

文革前的鄧小平

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 | 鍾延麟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文革前的鄧小平

毛澤東的「副帥」 (1956-1966)

鍾延麟 著

版權信息

《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
鍾延麟 著

© 香港中文大學 2013

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 (ISBN) : 978-962-996-556-3

出版：
中文大學出版社
香港 新界 沙田·香港中文大學
傳真：+852 2603 7355
電郵：cup@cuhk.edu.hk
網址：www.chineseupress.com

Deng Xiaoping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Mao's "Vice Marshal" (1956-1966) (in Chinese)
By Yen-Lin Chung

©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62-996-556-3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 Tin, N. T., Hong Kong
Fax: +85226037355
E-mail: cup@cuhk.edu.hk
Web-site: www.chineseupress.com

Printed in Hong Kong

書 名：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

作 者：鍾延麟

版 本 號：V1.0

最後更新時間：2013年07月11日

本書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授權Info Rainbow Limited全球電子版獨家發行，掌上遊科技提供技術支持，非經書面授權，不得轉載和使用，版權所有，盜版必究。

聲明

本書內容僅代表作者之立場觀點，與Info Rainbow Limited無關。

[Directory](#)

[扉 頁](#)

[版權信息](#)

[作者簡介](#)

[陳永發序](#)

[林蘊暉序](#)

[緒論 鄧小平研究中模糊的「副帥」時期](#)

[第一章 擔任中央總書記的背景原因與組織角色](#)

[第二章 具體部署全黨整風、督導實行「反右派」 \(1957\)](#)

[第三章 領導軍隊整風 \(1958\)](#)

[第四章 「大躍進」前期高揚紅旗 \(1958-1959\)](#)

[第五章 「大躍進」後期續揚紅旗 \(1959-1960\)](#)

[第六章 參與管理中共的黨對黨外交 \(1956-1966\)](#)

[第七章 「大躍進」後緊跟不上毛澤東 \(1961-1966\)](#)

[結論 從毛的「副帥」到「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徵引文獻](#)

[後 記](#)

[更多書籍](#)

作者簡介

鍾延麟，現任台灣國立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東亞研究所助理教授。曾赴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研究所訪問，並於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澳大利亞Monash大學中文系進行博士後研究。曾在The China Quarterly、The China Journal、《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中國大陸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二十一世紀雙月刊》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

陳永發序

2005年底，鍾延麟到我台北中央研究院的辦公室來找我，要我擔任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當時我認為自己並未在政治大學兼課，而且學術和行政兩方面的職責已壓得我有點透不過氣來，加以婉拒。可是他不肯死心，仍然再三前來懇求。經不起他的美言美語，尤其認識了他凡事不肯輕易認輸的個性以及探索研究領域的熱誠後，終於心軟，答應了他的邀請。

當時我問他，將來寫博士論文想寫什麼課題，他說鄧小平與中共高層政治。聽到答案，我忍不住立即表示反對之意，原因是進不去中共的中央檔案館。中央檔案館不對外開放，連職司中共黨史和國史修撰的研究人員，都不准隨意借閱檔案，何況是在一般教育機構任職的中國大陸教授了。延麟這種從「蔣幫」學術機構前來的研究生當然更不可能登堂入室。我知道中國大陸的地方檔案館，相對開放，因此建議他另外找一個題目，沒想到延麟擇善而固執之，堅持研究中共黨史一定要從研究中國的高層政治著手，即便中央檔案館不肯開門，但他認為還是可以在中共中央已經公佈的各種文獻中蒐集足夠素材，加上中國大陸出版的大量回憶錄和網上資料，應該大有可為。縱使官方資料受到控制和封鎖，回憶錄千篇一律，網上資料又真假難分，但並不表示鄧小平是沒有研究前途的研究課題。我說服不了他，就心想權且讓他試試，碰壁之後，自然會回心轉意。

延麟念研究所以後，半工半讀，並無富爸爸可資依靠。為了克服文獻不足的問題，省吃儉用，卻還是湊足旅費，屢次到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去省級地方檔案館尋訪資料，不料竟然找到一些原來認為只有在中央檔案館才能看到的高層文件。更重要的是他認識了許多中國大陸的同行和長輩。這些同行和長輩無法為他打開中央檔案館的方便之門，卻非常慷慨地分享他們研究多年的心得，並為他介紹中共高層政治運作的習慣和氛圍，結果四、五年下來竟然寫出一本值得閱讀的鄧小平研究。明顯地，我當初的判斷是錯誤的，嘴裡沒有明說，心裡卻感覺欣慰，好在不曾堅持己見，並協助他申請國科會的一年補助，到美國加州柏克萊見識高明，完全放任他就其個人興趣，發展潛力。從看他的論文章節和聽他的心得報告中，我看到他的學術成長，同時也學到許多對中共高層政治的知識。教學相長，確實是人生一大樂事。延麟繳出博士論文以後，為使論文更臻完善、更像一本專書，又花了兩年時間在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後，並從國科會申請獎助到澳洲游學一年，與當地的知名學者切磋心得。此外更抽出大量時間閱讀最近幾年才發佈和出版的鄧小平文獻以及文革小報資料，增添內容。這就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一本不同於其原始博士論文的新書，我感覺與有榮焉。

鄧小平可以說是九十年中共黨史中，重要性僅次於毛澤東的人物。1997年以93歲高齡辭世，迄今已十餘年，但觀察中國大陸當前的政治和經濟發展，仍然得說，基本不出二、三十年前他領導中共告別毛澤東革命後開創出來的基本格局。像他這樣重要的歷史人物，當然關於他一生的各種傳記競相問世。鄧小平最疼愛的女兒鄧榕就打破中共慣例，為他寫了上下兩卷傳記。最近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也以他的改革開放為題，寫了一本精彩傳記，翻譯成中文，聽說膾炙人口。

奇怪的是，在眾多的傳記之中，不見有歷史學者詳細討論他擔任中共總書記十年的生涯。即便提到他擔任總書記時期的作為，也都是寥寥數語，語焉不詳，不知道他在這一個關鍵位置上究竟如何盡忠職守。我們得到的印象反而一般只是，鄧小平跟劉少奇、周恩來以及陳雲一樣，始終都是毛澤東激進、過左政策的煞車者，因此獲罪於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為走資本主義路線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陪劉少奇挨批挨鬥。其實，正如延麟所指出，真實的情形並非如此。1959年春，毛澤東在決定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的一次中共中央委員會會議上，便不顧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陳雲等其他政治局常委在兩旁坐著，忽然對全體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宣佈，他是大躍進的大元帥，要向大家推薦鄧小平為副帥，兩人一正一副，總攬大權，領導全黨上下闖過大躍進帶來的難關。其實早在1956年9月毛澤東便已設置六人政治局常委會，以原書記處的五位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以及另一位新任命成員組織之，負責大政方針和重大政策的擬定，此外拔擢年輕的優秀幹部成立新的書記處，要鄧小平以政治局常委身份兼任新設置的總書記，率領其他成員貫徹政治局常委會的意志和決定。通過這一項重大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安排，毛澤東實際上是以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委員會主席身份把持政治局常委會議，並通過真正負責一線工作的鄧小平，在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後，領導中共全黨進一步動員和組織全民從事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當時鄧小平已經是毛澤東領導體制的副帥，只不過他口裡尚未發佈這項訊息而已。

鄧小平出任總書記以後，奉行毛澤東旨意，也就在1957年根據毛澤東所迷信的中共延安經驗，在黨內掀起邀請黨外人士幫忙的整風運動，隨後又主持了事先未曾逆料到的全國「反右派」運動，進而更以「反地方主義和分裂主義」為名，激化黨內幹部之間的各種矛盾，動員全黨輿論，為毛澤東的大躍進鋪路，隨後又以「反教條主義」為名，動員人民解放軍，以反「反冒進」和「反右傾機會主義」為名，動員各級軍政幹部和各級黨委書記，率領全國人民大躍進，力圖實現工農業高產的經濟奇蹟。在大躍進竟然帶來大饑荒以後，毛澤東更要鄧小平以挖掘「修正主義」罪惡為名嚴詞指斥蘇聯黨的內政和外交，且向亞非拉國家輸出毛澤東式革命，動員全國人民的民族主義情緒。關於這些黨內外鬥爭，我們耳熟能詳，但是對其

理解卻多半帶有兩點忽略。第一點忽略是，儘管已經體認到毛澤東發蹤指使的角色，卻總忘記他掀起政治運動，必須仰賴總書記鄧小平率領全國各級黨委貫徹意志。第二點忽略是，嚴重低估或全然否認黨內外鬥爭對動員和組織幹部以及群眾所起的激勵和團結作用，因而僅注意過程中受害者的清白無辜，完全不見毛澤東整風和鬥爭所帶來的思想和組織認同。換言之，集中注意力於毛澤東的過左冒進，以致忘記他是如何透過整風和鬥爭來取得內部思想共識。同時也因為毛澤東以地方促進中央、以群眾決定一切代替史達林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從而忘記毛澤東在分散權力的同時也高度集中權力，就是強調鋼鐵般組織紀律和一元化黨的領導，要求各級黨委書記大權獨攬，發揮其最大程度的積極性，在享受下放和分散的經濟規劃權力之際，卻全然不敢違抗上級追逐各項生產高指標的意志，結果鬧出三年大饑荒的人間慘劇。

鄧小平在上述政治過程中，逐漸體會到以黨內鬥爭和整風動員全黨全民搞經濟突破，終究會得不償失，弊大於利，乃是注定帶來災難的治國之道，尤其體會到毛澤東以改變生產關係來促進生產力理論的全然不切實際，所以與日暮途窮感覺越來越深重的毛澤東漸行漸遠，而終於淪為毛澤東拋棄和批鬥的對象，最先是附在劉少奇後面加以徹底打倒，後來雖然讓他重返權力核心，卻又因為他拒絕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歷史地位，而加以鬥倒鬥臭。在此政治命運起伏的過程中，鄧小平應該更能體會毛澤東以政治運動和群眾動員搞革命方法的錯誤，亟思改弦更張之道。毛澤東死後他乘機重返中共中央，取得最高權柄之後，立即改變中共治國路線。由於無法徹底否定毛澤東個人，於是決定重新詮釋毛澤東的思想，將其一分為二：一方面肯定毛澤東「正確」的思想，用以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中共專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否定毛澤東的「錯誤」思想，實際則全面告別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為中共創造完全不同於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和社會格局。

關於鄧小平擔任總書記十年的政治歷史，延麟有仔細的鋪陳和剖析，當然從完美主義的觀點來看，他並未能完全突破文獻不足徵也的困難，尤其缺乏關於鄧小平內心世界的個人資料，故有些討論不免揣測，但是延麟重建的史實有根有據，而他提出的觀點尤其值得咀嚼。今天談論中共高層政治的著作充斥坊間，若非頌聖，即為扒糞，再不然就是缺乏新義，人云亦云，可以看到的史學著作其實屈指可數。其中最大原因就是中共中央嚴格控制研究資料和有關檔案。正因為如此，延麟這一本新書顯得尤其難能可貴。它充分證明，儘管中共通過管控檔案編織的文網如何嚴密，研究中共高層政治的學者，辛苦耕耘之後，也可以重點突破，拿出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學術成績單。是為序。

陳永發

2013年6月4日

林蘊暉序

我和鍾延麟同學相識，是2006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那年2月，我應香港科技大學文化研究中心邀請，作「重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講座系列的演講，然後轉到香港中文大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四卷——《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作最後的修訂。延麟事先從服務中心熊景明主任處得知我將到訪，當我到達中心以後，很快就自我介紹與我交談。

延麟首先向我介紹的是他正在從事博士論文的研究和寫作，題目是「十年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1956-1966）。給我的第一印象，這真是個好題目、也是個大題目，確實是現有鄧小平研究中的一個空白。能讓博士生做這麼一個大題目的導師，肯定是一位很有眼光的老師；能承擔這個大題目的學生也肯定是一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有較好基礎和有相當研究潛力的學生。當延麟向我談了他目前的研究狀況和對相關問題的提問以後，我曾向熊景明主任談及，鍾延麟這個年青人很不錯，從他掌握的材料和提出的問題可以看出，很用功、很刻苦，做學問很踏實。熊景明主任脫口而出：在台灣也是「鳳毛麟角」。說明延麟確是年青學子中的尖子。此後，延麟一直和我保持聯繫，除2007年再次在香港中文大學、2008年至2011年他三次來北京訪問相見外，更多的是電子郵件的交流，幾乎他完成的每一章書稿都發給我徵求意見。我想這就是他邀我為這部書稿作序的原因吧。

1956-1966這十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多事之年」，經歷有1956年的中共「八大」、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1958年軍隊系統的「反教條主義」、1958年-1960年的「大躍進」、1959年-1961年的大饑荒、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1961年-1965年的國民經濟調整、中蘇論戰、「四清」運動、文藝批判等等，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國際共運和外交的方方面面。要弄清每件大事的歷史背景和來龍去脈已屬不易，更不用說要深入到這一系列大事的內層去探討作為總書記的鄧小平所處的角色、發揮的作用和造成的影響，何況還是生長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台灣學子，難度就更可想而知了。

對十年總書記鄧小平研究的困難，最難的是缺少第一手的歷史資料可以查閱。延麟的功夫不僅下在已正式出版的中共中央領導人的選集、文集、文稿、年譜、傳記、中央文件選編，各種人物的日記、回憶錄、口述史，當年的報紙、刊物，參考消息，「文革」中的紅衛兵小報等等；而且從看似與鄧無關的更廣泛的書、報、雜誌發表的文章去尋找有關鄧的點滴資料。我們從全書的注釋可以看出閱讀範圍之廣，書刊品種之多。正是經

過這樣的艱苦努力，才使他有可能對鄧小平在這十年的每一重大決策和貫徹執行過程的作為，做出有血有肉的敘述和自己的評估。概括來說，這本書的特點是：

一、以鄧小平是毛澤東在構思與推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所倚重的主要助手，作為全書的切入點。

以「毛澤東的『副帥』」命名的十年總書記鄧小平，顯明地點出了本書主人翁的歷史地位及在期間所發生的重大影響。那麼，鄧小平何時成為毛澤東「副帥」的呢？

延麟在第一章〈擔任中央總書記的背景原因與組織角色〉引用李雪峰回憶的一段話說：「毛澤東強調：『書記處是中央委員會的辦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們去做，抓全面工作，發文用中央名義。』」^[0-1]關於中央書記處的職權，中共八大黨章規定：「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之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所以，李雪峰借用毛說的這段話與黨章的規定是一致的，並不說明當時鄧小平已居「副帥」的地位。書記處職權的擴大，是1958年的事。

1958年春，毛澤東對周恩來等在1956年經濟建設中力主反對急躁冒進傾向，強調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並借此發動「大躍進」。為進一步集中權力和有力地推進「大躍進」的決策，1958年6月8日，毛澤東在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稿上，加寫了一段有關中央職權重新劃分的重要文字。全文如下：

黨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這些小組是黨中央的，直隸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它們直接做報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只有一個『政治設計院』，沒有兩個『政治設計院』。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都是一元化，黨政不分。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政府機構及其黨組和黨中央一同有檢查之權。」^[0-2]

毛澤東專就這一重要決定向劉少奇等交代說：

即送劉、林彪、小平、彭真、周、朱、彭閱，交小平辦。
此件加了職權劃分，小組成員也有些增加，請你們閱後，退小平提付政治局討論、通過，然後發出。有不同意見，請即告我。^[0-3]

這一職權劃分，明顯超越了八大黨章中央書記處職責的規定，極大地強化了中央書記處的職權，削弱了周恩來領導的政府機構的權力。這一權力格局的重建，就是毛澤東：「我為正帥，鄧為副帥」之說的由來。^[0-4]

由此作者認為，作為毛澤東政治副手的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中共黨的組織與運作中，擔負承上啟下、連結各方的作用：領導中央書記處秉承執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決定（鄧也參與獻策），並處理黨、政、

軍、文教、外事等全面工作；代表黨中央對地方黨委、政府與軍隊進行領導。鄧小平在制度上所處的樞紐地位，使他與「文革」前各項重大決策、運動及政策，不但密不可分，更是扮演重要角色。

正如本書評審專家指出的，儘管中國大陸關於鄧小平的研究著述甚豐，但大都是敘述其早年進行革命的經歷或晚年改革開放的業績，對這一「前」—「後」，著者濃墨重彩；唯獨對中間這十年，要麼淡寫輕描，要麼索性迴避。其原因在於研究難度太大。海外的研究，也是關注其晚年經歷較多；至於「總書記十年」，雖非絕無著述，但亦失之籠統，語焉不詳。故迄今關於鄧這十年的歷史研究仍顯薄弱。我以為，延麟的《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一書的出版，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填補這一「空白」。

二、本書作者著力於對鄧小平如何輔助毛澤東，形成與推行這十年的一系列新政策和運動的研究，其立論有理有據，是相關研究的一大進展。

正如評審專家所肯定的，作者在紛繁蕪雜且分散零星的史料裏扒犁剔擇，細心勾連，相當細膩地梳理了鄧在整風反右、軍方「反教條主義」、「大躍進」、「反右傾」、中蘇論戰、「四清」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史實，就若干重要史實作出了有說服力的新考證。書稿不僅還原了史實真相，尤其凸顯出「文革」前鄧在中共高層權力架構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出了此一時期中共政治運作是「主事在毛，成事在鄧」的基本判斷。

作者認為，毛澤東在領導摸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推出的整風、「反右派」、「反教條主義」及「大躍進」等運動，主要是沿用革命時期的經驗：以政治運動的方式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並調動黨員與群眾的積極性。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一項重要職責，就是負責對相關運動進行具體部署：一是代表毛澤東作中央具體規劃與佈置，負責執行並監管其進度；二是代表毛澤東與中央激發、鼓動並引導各級黨政幹部的幹勁與熱情。鄧小平從中多能準確掌握毛的政治意圖、嫻熟運用運動（整風）方法，在落實中與實際情況適度結合，將之發展、充實。其中也融入了鄧自身急見成效的政治特性與鐵腕作風。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觀察到鄧小平在領導組織與具體部署的過程中，並非簡單地照本宣科，而是享有一定的裁定權限與操作空間，對於事態的發展也能產生強化或弱化的影響。譬如在「反右派」的擴大化、「反教條」的逼供上綱、「大躍進」的失控，以及批「蘇修」的不留餘地，皆可見鄧小平個人的突出作用。鄧小平在「大躍進」後的經濟調整對策與國內治理方向上，由於未能讓毛滿意，甚至令之起疑，最終在「文革」初期被毛解職。

三、本書在重建、研究鄧小平「文革」前十年歷史的基礎上，進一步

討論了其與鄧晚年推行「改革開放」之間的關係。

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時期的諸多正反經驗，乃是他後來推行「改革開放」的關鍵歷史緣由。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若干重要施政作為，如：廢除以階級鬥爭為綱，確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生產力作為社會主義的第一要務，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等等決策，在相當程度上是經過十年「文革」之後，反思其「文革」前十年的治理經驗教訓而來。在「文革」結束後的1980年代前期，鄧小平在談到歷史經驗時多次說道：

「什麼叫社會主義，什麼叫馬克思主義？我們過去對這個問題的認識不是完全清醒的。」^[0-5]「社會主義是什麼，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過去我們並沒有完全搞清楚。」^[0-6]進而強調指出：總結歷史經驗，最重要的一條經驗教訓，「就是要搞清楚這個問題」。^[0-7]從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作出的「改革開放」決策，正是基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再認識。

對這本書稿的學術價值，評審專家給予了很高評價，指出：該書稿的學術積累（史料搜集、史實考辯）的功夫在同題相關著述中僅見。書稿的基本立論均為作者獨立見解，且有新的分析和考證。書稿關於宏觀背景和具體史實的敘述基本準確。書稿脈絡清晰，條理分明，結構比較合理，語言也流暢，持論較客觀，如既指出鄧在反右、批判軍隊「教條主義」、「大躍進」中負有的重要責任，也承認在其間出於種種考量所作的調整、舒緩。該書稿是一部相關專題的上乘之作。鑒於本題目的重要性和同題相關讀物的稀少，該書稿將引起專業研究者和知識界讀者較大關注，同時愛好歷史的一般讀者也會有閱讀興趣。我以為，評論專家的上述評論和肯定，是客觀的、符合實際的。

曾有一些學者看過這本書稿，對他們提出的問題和有關對歷史人物研究的視角，我想在這裏談點個人看法，和海內外學者討論。

一、有的學者提出「作者對於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修改黨章報告時從黨章中把『毛澤東思想』拿掉一事隻字未提，不知有何緣故？毛澤東一直把自己作為中共幹部、黨員的『導師』，對於自己的思想『毛澤東思想』非常在意。但鄧小平把『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去掉，毛澤東有何反應？作為總書記，他只是遵循毛澤東的政策，卻不是按毛澤東思想辦事。對他來說，毛澤東是『領袖』，而不是『導師』。毛澤東如何看？毛澤東的反應如何體現在毛、鄧互動上？」

中共「八大」黨章未寫「毛澤東思想」一事，已是個老問題了。本人在《中共黨史研究》1991年第6期就曾發表〈中共八大黨章未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原委〉；沈志華教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卷中也專門寫有一節：「八大不提『毛澤東思想』」。闡明不提「毛澤東思想」正是毛澤東本人的意見，時間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這與當年斯大林和

蘇共中央拒絕承認「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有關），明確提出必要時可改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字樣。據此，1954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根據中央書記處的指示正式下達了〈關於毛澤東思想應如何解釋的通知〉，解釋說：「黨章已明確指出：『毛澤東思想』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它的內容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同一的。」「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後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後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通知稿時加寫了一句：「在寫文章做講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0-8]由此可見，不提「毛澤東思想」在中共黨內高層早已形成共識，何況這是由毛澤東本人提出的。中共「八大」黨章不再寫上「毛澤東思想」，當然就按慣例和成規了。針對此問題，延麟後來在書稿第一章中也作了適切的回應。

有的西方學者認為，中共「八大」黨章不寫「毛澤東思想」，「進一步證實毛大權旁落」，是「劉少奇可能的確試圖減少毛澤東的作用」，以及所謂「把毛澤東思想的部分從新黨章中刪去的提議，最初來自彭德懷」等等，顯然是依據「文革」期間紅衛兵小報對劉少奇、彭德懷的所謂批判材料作出的猜測。

二、有的學者指出：「『七千人大會』鄧實際上是為毛澤東護短的，以往不知此情，現在有研究文章零星披露出史料，表明鄧在林彪講話之前，已經做了不少為毛護短的工作。」

有關「七千人大會」期間，鄧小平為毛澤東護短的情節，延麟在第七章援引張素華、吳冷西等人提供的材料評論說：

1962年初，中共中央舉行旨在檢討「大躍進」錯誤的「七千人大會」。相較於林彪在「七千人大會」公開講話中力挺毛澤東（此舉常被看作是惡名昭彰的政治投機行徑），鄧小平支持毛的堅定立場，實也不遑多讓。在會議的籌備階段，鄧小平向毛澤東並中央常委提交書面報告，檢討由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在此前幾年的工作，表明應對「大躍進」運動失誤負起主要責任，並為毛個人的錯誤開脫。鄧小平表示：「總的來說，毛主席歷次反映我們根本路線、政策的議論，是正確的，但我們有若干具體政策措施，與指導思想相違背」，「是許多具體的問題、具體政策違背了毛主席的指導思想」。另外，對於陳伯達奉鄧小平指示整理而成的「大躍進」以來的中共中央文件輯錄，鄧也強調：經研究的結果，毛澤東在此一時期的語錄，作為黨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的指導思想，沒有錯誤。鄧小平主動攬責在身、不遺餘力維護領袖威信的報告，毛澤東閱後都有些不好意思，他對鄧小平等人表示：你書記處寫了一個報告，什麼都是執行我的指示，理解不深，執行也有偏頗，你們把我當成聖人，不是閒人已經不錯了，你們不批評我，我自己也要作自我批評。「七千人大會」期間，中共中央為討論修改劉少奇的大會報告稿成立一個專門的起草委員會，在其開會的過程中，鄧小平在人民公社問題上強調：「當然是跟主席走！」擺出「唯毛是瞻」的態度。

我在司馬清揚、歐陽龍門合著的《新發現的周恩來》中，也看到該書作者在引用周恩來在向「七千人大會」報告的起草委員會作的有關「大躍進」

錯誤責任問題的講話後，評說：「如果將周恩來的講話與林彪對比，則發現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官吏對於兩者的評價則是天淵之別。」延麟在這裏也認為鄧小平支持毛的堅定立場，相較於林彪「不遑多讓」。

首先要指出的是，書稿所引鄧的兩段文字，是準確的。但是，這裏有一個如何比較的問題。

鄧小平的上述講話，周恩來也講過類似的話，周說：「主觀上的錯誤，要著重講違反毛澤東思想，個別問題是我們供給材料、情況有問題，應由我們負責，不能叫毛主席負責。如果不違反『三面紅旗』的思想、毛澤東思想，的確成績會大些。」「主席早發現問題，早有準備，是我們犯錯誤，他一人無法挽住狂瀾。現在要全黨一心一德，加強集中統一，聽『船公』的話，聽中央的話。中央聽毛主席的話。」^[0-9]

林彪說：「我們黨提出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是正確的，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兩、三年來，我們國家在某些方面發生了一些困難。這種困難，是多方面造成的。……我們工作上也有一些錯誤。可是這只是工作上的錯誤，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其中，林彪還專門有一段「付學費」說。稱：「我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們在精神上卻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方面，也有所得的一方面。」「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學生付學費一樣，學出來以後作用就很大了。」「我們付出一點學費是值得的。」^[0-10]

粗看起來，鄧、周、林三人講的內容無太大的差別，只是林彪講得更系統、更深刻一些。值得探討的是，三人所處的位置和講話的場合有很大的不同。鄧是總書記，處於發號施令、督促檢查的位置；周是國務院總理，負責具體執行。他們的講話確有維護毛澤東威信的一面，但檢查自己的一份責任也是符合實際的。當然，無論是維護毛，還是自己攬責，都明顯太過分了。更為重要的，鄧是在以中央書記處名義寫給毛的報告中為毛包攬了責任；周是在報告起草委員會上講不能追究毛的責任。而林彪是在

「七千人大會」的全體會議上講的這一番話，並以黨的歷史加以論證，當場得到毛的肯定，繼而整理下發全黨，其影響所及，鄧、周那幾段話顯然不能同日而語。如果再與1960年林彪主持軍委擴大會議重釋毛澤東思想的決議（毛澤東親自修改並指示「印發黨、政、軍、民各系統」）、^[0-11]此後從解放軍開始在全國範圍掀起的學《毛著》運動聯繫起來考察，林彪這個講話在1960年代的造神運動的作用，更非他人可比。當然，把林彪這番講話片面指責是一種投機鑽營也是不妥當的。

需要探討的再一個問題是，中國大陸境外的學者尤其是西方學者，往往多從個人功利得失的視角去觀察和分析中共領導人之間的關係，作為生長在台灣的學子也不能不受此影響。

如：延麟的期刊論文〈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對鄧與毛澤東、劉少奇之間互動的描述。偏重於把整個事件中的每一個人、每一個舉動都看成帶有個人利害得失的考量，給人的感覺毫無是非之分。毛是很重視自己權威的，但在用人的問題上也不單純是從維護自己的權力出發。對鄧和劉的關係簡單用「挺」和「回報」來形容，也欠妥當。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幾位中央領導人的發言，除鄧外，沒有別人涉及政治方面的內容，唯鄧正面談了對劉天津講話的看法，鄧不會不知道毛對劉的天津講話的態度，說明鄧並不完全看顏色行事，而是敢於發表自己意見的，把這簡單稱之為「挺」劉，就沒有本來的政治意味了。

又如：延麟書稿第二章的前身（期刊論文）〈鄧小平在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中之角色〉文中，對毛澤東作出「反右派」的決策，鄧小平的反應和表現有如下描述：「對毛提議的對黨整風方式，更是自始即無排斥之想法。當毛澤東感到有人藉機肆意攻擊中共、意圖謀反，登高一呼展開對『右派』的反擊，朝中重臣無人不從，生怕落於人後，鄧小平也不例外。」「除了政治上的『唯毛是瞻』，鄧小平經毛澤東推薦出任中央總書記尚不及一年，對於由毛發起的整風、『反右派』，鄧小平就算不搶立新功、急爭表現以回報感遇之恩，或許也有不願辜負毛所望的心理。」

這裏的「生怕落於人後」、「回報感遇之恩」之說，明顯與該文所述反右「正是鄧小平自身對維護共黨政權的意志和敏感」，以及「人家要殺共產黨」的形勢判斷相悖。「對維護共黨政權的意志和敏感」和對所謂右派進攻形勢的判斷，正是鄧與毛的共同理念和看法，並非簡單的所謂「唯毛是瞻」、「回報感遇之恩」所能說明。

再如：第三章〈領導軍隊整風〉，專有一節「決定劉伯承到會參加整風」。文中寫到劉伯承是否到會檢查，包括彭德懷在內軍內高層認為劉帥有病，不必到會，會中意見可整理報送劉帥。但「會議主持者鄧小平卻反

其道地表示：『劉帥能來出席比不來好。』」對此情節，書稿作如下解讀：「鄧小平驅使軍委負責人『邀請』軍隊『教條主義』問題的重要關係人劉伯承到會，確可對會議在批判『教條主義』問題上，起到火裏添薪、助火旺燒的效果。何況，最先提出要劉與會的聲音，乃是出於會場中鳴放的意見。順之要劉出場，既有『民意』的基礎，還可以不挫傷『反教條主義』積極分子的革命熱情。」「鄧小平更深層的考量，恐怕還有他對毛澤東心意的順應與迎合，以及自己權力利害的計算。」

把鄧的「劉帥能來出席比不來好」一語，解讀為：鄧「對毛澤東心意的順應與迎合，以及自己權力利害的計算」，以及鄧扮演了「決定劉伯承到會一事上的推手角色」。恐怕也有偏頗。對這一情節，《彭德懷全傳》作者如是說：

80年代中在評審《劉伯承傳》第一稿時彭德懷傳記組組長王燄（50年代曾任彭德懷辦公室主任）曾在討論會上發言說關於劉帥帶病來京檢討一事他親身經歷了一個重要情節：一天鄧小平從毛澤東處回來和彭德懷談劉帥要不要出席大會問題，彭德懷說劉帥有病就不要來了，鄧小平面有難色，說：「來一下比不來好」。彭德懷就沒有說什麼，領會到這是毛主席的意思，王燄當時在場。

請注意「鄧小平面有難色」一句，表明鄧對劉帥「來與不來」有左右為難之處。《彭德懷全傳》在同頁接著說：

黃克誠於6月18日晚，在主席團會議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工農兵學商，農業先解放，其次是工業、商業也已解放，沒有解放的就是軍隊和教育界。前年曾和董純才談過話，說你們是蘇聯的教育部？還是中國的教育部？如果是外國的就撤銷。劉伯承同志從來是講話的，整風沒有講，勝利後又照搬。」

至此，已完全清楚，劉伯承到會把延安整風未講的話講一下，符合毛澤東的意願。6月14日鄧小平的意見是有來頭的。^[0-12]

6月29日，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就直接點了劉伯承，說：「劉伯承不以自己為主」，「兩頭沒有搞好，一頭是他到中央蘇區時沒有搞好，教條主義開始是依靠他，那時起了不好的作用」，「一頭是革命勝利後，在軍事學院一段沒有搞好。中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表現都好，這段時間長，工作好，很努力，所以兩頭短，中間長，兩頭小，中間大」。^[0-13]

可見，鄧小平「來一下比不來好」一語的含意是，劉帥來京參會有利於爭取主動，以免引起毛的誤會。完全是出於好意，絕非要把劉推到前台作批判的靶子。請看毛澤東在1959年中共八屆七中全會的講話，毛在歷數與一個個老同志結怨時，專門講到「劉伯承同志我們兩個是不是鬥得厲害？我還寫了書，戰略問題，那就是批評你的，你也沒有答覆。後來你在軍事學院大概是想答覆一下，沒有尖銳地提出那些問題來批評，因為我那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不能駁的，是駁不了的。那裏頭批評了

劉伯承，批評了任弼時，沒有指名字。任弼時封我一個『狹隘經驗論』；劉伯承封我一個『怕打爛罈罈罐罐』，軍事上不行。」「但是你們是反對派，你們的官還可以做，我不報復。去年報復一次，不是我報復。去年報復是開軍委擴大會議，四五百人，是你們犯了錯誤，把你們這一批評，我就開心了。」^[0-14]

所以，書稿中將「來比不來好」一語，作出是鄧「對毛澤東心意的順應與迎合，以及自己權力利害的計算」，扮演了「決定劉伯承到會一事上的推手角色」的判斷，是不是有點誤讀。

再如：第七章〈「大躍進」後緊跟不上毛澤東〉說「在『包產到戶』問題上，鄧小平視之為農村紓困的可行對策，反映務實傾向對其治國思考的影響，只是在毛澤東的堅決反對下無法堅持己見」。

在1960年代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對農村政策鄧曾有過「白貓、黑貓」說，但毛澤東的底線是不得超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包括鄧在內曾一度認為「包產到戶」也可行的意見遭到否決。這當然有「在毛澤東的堅決反對下無法堅持己見」的一面。但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共識，即社會主義農業只能是集體化，個體經營則有背於社會主義。這一基本理念，就鄧而言，也非容易超越。直到1980年5月31日，鄧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放寬農村政策可以搞「包產到戶」問題時還說：「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準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準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0-15]請看，這裏仍然把集體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不可背離的方向，從歷史發展來看，似乎到1980年代中期，這種觀念才慢慢淡化。所以，應該說當年鄧放棄「包產到戶」、接受毛的主張的作為，也含有鄧的主觀認識因素在內。

我在這裏提出的以上幾點，是想說明對歷史的解讀，視角應該更寬廣一些，目的是提供學界討論，並無對書稿的學術價值有任何的貶意。如果可稱為不足的話，也瑕不掩瑜。何況，當年論文中的個別問題，書稿已另有表述。

最後，值得提及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傅高義先生的《鄧小平時代》（中文版）。時隔一年，《文革前的鄧小平：毛澤東的「副帥」（1956-1966）》在同一出版社出版，從對鄧小平這個歷史人物的研究來說，確實是件可喜可賀的事。在此向延麟表示由衷的祝賀。

林蘊暉

2013年4月22日

於廣東佛山碧桂花城

注釋

- [0-1]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二十四年〉，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221。
- [0-2]〈對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7冊，頁268-269。
- [0-3]〈對中央決定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稿的批語和修改〉，頁268。
- [0-4]〈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提綱〉，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8冊，頁196。
- [0-5]〈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載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頁63。
- [0-6]〈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載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頁137。
- [0-7]〈政治上發展民主，經濟上實行改革〉，載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頁116。
- [0-8]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361-365。
- [0-9]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09-110。
- [0-10]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42-145。
- [0-11]〈對《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和中央轉發這一決議的指示稿的批語和修改〉，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9冊，頁383。
- [0-12]彭德懷傳記組：《彭德懷全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第3冊，頁1155-1156。
- [0-13]彭德懷傳記組：《彭德懷全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第3冊，頁1156。
- [0-14]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下冊，頁470-471。
- [0-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上冊，頁641。

緒論

鄧小平研究中模糊的「副帥」時期

1959年4月初，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七中全會。在4月5日的閉幕會議上，中共最高決策機關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所有成員，全數到齊，坐在會場主席台上：黨主席毛澤東位居正中，滔滔不絕地發表演說，五位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以及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分坐兩旁。台下是全體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對於最高領導人的講話，與會高幹無不正襟危坐、洗耳恭聽。

出乎眾人意料之外，毛澤東在講話中說：

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叫毛澤東，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掛副帥，為副總司令，我們兩人一正一副，你是總書記嘛！我向你們要求這個權力，要你們通過。中央常委七個人，書記處十二個人，十幾人集中領導。但要掛帥，沒元帥怎麼行？我姓毛，毛遂自薦，我要掛帥，六億六千萬人，一千三百萬黨員，不掛帥不行。

他緊接著又說：

「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這是唐朝人的兩句詩，好像是《太平廣記》上的，要當秦始皇，當秦始皇就要辦事，先在常委、書記處討論，我和鄧小平掛帥。鄧小平你掛了沒有？你敢不敢？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也是常委會的總書記，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但是你也是我的總書記。不過你還是相當硬的，中央委員會那麼多人怎麼找到鄧小平呢？還是我找為好。^[0-1]

毛澤東本來就是中共的最高領導人，他自己說要「掛正帥」，眾人不曾不同意。解放軍元帥彭德懷個性魯莽、口無遮攔地對毛說：「你不早就掛帥了嗎？」說出其他人心中的疑惑。^[0-2]彭德懷沒有多想的是，此次全會決定毛澤東不再連任國家主席，改由劉少奇接任。儘管這個決定的起因是毛澤東自己想擺脫官場上送往迎來的繁文縟節，毛在劉少奇確定出任國家主席之後自稱「大元帥」，可能是要提醒大家：他不是國家主席，卻還是黨主席——真正當家、掌權的人。

當毛澤東講要鄧小平「掛副帥，為副總司令」時，滿座除疑惑之外，更感到震驚。毛擺明鄧小平就是他親自挑選的「副帥」，而一句「我向你們要求這個權力，要你們通過」，語氣之強硬顯得絲毫沒有商量的餘地。若仔細推敲毛的話，其中還有一層意思：他就是鄧小平「副帥」最大、最硬的後台，既然有此「靠山」，鄧小平就應要勇於任事、無所顧忌；毛同時也警告他人，對此不要有所異議，在鄧掛「副帥」行事時更不要干擾其工作。

據聞出身綠林、頗有江湖習氣的另一名元帥賀龍在聽完毛講話後，暗中詢問朱德：鄧小平是「副帥」，劉少奇的位置要怎麼擺？^[0-3]當時擔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回憶此事時也說：「這樣劉少奇擺到哪兒去」，「開完會回來，大家都議論，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呵，當然誰也不好去問」。^[0-4]

對毛澤東要鄧小平而非劉少奇「掛副帥」的說法，中共要人議論紛紛，不是沒有理由的。在中共中央還待在陝北延安、沒有取得全國政權之前，劉少奇就一直被視為毛澤東最重要的政治副手，而劉在此次中央全會上又被提名接替毛澤東出任國家主席，其作為毛的接班人的態勢更是明顯。但是毛澤東突然越過劉少奇，點名鄧小平當他的「副帥」，教人不吃驚也難。毛澤東此舉雖不至於有後來人揣測的「包含了要把劉少奇同志作為接班人撤下來的意思」，^[0-5]但有可能他是拉抬鄧小平以向劉少奇示警，使劉不要自以為在繼承大位的問題上，已勝券在握、成為定局。亦即劉還須如同既往地對毛戒慎疑懼、小心聽命，否則在接班問題上，難保未來不會「半路殺出程咬金」，被鄧小平取而代之。這並非隨意猜測，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最會揣摩毛澤東心意，聽到毛對鄧小平「封帥」後，就認定毛有視鄧為接班人的意思，從此便開始將鄧「當作黨的接班人來尊重和信任」。^[0-6]

引人進一步好奇的是，毛澤東在劉少奇之外另有四位副主席，但他為甚麼「賜封」鄧小平為「副帥」時，不順便提他們幾個人的名字一起共享「封號」呢？他選封鄧小平為「副帥」，是否為即興之作，抑或經過深思熟慮？事實上，從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人事佈局上，即可見毛澤東早有安排鄧小平成為他左臂右膀，甚至是自己未來接班人的構想。

中共自1949年10月1日正式建立全國政權後，歷經七年的經略，在1956年宣告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變革經濟所有制，建立社會主義生產關係），開始邁步進入所謂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同年9月，遂舉行「八大」，除公佈全黨的新方向與新任務外，也對高層的組織和人事進行調整。

在中共召開「八大」之前，中央書記處實際上是最高的權力機構，集決策權與執行權於一體。然而，中共「八大」將決策權與執行權分開：一方面成立六人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職司決策大權；另一方面則設置一個新的十人中央書記處，負責統籌執行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所作的決策並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在人事配置上，鄧小平既是政治局常委，與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一起與聞黨國大計（林彪在1958年5月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才被增選為副主席與政治局常委），也獲任新設的中央總書記，領導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負成敗總責。毛澤東要鄧小平同時肩負決策與執行大權，其意圖就是要鄧單獨負責推動新政策與運動。

1950年代中期，毛澤東在如何建設中國的問題上，想從蘇聯經驗之外，另覓較適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途徑，而這種政治實驗在中共「八大」以後全方位展開。毛在實行方式上，仍沿用延安經驗，特別是以政治運動（整風）的方式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並調動黨員與群眾的積極性。為了提升中共的統治能力並齊一思想，以便更好地領導全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1957年春毛澤東在黨政領域發動了一場以改善黨風、除弊革新為內容的整風運動。這場運動採取鼓勵人民（特別是黨外人士）對中共提出批評意見的方式，到中間展開「反右派」運動，在黨內、外獵捕政治異己。整風的矛頭在1958年漸次地擴延至其他領域：在經濟領域中，對中共建政以來仿蘇實行的經濟體制與方法進行批判，特別是反對首重穩步、均衡發展的「反冒進」政策，進而推出講求高速、多產的「大躍進」運動。同時又在軍事領域中，展開「反教條主義」，檢討、批判中共解放軍學習蘇聯軍隊經驗過程中，不顧自身國情與經驗的現象。在外交領域中，隨著中共在內政中更旗幟鮮明地尋求和採行有別於蘇聯的發展模式，以致於中蘇雙方對國際事務主張愈益浮出歧異，中共在對外關係上更敢於提出自我的看法與立場。

在鄧小平於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被毛澤東封為「副帥」的前一年，中共已宣告成功結束整風、「反右派」運動；在軍中進行的「反教條主義」運動，也在相關犯錯人士遭到高聲批鬥後，進入運動收尾與組織處理的階段。「大躍進」運動經過1958年最後一季的全國上下用命，業已度過第一波高潮；如何調整經濟計劃、實現連續第二年的經濟飛躍成長，則是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召開的一個重要宗旨。鄧小平因所任職位之故，對於以上接二連三出爐的政策與運動，皆參與相關決策並領導執行。毛澤東在1959年賜贈鄧小平「副帥」榮銜，也實是對後者的一種欣賞與鼓勵，包括：對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以來的工作表現，予以高度肯定與嘉獎；對鄧在中共「八大」後黨內的突出權位（其在「大躍進」初期又增添經濟管理大權），作進一步的確認，讓之更實至名歸，並對他賡續寄予厚望。

鄧小平在擔任中央總書記一職期間（1956年至1966年，也常被通稱為「文革」前十年）究竟扮演了甚麼政治角色，究竟發揮了甚麼政治作用，特別是作為「副帥」，他如何將「主帥」毛澤東對建設社會主義的宏圖與倡議付諸實踐？他有多大的權衡餘地？對於政策的實際結果又能產生多大的影響？他又何以從受毛寵信、重用的「副帥」到「文革」初變成毛要打倒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0-7]

關於鄧小平在「文革」前十年中央總書記任內經歷和作為的研究，中國大陸學者一貫依循「揚長避短」的模式處理，也就是刻意突出鄧小平政績斐然的一面，例如：對石油開發戰略的正確指示、在「三年困難時期」的力挽狂瀾、為規劃「三線」建設的西行探勘等等。但對鄧小平引人非議

的一面，則諱莫如深、不敢正視，例如：對鄧在整風、「反右派」的涉入情形，不是顧左右而言他，^[0-8]就是根本未置一詞；^[0-9]對鄧與軍隊「反教條主義」的關係，只強調他後來對此事翻案的功勞，卻從未細談他當年如何鑄成此案；^[0-10]對鄧在「大躍進」運動中的歷史，試圖加以掩蓋、甚至蓄意誤導；^[0-11]對鄧在中蘇關係中的作為，未見全盤的耙梳和超越愛國主義的解釋，對他參與輸出革命的情況，更是置若罔聞。^[0-12]這主要肇因於鄧小平晚年推動經濟改革，被中共官方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享有崇高的歷史地位與評價。出於「為尊者諱」的需要，鄧小平在「文革」前十年涉及敏感的歷史，就成為中國大陸學術研究的禁區，不容許實事求是的探討。

西方學者沒有政治忌諱，對「文革」前十年的鄧小平，可以暢所欲言。他們雖能碰觸中國大陸同行須得迴避的歷史議題如整風、「反右派」和「大躍進」，但因資料有限，也只能作一概況性的描述和判斷，而無法詳細鋪陳和細密佐證，所以存在「有粗無細」的問題。^[0-13]令人覺得空泛抽象、隔靴搔癢。至於鄧小平當時對中共對外關係與軍隊事務的角色與影響力問題，西方學者也有對前者認識不夠、開發不足，^[0-14]對後者嚴重低估、欠缺深究的缺點。^[0-15]

本書的目的是力求矯正並超越中國大陸出版物偏於評功擺好、海外相關著作流於點到為止的兩大缺憾，對鄧小平中央總書記任內的歷史，加以持平的呈現與進行深度的刻劃。希望如此可有助於還原、恢復鄧小平在此一時期真正的歷史原貌。

以鄧小平當時的重要職位與所處的關鍵地位，本書重建、研究其個人相關歷史，還有益重新檢視與認識他置身其中、擔任要角的「文革」前一系列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重大政治決策、運動與事件，以及他所經手操作的中共政治體制（包括：中央書記處制度，黨的一元化領導下的黨政、黨軍、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另外，鄧小平以中央總書記的身份參與國策長達十年之久，累積了黨內鮮有人可企及的豐富的執政正反經驗，對之加以了解，亦可對鄧在「改革開放」時期的主要施政作為的歷史溯源有所裨益。

在研究途徑與方法上，本書採取「歷史研究途徑」；^[0-16]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獻資料分析與歷史研究分析。^[0-17]在本書使用的文獻資料方面：集中收藏鄧小平原始檔案的中共的中央檔案館，作者雖然無法一窺堂奧，但經由其他的檔案館與管道，也有些斬獲；揭發、暴露鄧小平政治錯誤的「文革」批判材料中，也有許多對本書研究有用的內容與資訊。^[0-18]本書得利於近年來問世的大量中共歷史材料，包括：中共要人的年譜（特別是官方出版的《鄧小平年譜（1904-1974）》）、日記（幫助最大的是當

時常與鄧小平共事的楊尚昆所寫的日記）、文選、回憶錄、傳記，中共重要報刊與內部讀物（如高幹方能獲閱的《內部參考》），研究專著與論文、網路資料等。本書也使用國外收集的鄧當時對外往來的談話紀錄，冷戰期間「自由民主陣營」（包括：台灣、美國、英國）針對鄧個人與中共政情的情資報告，以及能披露鄧的視察情形與政策後果的地方志。

本書也使用訪談資料，^[0-19]作為文獻資料之外的重要補充。^[0-20]訪談對象除了少數曾與鄧小平有過直接接觸經驗者，最主要的是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與當代中國史的專家，尤其是官方治史機構的學者，他們有特別的機曾訪談中共要人與查閱檔案，經其轉述或介紹，對本書的研究有重要的輔助作用。

最後，對本書的內容安排進行簡要的說明。

本書乃以作者的博士論文為基礎。^[0-21]在寫作博士論文之前與期間，部分內容曾以期刊論文的形式發表。^[0-22]然而，由於作者在博士後研究期間的持續研究與追蹤，與本身對問題認識的深化，再加上有關重要資料的陸續面世與對之的蒐集整理，本書對相關主題的探討，在涵蓋的時間範圍與議題上，多有擴增；在內容論證與分析上，也大有作進一步的改寫與充實。^[0-23]

本書的時間斷限，是從1956年中共「八大」鄧小平出任中央總書記至1966年「文革」爆發他失勢為止，亦即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年」。然而，本書並無打算鉅細靡遺地討論鄧小平在此一時期的所有作為。對於官方大肆宣揚的鄧在「文革」前十年的業績，本書只擇要論及，以免重複討論。本書欲集中探討的是爭議性較高、但仍未充分而深入研究的重大議題，包括：鄧小平如何組織與運作黨務、指揮整風與「反右派」運動、領導軍內「反教條」、推動經濟「大躍進」，以及處理黨際外交和輸出革命。事實上，本書認為唯有儘可能地解答前述提出的議題，方能更完整而非片段地重新認識那些向來為中共津津樂道的鄧小平相關事蹟，進而在更全面的基礎上評估鄧在「文革」前十年中共政經發展中的角色和分量，並得以較確切地追蹤這時期的政治經驗對他之後「改革開放」政策所產生的具體影響。

本書的章節架構，除此緒論外，第一章探討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的原因和角色。鄧小平早期的政治經歷為何？他何以能「搏扶搖而直上」，雀屏中選中央總書記的要職？中央總書記與其所領銜的中央書記處，在中共黨機器的組織和運作中佔有何種地位和作用？鄧小平從中具有多大的政治權限與空間？這些是本章所欲解答的問題。

第二章探討鄧小平在1957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之角色和活動。

此一政治運動不但使得數十萬的敢言之士遭到政治迫害，更導致政治言路的長期閉塞，進一步地加劇中共統治「一言堂」的局面。然而，多年後，中共官方和鄧小平本人仍一直堅持其正確性與必要性，並強調其中若有不當之處，也僅是將之「擴大化」，也就是波及人數太多、處分稍嫌過重的問題。這章將探討在「整風」到「反右派」的轉折前後和運動後來流於擴大的問題上，鄧小平擔負何種角色、介入程度為何等問題。

第三章討論鄧小平在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中之角色和活動。「反教條主義」是中共在軍事領域嘗試走出自我發展道路的重要舉措，但是其後果卻是弊遠大於利：除了部分將領遭到不公的批判，更遲緩了中共軍隊現代化的發展。鄧小平後來回顧此事也不得不認為是一個錯誤。本章將聚焦於鄧在這場軍隊整風中的相關角色和作為。

第四章與第五章探討鄧小平在為時三年的「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和活動。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可說是中共在經濟領域所進行的大膽創舉，其實施的直接結果竟是數以千萬計的農民飢餓致死，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社會造成巨大破壞，甚至引發中共高層內部分歧的政治效應。對「大躍進」運動，鄧小平晚年嘗言其當時沒有反對、頭腦也發熱，然卻鮮少有細節的描述，以致模糊不清。這兩章關注的焦點在於：鄧小平在運動期間的具體角色和實際作為，以明確他與此一運動的關係和應負責任。

第六章討論鄧小平在中共黨對黨外交中之角色。從1956年起，中共與蘇共之間開始出現嫌隙，其後爭執升高，更擴及雙邊國家關係，最後演變成彼此劍拔弩張的局面。這也是中共自1950年代中期開始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愈加獨樹一幟的主要國際背景。鄧小平在中蘇關係惡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是本章所欲探討的問題。另外，東南亞緊鄰中國大陸，乃是中共較能發揮政治影響力的區域，也是中共推動黨際外交的重點地區。鄧小平在處理相關關係時主要從事哪些活動？如何配合當時中共對蘇共外交的需要？

第七章討論鄧小平在「大躍進」後的國內政治中緊跟不上毛澤東的情形。為因應「大躍進」運動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中共進行政策調整以緩解嚴峻的經濟情勢。與此同時，中共高層內部的緊繃關係和政策歧異徒增不減，更在之後防止黨國變質退化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國民經濟第三個五年計劃（「三五」）的規劃問題上表面化。在此階段，鄧小平何以逐漸失去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伊始即被迫交權的問題，是本章討論的重心。

最後一章是結論。其內容包括：一、扼要評述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任內的政治角色與作為。二、鄧在「文革」前的相關政治經歷，為其個人後來的政治生涯帶來的政治資產。三、中央總書記時期的經驗對鄧在「改革

開放」時期施政方針之影響。

注釋

- [0-1]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下卷，頁465-466。
- [0-2]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頁36。
- [0-3]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者（A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08年4月）
- [0-4]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頁36。
- [0-5]郭道暉：〈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頁4。
- [0-6]東夫：〈李井泉和四川大饑荒的特殊成因〉，載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香港：田園書屋，2009），上冊，頁337。
- [0-7]1987年4月30日，鄧小平回顧中共歷史時表示：「1966年開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這是一場大災難。當時很多老幹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內。我是劉少奇之後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是『統帥』，我是『副統帥』。」〈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載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頁227。
- [0-8]比如：武市紅、高屹主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頁35-41。其〈鄧小平與1957年反右派鬥爭〉一章中，竟鮮有關於鄧小平個人言行的記載，完全看不出鄧在運動中任何的實質角色和具體作用。
- [0-9]介紹鄧小平對中共重要歷史的參與角色的專書如：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竟無探討鄧與1957年整風、「反右派」的關係。此外，另一專著：閻潤魚：《共和國歷史上的鄧小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頁87。其敘及「反右派」也僅是三言兩語，根本未提到鄧小平。
- [0-10]具體的例子可見：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辦公室：〈一項提挈全軍的重要決策〉，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中冊，頁509-519。
- [0-11]例如：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頁161。武市紅、高屹主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頁51-52。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圖文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大象出版社，2004），中卷，頁20-21。蘇台仁主編：《鄧小平生平紀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462-463。張湛彬、劉杰輝、張國華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1），頁77-78。他們千篇一律地強調：鄧小平對「大躍進」的出台，「本來就有他自己的看法」，因而暗示他對「大躍進」持保留態度，只是被動回應；對「大躍進」的開展，鄧僅消極參與，採取「沉默」方式進行「抵制」。僅有極少數的著作持以不同的看法如：李健：《鄧小平三進三出中南海》（北京：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頁49。其表示：至少在1958年期間，鄧小平和毛澤東之間，「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對具體情形卻無進一步地討論。
- [0-12]這方面的例子有：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鄧小平同志對黨的對外工作的重大貢獻〉，載《回憶鄧小平》，中冊，頁21-50。潘敬國主編：《共和國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頁1-26。邵維正主編：《鄧小平百年百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頁243-249。呂書正：《解讀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184-199。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頁179-191。武市紅、高屹主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頁86-96。蘇台仁主編：《鄧小平生平全紀錄》，頁499-509。閻潤魚：《共和國歷史上的鄧小平》，頁72-78。
- [0-13]例如：在古德曼（David S. G. Goodman）、尤里·佛蘭茲（Uli Franz）各自所寫的鄧小平傳記，白魯恂（Lucian W. Pye）、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和懷默靈（Martin King Whyte）以鄧小平為題的論文中，都提及鄧在「反右派」中的重要角色；在馬若德（Roderick Mac Farquhar）和泰偉斯（Frederick C. Teiwes）、孫萬國（Warren Sun）各自以「大躍進」為主題的專著中，皆提到鄧小平對「大躍進」的狂熱與在執行運動上的關鍵角色。但他們對鄧小平在相關運動中的具體表現與實際活動，卻沒有足夠明確的說明。傅高義（Ezra F. Vogel）所著的鄧小平傳記，時間上主要集中在「文革」中鄧小平被下放江西

以後到整個鄧主政時期，對於「文革」前十年的鄧小平，著墨甚少，而且也存在認識有誤的問題，特別是他以「務實的執行者」(practical implementer)形容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用，並根據訪談所得指出：鄧在1959年中即感到有問題，並開始有意不出席要求與會者支持運動繼續進行下去的官方會議。他也指出鄧在1960年起連續兩年在經濟的務實調整上扮演領導的角色。然而，本書將指出：1958年初當毛決定發起「大躍進」時，他大幅擴張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職權，讓之從管黨務進而到監管、綜攬政府事務，統帥中央各部與地方黨委，具體形塑與貫徹執行運動。鄧在肇禍極大的三年「大躍進」中，對運動保有一貫的熱情與信念，有時在構想計劃時甚至比毛還不切實際；鄧一直站在運動的前線，不但沒有閃躲迴避，更將運動硬撐至1960年底。David S. G. Goodman,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57-59. Uli Franz, *Deng Xiaoping* (Bost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8), pp. 147-148. Lucian W. Pye, "An Introductory Profile: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p. 431, 438. David Shambaugh, "Deng Xiaoping: The Politician,"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 468. Martin King Whyte, "Deng Xiaoping: The Social Reformer,"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 524.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61, 121, 166. Frederick C. Teiwes,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p. 111-112, 117.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38-43.

[0-14]以邁克·亞忽達 (Michael Yahuda) 的觀察為例，他只關注鄧小平在「文革」前對中蘇論戰的投入，沒注意鄧同時負責經略中共與其他共黨的關係；他僅單方面留意毛澤東對鄧外交行為的制約，而無思考鄧對毛外交思維的可能反饋。Michael Yahuda, "Deng Xiaoping: The Statesman,"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 552.

[0-15]例如：金德芳 (June Teufel Dreyer) 在專論鄧小平與中共軍事關係的文章中，引述訪談資料表示，鄧小平在中共建政後到「文革」前這段時期，並非是一個軍事的角色。June Teufel Dreyer, "Deng Xiaoping: The Soldier,"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 538. 完全忽略了鄧小平一直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任職，以及他擔任中央總書記後經常代表黨中央經手處理軍隊事務 (包括：「反教條主義」) 的史實。

[0-16]此一研究途徑乃以過去歷史為研究對象，選取史料作為分析資料。主在提煉與發現史實，亦即在研究過程中確證事理，並對之賦予命義與解釋。王爾敏：《史學方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38、144-146、166-167。

[0-17]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9)，頁121-128。

[0-18]誠如審稿人所指出的：「文革」材料與資訊存在有實有虛、有待商榷等問題。本書在使用「文革」資料時，力求行以批判性的引用：首先，留意相關材料所具的特定傾向性 (為政治批鬥服務)；其次，將其內容所指與其他各類文獻作對比與參照；再次，注重其所述與相關歷史背景、氛圍之間的契合度，並將之對證於基於因果邏輯推論的「理據」。本書也強調，書內倚重「文革」資料所做出的若干論斷，存有可能的侷限性，有待日後其他文獻，特別是官方檔案面世後，再行進一步的檢驗以至修正。

[0-19]訪談在中共黨史研究的運用上，屢見不鮮，泰偉斯與孫萬國即善用此法。泰氏曾根據自身經驗，著有一篇專門探討訪談的文章。Frederick C. Teiwes, "Interviews on Party History,"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pp. 339-353.

[0-20]由於中共黨史研究的特殊性，關於訪談資料來源的說明問題，目前學界尚無一個統一的規定與範例，甚至在同一著作中，針對訪談對象背景和意願的不同，猶有說明程度不一的情況，本書也有這種情形。為了不造成中國大陸的訪談對象的不便，並能將之予以適度的區別，本書對多數的中國大陸受訪者分別冠以A、B、C、D……等代號，另外再註明訪談地點與概略時間。

[0-21]鍾延麟：〈重重帷幕後的總書記：鄧小平與「文革」前的中共政治，1956-1966〉(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2009)，總260頁。

[0-22]鍾延麟：〈鄧小平在中蘇關係中的角色與作為 (1956-1976) ——兼論對「鄧小平研

究」之意義》，《中國大陸研究》，第48卷，第4期（2005年12月），頁85-110。鍾延麟：〈三面紅旗執旗手：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之角色與作為〉，《當代中國研究》，第13卷，第2期（總第93期）（2006年6月），頁94-105。鍾延麟：〈鄧小平在文革前中共與東南亞共黨之關係：角色和活動〉，《中國大陸研究》，第49卷，第3期（2006年9月），頁143-169。鍾延麟：〈1958年鄧小平在解放軍「反教條主義」運動中之角色與活動〉，《中國大陸研究》，第49卷，第4期（2006年12月），頁77-103。鍾延麟：〈鄧小平在1957年中共整風、反右派運動中之角色〉，《中國大陸研究》，第50卷，第4期（2007年12月），頁87-116。

[0-23]針對整風、「反右派」運動，本書增寫運動從1957年夏擴大至各領域後的探討；最後的篇幅與字數較諸早時發表的期刊文章，增達一倍。針對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本書加寫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轉入「反教條主義」後的細部發展；篇幅與字數相較也成倍增加。針對「大躍進」運動，本書的篇幅與字數更多達期刊文章的八至九倍，其中對1958、1959年的運動情形詳加充實外，並新寫了1960年的運動情況。針對黨對黨外交，本書也多予重新整理並增添內容。

第一章 擔任中央總書記的背景原因與組織角色

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時膺任中央總書記，開始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直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改組中央領導機構，鄧小平先前擔任的中央總書記一職不再被提及，中央書記處不久也被「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所取代而停止活動。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並領導中央書記處前後長達十年之久。

中共「八大」後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乃毛澤東一手主導創設，他的可能用意包括：分擔工作、分散風險、培養後進，甚至藉之分權制衡。1958年，毛澤東決心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以便他能更得心應手地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推動自身構想的社會主義建設藍圖，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的權力獲得進一步的擴充，既能直接插手國務院工作，成為其頂頭上司，也能介入指揮軍方高層整風，成為毛推行政策時倚重的助手與利器。鄧小平早期的政治經歷為何？他何以能在各路菁英群聚的中共高層中脫穎而出，獲任中央總書記？該職在中共黨組織與政治運作中有何作用？

鄧小平長期以來出色的政治能力和工作表現，在黨內乃為人所共睹，更重要的是其受到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賞識與器重，讓之可以雀屏中選中央總書記要職。這也預示鄧小平能否繼續任職，將取決於他能否遵照毛澤東的意旨。中共「八大」設立的中央書記處，乃是負責處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機構，上承中央政治局（事實上主要是常委會）之命處理黨、政、軍、經各方面的事務，儼然是中共政治的核心發動機與政策的關鍵推進器，位居整個黨國體系中的樞紐地位。擔任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在「文革」前中共黨內雖然並非正副主席，但在政治局常委會內也享有正副主席擁有的同樣地位，並透過中央書記處直接參加黨中央對黨直屬各部、政府、軍隊以及地方黨委的領導。其位高權重，使之與「文革」前的中共政治發展相連難分。

下文首先檢視鄧小平早年的政治經歷，特別是在中共建政以前的政治表現，接著探討鄧小平何以能獲任中央總書記，之後討論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在中共黨內核心中的運作情形，特別是其與政治局、常委會如何互動，然後依序觀察中央書記處內部以鄧小平為軸心的運作方式與情形，鄧小平、中央書記處與政府和軍隊的互動，以及鄧小平與地方黨委的連結關係。最後在小節中簡要探討本章研究對後面各章討論的意義。

第一節 早期的政治經歷與活動

1904年8月22日，鄧小平出生於四川省廣安縣一個小地主家庭。鄧小平原名鄧先聖，學名改為鄧希賢。1927年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方改名為鄧小平（或許還有自表反對封建聖賢、甘作普羅平民的含意），並一直沿用下來。他1919年考進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預備學校，在完成短期課程後即動身出國，並於1920年10月抵達法國。

鄧小平待在法國的時間超過五年，大多數的時間是從事重體力、低技術的工作，例如：在鋼鐵廠做雜工（在高溫爐前拖送鋼條）、在火車站碼頭當搬運工、清潔工、在紙業加工廠製作絹花、在橡膠廠製作防雨用套鞋、在汽車廠打磨汽車零件。^[1-1]鄧在法期間所積累的工廠實作經驗與知識，使他在半甲子後以中央總書記身份到中國大陸各地視察工業生產時，常能作出頗為專業的提問與指示，而令基層作業人員驚訝與佩服。^[1-2]然而，總體而言，鄧在參與領導「文革」前全國經濟建設與管理時，較諸其他未曾踏出國門、一直在中國本土從事革命工作的中共人士，他的「留洋經驗」所可能產生的差別性影響，^[1-3]只有在政治氛圍許可、特別是毛澤東的意向較為寬鬆之時方會有所流露與展現。在忽視客觀經濟規律、將人的主觀能動性誇大到極致的「大躍進」運動中，鄧的行為舉止與其他中共領導人並無二致，有時甚至表現出更大的狂熱。

鄧小平在旅法期間，開始參加信仰共產主義的政治組織活動。雖然他自承起先的動機是為了「趕時髦」，^[1-4]但也自此走上了所謂的「革命的道路」。鄧在法期間也結識了一批後來成為中共領導骨幹的人士，最主要的有：中共建政後即擔任政府總理至死方休的周恩來、名列中共解放軍「十大元帥」之一的聶榮臻，以及「文革」前在鄧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中負責計劃工作的李富春。這批同有留法背景的人，被台灣早期的「匪情分析」歸類為所謂的「法國派」。^[1-5]

1926年初，鄧小平被組織送往蘇聯莫斯科的中山大學，接受蘇共的政治訓練與培育。在這未滿一年的受訓期間，他在組織與宣傳上所具之才幹，已有所展露、並為上級所注意。^[1-6]1927年春，鄧小平回到中國大陸，在中共組織的安排下至馮玉祥軍隊所屬的西安中山軍事學校擔任政治工作。同年4月，國民黨發動「清黨」，國共第一次合作破局並公開分裂，鄧小平被迫前往武漢向中共中央報到。中共在武漢召開的決定發動土地革命與武裝鬥爭的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上，鄧小平首次與毛澤東見面。但鄧在政治上真正開始進入毛的眼簾之內，要到他進入江西蘇區工作以後。

1927年底，鄧小平轉往上海，擔任黨的中央秘書長。此一職位主在處理中央的文書與機關工作，其工作性質、權力大小與影響規模遠不能與鄧在「文革」前所任的中央總書記並提、相比。鄧也在「十里洋場」參與中共的地下活動，幾度險象環生。^[1-7]鄧小平在此一階段以下級的身份與周恩來、李維漢關係極為密切、多有接觸，他也在此時認識康生。^[1-8]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的中、後期，負責對蘇聯進行意識形態論戰的工作，康生是他主要的幫手。

1929年夏，鄧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廣西，負責在該地進行聯絡與籌劃武裝起事。這是鄧接觸軍事工作的開始。1929年底、1930年初，在鄧小平的居中協調下，中共在廣西的黨人結合當地的實力派，在百色、龍州公開紅軍旗號，其聲勢浩大時曾擴及右江地區多縣。然而，因為在實力不足的情況下仍攻打敵人防備堅固的城市，折損不少兵力，不得不轉戰離境，移兵江西。鄧小平在此支紅軍敗走之際，離赴上海向中央報告之舉，後來衍生不少的政治風波，鄧在「文革」初居於政治劣勢時，即為政敵所藉機攻擊。^[1-9]

1931年夏，鄧小平到達中共在江西的活動區域，也就是後來通稱的「中央革命根據地」。鄧小平初始在贛南瑞金、會昌等縣擔任地方領導的職務。然而，因為其政策主張多與當時主要由留蘇人士所組成的中共中央格格不入，而反倒與毛澤東的看法類同，所以成為中共中央在批判、打擊毛相關主張時所特意豎立的政治標靶，被貶作「鄧、毛、謝、古」（除鄧小平外，其餘三人依序為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的一員，遭受嚴厲的政治批鬥與處分。主持對鄧批判的李維漢，在1957年以中央統戰部部長的身份，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投入整風、「反右派」運動。

鄧小平在贛南的政治境遇，自當時同樣遭受孤立、打擊的毛澤東看來，是為之受過。毛自此將鄧視為自己的政治班底與門徒，亦即成為「毛派分子」。鄧日後的政治仕途與升遷上，由此獲益極多。鄧小平在江西被政治批判並懲處時，幸而得到時任中共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的出手協助與安排工作。^[1-10]1956年起，王稼祥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在鄧小平領導下負責外事政策與黨際關係。

1934年10月，中共在國民政府的強攻之下無法繼續立足贛南，開始進行所謂「兩萬五千里長征」。鄧小平在中共長征隊伍中的地位與作為，如其所言只是「跟到走」，^[1-11]並無特別突出的建樹。中共後來大書特書、強調對中共有轉危為安的關鍵意義的遵義會議，鄧是否列席此會，後來也成為一件歷史爭議。^[1-12]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重返中共領導核心，鄧小平的政治生命也逐漸從低谷回升，這首先表現在鄧在林彪領導的紅一軍團的政治部門中地位的爬升。

1937年7月，中國對日抗戰全面啟動。中共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三個師。在毛澤東的安排下，鄧小平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任弼時為主任），^[1-13]次年初出任「一二九」師政治委員，配合師長劉伯承在太行山地區進行軍事活動，一方面參與對日軍的作戰，另一方面，處理與當地國軍的摩擦與衝突。鄧小平除累積大量軍事經驗，也與同袍戰友因共度危難而建立厚實的關係與信任感。

1942年9月，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書記，部屬李雪峰在1950年代成為鄧在工業問題上的主要助手。1943年10月，太行分局併入中共中央北方局，鄧小平擔任北方局代理書記，在其他領導人前往中共中央所在地陝西延安參加整風學習時，獨自留守並承擔領導晉冀魯豫地區黨、政、軍全局工作的主責。鄧小平工作任務吃重（鄧晚年曾以「吃苦」兩字形容），^[1-14]反映了中共中央（毛斯時在其中的領導地位愈加鞏固）對之的政治信任。鄧也確實不辜負中共中央的期望，在建設政權、精兵簡政、發展生產等工作上，表現出色並多次受到黨中央的褒獎表揚。然而，鄧小平在1940年代華北太行抗日根據地推行整風運動過激，迫使中共中央發電制止。^[1-15]鄧1957年以中央總書記身份督導、執行全國整風、「反右派」運動，致使運動益加惡性發展、傷及更多的無辜，從他主政太行時期的個人歷史上似有跡可循。

1945年6月，中共舉行「七大」。鄧小平雖然未參加，但仍被票選為中央委員（總共44人，鄧排名28）。這是鄧首次進入中共的領導行列，應是對他在華北抗戰前線辛勤經營的一種政治表彰。值得一提的是，抗戰尚未結束，國民政府（下簡稱國府）內部甚至已將之列為通緝捉拿的對象。^[1-16]

1945年8月，日本宣佈投降。如何分配中國戰後政治權力的大餅，隨即成為國共兩黨交鋒的問題。國共在進行政治談判的同時，不約而同地皆想利用戰場上的收穫來配合、進而影響桌上談判的進程。鄧小平以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和軍區政治委員的身份協同劉伯承率兵與閻錫山爭奪上黨地區與平漢鐵路線，取得首戰勝利，配合毛澤東在重慶的談判。^[1-17]1946年中起，國共公開兵戎相見，鄧小平所轄的「中原解放區」首當其衝，遭逢國軍的正面進攻，他與劉伯承組織反擊。1947年6月底，鄧小平與劉伯承被迫率晉冀魯豫野戰軍強渡黃河，隨後輕裝南下直抵大別山區。此一戰略舉措旨在吸引進攻中共其他「解放區」的國軍，減緩友軍、友區的壓力，並讓華中地區的國軍疲於奔命、首尾難於相顧。鄧小平在執行此一將戰爭「從內線引到外線」、「從解放區引到國統區」之任務的過程中，其行蹤被國府緊密監視，^[1-18]四周更經常環繞國軍追兵。在敵情嚴重與情況艱困時，鄧、劉會被迫分兵，各自避敵與作戰，但終能全身而退。

鄧小平在大別山堅守期間，早年曾在該地活動的李先念在旁協助。1958年，李先念進入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分管財經與貿易。1948年春，鄧小平率軍隊轉出大別山區。5月，鄧小平出任轄區廣及隴海以南、長江以北直至中共川陝邊區的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記，並兼任中原軍區及中原野戰軍政治委員。對於影響國共戰局甚大的「淮海戰役」（國府稱之為「徐蚌會戰」，其從1948年11月開始至1949年1月結束），鄧小平與劉伯承領導的「中野」負責包圍、殲滅國軍的黃維兵團。

在淮海戰事方酣之時，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組成「總前委」，由鄧小平擔任書記，劉伯承、陳毅、粟裕、譚震林為成員，主要籌劃、指揮淮海戰役後共軍跨渡長江作戰的問題。^[1-19]鄧小平在「總前委」內的兩名同事劉伯承與粟裕，後來在1958年中共軍隊高層整風時淪為被批判的目標，而鄧主持此次整風；鄧與劉、粟過去在戰時工作上的分歧與為了爭取戰場表現所累積的衝突，都在其中發酵。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期間，譚震林又與之共事於中央書記處。譚主要負責農業問題，是鄧在農業上的顧問。鄧、譚是「大躍進」中發生高估產與高徵購問題的重要關係人。

1949年4月，中共「百萬雄師過大江」，南京、上海易手，國府倉皇辭廟。鄧小平是此一軍事行動的重要擘劃者。在共軍渡江以前，鄧小平已獲命為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所轄範圍包括：山東、浙江、福建、江蘇、安徽、江西東北部，甚至也將台灣包括在內。然而，在陳兵江南後，鄧小平主動請纓，與劉伯承率領麾下的野戰軍（此時已改編為第二野戰軍）轉道進軍包括四川、西康、雲南、貴州在內的西南地區。鄧小平與劉伯承在軍事上執行中共中央與毛澤東制定的「大迂迴、大包圍、大殲滅」戰略方針，同時也致力於用心戰勸降的方式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在中共氣勢如虹的背景下，其策反效果特別顯著，先成功爭取到主滇的盧漢「揭竿起義」，再以此促使四川地方實力派軍人對中共不戰而降。^[1-20]這導致國府原欲以西南作為反攻基地的計劃告以失敗。

在中共大舉進軍西南地區之際，中共在西南的領導團隊也相應建立，鄧小平在其中佔有突出的地位，擔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以及西南軍區政治委員。台灣的軍政情資即將鄧形容為「西南王」。^[1-21]鄧小平主政西南的兩年半的時間內，大刀闊斧、鐵腕作風，頻頻有重大舉措，讓中共統治的觸角成功地延伸至此一邊陲地區。鄧小平領導的西南局，在西南的城市地區首重接管工作、穩定政經情勢，以求儘速恢復秩序與生產；^[1-22]在農村地區則先是強勢地進行徵糧、並以剿匪為名重手處理隨之而起的抗爭事變，繼而開展減租退壓以及土地改革運動，按部就班地打破農村底層固有的權力結構，以運動中湧現的積極分子為先鋒與依靠，將之改組成以共黨基層組織與黨幹為核心的新型權力關

係，進而為中共黨國未來汲取該地農村資源與從事改造大開便利之門。鄧小平在西南局的任內，也領導完成中共武力佔領西藏的工作。

鄧小平從1922年開始參加中共的組織活動至1952年從西南上調北京出任中共政務院副總理，前後經歷了整整三十年的政治鍛鍊。經過漫長的革命洗禮，鄧小平在就任中央領導人時，無論在政治傾向、能力歷練與領導特質，都已形成一定的發展格局與特色，也對其後來擔任中央總書記期間的角色與活動造成影響。

首先，在政治傾向上，鄧小平與多數的中共黨人一樣，對於毛澤東在中共革命中的卓越領導，高度信服。^[1-23]鄧自己在中共黨內的地位之所以能逐步攀升，也與毛對其賞識直接相關。事實上，從江西時期兩人同遭黨中央政治打壓開始至中共建政之時，毛、鄧之間長年下來已形成穩固的政治庇護與扈從關係，言鄧是毛的心膂股肱也不為過。

其次，在能力歷練上，鄧小平自歐洲返回中國後，即獻身中共的革命事業。鄧從普通黨員幹起，一直做到統兵一方的封疆大吏；曾在秘密機關中辦公，後來更多的時間是在軍旅部隊與高參總部中任事。鄧小平承辦過多項大小工作與任務，也練就多種能力。當他被任命為「京官」時，業已成為一政治「多面手」。

再次，在領導特質上，鄧小平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堅強的組織紀律性，特別是對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示戮力貫徹。^[1-24]毛甚至曾以鄧為範例批評其他高級幹部如林彪。^[1-25]鄧小平御下嚴整、治下有方，講求工作效率與成績，不讓講價與折扣；^[1-26]在與他人互動上，鄧願意主動承擔工作重任，重視友鄰團結，^[1-27]同僚多予以正面的評價。^[1-28]

第二節 獲任中央總書記的原因與過程

中共在1956年「八大」設立中央書記處與中央總書記，乃是毛澤東所倡議與主導的。1980年2月26日，鄧小平回憶：「『八大』為什麼建立書記處？毛主席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裏就在考慮一線、二線問題。」^[1-29]所謂一線、二線的安排，主要是讓毛澤東可機動地離開中央領導的前線，擺脫繁雜的領導工作，並委交其他幹練的同事負責相機處理，而毛自己則能在第二線「抓大放小」地專心思慮影響深遠的重要議題。而中央書記處乃是協助、強固第一線領導的配套制度。^[1-30]

毛澤東有此構想的主要理由有二：首先，安全風險因素，亦即預防中共主要領導人在遭遇不測後，不致群龍無首、後繼無人；其次，在一線內，資歷深、具威望的劉少奇，以毛的接班人之姿坐居首位，與此同時，

毛也想儘早培養其他年紀較輕的黨內新秀在一線內擔負重任，如此既可直接減輕毛、劉等年長領導人的工作負擔，也可讓他們趁早樹立威信，避免未來青黃不接、出現斷層。因此，設置中央書記處的目的，既是要分擔第一線領導的工作，也作為黨內青壯人才的鍛鍊平台。領導中央書記處的中央總書記的重要性，當然非同一般。

鄧小平能獲任此一職務，與他自身的傑出能力與傲人表現有關，但毛澤東對其才能的欣賞和肯定，更是箇中關鍵。如前一節所述，在中共「馬上得天下」的過程中，鄧小平立有汗馬功勞、彪炳軍功，已能獨當一面，成為未來可期的政治新星。對毛澤東而言，鄧小平在中共「馬下治天下」時，自不可能缺席，更要委以重任。

1952年至1953年，針對大規模經濟建設展開在即，出於強化中央領導力量的緣故，中共中央將任職地方分局的領導如高崗、饒漱石、鄧小平、鄧子恢、習仲勳調進北京，這就是時人所稱的「五馬進京」。相較於高崗被毛澤東委以經濟大任（擔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鄧小平開始雖不若高「一馬當先」般顯眼，但是在1953至1954年爆發「高饒事件」後，鄧小平後來居上，甚而一枝獨秀。

「高饒事件」之發生，乃源於高崗和饒漱石（從華東局上調赴京，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獲悉並利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在處理「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的歧異，以及毛對周恩來政府工作的不滿，各自地借題發揮，對劉、周形成政治壓力。高崗更以私下活動的方式，意圖促使高層權力的重新分配。1953年底，在陳雲和鄧小平面告揭發高崗後，毛澤東方決定嚴正以對，並將高、饒兩人連帶整肅。^[1-31]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上最重要的政治獲益，就是更進一步地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提拔。

毛澤東原希望藉由重用高崗來對劉少奇與周恩來的權力加以制衡，但是高崗在權力面前忘乎所以，行動上又過於莽撞、冒失，不但讓毛澤東失望，甚至讓之難以收場（毛在對高、饒進行不點名批判的1954年中共中央七屆四中全會缺席，多少就反映出其政治上頗為難堪的處境）。在高崗的問題被揭露後，毛澤東自然無法再繼續期望透過高對劉、周施以權力平衡，毛需要一政治人物為其所信任、本身又能堪大任，在相對於劉、周享有重權之時，可秉公理事而不會圖謀私利。仔細考慮之後，鄧小平乃是一適合的人選。^[1-32]

在歷史淵源上，鄧小平屬於「毛派分子」，毛澤東對其懷有特別情感，分外信任、提攜；鄧小平在過往工作上也屢創奇功，未曾讓毛失望。1952年鄧小平上調北京，在高崗活動開始變得積極之前，已有跡象顯示，毛澤東有意讓鄧小平擔負更大的權限，例如：毛澤東在1953年3月初曾批

示：「凡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件請小平多管一些。」^[1-33]同年夏，在高崗著墨甚深的中央財經工作會議中，成為「標靶」的財政部部長薄一波無法繼續視事後，鄧小平接掌其位。此一人事任命，自非經毛澤東認可不可。約此前後，毛澤東也要鄧小平在同年秋全國糧食緊急會議與建立統購統銷制度的相關工作中擔負更多責任，顯示鄧在毛心目中地位的不斷上升。對權力動向極為關注的高崗，甚有可能觀察到鄧小平政治行情上漲的趨勢，所以不顧過去與鄧鮮有共事與往來的經驗，仍冒險對之議論劉少奇的問題。

如前所述，鄧小平向毛澤東上告高崗密謀的活動，是毛澤東決定嚴肅處理高、饒活動的關鍵原因。鄧小平在此事上的表現，^[1-34]令毛澤東激賞，^[1-35]有意讓告發高崗「立功」的鄧小平，繼續有擴大表現的機會，故指示鄧在後續處理「高饒問題」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執行角色。^[1-36]1954年4月，毛澤東既要鄧小平接掌「中箭下馬」的饒漱石的中組部部長之職，^[1-37]更要鄧出任「中央的事由你們做，對外一律用中央名義」的黨中央秘書長。^[1-38]中央秘書長會議擴大權力以後即是兩年後中共「八大」的中央書記處。^[1-39]在1955年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更將鄧小平和林彪同時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鄧小平在中共黨內高層內的快速爬升，也為西方所注意，例如：在同年英國外交部的一份分析中共領導人的文件中，即以「一顆正在崛起之星」（A rising star）形容鄧小平。^[1-40]對此，陳伯達晚年亦曾予以評論：當時「鄧小平同志代替高崗過去的地位」。^[1-41]實際上，在毛澤東的悉心呵護下，鄧小平得到的是高崗生前竭力追求仍未得的政治地位。

為了讓鄧小平能再進一步地順利選任1956年中共「八大」新設的中央總書記，毛澤東從兩方面使力。一方面，毛澤東努力勸說鄧小平接受該職的提名與職權。鄧小平對於自身在短時期內「搏扶搖而直上」、又要「再上一層樓」，唯恐他人不服並自慚不才而頗感不安。毛澤東為減輕鄧小平心理壓力表示：「我們是醫生，書記處是護士，你是護士長，還是我們的助手嘛！」^[1-42]但是當論及中央總書記及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的權責問題，面對鄧小平的謙辭、讓權，毛澤東正色加以明確界定，務使鄧行將上任的中央總書記符合其構想與期待。對於此一「討價還價」，鄧小平也曾做過一番回憶：

在中央決定我做總書記時，我曾向毛主席提出，書記處還是作為政治局的辦事機構，專管黨務，對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僅負責傳送。毛主席不同意，他強調書記處是中央委員會的辦事機構，什麼事都要管，中央的事都由你們去做，抓全面工作，發文用中央名義。^[1-43]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黨內高層公然為鄧小平壯大聲勢。1956年9月13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推薦鄧小平膺任該職時表示：

他〔鄧小平〕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贊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麼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順，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不滿意他的人也有的，像有人不滿意我一樣。有些人是不滿意我的，我是得罪過許多人的，今天這些人選我，是為了顧全大局。你說鄧小平沒有得罪過人我不相信，但大體來說，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兒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1-44]

毛澤東頗費唇舌地對鄧小平予以正面評價，較諸其評比他人，已實屬罕見；毛澤東在為鄧小平評功擺好時，屢次將鄧與自己相提並論，更體現出毛對鄧的強力舉薦。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美言宣傳顯然奏效，鄧小平在「八大」選舉中就獲得令人側目的高票。[1-45]毛澤東將鄧小平「扶上馬」後，仍不忘「送一程」，一有機會就在對內、對外各種場合為已任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造勢。[1-46]

對於鄧小平在毛澤東的庇佑下在中共政壇上嶄露頭角，並在1956年中共「八大」取得傲人權位的此一發展，對中國大陸政治動向極為關心的台灣國府與美國的中央情報局，也都特別注意且饒有興趣。[1-47]

檢視鄧小平時至中共「八大」前後的仕途，毫無疑問地，毛澤東正是鄧小平從「一路諸侯」變為「一朝重臣」的最大推手，也是鄧允諾就職中央總書記後的最大依靠。[1-48]如此鄧小平不但能一躍超過諸多黨內較他資深的人物，成為毛澤東的一名重要副手，更躋身成為毛屬意的主要接班人選之一。「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毛澤東對鄧小平有所警惕、不復信任，鄧的中央總書記地位自是大為動搖，其政令甚至形同具文。

第三節 進入最高決策圈並負責執行

1956年中共「八大」建立的中央書記處機構與中央總書記職位，在中共黨組織的權力「金字塔」頂端中的位階問題，可以其與政治局和常委會的關係作觀察。1956年9月16日，鄧小平在「八大」上所做的〈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中，曾對此作過說明：

在黨的中央組織中，草案規定，中央委員會除選舉中央政治局以外，還選舉中央政治局的常務委員會，由它繼續擔任原有的在黨的多年經驗中證明為必要和適當的中央書記處的作用；同時，選舉中央書記處，使它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領導下，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1-49]

10月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對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又做進一步的確定：

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工作，一切原則、方針、政策和重大政治問題由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書記處按照這些決定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央書記處在自己的工作中，既要能夠盡到「擋風」的責任，又要不犯越權的錯誤，並且必須盡可能做到使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各同志，能夠及時了解各方面的工作情況。同時，中央書記處應該同國家機關各黨組和軍委取得經常聯繫。^[1-50]

鄧小平擔任的中央總書記，即是在中央政治局和常委會的領導下，率領中央書記處負責處理黨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央總書記、中央書記處與政治局、常委會的關係，雖是上下隸屬關係，在實際的運作上則是雙向互動的。

首先，自上而下地，中央總書記、中央書記處接受政治局和常委會領導，按照後者的意圖與決定辦事或將之付諸實施，並回報進度、接受新的指示。也就是「決策在政治局、常委會，執行在書記處」的工作格局。毛澤東在1958年6月作的「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的批示，亦是基於此一程序的思路。

然而，有關政治局、常委會與中央書記處在現實政治中的地位問題，究其實質，常委會較諸政治局更重要，政治局往往看常委會、特別是毛澤東的意向做討論或背書。^[1-51]另外，不同於政治局有開會才有作用、而政治局開會次數不多又不定期，中央書記處則是一常設的實體組織；而中央書記處能較早聽聞毛澤東的意向、知曉中央最新的決策，其成員甚至比一些政治局委員消息更靈敏。^[1-52]

在中共中央層峰作出決策、經由中央書記處執行的過程中，中央總書記、中央書記處能發揮的能量和作用，自是不能低估。當中共中央制定了較符合實際的戰略決策和大政方針，中央總書記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不致發生「歪嘴和尚念經」的情況，確能因地或因時制宜地推行並收其成效。相反地，當中共中央制定了脫離實際的錯誤戰略決策和大政方針，中央總書記管理的中央書記處也是不扭曲地堅決執行，甚至起擴大錯誤的作用。對於1957年「反右」擴大化的錯誤，鄧小平白首憶往：「1957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我是總書記呀！」^[1-53]如此突顯的是鄧小平帶領中央書記處積極貫徹中共中央「反右」指令的角色和作用（詳細的討論，可見於第二章）。另外，對於後果慘痛的「大躍進」，鄧小平也曾數次代表中央書記處對相關工作進行檢討（鄧在該運動中衝鋒陷陣的情形，可見於第四章與第五章）。

其次，從下而上地，中央總書記、中央書記處匯整與過濾下級所上呈的須待中央裁示的事項，其中，對相形次要的事務，總書記、書記處得以用中央名義直接做出處置，再事後備案；至於總書記、書記處無法自行決定、處理者，也須提出意見提交政治局和常委會參考以助其定奪，^[1-54]而

後者在決策時往往對之甚為倚賴。易言之，中央總書記領導的中央書記處限縮了政治局和常委會在資訊取得和方案選擇上的範圍，亦即起到實質引導中央決策的作用。

在大量湧向中共中央要求裁判、指示的各類請示與詢問中，何事應予先行篩選或自行決定，以符合奉命「擋風」、事先攔堵的職責？何事應予上報，以免把關過於嚴密以至水流不入，被指責為封鎖情資、蒙蔽「聖上」？其中尺度、界線如何為宜，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個人掌握。毛澤東在信任鄧小平之時（「文革」前十年的前、中期），對鄧寵信有加，要其「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鄧小平在這種時候也大膽拍板，對下發號施令。但後來當毛澤東對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不滿、對鄧小平信任不再時，鄧就變得小心謹慎，注意向上請示。

相比之下，鄧小平與黨內地位僅次於毛、有時代毛主持政治局與常委會會議的劉少奇之間的互動，就較為平順、少有風波。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表示：「他們合作得很好。書記處能處理的問題，就書記處處理，書記處解決不了的問題，重大問題就上報少奇。少奇把重大決定報告主席。」
「我一直沒有覺得他們中間有什麼分歧。」^[1-55]

應予著重強調的是，在中共「八大」的常委會與中央書記處的人員組成上，可以發現唯有鄧小平一人跨足兩者：既作為常委會的一員，又是中央書記處的領導人（請參閱表1）。機構兩棲的鄧小平，一方面可被看作是代表常委會對中央書記處進行領導，督導中央已定決策的落實；另一方面，他也可以被視為代表中央書記處向常委會陳述意見。鄧小平既參加最高決策又擔負統籌執行責任的重要角色，使之在常委會中享有特殊的地位。

表1：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與中央書記處的人員組成表（1956秋-1966春）

政治局常委會	中央書記處
主席毛澤東； 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 陳雲、林彪（1958年增選）； 中央總書記鄧小平	鄧小平、彭真、王稼祥、譚震林、譚政、黃克誠、李雪峰（書記）；楊尚昆、劉瀾濤、胡喬木（候補書記）； 正式補選：李富春、李先念（1958）；陸定一、康生、羅瑞卿（1962）； 實際去職：黃克誠（1959）、譚政（1960）

*此表為作者自行整理。

中共官方雖然宣稱「八大」新建的常委會乃是「繼續擔任原有的在黨的多年經驗中證明為必要和適當的中央書記處的作用」，但事實上，中共「八大」以前的原中央書記處的「經常業務」——包括：準備政治局會議的日程和應討論問題的資料（或通知各部委準備）；負責組織政治局會議決議之執行並檢查執行的情況；在政治局的方針之下辦理和決定日常工作問題；管理中央各部門的工作並聽取各地區的工作匯報^[1-56]——有許多內容中共「八大」設置的常委會皆不予負責與行使，而改交鄧小平領班的新的中央書記處。換言之，「八大」的政治局常委的職權範圍，並不及「八大」前原中央書記處的書記，主要被侷限在決策層面（也就是前述鄧所言的參與決定重大的原則、方針、政策和政治問題），而脫離執行與操辦層面。從這個角度看來，毛澤東讓他在「八大」前原中央書記處的同仁（如劉少奇、朱德等），改任「八大」的常委，並另冠上副主席的官銜，看似升官的同時，卻抽走他們任職「八大」前書記處時本有的一些實權。

相形之下，鄧小平雖是「八大」的常委成員中，項上唯一沒有副主席頭銜的常委，在常委會中排名敬陪末座，但他同樣可以參贊中樞機要，甚至因其經過中央書記處的事前討論、會前準備，較諸其他常委，更顯得「有備而來」，易切中討論議題的要害；常委會議決後，又由他負責「上令下達」、組織並檢查執行（1958年毛澤東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後，周恩來、陳雲的政府財經工作也納入其領導與監管之下）。又議又行、議行合一的鄧小平，其集常委與中央總書記於一體的職權，反倒像一名「八大」前的原中央書記處書記。

第四節 領導中央書記處

鄧小平作為中央總書記，中央書記處乃置諸其麾下。「文革」前作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胡喬木晚年即表示：「這個書記處是在鄧小平同志的領導下工作的。」^[1-57]

在中央書記處內，鄧小平的地位高於書記處的其他成員。中央書記處開會議事時，鄧小平能不斷插話，在會議結束時，以領導人姿態作總結。除非事涉重大事務、中央書記處無法自行決定者外，不然，鄧小平的意見通常即可代表中央書記處的最終決定。曾作為中央書記處一員的李雪峰後來表示：「在以後書記處的工作中，對承辦軍隊和國務院的文件，一般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見轉出去。」^[1-58]

鄧小平中央總書記的領導地位，也確實受到書記處其他成員的尊重。當意見出現相左時，基本上不採取表決方式決定，而是以鄧小平的意見為最後意見。鄧小平做出的決定，其他書記處成員必須接受。^[1-59]例如：1964年底到次年初，在北京大學「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上，主管相關

業務的書記陸定一對該校黨委領導陸平採取質疑、批判的立場，但是當鄧小平表態支持陸平後，陸定一就不得不退讓。^[1-60]此外，中央書記處成員的工作疏失檢討，由鄧小平把關；^[1-61]請假、休息亦須報請其核准。^[1-62]

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內的領導，也非所謂的「一言堂」。因為在鄧一錘定音之前，其他成員可各陳己見，頗有暢言的氣氛。例如：1959年上半年針對「大躍進」運動降溫一事，以及1962年是否允許「包產到戶」的問題，中央書記處內部皆熱烈討論，甚至形成贊成、反對者各佔一半的局面。^[1-63]中央書記處經常要針對重大問題進行討論，並向政治局、常委會提出建議，鄧小平需要其他成員集思廣益，共同謀劃與協調。集體共議因而成為中央書記處內部固定的作業模式，密集的開會也是中央書記處運作的一大特色。^[1-64]鄧小平在主持會議時發言的簡短扼要，乃相當著名。在書記處共事的過程中，鄧小平出眾的工作能力也每每讓其同僚深感佩服。陸定一即曾稱許鄧：「我們遲鈍得很，太不解！小平同志什麼都來得快。」^[1-65]

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因要經常開會，以及有大量的公務需要共商處理，所以有固定的辦公之處，也就是在中南海的居仁堂。根據楊尚昆的回憶：居仁堂由前、後兩座兩層樓所組成。居仁堂前樓的第一層的會議室，即是中央書記處會議舉行的地點；前樓的第二層則主要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們的辦公室。居仁堂後樓則分配給專為中央書記處提供政治服務的中央辦公廳直屬各組使用，^[1-66]中央辦公廳直屬各組因而又有「後樓各組」之稱。中央辦公廳直屬各組包括：工業、農業、群眾工作、經濟、翻譯……等組。^[1-67]主要改編自中共「八大」前原中央書記處下轄的四個辦公室。^[1-68]

因為中央書記處「什麼事都要管」、「抓全面工作」，事務繁重，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央書記處內部實行分工，各有所重。中央書記處初建不久，鄧小平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確定書記處成員的分工。^[1-69]但其後隨著政治與人事的變化而有所變動（請參閱表2）。

表2：中共中央書記處內部的執掌分工與人員配置表（1956秋-1966初）

執掌分工	人員姓名	附註
總書記	鄧小平	主持書記處全面工作，在不同時期兼管特定工作
政 法	彭 真	彭亦協助鄧小平負總責
財 經	李富春、李先念	1960 年李雪峰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負責人，李富春兼管工業
工 業	李雪峰	
農 業	譚震林	
外 事	王稼祥、康 生 ¹	王告假後，康主掌
軍 事	黃克誠、譚 政、羅瑞卿	黃、譚先後離職，羅繼任
宣傳文教	陸定一、胡喬木	胡告假後，陸主掌
群眾團體	楊尚昆、劉瀾濤	劉在 1960 年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負責人

*此表為作者自行整理。

注 1：康生在正式補選進中央書記處以前，即是 1958 年設立的中央文教小組的一員，而後兼任隸屬該小組的中央理論小組組長。因此，康生在中央書記處內的分工，除外事以外，尚有宣傳教育。

鄧小平本人除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全面工作外，在不同時期也會因應上級指示和當下工作重心需要，兼管其他的工作。例如：處理以中蘇共關係為中心的黨際外交；在 1960 年代初經濟進行調整時，分工聯繫鐵道部、石油部；^[1-71]在 1960 年代中期抓「三線」建設。

分工把口的各書記，將其管轄範圍內的要事向鄧小平口頭匯報或送呈報告，也按照鄧小平的指示佈置工作。例如：1963 年，鄧小平視察西北後提出要重視黃河中、上游的治理並應建立管理水土保持機構的意見。在書記處中負責主管農業工作的譚震林即據此開始積極籌建。^[1-72]鄧小平對其他書記基本上予以高度信任和不小的裁量權限，亦即在決議出爐、方針擬定後，鄧小平即不過問執行細節和可能遭遇的具體問題，而由交付承辦相關業務工作的書記全權處理和處置。鄧小平晚年回顧時認為，此一「做出決定交給專人分工負責」的工作方法，使得受命者「確實有很大的權力，可以獨立處理問題」，直接有助於中央書記處工作的效率。^[1-73]李雪峰就曾評論鄧小平「對幹部既嚴格又放手」，是其「一貫的工作作風」。^[1-74]

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中對彭真的倚重。

歷史上，彭真在黨內的政治地位一直高於鄧小平，先鄧進入中央政治局，並擔任如同後來常委會性質之中央書記處的候補書記。但在「八大」之後，彭真卻居於鄧小平的副座，在組織上被明確指定在中央書記處內協

助鄧負總責。1959年廬山會議前夕，鄧小平因跌斷腿而住院，毛澤東即指示彭真在鄧請假期間代行主持書記處工作。^[1-75]鄧小平與彭真在中央書記處互動一直良好，未受政治資歷問題的干擾與影響。

一方面，鄧小平相當信任彭真。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成立之初曾提出彭真辭去北京市委書記、市長等職，以全心將精力放在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只是相關意見並沒被中共中央接受。^[1-76]彭真在中央書記處中分管政法，但是其實質處於常務書記的地位。鄧小平裁定或中央書記處集體議決的事項，鄧小平經常交由彭真落實。^[1-77]在「大躍進」熱火朝天時，即是由彭真代表中央書記處召開電話會議，驅策各方大員投入「只爭朝夕」的大煉鋼鐵運動。另外，鄧小平也常委託彭真代為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對彭真在中央書記處此一時期的工作，鄧小平後來曾作過高度評價：「彭真同志實際上是黨的副總書記，書記處的工作主要是看他來抓呢！」^[1-78]

另一方面，彭真尊重鄧小平，兩人配合情況好。彭真辦事能力強，能獨立思考、敢直抒己見，對於鄧小平本人也不避諱。但是，彭真根據組織原則，重大問題「都事先與小平談」，不擅自作主。鄧小平、彭真無須秘書從中聯繫，彭真可隨時去找鄧小平會商。彭真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鄧、彭之間「什麼事一說都理解」、「一提都知道」，不用多說，「話很短」。^[1-79]他們在中央書記處長期共事，成為默契甚佳的搭檔。

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中倚重、信任彭真，在彭「出事」、遭罷官後，這成為鄧被批評的重要事由。毛澤東即批評鄧小平：「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說他有能力嗎？」^[1-80]鄧也不得不對此進行檢討：「在書記處裏，我過分地信任彭真，許多事情都交給他處理。」^[1-81]

當鄧小平自己繼彭真之後，在「文革」中也成為被批判的對象，他在中央書記處的同僚如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在「文革」政治壓力下，亦紛紛對鄧進行揭發與批判。^[1-82]

中共中央的各工作部門，也隸屬於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1-83]有一些書記處書記同時擔任黨屬中央部門之首長，使該部處於中央書記處的直接領導下。例如：王稼祥為中央對外工作聯絡部部長；李雪峰任中央工業部部長，直到1960年該部撤銷為止；1962年選補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陸定一，一直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小平透過他們掌握相關部門。鄧小平對於若干重要的黨部門如長期以安子文為部長的中央組織部，則直接予以掌控。安子文的任命乃是鄧小平所推薦；^[1-84]中組部報送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鄧每每親自過目審閱，裁示處理意見。^[1-85]在「文革」批判材料中，即有文批判：「劉少奇、鄧小平之流」，「加上黑幫分子安子文控制了中央組織部，貫徹了一條修正主義的建黨路線和幹部路線」。^[1-86]在當

時的政治氣候下，周恩來也曾表示：在組織用人上，「用人唯私」的問題，「劉鄧路線也是這樣，特別是鄧小平，有宗派主義」。^[1-87]

另外，鄧小平也可以中央總書記的身份，對黨屬中央部門的工作表現給予評價。1958年7月，鄧小平出席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就對中央統戰部的工作予以肯定。^[1-88]時至1963年，中央統戰部發生「內訌」，副部長徐冰（邢西萍）揭發部長李維漢在統戰問題上犯了一系列的政治錯誤，使後者處於被批判的下風地位。鄧小平支持對李維漢的批鬥，^[1-89]李也在1964年丟了部長的差事。鄧小平對此的相關態度固然有受毛澤東益加「左」斜的意向的影響，鄧與李維漢早年在江西的政治與私人恩怨（鄧當時的妻子金維映琵琶別抱於李），以及鄧與徐冰的連襟關係，^[1-90]不知是否也在其中起了作用？

第五節 落實黨對政府與軍隊的領導

以黨領政方面

有關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期間，在中共「以黨領政」運作中的關鍵角色，可以從兩個面向觀察。

首先，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的工作關係與相對地位。

毛澤東對周恩來領導的國務院重視具體實務、忽略政治影響的傾向一直不滿，更希望改變國務院在1950年代前、中期計劃經濟體制形成的過程中對經濟計劃與管理工作的獨攬態勢。毛澤東在1958年初醞釀發起「大躍進」運動時，即對此「分散主義」強力抨擊，要求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讓黨中央參與設計、甚而親掌經濟工作：

政治設計院究竟在哪裏？章伯鈞說國務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滿意，他要有權參與設計。我們政治局委員可不可以有權參與設計呢？過去這個五年計劃，實際上是無權參與設計。我是主席，也沒有參與設計。每年的年度計劃，總是請你簽字，叫作強迫簽字。我有個辦法，不看。你強迫我嘛，我事先沒有預聞，事先沒有接觸嘛。老是在國務院討論，總是拿不出來。千呼萬喚不出來，為什麼不出來呢？說沒有搞好，等到梳妝打扮一跑出來的時候，我們說不行，時間遲了！這事實上是一種封鎖。

有人想把大權獨攬過去，讓黨委搞點小權。這樣就沒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於黨委、政治局、常委、書記處，只能有一個核心。^[1-91]

毛澤東進而要處於黨機器樞紐位置的中央書記處直接指揮國務院行事，以更進一步地貫徹「以黨領政」、「以黨領經」的方針。1958年2月中旬，毛指示：「中央書記處對國務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來」。^[1-92]5月的中共八屆五中全會，向來在國務院內主管經濟工作的李富春、李先念被調入中央書記處，美其名「以便把國務院和國務院各部的一些問題提到書

記處討論」，實際上，國務院主管經濟的大權轉移至中央書記處手中。

6月，在毛澤東主持下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各小組的通知〉，更做出兩點明文規定，進一步地規範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的工作關係：一、中央政治局決定「大政方針」，中央書記處負責「具體部署」，國務院及其黨組擔負「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也就是國務院必須聽命於中央書記處，按其部署執行。二、按照業務性質成立黨中央各領導小組，國務院的各領域工作歸口受其管制、協調；相關小組統一集中受命於黨中央，實質上又是與常設性質的中央書記處作直接聯繫並受其指揮。^[1-93]

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代表中共中央，透過上述新設立的黨中央各領導小組、黨中央各工作部門，以及國務院所屬各部委黨組，將國務院更緊密地附著於黨機器之下。^[1-94]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的上下從屬關係，自此固定下來，直至「文革」初期皆沒有太大的變化。

在此背景下，雖然無論在黨或政，周恩來名義上的地位都高於鄧小平（周為黨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鄧為名次在其後的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但根據前述新定的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的組織關係，鄧小平在中共政治運作上的地位，甚至比政府總理周恩來高。鄧小平與周恩來之間的權力互動出現重大的消長，也就是「鄧領導周」，而非「周領導鄧」。^[1-95]周恩來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尊重鄧小平對書記處的領導權；^[1-96]周主動向鄧進行匯報，並不時在部下面前表露對鄧個人與中央書記處的尊敬。^[1-97]

政府閣揆對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尚且如此，其治下的各部百官，更是上行下效、莫敢不從，再加上黨紀的嚴明要求，鄧小平在中共整個黨國官僚結構中的引領地位，自是無庸置疑。例如：國務院中負責工業、交通事務的副總理薄一波，為了開好1964年初的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在會議期間向中央書記處匯報並請示工作，薄在會上即強調「小平同志和書記處的同志們給了許多重要指示」；在他的講話中，除標榜毛澤東、劉少奇的指示外，也甚為注意傳達鄧小平的看法。^[1-98]在戰爭時期即跟隨鄧小平、後來出任政府部長者如衛生部部長錢信忠，言語之間對鄧的敬崇，更是到了五體投地的地步。針對錢信忠的「文革」批判材料，就指控錢曾言：「黨中央就鄧小平沒有犯過錯誤」；鄧小平是「四川才子」，「能力很強、很穩，說話雖不多，份量很重」；「毛主席認為鄧小平很能幹，文章寫得好，看了鄧的文章像吃冰棒一樣痛快」，「毛主席很會用人才，要小平當總書記可以省心了」。^[1-99]

其次，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在政府人事安排上的權力。

在中央高層，鄧小平可以代表中央徵詢個別黨國要人對政府工作分配的意見，例如：1956年10月，鄧小平就徵求聶榮臻的意願，並確定聶出掌科技發展的工作。^[1-100]聶榮臻日後在相關工作的領導與推動上，即甚為注意向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報告並聽從其指示。

在1958年中央書記處凌駕國務院之上後，對於中央一級的政府機構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的重要人事，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就得以有更大的發言權。

國務院方面，1958年3月1日，黨副主席兼國務院副總理的陳雲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第一機械工業部、輕工業部、建築工程部、水利電力部、第二商業部、林業部、交通部等七個部改組後的副部長、部長助理人選調整問題。同日，陳雲將會議商定的人選名單附信送鄧小平，請中央書記處審核。^[1-101]3月3日上午，鄧即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國務院有關的人事調整問題。^[1-102]

全國「人大」、「政協」兩會方面，為了因應1959年春第二屆全國「人大」與第三屆全國「政協」的召開，以及連帶國務院的重新改選，1958年底，鄧小平頻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相關政府機構的人事組成問題。1958年12月17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會中研議的事項之一就是指派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提出「人大」、「政協」常委會委員等的人事安排；^[1-103]同月31日，鄧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針對「人大」、「政協」的常委名單進行討論。三天後（1959年1月3日），鄧又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的範圍從「人大」、「政協」常委名單，擴增到國防委員會委員與國務院各部部長人選推薦名單。^[1-104]

1959年1月6日，綜合先前幾回討論的結果，鄧小平針對新一屆政府人事安排與國家機構調整問題，正式致函毛澤東等中共主要領導人進行說明。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關於國家主席、副主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政協」主席、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等所謂「國家領導人」層級的人事名單，還是鄧小平個人綜合各方意見與自身想法後所擬出。^[1-105]易言之，中共中央在決定政府高層人事任命時，是在鄧小平及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所擬議、提供的名單中，進行考慮與圈選。

綜上所述，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透過政治導向與組織人事的管控，可確保黨對政府的領導。

以黨領軍方面

鄧小平擔任的中央總書記及其下轄的中央書記處，也可與聞軍隊事

務，有時甚至扮演「以黨領軍」的上級督導者的角色。這出自毛澤東的執意安排，鄧小平在初始時雖曾基於軍隊自成體系難管以及軍權敏感宜避的考量，試圖加以拒絕，但在毛的堅持下只得接受此一職責。^[1-106]此一問題同樣可從兩方面考察。

首先，鄧小平對軍方上呈中央文件的傳送與處理。

中共軍方上呈中共中央請求同意批覆的文件，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可先行過目篩選、提供初步處理意見後，送交黨主席兼中央軍委會主席毛澤東。^[1-107]毛澤東在獲閱相關文件後，也並非事必躬親，毛只對一些重要問題予以親自裁決，常再交付中央書記處承辦，最後一般是按照鄧小平的意見發出。相關的例子很多，例如：1957年7月1日，鄧小平受毛澤東委託代表中央書記處，對彭德懷6月底呈送毛和中央審閱準備在國防委員會上的講話稿，加以批改並許可。^[1-108]1958年2月25日，中共軍方就擬建設陸上和海上導彈試驗靶場一事，上報毛澤東並中共中央。26日，毛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請書記處處理。」3月3日，鄧小平批示：「書記處已同意。送陳雲、陳毅同志核閱後退軍委。」^[1-109]1958年6月18日，彭德懷將「甘肅藏族地區的反革命叛亂活動」，以及擬因應處置的方針和做法呈報中共中央，鄧小平閱後以中央書記處之名批覆「同意」。^[1-110]

其次，鄧小平對軍方內部事務的討論與決定。

中央書記處與軍隊有所連結的另一重要渠道和方式，乃在於其書記中有兼任軍隊要職者，譬如早先的黃克誠是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譚政也膺任總政治部主任；羅瑞卿在1962年進入中央書記處時，也已是總參謀長兼軍委秘書長。他們會將一些軍隊的事務提交中央書記處討論或向之通報尋求指示。

例如：1950年代中期，關於「公安軍」的軍種是否要撤銷的問題，黃克誠、譚政會同當時擔任該軍領導人的羅瑞卿三次開會進行研議。其討論結果是撤銷公安軍的軍種番號，並做成《關於公安軍問題專門小組會議記錄》送交中央書記處，由鄧小平加以審閱。1957年1月7日，鄧小平審閱後批示黃、譚、羅等人：「記錄我改了幾個字。請你們再審閱後退我，以便報告政治局常委。」17日，鄧再審閱後報請毛澤東批示。毛在22日批示：「照辦」。^[1-111]公安軍番號因而撤銷，改稱為解放軍公安部隊，其原領導機關也縮編為總參謀部警備部。

羅瑞卿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也會將一些軍隊問題提到書記處討論。^[1-112]具體的例子如：中共國防工業內部的整合問題，特別是聶榮臻領導的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與賀龍領導的國防工業委員會（國防工業辦公室為其辦公機構，羅瑞卿擔任主任）兩者之間的關係問題，鄧小平就非常關

心，曾特別囑咐同時在兩單位擔任副職的張愛萍：「不要讓兩個老師打架喔！」^[1-113]1964年，羅瑞卿提出「部院合併」方案，亦即國防科委所屬的研究院要併入國防工辦歸口管理的國防工業相關部門的問題，^[1-114]引發聶榮臻的強烈不滿。^[1-115]羅瑞卿將此一問題提交中央書記處審議，鄧小平裁示支持羅的「部院合併」提案。^[1-116]此外，羅瑞卿倒台後，也有大字報指控：羅未將軍中高級人事任免案事先報告中央軍委常委並徵得其同意，即直接上報鄧小平審議與批准。^[1-117]

如上所言，鄧小平經由對軍方文件的閱批與中央書記處內軍事書記的聯繫，經常與聞軍隊事務、具體掌握軍中動態。因此，當毛澤東決定對軍隊高層進行整風，以強化黨對軍隊的一元化領導，鄧小平自是代表黨中央督率軍方將領的不二人選。鄧小平在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中被任命為「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就是一重要的事例（第三章即專門討論鄧在該事件中之角色與活動）。

中共軍方總部或地方軍區的領導人，在更多的時候也將中央總書記鄧小平視為代表黨中央高層的重要人物。繼羅榮桓之後接掌總政治部的蕭華，在1963年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提出要著重學習鄧小平的相關講話，強調其「對軍隊黨的建設同樣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1-118]1964年的全軍政工會議期間，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蕭華對之要點加以宣傳，也指示中共軍方的機關報《解放軍報》社：「以後報紙上注意提高總書記的威信，要登總書記的照片」，「鄧總書記的位置不要低於周總理」。^[1-119]

地方軍區上，例如：蘭州軍區的司令員張達志，在「文革」期間被揭發曾讚譽鄧小平以中央領導人身份所作的講話：「對我思想震動很大、教育很大」，「是一次活的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在對下級講課時也多次引用鄧小平的講話。^[1-120]張達志過去效力於「一野」，與鄧小平無任何歷史淵源，他對鄧敬重的態度，在一定的程度上可反映中央總書記在軍中的聲望。

然而，正因中央書記處對軍隊事務的涉入，鄧小平當然不免捲入軍中的糾紛，特別是其與1959年廬山會議後繼彭德懷主持軍隊工作的林彪之間的政治衝突。例如：1960年底，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針對軍隊官兵對「大躍進」中農村「刮五風」的不滿，^[1-121]要求其副手蕭華向中共中央建議：各地駐軍除接受當地黨委領導，學習地方工作經驗外，還應經常關心地方工作，及時向地方黨委反映駐地附近人民群眾的政治思想動態，地方工作中執行中央指示的情況和急需解決的問題。鄧小平的中央書記處對此予以同意，總政治部也向部隊作了傳達。然而，林彪以個人名義向毛澤東呈送報告表示反對，認為此舉有造成「軍隊向地方開炮」、干涉地方政

治之虞。林的意見為毛所用，已下發之總政建議則被收回。^[1-122]

中央書記處與主持軍隊的林彪之間更大的衝突，則表現在如何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上。1961年春，羅榮桓對林彪在軍中先後推行的「背警句」、「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等方針學習「毛澤東思想」，再三提出異議，並致電鄧小平稟告其對有關問題的看法。^[1-123]中央書記處為此進行討論。鄧小平在1970年代回憶此事：「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羅榮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說學習毛澤東著作要學精神實質。當時書記處討論，贊成羅榮桓同志的這個意見。」^[1-124]「我和羅榮桓同志曾經同林彪作過鬥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系來看待。」^[1-125]即便如此，中央書記處可能因為不願意造成黨軍之間的不和諧，最後還是「沒有正式作決定」。^[1-126]此外，林彪在軍中提出「突出政治」，其後在「文革」前出現政治與業務孰輕孰重的爭論，鄧小平也難免置身其中。

對鄧小平而言，恐怕更為棘手的是：其所率領的中央書記處在相關問題上與林彪為首的軍方領導有不同意見，可能會有觸怒毛澤東、造成自己政治失分的危險。因為當時軍方的相關作為，皆是為了緊隨毛的思維、迎合毛的心意而來。

值得一提的是，賀龍在1963年9月至1965年12月羅瑞卿被整肅的這段期間，因林彪養病之故，在毛澤東的提議下代理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127]賀龍對於鄧小平中央總書記的地位甚為尊重，配合也較好，^[1-128]甚至為了維護鄧小平在「紅七軍」時期的歷史聲譽問題，不惜動手整人。^[1-129]

第六節 加強黨中央對地方黨的領導

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期間，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所扮演的角色，過去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鄧小平位居的是結合兩者的樞紐地位，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推促地方聽令中央行事

鄧小平依循黨組織的網絡，自上而下地將毛澤東的旨意和黨中央的決定，傳達給各地的黨政要人，並張羅促之推動與兌現。鄧小平令到行止、不打折扣的強勢政治風格，有利說服或溝通方面大員。在後面關於「大躍進」的章節（第四章與第五章）裏將可見：在運動上揚和掀起高峰階段，鄧小平屢屢代表中央鼓動、激發地方的熱情和幹勁，並佈署目標要求；在運動出現過熱、偏斜之時，鄧小平則忙於對之抑制和加以引導；當運動呈

現遲滯和難以為繼，鄧小平又要對不復豪情的方面大員鼓舞勵志、指派任務。

鄧小平在此方面往往能不辱使命，主要原因有：

一、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重用與信任。「文革」前，關於毛澤東未來的權力繼承人問題，地方領導人如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中央華東局書記魏文伯、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之間，已在流傳鄧小平是繼劉少奇之後毛的接班人的說法。^[1-130]在天津更有人聲稱：「鄧小平是黨內公認學習毛主席思想最好，跟毛主席最緊的。」^[1-131]若干地方大吏自己雖有管道「通天」、直接與毛接觸，但對鄧仍表尊重，不敢與之正面衝突。

二、鄧小平自身的領導威望。鄧在中共「馬上得天下」的過程中，立有戰功；鄧在黨內重大鬥爭中的表現，令人印象深刻。例如：在「高饒事件」上，不但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正直」，當時領導廣東的陶鑄更在黨代會上公然宣稱：「如果黨內允許拜師的話，當主席的學生我不夠格，但我願拜鄧小平為師。」^[1-132]鄧小平在建政初雖曾統領西南，但是在「入京」上調中央後，在人事安排、調動上，也尚能公正地未謀一方之私。^[1-133]鄧在處理公務上顯現出來的才幹，更是有口皆碑，常教地方領導人嘆服，這方面的例子很多：李井泉長期擔任四川領導人，後來升任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有「西南王」之稱。據李井泉的舊屬回憶：李「對於鄧小平的思想敏捷、決策果斷、作風務實稱讚不已，常對我們講總書記是我們黨的一個人才。所以有些工作，他要聽鄧小平的意見」。^[1-134]1960年出任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的宋任窮也曾評論鄧小平：「能力強」、「說話簡明扼要」、「不說廢話」，「處理問題乾脆果斷，從不拖泥帶水」。^[1-135]張平化亦表示過：「鄧小平處理問題不囉唆，真有政治家的作風。」^[1-136]陶鑄的妻子曾志則有如下的回憶：

陶鑄同志對小平同志很尊重，他說小平同志這個人非常聰明，看問題看得很深。另外一方面，他又很輕鬆，我們一天都是忙得不得了，有的抓不到要點，他很輕鬆，他什麼事情都很輕鬆。但是他一抓問題就抓住核心，而且抓得很緊。他從內心尊重小平同志。^[1-137]

鑒於鄧小平厚實的政治後台與自身的領導才能，地方領導人在其領地中傳達中共中央工作指示時，中央總書記的講話與指示是強調的重點與行動的指南。^[1-138]他們在省內推行政策遇到阻力時，有時甚至會抬出鄧小平，以經其同意為由，要求下級貫徹執行。例如：劉建勳在「大躍進」後出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為收拾、扭轉運動在該地所造成的困難局面，主張採取「借地渡荒」（借一些集體耕地給農民，讓之結合自留地、荒地自行進行生產並自享收成）、牲口包養到戶等政策。但劉建勳一開始在推行相關政策時，在省內遇到異議之聲。劉指出：「點子〔借地〕是我們出了，可是經過中央批准的」，「這個情況已報告到中央，中央書記處討論

同意，少奇同志也同意，借地三年以後，搞好了，我再報告中央。你們比我還革命嗎？」「牲口分槽餵養，也可以包養到戶。公私雙利有什麼不好呢？這些都是鄧總書記批准的，他說：『看來很好，可以執行。』你不執行，你比鄧總書記還聰明？」^[1-139]

地方領導人至首都北京洽公時，不忘投其所好，攜帶鄧小平所喜愛的地方特產；^[1-140]若適逢節慶，則登門對總書記噓寒問暖；^[1-141]當鄧小平視察其管區時，更是殷勤招待，力求賓至如歸。^[1-142]青海的王昭為了鄧小平的視訪，忙前忙後，從鄧到西寧後下榻的地點、桌上餐飲，甚至房內的桌上擺置、床位位置，王都一一仔細安排。王在鄧離開青海後，就因過度疲勞而病倒。^[1-143]鄧小平在中共革命過程中曾活動的省區如廣西，該地領導人韋國清也精心宣揚鄧的相關革命歷史，要求「對學生進行教育，要學生懂得總書記是搞根據地的」。^[1-144]這在「文革」中皆成為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

鄧小平除了在貫徹中央政策、彰顯中央權威上發揮重要作用，鄧也因負責處理黨中央日常工作，同各地首長互動、接觸甚為頻繁，例如：官方文件往返，開會討論議事；地方黨的領導人到北京時，也要向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匯報工作或請示。^[1-145]其間培養了密切的工作關係與公私情誼。

後來從「南粵王」升作「中南王」（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曾表示：在「八大」以前，其與鄧小平「僅是公事往來，交往不深」，但「鄧小平擔任總書記後，之後接觸就多了，關係也更密切了」。對鄧的觀感，「確實是好的」。陶鑄在「文革」初調到中央，乃是鄧小平向毛澤東舉薦。^[1-146]鄧小平必也是基於其任中央總書記期間與陶鑄多次的互動經驗，才這樣做的。中央華東局第一書記兼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也與鄧小平培養了不錯的關係，鄧在柯身後遭人議論時，不但仍對其繼續肯定，^[1-147]也對其遺孀的生活加以照顧。^[1-148]陳丕顯指出，「文革」前他在上海分管市委常務工作，與分管黨中央常務工作的鄧小平「來往很多」，並從中培養了彼此的信任感。^[1-149]李井泉在「文革」中被「造反派」多次提審，其與鄧小平的「黑關係」是審問重點，李也曾被迫作「我和鄧小平關係的檢查」。^[1-150]

鄧小平與方面大員的熟稔，又更有助於鄧代表中央與地方進行聯繫、疏通的工作，進而讓鄧在中共政治運作中佔有一特殊而不可或缺的位置。例如：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鄧小平在正式議場中不厭其煩、甚而舌敝唇焦地與地方要員周旋，促使後者能配合中央一致行動。從吳冷西（「文革」前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的回憶，也能發現鄧小平在會場外所從事的另一種遊說。吳表示：

應該講小平同志還有一個特殊的作用，是他來自地方，過去和各中央局、省委的同志關係很熟，所以他利用這種關係來溝通中央與地方的思路，這個作用是別人所不能代替的。開七千人大會期間，中央局和省委書記都住在北京飯店，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或者是聊天，或者是打台球，就在這個來來往往中間，把中央和各省的思路都溝通了，這個作用是別人不能起的特殊作用。[1-151]

過問地方人事問題

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基於政治或政策需要，以及情勢的變化，出面對地方的黨組織進行調整和改組，以求組織上的相應配合和保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在地方高級領導人的去留上，鄧小平可掌有重大權力。

1957年底至1958年中，中國大陸前後有12個省的黨政領導遭到清洗和改組。此一波人事變動一方面肇因於整風運動在各地的鋪展與深化；另一方面，也歸因於當時中共中央正積極強化黨在各級的一元化領導，以為「大躍進」的順利推行創造條件，地方上的黨委既橫向地就地集權，也縱向地獲得中央下放的權力，成為一個重要的權力載體。黨中央因而要特別確保地方代理人的忠誠與順從，也要助其除去在省內與之作對的政敵。在中共中央採取相關先行措施（preemptive measures）的過程中，在廣東、浙江、河南、山東、遼寧，都可見到鄧小平的身影（可參閱第二章與第四章）。

「大躍進」肇禍後，運動「災情」特別嚴重的若干省份，其領導班子被重新改組，鄧小平也參與其中。例如：原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長的王昭被調至青海省委，實際主持該省的黨政工作。據王昭自己所言，應該就是鄧小平推薦的結果。[1-152]至於取代吳芝圃出掌河南的劉建勳，雖無資料說明鄧小平在他的人事任命案上有否發揮影響，但最後是由鄧代表中央正式對劉談話、交付任務的。[1-153]

另外，針對「大躍進」對中國農村生產所造成的巨大破壞，鄧小平甚至也對地縣一級人事，進行局部調整。1962年，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決定從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家機關抽調一批領導幹部，帶職下放到各主要產糧區，加強地縣和基層的領導，[1-154]以使鄧與中央書記處當時忙於進行的經濟恢復與調整工作，更能在地方基層實現。

「文革」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改稱「四清」），[1-155]因中央內部存在分歧和前後政策的不一致，在地方上也造成了人事上的嚴重對立。代表中共中央處理地方領導層人事問題的鄧小平，其出面處理和因應的做法，既能顯現他在中央對地方人事調整權上享有的地位，也可具體反映他從事相關工作時所依循的標準和原則。

例如：貴州是劉少奇在1964年選擇作為推行其「社教」運動方針

（〈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簡稱〈後十條修正草案〉）的「突破口」，中共中央西南局（尤其是四川省省長李大章），便指控貴州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的周林「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性質的錯誤」，並將之降職。周林對此感到不服，上書黨中央要求申訴。由於毛澤東對劉少奇有關「社教」的主張和作法本來就有所不滿，除藉機將之公諸於黨內高層，更直接過問劉選擇開釗立威的貴州一案。毛批評貴州「社教」運動的搞法，甚至揚言要將已被鬥倒的周林「官復原職」。先前在劉少奇運動指導方針下遭到定罪的周林，更加不願接受西南局對他所作的指控。

鄧小平在此一問題上採取「首重毛澤東、再兼顧各方」的方針。首先，對周林申訴信的處理：由於周林原為貴州最高負責人，其申訴茲事體大，為示慎重，鄧小平按照組織的程序，將周林的申訴信批轉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員以徵詢意見；鄧小平也為此特向毛澤東報告，讓毛知曉貴州所發生的事情；其次，鑒於毛澤東對原定的貴州新省委人事任命有不同意見，鄧麾下的中央書記處專門開會討論，重新進行安排，表示對毛尊重；再次，針對周林和西南局之間圍繞在貴州「社教」問題上的糾葛和爭端，鄧小平表示「不做結論」，要彼此休兵。^[1-156]鄧小平這種擱置爭議的做法，一方面，未說周林在黔犯錯，以舒緩周的怨氣；^[1-157]另一方面，也未明白裁示，西南局在周林和貴州問題上處置是否得宜或失當，但基本接受了西南局對主黔人事的建議以及對周林新職位的安排，避免因周林一人而對西南局領導的整體威信造成打擊。

陝西也發生相似的情況。因應〈二十三條〉（全稱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的發出，從1965年1月中旬起，代行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的胡耀邦，針對陝西「社教」運動前一時期出現「左」的情形，提出一系列意在糾偏的思想和主張。以劉瀾濤為首的中共中央西北局，指稱胡耀邦所提的幹部政策，可能有引起翻案風之虞，因此對胡嚴加批評，更全盤否定他來陝西工作後的成績。胡耀邦在身心俱疲、心力交瘁之下，被葉劍英帶回北京養病。

對於胡耀邦和西北局之間同樣因「社教」方針更易而引爆的衝突，原定由中央書記處召集爭執的雙方進行討論，然而，1965年10月6日，鄧小平指示胡耀邦：「你們的爭論擺下，不要談了。」「他們〔西北局〕說的不算」，也表示中央無必要為胡做結論。鄧要胡「不要回陝西去了，休息一段時間，另外分配工作。」^[1-158]易言之，鄧小平的做法就是將「誰是誰非」的問題束諸高閣並隔離兩造，避免彼此對立激化、擴大。鄧小平的主要考量，與其在處理貴州問題上頗為相似，亦即避免「支持一位，傷及一片」的情況，並讓地方的黨系統賡續運作，不糾結於此而停頓、耽擱；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護了被批判者。

鄧小平以中央總書記的身份過問地方的人事問題時，也曾發生參與製造「冤假錯」案的情形。對寧夏劉格平的批鬥，就是一個案例。

劉格平在中共建政後即從事民族問題工作，後來出任寧夏回族自治區的行政首長。然而，劉格平長期以來即與時任寧夏區黨委第一書記的汪鋒以及中央統戰部李維漢等人之間，存在關係有欠和睦的問題。劉格平主張製作寧夏回族民族服裝一事，在1960年更直接引發雙方正面衝突。根據「文革」批判資料，鄧小平在此事的發展過程中，扮演的是「拉偏架」的角色，也就是支持、進而指揮李維漢與汪鋒，以劉格平製作民族服裝圖謀進行民族分裂活動為由，對之展開政治批鬥。

1960年3月中旬，汪鋒、李維漢將劉格平製作民族服裝問題向鄧小平匯報，鄧指示：「劉格平的問題很清楚嘛！早在民委就已經很清楚了，現在應該把問題敞開談，現在小範圍內，不行再擴大。」鄧小平並指示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與會助陣。3月25日至27日，北京舉行小型座談會，針對劉格平的問題進行揭批。鄧小平聽取座談會匯報後表示：「小會沒有解決問題，要放到擴大一些的會上去搞。」安子文、李維漢、汪鋒便組成核心領導小組，在4月召開為期近一個月的「擴大會議」，繼續對劉格平進行批判。4月底，鄧小平再指示：「這個問題在這裏解決不了，要回到寧夏去徹底解決。」

5月6日至7月3日，在中央派遣工作組坐鎮指揮下，舉行寧夏自治區第七次擴大會議，加大對劉格平及其從眾的批鬥火力。6月25日，汪鋒將會議情況向鄧小平進行電話匯報。鄧指示汪：「要堅決地整、徹底地整、狠狠地整」。^[1-159]會議進而掀起抓「以劉格平為首的地方民族主義反黨集團」的鬥爭高潮，多人遭到迫害。最後，劉格平被調離寧夏，降級使用。「文革」中，劉格平即以受到「劉、鄧黑司令部」政治迫害的受害者身份亮相並重新獲得起用。

最後，也有案例顯示，鄧小平在與聞地方領導人事問題時，其中可能夾雜著他個人的好惡因素。對西藏范明的批鬥即是一例。

1950年代中期，如何看待西藏政治情勢與應採方針政策問題，引起中共中央高度關注，特別是中共在西藏的領導機構「中共西藏地區工作委員會」的第一、第二領導人張經武、張國華與第三領導人范明之間對相關問題出現嚴重的分歧。范明對於藏人領袖達賴及其勢力一向抱以懷疑的態度，認為防阻其進行所謂分裂活動，應是中共治藏的工作重心，制度改革雖然在短時間內不會展開，但也要開始著手準備；兩張則不以為然，認為達賴雖然態度猶疑，但總體而言，在政治上還是比較心向中共，因此在制度改革上，應稍安勿動以免激化情勢發展。

1957年3月上旬，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召集西藏主要負責

人與會針對相關問題進行研議。鄧小平採納兩張的看法，決定對中共在西藏的工作採取大幅縮減力量的政策，也就是所謂的「大下馬」。對此，范明表示反對，不但上書毛澤東，明言鄧小平所制定的中共在藏實行收縮、緩和政策的可能負面後果，之後更乾脆直接給鄧本人寫信，強調其領導中央書記處所作的相關政策，已讓當地心懷不軌者趁勢發展、更行猖獗，也直指西藏工委內部存在的「宗派主義」問題（范明指控的兩張皆來自中共建政初期由鄧小平領導的西南局，范自己則來自西北局）。鄧小平因而決心懲治范明。鄧小平在1957年秋冬授意兩張在西藏工委展開針對范明的黨內整風，^[1-160]並在1958年3月2日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專門研究西藏黨內的整風問題。^[1-161]范明最後被打為「極右分子」，開除黨籍並革職，押送勞動改造。

「紅衛兵」在「文革」中即指控：范明甚早「就揭發了達賴『外向多而明，內向少而暗』，即傾向帝國主義多，傾向祖國少，鄧小平之流卻污蔑為『陷害達賴，抵制中央』」。^[1-162]范明晚年寫回憶錄提及此事時，還不敢指名道姓當年就是鄧小平要整他，而僅以「中央某負責同志」名之。

小 結

如本章前文所述，中共「八大」後，在毛澤東愈加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下，鄧小平憑藉中央總書記一職，極其活躍於「文革」前中共黨的組織與政治運作中：既能身處高峰、與議獻策；也能掌控黨機器，調遣各級幹部；亦可行使黨治，涉足政軍與地方。

鄧小平在當時中共領導層中屬於身強體健的「少壯派」，「身體狀況還相當地不錯」。^[1-163]在國外觀察者的眼中，鄧也給人一副精力充沛、幹勁十足的形象。^[1-164]然而，因為中央書記處經手各方事務、日理萬機，作為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相當繁忙，工作量極重。鄧小平的妻子卓琳在鄧出任中央總書記後充任其秘書，據她回憶：「當時中央領導數他的文件最多」。^[1-165]由於中央總書記工作實在過於繁重，「過度疲勞使得他患頭痛病」。^[1-166]對於十年中央總書記的這段經歷，鄧小平自己後來也嘗言：「在我的一生中，最忙的就是那個時候。」^[1-167]

在鄧小平入主中央書記處後，毛澤東漸次在各領域以政治運動的方式推行其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驗，例如：政治、思想上的整風運動，軍事上的「反教條主義」運動，經濟上的「大躍進」運動。在對外關係上，中共在國際共黨外交中也注入更多的自我訴求而與蘇聯漸生摩擦。鄧小平即以中央總書記的身份，深深地介入相關的運動與政策之中。

注釋

- [1-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上冊，頁12、14—15、24。
- [1-2]李嵐清：《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頁6—7。
- [1-3]胡喬木就強調：鄧小平、周恩來、劉少奇、陳雲「都會比較長期或短期地在外國，在歐洲生活過、學習過、勞動過」。相關的旅外經驗，「在革命戰爭年代大概不顯得那麼重要，可是到了建設時期，就顯出了差別」。〈會見美國記者白修德的談話〉（1983年5月14日），載《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208。
- [1-4]1926年鄧小平到蘇聯後所寫的中文自傳中表示：在他16歲出國以前，「生活浪漫」、「不喜歡讀書更是我的特長」；他在法國才逐漸介入政治活動；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的動機是為了「趕時髦」。余敏玲：〈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1998年6月），頁122。
- [1-5]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印：〈法國共產黨之研究〉，《專題研究》，第41期（1956年12月31日），頁27—28。有意思的是，毛澤東在1974年討論中共中央人事問題時，也曾以「法國派」稱呼周恩來與鄧小平。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2060。
- [1-6]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頁122。
- [1-7]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頁160—161。
- [1-8]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頁145、147。
- [1-9]李雪峰回憶：「1966年8月至9月間，中央召開了一次生活會，林彪誣陷小平同志，一條是與『四野』爭功，說《毛澤東選集》上著名的一段史實，是『四野』的，可鄧說是『二野』的。二條是鄧在『紅七軍』時臨陣逃跑。對這些『揭發』，小平同志似乎沒有聽見，眼睛瞅著天花板抽菸。」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二十四年〉，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225。
- [1-10]〈從「紅色教授」到「紅色大使」——採訪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載郭戰平、趙曦主編：《真情見證：開國領袖的親情家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頁247。
- [1-11]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頁303。
- [1-12]「文革」中，「紅衛兵」批判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期間在視察貴州遵義時，「恬不知恥」地自我冒充為遵義會議的與會者。對此指控，鄧小平後來表示：「我一生的歷史已經夠光榮的了，參加遵義會議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榮，沒有參加遵義會議也抹煞不了我一份光榮。」〈劉鄧醜聞〉，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辦：《8·15戰報》，第20期（1967年5月12日），版3。鍾文、鹿海嘯編著：《百年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上卷，頁278。
- [1-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474。
- [1-14]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頁438。
- [1-15]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550—551。李雪峰：《李雪峰回憶錄（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185—237。
- [1-16]〈臨時登記卡27676〉，國史館，全宗名：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卷名：鄧小平，典藏號：129000045607A。
- [1-17]《毛澤東傳（1893—1949）》，頁774。
- [1-18]例如：1947年10月22日，在安徽合肥的李品仙致電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表示：「現劉匪駐麻西之馬中岑，政委鄧小平駐麻埠附近小崗子。」國史館，全宗名：蔣中正總統文物，卷名：武裝叛國（一四七），典藏號：002-090300-00170-119。11月21日，在湖北武昌的萬耀煌致電蔣表示：「劉伯誠〔作者按：『誠』係誤字，應為『承』〕與鄧小毛〔作者按：即為鄧小平〕兩匪於巧日曾在上巴河宿營，皓日向馬鞍山竄去。」國史館，全宗名：蔣中正總統文物，卷名：武裝叛國（一四八），典藏號：002-090300-00171-290。1948年4月23日，在河南開封的劉茂恩致電蔣表示：「據俘匪供稱劉匪政委鄧小平、伏牛山區政委姜宗仁、匪六區專員郭思敬及各偽縣長於卯時起在南名西李青店召開軍事會議。」國史館，全宗名：蔣中正總統文物，卷名：武裝叛國（一五八），典藏號：002-

090300-00181-204。

[1-19]洪小夏、劉俊平：〈淮海戰役總前委辨析〉，《史林》，2009年第3期，頁101-110。

[1-20]宋毅軍：〈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軍事思想與實踐研究述評〉，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研究述評》（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上冊，頁186。

[1-21]行政院設計委員會編印：〈匪幫最近的重要人事調整〉，《匪情研究資料》，第7輯（1953年3月），頁44-45。

[1-22]宋毅軍：〈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軍事思想與實踐研究述評〉，載《鄧小平研究述評》，上冊，頁187。〈萬里談鄧小平〉，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編：《話說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20。

[1-23]1943年11月10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講話可說是一個代表：「我黨自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以後，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之下，徹底克服了黨內『左』、右傾機會主義，一掃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氣氛，把黨的事業完全放在中國化的馬列主義，即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之下，直到現在已經9年的時間，不但沒有犯過錯誤，而且一直是勝利地發展著，這種事實我們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現在我們有了這樣好的黨中央，有了這樣英明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這對於我們黨是太重要了。」載鍾文、鹿海嘯編著：《百年小平》，上卷，頁112-113。

[1-24]關於此點，「劉鄧大軍」的成員皆深有同感。〈李達談鄧小平〉，載《話說鄧小平》，頁63-65。〈秦基偉談鄧小平〉，載《話說鄧小平》，頁73。

[1-25]1948年中，毛澤東要求負責各戰略區、野戰軍的領導人，定期向中共中央呈報綜合性報告。毛曾轉發鄧小平遵照相關指示辦理的報告為範例，強調：「像大別山那樣嚴重的環境，鄧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規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綜合性報告」，批評林彪和東北局「心中存在著一種無紀律思想」。載《毛澤東傳（1893-1949）》，頁886。

[1-26]例如：針對「二野」部隊在進軍西南時所出現的畏苦怕難情緒，鄧小平指示：「凡是縣以上幹部，不願到貴州去的，一律開除黨籍。」劉銘簡：〈打開進軍西南的大門——解放貴州〉，載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鄧小平與大西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75-76。秦基偉亦回憶：「小平同志處理問題非常嚴肅，毫不含糊，他不是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而是抓住了你就得從嚴處理，那是一點也不含糊的。」「在原則問題上他毫不含糊，也不管你是誰，鐵面無私。他在處理問題上能『嚴』，就是在這些問題上叫你不放。」「小平同志有一個觀點，就是說嚴是培養人才，嚴是培養過硬的戰鬥作風，嚴才能出戰鬥力。」〈秦基偉談鄧小平〉，頁83。

[1-27]對日抗戰期間，賀龍的晉西北根據地經濟困難，鄧小平在太行根據地自身也處困難的情況下，仍號召節約物資以支援晉西北。「事後，中央又把劉鄧支援賀老總的情況發了通報。」〈秦基偉談鄧小平〉，頁77。1949年，共軍進軍大西南時，鄧小平特意指示「二野」「禮讓」賀龍的部隊，讓之進駐成都。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鄧小平主政西南時期思想與實踐研究述評〉，載《鄧小平研究述評》，上冊，頁196。

[1-28]對於鄧小平領軍前進並堅持在大別山的軍事行動，陳毅即曾高度評價：「正因為劉鄧在大別山拖住敵人，各地才能順利轉入進攻，打了不少勝仗。要記功的話，各地只能記一半，另一半要記在堅持大別山鬥爭的指戰員身上。」宋毅軍：〈解放戰爭時期鄧小平軍事思想與實踐研究述評〉，頁182。賀龍對於鄧小平也讚譽有加。他在1952年西南軍區黨代表會議上表示：「有人說西南軍區黨委是成熟的，我認為最成熟的是鄧小平，西南只有鄧小平精通馬列主義。」〈打倒篡黨篡軍篡政的陰謀家賀龍〉，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新北大》編輯部編：《新北大》，第28期（1967年1月20日），版3。

[1-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上冊，頁603-604。

[1-30]關於一線、二線的安排，毛澤東自己曾作過解釋：「考慮到國家的安全，鑒於蘇聯斯大林的教訓，搞了一線、二線，我處在二線，別的同志在一線。」「常委分一、二線，搞書記處，是我提議的。」〈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5日），載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毛澤東思想萬歲》（台北：1974），頁657-658。另外，有學者指出：可以選擇居於二線者，僅限於毛澤東一人，實際上，毛也沒有真正完全地退居二線，因為處於一線的其他領導人皆深知大權緊握在毛手裏。Frederick C. Teiwes, "The Paradoxical Post-Mao Transition: From Obeying the Leader to 'N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34 (July

1995): p. 59.

[1-31]林蘊暉：〈高崗事件與中共高層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上的分歧〉，《二十一世紀》，2003年8月號（總第78期），頁62-68。

[1-32]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在1953年初會發展到要高崗親自查看存放在瀋陽的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當地被捕的情況。載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321。高崗將此解讀為毛對之的特別信任，再加上高當時甚受毛所重用，讓之心生暗中活動扳倒劉的企圖。鄧小平後來回顧此事就表示：「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載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261。在高崗政治倒台後，毛澤東在黨內一再拉拔鄧小平，雖尚不至於是毛心想用鄧取代劉少奇，但毛應該至少是有欲抬鄧以制衡劉的意圖。

[1-33]〈關於政府方面要經中央批准的事請鄧小平多管一些的批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第4冊，頁72-73。

[1-34]更詳細的討論可參閱：鍾延麟：〈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2卷第4期（2010年12月），頁521-562。

[1-35]毛澤東曾表示：「從高饒問題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羅榮桓、鄧小平、陳雲。」王力：〈毛澤東談羅榮桓〉，載《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上冊，頁315-317。

[1-36]1954年春，鄧小平參加對高崗、饒漱石的約談，並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後主持饒漱石問題的座談會；1955年3月，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作《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載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上卷，頁325-331。

[1-37]安子文在1966年寫的《自傳》中表示：「鄧小平同志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的三年間，是組織部工作很順利的時期。」載陳野萍、韓勁草：《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頁108-109。

[1-38]李雪峰：〈從建國初期到「文革」期間〉，載李穎、程美東主編：《與鄧小平一起親歷歷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頁205。

[1-39]中央秘書長會議的職責為：「代中共中央處理日常工作」，具體負責協助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研究處理黨和群眾工作方面的日常事務，以及政治局（書記處）交議或交辦的其他事項。中央秘書長會議定期開會議事，中共中央許多決定的重大事項，多先經該會議研究討論，提出方案或擬出決定草案，再交中央審議通過。李林：〈中共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3期，頁15-16。

[1-40]"Notes on Leading Personality in China (1955),"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FO371/114984, p.116.

[1-41]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121-122。

[1-42]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42。

[1-43]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二十四年〉，上冊，頁221。

[1-44]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上冊，頁521。

[1-45]中共「八大」中央委員會的選舉結果，鄧小平得票比周恩來高，還引發一些感到好奇的議論。〈山東、河南、天津、武漢等地機關幹部和民主人士對「八大」的反映〉，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總第2015期（1956年10月10日），頁853-854。

[1-46]對內方面，1957年1月的中共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講話中四次提到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特別是最後一次，在整個講話的結尾部分，毛呼籲全黨要照辯證法辦事，更強調「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載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第5卷，頁330-362。對外方面，1958年夏，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訪問中國大陸，毛澤東與鄧小平同之面談。毛向赫氏介紹：「這是鄧小平同志，我們的總書記，你別看他個子小，但是他是我們淮海戰役的總指揮呀，前委書記，在中央主持日常工作，所以今天由他來主要跟你談。」閻明復：〈閻明復談鄧小平〉，載

《話說鄧小平》，頁165。

[1-47]台灣國府方面，蔣中正甚早就開始注意到鄧小平在中共高層中地位的變化。他在1953年9月19日的日記中寫道：「共匪財長薄一波與徐國棟被整肅，繼任者鄧小平與方毅應加研究。」Chiang Kai-shek Diaries, [50.10] 1/2,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對於鄧小平在1950年代中期的步步高升，在中共召開「八大」的隔年，台灣所作的一個對中共政要的調查中，即針對鄧表示：「鄧匪近年來連任要職，為匪黨中擢升最快者。」對共軍事研究會編印：《朱毛匪軍重要人物調查》，1957年12月，頁377。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在1957年的相關分析是：「中共高層機構增加了新鮮血液」，「最值得注意的個人提升就是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在13位原政治局成員中很明顯是年紀最輕的，卻進入了政治局常委會。」〈中情局對中國現狀及至1961年前發展的情報評估〉，1957年3月19日，載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第1卷，頁75。

[1-48]相較1945年中共「七大」的黨章，中共「八大」的黨章中並無提及「毛澤東思想」。此一變化常被認為是含有針對、限制毛澤東個人及其權力地位的用意；負責中共「八大」政治報告的劉少奇與修改黨章報告的鄧小平，則被看作是此事的主要運作者，並讓毛澤東感到不快。然而，實際的情況是，中共「八大」黨章不提「毛澤東思想」，乃是出於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高層的共識，例如：為了照應國際的影響，特別是蘇共「二十大」對史達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Stalin）個人崇拜的批評，所作的相對調整。載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361-368。因此，並無存在劉少奇、鄧小平藉機貶抑毛澤東，以及毛因此事對劉、鄧懷恨在心的情況。鄧小平在中共「八大」會議期間與其後受到毛澤東重用一事，本身即可以反映此事沒有對毛、鄧關係產生負面的政治影響。

[1-49]鄧小平：〈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卷，頁252。

[1-5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冊，頁1318。

[1-51]關於1958年以後中央政治局開會的情形，胡喬木的回憶是：政治局委員坐定後，毛澤東現身會場表述自己的意見後，即又離席。政治局會議則就毛的指示進行討論。胡並多次提到，自此以後，政治局開會時，都是毛總結、拍板定案，而無舉手表決、少數服從多數的情形。盧之超：〈回憶喬木〉，載楊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頁164-165。

[1-52]此乃根據當代中國史學者李海文對李雪峰秘書黃道霞的採訪。

[1-53]鄧小平：〈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41。

[1-54]此即毛澤東所說的：「很多事情要在那裏〔中央書記處〕處理，在那裏提出議案。」〈關於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7卷，頁112。

[1-55]王光美：〈王光美談鄧小平〉，載《話說鄧小平》，頁154-156。有關鄧小平與劉少奇在「文革」前中共政治中，特別是在一線領導內的互動與關係問題，可參閱：鍾延麟：〈劉少奇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52-196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4期（2010年11月），頁115-164。

[1-56]李林：〈中共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中共黨史研究》，頁14。

[1-57]〈會見美國記者白修德的談話〉（1983年5月14日），載《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頁206。

[1-58]李雪峰：〈關於黨的八大召開前後的歷史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4期（總第297期），頁9-10。

[1-59]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者（A君）提供的資訊。（北京，2007年1月）

[1-60]當時任職於中共中央宣傳部的阮銘所提供的資訊。（台北，2006年11月22日）

[1-61]譚震林因「大躍進」農業政策失當，欲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進行個人檢討，鄧小平批示，由作為一個集體的中央承擔責任即可。載董保存：《譚震林外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頁183。

[1-62]王稼祥因為身體需要長期休養，遂向鄧小平並中央書記處寫報告，要求半工作、半休養，得到了批准。在這種情況下，王稼祥召集中聯部各位副部長、秘書長、副秘書長商

量研究後擬訂：對中聯部的日常事務，今後由劉寧一、伍修權等人負責；中聯部凡有重要問題需要請示中央，寫明「稼祥並報中央」，先由他閱批後再送中央審批；如果遇到重大問題，則約集副部長等人在王稼祥處交談研究。對於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則根據王的身體情況再決定是否參加。這些都得到了鄧小平的批准。載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359。

[1-63]李銳：《李銳談毛澤東》（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5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19。

[1-64]依據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的楊尚昆的日記，中央書記處一週開會三到五次不等，甚至也有連天開會、一天內接連開會的情況。值得一提的是，中央書記處開會的密集度，在「文革」前中共中央的核心組織中居冠。

[1-65]〈揭開鄧小平的反革命老底〉，載湖南大學文革籌委會宣傳組、湖南大學東方紅聯合指揮部宣傳組、高司湖大總部宣傳部編：《大字報選》，第26期（1967年5月15日），版4。

[1-66]蘇維民：〈楊尚昆談在中央辦公廳二十年〉，《百年潮》，2008年第7期，頁19。

[1-67]李穎：〈新中國中央辦公廳主任崗位上的楊尚昆〉，《中共黨史資料》，2007年第3期，頁154。

[1-68]1955年1月，在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的建議下，在中央書記處之下成立第一辦公室（主要承擔中央書記處直接交辦的工作與調查研究任務）、第二辦公室（主要分管農業、林業、水利工作的調查研究與書記處交辦的工作）、第三辦公室（主要分管工業、交通的調查研究與書記處交辦的工作）、第四辦公室（主要分管對群眾團體工作的調查研究）。這四個辦公室在1956年12月被撤銷、改組。載鄭謙、龐松、韓鋼、張占斌：《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發展概要》（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頁63-64。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第5卷，頁67-68。

[1-6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冊，頁1318-1319。

[1-70]康生在正式補選進中央書記處以前，即是1958年設立的中央文教小組的一員，而後兼任隸屬該小組的中央理論小組組長。因此，康生在中央書記處內的分工，除外事以外，尚有宣傳教育。

[1-7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14。

[1-72]金冶主編：《回憶譚震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頁424-425。譚震林在「文革」前宣揚鄧小平的講話並對鄧的工作指示予以重視，例如：在林業問題上，譚震林對於1964年鄧視察東北林區時所肯定的生產經驗（「採育雙包」，也就是將採伐與育苗包工給工人）大加推廣，在「文革」中成為其被批判的「罪行」之一。〈譚震林在林業系統復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林業部東方紅公社《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第2期（1967年9月28日），版4。〈譚震林罪行錄〉，首都紅代會北京林學院東方紅公社：《北林東方紅》，第9期（1967年3月20日），版3。

[1-73]鄧小平：〈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246。

[1-74]李雪峰：〈我在小平同志領導下工作的二十四年〉，頁221。

[1-75]楊尚昆：《楊尚昆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上冊，頁395。

[1-76]《彭真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220。

[1-77]Pitman B. Potter,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83.

[1-78]文輝抗、葉健君主編：《新中國第一代：省（市、區）委書記、省（市、區）長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上冊，頁12。

[1-79]項淳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載李海文、王燕玲編著：《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頁129。

[1-80]〈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毛澤東思想萬歲》，頁661。

[1-81]鄧小平：〈鄧小平寫給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摘錄）〉（1968年6月20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1-82]1967年4月，李富春揭發鄧小平支持「單純財政觀點」，在1962年「對『三面紅旗』刮冷風，不要階級鬥爭，不抓階級鬥爭為綱，搞分田到戶、三自一包、三和一少」。〈李

富春同志談毛主席經濟方面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國務院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主編：《財貿紅旗》，第7期（1967年8月11日），版3-4。同年8月，李先念也指控鄧小平犯的「一系列罪惡活動，集中到一點，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篡黨、篡國、篡政，奪無產階級的權，專無產階級的政」。李先念：〈我的檢討〉，國務院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主編：《財貿紅旗》，第9期（1967年8月30日），版2。同年2月8日，譚震林表示：在1960年至1966年，「每逢雙數年是劉、鄧反動路線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進攻最厲害時期」。〈周總理和譚副總理接見江蘇省革命造反奪權委員會赴京代表講話紀要〉，載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國家測繪總局二分局計算隊翻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選編》（北京：1967年3月），頁48。

[1-83]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對於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與中央各部門的關係，有一頗符合實際的分析：「黨的所有政策和指示都來自毛、常務委員會和政治局」，書記處「負責這些指示在黨的下級機關或者政府部門的貫徹執行。書記處受到十個或者數目不定的中央部門的協助，分別處理職能性質的工作（外國情報、宣傳、黨的組織、意識形態培訓、婦女工作、青少年工作、統戰工作，與國外共產黨的聯絡）」。
〈中情局關於中國及其當前問題的情報手冊〉，1966年1月1日，載《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3卷，頁513。

[1-8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冊，頁1328。

[1-8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42。趙生暉：〈1965年中央組織部關於黨的建設的三個報告的形成過程〉，《中共黨史資料》，第52期（1994），頁12-14。

[1-86]〈把劉、鄧氏黨組織連根拔掉〉，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站：《東方紅》，第18號（1967年1月31日），版3。

[1-87]大連鐵道學院紅色造反團戰士記錄整理：〈周總理的講話：2月1日於中南海國務院小禮堂〉，大連鐵道學院紅色造反團主辦：《紅鐵道》，第3號（1967年2月11日），版3。

[1-88]鄧小平表示：「總的方針，我們統戰部管的這一套，中央也好，地方也好，我們統戰部門也好，是搞對了的，搞得很有成績」，「總的方針、總的方向是搞對了的」。〈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6，目錄號1，案卷號122，頁3。

[1-89]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75。

[1-90]1928年春，鄧小平與張錫瑗結婚。此段婚姻因張在1930年去世而結束。鄧小平為其妻妹張曉梅介紹婚姻，對象即是徐冰。鄧、徐兩家直至「文革」前一直保持密切、友好的關係。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頁152-153。

[1-9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73-674。

[1-9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16。

[1-9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1396。

[1-94]隨著各中央領導小組成立並直接領導國務院各大口的業務工作，黨中央各部門的職能也相應擴展，由原來的主在管理對口的相關政府部門的幹部，更進一步地管理後者所負責的業務。例如：中央工交部管理工業、交通運輸與基本建設；中央財貿工作部管理財政、金融與稅務；中央農村工作部管理農業、林業、水利與氣象。載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頁34-35。

[1-95]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者（B君）提供的資訊。（天津，2008年4月）

[1-96]李雪峰回憶：「黨的『八大』，我被選為中央書記，書記處幾乎天天有會，總理也參加，但他責權分明，主要抓國務院的工作，中央書記處主要是小平同志負總責。」趙春偉：〈紀念我敬仰的首長李雪峰同志——回憶在李老身邊工作的一些往事〉，載《李雪峰紀念文集》編輯組：《李雪峰紀念文集》（北京：未出版，2007年），頁407。

[1-97]有關鄧小平與周恩來在政治上的互動與關係的議題，可參閱：鍾延麟：〈中共建政後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49-197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2009年11月），頁169-220。

[1-98]〈薄一波同志1月7日在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21，目錄號4，案卷號8，頁92-95。

[1-99]〈錢信忠三反罪行錄〉，衛生系統革命造反派《全無敵》編輯部主辦：《全無

- 敵》，第8期（1967年5月12日），版4。〈錢信忠三反罪行錄之二〉，首都醫革會健康報延安公社《全無敵》編輯部主辦：《全無敵》，第9期（1967年5月19日），版4。
- [1-100]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香港：明報出版社，1991），頁681-682。
- [1-10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中卷，頁410-411。
- [1-10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19。
- [1-103]《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24。
- [1-10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77-1478。
- [1-10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79。
- [1-106]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者（C君）提供的資訊。（天津，2008年4月）
- [1-10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35、1342。
- [1-108]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191。
- [1-109]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下卷，頁634。
- [1-110]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687。
- [1-11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36。
- [1-112]《王力反思錄》，下冊，頁941-942。
- [1-113]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頁244-245。
- [1-114]《羅瑞卿傳》編寫組：《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頁250-251。
- [1-115]聶榮臻曾為「部院合併」問題向羅瑞卿激動地表示：「把我的意見再給中央反映一下嘛，我也是一票嘛！」載聶力：《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頁268-269。
- [1-116]針對聶榮臻對於「部院合併」提案的不滿情緒，根據「文革」批判材料的揭發，鄧小平強硬地表示：「大將為什麼不可以指揮元帥？」也就是在相關問題上，表達對羅瑞卿意見的支持。〈打倒篡軍反黨野心家羅瑞卿——徹底清算羅瑞卿摧殘國防科研事業的滔天罪行〉，「1025」批鬥劉鄧賀羅籌備處：《1025戰報》，第6期（1967年9月19日），版2。
- [1-117]羅瑞卿在「文革」中遭指控：「1965年4月，林副主席明確指示，軍隊六級（中將）以上幹部和總部各部部长 的任免，要經過軍委常委同意，然後才上報黨中央，但羅瑞卿公然反對林副主席的指示，根本不請示報告林副主席和軍委常委，就自作主張報告鄧小平批准。」北工紅旗720部隊：〈羅瑞卿篡軍反黨迫害林彪同志的十大罪狀〉，北京工業學院革命造反委員會紅代會北工紅旗編輯部：《北工紅旗》，第62期（1967年9月6日），版3。
- [1-118]〈蕭華與劉鄧黑司令部的關係〉，石家莊魯迅（狂人）公社紅衛兵第二革命造反司令部、北京郵電學院革命委員會首都紅代會北郵東方紅公社：《狂人、北郵東方紅聯合版》（1967年9月4日），版4。
- [1-119]總政機關無產階級革命派《鬥批籌備處》：〈大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蕭華罪行錄〉，北京礦業學院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京礦院東方紅：《東方紅》，第98期（1968年5月1日），版8。
- [1-120]〈把張達志揪出來剝皮示眾——張達志三反罪行一百例〉，甘肅師範大學革命造反總部編：《東方紅戰報》，第14期（1967年6月21日），版2。〈把張達志揪出來剝皮示眾——張達志三反罪行續編五十例〉，甘肅師範大學革命造反總部編：《東方紅戰報》，第16期（1967年6月28日），版3。
- [1-121]所謂「五風」指的是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以及對生產的瞎指揮風。
- [1-122]羅東進：《我的父親羅榮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頁357。
- [1-123]劉漢、黃瑤等著：《羅榮桓元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頁933-937。
- [1-124]鄧小平：〈各方面都要整頓〉，載《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33。
- [1-125]鄧小平：〈「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載《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36。

- [1-126]《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頁65。
- [1-127]《賀龍傳》編寫組：《賀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355。
- [1-128]「文革」期間，賀龍因其與鄧小平的關係問題，被多次揭發與批判。有「文革」小報指稱：「賀對鄧大肆吹捧、百般奉承，經常宣揚總書記如何如何，屁大的事也要找鄧小平。」賀龍也被指控會主張軍隊院校應邀請鄧小平、劉少奇、彭真等人到校作關於「四清」運動的講話，並強調「他們的報告是靠得住的！」〈把賀龍揪出來示眾〉，北京郵電學院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郵東方紅公社：《北郵東方紅》，第47期（1967年8月12日），版4。
- [1-129]賀龍被揭發夥同羅瑞卿、彭真在1964年至1965年整肅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莫文驊，以為鄧小平報一箭之仇。莫文驊被指控在1945年曾揭發鄧脫隊「紅七軍」、自行離去的歷史問題，負責調查的工作組就批判他：「從反鄧總書記的性質看，是反黨性質的錯誤」；「對中央許多領導同志缺乏階級感情，對劉主席、彭真、賀龍，特別是對總書記鄧小平造謠誹謗」。〈賀、羅在政治學院64年整風中的罪惡勾當〉，紅代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第45期（1967年8月30日），版3-4。〈打倒篡軍反黨分子賀龍——賀龍的部分罪狀〉，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隊：《星火燎原》，第3期（1967年1月18日），版2。〈打倒黨內反黨篡軍的大頭目——賀龍〉，中國人民解放軍測繪學院井岡山紅色造反團：《井岡山戰報》，第3期（1967年1月16日），版1-2。對於此事，莫文驊在回憶錄中給的是一個前後矛盾的說法。莫表示：其因為對林彪的指示陽奉陰違而被林派人批鬥，「誹謗原紅七軍某領導人」也確實是他被批判的一項重要罪名。然而，莫堅稱：他在1945年所主持的《紅軍第七軍簡史》裏，根本沒有「誹謗原紅七軍某領導人」的話，此乃工作組「把自己說的話，強加給小冊子，遷罪於我。」莫被批判、撤職後，被指派到福州軍區降級使用。莫表示：在他準備赴任之際，正值「文革」激化發展的政治變局。葉劍英突然告之：「你的問題可以平反了，你也可以不走了。」載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頁675-678。引人好奇的是，「文革」初期，林彪在政治上如日中天，當初若真的是林要整莫，莫何以能在斯時全身而退呢？另外，根據王力的說法，莫文驊在「文革」中曾寫信揭露鄧小平，說鄧當年是逃跑；張雲逸也跟進寫信證明此說。載《王力反思錄》，下冊，頁733-734。
- [1-130]韓哲一：〈魏文伯、陳丕顯惡毒攻擊毛主席的滔天罪行〉，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大會專刊》，聯合版第5期（1967年4月13日），版2。〈張平化的自白〉，湖南大學文革籌委會宣傳組、湖南大學東方紅聯合指揮部宣傳組、高司湖大總部宣傳部編：《大字報選》，第17期（1967年3月22日），版2。〈益陽地委書記周繼舜交代和揭發張、王、蘇「三家村」的反革命罪行〉，湖南大學文革籌委會宣傳組、湖南大學東方紅聯合指揮部宣傳組、高司湖大總部宣傳部編：《大字報選》，第18期（1967年3月28日），版4。
- [1-131]此乃根據「文革」中對原中共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的揭發。〈萬曉塘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話集〉，河北大學毛澤東思想「八一八」紅衛兵《八一八戰報》編輯部：《八一八戰報》，第54期（1967年3月16日），版1。
- [1-132]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頁452。另外，根據「文革」的批判材料，在1957年一次廣東省委會議上，陶鑄曾帶著激動的情緒表示：「有人要學習毛主席，那麼容易？能夠學到鄧小平那樣就很不錯了。」紅代會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報：《北京公社》，第34期（1967年8月8日），版4。
- [1-133]Frederick C. Teiwes, *Provincial Party Personnel in Mainland China 1956-1966* (New York: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67), pp. 20, 30, 80.
- [1-134]許夢俠：〈回憶李井泉在四川的工作〉，載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李井泉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頁168。
- [1-135]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伐宋兵團》：〈堅決打倒東北地區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宋任窮：徹底揭露宋任窮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之一）〉，東北工學院紅旗紅衛兵造反團東工紅旗編輯部：《東工紅旗》，第4期（1967年7月10日），版1。
- [1-136]〈益陽地委書記周繼舜交代和揭發張、王、蘇「三家村」的反革命罪行〉，湖南大學文革籌委會宣傳組、湖南大學東方紅聯合指揮部宣傳組、高司湖大總部宣傳部編：《大

字報選》，版4。

[1-13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百年小平》（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頁260。

[1-138]例如：青海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被揭發1963年在傳達中共中央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時，「只用了幾句話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而用了大量篇幅宣揚黑幫分子劉少奇、鄧小平的黑指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楊植霖在我省城鄉四清運動中的反動嘴臉〉，青海省東方紅公社、東方紅紅衛兵指揮部主辦：《東方紅》，第9期（1967年3月18日），版3。吉林省委第二書記、曾代理第一書記的趙林被揭發曾宣稱：「在企業裏踏踏實實地工作，不要敲鑼打鼓的貼大字報的群眾運動」，「這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辦企業要驢打滾」，「要辦有高利潤的工廠」，「這是總書記鄧小平的指示」。〈打倒吉林省黨內頭號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趙林〉，《長春公社》報編輯部：《長春公社》，第16期（1967年9月2日），版2。

[1-139]〈劉建勳是人？還是鬼？〉，河南省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主辦：《中州烈火》，第12期（1967年6月10日），版3。

[1-140]例如：李井泉在「文革」中被指控：「每次到北京，一下飛機第一件事，就是約鄧小平會見，匯報情況，密謀策劃。」「李井泉對鄧小平的孝敬，也是無微不至的」，「鄧小平不吃別地的大米和橘餅，專吃川西『麻麻穀子』大米和內江的橘餅，李井泉每年都用飛機專遞」。〈李井泉與劉鄧黑司令部的聯繫〉，紅衛兵成都部隊成大支隊成都大學八三一戰鬥團：《八三一戰報》，第24期（1967年6月6日），版4。

[1-141]中共青海省委第一、第二書記楊植霖與王昭被揭發：1963年春節，兩人「一道登門拜訪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向這個劉家黑店的二掌櫃請安問好」。〈楊植霖是從哪個山頭上來的？〉，青海省東方紅公社、東方紅紅衛兵指揮部主辦：《東方紅》，第7期（1967年3月11日），版3-4。

[1-142]貴州的賈啟允在「文革」中就會因此一問題被揭發與批判。〈鄧小平「遊黔」側記〉，湖南大學文革籌委會宣傳組、湖南大學東方紅聯合指揮部宣傳組、高司湖大總部宣傳部編：《大字報選》，第26期（1967年5月15日），版2。

[1-143]尹曙生：〈省長王昭之死〉，《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頁11-12。

[1-144]〈廣西土皇帝韋國清罪惡滔天〉，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首都紅代會中國科技大學東方紅：《四二二戰報、東方紅》，第44期（1967年8月26日），版2。

[1-145]例如：中共在西藏的領導人譚冠三，赴北京向中央書記處匯報西藏的狀況，鄧小平即代表中央對之工作表現予以評價。關良桂、夏明星：〈譚冠三中將在西藏〉，《黨史文苑》，2006年第10期，頁27。

[1-146]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頁449、452。

[1-147]針對有人要編寫《中共上海黨的兩條路線鬥爭史》，將柯慶施視為對立面的代表人物，時任上海市委書記陳國棟請示鄧小平，鄧表示：「柯慶施還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氣不好，得罪了不少人。」相關編寫計劃因而不了了之。鄧偉志：〈評柯慶施〉，《江淮文史》，2004年第1期，頁16。

[1-14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646；下冊，頁1058。

[1-149]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231。

[1-150]〈徹底打倒西南的赫魯曉夫——李井泉〉，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重慶大學紅衛兵八一五戰鬥團主編：《8.15戰報》，第61期（1968年4月20日），版1-2。

[1-151]吳冷西：〈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者〉，載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頁320。

[1-152]「文革」中，王昭表示：「有人說，我來青海是羅瑞卿介紹的、彭真批准的。這話不確切。」「後來我聽說過鄧小平會向中央說過：『青海選這個人去很適合』。」〈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八月三十一日審問王賊筆錄〉，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編：《大批判》，第3期（1967年9月3日），版4。

[1-153]鄧小平在談話中對劉建勳表示：「建勳啊，你命苦，57年廣西出了問題，餓死人，要你去。現在河南餓死人，又得你去！」劉立強：〈「信陽事件」後劉建勳在河南〉，《炎黃春秋》，2009年第9期，頁64。

[1-154]鄭仲兵、盛平：《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香港：時代國際，2005），頁197。

[1-155]此一運動乃是1963年初中共中央為防止中國大陸城鄉地區冒出「修正主義」而發動

的。其內容從原本的「清理賬目、清理倉庫、清理財務、清理工分」，後來擴大為「清政治、清經濟、清組織、清思想」。

[1-156]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頁75-89。另外，感謝高華教授就此問題與作者所作的交談與提供的意見。

[1-157]周林：〈貴州「四清運動」的幾個問題〉，政協貴陽市委員會網站：<http://www.gyszx.gov.cn/wenshi/showDetail.asp?id=1795>（2010年8月登入）

[1-158]張黎群、張定、嚴如平、唐非、李公天主編，唐非撰：《胡耀邦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第1卷，頁388-389。

[1-159]寧夏無產階級革命派總指揮部關於「反地方民族主義」專案調查團，〈妖為鬼蜮必成災——撕開劉、鄧黑司令部迫害劉格平等同志的黑幕〉，首都紅代會中央民族學院東方紅公社《民院東方紅》編輯部：《民院東方紅》，第32、33期（1967年10月20日），版3-6。

[1-160]范明著，郝瑞整理：《西藏內部之爭》（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頁371-375。

[1-161]陰法唐：〈鄧小平同志與西藏和平解放〉，載楊國宇、陳斐琴、陳鶴橋、劉備耕編：《二十八年間三編——從師政委到總書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頁38-39。

[1-162]〈西藏叛亂與鄧小平〉，全國赴石五湖四海戰鬥兵團：《捉鱉》，第10期（1967年9月19日），版2。

[1-163]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頁276-277。

[1-164]一名英國外交官在1956年底記錄其所觀察到的鄧小平：「他是一位個子小、精神飽滿、圓頭，並看起來十足強悍的人。」"Leading Personalities in China (1956),"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F O371/120875, p. 88.美國的中央情報局在1964年則對鄧小平有如後的描述：「鄧小平身材矮小、脖子粗短，他在休息的時候像彼得·洛（Peter Lorre）。他精力旺盛、敢作敢為。」洛氏乃為一美國電影演員，通常扮演邪惡的角色。〈中情局關於中國領導層與接班問題的分析報告〉，1964年3月20日，載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2卷，頁89。

[1-16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永遠的小平：卓琳等人訪談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頁31。

[1-166]《百年小平》，頁231-232。

[1-16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23。

第二章 具體部署全黨整風、督導實行「反右派」（1957）

1956年可說是國際社會主義陣營與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多事之秋。是年初，蘇共召開「二十大」，該黨領導人赫魯雪夫在會中對前領袖史達林進行政治清算。^[2-1]消息傳出後，舉世震驚，包括中共在內的共黨國家更因之動盪，波蘭與匈牙利甚至出現反共、反蘇浪潮。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一向為其他國家共黨視為學習與模仿對象。史達林是毛澤東口中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領袖」，赫魯雪夫卻證實了被資本主義國家批評的史達林的陰暗面，更揭穿了蘇聯經驗與模式是無瑕典範的神話，暴露其存在的嚴重弊端與缺陷。

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大國與大黨的中共，追隨蘇聯之後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正式宣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但是在進入社會主義階段以後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如何避免蘇聯在其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走過的彎路」，^[2-2]是毛澤東領頭的中共中央費力思索的首要政治課題。中共在政治上優先關注的是：在史達林個人專制下的蘇聯黨國，不但無視社會主義國家中仍存有矛盾、須得妥善處理的事實，更諱疾忌醫，一味地以高壓的手段回應社會的要求與問題，導致其「不下於歷史上任何最殘暴的統治」。毛澤東擔憂如此下去，社會主義制度將無法「千秋萬世」。^[2-3]歷經1956年秋中共「八大」召開前後的思考與探索，毛澤東在政治領域上提出：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以調動國人的積極性並團結內外的力量，「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作為「團結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核心力量」的中共，自身相應要勵精圖治，透過整風運動以具備更好的執政條件與能力。

整風運動乃是毛澤東基於對農民群眾運動的經驗與思考，以及他在1940年代延安時期的政治實踐，所獨創出的一套加強政治領導、提高思想共識的方法。

整風運動的意涵就是：在黨的組織框架和政治謀略下，首先學習指定的文件，再透過「群眾路線」——鼓勵、教唆群眾採取批評（對他人錯誤不能「麻木不仁」，而要勇於「揭人陰私」）與自我批評（對自身錯誤不能「熟視無睹」，而要敢於「自曝其短」）的方式，激發與累積一定的揭發內容後，運動領導者在參加者之中進行適度劃分與適時拉打，調動群眾對黨事業的積極性，也就是使之心生同仇敵愾、休戚與共之感，進而共同

促成實現清除黨內不正之風與不良之徒的目標。[2-4]

毛澤東在1957年發起的整風運動，是以反對與革除黨內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目的。他在得不到多數幹部和黨員的理解與迴響下，在1957年春決定引進外部的力量與聲音以推動整黨的目標，亦即所謂的「開門整風」。然而，非共人士對中共所提出的批評內容與強度，卻超乎毛的預期與忍受範圍，他翻臉不認人，更蓄意設陷、誘人自投羅網。是年孟夏，毛政治攤牌，在保持運動原有的性質與任務外，另外加入了「反右派」的議程，甚至欲以此政治插曲推動、升溫整風本身的發展。7月中旬的青島會議與9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接連掀起運動的高峰，在此過程中，整風也出現了從上層組織到下層組織、從政學菁英到普羅大眾、從中原地區到邊疆地區的漸進拓展。整風運動的重要影響是：黨在國家各級政治生活中的獨尊地位益加強化，黨對民間社會的宰制也愈形固化，如此使得中共在之後得以更能恣意妄為地施展其改造與建設中國的狂想。

本章嘗試了解：甫於中共「八大」獲任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對隔年的整風運動到底採取什麼態度與立場？他在運動的各階段採取哪些作為？他與運動的惡性發展，特別是濫打右派，有何關係？本章的主要論點為：鄧小平無論在整風或是對右派進行回擊的運動各個階段，咸認為毛澤東洞燭機先並遵從其判斷。鄧不但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中高度參與和符合毛澤東的運動決策，更領導中央書記處對之進行具體部署和執行，[2-5]可謂「主事在毛、成事在鄧」。鄧小平強勢的個性與對運動投入之激情，是中央各部門與地方的運動發展的關鍵力量。

下文首先檢視鄧小平在整風醞釀和展開期間的態度與活動，接著依序討論鄧小平對之後整風各階段的參與情形，包括：具高度爭議性的「引蛇出洞」，「反右派」發動初期，7月青島會議後將運動進一步地帶向黨內與基層農村、工廠，9月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後對運動的再行擴大，對「打入另冊」的右派的劃定與處理。最後小節將對鄧小平在運動中的角色與作用進行一扼要的綜述。

第一節 對整風的準備、宣講與執行

在整風醞釀期間

1956年中共宣稱進入了社會主義階段，但是發現社會上出現不少工人罷工、農民退出合作社、學生罷課等事件。毛澤東認為新社會中仍有所謂非對抗性的「人民內部矛盾」，如果各級幹部處理不慎、失之簡單粗暴，就有轉化成對抗性矛盾的可能，他提出或肯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等方針，更在1957年2月27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與3月12日的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為整風的預備發起與動員發表講話。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所作的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中指出，關於正確解決社會主義時期的「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無須他求，因為中共自身在延安時期的經驗已提供重要的借鏡以及行之有效的辦法：中共在1942年起在黨內開展為時三年的整風運動，旨在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該次整風運動不同於先前黨內鬥爭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而採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與「團結——批評——團結」（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分清是非，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得到團結）的新方法，其成果是「達到了全黨團結的目的」，更因此「取得了人民革命的偉大勝利」。此一方法當時也推廣到黨外，用之於處理領導黨群關係、軍民關係、官兵關係、軍中關係、幹部之間關係，並「得到了偉大的成功」。毛在演說中進而表示：「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整個人民內部繼續推廣和更好地運用這個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廠、合作社、商店、學校、機關、團體，總之，6億人口，都採用這個方法去解決他們內部的矛盾。」^[2-6]

毛澤東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指出：「整風就是整頓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黨內在今年開始整風」。這一次整風運動要批評的錯誤思想、工作作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雖與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稍有不同，但方法如一：

這次整風的方法同抗日時期的整風一樣，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個人在學習文件的基礎上檢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方面，發揚優點和正確的方面。在整風中間，一方面要嚴肅認真，對於錯誤和缺點，一定要進行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一定要糾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風細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反對採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辦法。^[2-7]

毛並以延安整風為例證堅稱：在此次整風中，「我們一定可以更多地學到一些馬克思主義」，「黨的威信」也會增加；整風「把我們身上的錯誤東西整掉」，以擔負起「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後、文化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的「艱鉅的任務」。^[2-8]

如果說延安整風運動如毛澤東自己所言，「實際上也是批判史達林和第三國際在指導中國革命問題上的錯誤」，^[2-9]讓中共得以更自主地依照中國的國情領導革命、取得政權；1957年毛在北京發起的整風運動，事實上也是中共開始思考揚棄蘇聯在執政建設問題上的正反經驗，並以回歸自我的歷史實踐的方式，更主動地根據中國的情況領導、規劃中國的社會主義

建設（至少在政治、思想領域）。然而，以毛為首的中共領導人更自覺地意識到此點，並提出更完整的有別蘇聯模式的整套發展對案，則要等到1958年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發起「大躍進」運動的時候了。

毛澤東在1957年春號召全黨整風，各級幹部間出於對把持權力的依戀，或是有感延安整風中不愉快經驗的夢魘，多表現出不理解又不情願，中共領導層內部對於整風的問題根源與側重面、推行的具體方式，也有所歧異。然而，對於毛澤東的整風倡議，鄧小平則亦步亦趨、從旁輔弼，予其實質的支持。^[2-10]

首先，針對各地學校因內、外情勢變化而出現躁動不安的情況，以及由此顯示中共相關政治思想工作未能跟上的缺點，鄧小平在1月12日到清華大學為上萬名師生作形勢報告。

鄧小平的報告甚為冗長，主要包括五個問題：中共當時對以「匈牙利事件」為主的國際情勢的判斷與立場、對中共所行制度和政策的辯護、對民主和專制問題的看法、對蘇聯應有的態度，以及艱苦奮鬥的要求。^[2-11]其中值得指出的是，鄧小平當時對「雙百方針」的看法。鄧肯定此口號的提出，並認為「對科學、藝術的發展起了很好的作用」。鄧進而表示：此口號是在「思想改造取得相當成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亦即「馬列主義思想取得了領導權、馬列主義的旗幟樹立起來了、唯物主義的旗幟樹立起來了」。以此為前提下的「百家爭鳴」，「放出來就有好處」，既能讓自身思想不流於僵化，也可經由競爭轉化主張唯心主義的人，「使真理越爭越明」。^[2-12]鄧小平相信中共此前在思想領域裏是經營有成，也佔有主導地位的。

對於鄧小平的長篇大論，現場聆聽者的反應為何，或有爭論。^[2-13]但毛澤東對此表示滿意。他在不久之後召開的中共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就表示：「工、農、商、學、兵、政、黨，都要加強76文革前的鄧小平政治思想工作，現在我們的總書記鄧小平同志，親自出馬到清華大學作報告，也請你們都出馬。中央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領導同志，都要親自出馬做政治思想工作。」^[2-14]毛澤東期望在鄧小平「一馬當先」、以身作則之下，中央和地方的黨委領導有樣學樣地儘快向所轄部門或地域開展政治思想工作，除澄清思想，安定情緒，也表明中共黨人願意與民溝通、向民解釋的誠意。鄧小平的清華演講內容，後來也傳達到黨外。^[2-15]

其次，為展示並落實中共中央欲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心志，鄧小平從2月中旬起領導中央書記處數次開會研究相關問題，並擬定具體指示和規令。到了3月7日，鄧小平主持完成了〈關於處理罷工、罷課、請願問題的指示〉、〈關於在企業中加強群眾監督的指示〉、〈關於研究工人階級問題的通知〉三個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並在報送毛澤東審閱後發出。^[2-16]

再次，對於中共中央剛確認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政治方針，鄧小平與其他中央常委各自到外地進行宣揚與推廣。毛澤東巡視華東，劉少奇下行中南，鄧小平則在3月下旬、4月上旬橫走華北，駐足山西、陝西、甘肅，賣力地推銷中央的新方針。

鄧小平在跨省之旅期間，相關講話的要點如下：

一、中共領導國家要能長治久安，就得不斷自省。3月30日，鄧小平在面對太原廠礦企業和省、市級機關幹部時就表示：「黨的領導好壞，關鍵在於我們能否依靠群眾，能否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從思想上經常洗臉、掃地。」「面對群眾，發現問題，依靠群眾，解決問題，要天天看到人民群眾，不要天天看領導，我們全黨如果都是這樣，我們黨就不會滅亡。」^[2-17]

二、針對當時層出不窮的群眾鬧事問題，幹部要區別對待，也能將之杜絕。鄧小平在前述的同一場合指出：要正確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絕不能用階級鬥爭的辦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只要堅持群眾路線和經常的政治思想工作，群眾鬧事的現象是可以避免的。^[2-18]

三、為避免「脫離群眾，犯大錯誤」，中共必須接受監督。鄧小平在陝西西安幹部會上強調：共產黨要接受來自黨內、來自群眾、來自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這三方面的監督。

有了這幾方面的監督，我們就會謹慎一些，我們的消息就會靈通一些，我們的腦子就不會僵死起來，看問題就會少一些片面性。共產黨員謹小慎微不好，膽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黨，二怕群眾，三怕民主黨派，總是好一些。謹慎總是好一些。^[2-19]

四、宣揚「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就鄧小平所做的觀察：「黨內不少人思想不通，不了解它的好處」。鄧在西安對此方針加以說明與解釋，冀以打通持抗拒態度的黨人的思想：

如果我們不注意，不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想要僵死起來，馬克思主義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種意見表達出來，進行爭辯，才能真正發展馬克思主義，發展辨證唯物主義。這一點，斯大林犯過錯誤，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單純了。在蘇聯，馬克思主義在一個時期衰退了。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也是這樣，有監督比沒有監督好，一部分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產黨總是從一個角度看問題，民主黨派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出主意。這樣，反映的問題更多，處理問題會更全面，對下決心會更有利，制定方針政策會比較恰當，即使發現了問題也比較容易糾正。所以，對這十六字方針應當想通。^[2-20]

鄧小平在西安所作的相關談話，因內容顯得其政治開明，在1980年代還被選入《鄧小平文選》。

另外，毛澤東在4月10日對《人民日報》及其總編輯鄧拓的工作成績大

表不滿，以「死人辦報」為喻，對之嚴厲批評。其導火線乃因該報對毛澤東在2月底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宣傳不力，在政治上沒有起到呼應、造勢的作用。^[2-21]鄧小平對毛的批評意見不敢輕忽，在4月16、17日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人民日報》的改進問題。鄧在17日會上表示：「毛主席講，辦報的人一天到頭鑽到紙堆裏，不脫出來看看大問題，辦不好報。因此，辦報要經常打聽氣候，在大的方面不走樣。大的不走樣，小的錯誤不要求不犯。要求在大的方面不犯錯誤，首先是思想清楚，第二是方法對頭。」^[2-22]

亦有資料披露鄧小平當時對《人民日報》的指導內容，其具體日期與場合雖不明，然從內容判斷，也應是在此前後。鄧小平指出：

《人民日報》8年來的工作中，成績是基本的；但是有缺點、有錯誤。我們對整個國家工作做這樣的估計，對《人民日報》的工作也是做這樣的估計。《人民日報》工作中的主要缺點是對一些重大的政治事件、新的形勢變化的反應不敏銳。編排方面也有缺點，不生動不活潑。不過這些都是次要的缺點。對重大的政治事件的反應不敏銳，使我們的報紙常常落在形勢的後面，而受到中央的責備。當然，要辦報就不要怕犯錯誤，不要怕受批評，而應該接受批評，即時改進我們的工作。^[2-23]

鄧小平對《人民日報》改進工作的緊抓，可促使此一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在後來的整風運動中能確實扮演黨中央喉舌的角色。鄧小平在整風開始後，一方面密集審閱、批改《人民日報》社論稿，讓該報密切地配合中共中央在運動不同階段的需要；另一方面，鄧也會召集該報的負責人開會，持續研究加強報社工作的問題。^[2-24]

整風初期

經過此前數月的醞釀與準備，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正式發起整風運動。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並在隔日的《人民日報》上全文刊載，公告中共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2-25]在相關決策與正式文件出爐的過程中，鄧小平皆有參與。^[2-26]

著眼於黨內對整風倡議的不甚積極、消極對待，毛澤東決定引進黨外的聲音以推動黨內的整風。1957年4月30日，第十二次最高國務會議召開，討論有關開展整風運動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表示歡迎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並指定：「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的問題徵求意見。」^[2-27]

此後，中共中央統戰部從5月8日至6月3日，分別召開13次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座談會和25次工商界人士的座談會，徵求對共黨整風的意

見。總共180多人講話，對中共提出批評和意見。在此一過程中，由毛澤東欽點過問此事的鄧小平既會親自出面與談，^[2-28]也循由黨的機制與程序，知曉並指導統戰部有關工作的推動，例如：統戰部不時向中央書記處上呈報告並請求指示；部長李維漢亦會「即時向中央常委稟報」。^[2-29]

整風以來各方「鳴放」出來的意見，主要是針對中共弊病的指陳與揭露，相關問題也的確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關切和憂心。5月14日，毛澤東批轉上海《解放日報》5月10日刊登的中、小學教師座談會的發言摘要給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彭真，並批示：「這一版值得仔細一看，不整風黨就會毀了。」「請你們注意看上海解放日報，南京新華日報、上海文匯報、北京日報、光明日報，集中刊人民內部矛盾和我黨整風消息，這是天下第一大事。」^[2-30]負責處理黨的日常工作的鄧小平，對於黨的工作缺點、失誤的體認，必也不下於毛澤東。因為值此前後，鄧小平正在處理1956年發生農民逃荒和死亡的「廣西事件」。

「廣西事件」乃指：1956年1月至7月，廣西省平樂專區和橫縣等地，因1955年減產報增產、層層加大糧食徵購任務，以及地、縣委壓制幹部和群眾反映災情，造成餓死近1,500人、逃荒約12,000人、患浮腫病者有15,000人的慘案。^[2-31]1957年1月27日上午，鄧小平曾召集中共廣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李維漢等開會，討論相關問題。^[2-32]整風運動開始後，相關事件正可作為彰顯發起整風運動的正當性的典型大案，其之處理更加有了現實的政治意義。

5月1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廣西省委關於「廣西事件」的情況匯報。20日，鄧小平再次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並處理此事。^[2-33]由於該事件反映出中共黨國幹部脫離群眾的嚴重性，鄧小平既震驚又生氣。他在會上表示：

這次事件是在國家有錢有糧的情況下發生的。而且事件發生後，省委對有關失職人員一直拖著不處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僅缺乏群眾觀念，連「人民」兩個字的觀念也沒有了。根源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造成了嚴重的後果。……問題的性質是嚴重的，主要責任在省委。中央決定要嚴肅處理，早處理早主動。這樣，才能使群眾心服。……你們回去要召開縣委書記會議，好好總結經驗教訓，使廣西的工作作風來個根本改變。書記一人包辦的作用是很壞的。「人民」二字在心中有沒有位置？沒有受處分的同志也要進行自我批評。省委自己要作出一個決議來教育全黨，這是開國以來第一次處理的一件大事，應引以為戒。^[2-34]

6月18日，《人民日報》公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廣西省、平樂地區失職黨政幹部的處分決定。^[2-35]廣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因此事而遭到撤職。

當整風「鳴放」揭露出中共此前工作上存在諸多的弊端，讓中共領導人進一步認識到發動整風的必要性的同時，對情勢觀察入微的毛澤東，也

警惕地注意到另一股雖較小但卻對中共領導地位直接提出質疑與挑戰的輿論，正在逐步蔓延與擴大。

根據《人民日報》5月8日至14日的報導，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交通部部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指出：在非黨人士擔任領導的地方，實際上是中共黨組決定一切，這是形成非黨人士有職無權的根本原因。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陳銘樞針對學校黨委制表示：學校中的工作應更多地依靠教師和學生。國務院糧食部部長、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提出：現有一部分中共黨員，黨內一個是非，黨外一個是非，把「黨黨相護」當作黨性。章乃器更指出他在糧食部內有職有權，是經過鬥爭得來的。^[2-36]

國務院森林工業部部長、民盟中央副主席羅隆基認為：民主黨派不能在工農群眾中發展，主要在舊知識分子中發展，影響到民主黨派能否長期存在的問題。羅隆基也批評：現在各民主黨派雖參加政權，但是過去很多重大的政策問題，往往都是在中共黨內討論以後才拿出來協商，希望今後這些問題在中共黨內討論的同時，也交民主黨派討論，並由有關方面事前提供情況和資料。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委員李伯球著重提出有些共黨黨員的特權思想問題。^[2-37]

毛澤東認為這些對中共統治頗有微辭者，必是言猶未盡，乾脆引誘其一吐積怨，既可讓之繼續道出中共治理上一些確實引人詬病之處，也能趁此測試其背離中共的程度。此外，也必定還有不少的異議者仍在觀望、保持緘默，促其發聲，可以進而發覺他們的蹤跡。

第二節 助毛暗施「引蛇出洞」

毛澤東在全黨整風的過程中確定「反右」方針的時間，長久以來普遍的看法是在5月中旬，理由是因為毛澤東在當時寫下〈事情正在起變化〉文稿，發給黨內高級幹部閱讀，其中指出：「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我們越有益」。^[2-38]毛澤東雖是在5月中旬開始撰寫〈事情正在起變化〉，但是他在6月11日才將之完稿。因此，該文並不能真正反映毛在5月中旬的想法。^[2-39]

然而，另有其他證據顯示，中共中央確實是在5月中旬開始改變對整風運動原有的設想，並摻入居心不良的整人動機。5月14日，鄧小平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其中指出：最近各地黨外人士正在開展對於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這是很好的現象，這不但會大大幫助我黨的整風，消除黨同黨外人士的隔閡，而且可以

在群眾中暴露右派分子的面貌。我們各地的報紙應該繼續充分報導黨外人士的言論，特別是對於右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論，必須原樣地、不加粉飾地報導出來，使群眾明瞭他們的面目。這對於教育群眾、教育中間分子，有很大的好處。^[2-40]

5月16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其表示：近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的方向上去。要放手讓他們發表，並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2-41]至此，中共「引蛇出洞」的運動方針，幾已確立。

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提出「反右」方針的過程中，鄧小平一直保持著高度的參與。首先，在5月中旬中共最高領導層頻繁召開的小範圍人士的會議中，鄧小平皆與會參加討論。^[2-42]經由密切的意見交換，無論是出自本身對問題的認識或是組織上紀律的要求，鄧小平與毛澤東、黨中央能保持著對運動想法的一致。

其次，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為呼應中央政治局與常委會新確立的運動方針，尤其是在新聞輿論上的「讓敵暴露」和「按兵不動」，即著手進行配合與佈置：

第一，鄧小平明白劃出「大鳴大放」的範圍，以免局勢失控。針對前述的由鄧小平親寫的5月14日發出的〈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鄧在5月16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進一步地加以闡釋：

報紙把壞話刪掉，實際上是幫助他們，現在應讓他們放完，應在新的基礎上團結中派。一是黨改變作風，一是右派教育他們。現在報紙上為右派粉飾。對各種言論不要駁，到一定時機黨內也打打招呼。有三個東西不能登：對物價有影響的，涉及外交政策，涉及肅反的。現在不放不利，右派還沒有出頭。^[2-43]

從鄧小平簡短的語言中，既可以看到中共竭力要讓右派暴露的意圖，也可注意到執行運動的鄧小平，謹慎防止若干敏感領域與議題的不當發酵。鄧強調不能登載的「三個東西」，影響的層面都相當廣泛。物價波動會影響民眾生活，進而引發人心浮動。所謂「涉及外交政策」，實質指的是對中蘇關係，尤其是對「一邊倒」國策之議論；由於蘇聯對中共所提的「雙百方針」本有保留，報刊若再公然出現批蘇文字，勢將引發雙邊的外交糾紛。至於「肅反」，因為該運動牽涉不少的人數，若經炒作恐釀成翻案的風潮。由此可見，鄧小平雖努力煽起哄鬧、熱烈的運動情勢，但也注意維持總體局面的基本穩定。事實上，中共如此也才能專心地因應右派捲起的「茶壺裏的風暴」，並且如其所意地操作運動的走向。

第二、除了規定報章在報導「大鳴大放」時，要繞開有關物價、外交與「肅反」三個「禁區」外，鄧小平也主動介入主要官方媒體的宣傳口徑，從中鼓吹「大鳴大放」，同時也引導運動方向，這方面主要表現在他對《人民日報》頭版社論所作的經常審閱工作上。

鄧小平於5月18日審改《人民日報》社論稿〈繼續爭鳴，結合整風〉。鄧在審閱該稿的過程中，加寫了對已鳴放出來的意見大加肯定並要求領導幹部從善如流加以研究、改進的字句。^[2-44]這篇經鄧同意後即在隔日登出的社論，旨在呼籲「讓各個方面人們的各種不同的意見都講出來，大家推心置腹，暢所欲言」，從而「真正地實現了『百家爭鳴』，同時幫助了我們黨的整風運動」。^[2-45]然而，在中共中央當時已作「引蛇出洞」盤算的背景下，該社論拳拳盛意的言詞背後，很難不令人聯想其是否懷有引人上鉤的企圖。其後到5月底，由鄧小平把關、批可的與運動有關的《人民日報》社論還有：〈怎樣保證整風和工作兩不誤〉（鄧5月24日審改，5月27日刊登）、^[2-46]〈能解決的問題要馬上解決〉（鄧5月30日審改，5月31日刊登）。^[2-47]鄧小平除了負責審批、認可報紙社論，他對黨內個別政治人物如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鼓動「鳴放」的言論，在斟酌情勢後，也有權力決定其刊出的方式。^[2-48]

在努力暴露右派的同時，鄧小平也開始為開展「反右」鬥爭積極進行準備。5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加強對當前運動的領導的指示〉，要求各省市黨委，「必須積極指導宣傳部門和黨報立即著手分類研究右翼的反動言論和其他資產階級論點，準備在適當時機（中央屆時另作通知）發表一批論文和社論，予以反駁和批判」。^[2-49]鄧小平及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自然不得閒。

薄一波的回憶錄透露：1957年的5月21日和25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研究報紙宣傳報導和組織文章爭鳴問題，擬定一批題目和指定作者，並確定各文的審稿人和交稿日期。^[2-50]這兩次中央書記處會議都是鄧小平親自主持的。鄧在5月21日下午的會上表示：「報紙對各種問題發言要及時，不一定是長篇文章，各種各樣的形式都可以。要辦好報紙，必須及時了解各階層動態，並把這些動態反映到報紙上。」^[2-51]他進而指示：「正面的，應該篇幅佔大些。至少在一兩週內，主要是刊登中間分子講公道話、駁右派的言論。左派的言論也可登一點講道理的、有說服力的。」鄧小平在要求讓「同情分子」多在報上「露臉」為中共講話的同時，也指示要佈置「文字打手」在場邊待命。鄧表示：「要組織力量搞幾十篇東西，由《人民日報》放出去。現在分門別類作準備，累積材料，有的寫長文，有的寫短文。」^[2-52]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將這些指定組織撰寫的文章，譬喻為一批「火箭炮」，^[2-53]適足反映其欲對右派加以痛擊的心理。為了

更進一步地落實這方面的工作，5月25日上午，鄧小平召集各大報紙負責人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如何寫文章回答黨外人士的批評問題。^[2-54]

鄧小平在運動處於「引蛇出洞」階段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活躍身影，亦可從以下幾方面觀察：

第一，5月23日下午，鄧小平在劉少奇主持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最近整風「鳴放」情況和「反右派」工作部署的報告。^[2-55]

根據鄧小平的官方年譜所公佈的極有限的訊息，鄧小平在報告中表示：整風運動的目的，首先是要克服黨內三大主義，糾正脫離群眾的現象；其次是要團結黨外人士的大多數，孤立右派。有關這點，鄧特別解釋「這是隨著運動的發展增加的新的內容」；再其次是加強黨的領導，加強人民民主專政和社會主義建設。

對於運動現勢的估計，鄧小平講話的要點為：目前開展的黨外人士批評運動，凡是放得開的地方，已經產生了好的效果：暴露了黨和政府工作中大量的毛病、三大主義；在爭取和團結中間分子方面，也收到了好的效果；暴露了右派分子。鄧小平進而強調：右派的典型言論必須登報，登出來就會教育共產黨，就會教育中間分子，也會教育左派。^[2-56]亦即中共操作媒體刻意大幅報導右派的言詞與行徑，既可讓右派無所遁形，也能使「自己人」和「友我」人士在此過程中識別異己模樣、辨清政治方向。

根據其他資料所披露的片段紀錄，鄧小平在報告中也透露自整風以來當中共面臨嚴重抨擊時，其個人的心理變化：

現在的問題是：這個運動可不可怕？現在我們確實有些擔心，比如我們黨校有相當的高級幹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們在那裏很擔心。這個擔心是有理由的。你說共產黨看到那個罵娘的事情心裏不著急呀，我看也難設想，我就有點著急。開始幾天，人心裏面有點急。後來看到那個反動的東西愈多，心裏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擔心是不是會出亂子。總的估計是出不了亂子。^[2-57]

鄧小平之所以從原先的擔心、著急到後來的安心、舒服，就是因為其自認找到了問題的核心、鬧事的兇手——就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右派在趁機搗亂、發難。

既然「病源」已被診斷確定，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對症下藥」、「藥到病除」，故能感到寬心。

鄧小平報告結束後，劉少奇表示：「小平同志的報告很好，這是在主席那裏中央常委確定的，要根據這樣的方針、步驟來領導當前的運動。」^[2-58]由此可見，在運動重心逐步轉向「反右」之時，運動是毛澤東為首的常委會（鄧小平亦是其中一員）決定方針後，由鄧小平負責運動的具體部署與執行方案。之後的發展也顯示，這種工作格局貫穿了整個整

風、「反右」過程。

第二，5月28日，中共中央召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作關於整風問題的報告。

鄧小平在報告中首先向集於一堂的地方大員說明中央當時對情勢的研判，其中最重要的情況是右派的圖謀不軌、蓄意奪權。鄧表示：整風運動開始的目的是搞黨內的三大主義，因為問題很嚴重，最初用的是內外夾攻的辦法。運動開展以後，絕大多數的意見是正確的、有益的，90%對我們有幫助。^[2-59]

但很顯然有部分右派跟我們爭領導權。這個鬥爭不只是在思想領域，已經擴及政治範圍。有人提出綱領很謹慎的，不是打倒共產黨，而是要我們退出陣地。各地都看得出，以上海、北京為典型。因此中央不能不做鬥爭，他們已經〔這樣〕做了。^[2-60]

在右派已有所動作、中央「不能不作鬥爭」的情況下，鄧小平強調：「黨內外歸結起來一個目的，加強黨的領導。」亦即以鞏固中共的統治地位作為號召，動員來自各地的領導幹部，使之同仇敵愾。鄧小平後來更進一步地介紹右派活動的跡象：現在「右派大體出來了」，如章伯鈞、章乃器、龍雲等等。右派活動現在有兩個傾向，一是「向基層發展」，二是「暗地組織活動的跡象明顯了」。^[2-61]如此易令在座者產生敵情不可小覷的印象。

對於運動的方法，鄧小平指出：

關鍵是能不能團結中間派。右派在爭取中間勢力，左派、我們也在爭取中間勢力。我們爭取中間勢力有兩條：一是改正自己的錯誤，二是孤立右派。用右派教育中間派，使中間派知道需要同右派劃清界線。^[2-62]

關於今後的方針，鄧小平表示：還可以繼續鳴放，主要在機關、大專院校，讓右派進一步暴露出來。黨團隊伍也要考慮整頓，但工廠、中小學不要觸動，關鍵是不能「出大亂子」。易言之，鄧小平在鼓勵黨人儘可能地誘出所謂「毒花」、「毒草」的同時，也界定了運動的範圍，因為過早讓工人、中小學的師生投入運動，可能會模糊焦點且衍生不必要的混亂。

最後，鄧小平談到「中央有個設想」，即「運動的下一步我們要建議黨外整風」，「黨內外幾百萬知識分子的改造不能放鬆」，還是採取說理的方法。^[2-63]這預告了整風運動的對象將從現在針對中共本身，逐步向黨外移轉。而在「鳴放」過程中，知識分子的表現顯然讓中共失望，所以不但「改造不能放鬆」，在運動即將發生質的變化以後，他們更是首當其衝。

據陳伯達的回憶，鄧小平在會議上還使用頗具刺激性的語言，對運動

後續的發展產生負面的影響。陳表示：

他〔鄧小平〕在那次會上對各地的領導人說：「現在時間比金子還寶貴，你們要趕快回去收集右派們的言論，否則時間晚了，就收集不到了。」我當時很驚訝，怎麼會「時間比金子還寶貴」呢？人總是會說錯話的，這樣抓緊時間去專門收集言論，牽涉的人就多了。所以，反右後來搞得那樣擴大化，鄧小平同志是有很大責任的。〔2-64〕

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在執行「引蛇出洞」策略時，考量到黨在運動中的整體利益，也是有所選擇的。例如：5月中旬，「新民主主義青年團」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此次會議決定將團名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亦即「共青團」）。會議期間，有一些與會者提出：會議的開法也應採行「鳴放」的方式。鄧小平寫信表示反對，認為此舉在國內、國外都會遭到有心人士的利用。

5月31日，鄧小平在接見團省、市委書記時，曾對此加以說明：「要在大會當中鳴放，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呢？肯定的說是錯誤的。你們的大會主席團沒有接受過這個意見，我看是對的。」鄧更強調：對內，「如果你們在大會鳴放，《中國青年報》〔按：此為團的機關報〕整篇整篇的登，那麼有的報紙是最高興登你們的消息的」。亦即「資敵」，提供那些被所謂右派把持的報刊抨擊中共的材料。對外，「法新社、美聯社登這些文章，這樣做對你們共青團並不光彩」。〔2-65〕也就是預防西方媒體藉機作文章。

鄧小平在同一場合的其他講話內容，可以看到更多斯時他對運動情況的回應，而且值得一說的是，鄧小平此次講話雖同樣有上令下達的含義，但由於談話對象是年紀較輕的團的幹部，言論中更能流露鄧個人的色彩。

對於充斥版面、成篇累牘的批共言論，鄧小平反駁：「現在黨外有些人攻擊我們，罵我們是『特殊階級』。新階級是沒有的，生產資料並沒有歸我們私有。」〔2-66〕鄧指出運動的確暴露出中共自身的問題，「告訴我們值不得驕傲」、「腦筋不能發脹」；但仍自信地強調「我們的黨」「總的路線、總的政策基本上是符合群眾利益的」，「現在要群眾趕共產黨下台他是不幹的」。正自認為民心所向，對於此時由中共刻意誘發而成的「敵狂我狷」態勢，鄧小平自然是老神在在以對：「不要看到報紙搞得那麼凶，但是最後還是無產階級勝利，還是無產階級凶。」〔2-67〕

對於此時在北京的大學校園內舌戰中共人員、獨領風騷無敵手的人民大學學生林希翎，鄧小平也有一番反向思考的獨特評論。鄧認為基層黨組織辯駁不過林希翎，正顯出此前政治思想教育的缺點與不足：「林希翎是個好教員，她首先教育了一些人知道自己不行，本事不大，使得我們要臥薪嚐膽，刻苦自勵。」〔2-68〕

在「引蛇出洞」的後期階段，鄧小平既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黨政部門負責人關於運動鳴放情況的醞報，^[2-69]也前去東北指導運動。6月5日，鄧小平搭機前赴遼寧瀋陽。次日下午，鄧小平聽取黑龍江、吉林、遼寧領導人歐陽欽、吳德、黃歐東匯報各自省內的整風運動情況。6月7日上午，鄧小平在集合遼、黑、吉三省的省、市、地黨員幹部會議上，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2-70]

現所知的鄧小平此一講話的摘要內容，主要是關於他對整風運動任務所作的說明。鄧小平表示：首先是真正改正我們黨自己的錯誤。執政黨要經常警惕脫離群眾的危險，任何時候都必須把改正錯誤放在第一位。改正錯誤的目的，是加強和鞏固黨在各方面的領導，提高黨的威信。其次是爭取大多數，關鍵是爭取中間分子。我們要以是否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劃分左、中、右。要善於團結中間分子，不要傷害中間分子。第三是孤立右派。右派不僅僅有資產階級思想，而且有政治目的，對共產黨、對人民民主專政是仇視的。第四是鍛鍊戰鬥力。^[2-71]

若對此報告摘要再進一步地加以分析，可以注意到的是，鄧小平此時向「黑山白水」的省地級黨員幹部提出「以我劃線」，亦即以是否擁護共黨領導為標準，開始在運動中進行政治排隊；也跟他們說明右派的為惡之處並提出「孤立右派」的任務。其內容實與毛澤東在前一日，亦即6月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並註明為「絕密，不要翻印下達」的〈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多有雷同。

該〈指示〉指出：省地一級機關「用大鳴大放方法的整風，請即加緊進行」，以「揭露官僚主義等錯誤缺點」；暴露有反動、錯誤思想者的面貌；鍛鍊黨團員及中間派分子。「必須注意爭取中間派，團結左派，以便時機一成熟，即動員他們反擊右派和反動分子」。另根據北京的情況，暴露出的反動分子「佔各單位人數的百分之幾」，因此「請你們注意將你們的單位人數，在運動中，按左中右標準，排一下隊，使自己心中有數」。^[2-72]可見鄧總書記在「關外」停留期間對運動所作的指示內容，乃與毛澤東在北京新發出的運動指示同步。言其為「同步轉播」，也不為過。

既然中共中央已提出分出右派並對之展開包圍、加以圍困，下一步自然是將其聚而殲之。未幾，東北三省的黨幹與全國其他地區的同黨同志，就聽到北京黨中央射向右派的第一聲槍響。

第三節 「反右派」打響後督促各省與中央部門的運動發展

6月8日，中共正式發動「反右派」鬥爭。《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社論〈這是為什麼？〉。其中指出：少數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產黨和工人階級的領導權挑戰，他們企圖乘機把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打翻。^[2-73]中共中央發出也由毛起草的〈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要求各省市級機關、高等學校和各級黨報都要積極準備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2-74]大規模的「反右派」鬥爭自此開始在全國範圍展開。

毛澤東吹起「反右」號角聲響後，^[2-75]原在東北視察和演講的鄧小平也火速回到北京，參加中共高層會議。^[2-76]6月9日起，鄧小平佈置的所謂「火箭炮」，接連打響：《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表明官方立場並對先前異議之聲一一展開回擊。這些社論的發出讓中共重新佔領發言的制高點。

6月中旬，鄧小平主要到地方指導整風、「反右」工作。10日至16日，他馬不停蹄地到西安、成都、濟南、上海、南京等地聽取西北、西南、華東各省市領導人關於「大鳴大放」情況的匯報，也先後出席陝西、四川、山東等省黨員幹部會議，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精神。^[2-77]這是自上月下旬在北京舉行的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後，鄧小平對地方領導人的再次當面指導。

目前比較可知的是關於鄧小平到廣東、四川所作的指導。鄧小平6月14日在廣州向廣東省委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並指導廣東工作。^[2-78]當時廣東第三把手的趙紫陽晚年回憶說：「鄧小平到廣東來做報告，說放長線釣大魚。」^[2-79]亦即鄧小平要廣東的黨幹繼續鼓勵「鳴放」，以引出仍未曝光的更大的異己分子。

鄧小平在四川檢查運動工作時，對於自己任職西南時所創立、並為之親寫報頭的《重慶日報》嚴加批評，直言該報不像黨報的樣子，該報副主編後來就被打成右派。年底，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示意整肅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張文澄，重慶市副市長鄧墾就以其長兄對《重慶日報》所作的批評為由，寫貼大字報質問張文澄，為揭發以張為首的「右派反黨集團」奏響了序曲。^[2-80]

鄧小平自外地返京後，即讓中共中央及時掌握其所觀察到的地方運動發展情況。6月17日夜，鄧小平在毛澤東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報告東北、西北、西南、華東等地區開展「鳴放」的情況。^[2-81]有資料顯示：6月22日，鄧小平又到山東視察，在省級機關黨員幹部大會上作關於整風、「反右」運動問題的報告。^[2-82]其後，鄧小平則藉由召開電話會議與

文件往返傳送的方式，與地方省委書記保持運動相關訊息的暢通。

6月下旬，鄧小平主要在北京過問中央各單位、部門的整風、「反右派」運動，並施予個別指導。具體的例子可見中央高級黨校。該校學員對於運動持有多種意見：有的擔心「這種搞法會渙散組織，損害黨的威信」；有人則認為針對胡風問題、「肅反」、統購統銷等問題所「鳴放」出來的意見，不無道理，甚至以為「不少問題的根子在上面，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中央，整我們這號幹部不頂事」、「不能樹幹不動，光讓樹梢搖晃」。6月17日，陸定一將中央高級黨校學員對「大鳴大放」的反應資料，呈送給毛澤東。毛閱後認為，該校學員的思想動態所反映的並非小問題，其中也反映了黨內的右傾思想。^[2-83]

毛澤東對中央高級黨校表示了不滿與關切後，鄧小平即於6月19日上午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央高級黨校和衛生部的整風運動問題。^[2-84]會議認為中央高級黨校有些學員有很多錯誤思想，如不改正並統一思想，俟其歸建原單位後，恐會將錯誤的觀點一併帶回去並加以散播，故決定黨校全校學員皆留校繼續整風，所有課程都停下來，原定的大報告一律取消，採取群眾路線的辦法，開展大討論，不解決問題不能回去。^[2-85]

另外，6月28日上午，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召集的匯報會，聽取外貿部、文化部、地質部、建築工程部和共青團中央負責人匯報整風運動近況。^[2-86]

約於此後，鄧小平也特別與聞群聚知識文藝界著名文人、作家的「中國作家協會」的運動。「作協」主辦的《文藝報》，在先前政治較為寬鬆的日子裏曾刊載不少大膽、甚至是出格的言論。鄧小平要中宣部主管「作協」事務的副部長周揚，轉告《文藝報》主編張光年：「要張光年把腦殼後面的一些小辮子自己揪下來，積極投入反右鬥爭，把《文藝報》辦成文藝界反右的主要障地。」^[2-87]張光年與《文藝報》於6月24日到7月8日召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進行自我批評。張光年本人雖躲過了一劫，^[2-88]但或出於自保與對鄧「打招呼」的回報，他「拋出」該報副主編蕭乾，作為替罪羔羊。

另外，「肅反」運動的背景下，1955年「作協」內部揭出的「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2-89]因丁、陳本人的不服，一直爭休不斷。1956年，中宣部獲得鄧小平的同意後，開始對相關人士進行複查。^[2-90]但有關的調查結論仍未為丁、陳所接受。在1957年整風氣氛下，丁、陳要求重議，在「作協」內引發熱烈的討論，進而對當初主其事的周揚提出質疑與批評。6月，中宣部部長陸定一曾向鄧小平報告關於丁、陳的爭論，而鄧小平聽後起先仍是採取較開放的態度。據與陸一起出席中央書記處會議的中

宣部秘書長李之璉回憶：鄧小平「沒有表示什麼意見，只是說：意見不一致，你們去討論」。^[2-91]

然而，當陸定一與周揚決定利用「反右」，將丁、陳翻案與對領導提意見看作是向黨進攻的「歪風的代表」後，鄧小平改變不介入此案的態度。7月3日下午，周揚召集「作協」黨組領導開會，傳達鄧小平的意見：「他〔鄧〕認為現在對右派勇氣不夠，方法不夠。時間要延長，鬥爭要堅決展開。要各單位排排隊，做出計劃來。」^[2-92]周「如獲至寶」地旋即按照鄧的指示，決定在「作協」內對丁玲等人開展「反右派」鬥爭。

從上所述，一方面，可以想見，鄧小平對各單位、部門運動進展的了解，縱使不能巨細靡遺，也可達致通盤性的掌握，在當時中共領導層中，恐是無人能出其右；另一方面，由於鄧小平每以黨中央代表之姿過問各單位、部門的運動，對單位領導人而言，鄧的一言一行如同中央的旨意，不但不能有所折扣，更要想方設法地將之套用在自身所屬單位，進而創造性地「活學活用」。

7月上、中旬，鄧小平常找高、中級負責幹部開會和講話，闡釋政策、驅策動員，指揮運動前進。

7月4日上午，鄧小平在一場人數不少的黨幹會議上，作關於運動問題的報告。與會者有：在首都的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國家機關各部委、解放軍各大單位和北京市及各高等學校負責人。從參加會議的人員組成上觀之，可見會議規格之不低。

為了讓報告內容能更具體、真實地反映運動的情況，前日上午，鄧小平還特地召集中央各部委負責人開會，討論相關報告的文稿。^[2-93]可惜的是，鄧小平這場精心準備的運動報告，現在公開面世的內容，僅有「斷簡殘篇」而已。即便如此，從中仍可感受到鄧小平在會上積極號召進行「反右派」鬥爭的態度。他在講話中強調：

這次「反右」鬥爭比以往任何一次政治思想改造運動都深刻得多，是一場思想鬥爭和政治鬥爭。資產階級思想反映到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甚至反映到黨內來，應當引起重視。右派的思想言論還有市場，特別是在青年學生中市場更大。因此，「反右」鬥爭必須繼續深入。通過這個鬥爭，可以教育黨團員和人民群眾。

對於「反右派」的方法，鄧小平表示：「不應採取簡單口號的辦法，而應說理，因為這是思想意識形態的鬥爭，而在這方面取得大的收穫，就得花費一定的時間。」^[2-94]

鄧小平組織的這種由重要黨幹列席的會議，目的在於：使他們聆聽鄧代表黨中央所作的運動新指示後，再各自回到所屬部門推進運動。例如：7月4日會議的與會人士中，包括「作協」的黨組書記邵荃麟與劉白羽。當日

下午，邵、劉就在「作協」的黨組會中「傳達了小平的報告。一起商談了一下方針和步驟」。^[2-95]

經鄧小平在前一日的審閱與批准，7月8日，《人民日報》刊出社論〈鬥爭正在開始深入〉。其要點為：「鬥爭還只是開始深入。右派的陰謀還遠沒有完全揭穿」。正因如此，「有一部分處在中間狀態的人們」對於「反右派」還在「將信將疑」、「抱著觀望態度」。為了說服之，「必須使鬥爭繼續深入下去」，以「完全揭穿右派的陰謀，完全駁倒右派的謬論」。為了使鬥爭繼續深入，則需防止兩種傾向：一是「對於右派分子的溫情主義」；另一是「對鬥爭的指導採取急躁粗暴的態度，希圖用簡單的方法『速戰速決』」。^[2-96]

按著此篇社論的思路，7月8日晚，中央書記處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負責人電話會議，鄧小平在會上作關於整風「反右」問題的報告。關於前一階段的整風、「反右」運動的估計，鄧表示：「現在運動開始走向深入，已經收到很大效果。群眾起來了，中間分子逐步向我們靠攏，右派分子逐步孤立。」針對如何開展下一階段的運動的問題，鄧再彈社論〈鬥爭正在開始深入〉之論調：

現在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對右派要狠，來不得溫情主義；另一方面必須充分揭露事實，堅持說理原則，防止簡單粗暴的方法。所謂「狠」，就是要有充分的論點和事實。用簡單粗暴的方法達不到這個目的。反對溫情主義同反對粗暴是一致的，「狠」同說理的原則是一致的。^[2-97]

透過電話，鄧小平還向中共地方領導人指示：前一時期，我們集中力量對左派、中間分子做工作，現在對右派也要做工作，要向右派指明出路。^[2-98]鄧在這方面較詳細的講話紀錄為：「在『反右派』鬥爭中，要動員黨團員和中間分子投入鬥爭，尤其要注意爭取右派分子起義，起義的人對我們的運動有很大的幫助，是很重要的力量，所有作戰的單位，在運動走向深入的時候，就要注意，做好爭取起義工作。」「費孝通前不久寫的兩篇文章，轟動全國，台灣、香港都很注意，現在回過頭來，他還可以寫很好的文章。」「右派分子當中，有容易投降的，有頑固的，有『單幹戶』如龍雲，有『合作社』如『章羅聯盟』（按：章伯鈞與羅隆基），容易爭取的，當然要爭取，就是不容易爭取的，只要有用途，也要下功夫。」^[2-99]亦即，鄧小平希望在中共與右派進行的鬥爭中，能有一部力量是從右派自己的堡壘內部突破，從而對於負隅頑抗的右派造成內外夾攻的態勢。

僅隔四天，鄧小平又代表黨中央出席黨內重要會議，發表關於運動的綜合性報告。7月12日晚，鄧小平出席統戰工作會議並作題為〈關於當前整風情況和今後工作的意見〉的報告。經鄧小平指示，中共黨和國家機關各

部副部級以上幹部、在京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也受命與會聽講。^[2-100]鄧對此的用意是：「今晚主要是為出席統戰工作會議的同志做報告的。只有一句新話：運動已發展到很細緻的階段。要把在北京的同志找來，是想通過今晚的會議，使大家了解運動狀況；有些事情能一再告訴大家也是好的。」

鄧小平這個講話，是目前所能找到最完整的鄧在這一階段對運動所作的一次表述，對於理解、認識他當時對運動的看法、採取的作為有很重要的意義。

首先，鄧小平對5月中旬「引蛇出洞」以來運動的成績予以肯定的評價。鄧指出：中央抓住、抓對了找右派此一主要問題，「確實抓到了大魚」，在政治方面「已經收到顯著的成績」。並高調宣稱毛澤東所倡「雙百方針」的正確性，認為其優於蘇聯的「一家獨鳴」外，也能讓「牛鬼蛇神都現出來」，從而「教育民眾、爭取中間，暴露右派，也鍛鍊了黨」。^[2-101]

其次，對於運動接下來的要求，鄧小平強調主要是「思想方面的收穫」，「運動的實質是毛主席所說的『滅資興無』的鬥爭，就是要滅資產階級思想，興無產階級思想」。由於思想鬥爭短期內無法取勝，「打這種仗，不能急躁」。^[2-102]鑒於鬥爭不能求速決、速成的特性，鄧指示：「對右派打得要狠，不能溫情主義」，「狠就是用充分論點和事實根據駁得他體無完膚，這才是狠」，「打他兩下子不是狠，是粗暴」。^[2-103]也就是在思想上對右派要做無一疏漏的地毯式駁斥，使之思想徹底「破產」。

再次，對於運動的操作，鄧小平提出了具體的指示。包括：一、「要把隊排好」，也就是在運動中辨別左、中、右與我、友、敵。鄧明言其方法是「鬥爭深入，暴露多，排隊就容易」。二、點名批判。鄧批評「前一時期報紙上點名點得太少，出現老一套，就那麼幾個人，那一些東西。」鄧更針對上海指出其點名太少，要增加一倍。就全國的範圍，可被點名者「不僅是民主黨派，其他方面也可以點，如新聞界、文藝界、戲劇界」，「只要不超過800人就沒有危險」。^[2-104]若按照7月2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所稱，估計全國右派有8,000人。^[2-105]亦即可允許10%的右派在報上受批判。^[2-106]三、推廣地方的「有效」經驗。鄧表示：「現在有幾個經驗，大魚在後面才能出來，在運動深入時才能捉出來，分化後才能揭出來。」^[2-107]事實上，鄧演講的前五天，中共中央才轉發了〈吉林省委關於高校鬥爭的情況報告〉。報告中表示：先前在第一線公開向我們進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批「蝦兵蟹將」，更凶惡的「鯊魚」多在暗地活動。^[2-108]可見鄧對「吉林經驗」的重視。上述鄧小平對運動做法的指示：運動要再深挖、要加大對右派的輿論轟炸，以及真正的「大魚」還未出來的估

計。經由散播，無一不會對運動的發展起到火上加油的作用。

再其次，對於若干已「落網」成為右派象徵的著名高級民主人士的鬥法，鄧小平也提出詳細的指示。鄧表示：「章羅聯盟就是想推翻我們，把我們搞倒，他來上台」，^[2-109]但是「章羅再弄也就沒意思了，就那麼多東西，重複人家就不高興看了」。^[2-110]相形於錢偉長「其言論還有市場」，可以考慮再開萬人大會批判，「章羅就不必了，因為他們已經臭了」。^[2-111]然而，鄧小平並不贊成有人建議的馬上撤掉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等職務，鄧認為當前暫不動其職是有教育意義的，因為「撤掉就沒有戲唱了。對中間分子的教育爭取就差了，中間分子就想息事寧人，一撤事情就完了，他就好去睡覺了，這是代表中間分子思想的」。^[2-112]

鄧小平說「章羅是合作社」，龍雲則「看來是個單幹戶」，其送來的檢討書，「也還深刻，但背後還是罵娘。罵就讓他罵吧，不讓他罵也不行」。^[2-113]鄧指出「對低頭繳械的適可而止」，「龍雲就差不多了，以後有材料還可以再弄」。^[2-114]鄧小平主政西南時，親自安排龍雲出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2-115]先前是虛位以懸的爭取對象，僅數載已形同陌路。對於費孝通，鄧小平指示對費「就可以分化出來」，^[2-116]「要爭取過來，他會寫文章，他的文章對爭取教育中間〔分子〕有意義」。^[2-117]如上證明對這些右派「首犯」的批鬥，是緊控在鄧小平手裏的。^[2-118]

在運動進入開始「反右」的階段後，鄧小平曾三番兩次地強調整風與「反右」不可偏廢。鄧小平在7月4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表示：

改進工作，現在來看改的決心不夠。整風就是為了克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只有改進工作，才能提高黨的威信，團結廣大群眾；改進工作以後，右派分子就沒有資本，中間分子就會靠攏我們了。報上對我們所提出的意見，90%是正確的。是鮮花不是毒草，要誠懇接受，加以改進。團結中間分子是反右派鬥爭的關鍵，而團結中間分子，就必須狠狠地打擊右派和改進工作。現在來看，工作有些改進，但不夠堅決。每個部門、每個單位必須堅決地去改進工作。^[2-119]

簡言之，鄧小平認識到黨自身改進工作的成功與否，既有杜絕「右」、拉攏「中」的效果，更是維繫、增進群眾對黨之向心力的根本之道。

鄧小平在7月12日的統戰工作會議上也講：

運動的目的是為了兩件事，一是整風，一是反右派。整風是為了克服三大主義，反右派是在政治思想上削弱資產階級影響。……目前這把火應該燒兩個東西，一是燒三大主義，一是燒右派。任何時候不要忽略這兩個方面，只燒右派不燒三大主義不行。目前看來是燒右派燒得更多一些，總之，不要忽視反右派，也不要忽視整風。要兩個狠，狠狠發現右派，狠狠整三大主義，都要貫徹到底。^[2-120]

但是鄧小平「兩手都要抓」的勸說，收效必然不彰。因為在經由整風暴露敵人而展開追擊的「反右派」，以及經由整風揭發弊病而促發改進黨的工作之間，不同於抓右派時迅速可見的鬥爭結果和成績，改進工作需時較長，相較難收立竿見影之效。再加上「反右」運動的浩浩蕩蕩、大張旗鼓，更吸走各級黨幹的注意力，「迎敵痛擊」求戰的喜悅與熟悉，自非虛心檢討、默默耕耘的工作經營可相比。因此，鄧小平對黨幹不要放鬆整風的提醒和呼籲，實是曲高和寡。事實上，鄧自己投入「反右」的興致和專注，根本不亞於「磨刀霍霍」的其他黨人。

第四節 青島會議後大反黨內「溫情主義」

根據青島會議精神佈署運動

7月17日至21日，中共中央在青島召開有部分省、市委書記參加的高層會議，著重討論了整風、「反右派」問題。會議期間，毛澤東所寫的〈1957年夏季的形勢〉一文，成為會議的主題。其強調：「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各界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各階層，「都應當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2-121]該文作為指導運動的新方針，對於運動後續的發展產生加溫與升級的作用。

鄧小平在青島會議期間，除了開會以外，花了不少心思在參與修改毛澤東的〈1957年夏季的形勢〉文稿。^[2-122]此一修改過程應有助鄧小平「吃透」毛澤東對運動所抱持的新構想，如此使得他在研擬運動廣續的具體政策與做法時，能更貼近毛的想法。鄧在青島的活動中，也包括審閱運動的政策文件如：統戰部報送的〈關於幫助各民主黨派整風的意見〉。^[2-123]回想鄧小平在5月初還曾代表中共出面邀請非共黨派人士敞開心胸地對中共的治政與領導惠予指教，以助中共自身的整風。然而，事過還未達百日，鄧就反過來動腦籌劃中共如何整這些非共黨派人士。後來事情的發展顯示，對於這些在中共恩賜下方享有參政權利的友黨的整風，中共採取的辦法簡直就是侵門踏戶以至於登堂踢館；然而，這些蕞爾小黨為了安度運動的關卡，唾面自乾外，「別人收拾自己還嫌不夠，要自家整自家了」。^[2-124]

會議結束後，鄧小平即回北京投入新一階段的運動領導工作。7月23日上午，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根據青島會議的精神，尤其是毛澤東〈1957年夏季的形勢〉的最高指示與思路，對運動進行具體安排和部署：明確右派問題是「敵我性質」；強調「運動要展開，每單位各行各業要展開，農村、工廠也要搞，方法不同」；分別起草有關農村整風和工廠整風的指示；地、縣一級整風，首先批判右派，然後轉入以思想教育為主

的整風。

對於如何處置右派的問題，鄧小平則表示「組織處理不忙，人大、政協、黨團都不忙處理，等人大改選後再說」，但要求「要積極做準備工作」，並指定「統戰、宣傳、組織部趕快研究，12月必須拿出方案。政協、人大，包括省市，11月拿出方案，統戰部負責」。^[2-125]鄧小平對與運動直接相關的中央部門、政府系統以至於地方的運動進度，做出具體時間的規定，其身為運動執行者的關鍵角色，再次表露無疑。

8月1日，毛澤東基於青島會議精神為中共中央起草〈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2-126]毛在〈指示〉中表示：「在深入揭發右派的鬥爭中，現在一方面正向地縣兩級（在城市是向區級和大工礦基層）展開，一方面又必須在中央一級和省、市、自治區一級各單位深入地加以挖掘。這樣，右派分子將繼續發現和挖掘出來，人數將逐漸增多。」^[2-127]應予以強調的是，經過青島會議對整風、「反右派」的初步總結與毛澤東對運動所作的進一步部署與安排，毛認為運動已經上軌道，自8月中旬起，他便將整個心思放在農業問題上；在9月上半個月，他也都在外地了解農村整社和農業生產情況。^[2-128]中共中央對運動的領導，更多地由鄧小平統一負責。1957年的盛夏初秋，鄧小平也確實為了領導運動而顯得極其忙碌。根據鄧小平的官方年譜所提供的資訊（恐非完整），鄧在8月份每週至少會主持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針對運動問題進行討論或聽取匯報；其間鄧也不時召集其他形式的會議處理運動有關事宜。^[2-129]

黨內反「溫情主義」

中共發動整風運動，本意就是要對黨自身進行革新。自整風「鳴放」以來，言行出現脫序、失常的黨員，勢要受到嚴厲的懲處；其舉止若被判為與右派無異，更將成為被清洗出黨的對象。鄧小平在黨內「反右」上的表現，給人的觀感是相當地鐵腕，有大義滅親、在所不惜之感。

鄧小平對於黨幹、黨員在運動中是否站穩立場，一直很密切地關注，態度也甚為嚴厲。在運動處於整風、以至步入「引蛇出洞」的階段，鄧小平就表示：「確實有一些並不具備入黨、入團條件的人入了黨、入了團。」因為鄧就特別注意到「北大先貼大字報反共的就是一個黨員、兩個團員，這就是投入到資產階級隊伍裏去的人」。^[2-130]正式發動「反右」後，鄧小平即強調：「黨團員是右派應該一視同仁，當怎樣處理就怎樣處理，不要包庇，沒有什麼可惜。」^[2-131]

7月青島會議後，中共黨內加緊展開反「溫情主義」。毛澤東起草的〈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中指示：「黨內團內右派分子，

只要是同黨外團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向黨猖狂進攻的，必須一視同仁，一律批判。該登報的，即應登報。」^[2-132]鄧小平在這方面確能做到「鐵面無私」。以下即以前面曾提及的中央高級黨校和「中國作家協會」為例，觀察隨著黨內「反右」持續加溫，鄧小平是如何對此二單位運動的激化產生巨大的推力。

（一）中央高級黨校

中央高級黨校正、副校長兼黨委第一、第二書記的楊獻珍、侯維煜，在6月19日當面聽取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對該校運動所作的指示後，回校後即連軸轉地開會傳達並安排。楊獻珍在會上表示：「社會上右派的思想，我們這裏都有」；「黨外的右傾思想都放出來了，黨內還沒有，只有高級黨校暴露出很多右傾思想」；「現在要一致對外，反擊右派分子的進攻」。^[2-133]至此，無論其主觀意願為何，楊校長被推到黨校「反右」的火線上了。

7月22日，楊獻珍、侯維煜向中央書記處上報四人名單，其中兩人被劃為右派，兩人被指稱有右傾錯誤思想。報告上送後，鄧小平召見楊、侯。在談到被指稱有右傾錯誤思想、進黨校學習前為全國總工會海員工會國際部部長的蕭魯時，鄧小平說：「一個黨員領導幹部，稍微有點風吹草動就倒過去了，那怎麼行？」「你們高級黨校學員中絕不會只有兩個右派分子，反右剛開始，你們思想不要右傾啊！」^[2-134]鄧的語意很明顯：中央高級黨校內一定還有沒現身的右派，只待校領導努力去追、致力去抓，對此若躊躇不前，就有犯「右傾」錯誤之虞。

在鄧總書記當面指示與採取「緊迫盯人」後，^[2-135]楊獻珍等只能進一步地在高級黨校內「反右」，8月17日，在學員中確定劃了九名右派分子。顯然，鄧小平對此還不甚滿意。8月23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國家機關黨委、全國總工會和高級黨校三個單位的整風「反右」問題時，鄧小平對應召列席的楊、侯感到不耐煩地說：「蕭魯的問題，你們第一次上報他的材料時，中央就批准把他劃為右派，你們怎麼現在還在猶豫？」「如果這樣的人不劃為右派，黨內就沒有什麼右派了。」「這樣的人不搞出去，他就不知道怎樣才像一個共產黨員。」在座的彭真更插話表示：「現在的問題不是蕭魯是不是右派，而是你們兩個是不是中右的問題。」^[2-136]另也有資料表示：鄧小平會偕同劉少奇召集楊獻珍針對高級黨校的運動問題進行談話。對於該校運動的「低溫」狀態，劉不悅地表示：「你站在右派的立場，怎麼能查得出右派呢？」一旁的鄧小平更單刀直入地表示：「我看你就像個右派！」楊獻珍雖沒被劃為右派，但被迫「靠邊站」，喪失了對黨校的運動領導權。^[2-137]

毫無疑問，鄧小平的一再施壓，對中央高級黨校的運動有直接加乘的作用，到了12月初，黨校教職員不算在內，學員中就有63人被劃為右派。^[2-138]因為運動高度緊張的狀態及其造成的壓力，侯維煜竟為此病發。對於校內「反右」赤焰高漲的結果，在病榻上的侯副校長不禁愧疚地表示：「各地把一些領導幹部送到高級黨校來學習培養，現在這麼多人被打成右派，我們怎麼向各地負責人交代！」^[2-139]

（二）中國作家協會

中宣部正、副部長陸定一和周揚，決心利用「反右」之機，將欲為自身洗冤的丁玲、陳企霞當作文藝界「反右」的「成績」上呈中央。對此，鄧小平不但樂觀其成，更希望能儘早交出成果。7月26日，中央書記處就批評文藝界「搞得太慢」。^[2-140]在中央聲聲催的情況下，周揚與「作協」黨組領導在費盡一番心力後，總算是「攻破」了丁、陳為首的「反黨集團」的「猖狂進攻」。8月初，陸定一請示鄧小平有關此事登報告捷的事宜。鄧小平或覺得既是「反右」佳績，自應早早面世昭告，故主張兩天後馬上登報。鄧小平這種急見運動捷報的心理，倒是苦煞了相關的承辦人。^[2-141]此即8月7日《人民日報》頭版刊載的〈文藝界反右派鬥爭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一文的由來。^[2-142]

鄧小平對「作協」內的「反右」攻勢，愈益催促。8月9日晚，鄧小平與周恩來「召集文藝界同志談了反右派鬥爭問題」。鄧、周指出：

文藝界反右已展開，但火力還不夠，應該更徹底。不要有溫情主義，不要認為搞得過火了、面寬了等等。個人主義在文藝方面很厲害，略有成就就反黨，根本忘記他的成就是怎麼來的。今天不痛，將來不知道要怎麼痛，將來就痛得不可收拾。頑抗的只好毀掉，淘汰一部分，這也是挽救更多人的好辦法。這些人就是文藝界的敗類，如不淘汰就起腐蝕作用。如這些人不整，則搞出的東西也是資產階級的。不要姑息名演員、名導演，給他再次登報，揚揚臭名。^[2-143]

對於「作協」的鬥爭，鄧小平、周恩來也做出具體的指示。兩人咸認為「鬥爭已展開，很多大鯊魚浮上來了」，並決定緊接著就展開對馮雪峰的鬥爭，掃清外圍，再進一步揭露「丁玲及其小集團」。^[2-144]馮雪峰在中共江西時期即是有一定名望的黨員，在鄧小平督陣的反「溫情主義」的浪潮下，也中箭落馬，成了「丁陳集團參加者，胡風思想同路人」、「文藝界反黨分子」、「右派骨幹分子」。

9月1日，《人民日報》刊出社論〈為保衛社會主義文藝路線而鬥爭〉。該文乃經鄧小平事先審閱並批示可用。^[2-145]其內容要點為：「文學藝術界揭發了丁玲、陳企霞、馮雪峰、江豐、鍾惦棐等人的反黨活動。這是一場辨明大是大非的原則性的鬥爭，是黨的社會主義文藝路線跟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文藝路線的鬥爭」。相關人士「反對黨的領導」，犯有「嚴

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侮辱了『靈魂工程師』的光榮稱號，而變成了不折不扣的『靈魂的蛀蟲』」。社論並堅稱：「決不容許任何人有暗地裏搞小宗派、搞反黨集團的自由，不管他們有多老的資格，有多大的『聲望』！」^[2-146]

在「作協」內的「反右」鬥爭塵埃已定的情況下，9月3日，鄧小平會解釋何以這些「老資格」的作家黨員「昨是而今非」：

丁玲問題在前年也認識不夠，一定要再加兩年，還得有個反覆，是否把問題搞過了？這樣才把問題最後搞清楚，有些人過去認為是好幹部，這次是個右派，是否過去都看錯了？不是的。事和物都有隱蔽的一面，沒有一定的溫度、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場合是露不出來的，沒有什麼值得後悔的。現在暴露出來了一些問題，這是好事還是壞事？應該說，這是好事。把問題通通發現出來，這很好，如果不發現，再讓這些右派搞三年，情況就不同了。現在發現了，是好事。^[2-147]

為了使黨內「反右」在更大範圍上能更如火如荼地展開與深入，9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分子問題的指示〉。該〈指示〉的出台乃經鄧小平之手：鄧在9月1日審改後批示提交次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並獲得通過。^[2-148]該〈指示〉指出：「現在還有一些同志，在反對黨內右派分子的鬥爭中，存在著比較嚴重的溫情主義」。「在中央肯定了右派性質和對黨內的右派分子的黨籍採取從嚴的方針之後」，他們仍對「與黨外右派政治面貌完全相同」的一般黨員「姑息寬容」；對於「應劃為右派的老黨員」，更是「下不了手」，「這是完全錯誤的」。該指示也強調：只要黨員言行同黨外右派一樣，「就沒有理由不根據一視同仁的原則」，「同樣地劃為右派分子，並與之進行堅決的鬥爭」；「必須了解，黨內右派分子有著『共產黨員』的招牌，有較多的政治資本，因而也就容易欺騙、蒙蔽和影響群眾」，再加上，他們又和黨外的右派分子呼應、配合，「從堡壘內部向黨進攻，因而對黨的危害就愈大」。「這種黨內右派分子，他們的黨齡愈長，職位愈高，對黨的危害就愈大」。^[2-149]

由於該〈指示〉既不假辭色地批評在黨內「反右」問題上的「溫情主義」，又直指不及時革除黨內右派會造成的危害，顯得僅單方面地突出抓黨內右派的重要性，鄧小平在審改過程中不得不加寫上黨內「反右」也應慎重的簡單字句，^[2-150]以讓其內容稍顯平衡。只不過，以其加寫文字處的上下文觀之，以及該〈指示〉通篇的好戰精神，仍甚容易讓黨的下級官僚心生黨內的右派不抓不行、多抓為妙、先抓再說的認知與印象。

為了配合前一號召黨內「反右」的中共中央指示，鄧小平9月9日又審改一篇題為〈嚴肅對待黨內的右派分子〉的社論稿。^[2-151]兩日後，此一社論在《人民日報》頭版上刊出，其內容可謂是〈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分子問題的指示〉進一步的詳細說帖。亦即堅決反對將「『猛虎』放在身邊而不去觸動」的「溫情主義」現象；在不吝筆墨地強調對待黨內右派「決

不應該有任何的姑息寬容」、要求各級黨委「大力糾正溫情主義」後，方在文章的尾聲提醒「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也要注意防止錯劃右派的現象」。^[2-152]

鄧小平在1957年強力執行黨內「反右」上，也發生一件為其始料不及的事。據聞在當時中共黨內傳達的一個講話中，鄧小平指責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兼總編輯的曾彥修為「中國的納吉」，因為曾彥修在他人貼的大字報上寫上歡迎批評、鼓勵向領導大膽提意見的字句。納吉（Imre Nagy）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主張政治改革與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自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領導人看來，納吉是革命的叛徒，因此斷不允許中國大陸出現有近似主張的人物。想不到十年以後爆發「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反被指稱為「鄧納吉」。^[2-153]

第五節 將整風帶向農村和工廠

根據毛澤東〈1957年夏季的形勢〉要求運動擴及農村與工廠的最高指示，鄧小平在7月23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強調：「運動要展開，每單位各行各業要展開，農村、工廠也要搞，方法不同」；並決定分別起草有關農村整風和工廠整風的指示。參與制定中共中央針對農村與工廠的運動指示，並關心相關運動推行中所產生的問題，即成為鄧小平在1957年8、9月之交的一項重要工作。

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有關農村的整風，中共名之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指導文件為中共中央〈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此一鄧小平曾參與審改的〈指示〉強調：「在目前農村中，有必要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優越性問題；第二，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等等。教育的方式是：利用生產間隙和休息時間，在全體農村人口中就這些中心題目舉行大辯論。」^[2-154]

由於農村的運動牽涉人口眾多，再加上根據過往農村政治運動易引發混亂甚而出現亂鬥、暴力現象的經驗，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對農村的整風，表現得較為謹慎。鄧小平在審改前述的〈指示〉稿時即曾加寫：「各級黨委必須很好地掌握這個運動的領導，使它有準備、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等內容。^[2-155]8月14日，鄧小平在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宣傳報導農村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的指示〉時，特別要求地方各級黨委對當地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宣傳和報導，要有所注意與拿捏。鄧在〈指示〉中強調：

各地報紙、刊物、廣播電台等宣傳機關，對於農村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的報導，應著重於好的經驗的介紹，正面道理的宣傳（包括對於資本主義思想的駁斥）。在反映農村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時，要恰如其分，不要使人感到漆黑一團。[2-156]

如此明顯地與鄧小平在整風初期刻意要城市的機關單位與人員暢所欲言（包括「放毒」），並將之明載於報章上的作法有別。鄧小平考量的因素除了避免因過度突出農村政治中的對立面，從而拉緊農村階級政治鬥爭的神經；更現實的原因還有：不要讓農村整風運動出現意外的發展，以免影響、耽擱農業生產收成以及當年統購統銷任務的如期完成。

對於如何看待、定位在農村相關運動中被找出、鎖定的異議分子的問題，鄧小平也加以指示。中共對城市機關單位及其人員所進行的整風運動中，後來「反右派」演變成重要、甚而關鍵的一部分。在農村與工廠的整風中是否要如法炮製呢？不少地方黨委皆有此疑問。

9月4日，鄧小平審閱胡喬木報送的《人民日報》長篇社論稿〈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多數〉。[2-157]該文旨在說服那些為數不少的「對於在工廠農村展開群眾性的大辯論抱著懷疑的態度，不敢發動群眾起來大鳴大放大爭」，擔憂將「大字報、座談會、辯論會的鬥爭形式」「推廣到全體工人、農民中間去」，會「搞得『天下大亂』」的「同志」。[2-158]鄧小平在為中共中央在農村、工廠推行整風作政策辯護的同時，也指明「同是整風，反右有別」。因為也在同一天，經鄧小平審改後，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稿。[2-159]其中針對農村的部分指出：「中央認為，在農村中，對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沒有改變成分的，即照原來成分對待，已經改變了成分又進行搗亂破壞的，可以分別恢復他原來的成分，戴上原來的帽子，但是不要叫右派分子。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應當批判，不要戴右派分子的帽子。」「農民中已經劃了右派分子的，應當改正。」[2-160]換言之，鄧小平希望將農村整風中「冒尖」出來的政治異端分子，按照中共在農村政治中既有的政治分類來因應處理。這種將在農村整風中「抖出」的政治異己「分門別類」、進而「分而化之」的作法，事實上，也與中共在農村進行整風的原初考量相吻合，亦即不要讓農村政治情勢因整風而陡變，終而影響到農業的正常生產與徵購任務。

以農民運動起家的中共，在這方面果然有一定的「先見之明」。因為農村的整風一旦啟動，縱使美其名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運動的積極分子就易有鬥爭上癮、追捕成性的偏向。農村整風開展後，中共遼寧省委即向中共中央呈報〈關於農村中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突出分子可否劃為反社會主義分子的請示〉。9月15日，鄧小平審改中共中央對此〈請示〉的覆電稿。鄧按照十天前經他過目的〈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的

精神作了如下修改：

對於農村中反黨反社會主義突出的分子，仍按照他們本人的情形加以確定為好。如是地富反攻，則按地富反攻處理；是反革命，則按反革命分子處理；是流氓，按流氓分子處理，等等。這種人是反社會主義的，應在群眾中指出其反社會主義性質，但是不要在農村中去專劃一項「反社會主義分子」。因為這樣很容易形成亂戴帽子，特別是對一部分富裕中農容易搞得過分。[2-161]

鄧小平的相關回應，一方面代表了中共中央否決了遼寧領導人欲在農村整風中抓所謂「反社會主義分子」的提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對農村的整風，自始即有的管控之意。然而，需要強調的是，農村的整風因群眾運動規律的負面影響，仍釀成多起暴力批鬥與逮捕，以及被迫自殺的事件；對批判對象扣以右派帽子的情形也屢見不鮮。[2-162]鄧小平參與其中的中共中央，雖三申五令不得在農民中劃右派，但是在整風中「芳蹤」被盯上的所謂「反黨反社會主義突出分子」，所數既不會少，他們被當作反革命或作其他罪名的處理，下場也不會比政治上被劃為右派者來得多好。更重要的是，以黨的強制力量為依靠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其對農業上「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硬性強調與政治上「唯我共產黨一家」正確性的強力灌輸，也為來年農村田間出現的若干怪現象如：為行政治攀比而宣稱高產豐收，為表政治先進而爭入公社體制，提供了豐沃的政治土壤。

工廠整風

對於工廠的整風運動，中共中央與運動的具體組織者鄧小平也採取以穩健為主的領導方針。鄧在這方面主要從事的工作是相關政策文件的制定，他也曾在此期間實地到工廠觀察運動。

鄧小平參與審改的9月4日發出的〈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其對於工人部分的規定為：「工廠中科室以上的幹部和技術人員可以劃右派分子，在工人中則只定先進、中間、落後的界線，不作左中右的劃分。是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壞分子的，可按各人具體情況加以確定，但一律不用右派分子的名稱。」工人中已經劃了右派分子的，應當改正。[2-163]

中共何以在工廠整風中對工人如此「優待」？鄧小平後來在9月23日會加以解釋：「工人階級隊伍的整風問題，是本階級整頓思想作風、提高階級覺悟的問題，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有原則的區別。因此，應該著重改進工作和對群眾進行社會主義教育，而不應該把機關學校中對待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辦法，拿來對待一般的工人群眾。」至於「企業中的技術人員和職員」則就沒那麼幸運了。鄧表示：他們「多數還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範疇」，「整風主

要是使他們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大體上可以仿照機關整風的做法」。^[2-164]中共不在工人中抓右派，除了階級政治與意識形態因素，顧慮運動恐會過多地影響生產，或也在考量之內。

前述的8月初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中曾指出：「地縣兩級，城市區級及工礦基層的領導人經驗較少，有些人鑒別水平不高，你們必須諄諄給以教育，隨時檢查，使他們站得穩，打得狠，這是要十分注意的。」^[2-165]對於首都工廠基層的整風，鄧小平為了「給以教育」與進行檢查，就率先於9月5日下午至北京電子管廠看運動大字報，了解整風情況。^[2-166]繼鄧小平之後，其他在北京的中央常委如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也相繼赴工廠觀看大字報並給予指示。^[2-167]最後更形成了在首都的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72人蜂擁前往40個國營工廠礦山企業觀察整風的熱潮。^[2-168]

鄧小平下廠看運動大字報，是否像毛澤東一樣受其內容文字所激揚，^[2-169]雖不得而知，但其相關動作本身，即具有政治意義：一方面可表示中共中央對工廠整風的重視與指導，並藉以鼓勵職工對整風的參與；另一方面，相關的探察活動，也為了擬定有關工廠運動的中央文件作先期準備與資料蒐集。9月12日下午，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共中央〈關於在企業中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文稿。是夜，鄧參加劉少奇召集的會議，討論並通過該稿。^[2-170]此一中央文件即在隔日的《人民日報》登出。其主要內容為：「全國各地工廠、礦山、交通等企業的領導方面」，「放手發動工人群眾提意見，誠懇地傾聽群眾的批評」；對各種意見都必須「件件研究」、「邊整邊改」，能改則改。再則，組織工人與技術人員、職員進行問題討論，以引導之認識：社、資兩條道路的不同，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資產階級右派的陰謀等。^[2-171]

為了對工廠運動的發展作更具體的引導，中共中央決定發出補充性的指示，並由鄧小平負責此事。9月15日，對於曾數易其稿的中共中央〈關於企業整風運動應該注意的若干事項的通知〉，鄧小平進行審閱後，批請劉少奇核發並主張「宜快發出」。其主要內容與〈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相一致，亦即：企業中的技術人員、職員的整風，大體可以仿照機關學校的做法。對於工人群眾，主要是進行社會主義教育，提高他們的認識問題。在工人中不作左、中、右的劃分，不進行「反右派」鬥爭。^[2-172]

如同其他部門展開群眾性政治運動後的情形，「工人老大哥」所屬廠房、車間的整風運動的情況，自不可能是「溫良恭儉讓」。1957年底，在北京個別的工廠中，竟有百餘名的幹部在運動中被勒令作檢查，並被視為運動後期要處理的對象，引起了中央書記處成員的關注與制止。^[2-173]雖然

中共中央明令不得在工人間抓右派，但是工廠的黨幹還是可另憑名目（階級異己分子、反革命分子、流氓分子、壞分子）對言行「乖張」者進行整肅。

到了1958年，鄧小平及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對於工廠整風也一直保持關注，甚至不忘火裏添薪。1958年1月10日，鄧小平在西安聽取陝西省委負責人匯報整風、「反右派」情況時即表示：整風運動是過社會主義關的問題。工廠中進行整風有兩條，一是領導幹部主動「下樓」，檢查自己，解決問題；一是向職工進行階級教育。^[2-174]針對同一問題，同月20日，中央書記處內分管工業的李雪峰在群集大型工礦企業的遼寧有更具體的說明：「在整風運動的指導方面，主席曾經指示，今後應當將重點轉到基層。因此，把工業企業和其他基層單位的整風搞好，就成為我們上半年的重要任務。」「整風中總的要求，就是要改進領導作風，反掉三個主義，整頓企業的指揮部；進行反右派鬥爭，清除敵人，純潔隊伍。最根本的是要發動群眾，提高工人階級隊伍的政治覺悟，包括知識分子的思想覺悟。」^[2-175]

2月14日，李雪峰在另一場合對工廠的運動問題指示：

有的地方（如太原）企業裏放出了不少右派，有的地方（如北京企業）就沒有搞出多少右派。即使少，是不是要在辯論中劃一段專門來反？不反就不能解決「要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領導」等問題。凡是有活教材的地方，都要搞，能多挖出一些當然好，但不要硬挖。每一個企業都要摸一摸，不要放鬆，機會不可多得，以後雖有整風，但全國性的反右派鑼鼓，估計不會有了。^[2-176]

李雪峰當時對工廠「反右」所持的「時乎時，不再來」的熱衷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應可反映其書記處上級鄧小平對相關問題的態度。

第六節 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作整風專題報告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三中全會。中共於此之時召開全會的主要目的之一，即與整風、「反右派」運動高度相關。全會結束後的第四天，即10月13日上午，在毛澤東主持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負責通報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鄧小平表示：

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的議程就是關於整風問題。整風、反右派，是全國在這個時期的中心政治問題。它的廣泛性是過去歷史上的運動沒有的，是最深刻的運動之一。我們開展這個鬥爭，為的是使大家從運動裏邊得到教育，得到改造，得到進步，許多問題經過辯論以後認識更加一致。^[2-177]

1957年9月開始，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準備事宜，就成為鄧小平的一項主要工作。依照中共黨內由工作負責人作專題報告的習慣，鄧小平負責在

此全會上代表黨中央作關於整風、「反右派」運動的正式報告。鄧小平所提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文稿，毛澤東在9月20日審閱時批示：「此件很好」，僅有「若干小的修改」。^[2-178]由此可以顯示，鄧小平的〈報告〉內容觀點乃為毛澤東所讚賞、同意。鄧小平也在三日後，亦即9月23日在全會上將之公開朗讀。雖然該〈報告〉的主張並非全然是鄧小平一人的發明創見，而是綜合、統整以毛為首的中共中央在相關問題上的「集體智慧的結晶」，但如此確可反映出：鄧小平在整風、「反右」問題上，不但是與毛和其他領導人保持高度的一致，更能在自我吸收咀嚼後，將之系統化、條理化，成為代表中共中央對當下運動情勢評估的權威論斷，以及黨在各個領域（包括：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農村、工人階級、少數民族、軍隊、黨和團）推行運動的依據與指南。以下簡要介紹與探討鄧〈報告〉中對運動的評估與指導，以及有關知識分子的部分。

對運動的評估與指導

鄧小平針對運動的愈加鋪展進行說明：

從今年5月開始的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8月以前主要在省市以上黨政機關、大專院校、民主黨派、新聞出版界、科學技術界、文藝界、衛生界中進行。8月以後逐步向工人、農民、工商界、中小學教職員展開。軍隊也同時開展了整風，現在正擴大成為全民的整風運動。^[2-179]

從上可以看見，原初是中共對黨外的「不恥下問」，經過一陣對右派的猛烈討伐，運動發展至此反變成全國、全民須聽從中共指示的自我洗心革面運動。易言之，中共從「自我檢討」轉成「要人檢討」，從「必有我師」到「我為人師」，化被動為主動了。

另外，鄧小平雖在報告中指出：「經過三個多月的鬥爭，情況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在各民主黨派、高等院校、其他知識界和省市以上機關，鬥爭一般已取得決定性的勝利」。^[2-180]然而，中共並不以此為滿足，主張對右派還要「剩勇追窮寇」。

鄧小平在報告中強調改進工作是運動各階段中必備的重要內容：

運動還要繼續深入和展開，不能草率收兵，不能前緊後鬆，必須爭取全勝。在中央、省（市）、地、縣四級機關，運動都必須經過四個階段，即大鳴大放階段（同時進行整改），反擊右派階段（同時進行整改），著重整改階段（同時繼續鳴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評反省、提高自己階段。凡是在反右派鬥爭已經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單位，應該及時轉入以整改為主的第三階段，同時對資產階級思想進行有系統的批判。^[2-181]

鄧小平在社論宣導上，也留意突出改進工作任務在運動中的重要性。猶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進行期間，9月29日，鄧小平即審改內容強調「改進工作也不能允許溫情主義和草率收兵」的〈下決心整頓作風改進工作〉社

論稿，並安排在隔日的《人民日報》首版刊出。^[2-182]但是鄧小平在全會報告中仍明白指出：「在第三、第四階段如果繼續發現右派，或者原有的右派還沒有低頭，當然仍有反右派的任務」，「對這四個階段不能看得太死」。鄧在10月9日全會閉幕的總結發言中又將此話重複了一遍。^[2-183]「反右派」的任務自是進一步地深植在台下聆聽者的腦海中。

在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對全黨號召將運動「擴大成為全民的整風運動」與「當然仍有反右派的任務」、「把反右派鬥爭進行到底」之下，運動自是方興未艾。獵捕右派或以右派帽子定罪的情形未曾稍歇，落網成右派的人數更急速增長。

知識分子問題

中共對知識分子本抱持著不信任和敵視的心理，經過「反右」與之搏殺、較量後，這種心態更是只增不減。鄧小平的報告中的相關論述與段落，就有類此鮮明的痕跡。

首先，鄧小平在報告中表示：「就我國目前的情況來說，多數的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所受的教育也是資產階級式的，所以，為了方便起見，同資產階級放在一起說。」^[2-184]就中共當時所收集的情資顯示，有不少的知識分子對於鄧小平將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並論的「便宜行事」的提法，反應負面，例如：懷疑「這樣是否就一樣看待了」；^[2-185]對此「感到突然」、甚至是「想不通」。^[2-186]1956年中共召開的知識分子問題會議，曾指出知識分子中的絕大部分「已經成為國家工作人員、已經為社會主義服務，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2-187]僅隔一年，在鄧的報告中其絕大多數又被看作屬於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

其次，鄧小平直指知識分子是運動中問題之所在、冒出右派的主源。鄧在報告中表示：「這次反右派鬥爭，主要是在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範圍內進行」、「右派分子活動的主要場所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2-188]正因知識分子位列於鄧指揮的「反右」浪潮的主要打擊面之下，1957年迎來的不是費孝通早時說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反而是凜冽寒冬的開端。

再次，鄧小平指出知識分子後續改造問題的重要性與必要性。他表示：

資產階級，特別是它的知識分子，是現在可以同無產階級較量的主要力量。他們還有政治地位、政治資本和政治影響，而無產階級也需要他們的知識。但如果他們不堅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他們同無產階級的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服務，否則就有變成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樑上君子」的危險。^[2-189]

在這種對知識分子存有忌憚、對其能力又有所圖的心理作祟下（鄧小

平對待錢偉長的態度就是一個具體實例。錢是在鄧的副手彭真幕後設局下而出面演講、評論時政，進而被指認為右派的；^[2-190]鄧也曾親作指示要開萬人大會對錢進行批判。然而，錢在政治上已被運動搞得「臭不可聞」後，鄧又指示蔣南翔：「錢偉長不管怎麼說，還是個力學家，讓他開課」），^[2-191]中共黨人對知識分子提出綿綿如無止盡的改造要求，既助長後來中共不重視知識、甚至反智的傾向，也導致知識分子長期的抑鬱不得志。

鄧小平此一《報告》在1957年10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事實上，該文也是鄧小平在運動中唯一公開署名的文字。從後來的反應來看，對於運動而言，鄧小平這篇「宏文大作」，算得上是成功，因為其達到了激勵同志、渙散敵人的效果。運動積極分子對此迴響甚為良好，覺得「整個是很精彩的」。^[2-192]右派中有的讀後哭喪地表示：「這回可完了，要開除黨籍了」，^[2-193]有的「感到罪惡嚴重」、「思想壓力很大」。^[2-194]

鄧小平的此一〈報告〉在當時也引起國際的注意。蘇聯的《真理報》在10月24日發表其內容摘要；^[2-195]台灣的國民黨對之亦甚為重視、詳加分析。^[2-196]不過，鄧小平這篇在運動中起到「振聾發聵」作用、並引發海外注目的政治報告，不知是否已「不合時宜」——鄧小平晚年並沒有將之收入在自身「政治交代」性質的《鄧小平文選》中。

第七節 將整風擴至中小學、地方各省與邊疆地區

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運動專題報告中曾表示：運動截至當時，在第一批參加運動的省市以上機關、學校、民主黨派共約309萬人，其中被揭露出來的右派分子有62,000餘人。^[2-197]薄一波回憶：在該會上的透「底」估計，全國約有右派15萬人。^[2-198]然而，僅在半年以後，落網者卻是兩至三倍地翻增。^[2-199]這無疑與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後運動戰線不斷擴大、拉長緊密相關。鄧小平在中央層級所作的指揮與領導，也為運動在如中小學、地方各省以及少數民族地區的持續擴大發展，提供條件並予以鋪路。

中小學的整風、「反右派」

有關中、小學的政治思想問題，在整風運動正式發起之前，中共當局即予以關注。然而，中共中央當時認為中、小學內的主要問題，乃在於領導幹部。這與毛澤東鑒於幹部官僚主義問題叢生而計劃發起整風運動的思

考方向是一致的。鄧小平在1957年4月16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曾對中、小學問題表示：「中、小學比較重要的問題是幹部太弱、各級文教班子弱。有些宗派情緒很厲害的幹部在做領導工作。」至於改進的對策，鄧援引毛澤東對解決文教領域領導問題的看法指出：「一是教育原有幹部改變工作作風、方法和思想，自己要改造。有一部分經教育實在不好的幹部要調出來」；「二是派新幹部」；「三是從現有進步的知識分子中選幹部」。^[2-200]諷刺的是，中共後來在文教領域大反右派後，主要也是採取如上的辦法，將對黨有貳心者調離文教崗位，派駐人員接管、換血，以清理相關的組織隊伍。

在1957年5月上旬整風剛開始不久的階段，鄧小平應已從毛澤東當時批轉的有關上海中、小學教師座談會的報導中，知道這一群體既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也是饒有不滿、牢騷滿腹的。因此當5月中、下旬中共決心在運動中進行「反右派」後的一段時間裏，為了讓運動優先在政治界與文化科學界的高級知識分子中推展，鄧小平曾向地方領導人交代先不要將運動引入中、小學。青島會議後，中、小學開始被納進此政治運動涵蓋的範圍之內。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所作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更明確地指出「教育界的主要戰場現在正移向中小學」。^[2-201]

為響應中央總書記關於將中、小學作為運動新重點的指示，10月1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中等學校和小學的教職員中開展整風和反右派鬥爭的通知〉。〈通知〉雖表示在全國為數兩百多萬的中、小學教職員中，大多數都是好人，但由於相關群體的社會出身和政治思想情況可能比大專學校還要複雜，所以「反右」是有必要的。在運動的方式上，城市學校教職員可採用機關整風的辦法，農村學校教職員可參加當地農村中的社會主義大辯論。為了「整風和教學兩不誤」，中、小學的整風「反右」則將利用寒暑假集中解決。^[2-202]中、小學教職員在1957年底至次年春（尤其集中在1958年初的寒假），成為運動的重點對象，面臨了「反右」的政治考驗。

在中共決定在中、小學教職員裏大肆獵捕右派後，目前雖無更多的資料直接說明鄧小平在相關問題上的態度，但彭真代表中央書記處對外所做的統一發言，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央總書記的意向。彭真在1958年2月16日表示：「中、小學教員必須徹底整風。不能為人師表的，都不要做中、小學教員。把後代給反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不滿的分子或者壞分子去教育，是不應該的。」「處理中、小學教員要和機關人員一樣，保留工資，下放參加勞動，或調作其他的工作。已經批判的右派，要開始做爭取工作。一做爭取工作，內部就會起分化。如果這裏爭取，那裏還未鬥也是問題。中央準備發一指示，沒批判沒揭發的還要揭發批判。」^[2-203]

既然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央書記處成員（或代表鄧本人）對於承擔培育「國家未來主人翁」重任的中、小學教職員的政治忠誠與政治審查看得如此之重，再加上，地方上對此一由小知識分子組成的群體所作的通報與分析，也易讓人覺得其似乎確實存在令人堪憂的思想動態問題，^[2-204]那麼，中、小學教職員受到運動嚴苛的衝擊，自是在所難免。事實上，中、小學教職員成為右派總體人數短時內再次激增的一主要「增長點」。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就表示：「實際上去年12月以後還在小學教員中搞出了十幾萬右派，佔全國30萬右派的1/3。」^[2-205]

「反地方主義」任務的提出

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運動專題報告中，提出在黨的幹部工作問題上要反對「地方主義」的任務，這對於一些地方省份黨內運動的發展，產生了激烈的影響。鄧小平在報告中表示：「關於幹部地方化的問題，是黨的幹部工作中必須正確解決的問題之一。在這個問題上現在有些糊塗觀點，需要加以澄清。」中共建政初期，「中央提出依靠大軍、依靠老解放區幹部建立新解放區」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現在這些幹部絕大部分工作是好的」，「已經地方化了，應該繼續留下來工作」。鄧繼而批評：

但是也有些同志，對於幹部地方化缺乏正確的了解，有些人甚至有排斥外來幹部的情緒。這是一種錯誤的地方主義的表現，應該在這次整風中加以糾正。必須指出：幹部地方化並不是黨的幹部政策的最高原則。幹部政策的最高原則首先是共產主義化，無論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都必須首先共產主義化，而地方主義卻是同共產主義不相容的。^[2-206]

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出的如上指示，為若干身為所謂「南下幹部」的地方領導人提供了極大的政治便利性，因為他們在對付與之糾纏多時的出身在地的黨內政敵時，可將鄧總書記的相關講話內容當作「尚方寶劍」，順手筆直地向黨內對手砍去，廣東的陶鑄即是一例。

1957年9月中旬，以陶鑄為首的中共廣東省委在「反右派」的問題上，因有感於「比較起其他先進的省市來，廣東省仍然比較落後」，為了急起直追、甚而迎頭趕上，乃決定：一方面，計劃該省右派的數量將從1,600人逐漸上升至5,000甚至10,000人；另一方面，在攻擊當地歷次政治運動的黨內右派分子中發現更多的線索，以清查出更多的「右派分子集團」。^[2-207]針對後一類，尤其是省裏長年與之作梗的黨內地方實力人物如馮白駒、古大存，陶鑄在鄧小平於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反地方主義」任務後，感到無須再遮掩行事，明確提出「反地方主義」的口號並對之展開鬥爭。^[2-208]鄧小平也淌入嶺南這個政治渾水。

廣東高層圍繞在陶鑄與古大存之間的黨爭早已有之，鄧小平在1955年

也曾代表中共中央表態支持陶鑄在當地的領導權。^[2-209]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三中全會上提出整風中要「反地方主義」後，對待鄧相關發言的態度問題，成為廣東政壇的一個焦點。飽受陶鑄的攻擊與壓力的馮白駒，「揭發」古大存曾對鄧小平講話中「反地方主義」的段落有所非議。馮稱古曾表示：「鄧小平同志總結發言中，提出地方主義，是陶鑄那裏弄出來的。」古大存雖嚴加聲明絕無此事，陶鑄卻緊咬不放，批古「惡劣」，說是「對中央的污蔑」，為相關的政治批判再擲下一枚不小的震撼彈。^[2-210]目前雖無資料說明鄧小平對此問題的態度，但陶鑄對「馮白駒、古大存地方主義反黨聯盟」的結論與處理，後來是獲得中共中央批准與認可的。

另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在浙江的整風運動發展中，中共中央介入甚深。毛澤東在1957年的7、9、12月四次駕臨浙江，對其運動常予過問；1957年的夏季，鄧小平也曾前來對運動加以指導，這也是他在中共建政後首次造訪浙江。^[2-211]在「暖風吹得遊人醉」的「人間天堂」，鄧小平在肅殺的政治氣氛下執行運動的有關任務。該地運動的發展在中央領導人的頻頻「關愛眼神」下，較諸他省也因而顯得突出。「反右派」期間，浙江有13,563名知識分子和黨政幹部被錯劃為右派，其中最矚目的右派就是省委常委兼省長的沙文漢。在全國的範圍中，沙氏也是在運動中被打為右派的最高級的中共省級幹部。^[2-212]江華與沙文漢、省委常委兼副省長楊思一等人之間數年的政策歧異與人事衝突，藉由整風、「反右派」之機而進行政治攤牌。^[2-213]

對江華、沙文漢之間的權力鬥爭，鄧小平扮演了大力肯定江華、批准認證其運動成果的角色。1957年11月，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李豐平為沙文漢、楊思一等人的問題專程進京向鄧小平匯報請示。鄧小平表示：「你們的雷峰塔倒了」，「沙、楊的性質最壞，還不如民主人士」。鄧明白指示：要將沙、楊等人劃為右派，並將有關會議決議登報、在黨內公佈對他們的處分意見。^[2-214]江華有了鄧總書記撐腰，在12月9日提交省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中，直接援引鄧在倡議反對「地方主義」時所用的政治論斷與語言，宣告沙文漢及其「從犯」的政治死刑。^[2-215]四日後，沙、楊等人正式被開除黨籍。^[2-216]這引發甚大的政治震動與運動示範作用。在1957年底，鄧小平偕同毛澤東在杭州召集華東六省一市第一書記會議，兩人在會中直接對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施壓：「地方主義問題，廣東、浙江解決了，福建還沒有解決，對地方主義要批判，要進行共產主義教育。」葉飛即「領旨」回閩開展反「地方主義」鬥爭。^[2-217]

鄧小平在1957年入秋起主持的黨內「反右」攻勢，中共八屆三中全會後在地方上變本加厲地與「反地方主義」合流。譬如廣東的「反地方主義」乃緊接「反右派」展開或與之交錯進行，由於陶鑄聲稱：「地方主義

者實質上是黨內的資產階級右派」。許多地方幹部因而被劃為右派。^[2-218]該省最後被劃成右派者達36,610人。^[2-219]在廣東、浙江所發生的事情，到了隔年，在「大躍進」政治氣氛與政治需要的影響下，又在中國大陸多處地方出現。鄧小平也經常代表中共中央對之在事發時加以指導、事發後予以認可。有關這方面更詳細的討論，將放在第四章內。

少數民族地區的運動發展

少數民族地區的運動方面，鄧小平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即專闢一節加以說明。鄧小平表示：「在一切已經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人口，應該同樣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並且適當地進行反右派鬥爭。」「在少數民族中的社會主義教育和反右派鬥爭，除了同漢族地區相同的內容以外，還應該著重反對民族主義傾向。」「地方民族主義傾向和大漢族主義傾向，同樣是資產階級的反社會主義的傾向，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各民族的團結統一同樣有危險。」除了一如既往地「堅決反對大漢族主義」，「目前在少數民族幹部中，強調反對地方民族主義傾向，是同樣必要的」。^[2-220]

如同中共中央有專門制定一政策文件以具體指導中、小學的運動一樣，鄧小平也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在少數民族中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2-221]並於10月15日正式發出。該〈指示〉要求運動須根據三種不同的情況，在推行上有所差異：一、在已經實現社會主義改造的地區，「適當地進行反右派鬥爭」；二、在已完成民主改革並開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地區，「黨內一般應當進行整風」，在黨外「採取適當的方式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三、在沒有進行民主改革和某些不需要經過民主革命而直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地區，以正面教育為主。原則是將「重心放在黨內」。^[2-222]

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宣告少數民族地區要開展以反對地方民族主義為重要內容的整風，以及他主持制定的相關中央文件的後續下發，很快就在邊疆各地起到一呼百諾的作用。新疆、廣西、雲南等地舉行的運動座談會上，各民族的與會代表首重討論鄧小平在〈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有關少數民族部分的運動指示。在「我堅決擁護鄧小平同志的報告」、「鄧小平同志的報告是適時的，正確的」的政治表態後，其中的有心人就以整風與批判地方民族主義為名，揮劍指向「披著民族外衣向共產黨進攻」的政治異己。^[2-223]

對於1957年秋後在中共中央領導下所進行的少數民族地區整風，鄧小平在1958年7月16日曾予以高度評價：「經過整風、反右派，形勢來了，所以黨的三中全會就可以把反對地方民族主義提得更響亮了，而且真正做，

做出了很大的成績，這實際上在各民族地區是一種共產主義解放運動。這種思想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遲早要做的。」^[2-224]

第八節 右派的劃定與處理

右派的劃定問題

鄧小平在運動中的一個重要角色，就是在劃定右派上所具有的巨大權限。

首先，鄧小平主持制定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

中共中央在6月8日正式通知全黨在運動中須同時進行「反右派」，但是對如何劃分右派，卻遲遲沒有正式發給一紙說明文件。6月19日，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公開發表（其在此前隨著運動的發展而有多次修改，最後確定的內容與精神，乃與毛講話時的原稿大相逕庭）。文中雖提出六條區分「香花」和「毒草」的政治標準，但其「還代替不了劃分右派的具體界線和具體標準」。7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統戰部〈關於劃分左、中、右的標準的建議〉，其內容「雖然具體了些，但仍較空泛，不便於掌握」。^[2-225]由於中共中央沒有針對相關問題制定一專門的政策文件，處於運動前線的地方黨委，不得不「自力救濟」。例如：9月12日，中共廣東省委整風領導小組宣稱在根據「正確掌握毛主席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報告中的六條政治標準和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的建議意見」的精神下，擬定劃分右派分子的八項具體標準草案，「作為機關內部排隊時的參考」。^[2-226]

在金秋時節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期間，有關劃分右派的標準問題，也成為分組討論中熱烈談論的焦點之一，甚而出現「建議中央快一點制定出一個右派分子的標準」、「大家認為須由中央頒發一個統一的標準」的聲音。^[2-227]或強烈感受到與會人士對劃分右派標準的殷切要求，10月9日下午，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就整風運動等問題作總結發言時，表示中央不久將提出一個草案。^[2-228]事實上，鄧小平在全會期間就在加緊相關政策文件的審閱與討論工作。^[2-229]

10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此時距「反右派」開始已超過四個月，可說是「千呼萬喚始出來」。薄一波晚年指出：「明確具體地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下達晚了」，乃是「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的三個主要教訓之一。^[2-230]然而，整個運動的發展，全然是中共中央——特別是毛澤東、鄧小平所緊控下進行的。毛、鄧何以姍姍來遲地發出該〈標準〉？難不成習於領導政治運動的他們會不知道

它對運動熱度與走向的影響，抑或是他們冷眼地任運動自流？對此可能的解釋是：毛澤東與鄧小平乃有意為之，因為中共中央若太早下發相關的指示，一方面恐會對運動的積極分子綁手綁腳，無法讓之盡興地施展拳腳，從而減損他們對運動的熱情；再一方面，各級黨幹也會過早地將心思移轉至如何處理那些套用中央標準即可算是「名符其實」的右派，而不再去積極地自行摸索、查找「隱而不顯」的潛伏右派。運動方被炒熱的氣氛可能會因此冷卻下來。

另外，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下頒後，如前所述地，1957年秋冬，被中共打為右派的人數仍持續攀升，甚至有更猛的趨勢。這固然最主要與運動擴大範圍有關，但也突顯出在引導運動上，該〈標準〉所起作用的有限。薄一波對此的解釋為：該〈標準〉中雖有正確的內容，「但在當時強調反對『右傾情緒』的氣氛下，卻是很難做到」。^[2-231]但是更重要的原因，恐是該〈標準〉無法克服的內在缺陷——中共在運動中採取的是「以言治罪」的辦法，鄧小平對於右派定罪的標準，無論制定得再怎麼細密，也有讓各級經手黨幹主觀詮釋的餘地與隨意曲解的空間。

該〈標準〉對於應劃分右派分子的規定有六點：一、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反對民主集中制；三、反對共產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四、以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團結；五、組織和積極參加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小集團等；六、為前述右派分子出主意，拉關係，通情報等。其各點下面雖再列有一些細項，但仍都是抽象性的原則。鄧小平在該〈標準〉中還別出心裁地用負面表列的方式，規定出六種「其錯誤應予批評糾正，但不應劃為右派分子」的情形。^[2-232]但也存在類似的問題，也就是內容有模糊性，最後只能端賴單位主官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鄧的「美意」自然也大打折扣。

其次，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對於劃定右派問題，手握「生殺大權」，能夠審定下級機關報送請求批准的運動「戰果」。

除非是毛澤東直接關注的對象（其多半是著名人士，為數不多），作為中央書記處之首的鄧小平，具體到特定的部門與人士時，通常可一錘定音。例如：與毛澤東認識多年的丁玲、馮雪峰，其之「入罪」，非得毛首肯不可；^[2-233]但是以丁玲為首的「集團」，其成員人數的多寡，鄧小平可拍板決定。^[2-234]在新華社國際部副主任李慎之是否應被劃為右派的問題上，社長吳冷西本來想試圖保住李，不料在開會時，鄧小平拿出資料向與會者表示：「請大家看看有關李慎之的這份材料，對這樣嚴重的右派言論，新華社還有人說李慎之是位很有才華的好同志而不是右派分子。大家說說，李慎之究竟該不該被定為右派分子？」吳冷西只好噤聲。李慎之在

鄧的發話下即被劃作右派。^[2-235]由於毛、鄧關注面寬窄的不同，甚至可以說，在運動中由鄧小平圈定認可右派的範圍與人數，恐比毛澤東還廣、還多。^[2-236]

從「共青團」所屬的《中國青年報》劃右派問題上，也可見鄧小平「一言九鼎」的權威。^[2-237]《中國青年報》在運動鼓勵「鳴放」階段，在社長兼總編輯張黎群的身體力行下，提出不少前衛、甚至挑戰性的觀點。「反右」開始後，該報一下子淪為所謂的運動「重災區」，張黎群更成為團內運動積極分子的眾矢之的。在鄧小平的主持下，中央書記處也對張黎群的問題進行了討論。

由於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事前曾求見鄧小平替張黎群說項，甚至予以保證，多少對鄧造成了影響。^[2-238]再加上，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與張熟識，了解其為人，在向中央書記處匯報時也刻意對張保護，例如：中央書記處討論張案過程中，對於張黎群被指控會公然表示「我們的報紙不能當作傳聲筒、翻版書、留聲機」一事，鄧小平詢問道「他〔張〕怎麼能這麼說呢？」，胡耀邦機警地為張緩頰：「這是糊塗俏皮話，意思是報紙不能辦得上面怎麼說，下面也怎麼說。」鄧小平聞後表示：「這是個糊塗人，總編輯就不要當了。」^[2-239]最後，張黎群雖受黨內嚴重警告、並被撤銷團中央常委職務，但畢竟倖免被打成右派。

「共青團」內的運動積極分子本不願對《中國青年報》鬆手，還是硬要喊打，直至鄧小平做出如下表示：「對於《中國青年報》，大家有些意見是對的，但是要說清楚，報紙沒有照右派、照資產階級方向去辦。」^[2-240]事情方告平息。否則，團內因運動而被整的人數只會更多。時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克實後來就語帶感謝地表示：「57年《中國青年報》問題那麼大，還是總書記保護過了關。」「文革」期間，紅衛兵即批判鄧「庇護《中國青年報》過關」。^[2-241]

從鄧小平口中「虎口餘生」的幸運者，張黎群自應不是唯一的案例；但是經鄧親自認可而墜入右派「深淵」者如中央高級黨校報送的蕭魯、新華社的李慎之，必然也不在少數。由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定案的右派案例，又會被下一級黨委當作「標桿」，亦即成為其在審議相關政治嫌疑犯應否被劃為右派時的重要依據。^[2-242]

右派的處理問題

右派被揪出以後，後續的問題就是如何將之處理和懲治。對於右派的處理，運動的首要執行者鄧小平也扮有重要的角色。

前文提及在7月青島會議結束後，鄧小平就指示相關各部要在規定時間

提出處理右派的方案。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的〈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中表示：「對於右派分子的處理，原則上應該是嚴肅和寬大相結合。政治上思想上要鬥透，處理上則不宜過分，以便對右派分子繼續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寬大無邊，混淆了敵我界限和是非界限。在這個問題上，必須注意掌握分寸。」^[2-243]他在該全會的總結發言中，針對右派處理的問題，也重申其原則是「政治上鬥透，處理上則不宜過分」。中共規劃要將一部分右派送去勞動教養或監督勞動，而對其多數則要比較寬大。^[2-244]然而，這畢竟只是原則性的意見，尚缺具體的內容與辦法。

由於八大「民主黨派」與相關的民主人士，是最早經歷「反右」政治風暴的群體，或是「早揭發，早處理」，10月14日，鄧小平首先即針對民主黨派內的右派，以及在政府各系統內任職、參政而在運動過程中被打為右派的民主人士的處理問題，進行研議。^[2-245]鄧小平這時也直接介入處理文化菁英界的右派，例如：「丁陳反黨集團」相關人員的處理問題，即是周揚請示鄧小平後才開始予以安排的。^[2-246]

由於鄧小平在青島會議後曾規定中共相關部門須在12月繳交有關右派處理問題的方案，後者自不敢對鄧總書記的指示有所怠慢。12月初，統戰部、中宣部以及北京市委各自向中共中央如期報送其主管範圍下主要右派的處理方案：統戰部針對的是民主黨派人士中的右派，中宣部處理的是文藝、新聞、出版界的右派，北京市委則處理首都高等院校教師中的右派。鄧小平對此甚為重視，在12月3日、4日、5日、7日密集地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有關部門提交的右派處理方案。^[2-247]

鄧小平何以不惜時日地為此連天開會討論？因為相關右派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與社會影響，各界對其被中共劃為右派後何去何從的問題，乃甚為關注。鄧希望對這些響噹噹的右派做到恰如其「罪」的處置，使其「罪有應得」外，也能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另外，相關右派的處理，鄧也將之作為所謂的「標兵材料」，亦即可供其他各級單位在處理右派時加以比照、參考的「樣品」。

12月8日的近午，鄧小平參加毛澤東召集的有黨內高幹與二十餘位民主人士參加的會議。毛澤東在會中針對右派的處理問題表示：第一，「對右派分子要有所處分，不處分不足以平民憤」；第二，為了爭取中間分子、分化右派，所以「還要留點情，不可太嚴」。然而，毛也強調：對右派的處理，「不是寬大無邊，取消他們的職務，降他幾級，是寬大有邊的」。^[2-248]毛澤東所言的「寬大有邊」，其「寬大」的邊界尺度確實為何、又如何具體安置政策上體現的問題，代表中共中央負責其事的人，即是連日開會忙於敲定京畿地區右派名人處分內容的鄧小平。中共中央〈關於國家薪給人員、民主黨派、高等學校學生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原則〉

即由鄧小平主持討論制定。^[2-249]無怪乎大右派章伯鈞的女兒就曾語帶戲謔地表示：「發落右派的各種原則和招式，可都是鄧大人一手制定和操辦的。」^[2-250]白魯恂也指稱：遣送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右派到農村進行勞動，正是出自鄧小平的倡議，並為毛澤東所採納。^[2-251]

右派最後多被調離原職、降低待遇，甚至被迫遠走他地，不但生理上要承受勞動改造的強力負荷，心理上也必須忍受淪為政治異類後得面對的壓抑與疏離。在後來諸多的政治運動中，右派自身，甚至連帶其親友也常被拋出來作為批判的標靶，這種情形在「文革」中更是發展到極致。

小 結

從正文的討論，可以對鄧小平在中共整風、「反右派」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責任，做一整理和總結。

首先，鄧小平在運動中是處於「毛之下，他人之上」的地位和分量的。

無庸置疑地，整風的醞釀、型態、發起，到「反右」的發動與發展，都是由毛澤東親自掌控。在運動過程中，中共中央每發出的關鍵性指示，即常由毛親自起草，其對運動之主導性，由此可見一斑。鄧小平在同樣涉入毛主席的相關決策外，更實際領導和推動運動的發展，比其他中央常委發揮更大、更實質的影響力。

因為整風本來旨在整黨，鄧小平身任黨中央總書記，本以料理黨務為主要職責，對於黨自身的除弊與建設，自是責無旁貸。轉入「反右」後，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一方面銜命於毛，調動黨機器（中央部門與地方黨委）對黨外右派施以回擊、開展全民整風；另一方面，也不放鬆黨內整風，對黨內的右派力求除惡務盡。鄧小平與運動的關係，可以說是在毛澤東「單線領導」下的「專案負責」，從文中可見鄧小平在運動期間相當地活躍：擬文件規劃政策、審社論引導宣傳；開大會鼓動要員、聽匯報插手單位；掌號令電傳全黨、奔各地驅動四方。

相形之下，其他常委多是在旁建言，或是當涉及其分管業務時方有所表示，例如：在黨內主管統戰與知識分子工作的周恩來，對運動在相關領域的進展經常過問、保持關心，甚至協助鄧小平制定有關的政策文件如中共中央〈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然而，在劃定右派上，周對個別人士的伸以援手，卻經常出現失靈、不算數的情形。^[2-252]貴為中共第二號領導人的劉少奇，在運動期間常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批准鄧小平主持制定的運動工作部署與中央文件，然究其實質，由於鄧對運動的安排多直接源於毛澤東的指示與指導，劉對之主要扮演的是程序認可

而非內容考核的角色。

不可忽視的是，鄧小平對運動的統籌執行：上有指令，鄧結合具體情況加以下達；下有新情，鄧過濾盤整再予以上傳。在上令下達與下情上傳之間，鄧小平個人確能享有不小的仲裁空間。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對運動縱有「雄才偉略」，沒有鄧小平從中的佈置落實，難免走樣；置身運動、對之動向最為熟稔的鄧小平，若未據實以告、適時反饋，毛澤東與中共中央要善行領導，恐怕也是問題。鄧小平在運動中的表現，特別是令到行止、風行草偃的組織長才，毛澤東甚為欣賞與滿意。

毛澤東在運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後，於1957年11月前往蘇聯訪問。毛不但指定鄧小平隨同前去，他在向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介紹中共高層人士時，也唯獨對鄧讚譽有加。^[2-253]可見經由1957年整風、「反右派」的考驗，鄧小平在毛澤東心目中的地位益加鞏固。不久周恩來、陳雲等國務院主要負責人因「反冒進」問題遭毛澤東嚴斥、「打入冷宮」，毛決定要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讓黨凌駕在政府之上，親掌經濟計劃與發展的工作。在整風、「反右派」期間，領導中央書記處有力動員與高效操控黨官僚與機器的鄧小平，自是毛認為可襄佐自己的不二人選，一同指揮1958年發起的「大躍進」運動。

其次，鄧小平對於「反右派」鬥爭激化負有直接的重大責任。

如前所言，鄧小平在運動中是毛澤東之下的第二號人物，「反右」的炮火鋪天蓋地，數十萬人被扣上右派帽子並無辜受害，^[2-254]鄧小平的責任當然也僅次於毛。就運動的指導思想而言，整風、「反右派」的決定者是毛，或可以說按照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和紀律，鄧自我倡議的空間較小

（姑且不論鄧在相關問題上可能與毛是「英雄所見略同」，^[2-255]甚而在資訊提供、情勢研判上，印證、強化毛基於階級鬥爭思維的主觀判斷）；就運動的實際領導而言，鄧小平管得具體、問得詳細（毛關注的主要是運動大方向以及若干頭面人物的動態），對運動的推進、以至擴大都有獨到的「貢獻」。

在運動的過程中，鄧小平往往是替運動打氣加油、催油加速的。揮兵「反右」上，常見鄧小平態度亢進、言語激越，例如：「引蛇出洞」期間，指出「時間比黃金還寶貴」，要各省黨人趕緊回省內收集「離經叛道」的言論以利秋後算帳；展開「反右」後，不厭其煩地強調「放長線釣大魚」、「大魚在後面才能出來」，要運動再深入。以鄧小平在運動中「二把手」的地位，他代表中央所做的相關言行，確可對運動造成推波助瀾的效果。

持平而論，鄧小平也曾對運動稍作抑制。在「反右」開始約一個月後，鄧小平在7月11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即曾談到注意運動擴大化的問

題，要求給各地打招呼。^[2-256]然而，鄧縱使做出「煞車」指示，也模稜兩可。他在隔日的統戰工作會議上雖表示：「前一時期右派排得太少了，現在要防太多，太多不好，太少也不好。」^[2-257]然何謂太多、太少？也沒有清楚的界定。這反映鄧小平欲引導運動但又不願潑其冷水、使之降溫的矛盾心理。更何況，隨著運動朝激化的方向發展，還是「多多益善」為好，就鄧後來與聞中央高級黨校的例子來看，單位領導人若太保守，猶有被批評思想右傾的風險。

另外，鄧小平雖提出避免運動擴大化，並在實際行動上同意採取如樹立「中右」標兵的辦法，以免有類似言論的人士被劃成右派。^[2-258]然而，他卻沒有提出任何違反相關主張的懲處辦法，易言之，一項沒有制裁規定配套的要求，在政治運動「寧左勿右」的慣性下，實質上僅是一不甚認真的勸說。這不正與毛澤東當年在延安發起搶救運動前，空口聲稱反對「逼供信」如出一轍嗎？

應予指出的是，鄧小平確曾在運動的局部方面提出保護性措施，如對自然科學界。鄧小平在8月23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中指示：「對有些科學家，特別是有建樹的真正的自然科學家，有科學水平的，只要不搞政治活動，中央確定採取不鬥、講清楚的辦法。」^[2-259]9月2日，鄧小平在審閱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的文件時，加寫：「特別是對於那些有重大成就的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鬥不可者外，一律採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2-260]鄧小平也同意國務院專家局局長齊燕銘的建議，不在歸國留學生中劃右派，並向全國發通知。^[2-261]對於醫學專家所遭受的批鬥，鄧小平亦會伸以援手。^[2-262]然而，這「熱中有冷」只限於學有專精的特定人士，而且僅係運動已釀就巨大衝擊後所做的小部分緩衝。

在整風運動席捲中國大陸各領域與部門的同時，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基石與最後保證的軍隊自不可能置身事外，中共中央也要軍方高層採取整風的方式檢查自身的工作。中共解放軍數年來側重學習蘇聯軍隊經驗，走火的情況與偏差的程度有多少？中共在軍事領域中，能否像其他領域嘗試找出有別於蘇聯的發展模式與經營特色？中共中央對軍隊整風予以密切的關注與指導，最後更演變成鄧小平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主持「整軍」的局面，這是下一章討論的課題。

注釋

[2-1]「赫魯雪夫」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通常將之翻譯作「赫魯曉夫」，「史達林」在中國大陸和香港通常分別翻譯作「斯大林」、「史太林」。

[2-2]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表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

以為戒。」〈論十大關係〉，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7卷，頁23。

[2-3]李慎之：〈胡喬木在1956–1957年的「右派言論」〉，《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頁75。

[2-4]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序1–3，頁4–8、19–34。如同審稿人所強調的：中共在延安推行的整風運動，其一重要目的與面向是在黨內高層中，樹立毛澤東個人的政治權威，以及確立「毛澤東思想」獨一無二的最高指導地位。

[2-5]鄧小平在1957年相關運動中發揮重要影響力的職位，有一種頗為普遍的說法是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反右領導小組」的組長或主任。持相關看法的著作如有：丁抒：《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香港：開放雜誌社，2006），頁I。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 Y.: M. E. Sharpe, 1998), p. 141. 作者曾就此問題訪問四名中國大陸的中共黨史研究者（A君、D君、E君、F君），得到的回應包括：「未曾聽過」或沒有此一小組的設置。（2006年8月；2007年1月）本文傾向於後者，因為鄧小平身為中央總書記，即可經由中央書記處對運動予以籌策、指揮以及調度。

[2-6]〈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載《毛澤東文集》，第7卷，頁210–211。

[2-7]〈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毛澤東文集》，第7卷，頁273–274。

[2-8]〈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毛澤東文集》，第7卷，頁274–275。

[2-9]此出自1956年9月24日毛澤東與前來參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代表團的講話。

〈吸取歷史教訓，反對大國沙文主義〉，載《毛澤東文集》，第7卷，頁121。

[2-10]有關鄧小平在整風醞釀階段的態度，論者之間有不同的觀點。胡績偉認為：對於毛澤東的新政策，鄧小平和劉少奇一樣保守。古德曼認為：鄧小平與毛澤東對於整風有著不同的理念，鄧主張在黨內展開整風，並建立公眾監督中共活動的機制；毛主張用群眾動員。楊炳章認為：鄧小平保持著謹慎的中立，靜觀事態的進一步發展，摸清毛澤東的真實思想。馬若德則指出：鄧小平強力支持毛澤東倡議的「雙百」方針，在整風運動的方式上想法一致。本章在這問題上的看法與馬若德相近。見胡績偉：《胡績偉自述（1953–1976）》（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第2卷，頁89。David S. G. Goodman,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4), pp. 57–59. 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p. 139.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p. 178, 191.

[2-11]〈鄧小平在清華大學的講演〉（1957年1月12日），載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北京：1967年），第2集，頁4–19。

[2-12]〈鄧小平在清華大學的講演〉（1957年1月12日），載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北京：1967年），第2集，頁11、13。

[2-13]丁抒的著作中表示：鄧小平在清華大學演講時，因用詞凌厲，不少學生因而退場。校黨委書記兼校長蔣南翔見狀喝斥：「你們對小平同志什麼態度，小平同志也是留學生……」載丁抒：《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頁223。作者曾就此詢問當年接待鄧小平來校演講的阮銘（時任「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清華大學委員會書記），他在演講會場，卻無此記憶，並指出：中央總書記來校演講，事屬新鮮，學生對此好奇，沒有對鄧小平看不起的情形。當時的學生很單純，鄧小平的演講頗有效果，之後校園逐漸恢復平靜，直到毛澤東發起整風。（台北，2006年11月22日）鄧小平至清大視察、演講的情況，可參閱：阮銘：《中共人物論》（紐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3），頁63–64。

[2-14]中共北京市委：〈鄧小平同志對北京市的關懷和激勵〉，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20。

[2-15]2月13日、16日，浙江省政府委員、中國民主同盟浙江省副主任宋雲彬，在浙江政協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傳達鄧小平的相關報告。宋後來被打為右派。宋雲彬：《紅塵冷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頁446。

- [2-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1348–1349。
- [2-17]中共山西省委胡富國：〈山西人民永遠懷念小平同志〉，載《回憶鄧小平》，下冊，頁76–77。
- [2-18]鍾文、鹿海嘯編著：《百年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上卷，頁251。
- [2-19]鄧小平：〈共產黨要接受監督〉，載《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卷，頁270–271。
- [2-20]鄧小平：〈共產黨要接受監督〉，頁272–273。
- [2-21]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頁41。
- [2-2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56–1357。
- [2-23]人民日報編輯部：〈鄧小平與人民日報〉，載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組織委員會編：《鄧小平百週年紀念——全國鄧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下冊，頁2053。
- [2-24]自1957年6月接替鄧拓出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吳冷西，在「文革」中曾揭發鄧小平：「1957年夏天，毛主席決定我到《人民日報》工作後，鄧小平會為此召集《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負責幹部開了一次會。他在會上一面宣佈我到《人民日報》任職，一面又說鄧拓過去的工作是有成績的，雖然也有缺點與錯誤，但成績還是主要的，因此仍然留在《人民日報》擔任社長。鄧小平對鄧拓的這種估計，是同毛主席唱對台戲的。毛主席當時如何批評鄧拓，我那時還不知道，是胡喬木在後來告訴我的。我在鄧拓留在《人民日報》工作期間，就是根據鄧小平的這種估計，開始我只管版面，社論仍由鄧拓負責，後來鄧拓說他不了解中央意圖，把社論交給我。但我仍然求他管五、六版。直到鄧拓離開《人民日報》時，我在歡送會上仍然根據鄧小平的看法為鄧拓吹捧了一番。這也是錯誤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吳冷西關於劉少奇罪行的供詞〉（1968年6月），載國防部情報局叢書編輯委員會：《劉少奇問題資料專輯》（台北：國防部情報局，1970），頁609。在整風運動期間，鄧小平確實常就《人民日報》社論問題與鄧拓往來。
- [2-25]〈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1957年4月27日），《人民日報》，1957年5月1日，版1。
- [2-2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58–1359。
- [2-2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上冊，頁67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59–1360。李維漢：《回憶與研究》（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下冊，頁831。
- [2-28]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者（D君）提供的訊息。（北京，2007年1月）
- [2-29]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頁833。
- [2-30]毛澤東：〈關於注意閱讀整風消息的批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6冊，頁468。
- [2-31]〈廣西省平樂專區和橫縣大批餓死人的情況〉，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總第2180期，1957年4月16日，頁3–6。
- [2-3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40。
- [2-3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40–1341。
- [2-34]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趙富林：〈壯鄉人民永遠懷念敬愛的鄧小平同志〉，載《回憶鄧小平》，下冊，頁296–297。
- [2-35]〈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嚴肅處理廣西因災餓死人事件，廣西省委第一書記陳漫遠和副省長郝中士蕭一舟受到撤職處分〉，《人民日報》，1957年6月18日，版2。〈去年廣西因災餓死人事件是怎樣發生和怎樣處理的？〉，《人民日報》，1957年6月18日，版2。
- [2-36]在1954年的推廣米糠榨油的問題上，章乃器表示贊成，而與時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的鄧小平之間有所歧異，鄧下令停止有關政策的推行。「反右派」開始後，章對相關問題的抱怨與批評，被控作是「對黨和上級領導進行惡毒的攻擊，污衊中財委停止推廣米糠榨油的措施，是以『行政命令代替科學』」。〈章乃器的工作經得起檢查嗎？糧食部揭發他苦心孤詣地污衊黨的領導、打擊黨的組織、辱罵黨的幹部〉，《人民日報》，1957年

8月14日，版2。

[2-37]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台北：允晨文化，2001），頁88-94。

[2-3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下卷，頁634-635。

[2-39]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553。

[2-4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6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中卷，頁382。

[2-4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第10冊，頁272-273。

[2-4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63、1365。《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90-69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卷，頁403。《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83。

[2-43]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559。

[2-44]〈鄧小平與人民日報——寫在鄧小平同志誕辰100週年之際〉，《人民日報》，2004年8月18日，版5。

[2-45]〈繼續爭鳴，結合整風〉，《人民日報》，1957年5月19日，版1。

[2-4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68。〈怎樣保證整風和工作兩不誤〉，《人民日報》，1957年5月27日，版1。

[2-4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69。〈能解決的問題要馬上解決〉，《人民日報》，1957年5月31日，版1。

[2-48]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5月18日曾致信鄧小平表示：「新華社朱穆之同志送來兩個消息，我考慮之後，認為此事已在廣東發表（新聞未發，但陶鑄同志有一篇很長的演講登《南方日報》，其中說了這件事），可以不必在全國發表。這件事，激動人心。現在群眾反官僚主義鬥爭不是沒有起來，而是已經起來。右派現在是猖狂到發瘋的地步，不需火上加油。所以我意以為不發消息，而發《內部參考》為好。如何？請決定後告朱穆之同志。」鄧小平批示：「同意定一同志意見，退朱穆之同志。」〈陶鑄和劉鄧早就串通一氣〉，載西安地區大中院校文革統一指揮部西軍電（臨）西北工業大學文革委員會、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西軍電紅衛兵總部、西工大紅衛兵總部主辦：《新軍電、西北工大合刊》，第52期、第73期，1967年9月13日，版2。

[2-49]《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83。

[2-5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37。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1906-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448。

[2-5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65-1366。

[2-5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66。

[2-53]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19。

[2-5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68。

[2-5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中卷，頁45。《劉少奇年譜》，下卷，頁403。

[2-5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67-1368。

[2-57]《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96-697。

[2-58]《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697。

[2-59]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06。

[2-60]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06-607。

[2-61]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07。

[2-62]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07。

- [2-63]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07。
- [2-64]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頁149–150。
- [2-65]〈鄧小平同共青團省、市委書記的談話〉（1957年5月31日），載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頁31。
- [2-66]〈鄧小平同共青團省、市委書記的談話〉（1957年5月31日），頁30。
- [2-67]〈鄧小平同共青團省、市委書記的談話〉（1957年5月31日），頁35。
- [2-68]〈鄧小平同共青團省、市委書記的談話〉（1957年5月31日），頁34、35。
- [2-6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0。
- [2-7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0–1371。鍾灝編著：《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縱覽（1938–1965年）》（北京：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頁301。中共遼寧省委顧金池：〈高瞻遠矚情繫遼寧〉，載《回憶鄧小平》，下冊，頁92。
- [2-7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1。
- [2-72]〈中共中央關於加緊進行整風的指示〉（1957年6月6日），《反右文件》，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特殊館藏，頁8–9。
- [2-73]《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頁289。
- [2-74]《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冊，頁285。
- [2-75]1957年5月25日，國務院秘書長助理盧郁文在民革中央的座談會上指出：有一些人提的意見有擺脫中共領導的意思，主張中共與黨外之間的「牆」應由雙方面共同來拆，並批評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鈞所提之「政治設計院」的主張。之後，盧郁文收到匿名信恐嚇。盧在6月6日公開宣讀此信。毛澤東認為此事恰巧提供一個機會，正式對右派發動反擊。載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頁39–40。
- [2-7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1。《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85。《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50。
- [2-7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2。
- [2-78]中共廣東省委謝非：〈廣東人民永遠懷念小平同志〉，載《回憶鄧小平》，下冊，頁278。當代廣東研究會編：《嶺南紀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頁108。
- [2-79]〈叩訪富強胡同六號〉，博訊新聞網：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5/01/200501301027.shtml>（2011年9月登入）
- [2-80]張文澄口述，李暢培記錄整理：〈我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紅岩春秋》，1999年第3期，頁59–63。
- [2-8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53。《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頁38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吳殿堯主編：《朱德年譜》，新編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下冊，頁1613。
- [2-82]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山東省志·大事紀》（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中冊，頁730。
- [2-83]龔士其主編：《楊獻珍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227–228。
- [2-8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2。
- [2-85]杜光：〈中央高級黨校反右派內幕〉，《炎黃春秋》，2005年第9期，頁3。
- [2-8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3。
- [2-87]李輝：〈與張光年談周揚〉，學術中國網：<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029>（2007年5月登入）
- [2-88]黎之：〈回憶與思考——整風、鳴放、反右〉，《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1期，頁100。
- [2-89]此事乃涉及丁玲與周揚多年的個人恩怨，以及周揚欲藉打擊在「作協」內頗孚人望的丁玲，以掌控「作協」的權力考量。載陳徒手：《人有病天之否：1949後中國文壇紀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頁115–117。
- [2-90]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修訂版（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頁382。
- [2-91]李輝：〈與李之璉談周揚〉，學術中國網：<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031>（2007年5月登入）

- [2-92]郭小蕙整理：〈郭小川日記（1957中）〉，《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3期，頁155。
- [2-9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6。
- [2-9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6–1377。
- [2-95]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頁194。郭小蕙整理：〈郭小川日記（1957中）〉，頁155–156。
- [2-9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8。〈鬥爭正在開始深入〉，《人民日報》，1957年7月8日，版1。
- [2-9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8–1379。
- [2-9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9。
- [2-99]〈鄧小平抹煞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黑話〉，載雲南衛生系統八二三戰鬥兵團、昆明市衛生系統八二三白求恩兵團合編：《白求恩戰報》，第19、20號，1967年10月27日，版8。
- [2-10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79。
- [2-101]〈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7年7月12日），《反右文件》，頁23、25。
- [2-102]〈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7年7月12日），《反右文件》，頁23–24。
- [2-103]〈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7年7月12日），《反右文件》，頁27。
- [2-104]〈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8。
- [2-105]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7月2日。載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27。
- [2-106]鄧小平在「反右」開始僅一個月的時間，下令報紙擴大點名批判右派的作法，乃是為了保持，甚而增強此一政治運動的動力。因為報紙上增加對右派人數的批判，一方面，可讓中共各級幹部感到右派數目並非個別、零星，顯示相關敵情頗為嚴重，對之要提高警覺、不能小覷；另一方面，報上批判的方式與揭露的內容，也可供中共各級幹部參考、仿效，進而而在其所轄單位內進行對右派的挖掘與追緝。
- [2-107]〈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8。
- [2-108]張國星：〈關於右派的人數和性質〉，《黨史博覽》，2005年第6期，頁50。
- [2-109]〈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4。
- [2-110]〈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6。
- [2-111]〈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9。
- [2-112]〈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6。
- [2-113]〈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7。
- [2-114]〈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9。
- [2-115]中共重慶市委張德鄰，〈鄧小平同志與重慶〉，載《回憶鄧小平》，下冊，頁329。
- [2-116]〈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9。
- [2-117]〈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8。
- [2-118]錢偉長與費孝通在1957年的整風運動中淪為右派，其之批判與處理，主要經由鄧小平之手。然而，1986年，當年也被打作右派的劉賓雁計劃在隔年舉行紀念「反右」三十周年的大會，錢偉長、費孝通聞訊後竟向中共中央揭發劉的相關計劃。1986年12月30日，趙紫陽將此事報告鄧小平。鄧大怒，當場表示要開除劉的黨籍，並表揚錢、費。Ruan Ming, 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 166.
- [2-119]〈北京市委7月5日鄭天翔傳達鄧小平整風報告〉，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北京：1967），頁20。
- [2-120]〈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4–25。
- [2-12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543–544。
- [2-12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1。
- [2-12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1。
- [2-124]章詒和：《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頁65–68。

- [2-125]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32–633。
- [2-126]《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715。
- [2-127]〈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1957年8月1日），《反右文件》，頁33。
- [2-128]《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716。
- [2-12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3–1387。
- [2-130]〈鄧小平同共青團省、市委書記的談話〉（1957年5月31日），載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頁34。
- [2-131]〈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頁29。
- [2-132]〈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1957年8月1日），頁34。
- [2-133]龔士其主編：《楊獻珍傳》，頁229。
- [2-134]杜光：〈中央高級黨校反右派內幕〉，頁5。
- [2-135]7月24日上午，鄧小平又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侯維煜匯報該校的整風情況。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1–1382。
- [2-136]杜光：〈中央高級黨校反右派內幕〉，頁6。在楊獻珍的官方傳記中，雖然同樣提到此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以及會上對楊獻珍等人領導中央高級黨校運動不力而予以批評的情節，但是卻有意隱去了會議主持者鄧小平與彭真的姓名。龔士其主編：《楊獻珍傳》，頁233。
- [2-137]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66。
- [2-138]杜光：〈中央高級黨校反右派內幕〉，頁8。
- [2-139]龔士其主編：《楊獻珍傳》，頁234–235。
- [2-140]郭小蕙整理：〈郭小川日記（1957中）〉，頁163。
- [2-141]據郭小川在1957年8月2日的日記：「據說，定一同志請示小平同志，他主張後天就登報。這事，實在是夠緊急了。」郭小蕙整理：〈郭小川日記（1957中）〉，頁165。
- [2-142]〈文藝界反右派鬥爭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人民日報》，1957年8月7日，版1。
- [2-143]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頁223。
- [2-144]郭小蕙整理：〈郭小川日記（1957中）〉，頁168。
- [2-14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7。
- [2-146]〈為保衛社會主義文藝路線而鬥爭〉，《人民日報》，1957年9月1日，版1。
- [2-147]〈鄧小平對共青團省、市委書記會議的黑指示〉（1957年9月3日），載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頁37。
- [2-14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7。
- [2-149]〈中共中央關於嚴肅對待黨內右派分子問題的指示〉（1957年9月2日），《反右文件》，頁36–37。
- [2-150]鄧小平在稿中加寫：「在運動中，對於一個黨員應否劃為右派分子，應該同黨外人士應否劃為右派分子一樣，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對於黨齡較老的黨員尤其應該如此」等內容。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7。
- [2-15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90。
- [2-152]〈嚴肅對待黨內的右派分子〉，《人民日報》，1957年9月11日，版1。
- [2-153]中國大陸資深學者（G君）提供的資訊。（香港，2007年1月）
- [2-154]〈中共中央關於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人民日報》，1957年8月10日，版1。
- [2-15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4。
- [2-15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5。
- [2-15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9。
- [2-158]〈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多數〉，《人民日報》，1957年9月5日，版1。
- [2-15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9。
- [2-160]〈中共中央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1957年9月4日），《反右文件》，頁37–38。

- [2-16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91。
- [2-162]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58–659。
- [2-163]〈中共中央關於在工人、農民中不劃右派分子的通知〉（1957年9月4日），頁38。
- [2-164]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10月19日，版2。
- [2-165]〈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1957年8月1日），頁33。
- [2-16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9。
- [2-167]《劉少奇年譜》，下卷，頁406。《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76。《朱德年譜》，下冊，頁1625。
- [2-168]〈中共中央負責同志深入工廠，細看大字報重視職工意見〉，《人民日報》，1957年9月27日，版1。
- [2-169]胡喬木回憶：「本來是全黨整風，反右鬥爭一來打亂了，以後重新進行整風，在工廠農村中提出許多積極的批評意見。這對1958年大躍進有很大關係。毛主席認為，整風激發了群眾的積極性。他在上海看了工廠的大字報，非常興奮，感到群眾真正發動起來了……。」〈關於寫作《回憶毛澤東》一書的設想〉，載《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86。
- [2-17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90。
- [2-171]〈中共中央關於在企業中進行整風和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人民日報》，1957年9月13日，版1。
- [2-17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91–1392。
- [2-173]〈共產黨員要顧全大局——訪中央紀委機關黨委原副書記李繼偉〉，載李海文、王燕玲編：《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頁242–243。
- [2-17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14。
- [2-175]〈關於工業企業的整風問題——李雪峰同志在1958年1月20日在遼寧省委工業企業整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2，案卷號144，頁1。
- [2-176]〈李雪峰同志在省市工委工業書記會議上的發言〉，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1，案卷號27，頁72。
- [2-17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97。
- [2-178]毛澤東：〈對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稿的批語和修改〉，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頁584。
- [2-179]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版1。
- [2-180]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版1。
- [2-181]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版1。
- [2-18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94–1395。〈下決心整頓作風改進工作〉，《人民日報》，1957年9月30日，版1。
- [2-183]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50。
- [2-184]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
- [2-185]〈天津各界人士對鄧小平同志報告的反應〉，《內部參考》，總第2343期，1957年10月26日，頁7。
- [2-186]〈濟南市幹部、群眾對鄧小平同志報告的反應〉，《內部參考》，總第2344期，1957年10月28日，頁4。
- [2-18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冊，頁521–522。
- [2-188]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版1。
- [2-189]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版1。
- [2-190]阮銘回憶：彭真當面對之指示，要力邀錢偉長出席校園內學生的演講活動；並將其講話加以筆記與錄音。（台北，2006年11月22日）
- [2-191]〈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蔣南翔罪惡史：屈膝投降漏網的大右派〉，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第81期（1967年9月6日），版4。
- [2-192]根據郭小川在10月12日的日記：「聽三中全會的傳達，今天是傳達鄧小平同志關於整風的報告，講了七個問題，突出的印象是右派分子原則上一律開除黨籍，在民族地區反

- 對民族主義，整個是很精彩的。」郭小蕙整理：〈郭小川日記（1957下）〉，1999年第4期，頁53。
- [2-193]〈天津各界人士對鄧小平同志報告的反應〉，頁7。
- [2-194]〈濟南市幹部、群眾對鄧小平同志報告的反應〉，頁4。
- [2-195]〈《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真理報》摘要發表〉，《人民日報》，1957年10月25日，版1。
- [2-196]國民黨相關分析指出：「鄧匪的報告，是可以代表匪黨整風運動的情況報導，也可以透露匪黨對於整風運動未來的若干措施和策略。」「因為匪黨的『整風運動』，現在已不限於匪黨內部，而是包括了大陸上各個階層，沒有一個人不捲入這個風暴裏。這是關係大陸每個階層，乃至各個人的未來命運的一個『報告』，所以有詳加分析的必要。」「共匪提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繼之『整風』、『鳴放』，在它的俄化道路上，具有兩個目的，一個目的是想借『整風』、『鳴放』來緩和它和大陸各階層人民之間的矛盾對立，對各級匪幹的作風作若干的修正，從而誘騙大陸人民，以減少其進行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阻礙；另一個目的則是藉以測探大陸人民的反共情況，從而發掘反共思想和反共人士而予以鬥爭清除。就鄧匪的報告內容看，共匪會後『整風』的方向，仍舊沒有脫出上述的範疇。」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印：〈共匪「黨外整風運動」的實質〉，《專題研究》，第38期，1957年12月9日，頁1-2、14-15。
- [2-197]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48。
- [2-19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42。
- [2-199]1958年4月，毛澤東說全國右派有30萬。1959年中共中央文件披露右派「約45萬人」。1980年中共對此進行改正時，複查統計全國劃有右派55萬人。載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61。
- [2-20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56-1357。
- [2-201]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49。
- [2-202]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55。
- [2-203]〈彭真同志在省市工業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1，案卷號27，頁78。
- [2-204]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55-656。
- [2-205]毛澤東：〈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二）〉，載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毛澤東思想萬歲（1958-1960）》（台北：1974），頁78-79。
- [2-206]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版2。
- [2-207]〈廣東省委舉行常委會研究反右派鬥爭的情況〉，《內部參考》，總第2311期，1957年9月16日，頁3-7。
- [2-208]〈廣東省黨內的反地方主義鬥爭〉，《內部參考》，總第2374期，1957年12月4日，頁1-20。〈廣東省黨內繼續揭露以馮白駒同志為首的地方主義集團的反黨活動〉，《內部參考》，總第2386期（1957年12月23日），頁1-14。
- [2-209]陶鑄、古大存之間的衝突，可溯及延安整風時期古曾對陶妻曾志進行過隔離審查的宿怨；中共建政後，古又曾向中共中央反映陶曾參與高崗的不法活動，如此令陶對古極為不滿。為了加強廣東省委內部的團結，1955年秋舉行一次名為「解決黨委團結問題」的會議，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與會。鄧在會上表示：「陶鑄同志是正確的，省委要團結在陶鑄的周圍。」〈文敏生與南霸天陶鑄〉，河南二七公社批鬥陶文聯絡站：《鬥陶文戰報》，第5期（1967年11月1日），版2。
- [2-210]楊立編著：《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頁179、183-184、188-189。
- [2-211]《江華傳》編審委員會：《江華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208。
- [2-212]《江華傳》編審委員會：《江華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210。
- [2-213]Keith Forster, "Localism, Central Policy, and the Provincial Purges of 1957-1958: The Case of Zhejiang,"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pp. 191–233.

[2-214]陳修良撰述，唐寶林編著：《拒絕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傳》（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頁342–343。

[2-215]江華：〈堅持黨的正確路線，爭取整風運動在各個戰線上全勝（之二）：中國共產黨浙江省委向中國共產黨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人民日報》，1957年12月28日，版3。

[2-216]〈中共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沙文漢、楊思一、彭瑞林、孫章錄黨籍的決議（1957年12月13日通過）〉，《人民日報》，1957年12月27日，版4。

[2-217]王昊、王紀一：《開國上將葉飛》（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473。

[2-218]張江明：〈階級鬥爭擴大化和廣東反「地方主義」問題——在廣東省委宣傳部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發言〉，載張江明選編：《廣東歷史問題研究——廣東「地方主義」平反研究資料》（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2000），頁158。

[2-219]溫盛湘：〈回憶所謂「地方主義」反黨小集團〉，載張江明選編：《廣東歷史問題研究——廣東「地方主義」平反研究資料》，頁248–249。

[2-220]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人民日報》，版2。

[2-22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94。

[2-222]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60。

[2-223]〈離開了共產黨的領導和漢族的幫助，少數民族就不能走上社會主義道路，雲南少數民族上層人士贊成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社會主義教育〉，《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3日，版4。〈新疆少數民族幹部中開始整風，領導虛心聽取意見努力改進工作〉，《人民日報》，1957年11月28日，版4。〈新疆伊犁自治州、伊寧市和喀什市民族幹部一致認為地方民族主義同祖國統一不相容，廣西民委開會決定批判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人民日報》，1957年12月1日，版1。

[2-224]〈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6，目錄號1，案卷號122，頁2。

[2-22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43。

[2-226]〈廣東省擬定劃分右派分子的八項標準〉，《內部參考》，總第2313期（1957年9月18日），頁17–20。

[2-227]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72。

[2-228]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頁650。

[2-22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94。

[2-230]另外兩個教訓，一是對右派進攻的形勢作了過分嚴重的估計；另一是不應把整風和「肅反」結合進行。載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41–644。

[2-23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643–644。

[2-232]〈中共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的通知〉（1957年10月15日），《反右文件》，頁45–47。

[2-233]1975年，周揚表示：「關於反右的事情，以前不能說，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們了。文藝界反右是主席親自抓的。」「批判馮雪峰、丁玲，是主席親自抓的。」載丁抒：《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頁227。

[2-234]據作家李納回憶：「在右派鬥爭進行尾聲時，劉白羽又找我談話說，鄧小平同志講了，丁陳反黨集團只劃七個人，不能再擴大化了，要不然，你們幾個人〔同丁玲關係較密切的人〕都得劃為右派。」載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頁245–246。

[2-235]作者感謝審稿人提供的資訊。

[2-236]黃克誠在1980年表示：「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但是擴大化了，錯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個負責。我那時是書記處成員之一，把有些人劃為右派，討論時未加仔細考慮就倉促通過了。自己做錯的事情怎麼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載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369。由此可見領導中央書記處的鄧小平，在

運動中劃定右派問題上具有的重大權限。

[2-237]香港政治觀察家丁望予以的提示。(香港, 2006年8月4日)

[2-238]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頁5。

[2-239]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 2006), 頁154-155。

[2-240]〈鄧小平對共青團省、市委書記會議的黑指示〉(1957年9月3日), 載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 頁38。

[2-241]〈鄧小平反毛澤東思想罪行〉, 哈爾濱林業系統紅色造反團總部主辦:《鬥私批修報》, 創刊號, 1967年10月15日, 版3。

[2-242]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直機關黨委書記的楊尚昆回憶:「中直機關在右派定案工作中還是比較謹慎的, 同『三反』運動中『打虎』一樣, 中直機關強調實事求是, 不事先規定指標, 至於具體到人, 哪個人該劃不該劃, 中直機關黨委以當時高級黨校上報的、經中央書記處批准劃為右派的一同志的材料為標桿, 對各單位上報的材料逐一反覆認真討論, 最後定案。」蘇維民:〈楊尚昆憶兼任中直機關黨委書記〉, 《百年潮》, 2009年第1期, 頁21。

[2-243]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 《人民日報》, 版1。

[2-244]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 頁650。

[2-245]《鄧小平年譜(1904-1974)》, 下冊, 頁1397。

[2-246]據郭小川1957年10月16日的日記:「9時, 到紅樓二樓開會, 討論對丁陳集團的處理問題, 周揚同志走了半小時(到小平同志處), 回來後由他主持討論到12時。決定開除幾個人, 把他們分配到下層去生活。最近就分別進行談話, 處理他們的黨籍問題。」郭小蕙整理:〈郭小川日記(1957下)〉, 頁55。

[2-247]《鄧小平年譜(1904-1974)》, 下冊, 頁1411。

[2-248]〈毛主席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紀要〉(1957年12月8日), 廣東省檔案館, 全宗號216, 目錄號1, 案卷號116, 頁1-2。

[2-249]《鄧小平年譜(1904-1974)》, 下冊, 頁1411-1412。

[2-250]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4), 頁278。

[2-251]Lucian W. Pye, "An Introductory Profile: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p. 431, 438.

[2-252]例如:周恩來曾反對將葉恭綽劃為右派, 因為其侄為時任台灣外交部長的葉公超, 周擔憂會對之造成影響; 另外, 周也曾表達出要「保」吳祖光、蕭乾的意思, 但最後卻都不成功。可見周對相關政治運動影響力的有限。夏衍:〈終身難忘的記憶〉; 蕭乾:〈兩次見到總理〉, 載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周恩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0), 頁289, 293-294。

[2-253]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1), 頁169。

[2-254]「文革」結束以後, 中共開展「撥亂反正」的工作。當年被打成右派者, 99%以上都被證明為錯案, 如此即可見「反右派」運動本身的荒謬與不合理。事實上, 中共所堅持的少數維持原判者, 是否真能站得住腳, 也不無爭議。然而, 在相關運動中位置重要、表現積極有勁的鄧小平, 卻一言定奪, 堅持認為「反右」是「必要的」, 若有可議之處就是「處理得過了, 擴大化了」。鄧小平:〈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 載《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3), 頁335。

[2-255]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站在運動第一線的李維漢晚年就表示:「對於反右派鬥爭擴大化這一失誤, 毛澤東同志從主張到部署都負有主要責任, 但當時中央認識上是一致的, 沒有提出不同意見, 他的主張得到了中央的確認。」載李維漢:《回憶與研究》, 下冊, 頁839。換言之, 就李所作的觀察, 作為中共中央一員的鄧小平, 在相關問題上與毛認識一致, 並無差異。

[2-256]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 頁638。

[2-257]〈鄧小平同志在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1957年7月12日), 頁28。

[2-258]彭真、劉仁與北京市委為了避免過多地將那些出於善意向中共提意見、但言詞尖銳

激烈的人錯劃為右派，選擇北大化學系教授傅鷹為「中右」標兵，也就是只要言論尺度不超過傅鷹，就不能劃為右派。此法經鄧小平同意後上報毛澤東批可。載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編：《劉仁傳》（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頁352。

[2-25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6。

[2-26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38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72。

[2-261]馬永順、朱雨滋、齊翔安編：《齊燕銘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頁263、451。

[2-262]錢信忠：〈憶小平同志關心醫務衛生工作〉，載《回憶鄧小平》，上冊，頁279。

第三章

領導軍隊整風（1958）

中共建政以後，隨著中蘇同盟的建立，即要求各部門與領域學習蘇聯的經驗，中國人民解放軍也透過高階將領的組團參訪與觀摩、各級人員的考察與學習，以及聘請蘇方專家與顧問等方式，全面地向蘇聯軍隊學習。學習的內容廣泛：從軍事科學、技術與作戰條例，到包含規章、制度、管理條例在內的軍隊建設。^[3-1]然而，自1956年中共強調「以蘇為鑒」後，軍隊在向蘇學習、引進經驗的過程中，有多少情況與程度是罔顧中國國情的「教條主義」弊病，便成為黨中央與軍方高層關注的議題。對於1957年有關「教條主義」錯誤的檢查與指控，軍中負責訓練工作的人員反彈尤其激烈。軍內這種針對「教條主義」問題的爭論與衝突，1958年在黨中央的強行介入下白熱化，出現一次總的爆發。

中共的整風運動到1958年已從黨政領域擴展至更大的範圍，軍隊也被納入其中。中共中央決定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軍方高層間展開一次整風，以除弊革新、激發活力。軍隊整風原本如同其他軍隊事務，主要由軍方自行主持進行，而「教條主義」問題也非原先預定的整風主題。但當時適值毛澤東要強化黨對各領域與部門的領導，以利其推行有別蘇聯發展模式的「總路線」與「大躍進」，加強黨對軍隊的掌控，令握有武力的後者更加聽命、配合黨中央，既是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讓黨心無旁騖、專心建設的一項必要前提。毛因而「點將」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出面組建「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鄧親任組長，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出任副組長，彭接受鄧的領導，在其指揮下行事），負責在此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中部署與推行「反教條主義」運動。^[3-2]此一「整軍」在當時既造成中共軍方高層人事的一波衝擊和整肅，對軍隊訓練、教育、規章、制度造成的負面效應，更持續超過二十年，可謂教訓慘痛。

本章嘗試了解：鄧小平對1950年代中期以來的軍中「教條主義」爭議抱持甚麼態度與立場？他在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整風各階段採取哪些作為？他如何批鬥和處理所謂的軍事「教條主義者」？本章的主要論點為：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經常代表黨中央處理軍隊事務，因此熟悉和掌握軍方的動態。他對軍內出現的反對「教條主義」的議論，不但早已了解知情，而且態度傾向支持。在毛澤東的囑咐下，鄧小平更以中央代表之姿介入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強勢驅策主軍的彭德懷改變會議整風的原定方向，改以「反教條主義」為主要議程；他經由指揮批鬥劉伯承、蕭克等

人的「教條主義」錯誤，有節奏地操控會議的進展與起伏。在鄧小平的努力下，在學習蘇軍問題上的犯錯者一一低首檢討；在「以我為主」之名下，毛澤東在共軍軍事思想上的獨尊地位，以及黨對軍的權威關係，也得到進一步的鞏固與加強。

以下首先檢視鄧小平對1958年夏以前共軍學習蘇軍問題的態度，接著依序探討鄧小平對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整風各階段介入的情形，包括：對會議初期批判總參謀長粟裕的參與，奉毛之命將會議轉向批判「反教條主義」，促成要求劉伯承與會的決定，掀起會議「反教條主義」的高峰，對批劉問題的緩衝，對會中個別人士檢討、批判的過問，對會議總結與決議的審定。最後小節簡單說明「反教條主義」的負面影響。

第一節 1958年夏之前對軍隊學習蘇聯問題的態度

1956、1957年：對相關問題早已注意

1958年中共軍隊整風，特別是後來發展成「反教條主義」運動，其之源起可溯及1956、1957年。為了更清楚地說明此一問題的來由，這裏有必要對此兩年中所發生的有關事情，約略地進行介紹。事實上，從相關問題的回溯中，可以發現鄧小平對於如何在學習蘇軍經驗同時又保持中共軍隊本色的問題，很早即予以注意。俟「反教條主義」問題升級、在1958年擴大為軍隊整風主題時，鄧小平不但不會覺得被動，反而因其自始對此問題即有掌握，而更具有發言權。

1956年初的蘇共「二十大」，開啟了對史達林的批判，也連帶地對蘇聯的優越模式與經驗「揭了蓋子」。在此背景下，中共解放軍應如何繼續學習蘇聯友軍經驗，自也越來越受到中共中央注目。在蘇共「二十大」閉幕未及一個月的時間內，同任中共黨主席與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即偕同時任中央秘書長與中央軍委委員的鄧小平，^[3-3]針對性地提醒中共軍隊在向
外學習上要有所堅持。

1956年3月17日，在有各大軍區首長參加的一次軍委會議上，身兼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副部長的黃克誠傳達說：「毛主席和鄧小平同志對於軍隊如何保持優良傳統的問題曾有指示，即在實行軍銜等一系列正規制度之後，擔心我們軍隊的優良傳統不能很好保持，如官兵關係、軍民關係、政治工作、群眾路線、黨委領導等，應該引起嚴重警惕。讓各軍區、各院校、各部門加以檢查。」^[3-4]毛澤東、鄧小平的此一指示和學習蘇軍經驗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黃克誠要求全軍仔細學習。

1956年春夏之際，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提出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習外國經驗，進而發出〈關於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的通知〉。提出「克服實際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克服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傾向，克服學術研究、報刊宣傳、教學工作中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在此背景下，軍隊也結合自身的工作進行參照、反省和檢查。然而，在軍中職司訓練的部門中，卻出現了如何學習蘇軍經驗問題的爭論。

對於軍中在「反教條主義」上所引發的爭議，鄧小平因為身居黨軍要職，不但不能置身事外，更成為下級上書請願的對象。1956年11月，先前在訓練總監部工作、後來在劉伯承親自點將下轉任軍事學院戰史系教授會主任的蔡鐵根（這兩個單位後來被指為是深受「教條主義」貽害的「重災區」），寫信給已升任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表示「深深感到北京存在著嚴重的軍事思想上的混亂，急需提請中央和軍委領導上的注意」。蔡認為近年軍隊在學習蘇軍經驗上，乃是「割裂開來，隨意取捨」，「結果弄得四分五裂」，應該要「真正地全部融會貫通以後，才談得到批判」。蔡氏這種意見，有別於近來中共中央所提的警惕、克服「教條主義」傾向的呼籲，反而認為學習蘇軍還不全、猶不足，可能會半途而廢、甚而誤入歧途。面對此一不「和諧」的聲音，鄧小平將此信轉給主軍的彭德懷（其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讓後者知曉有此情形。^[3-5]

約此同時，原擔任訓練總監部副部長、後調任副總參謀長的張宗遜，對軍事學院學習蘇軍經驗也有一個調查報告，基調卻與蔡鐵根完全相反，認為其存有嚴重的「教條主義」弊病。彭德懷接到這兩個不同意見的文件以後，決定親自前往調查。

1957年2月底至3月初，彭德懷與陳賡、譚政等赴南京軍區和軍事學院進行考察。3月2日，彭德懷聽取軍事學院領導幹部匯報後指出：「在學校教學中，不是有無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實際情況不相適應。」「在反對教條主義問題上，黨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明確地、積極地進行領導」。^[3-6]彭德懷後來將此次談話紀錄修改成為〈在聽取軍事學院匯報中的談話〉一文，並於4月24日附信呈送毛澤東。毛讀後批覆同意。彭德懷亦將此篇講話稿送給鄧小平，^[3-7]所以鄧可以掌握軍隊「反教條主義」的動態發展。

其後，彭德懷將自己先前赴華東視察的情況，向黨中央和軍委寫綜合報告，並將〈在聽取軍事學院匯報中的談話〉納入其中。這也就是5月21日彭德懷請毛澤東審閱之〈在南京軍區視察工作的報告〉。^[3-8]毛澤東於5月29日批示：「此件請書記處處理。」鄧小平在7月2日批道：「擬同意彭總

對於五個問題的意見。劉、周、朱指示後退彭總。」^[3-9]易言之，對於彭德懷對軍事學院所作的「不是有無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的估計，以及「把我軍優良傳統永久保持下去」、蘇軍經驗「應貫徹批判地學習的方針」等主張，鄧小平是支持並予以贊同的。

劉伯承自1950年11月南京軍事學院創校以來即擔任院長，不久並兼任政治委員，此時已在休養而不具體過問院務，但該校若如同彭德懷所言犯有「教條主義」的錯誤和偏失，其形成自非一時之結果，劉難辭其咎。1957年8月6日，劉伯承以「殘衰多病」為由致信毛澤東與彭德懷，請求移交軍事學院職務並免任剛新建的高等軍事學院院長。^[3-10]劉伯承的請求雖被獲准同意，但一旦南京軍事學院被全面追究「教條主義」問題後，劉也無法脫身。

1957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作〈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其中關於軍隊的部分，鄧小平指出在「反右」鬥爭下，「軍隊一般比較純潔」。但由於「某些工作人員不適當地強調專業化、忽視思想工作等原因，幾年來，幹部的個人主義和無組織紀律傾向有了一些發展」；「軍隊在官兵關係、上下級關係和軍民關係等方面，也有一些缺點需要克服」。^[3-11]

鄧小平談話裏指陳軍隊的問題時，雖然並非直接與「教條主義」禍害相聯繫，但卻多是先前中共中央批判的對蘇軍經驗不加思索、囫圇吞棗後所造成的後遺症。這些不良現象與弊病，確實為鄧小平所留意並欲加以解決的。

1958年春：對相關問題愈加關切

1957年10月，蘇聯國防部長朱可夫（Georgy Konstantinovich Zhukov）因位高權重，引起蘇共領導人忌憚而遭到整肅。此一「朱可夫事件」，再加上1956年「波匈事件」中軍隊不穩的教訓，使得毛澤東對於軍隊的穩定性和服從性，益加高度注意和小心。^[3-12]1958年在「大躍進」醞釀、成形的過程中，軍隊與當時急欲成就一番事業的地方相比，顯得消極和滯後，對此，毛澤東指出：「以往是拿軍隊將地方的軍，現在要拿地方來將軍隊的軍了。」^[3-13]在此背景下，3月26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表示「今年要回過頭來搞點軍事工作」。毛在其他場合也提出「黨要抓軍隊」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鄧小平正是代表黨出面「抓軍隊」的主要人物。

針對軍隊工作相較於地方顯得冷清落後的問題，鄧小平在3月的成都會議中表示：「軍隊幹部發展不快，我們學術思想是落後的，落後的原因，是沒有深入群眾、深入實際中去。」^[3-14]彭德懷在與鄧小平、周恩來磋商後，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使中央軍委的決議和意圖在全軍很好地貫

徹實行。經由整風，可使總部機關統一思想、理順工作關係，進而發揮其積極性和效率，有力地推動全軍工作。^[3-15]作為1957年全黨整風運動的總督導的鄧小平即表示：「軍人的傳統是活潑的，生龍活虎，這幾年不大對頭了。〔軍隊〕高幹要整風，大鳴大放，恢復過去那種政治風格。」^[3-16]彭、鄧、周的此一主張獲得毛澤東的批准，成都會議因此決定召開軍委擴大會議，進行整風、整編。

軍隊「教條主義」的問題，在此時並未引起毛澤東太大的注意。1958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的一次會議上表示：「全國解放後，在經濟工作和文教工作中產生了教條主義；軍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條，基本原則堅持了，還不能說是教條主義。」^[3-17]鄧小平在會議期間，雖也曾對「教條主義」加以批評（不限於軍事工作）：「所謂教條主義，主要是盲目地搬用蘇聯的經驗。本來在人家來說是個好經驗，但是，你不考慮自己的具體情況，用得不恰當，硬搬照套，這就是教條。所以說，教條主義就是懶漢，他不去分析。」「今天我們反對教條主義，主要應該由我們自己負責，不能要蘇聯負責。因為現在的蘇聯專家都是我們自己請他們來的，是雇來的，他的不正確的東西，你可以不執行。這是一。第二，人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經驗你怎麼樣運用，你自己可以決定。」但由於毛澤東此時關注與批判的焦點在於「經驗主義」性質的經濟「反冒進」問題，鄧小平對「教條主義」問題的重視，也就不如對「經驗主義」問題的優先處置。鄧小平表示：「自從經過批判斯大林的錯誤後，現在教條主義還比較容易克服；而最困難的是克服經驗主義。」^[3-18]然而，3月下旬起，訓練總監部召開機關四級幹部會議，圍繞在「教條主義」問題上出現激烈交鋒，使得毛澤東與鄧小平再次注意到軍隊的「反教條主義」問題。

為了貫徹中共中央反右傾保守和反貪污浪費的「雙反」決定，訓練總監部召開四級幹部會議。在訓練部長兼黨委書記蕭克的主持和引導下，針對「軍事學院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訓練總監部是教條主義的司令部」的傳言，主張「從思想上澄清一下」，並將指控軍事學院「教條主義」問題嚴重的張宗遜召回來開會，「把矛頭指向了他」。^[3-19]

張宗遜對此的回憶是：

1958年2月，黨中央發出指示，要反對生產建設中的浪費現象和保守思想。當時，訓練總監部的主要領導同志認為，訓練工作中的保守思想，主要表現為拒絕學習蘇聯的經驗，死抱著我軍過去的經驗不放。幾天之內，訓練院內貼滿了大字報，而且指名道姓地寫道：軍內保守的代表人物就是張宗遜。^[3-20]

我在組織上、行政上已同訓練無任何關係，既無權參與會議的領導，也無法獲得會外的任何訊息，只能隻身坐在被告席上挨批。發言者的帽子不斷升級，從「保守主義」、「經驗主義」、「修正主義」到「反蘇」、「右派」等等。我聽了一個月批判之後，作了一個發言，對軍事訓練中產生教條主義的問題承擔了責任，並重申了我對反教條主義傾向的認識和態度。……這一下子聽不到答覆性的意見了。^[3-21]

彭德懷對訓總四級幹部會議很重視，並將會議的簡報和主要發言「呈報主席、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同志閱」。針對蕭克在訓總四級幹部會議上反對軍事訓練部門存在「教條主義」的指控，曾經批評軍事學院「教條主義相當嚴重」的彭德懷自然不能接受，甚至揚言「訓總四級幹部會反張宗遜，你們反張宗遜就是反我」。^[3-22]鄧小平也抱持類似的觀點。因為鄧小平曾在一份關於訓總四級幹部會議的簡報上批道：「方向不對、風氣不正、水平太低」，^[3-23]充分顯示他對此會的不滿。對於鄧的意見，彭德懷相當地重視。^[3-24]訓總四級幹部會議因而在中央軍委的強行干預下，也開不下去了。

4月26日，中央軍委發出召開擴大會議的通知。其中指出：此次會議「首先採取整風方式，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研究軍事建設中的某些思想問題，以便達到統一認識、改進工作、提高覺悟、聯繫群眾的目的，其次討論軍隊裁減整編和其他問題」。^[3-25]4月29日，黃克誠主持由軍委委員和各總部領導出席的座談會，進一步討論利用擴大會議進行整風的問題。黃克誠在會上表示：「中央指示軍委召開擴大會議，運用整風方法開會，這與過去不同。地方各部門都用整風方式有很大提高，軍隊高級幹部究竟提高得怎樣？也難說。」黃所說的地方的整風，即是指鄧小平主導下推廣至全國各地的整風運動，當時部分地區甚至正在進行激烈的「反地方主義」。黃克誠進而說：「成都會議提出，地方比中央部門進步，軍隊幹部更落後。小平同志對訓總四級幹部會議，也提出這個問題，感到軍隊幹部落後，講不出道理來。訓總的幹部會議可能是好事情，涉及到全軍範圍。高級幹部能否鳴放起來、暢所欲言，是個問題，準備動員鳴放。」^[3-26]

值得觀察的是，鄧小平將訓總四級幹部會議中所出現的「教條主義」嫌疑者的「頑抗」，同軍隊幹部落後連結在一起。易言之，由鄧看來，軍隊思想之所以「冥頑不靈」，「教條主義者」責無旁貸，透過整風可以將相關問題攤開來。由此也可想見，當毛澤東突然在軍委擴大會議整風時高唱「反教條主義」之時，鄧小平不致需要面對「思想轉彎」的問題，更有可能是得心應手、一步跟上。

第二節 1958年軍隊整風先拿粟裕開刀

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從5月24日開預備會、5月27日正式開幕。

5月24日，彭德懷主持軍委預備會議，就軍委會議主題與進行方式講話，他指出：「這次軍委擴大會議的內容，主要是整風與整編兩大問題。」整風討論的範圍包括：建軍原則、建軍方針以及戰略方針問題；整

編則包含：軍費縮減、軍隊裁減、軍種與兵種的比例調整，以及組織機構改組。對於會議的開法，彭表示：「在成都會議上，中央指示我們用整風的方式是很對的〔按：鄧小平是主要的倡議者〕，有甚麼意見都可以講，應當大鳴大放、大爭大辯，講錯了不扣帽子，做錯了不追責任，主要是追求真理、服從真理、統一認識、提高覺悟。」^[3-27]反對「教條主義」雖也是彭認為的一項會議整風議題，但其排序並非最重要、最前列。事實上，軍委會議開始後整風的首要焦點，是針對總參謀長粟裕的批判。

軍委責成粟裕就所謂「總參與國防部關係」等問題做檢討，冠之以「一貫反領導」、「向國防部要權」、「告洋狀」的罪名。所謂「一貫反領導」，乃指粟裕在與陳毅、聶榮臻、彭德懷共事期間，先後與他們有所磨擦、關係不善；所謂「向國防部要權」，乃肇因粟裕領導的總參謀部與彭德懷作為部長的國防部之間，因職責劃分的不明所產生的誤會；所謂的「告洋狀」，則是指粟裕向蘇軍總參謀長索要該軍「關於國防部與總參謀部工作職責的書面材料」以作為參考一事。^[3-28]對粟裕開展批判，毛澤東是表示支持的。5月30日，黃克誠傳達毛澤東指示：「把火線扯開，挑起戰來，以便更好地解決問題。」彭德懷也將問題的嚴重性與「朱可夫事件」作對比。^[3-29]面對措詞嚴厲、接踵而至的批判，粟裕百口莫辯，僅能一再自我檢討。^[3-30]

在批判粟裕一事上，中共官方的《鄧小平年譜》對於鄧小平的參與情形，採取的是蓄意迴避的態度。因為其僅記載：「5月26日上午，鄧小平召集中共中央軍委負責人開會，討論次日開幕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有關事項」；「6月4日上午，鄧小平召集中共中央軍委負責人開會，研究軍委高級幹部整風中的一些問題」。^[3-31]事實上，鄧小平在批粟問題上的角色和作用，根本不下於掌軍的彭德懷，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軍委會議整風批粟的同時，鄧小平召集軍隊最高層人士在小範圍內對粟裕進行定調式的批判。5月26日、28日，以及6月4日，鄧小平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元帥會議，出席者包括：彭德懷、林彪、賀龍、陳毅、聶榮臻、羅榮桓、葉劍英七位元帥，黃克誠、譚政兩位大將以及蕭華上將。^[3-32]在批粟問題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對軍委擴大會議「督軍」的角色，不言可諭。鄧小平作為元帥會議主持人，立場並非「一碗水端平」，而是同彭德懷、陳毅、聶榮臻、黃克誠等一起發言對粟裕進行嚴厲的批判。^[3-33]

鄧小平批判粟裕的內容，截至目前為止，只能從側面略為猜知。根據中國大陸的粟裕研究者所公佈的資訊，居仁堂批粟會議上，陳毅公然宣稱粟裕為人「陰」，其他與會者也結合自身與粟裕往來的經驗，對之嚴詞批判。會議主持人鄧小平有可能也在此時投入批判。因為當聶榮臻批粟裕：「作為總參謀長來講，有了個人主義，就是大盜，大盜盜國！」現場即有人應聲對粟算起歷史老賬，指稱國共內戰時期粟主張並指揮的豫東戰役

是：「只有大野心家、陰謀家才如此貪功，打豫東戰役那樣的大仗！」此人可能正是鄧小平。^[3-34]

相關說法是不無可能的。因為粟裕在1948年籌劃豫東戰役之時，負責戰略協同任務的中原野戰軍（即後來的「二野」）領導人曾發出異議。但粟最後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故能放手組織此一戰役並取得大捷的戰果。^[3-35]在豫東戰役十年後，仍會對發起該戰役的構思提出質疑者，甚有可能就是當年對發動此役懷有疑慮的「二野」領導人，而鄧小平又是居仁堂會議出席人員中唯一出身「二野」者。至於出身其他野戰軍的領導人，由於當年分佈於其他戰區，對相關戰役決策的內幕詳情不甚了了，實也難以置喙。林彪當年曾盛讚粟裕所組織、指揮的豫東戰役「敢於冒險」，並欽佩地表示：「像豫東戰役那樣的仗，我是不敢輕易下決心打的。」^[3-36]更不太可能會就此問題批評粟裕。

粟裕的官方傳記對粟裕在會議期間所遭受的批評與對待，有如下評論：

有的人借機進行無限上綱以洩私憤，把一些思想認識問題、個人工作上的、性格上的問題，提高到思想意識甚至階級立場的高度，進行過火的政治批判和鬥爭。這樣鬥爭的結果，不僅破壞了黨內民主生活，傷害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而且將正確的東西，只要是遭批判的人所做的和主張的許多事情，都當作錯誤的東西進行貶斥，對遭批判和鬥爭的人歷史上的功績，也顛倒是非地說成是「個人野心」、「個人主義」等，甚至對歷史進行歪曲。^[3-37]

鄧小平批判粟裕是「大野心家、陰謀家」，因「貪功」而去「打豫東戰役那樣的大仗」一事，若非訛傳，就可看作是一個具體例子。

粟裕在1958年慘遭清洗，鄧小平在後續相關的組織、程序上的吃重角色，也是顯而易見的。粟裕的總參謀長一職，在他本人被圍攻而確定不保之後，有關其新工作的安排問題，鄧小平是粟相談、反映意見的對象。^[3-38]改任軍事研究院副院長的粟裕，從此離開了軍事指揮第一線，並被限制接觸部隊。他在調離總參時，中共中央一位領導人曾找之談話並表示：「調你到軍事科學院工作，今後你就待在那裏在北京搞學術研究，不必到部隊去跑了。」^[3-39]有論者指稱：這名中央領導人正是居仁堂批粟小型會議的主持者，^[3-40]也就是鄧小平。

粟裕在晚年極力爭取中共中央將1958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加諸其身上的各項不實指控全部推翻，以還自己的清白。對於粟裕的平反請求，雖然包括鄧小平在內的許多中共要人應允同意，但相關的審查工作卻一直沒有突破。粟裕也在未能如願下於1984年抱憾離世。^[3-41]有消息指出這或與鄧小平、粟裕兩人在1979年出兵越南問題上意見不合有關。^[3-42]

從1958年5月下旬到6月初的此一階段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整風，最主

要是批判以粟裕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會中雖然也有批判「教條主義」的聲音，特別是羅榮桓、蕭華皆將訓總四級幹部會議上的爭論，說成是「兩條路線鬥爭」。^[3-43]但主持會議的彭德懷卻不作如是想。5月31日，彭德懷邀集張宗遜、蕭克、李達、彭紹輝、李作鵬座談時表示：「你們對敵鬥爭都很堅決，不搞陰謀，不想推翻誰，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問題。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訓，不追責任。」「今天講清楚，不是整倒哪個，只是把相互間的成見、意氣消除掉。」^[3-44]從中可以發現彭德懷雖然對軍中訓練部門的「教條主義」問題有所不滿，但是尚抱持對事不對人的態度，不願上綱上線。

然而，毛澤東在6月初開始過問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整風的發展，更決定以「教條主義」為清算目標。在毛的示意下，本已領導軍委高層批鬥粟裕的鄧小平，自然而然地成為毛對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進行指導的首要代理人。

第三節 推動軍委整風轉向「反教條主義」

毛澤東何以會做出將會議整風轉向的決定和舉措？最流行的說法是：林彪懷有趁機打擊他人的政治目的，向毛獻計的結果。林彪在1959年批判彭德懷的軍委擴大會議上，也不無得意地回味他在1958年軍委會議的角色，甚至以自己是「反教條主義」的「先知先覺」為炫耀。^[3-45]即便如此，關注「教條主義」問題者並非林彪而已，海軍副司令員方強就是一個例子，其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並對之造成的影響，恐亦是不相上下。^[3-46]

5月29日，方強就會議的開法給會議主席團寫了一封信，闡述自己的意見，要求會議「以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綱，檢查軍隊各方面的工作」。6月5日，彭德懷將信轉呈毛澤東。同日，毛澤東對方強的信做出以下批語：

此件寫得很好，提出了問題，彭、黃、鄧看後還我。我暫時不宜於講話，先要讓他們把問題都放出來。過幾天，我準備找各小組長分別談一下，調查一下情況，摸一下底。

針對方強在信上所寫「我們的建軍方針、建軍路線、戰略方針」「是不存在甚麼根本性的問題的」，毛澤東批示：

一方面有優良傳統，另一方面，就整個歷史說來不佔全軍統治地位的另一個惡劣傳統是存在著，即非馬克思主義的，有時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例如教條主義、軍閥主義。

最後，毛澤東寫道：

彭黃閱後退小平：有些同志對會議的開法感到不滿。此事容易，調整一下就好了。振起生氣，大有可為。請小平商彭黃召集七八個同志經常談一下，似可不必開小型會，只開大會和小組

會。如何，請酌定。[3-47]

以上批語顯示，毛澤東希望改變會議的開法以「振起生氣」，借重鄧小平就是他所做的重大安排。鄧小平和作為會議主持人及組織者的彭德懷、黃克誠，也可從中知道毛澤東已將打擊、清算「教條主義」作為會議整風後續的主軸。[3-48]

6月7日凌晨4點，毛澤東專門致函鄧小平：

小平同志，六、七月你應做兩件事：一、第二個五年計劃佈局，如你自己所提的；二、幫助德懷同志將軍事會議開好，關鍵是本月一個月，宜與彭等少數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大事抓起來幹，多快好省。

軍事會上，你應準備去講一次，時機可在結尾的時候。[3-49]

此一短函的內容顯示：毛澤東親自授命鄧小平以協助、輔導的角色參加後續的軍委擴大會議整風。鄧小平被任命為所謂的「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的時間，或許即是在此前後。毛澤東委派鄧小平的任務是「幫助德懷同志將軍事會議開好」。究其實質乃是責成鄧小平扮演「監軍」的地位，從旁推促彭德懷將會議整風導引至為毛澤東滿意的方向和結局。

6月7日上午，鄧小平立即召集林彪、彭德懷、羅榮桓、葉劍英、黃克誠開座談會，商談截至當時為止會議開會的情形和後續會議的開會方式等兩項問題。由此亦可推測，毛澤東和鄧小平在此前應曾針對會議的相關問題當面交換意見，鄧小平方能對前者的意圖和所望「心領神會」，迅速予以貫徹。帶有「銜君命」身份的鄧小平在此次座談會上的講話和指示，可從黃克誠當日下午所作的傳達內容中顯現。

黃克誠在下午的全體大會上傳達說：

上午小平同志召開了一次座談會，彭總、林總、羅帥、葉帥去了，我也到了。首先傳達了毛主席對方強建議的批示，指出在建軍路線存在問題。接著商談了以下兩個問題：

一、是對前幾天會議的估計。小平同志認為，會議的「溫度」不夠。意思大體上是說，只有35度，沒有37、38度，更沒有40度。暴露問題不夠，在同志們思想中存在的意見是很多的，是多方面的，從建軍原則、方針，領導方式方法，到許多工作的具體措施都有意見，還沒有端出來，應當鼓勵大家擺開。

二、是今後會議的開法，決定採取機關整風的辦法，不再開小型會，只開小組會和大會。寫大字報、小字報，配合大會、小會的發言，爭取在一週內造成鳴放的緊張氣氛。希望同志們大膽發言，以共產主義的風格提意見，把話都講出來。批判的對象，主要應當是對軍委、總部。軍委和各總部的負責同志要沉住氣，聽別人把意見講完，再展開辯論，進行專題鳴放，然後就爭論結果分別起草文件（即決議草案）。這些文件主要依靠下邊的同志幫助各總部寫。[3-50]

鄧小平所說的「會議溫度不高」，指的是在上一階段的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會場上對批判「教條主義」的發言不甚積極、踴躍的現象。[3-51]此一情形需要有所改變。激起眾人對「教條主義」的「義憤」，不但勢在必行，更是鄧小平職責所在。在後來的會議期間，鄧小平會對軍事「教條主

義」作過一比喻：「學習蘇軍先進經驗，好比請客吃飯。別人請你吃飯是好意，你吃了拉肚子，這埋怨誰？只怪你自己吃多了，或者你胃腸消化不好。這要堅持實事求是。」^[3-52]易言之，鄧小平認為那些犯「教條主義」者，正是對蘇軍經驗生吞活剝、脫離中國實際所鑄下的錯誤。自我不爭氣、自誤誤己，怨不得人。鄧小平鼓勵與會人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橫眉冷對、不吐不快。事實上，批判目標主要就是針對陷入或涉嫌「教條主義」錯誤的個人。所謂「造成鳴放的緊張氣氛」，就是要專門對「教條主義者」鳴鼓攻之。

黃克誠在傳達的尾聲強調：「小平同志還提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以後，地方工作更加活躍了，軍隊的這次會議要開好，工作也就會大大活躍起來。開不好，大家就不要回去。一直到開好才算。」^[3-53]鄧小平強勢的政治風格和令到行止的決心，從中呼之欲出。在黃克誠傳達鄧小平的意見後，彭德懷進一步地對之加以闡述：

為甚麼要大鳴、大放呢？是為了把問題搞清楚，好的也要放，表揚、推廣；壞的要揭發、批評，可以改錯。為甚麼要這種形式呢？單一的形式是不行的。我們要採取大會、小會、大字報、小字報，而且可以交頭接耳。內容也可以是多方面的，建軍原則方針、作戰方針、規章制度都可以講，為的是要互相交換經驗。^[3-54]

彭德懷在強調以鳴放方式繼續進行會議的同時，也突出毛澤東對會議新定的「反教條主義」主軸：

我們建軍中兩條路線的鬥爭是長期存在的，有正確的、不正確的或不完全正確的，是馬克思主義同非馬克思主義有時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鬥爭。非馬克思主義或反馬克思主義，當前在我軍中表現的形式是教條主義、形式主義、軍閥主義。這些東西是壞的傳統，壞的習慣，是歷史上壞的遺產，是社會上壞的東西的反映。以往經過長期的反覆鬥爭，現在要與這些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或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作堅決的鬥爭，因為它腐蝕我們人民的軍隊。^[3-55]

彭德懷在同一講話中，也一改他在一週前對蕭克等訓總領導人赤誠以待的態度表示：「訓總有人把我這個國防部長實際上撤了職。」也就是回頭去計較去年他在南京軍事學院批評「教條主義」的講話，遭受訓總抵制一事。^[3-56]

對於鄧小平受毛澤東指示進一步介入會議的情形，黃克誠晚年回憶時留有深刻的印象：「中央委託鄧小平召集各位元帥開會，認為軍委擴大會議溫度不夠高，決定採用整風方式開會，會議發言與大小字報相結合，一週內使空氣緊張起來。」^[3-57]

在毛澤東拍板決策、鄧小平傳達與部署之下，會議氣氛急轉嚴峻，會議原主事者彭德懷、黃克誠，頗感意外地流於被指揮的地位。1962年，賦閒軟禁在家的彭德懷曾對此回憶：

軍委擴大會議之初，並不要大反教條主義，後來主席下了很大決心：「開不好，大家不要走」，作為中央領導下的副組長，我當時是很被動的，需要趕快轉彎子。小平同志受中央委託召集我們幾個老帥開會，認為會議溫度不夠高。結果反教條主義成為大會的中心議題，大字報、小字報一齊上，溫度越搞越高，對一大批同志進行錯誤的批判和組織處理，的確不是我的本意，現在回想起來，我是很難過的。[3-58]

黃克誠後來也坦言：「這次會議，實際是中央領導軍委整風，為彭德懷始料不及。我們未能領會中央精神，所以主持會議顯得很被動。」[3-59]

第四節 決定劉伯承到會參加整風

在鄧小平代表毛澤東向軍委擴大會議提出「會議的溫度不夠」、「開不好，大家就不要回去」等指示的隔日，也就是6月8日，鄧小平又召集軍委負責人續會討論。[3-60]其中可能包含研議「炒熱」會議氣氛的具體辦法。以彭德懷為首的會議主席團，最後決定出來的方法是「強制性的鳴放」——每人要寫兩張大字報，方能交差了事；會議所分的各小組內部要自行催繳。[3-61]

此法在短時之內即有明顯的效果。根據彭德懷秘書日記的記載：6月7日，也就是鄧小平介入會議、要求對之加溫的當日上午，他「讀發言材料」時，尚感到「近來的會議情況還不很理想，雖然放出了一些問題，但是還沒有很好地放，範圍不廣，內容也不夠深刻」。6月9日，他就得「全天讀各小組會議上的發言，因為發言已經大批印發，晚上時間也用來讀」。10日，彭的秘書更發出「稿很多，讀不完」的感嘆。到了13日晚上，這名國防部長的機要到軍委辦公廳所在地三座門看會議的大字報時，也驚呼「現已出了1,400張。內容還不少，批評還是誠懇和尖銳的」。[3-62]套用鄧總書記的語言，會議的「溫度」已開始爬升。然而，中共中央顯然還要將之再「加熱」一番。

6月9日下午，黃克誠一方面傳達毛澤東「會議要擴大範圍，每個師的黨委書記都來」的指示；另一方面也傳達毛對會議主題所提的論點：

教條主義不懂得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意識又反過來影響（推動）社會存在。大國有大國的憲法，小國有小國的憲法，教條主義即不承認這條真理。蘇軍條例、規章制度，是在蘇聯土壤條件中產生的，這些人不承認中國的社會（客觀）存在，不承認中國有它特殊的東西。[3-63]

由於毛澤東對會議要「反教條主義」的期許已甚清楚，新召喚來與會的師級以上的共軍將官，必也知所為何事而來、發言要以何為重。另外，自覺年事已高、知識不足而倦勤的彭德懷，在不久前曾向中共中央提出不擔任國防部長的工作請求。也在9日，經由毛澤東主持的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後，決定「沒有必要加以改變」。[3-64]對於軍委擴大會議甫由毛澤東欽定的「反教條主義」議程，按照整風「首長負責，親自動手」的原則與要

求，彭「只有拚命向前」了。

在上有「闖將」（彭）、下有「援兵」（擴大與會的範圍與人數）的情況下，會議的「溫度」將更具有再向上攀升的外部條件了。但是另一個問題也逐漸地浮現：「教條主義」要反是無庸置疑的，但是若無具體的「教條主義」標靶對象（猶如延安整風運動中的王實味，或是1957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的「章羅聯盟」），「反教條主義」的熱焰在空燒之下，恐也無法持久。負有「幫助德懷同志將軍事會議開好」任務的鄧小平，自然也會對此問題開始有所思慮。

根據鄧小平的官方年譜，在6月中以前，鄧小平曾在11、14日兩次「召集中共中央軍委負責人開會，討論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有關問題」。^[3-65]這無疑是按照毛澤東先前所作的「請小平商彭黃召集七八個同志經常談一下」（6月5日在方強信上的批語）、「宜與彭等少數同志每三天商量一次」（6月7日致鄧小平函）指示而來。這種由鄧小平召集、主持的由少數人組成的會議，根據現場工作人員的回憶，出席者通常有：彭德懷、葉劍英、羅榮桓、聶榮臻、黃克誠、譚政。^[3-66]由於後者可說都是會議主席團的中心人物，這或即是由鄧小平擔任組長的「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的主要組成人員。鄧小平可藉由此會開會研商的方式，對會議的發展行以間接的領導。另外，在這一由鄧小平領導的小組會議之上，還有一為當時人們稱作的「毛〔澤東〕、鄧〔小平〕、彭〔德懷〕三人小組」，主管會議的進程。會議期間，黃克誠也不斷地赴毛澤東處報告，並在聽取指示後，回來向主席團會議傳達。^[3-67]進而言之，鄧小平可謂是坐於幕後的毛澤東和一線執行開會任務的彭德懷、黃克誠之間的重要聯絡人，實質上根本就是上令下達、承上啟下的督戰者。

鄧小平召集的小組會議的議事內容，可能包括：配合毛澤東對會議所發的新指示，加以具體部署；對會議進行過程中出現的狀況，予以討論並回應。6月11日，鄧小平召開相關會議，其具體情況目前雖不明，但應與如何實施毛澤東在9日下達的擴大會議規模、人數的指示有關，亦即安排「調兵遣將」以共襄會議盛舉。另外，鄧小平先前曾代表中共中央向會議指出軍隊落後的問題，而在會上鳴放出來的意見中，似乎對此存在不以為然的聲音。這可能也在6月11日鄧召開的會議中被提出來討論。因為彭德懷在次日的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和小組長聯席會上，就特別針對「關於軍隊落後的問題，有人不服氣」的情況加以批駁。^[3-68]

6月14日，鄧小平再次召集小組會議。而在此會中，鄧小平經手處理，甚而主導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在會議高舉「反教條主義」旗幟後，中共建政以來軍事教育與訓練領域的主要負責人劉伯承，是否應要出席會議共同商討？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提出要對劉伯承相關工作加以討

論，以及劉應否出席會議等問題者，並非來自中共中央或是軍委領導層，而是被鼓勵大膽鳴放意見的會議「群眾」。代表中共中央坐鎮會議的鄧小平，不忘對此善加利用。

約在會議轉向「反教條主義」的前後，由軍中院校代表組成的院校組（高等軍事學院院長陳伯鈞、軍事學院院長廖漢生為正副組長）的一次小組會上，根據廖漢生的回憶：「有的同志提出要劉伯承元帥到會，聽取意見。會後，還有的同志要我出面跟軍委說，要求劉帥來京參加會議，以免被動。」廖眼見會議中對「教條主義」以及劉伯承的批評有增多的情況，便電話聯繫在南京主持軍事學院日常工作的副院長張震，向後者通報會議的情況，並表示：「請告訴劉帥不要來北京，他身體不好，可以請假，有話可由我們代為轉達。」^[3-69]

廖漢生所設想的劉伯承本人不用到會而由他人代為轉達意見的提議，看來已為劉伯承所接受。因為在6月12日，廖漢生即曾向會議主席團轉達劉伯承對會議新主題「反教條主義」的「三條意見」：「一、軍事學院開展反教條主義是正確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二、要以毛澤東思想作指針，學習現代軍事科學和軍事技術；三、政略決定戰略，戰略決定戰役，戰役決定戰術，也就是說政治必須掛帥。」^[3-70]從中，可以看到劉伯承既對會議表態支持「反教條主義」，也肯定自己灌注心血的軍事學院在「反教條主義」議題上是有跟上並站得住腳的。他或因此自認無必要出席會議。然而，「上」不從劉願。未幾，劉伯承就如同被「趕鴨子上架」般地被會議組織者示意要出席會議。

在6月14日鄧小平主持的小組會議中，黃克誠匯總會議各小組討論情況表示：空軍小組的兩位將軍（劉震、曹里懷）對於彭德懷愛罵人的工作作風提出批評。福州軍區對劉伯承也提出意見。對此，譚政表示：劉的身體不好，先將針對他的意見加以匯集，待大會結束後，俟劉身體好時再轉給他。其他與會者對此並無異議。這多少也應與廖漢生在兩天前已向會議主席團轉達劉伯承傾向不出席的意思有關係。然而，會議主持者鄧小平卻表示：「劉帥能來出席比不來好。」黃克誠在會後指示廖漢生聯絡張震，將會上的意見轉報劉伯承。黃克誠事後表示，鄧小平乃是從毛澤東處來主持此一會議的。^[3-71]

另外，根據時任國防部長辦公室主任王焰的親身所聞：在會議期間的一天（作者按：應也在14日左右），鄧小平從毛澤東處回來和彭德懷談劉伯承是否要出席大會的問題。彭德懷明白地表示：「劉帥有病就不要來了吧。」然而，鄧小平卻回覆：「來一下比不來好。」既然形同毛澤東對會議之代理人的鄧總書記對此表示不同的意見，彭就沒有再說下去了。^[3-72]有資料指稱：彭德懷後來自己被罷官後曾囑咐姪女彭剛將來要找機會給劉

伯承家帶話表示歉意。彭剛後來對劉伯承的女兒表示：「〔彭德懷〕叫我代表他向你父親道歉，但是讓你父親到懷仁堂做檢查，彭總當時是不同意的，那是鄧小平的意見。」^[3-73]

根據《彭德懷全傳》的披露，6月16日上午會議主席團的會議紀錄記載：「廖漢生傳達了劉伯承同志準備來開會。請廖漢生同志給張震同志一個電話，劉帥是否來京開會，由他自己決定。如果能來，還是來好。軍委不再正式表示態度。」當天晚上，人在南京的張震回電表示：劉伯承準備到北京出席會議，啟程日期另行相告。相關消息立刻報告黃克誠，也轉報給毛澤東、鄧小平及彭德懷。^[3-74]至此，在鄧小平出面對彭德懷為首的軍委所作的督促下（甚至可說是一反後者的初願），劉伯承赴京到會檢討一事終告確定。

鄧小平何以在14日的小組會議上力排眾議要劉伯承到會？何以在他與彭德懷的兩人談話中直接否決彭認為劉不用來的主張？首先，從會議操作的需要上，此事直接關乎前面提及的如何讓會議中的「反教條主義」主題更能聚焦的問題，也就是使會上批判能因有更具體的指涉對象，而有助產生「有的放矢」、「言之有物」的效果。鄧小平驅使軍委負責人「邀請」軍隊「教條主義」問題的重要關係人劉伯承到會，確可對會議在批判「教條主義」問題上，起到火裏添薪、助火旺燒的效果。何況，最先提出要劉與會的聲音，乃是出於會場中鳴放的意見。要劉出場，既有「民意」的基礎，還可以不挫傷「反教條主義」積極分子的革命熱情。

其次，鄧小平更深層的考量，恐怕還有他對毛澤東心意的順應與迎合，以及自己權力利害的計算。毛澤東在1958年中對軍隊「教條主義」現象與問題突然加以重視的原因，以及所抱持的意圖可能包括：一、鑒於此前蘇聯與「波匈事件」的教訓，藉此「殺雞儆猴」強化對軍隊的領導；二、配合中共當時嘗試走出自身發展道路的企圖，先破再立，在軍隊中排除蘇聯過多的影響；三、因應「大躍進」的形勢需要，在思想上對軍隊進行動員，使之跟上並投入；四、回應中共黨內、軍中要求重視相關問題的聲音（包括鄧小平、林彪在內的高級領導人，以及如方強等將官），以示自己傾聽下級、關注問題。另外，也存有一種可能：毛澤東預見軍隊若持續往正規化的方向發展，長久下來可能會對他個人在軍中的影響力有不利的後果；對主其事的劉伯承嚴加批判，也可順道一報江西時期毛遭劉排擠之仇。也就是指1932年10月，劉伯承在寧都會議有關毛澤東的去留問題上，響應「國際派」將毛逼退的主張，以及之後劉又曾撰文批判毛的軍事觀點與主張等事。^[3-75]

鄧小平不用毛澤東的名義而執意要中央軍委負責人安排劉伯承出席中央軍委會議，既可不拖「主上」下水而又能滿足後者內心所想——對劉伯

承新賬、老賬一起算。此論並非全然是一種沒有理由的猜測。因為在不到一年後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喜不自勝地表露出他成功藉此次軍委擴大會議之機，對劉伯承算賬出氣的快感。^[3-76]若沒有鄧小平在當時的張羅，毛此願能成與否，恐是一未定之數。

最後，鄧小平是毛澤東委託操作軍委會議走向、將會議宗旨改為「反教條主義」的人，他若迴避或袒護作為軍隊「教條主義」問題最大「嫌疑犯」的劉伯承，不能身先表率，恐遭人非議。尤有鄧小平要謹慎處理之處：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的前後，正值毛澤東進行權力與組織調整，以為行將發動的「大躍進」作準備之時。毛澤東擴大鄧小平的中央書記處的權力，使鄧在中共黨政權力分配上的地位，可謂是炙手可熱、權傾一時（相關的細節討論，可見第四章）。毛澤東派鄧小平至軍委擴大會議「監軍」，也反映毛對鄧的信任和器重。然而，同時也可能是藉此考驗大權在握的鄧的政治忠誠度，亦即要鄧在當下政治上的「識馬伯樂」毛澤東和昔日沙場上的生死戰友劉伯承之間做一選擇。劉伯承此時已是殘病交加、不便行走，鄧小平仍然力主劉赴京與會，應算是給了毛澤東一個再清晰也不過的答案了。

第五節 襄助掀起會議「反教條主義」高潮

會場內鳴放愈見熱烈，參加會議的人員也陸續增加，「反教條主義」的標靶人選，已從蕭克等訓練總監部領導人向上延伸到更具分量的劉伯承，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準備步入一個高潮的階段。鄧小平對此發展予以緊密的監控：6月18日，鄧小平召集中央軍委負責人開會，討論會議有關問題；19日，鄧小平又約黃克誠、楊尚昆談話。^[3-77]楊尚昆是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乃負責中央機關事務，鄧找之同黃克誠一晤，應涉及會議出席人數倍增下所造成的會議場地安排的問題。會議原來在坐落於三座門的軍委辦公廳，但因人數爆增、場地不夠大，經研議與安排，會議改在北京當時最大的會場舉行，也就是中南海懷仁堂。

6月20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懷仁堂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正式出席者一千餘人。鄧小平雖然奉毛澤東之命引領軍委擴大會議的發展，但也恪遵「黨的領導主要在於政治方向的領導」的原則，20日會議上「唱主秀」、「打頭陣」者，仍是軍委工作實際負責人彭德懷。以免給人一種中央總書記「包辦一切」的觀感。

彭德懷在大會上代表主席團講話的內容要點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著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全國勝利以後，軍事教條主義思想又重新復活了」，「這些軍事教條主義者和抱單純軍事觀點的同志，他們不是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而是搬運蘇聯的錯誤經

驗」。彭德懷自承「在教條主義問題上，我是有責任的」，並對於何以自己不早些「反教條主義」的原因進行自我剖析，^[3-78]接著就將「反教條主義」的利劍劈向蕭克以及所謂「抱有單純技術觀點和教條主義思想的人」。彭表示：他們用「正規化」、「現代化」、「原子條件」等口號嚇唬人，誇大了蘇聯軍事科學的完整無缺，使別人不加分析，不敢議論，以便於教者死搬硬套。他們反對張宗遜，說他是保守主義者，實際上教條主義者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彭甚至還批評軍事學院首席蘇聯軍事顧問的軍事觀點，說對這樣的「軍事專家」，「我是看不起的」。^[3-79]彭德懷在23日將此一講話紀要報請毛澤東看閱。毛顯然很滿意彭相關講話的內容，認為彭確切地掌握到其要大反「教條主義」的意圖。當日即批轉給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強調「此件值得一閱」。^[3-80]

毛澤東對於會議的發展極為關注。派遣鄧小平就近督導會議，就是他的第一招。第二、毛澤東也不時透過鄧小平或彭德懷、黃克誠，將自己的意見傳達給會議成員，從而對會議氛圍造成影響。例如：在鄧小平安排劉伯承前來與會一事已成定局後，毛澤東便公開表露其對劉伯承的不滿。黃克誠在6月18日的主席團會議上即傳達毛的「劉伯承同志從來是講話的，整風沒有講，勝利後又照搬」的話；^[3-81]彭德懷在同一會議上也傳達毛的「工農兵學商，農業先解放，其次是工業，商業也已解放，沒有解放的就是軍隊和教育界」的意見，讓人感到毛對軍方的殷切期望。^[3-82]第三、毛澤東也多次批轉「大躍進」的相關文件，^[3-83]試圖用「大躍進」引發的奮進心理和樂觀展望，感染、激勵軍方要「敢想敢闖」，揚棄教條，不墨守成規。第四、毛澤東也三度親臨會場演講或召集會議主要人員與談。對於「主帥親征」，「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自不敢小覷：事前悉心準備，毛澤東到場時如影隨形，事後則急忙照旨佈置。

在毛澤東到會講話之前，鄧小平為了讓毛可事先了解會議鳴放出來的主要意見與爭鋒焦點，在6月19日將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秘書處整理的材料〈軍委擴大會議中有關軍隊建設的若干問題與論點〉批報送毛，請其讀閱。^[3-84]6月21日上午，毛澤東在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體會議上發表正式講話，鄧小平在座恭聽。

毛澤東在對全體與會者的講話中，首先對共軍早期歷史上曾發生過的「教條主義」問題加以回顧，強調「資產階級教條主義」與「無產階級教條主義」合流的結果就是「把根據地送掉」。^[3-85]毛繼而切入軍中現存的「教條主義」問題：

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並不是外國的本本，也不是照中國資產階級的政府頒佈的本本，是按照實際狀況打的。朝鮮又打了一仗，我們打敗了美國人。勝利以後，辦了許多軍事學校，軍委又佈置了全軍的訓練，蘇聯那些東西也來了，請了許多蘇聯顧問，產生了一些教條主義。對有沒有教條主義有幾種議論。有人說沒有；有人說有一點，不很多；有人說相當多；有人說很多，

相當嚴重。詳細分析靠大家努力。[3-86]

對於「教條主義」問題是大是小，毛澤東表面上雖儘量表現得他本人是傾向開放討論、交付公評，但其心裏真正所想，還是在談話中有所顯現：

講一段黨的軍隊歷史，就是說有兩部分教條主義。一部分是對資產階級軍事學和管理軍隊的制度，認為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另一部分是無產階級的軍事學和管理制度，這在中央蘇區一個時期是有的，至於中間兩段——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是靠實際情況來打的，解放以後又發生了教條主義。我看上面四種人講的，只一種人說一點也沒有，其他三種人都說有，不過程度不同。我看總是有一點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國，不加區別地搬外國，這是妄自菲薄。[3-87]

毛澤東在同一講話中，還針對「教條主義」問題表示：「個別同志硬是不通，得想辦法幫助他們通一通，是說服，不是壓服。如果這次還硬是搞不通，也不要緊，多數人通了就好了。」[3-88]

根據鄧小平的官方年譜的記載，就在毛澤東至軍委擴大會議的大會上講話的同日，鄧小平曾前去探望奉軍委指示（軍委領導人又是聽鄧的吩咐）到北京參加會議的劉伯承。[3-89]劉伯承抵京後，到其住處探訪的政治人物並非只有鄧小平一人。根據羅榮桓的官方傳記的記述：劉伯承下榻於東交民巷，與羅榮桓比鄰而居。羅立即前往問候，並與劉「親切交談」。[3-90]強烈主張「反教條主義」的羅榮桓，此時探問劉伯承，倒有些像延安整風中「搶救失足者」的味道。與此相仿的是，由於鄧小平身為「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的特殊身份，劉伯承又是正在進行的軍委會議的焦點人物，他此時與劉一晤，恐非僅是敘舊誼、話家常。再加上鄧造訪劉的時間的敏感（由於毛的演講是從上午10點開始至12點結束，鄧對劉的探訪應是在毛演講之後），不禁令人猜想：鄧是否是代表組織，照著毛在會上所說的「想辦法幫助」劉「通一通」？也就是要劉自我批評、自動認罪。

6月23日，毛澤東召集並主持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成員和各組組長座談會，鄧小平也在座。[3-91]毛澤東在此座談會中表示：「學習蘇聯的方針是堅定不移的，因為它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學，現在學，將來也還要學，但一定要有選擇地學，堅決反對教條主義。」[3-92]毛澤東在講話中也明確地提出「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並為自己過去所總結出來的「十大軍事原則」的時效性加以辯護，堅信「小米加步槍」經驗的重要性，仍不能被簡單地否定：

十大軍事原則，是根據十年內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初期的經驗，在反攻時期提出來的，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運用了十大軍事原則，取得了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當然還有其他原因），十大原則目前還可以用。今後有許多地方還可以用。但馬列主義不是停止的，是向前發展的，十大軍事原則也要根據今後戰爭的實際情況，加

以補充和發展，有的有可能要修正的。
現在「小米加步槍」的經驗還是重要的，新的還沒有，就把「小米加步槍」否定了是錯誤的。
當然停留在舊階段也是不對的。

毛澤東也批評軍事院校存在「崇洋媚外」的「怪現象」：

現在學校怪得很，中國革命戰爭自己的經驗不講，專門講「十大打擊」（指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攻德國的十次戰役），而我們幾十個打擊也有，卻不講。應該主要講自己的，另外參考人家的。^[3-93]

親炙毛澤東對「反教條主義」之「教誨」的鄧小平，旋即在當日召集中央軍委負責人開會，討論會議的有關問題。^[3-94]鄧甚有可能在其中與領導小組成員共商策略，以在會議中加重對「教條主義」的批判力道。改變會議進行的方式，或是他們所獲致的結論。根據與會者的回憶：6月23日後，「一連幾天，軍委擴大會議採取半天小組會、半天大會的方式，揭發、批判、檢討教條主義。」^[3-95]大會上動員號召全體「反教條主義」，小組會再激發人人就「反教條主義」作個別發言，「反教條主義」的聲浪直是震天價響。25日下午在懷仁堂舉行的大會上，就有五名會議代表輪番上陣大談、高唱「反教條主義」。^[3-96]鄧小平在26日又召集中央軍委負責人開會，商談會議的有關問題。^[3-97]保持會議對「反教條主義」的熱度，應是鄧所領導的討論中的一項重要議題。

6月28日，鄧小平找黃克誠談話。^[3-98]與談的內容應與準備毛澤東計劃在次日召開的小範圍人員參加的會議有關。6月29日上午，毛澤東再次召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成員和各組組長會議。鄧小平和彭德懷、林彪、賀龍、陳毅陪同毛一起聽取匯報並共同給予指示。關於鄧小平在此會中單獨所作的指示內容，目前並不詳。當時在場的廖漢生的回憶中，只有對毛、鄧以及四位元帥的指示作一個籠統的說明：「教條主義的錯誤是我們自己犯的，不能推之於顧問和蘇聯；破除迷信，總結自己豐富的作戰經驗作為教材，其原則是『以我為主』，參考友軍，研究敵軍；一個農業合作社、一個工廠在破除了迷信之後都能搞出自己的一套東西來，而幾百萬軍隊也應該能搞得出自己的一套來。」^[3-99]這或也可反映出鄧小平在批判「教條主義」上，與毛澤東等人是所差無幾的。

毛澤東在這次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首先對會議截至斯時的發展予以好評，表示這次會議開得不錯，有些同志（如劉亞樓與張宗遜）發言很好。^[3-100]亦即會議確實朝著毛所期望的「反教條主義」的方向邁進，在此過程中也湧現了如劉、張等運動積極分子，他們對「反教條主義」的同聲附和，既有利於爭取會中原本持以中間意向的人，也可教頑固者益加感到孤立。這也應可看作是對鄧小平幫助彭德懷領導會議三週以來的進展的一種肯定。

毛澤東對「教條主義」的批判，在此次小會中也愈加火辣：「不知道軍事學院和訓總到底有多少馬列主義。馬列主義本來是行動的指南，而他們當作死條條來啃。如果馬克思、列寧在的話，一定要批評他們是教條主義。現在教條主義者主張抄蘇聯，請問蘇聯當時是抄誰的？」^[3-101]但是對於犯下「教條主義」錯誤的主要人物——劉伯承與蕭克，毛澤東卻對他們問題的性質做出了區別：劉是「好人犯錯誤」，蕭是「壞人」。這乃與鄧小平對劉伯承問題愈加有自己的看法並勇於使力有直接的關聯。

第六節 對批判劉伯承所作的緩衝

毛澤東、彭德懷對劉伯承的嚴批

在毛澤東決定改變會議議程大打「教條主義」後，劉伯承難逃一劫，他是被批責為「教條主義」大本營的軍事學院的創校院長，軍中「教條主義」瀰漫，他難脫責任，雖然已「南山歸蔽廬」，但仍然遭到「缺席批判」；更尷尬的是，在「老戰友」鄧小平的安排下，他還要奉命赴京準備檢討。

根據劉伯承的官方傳記的描述，劉在赴京前夜，因思緒起伏而無法成眠；在進京的火車上又失眠，致使左眼發紅；到北京以後，因罹患青光眼而眼壓飆高，不得不住進北京醫院，一邊治療，一邊準備檢查材料。^[3-102]「屋漏偏逢連夜雨」，劉伯承夫人汪榮華此時或也因其夫婿政治處境危急而高血壓病復發。^[3-103]即便劉氏夫婦接連病倒，政治的壓力仍排山倒海地向他們迎面撲來。

對於主導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走向的毛澤東而言，劉伯承來京待命檢討，對於會議正在進行中的「反教條主義」運動，可產生加碼、加乘的效果。毛澤東既認為這有戲可唱，豈會不思將之充分利用，進而將會議「反教條主義」的氣氛炒熱到最高點？6月23日，毛澤東在其召集的第一次軍委會議主席團成員和各組組長座談會上，就在煽風點火：

伯承身上的舊軍閥習氣就完全沒有嗎？當著他的面我也要說，我看還是有的。他一到蘇區，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塊兒，軍事上完全是本本主義、教條主義那一套。抗戰時期，好一點。解放戰爭初期，特別是進入大別山，也不行。辦了軍事學院，好為人師，搞起了老本行——教條主義，莫誤人子弟呦。^[3-104]

毛對劉所作的嚴厲批判，無疑為全面批劉大開綠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正式開幕前兩天，5月25日，林彪方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其向毛澤東建言軍委會議方向後，欲在批劉上再立新功，並不令人意外。彭德懷也與毛澤東一搭一唱相應和。前述6月23日的同

一場合，彭德懷表示：「劉伯承身上有很嚴重的教條主義，不但影響了南京，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轎子的。」彭更將批劉「教條主義」結合歷史舊事，直稱：「不要忘了，紅軍時期，教條主義可是逼死過革命同志的！」毛澤東順著彭的話表示：「教條主義真是害死人唷！」^[3-105]毛、彭唱和下，劉伯承的處境因而益加艱困。

劉伯承對於中央軍委以組織的名義要求自己到會，當然心中有數。6月21日，鄧小平「無事不登三寶殿」來訪；23日，毛澤東又在軍方領導人參加的座談會上點出劉的問題。劉伯承化被動為主動，著手作檢討的準備。23日當晚，劉伯承在病床前召集楊得志、陳錫聯和廖漢生。劉向三人表示其因病無法每日到會場，故請協助「了解會議情況，分析問題，提出意見，以便作好檢討發言。檢討的內容主要集中在教條主義方面」。在場的廖漢生後來回憶時也有所感嘆：

望著老院長誠摯的神態，聽著他沉重的話語，我的心情也十分沉重。老院長壓給我們的這個擔子太沉了！我本不願接受，可是又無法推辭。我不明白為甚麼一定要劉帥到會做檢討，但是又一想：這樣做，對我們來說是加上了一副沉重的擔子，但對全軍可能有益處吧？^[3-106]

會議揭發、批判「教條主義」的聲浪，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氣氛下只增不減。會場中批評涉及劉伯承個人的部分，也可從廖漢生的回憶窺知一二。廖為劉伯承整理、歸納的批評意見，主要有：「問題——不『以我為主』，不信任群眾，尊重組織不夠；原因——迷信外國，輕視自己；迷信個人，輕視群眾；迷信自己，輕視組織；性質——也是兩條建軍路線鬥爭在學院的反映。」^[3-107]不難想見會議批劉炮火之猛烈、上綱上線之高。

鄧小平節制對劉的批判

劉伯承必須抱病參加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乃是軍委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所做成的決定。對於犯了「教條主義」錯誤的劉伯承，鄧小平是贊同要給予批判的（他在1972年8月3日寫給毛澤東效忠兼自省的信中，仍堅稱「劉伯承同志在軍事學院的教學方針中是有缺點和錯誤的，批判是應該的」），^[3-108]但是對於軍委擴大會議上對劉一波高於一波的批判，鄧小平卻有所保留，特別是當對劉的批判，顯然已超出對他「教條主義」錯誤的指責之時。

中共的政治大批判經常會流於「牆倒眾人推、鼓破眾人捶」的情形。這是因為在上級示意要對特定對象展開批判後，下級為表政治進步，通常會爭先恐後猶如餓虎撲羊地跟進批判。在此過程中，識時務遠比講事實還重要，不然恐會有引火燒身的可能。其中順道挾報私怨，更是常見。批判的內容到後來只會越扯越多、越來越與事實不符。劉伯承在此次軍委擴大

會議期間，既已被毛澤東點名批判，其他的中共要人自不會對之客氣。彭德懷與林彪在毛澤東起頭後，從批判劉伯承在中共江西時期與中共建政以後的「教條主義」錯誤，進一步地對劉在抗日時期、國共內戰時期的功績開始有所質疑，更乾脆指稱劉伯承在「二野」的戰事中作用不大，大有不把劉參加中共革命後的歷史全部鬥臭、鬥倒則不罷休的架勢。

林彪、彭德懷對劉伯承的有關揭發，為批劉提供新的線索，其結果可能會將對劉問題的審查再予升級。在中共中央與軍方高層開會對之進行討論甄別時，相關時期與劉一起工作、箇中詳情最為清楚的鄧小平，自有超乎他人的發言權。對於這種針對劉伯承的愈漸失焦、失實的批判，當著毛、林、彭的面，鄧小平不但不予苟同，更直接跳出來踩煞車。鄧同意對劉「教條主義」錯誤予以批判，但也認為應以此為界，不能將劉全盤否定、一桿子打死。

在前述的鄧小平1972年所寫的信中，對於自己當時針對劉伯承問題與林、彭所作的交鋒，有如下回顧：

林彪和彭德懷一塊，對劉的批評不是與人為善的，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更是聲色俱厲的，他們甚至說劉在二野沒起甚麼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裏起作用，當時我曾為此說過，沒有那樣能夠很好合作的司令員，我這個政治委員也起不了甚麼作用的。[3-109]

鄧小平在1980年與楊得志、楊勇、張震就「反教條主義」問題的談話裏，還表示他當時會直接就劉的問題向毛澤東反映。鄧表示：「『反教條主義』主要是整劉帥，最後還是我向毛主席提出來要保劉帥的。當時，有人對我說，『二野』打仗主要靠你。我向毛主席講，沒有一個好的司令，我這個政委怎麼行呢？」[3-110]

鄧小平這種主張只攻劉伯承「教條主義」錯誤而不扯其他的態度，在1958年7月19日他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大會講話中，有較完整的表述：

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們是老搭檔了，你說他犯了錯誤，我心裏那麼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這幾年工作不是都做得不好，也不是過去不好。不能說他多年來做的不是好事。如果這樣說，不公道。[3-111]

鄧小平何以會如是為之？首先，鄧小平若認可林彪、彭德懷對劉伯承的戰場表現所作的背離事實的貶抑，無異於對他們針對劉的「假指控」作偽證。鄧如從之，將來也可能會落人口實，被說成是他趁火打劫，意想一人獨佔「二野」的軍功。

其次，鄧小平若呼應林、彭，極有可能會讓已因「教條主義」問題飽受批判的劉，再失去戰功這層保護膜，面臨被全面打倒的危險。對於作為「教條主義」「首犯」的劉採以「無情鬥爭、殘酷打擊」的作法，其惡性示範的作用與連環效應，也勢將大大不利於會議整風的整體健康發展。身

為「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擔負將會議開好重任的鄧，恐不樂見其發生。相反地，鄧這時出手規限對劉的批判，將之就事論事地限於對後者「教條主義」問題的揭批，既符合中共中央在6月初對會議所定的「反教條主義」主題，也可援之為例證明黨對相關鬥爭是遵循「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有理、有利、有節」等方針。

再次，鄧與劉長年並肩作戰，世人多以「劉鄧」稱之。兩人在共事過程中，雖不免有歧異，以至於摩擦，但因工作風格相補，大體配合得不錯。^[3-112]鄧對劉知根知底，自己過去勳業的建立也與之密不可分。劉在這次軍委會議「虎落平陽」，鄧扮有要角，但要其坐視他人將劉儘往死裏整，而自己完全對劉見死不救，恐也於心不忍、狠不下心。

鄧小平親自為劉伯承戰時指揮能力與功勞作證，足讓林、彭啞口無言，有效地限制了會議高層對劉愈漸失焦的批判，也對毛澤東的相關態度造成了影響。6月29日，毛澤東在其召集的第二次會議主席團成員和各組組長會議上，針對劉伯承與蕭克的問題分別表示：

蕭克不僅有教條主義，而且有資產階級思想、軍閥主義、封建主義思想。劉伯承同志是黨內很老的同志，基本上是好的，很有能力，做了許多工作，主要是沒有破除迷信，有自卑感。兩頭沒搞好。一頭是他到中央蘇區時沒有搞好，一頭是革命勝利後在軍事學院一段沒有搞好。中間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表現都好，這段時間長，工作好，很努力。所以兩頭短，中間長；兩頭小，中間大。

毛在講話中還提到要劉好好休息，可以不來開會作檢討，表示個態度就可以了。至於蕭克就沒那麼幸運了，毛表示：「蕭克是要發言檢討的。蕭克的錯誤是嚴重的。」^[3-113]當毛講到對劉的評價時，鄧小平也見縫插針地從旁表示：「劉工作積極認真，對組織是尊重的」，「伯承今年已66歲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緊張」。^[3-114]

毛澤東除了採納鄧小平所提的會議批判劉伯承只應批其「教條主義」錯誤的主張，也接受了鄧的意見：劉犯的「教條主義」錯誤，尚不至於影響其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位。^[3-115]毛澤東之所以「從善如流」，或因毛若欲藉「反教條主義」之名，對軍方行「敲山震虎」、對劉個人「算陳年帳」之實，劉本處於半退休的狀態，無異於一隻「死老虎」，何況劉也已擺出低首認錯、準備檢討的姿態，再過度為難之並無太大意義。鄧小平為劉伯承「仗義直言」，是在響應毛澤東批判「教條主義」號召（劉到會也是由鄧出面促成）的前提下進行的，與毛本人衝突不大。再說局面弄僵，對於會議的發展未必有利，反恐有害（鄧的意見若不算數，將有損其再繼續代表中央領導會議的威信；會議走勢也可能會因此急遽變化而出現難以預料的情況）。毛也可藉此籠絡人心，並同時給鄧一個作順水人情的機會。所以毛澤東索性順勢而下，將劉伯承問題作較輕的定性——「是思想方法問題、是方向問題」，也對劉認真的態度予以肯定。^[3-116]

第七節 對會上個別人士檢討與批判的過問情形

毛澤東在6月29日的座談會上宣稱：「這次會議主要是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以整風方式大鳴大放，破除迷信，提高思想，吸取經驗教訓，主要是教育全黨全軍，團結全黨全軍。」讓犯有「教條主義」錯誤者在會上公然認錯、伏首認罪，其他與會者鑒此能有所警戒、體悟並轉化想法，就是會議達到目的的一項重要標誌。

對劉伯承的大會檢討

鄧小平在6月中為了避免「反教條主義」的號召在會議中熱不起來或熱不持久，透過軍委領導人半請半押地要劉伯承到會；6月底，也是鄧小平將劉伯承豎立為證成會議秉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方針的「標兵」，以防會議「反教條主義」批判過熱到將「教條主義」的「患者」全面燒焦、燒糊的地步。毛澤東雖然也為劉伯承講了些好話，並表示劉無須到會檢討，但還是要之「表示個態度」。易言之，劉多少還是得為其「教條主義」錯誤表達悔悟，以示中共中央「反教條主義」政策的正確。如何讓劉順利「交卷」，使之在程序上完備一名被黨搶救過來的「標兵」最後所需的合格條件，也是鄧小平要費思量的問題。

陳錫聯回憶：鄧小平在中央與軍方高層為劉伯承說項後，鄧「還讓我去看望一下劉伯承，請他寫一個簡短的發言，他自己不能寫，讓別人代寫也可以」。亦即就鄧看來，要劉作發言，形式上的需要乃大於內容實質。

但劉伯承對此卻很認真地看待。陳錫聯回憶：

我去了，把小平同志的意見也轉告了。劉伯承說：我寫，我自己寫，我不找別人。出來後，我看汪榮華在掉眼淚，忙問是怎麼回事。她說：劉老的眼睛快瞎了，青光眼很嚴重。我急忙打電話給小平同志，報告了這個情況。小平同志大聲說：不要寫了，事情會弄清楚的。[3-117]

這位右眼已瞎、左眼又濁的元帥說到做到。劉伯承在南京軍事學院的下屬體貼地為他撰寫檢討發言的草稿，並主動分攤責任。然而，劉讀後不滿意要求改寫，最後乾脆自己動手伏案「大加修改，著重檢討自己」。^[3-118]劉伯承堅持要寫，固然是因為毛澤東曾言要他「表示個態度」，而且沒有一個適切的表態，軍委會議裏被發動起來的「群眾」，也不會輕易讓他過關；從劉伯承的官方傳記所披露的資料來看，另外也不乏一種可能：劉自己做的雖是一個違心的檢討，但多少仍可在其中吐露一些實情，以曲筆的方式為己辯誣。^[3-119]

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一開始就栽了跟斗的粟裕，在寫完檢討報告後即交代秘書呈送鄧小平、彭德懷、林彪審閱。^[3-120]粟裕給彭、林看檢討報告，主要因兩人為軍中兩大「龍頭」；粟交給鄧看，則因鄧代表中央召開元帥會議，大有來頭。劉伯承「眼盲心不盲」，也知道鄧小平在會議中的關鍵角色。他完成檢討發言稿後，也交送鄧審閱與處理。鄧小平處置的方式是自己不表態而讓毛澤東裁決。7月8日，鄧小平將劉準備在會議上講話的發言稿批報毛澤東：「這是伯承同志的發言稿，他要我們幫他看看。我已打印幾份送幾位同志幫他看看。現先送（這）一份看看。」^[3-121]鄧小平心裏可能的想法是：他此前已幫劉伯承部分解圍了，也就是將對劉的批判縮限在「教條主義」問題上，現在劉主要就「教條主義」問題作檢討，自己也就不宜再多說甚麼了。而且劉在檢討稿中所表示的態度，是否吻合毛澤東在6月29日要劉表示的「態度」，也只有毛本人說了算。鄧自不會越俎代庖，也可在此問題上，向毛表現出對其職權的尊重。

不到一日的景光，7月9日，毛澤東就對鄧小平批轉的劉伯承的檢討稿批示：「退小平同志，伯承此件寫得很好。所附七大講話一段，也好的。」^[3-122]劉伯承的檢討內容在得到毛澤東的認可後，它還得交諸軍委擴大會議，讓會議的「領導」和「群眾」所接受。對於劉伯承到會檢討能否順利一事，鄧小平不敢輕慢，也頗下功夫。因為鄧得回頭向會中大大小小的「反教條主義」積極分子做工作，他們激昂的「反教條主義」情緒，追溯起來還是由鄧自己所煽起的。

鄧小平首先嘗試打通對劉伯承還懷有「革命義憤」、認為不能就此了事的軍隊高級領導人的思想。鄧在高層開會時表示：「這事我看就差不多了，眼睛快瞎了。」^[3-123]7月9日，鄧小平會同陳毅、聶榮臻、葉劍英、黃克誠等人研究劉伯承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發言的有關事宜。^[3-124]同日，黃克誠在軍委擴大會議小組長聯席會上傳達毛澤東所言的「劉〔伯承〕是好人犯錯誤，蕭克是壞人」。^[3-125]無一不是為了讓劉伯承在預定10日進行的大會檢討能順利過關先行佈置。

7月10日乃為同情劉伯承的人所痛心的日子。衰衰老矣、病痛纏身的劉伯承，在他人的攙扶下登台檢討。然而，與劉作檢討的政治氣氛極不搭配的是，台下將官聽眾衣裝筆挺、正襟危坐，他們在「有罪〔教條主義〕在身」的劉台上現身時，以及檢討發言結束後，對劉報以的竟皆是熱烈的掌聲。如此很難不讓人去想像這背後有鄧小平在事前的居中協調與安排。若真是有，也算是鄧為了「老戰友」在歷盡會議風波後能較體面地離場。

鄧小平在22年以後強調，在1958年「反教條主義」之時：「迫於毛主席的決定，進行了批判，但我還是保護了一些人，特別是劉帥。」^[3-126]但是事情的實際過程，顯然較他的此番說詞更為複雜與曲折。因為正是鄧小

平將劉伯承架上了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滿足了毛澤東藉由批判劉的「教條主義」錯誤，以樹立自己獨尊的軍事權威地位的心意，並痛快地一了他與劉之間的歷史私怨。在此過程中，劉身心飽受煎熬。只是劉在會中被整到最後，也是由鄧稍事緩頰，使之在「大教條主義者」這頂政治高帽不離頭、自己有錯有責不離口的情況下，從會場上脫身。

對葉劍英的大會檢討

對於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會場上其他與劉伯承同樣被撻伐為犯有「教條主義」錯誤的人，鄧小平又有何表示？

曾任訓練總監部代理部長兼黨委書記的葉劍英，在會議期間也被點名批判；在劉伯承檢討的同日大會上，他也被迫發言檢討。為了過關，葉劍英首先承認自己的錯誤與責任：

幾年以來，特別是我在訓總工作期間，統率著六員上將，從事全軍訓練工作，由於對教條主義給予我軍各項工作的影響，和給予訓練工作所帶來的損害認識不足，體會不深；更沒有把它提高到有關我軍指導思想和建軍作戰基本原則的高度去看待。因而就沒有能夠及時地採取堅決而有效的措施，充分發動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的方法，展開兩條路線的鬥爭，實行大破大立。以至訓練工作中的那種迷信外國、輕視自己、脫離實際、機械搬運的教條主義的惡劣傾向，長期以來沒有克服。

訓總不僅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而且又犯了反對反教條主義的錯誤，毫無疑問我應當自覺地把責任承擔起來。因為我是訓總的主要負責人，是代理部長，又是部黨委書記。所以既不能把責任推到劉伯承同志身上，因為伯承同志從未過問訓總的工作。也不能把責任完全推到蕭克、李達同志身上。……我是應該首先負責的。

葉也痛定思痛地試從思想深處挖掘自身犯下「教條主義」錯誤的根源：

我自己把這一段時間內的工作概括了一下，認為工作既沒有做好，交班也沒有交好。原因是甚麼呢？我反覆地想過這個問題：是自己贊成教條主義和反對反教條主義嗎？還是由於領導上的官僚主義？誠然，我腦子裏的教條主義思想是沒有根除，官僚主義不僅有而且相當嚴重，但這樣講仍然不能充分說明問題。那麼究竟錯誤是在甚麼地方呢？依我現有的水平看來，主要是在我軍建軍的兩條路線鬥爭中，自己採取了缺乏原則性的庸俗的調和態度。不是用鬥爭的方法，而是用說教的方法去對待訓練工作中的嚴重的教條主義傾向和犯了嚴重的單純軍事觀點與軍事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我的主要錯誤就在這裏。[3-127]

葉進一步地陳述自己在此次錯誤中所得的教訓：「我個人從這次錯誤中並聯想到歷史上一些問題，認為體會比較深刻的有一條教訓，用三個字概括就是：要鬥爭。」並表示：

作為一個中國共產黨的黨員，作為一個多年追隨毛主席的部下、學生，對「鬥爭」兩個字卻一直了解不深，掌握不牢。在原則性的鬥爭場面，只憑說教，不組織批評和鬥爭，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這一次的錯誤主要原因我想在這裏。

鬥爭性不強是我長期以來沒有克服的老毛病。看看這次大會，再看看自己，恰恰是個鮮明的對照。必須從錯誤中吸取這一教訓。必須從會議中得到教育。[3-128]

以上詳引葉劍英的檢討內容，目的在於呈現一個冷酷的事實：又是一名元帥低頭認錯、捶胸自責。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鄧小平領導下所營造出來的會議氛圍，對於涉及「教條主義」錯誤的人製造了多麼強大的政治壓力，讓他們唯能拋棄己見、俯首投降。

以葉劍英官拜元帥的位階，他在會議中的遭遇與言行，「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應是瞭若指掌。只可惜目前沒有任何資料能具體說明鄧曾在葉的問題上有否表示或作為。葉劍英在「文革」結束後曾言：

「鄧小平是不授銜的老師，是老師的領班。」^[3-129]葉的相關認識恐怕早在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期間就因有親身體驗而初步形成了。

對蕭克的批判與檢討

蕭克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舉行以前，即對於軍隊訓練與教育存有嚴重的「教條主義」問題的指控不表認同。當軍委會會議主題轉入「反教條主義」後，他自然首當其衝，從6月7日、20日彭德懷的大會講話中即可見此端倪。會議對蕭克「教條主義」錯誤的批判越演越烈，因為毛澤東對蕭克的態度愈來愈硬，評價也愈來愈低。

毛澤東在6月29日的小型座談會上指稱：蕭克「不僅有教條主義，而且有資產階級思想、軍閥主義、封建主義思想」，也就是蕭的問題不僅是他犯下「教條主義」錯誤，還在於其個人品質中存有對革命有害的成分。7月8日中午，由毛澤東召集，有鄧小平和六位元帥、中央書記處兩名軍事書記出席的黨軍高層會議上，^[3-130]毛忿忿不滿地指控蕭克稱毛的軍事觀點已過時。^[3-131]毛澤東既然表明蕭克對他不敬，眾人豈會輕饒之？當日的軍委主席團會議上，在群情激憤下，蕭克被逐出主席團；下午的大會上，批判火力就特別集中在蕭克和他在訓練總監部的副手李達身上。^[3-132]

為何毛澤東與軍委會會議會將矛頭對準蕭克猛戳呢？在毛澤東早年政治發跡的過程中，對於蕭克兩次「站錯隊」的歷史，^[3-133]毛恐怕沒有忘懷而在此時發作以外，蕭克晚年在回憶錄中亦有一個短要的解釋：「當時，領導會議的人向毛主席反映，說蕭克抵抗反教條主義運動，拒不檢討。毛主席還說到蕭克是壞人，是資產階級隊伍的人。」^[3-134]亦即「領導會議的人」在信息提供上，一定程度地引導了毛澤東對蕭克問題的認知與判斷。所謂「領導會議的人」，彭德懷自是在列。然而，對訓練四級幹部會議做出「方向不對、風氣不正、水平太低」的12字批評、擔任「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的鄧小平，在對毛匯報蕭克的問題上，其作用應該不會比擔任副組長的彭德懷還小。

從領導會議的需要出發，由於鄧小平已規劃將劉伯承作為會議進行

「反教條主義」運動中「治病救人」的範例，對劉的批判更多地轉以「和風細雨」的方式。然而，與此同時為了維持會議「反教條主義」的熱度，對於次一級的「教條主義」錯誤的「要犯」與「從犯」的批鬥，反而有必要加重，甚至有可能為此而故意放縱對他們問題的揭發與批鬥，就算超出「教條主義」問題的界線也無所謂。

因為中共中央策動三軍將領反對「教條主義」時，即已預設了「教條主義」在軍中已嚴重到不反不行的地步。然而，如果負責軍隊教育與訓練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劉伯承再加上葉劍英），其「教條主義」錯誤只被定性為「思想方法問題」，那麼要解釋讓全軍範圍內產生「教條主義」錯誤的原因，恐怕還得另覓「兇嫌」才行，而且相關嫌犯「罪行」越惡劣、「本質」越低下，就越能解釋「反教條主義」的正確性與正當性。

在會議後期，或正基於會議還要繼續大反「教條主義」的需要，對訓練總監部的蕭克與李達，以及高等軍事學院的陳伯鈞、軍事學院的鍾期光的批判，愈加上揚。^[3-135]最讓蕭克無法接受的是，批判者就是逼著要他承認自己「反黨」。蕭克在1950年代初期主持編寫的軍隊共同條例（紀律、內務、隊列），在會上被批為是不要「黨的領導、民主制度、群眾路線以及官兵一致的基本原則」。蔡鐵根因1956年底上書鄧小平直陳自身對「反教條主義」號召的反對意見，此時也處於被審判的地位，但他看到會議對蕭克的批評嚴重失實，憤而發言指出：軍隊共同條例乃經過彭德懷修改、毛澤東批准。蔡話未言畢，即當場被運動的積極分子摘掉帽徽領章、扭送押出會場。此一場面實無異於農村基層批鬥大會上所出現的暴力揪打的情形；兩者稍有不同之處，只是他們身著將校服的衣裝。蔡鐵根隔年被劃為右派，並遭勒令離開軍隊、降級使用，在「文革」中更遭槍斃處決。蕭克晚年憶此，仍唏噓不已。^[3-136]

蕭克在中共江西時期即因共同刻蠟板而與鄧小平相熟，在1936年底鄧罹患傷寒而昏迷期間，還會特意前往探視。^[3-137]然而到了此次軍委會議後期，鄧小平應已對之是形同陌路了。

對李達的批判與檢討

時任訓練總監部副部長兼計劃和監察部部長的李達，過去是劉伯承、鄧小平征戰南北時重要的得力助手，擔任「劉鄧」參謀長一職長達14年，立功無數。^[3-138]李達在此次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被盯上，有人甚至提出「李達很滑，這次不要讓他滑過去」。^[3-139]李也因而成為眾矢之的而「中箭落馬」。最終的結果是：1959年5月14日，在中共中央轉發解放軍總政治部的〈關於以蕭克同志為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和反黨宗派活動〉的報告中，李達和蕭克一樣被打成「反黨分子」。

迄今為止，都沒有資料證明鄧小平曾在會上或會下為李達美言和辯護過。鄧小平恐怕也是在會議「反教條主義」的政治需要與顧念舊情之間，做出了以前者為要的取捨。尤有甚者，正因為鄧小平和李達在過去是上下從屬的關係，鄧愈有必要表現得嚴格，以顯示自身領導「反教條主義」是從公出發、有公無私。當年奉命留在大別山堅持戰鬥、後任「二野」第四兵團副司令員的郭天民，^[3-140]此次也身陷「反教條主義」政治風暴，^[3-141]鄧小平似亦不會聞問。既然「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都如此嚴以律己，其他軍酋對於各自「山頭」內的「失足者」，也只能袖手旁觀、不敢護短。^[3-142]

彭德懷在李達被免去軍職後，或感到李達自抗日以後效勞十餘年的兩位長官：一位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被批判、檢討（劉伯承），對之無暇顧及；另一位對之表現得鐵面無私、不徇私情（鄧小平），彭只能將李達的出路問題，安排至賀龍那裏（因為李達在抗戰前曾在賀龍麾下工作過）。因此，彭德懷對李達表示：「你原來是賀總的人，現在再回到賀總那兒去吧。」^[3-143]

對於1958年李達受到的不公平對待（其妻子在政治上也受到牽連），^[3-144]鄧小平並無採取甚麼具體的補救措施，至多在隔年12月，派李達到山東西部（「劉鄧大軍」曾活動的地區）「慰問看望鄉親」，^[3-145]多少以示其不忘李的舊功。直至1973年鄧小平復出工作後，方特別過問李達在1958年所遭受的打擊。^[3-146]1980年代，鄧小平二次復出後，「反教條主義」被指為錯誤，李達多年冤屈終於得到洗雪。1989年11月20日，鄧小平在會見編寫「二野」戰史的老舊屬時，多處提到李達的「當年之勇」。^[3-147]鄧特別表彰李的戰功，或許有補償的意味。

李達可知鄧小平深度涉入1958年「反教條主義」，甚至可能在李個人的冤案中佔有關鍵性的角色嗎？事發後的一段時間內，李或許還不甚了了。有資料指出：李達在1959年彭德懷政治倒台後，認為自己翻案有望，便計劃上書鄧小平以尋求協助。李達希望劉伯承能在其書信上一同簽字署名，但為劉所拒。劉表示：「我一不簽字，二不指望活著得到平反，你們是『蚊子叮菩薩』，找錯了人。」針對此事，劉伯承也曾跟妻子汪榮華表示相同的意思，亦即：李達「心粗」，「是蚊子叮菩薩認錯了人」。^[3-148]易言之，劉伯承認為：有關「反教條主義」一案，站在彭德懷背後、驅使其行事的正是鄧小平（對於鄧在「反教條主義」中的關鍵角色，包括鄧對劉「打一巴掌揉三揉」，劉自身應也心知肚明、了然於胸）。李達找鄧幫忙，如同要鄧承認自己在此事上有誤，李到頭來只會白忙一場。

事實上，李達確曾在1961、1962年兩次上書鄧小平，指稱1958年的批

判鬥爭「擴大化和逼供的情況十分嚴重」，「使成批幹部長期背著沉重的包袱，懷有冤氣和怨氣，已給黨的事業帶來了極不利的後果」，因而要求平反。^[3-149]但果然都如劉所預言的不了了之、沒有下文。

縱使李達身受委屈，但對「老長官」仍一派忠心。在「文革」的第二年，被批判的李達仍為鄧小平的革命歷史作辯護；^[3-150]鄧在「文革」中復出，人剛回北京，李和其他「二野」舊識也不顧避諱直驅探訪。^[3-151]「文革」後，李達對於自身在1958年「反教條主義」中的不幸遭遇的緣由，似乎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李達在詩作中提及此事時表示：「錯反『教條』整兩帥，蒙冤作了替罪羊。」^[3-152]但是他晚年談鄧小平時依舊對之讚譽有加，^[3-153]對自己在1958年所受的迫害則隻字不提。

第八節 對會議總結發言與決議的審定

中共每凡舉行重大會議，在會議的尾聲皆會安排主要負責人就該會的發展經過與討論結果進行總結，另外，最後也會以會議的名義發佈一正式的決議，公告會議的主要成果與精神，1958年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自不例外。7月19日上午，彭德懷作會議總結；7月22日下午，會議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後，也宣告閉幕。「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鄧小平有始有終，對相關內容文字的產出與確定，也恪盡職守地加以把關、審定。

根據彭德懷秘書的日記，彭德懷對於自己預定在會議最後，以中央軍委日常工作負責人身份向大會提交的總結發言很重視，從5月底就開始與秘書討論、著手進行準備。然由於會議在6月7日轉向，彭德懷對總結發言稿的繕寫準備工作，在6月10日又重新加以安排，其後他也與黃克誠對會議總結的提綱有所討論。

6月19日，鄧小平約黃克誠和胡喬木談話。^[3-154]與談的內容甚有可能與總結發言的內容佈局有關，因為在同日下午，黃克誠突然指示相關文件執筆人改變原本的構想，將總結發言中原定的對軍委領導工作的檢討，擴大為對全軍工作的檢查。如此大的變動，恐非黃克誠，甚或是彭德懷可自行決定的。如同6月上旬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介入、調整軍委擴大會議走向，鄧若代表中共中央向軍委秘書長作出總結發言結構要大改的指示，自也在情理之中。至於鄧小平之所以同時找中共黨內重要文膽，也是鄧在中央書記處的僚屬胡喬木和黃克誠一起與談，就是要在相關稿件後續的撰寫上借重胡的文筆。後來（24日）胡喬木即偕同彭德懷一道和寫作班子討論總結發言稿的內容問題。^[3-155]

鄧小平一方面安排胡喬木從內部參與總結發言稿的撰寫；另一方面，

他自己又在外部對該稿進行審閱。7月15日，鄧小平將其審閱後的總結發言稿退回。雖然「大的修改不多」，對於領導小組組長過目後的意見，副組長仍不敢輕忽。隔日上午，彭德懷即召開主席團會議，討論總結發言稿，^[3-156]為其之定稿作最後的衝刺。

彭德懷在7月19日上午發表的總結發言，內容有四個部分：一、幾年來軍隊工作的基本情況；二、詳述共軍在歷史上與現階段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並強調必須堅持的軍事路線和「以我為主」的基本指導思想；^[3-157]三、戰略方針和國防建設工作；四、思想工作和領導工作。彭德懷在第一與第二部分中，批判現階段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直指蕭克有「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罪惡活動」等。彭更提出：為了堅持和貫徹正確路線，克服錯誤路線，目前的鬥爭必須在全軍認真展開，認真討論和教育，決不可等閑視之。^[3-158]對此，蕭克後來也回憶：「彭德懷在總結中給我定性為：『一貫堅持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從極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出發，進行反黨反領導的宗派活動，企圖改變我們人民軍隊的面貌』。」^[3-159]

由於彭德懷總結發言的內容，乃事先經鄧小平過問與審定；鄧在同日下午的大會講話中也表示：「彭總已作了會議總結，把會議所有問題都概括起來了，講得很清楚，我完全同意。」^[3-160]因此其中對蕭克的相關指控，說是經鄧認可與點頭也不為過。

鄧小平對會議最後決議的產出也有施力。〈會議決議〉從6月下旬開始起草起，就受到鄧小平麾下的中央書記處的監製。6日25、27日，胡喬木在中央書記處辦公所在地居仁堂會議室領導國防部長彭德懷辦公室與總政治部相關人員，就〈會議決議〉稿的內容進行討論並安排分工。7月2日上午，〈會議決議〉初稿完成後，即送交胡喬木審閱。^[3-161]胡看過後，彭德懷又率領諸將研商、討論。^[3-162]有紀錄顯示：7月14日，鄧小平會同中央軍委負責人談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決議問題；在7月22日〈會議決議〉通過的當天上午，鄧小平還再同軍委負責人商談會議決議問題，^[3-163]應是對之做最後的敲定工作。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的內容有：「訓練總監部和一些院校，教條主義傾向直到最近仍然佔著統治地位。而且某些個別同志，還堅持了一條與黨的軍事路線相對抗的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現在我軍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基本上是我軍歷史上正確路線和錯誤路線的鬥爭在新條件下的反映」，「這樣兩條軍事路線的鬥爭，貫穿著我軍30多年的歷史」，「目前軍隊中的錯誤軍事路線，實際上是歷史上的錯誤路線在某些範圍內的復活」。「錯誤路線可以在受過歷史裁判以後捲土重來，在一段時間和一些部門、一些單位中可以橫行無忌，俘虜群眾，甚至有計劃

有組織地向中央和軍委的正確路線猖狂進攻，這就證明，兩條路線的鬥爭是一個長期的艱苦的過程。」^[3-164]該決議更進一步地要求：「為了堅持和貫徹正確路線，克服錯誤路線，目前的鬥爭必須在全軍認真展開，認真進行討論和教育，決不可等閑視之。」^[3-165]

彭德懷在7月19日進行總結發言的同日下午，鄧小平也遵奉6月7日毛澤東信中所提之「軍事會上，你應準備去講一次，時機可在結尾的時候」的指示，在懷仁堂代表黨中央對會議作一報告。這也是擔任「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的鄧小平從會議幕後正式走到會議幕前的一次亮相，當然他是中央總書記的身份蒞臨指導。

鄧小平在講話的一開頭，就對此次軍委擴大會議作出「會開得很好」的評價，甚至還說：「這次會議批評了我一句話，就是我講軍隊落後了，現在看來要取消這句話。」^[3-166]

鄧小平繼而以黨中央的名義對中央軍委與全軍的工作予以評價：

軍委的領導，基本上是正確的，方向是對的。軍隊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當然，也還存在著缺點，主要是思想不夠解放，落後於群眾。遠離實際、遠離群眾的結果，就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思想解放，特別是高級幹部的思想解放，對社會主義建設有決定的意義。

針對會議後來確立的「反教條主義」主題，鄧小平首先從理論的高度闡釋「教條主義」的錯誤性質，強調它與「修正主義」錯誤對黨同樣是一重大的危害：

我們必須尊重馬克思主義的共同原則、普遍規律。但是光這樣不行，還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規律和我們自己的特點、實際結合起來。普遍規律是大同，否認大同就是修正主義，否認自己的特點和實際，就是否認小異，就是教條主義。犯修正主義錯誤，我們建不成社會主義；犯教條主義錯誤，我們的事情同樣會遭受失敗。^[3-167]

鄧小平繼而對所謂「教條主義者」的「畫地自限」加以批評：

學習蘇聯是不錯的，應該學。但是我們不能總跟在人家後面走，要有自己的創造。要敢想、敢說、敢幹，富有創造性。如果外國沒有的話，我們就不能說；外國沒有的圖，我們就不能畫；外國沒有的字，我們就不能寫，那麼我們就永遠不能超越別人，就不能對世界做出我們的貢獻。^[3-168]

鄧也強調「教條主義」不但在過去歷史上害中共軍隊打敗仗，對中共未來可能遭遇的戰爭，也會有致命的影響：

我們軍隊過去向來打勝仗，就是不靠教條主義打勝仗的，教條主義是打敗仗的。如果我們軍隊裏面要搞教條主義，將來也會打敗仗的，以為是百戰百勝啊，永遠是打不爛的，你試試看。搞教條主義一直搞下去，若是仗一打起來，我看要打敗仗的。^[3-169]

他更用警惕的口吻表示：教條主義會「把我們的腦筋搞得死死的，到

打仗的時候，就出問題了」。「如果真正要了解我們軍隊傳統，就是活得很，就是馬克思主義多。毛主席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多。」^[3-170]

因為中央軍委擴大會議舉行之時，正值「大躍進」如火如荼下的國內形勢，鄧小平的講話中自然對之有所觸及。鄧作為中共推行「大躍進」的主要推動人與執行者，對此一運動規劃的美景如數家珍（有關的內容請見第四章與第五章），讓聽眾席上的將官們如臨其境、浮想聯翩，感到「前途的確令人樂觀興奮」，^[3-171]進而在「反教條主義」打破思想枷鎖和精神禁錮後，勇往直前地獻身於以「敢叫日月換新天」為職志的「大躍進」運動。^[3-172]

由於鄧小平監製下的彭德懷的會議總結發言與會議決議皆強調對「教條主義」的鬥爭要繼續，「決不可等閑視之」，因此，「反教條主義」的烈火並未隨著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結束而熄滅，在會上被點名的「教條主義者」，發回原單位繼續受批。相關單位也「依樣畫葫蘆」地仿效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採行的鳴放整風方式，揭露與批判「教條主義」及其代表人物。

訓練總監部持續猛烈地批鬥蕭克，使得蕭在精神緊張、身心疲憊的狀態下，竟在一次批鬥會後大口吐血。^[3-173]劉伯承在7月10日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所作的檢討雖一次過關，但在會後也難逃第二波的劫數。位在北京的高等軍事學院和軍事科學院舉行為時三個月的兩院黨委擴大會議，在劉伯承當面表示不同意的情況下，會議仍對劉嘔心瀝血的南京軍事教育事業做出徹底否定的結論。^[3-174]

小 結

從本章的探討中可知：鄧小平在1958年中共軍隊高層整風與「反教條主義」運動中角色之重要，當是無庸置疑的。首先，從事態發展的過程析之，鄧小平從初始即密切注意軍中的「教條主義」問題和弊病，並與主軍的彭德懷在這方面保持密切的工作聯繫。鄧小平對軍隊「教條主義」爭論的掌握，讓黨中央和毛澤東不但能及時知悉情況的變化，鄧在此一問題上愈益激進的態度，也對毛對「反教條主義」的決斷產生影響。其次，在「反教條主義」白熱化的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更銜毛之命推促彭德懷將軍委整風轉向「反教條主義」，大力開展對犯錯人士的大批判。

經過對鄧小平相關角色和活動的重建，1958年中共軍隊「反教條主義」的歷史圖像和個人角色問題，也已然較完整地釐清和界定：反對「教條主義」的決定權毫無疑問地為毛澤東所掌控，林彪發揮的至多是火上加

油的作用，^[3-175]鄧小平擔任傳達、部署以及監督的職責，彭德懷和黃克誠則負責實際執行和具體落實。

最後，簡要陳述鄧小平擔任要角的1958年中共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所造成的政治遺害。

1958年以批判教條主義為核心內容的軍隊整風，雖然並非完全一無是處，例如：有力制止中共軍隊學習蘇聯軍隊經驗中，或多或少存在的照抄照搬、忽視國情之偏向；對於中共軍隊自身經驗的提煉與汲取，相較之前也更加注重。然而，由於中共以整風方式開展「反教條主義」，使得運動的後果是弊遠大於利，這也是作為「反教條主義」的關鍵主事者之一的鄧小平，所應共同擔負的責任。

一、對軍中高層政治風氣的不良影響：「反教條主義」讓若干高級將領受到嚴苛的批判，甚至被迫交權和轉業，例如：劉伯承離開軍事教育和訓練工作的領導崗位，蕭克轉任農墾部副部長，李達調去國家體委。該事件對於軍中高層的行事作風，更造成了惡劣的示範效應。「只唯上，不唯實」，秉承上意，對批判者上綱上線，不容其為己辯白。此例一開，中共軍隊高層又發生多次這種政治高壓下不講原則的大批判與殘酷鬥爭。一年以後的廬山會議上，在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賣力演出的彭德懷，便遭到一樣的方式對待，這也是彭個人政治命運的悲劇所在。

「反教條主義」也讓本已糾葛複雜的軍中人事關係，增添了另一易引發衝突的因子。彭德懷因1959年廬山會議倒台後，在「反教條主義」中挨整的人如李作鵬（當時為訓總陸軍訓練部部長，乃是反「保守主義」的積極分子；更為人知的是，他後來成為所謂林彪手下的「四大金剛」），就想藉機重新評價1958年訓總內部的爭論，並刻意去找當時隨彭一起「反教條主義」的人的麻煩。^[3-176]在運動中算是得意者的張宗遜（會中因作「反教條主義」發言獲毛澤東表揚；會後組織改組，又受命主管訓總撤銷後改編成的三個部門），晚年自承：在事發時「說了過頭話」、「傷了感情」；事後又由於自身「思想工作做得不細」，造成「不少同志心情不夠舒暢」。張認為如此是他自己後來在「文革」中受「折騰」的重要原因。^[3-177]

二、對軍中訓練部門和工作人員的衝擊：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之召開，原先的目的是整風暨整編。整編的原因是中共解放軍的組織體制存在著的「機關龐大、部門過多、組織重疊、分工機械」的現象。^[3-178]然而，在會議轉向批判「反教條主義」後，統管全軍軍事訓練的訓練總監部，意外地成為箭靶。尤其當該部以蕭克為首的領導紛受批判和調職後，訓練總監部被撤銷建制、劃歸總參謀部。^[3-179]與此同時，負責管理幹部的總幹部部也因工作與總政治部多有重疊，而併入總政治部。^[3-180]至此，中

共解放軍的組織體制，從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訓練總監部、總幹部部五總部，恢復為1950年代初的三總部建制。伴隨著「反教條主義」的聲浪與訓練總監部的裁撤，全軍中職司訓練、院校教育的各級幹部，士氣大受打擊，即便未連帶受到懲處，然因相關工作不受重視，也不敢強化自身專業需求，其工作幹勁大為挫傷，為此感到抑鬱不得志者，不在少數。

三、對軍隊訓練工作的負面影響：部隊由於軍中展開「反教條主義」與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出現對訓練要求、教學課程不重視，甚至對行之有效的規章制度不分好壞地加以破壞的情形，並長期未獲改善。對此，中共「海軍之父」蕭勁光就曾予以批評。^[3-181]一直延宕至1980年，時任中共軍方總參謀長楊得志、副總參謀長楊勇和張震，為了讓停滯不前多時的軍中訓練工作與院校教育，能無所顧忌、更健康地發展，認為有需要提請中共中央重新回顧和評估1958年「反教條主義」的歷史。但他們在了解相關歷史的內情以後，一度有所顧慮，因為鄧小平正是當年軍隊「反教條主義」的重要關係人。楊得志等人在向鄧小平匯報時，就坦言擔憂：「這不是反到你頭上來了嗎？」^[3-182]所幸，鄧小平對此倒不規避，承認自己涉入在內，更直言當年「反教條主義是錯誤的」，從而為該事的基本翻案提供了依據與憑藉。

1958年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領導下，軍事領域進行了反對「教條主義」的整風，並強化了黨對軍的領導，使後者在軍隊建設上更能配合、響應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意在擺脫蘇聯經驗過多的影響而要自行摸索建設社會主義的政治風向。幾與之同步發展的是，中共中央也在經濟領域進行整風，集中批判政府領導人中的「反冒進」錯誤。其根本的目的也不外乎在蘇聯的模式外，另闢出屬於中國自己的經濟發展戰略與道路。「大躍進」運動的出現就是它的結果，而毛澤東也安排鄧小平作為他推行相關經濟計劃的主要助手。這是以下兩章討論的課題。

注釋

[3-1]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係見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頁101-166。

[3-2]鄧小平晚年對此回憶：「當年我是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辭。」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辦公室：〈一項提挈全軍的重要決策〉，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中冊，頁513。

[3-3]1954年9月28日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親自擔任主席，另有十一名軍委委員。鄧小平以外，其餘十人即是後來冊封的「十大元帥」。1956年中央軍委會人員組成雖有擴大，但無礙於鄧在其中的地位。身為軍委委員，鄧小平更直接與聞軍中的重大政策和活動如軍銜評定。在軍委會中，鄧小平的實質地位甚至高出一些元帥。首先，鄧小平在軍旅生涯中雖然多擔負的是政治委員的職務，卻也實際參與過作戰指揮，在特別講究論資排輩、作戰經歷的軍中，享有頗高的威望。中共軍方在評比軍銜時，也曾規劃授予鄧小平元帥之銜，唯因他已主要轉任政職而未成為事實。鄧小平對於自身赫赫的戰績，也頗以為

傲，認為自身的戰功足以與軍功彪炳的林彪媲美。資料參閱：〈楊成武同志狠揭鄧小平〉，載譚放、趙無眠選輯：《文革大字報精選》（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頁130-131。其次，鄧小平在黨內高層中的權力地位、職務重要性與影響力，絕大多數的元帥都瞠乎其後；毛也希望以文職為主的鄧小平可以協助其在軍委會中落實「以黨領軍」的原則。

[3-4]《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輯：《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頁545。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頁90-91。

[3-5]《彭德懷傳》，頁546-547。

[3-6]《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501-502。

[3-7]《彭德懷傳》，頁544。

[3-8]該報告內容有：一、南京軍區設防；二、反教條主義；三、對待在軍事學院任教的前國民黨軍隊軍官的問題；四、派駐軍工廠驗收的軍代表制。五、領導工作的問題。載《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175-178。

[3-9]載《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178。

[3-10]《劉伯承傳》編寫組：《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659。

[3-11]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第22冊，頁303-304。

[3-12]林蘊暉：〈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頁30-32。

[3-13]高連升：〈淺析1958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的鬥爭〉，《軍事歷史》，1994年第1期，頁9。

[3-14]《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66。

[3-15]《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56-257。

[3-16]〈在成都會議上的一次講話〉，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北京：1967），頁24。

[3-17]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上冊，頁186。

[3-18]〈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陶鑄傳達紀錄）〉，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頁22。

[3-19]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頁442、446-447。

[3-20]張宗遜：《張宗遜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頁452。

[3-21]張宗遜：《張宗遜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頁453。

[3-22]《蕭克回憶錄》，頁448。

[3-23]《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61。

[3-24]彭德懷傳記組：《彭德懷全傳》（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第3冊，頁1140。

[3-25]《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58。

[3-26]《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64。

[3-27]《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72-275。

[3-28]梁丞：〈粟裕大將的蒙冤與平反〉，《百年潮》，1999年第8期，頁5-8。朱楹：〈粟裕大將蒙冤始末〉，《文史精華》，2000年第12期，頁4-10。鞠開：〈二十六年蒙冤去，三十六年慰忠魂——回憶逆境中的粟裕〉，《縱橫》，2003年第8期，頁11-13。

[3-29]林蘊暉：〈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紀實〉，《黨史博覽》，2005年第3期，頁5。

[3-30]據在戰爭時期曾與粟裕在華東共事、後來官拜上將的陳士榘的分析，粟被嚴厲批判的原因是：粟在戰場上養成的「敢於儘快做決斷，容不得層層請示」的習慣，中共建政後，他在處理上下級關係時仍繼續沿用，因而「吃了大虧」。「他辦事情有自己的觀點，不唯上、不唯權，由此在工作中得罪了兩個老師（彭德懷、聶榮臻）」。載陳人康策劃、口述，金汕、陳義風著：《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322。出身「四野」、官拜中將的吳法憲則認為：彭德懷撤換粟裕總參謀長一職、並「給他戴上了好幾項政治上的大帽子」，乃因彭「山頭主義」作祟，以為其舊部黃克誠開道。吳的觀點雖非全面，但卻可反映彭在批整粟裕問題上的引人非

- 議。載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下冊，頁528-529。
- [3-3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1430、1432。
- [3-32]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627。
- [3-33]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627。
- [3-34]張雄文：〈將來可入正史的粟裕秘聞（一）〉，張雄文的部落格：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547a3010009m7.html（2010年10月1日登入）
- [3-35]鄧小平所在的中原野戰軍，會對粟裕發起豫東戰役的構想表達「似嫌殲擊企圖太多太大」的意見。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頁327。粟裕後來也會表示：「豫東戰役，『二野』開始是不主張打得這樣大的，後來還是中央下的決心，並要『二野』鉗制敵18軍。」載張雄文：《無冕元帥——一個真實的粟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112。
- [3-36]張雄文：《無冕元帥——一個真實的粟裕》，頁171、308。
- [3-37]《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頁945。
- [3-38]1958年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解除粟裕總長職務，由黃克誠任總參謀長」，「調粟裕任國防部副部長和軍事研究院副院長兩職務。他的具體工作在研究院」。對此，9月16日，粟裕表示：「中央對我的工作決定，我絕對服從分配，這次大會同志們對我幫助很大。我會要求下去基層鍛鍊，這是我真心誠意的要求。此意曾向黃老〔黃克誠〕及小平同志談過……。」載《粟裕年譜》，頁630。
- [3-39]《粟裕傳》，頁947。
- [3-40]張雄文：《無冕元帥——一個真實的粟裕》，頁306。
- [3-41]徐慶全：〈粟裕冤案平反的曲折歷程——訪粟裕夫人楚青〉，《炎黃春秋》，2004年第2期，頁1-7。
- [3-42]在是否要出兵懲越的問題上，鄧小平力排眾議，堅持採取此一軍事行動。粟裕對此不表贊同，因而引鄧不悅。中國大陸歷史研究者（M君）所提供的資訊。（台北，2011年6月）
- [3-43]齊德學：〈彭德懷與1958年反教條主義鬥爭〉，《軍事歷史》，1998年第5期，頁46。
- [3-44]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頁685。
- [3-45]齊德學：〈彭德懷與1958年反教條主義鬥爭〉，頁46。
- [3-46]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88。
- [3-47]〈在方強對軍委擴大會議開法的意見上的批語〉，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7冊，頁260-261。
- [3-48]中共對「教條主義」的界定，在於革命理論和外國經驗是否與中國實際作適當地結合。易言之，當革命理論和外國經驗在現實中的運用，沒有顧及中國具體的環境和條件而出現機械式的套用之時，就是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由於毛澤東與中共中央向來宣稱、強調「教條主義」在中共革命建政過程中所會造成的危害，因此「教條主義」的罪名是相當嚴厲的指控。然而，在評定「教條主義」問題上，卻充滿了主觀的隨意性，沒有任何清晰的判斷標準。在模糊的定義下，存在寬廣的操作空間，往往鬥爭意涵大於實質問題的處理，成為享有優勢權力者開展政治鬥爭收放自如的口實，並讓批判對象難以為己辯駁。所謂中共軍隊「教條主義」問題，即是共軍在移用、參照蘇軍經驗時是否得宜的問題。中共中央雖在1956年即要求軍隊對此一問題予以注意，但毛澤東本人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時還不看得很嚴重。然而，僅三個月之後，毛卻改變其原先的看法，進而決定改變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的議程，發動批判「教條主義」。由此可見其任意性。
- [3-49]〈關於做好第二個五年計劃佈局和開好軍委會議問題給鄧小平的信〉，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頁264。
- [3-50]《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86-287。《彭德懷全傳》，第3冊，頁1144。
- [3-51]吳欣峰：〈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真相〉，《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頁8。
- [3-52]吳欣峰：〈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真相〉，《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頁8。

- [3-53]《彭德懷年譜》，頁686。
- [3-54]《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89。
- [3-55]《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89-290。
- [3-56]《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90。
- [3-57]黃克誠：《黃克誠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294。
- [3-58]滕敘究：《風雨彭門：彭德懷家風、家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頁265。
- [3-59]《黃克誠自述》，頁295。
- [3-6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3。
- [3-61]具體的例子可見廖漢生的回憶：「我作為院校組負責人之一，在小組會上號召大家：從辦好院校的目的出發，對軍委及各總部過去有甚麼意見，今後有甚麼請求，都可以積極地提出來。我自己則從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不夠、組織體制龐大而職責不清、官僚主義作風等三個方面對軍委和總部提出了批評意見，並按照要求寫了兩張大字報。」載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續集，頁123-124。
- [3-62]《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86、294-296。
- [3-63]《彭德懷全傳》，第3冊，頁1144-1145。
- [3-6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1396。
- [3-6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4。
- [3-66]《彭德懷全傳》，第3冊，頁1154。
- [3-67]《彭德懷全傳》，第3冊，頁1155。
- [3-68]彭對此表示：「我的認識是：第一，軍隊的學風不好，照搬照抄；第二，黨風不好，共產主義風格不高，不暴露自己的觀點，當面不講，背後講。軍隊黨的生活不正常，顧慮多端，其實是有個人主義在內。要想縮短認識過程，只有扯開火線。」載《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95。
- [3-69]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集，頁123。
- [3-70]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集，頁124。
- [3-71]《彭德懷全傳》，第3冊，頁1155。
- [3-72]《彭德懷全傳》，第3冊，頁1155。
- [3-73]張雄文：〈無奈的歷史：劉伯承與鄧小平的真實關係〉，張雄文的部落格：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547a30100f8p0.html（2010年10月登入）
- [3-74]《彭德懷全傳》，第3冊，頁1155。
- [3-75]《劉伯承傳》，頁91-92。
- [3-76]1959年4月5日，毛澤東表示：「劉伯承同志我們兩個不是鬥得厲害？我還寫了書，戰略問題，那就是批評你的，你也沒有答覆。後來你在軍事學院大概是想答覆一下，沒有尖銳地提出哪些問題來批評，因為我那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是不能駁的，是駁不了的。那個裏頭批評了劉伯承，批評了任弼時，沒有指名字。任弼時封我一個『狹隘經驗論』；劉伯承封我一個『怕打爛罐罐』，軍事上不行。……至於跟粟裕同志、蕭克同志，還有陳伯鈞，還有郭化若同志，我們幾個人是歷來鬥的，他們是我的反對派。但是你們是反對派，你們的官還可以做，我不報復。去年報復一次，不是我的報復。去年報復是開軍委擴大會議，四五百人，是你們犯了錯誤，把你們這一批評，我就開心了。」載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470-471。
- [3-7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4-1435。
- [3-78]彭德懷指出有五點原因：「一、對蘇軍歷史和軍事科學的完整性摸不到底，對多兵種合同作戰和軍隊建設不熟悉，沒有經驗，不懂。二、對於教條主義的抵抗力之大，估計不足。三、我這個人是沒有學問的，是丘八學校和農民學校出身的。出身微寒，是難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們所說，反教條主義的人都是沒有學問的。四、馬列主義沒有叩門，毛澤東思想未真正體會。五、共產主義風格不高。我是敢說的，但幹勁不足，思想有點懶，沒有很好地系統地總結過去經驗，把時間溜過去了。」
- [3-79]《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98-299。
- [3-80]《彭德懷傳》，頁544。
- [3-81]《彭德懷全傳》，第3冊，頁1155。

- [3-82]《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97。
- [3-83]例如：6月22日，毛澤東對薄一波因應6月18日中央會議討論而修改的〈匯報提要〉（「以鋼為綱」的源起），一方面，改用正副兩道標題，正題是「兩年超過英國」，副題是「國家經委黨組向政治局的報告」；另一方面，作了批示：「此件印發軍委會議各同志。趕超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年到3年，2年是可能的。這裏主要是鋼。只要1959年達到2,500萬噸，我們就在鋼的產量上超過英國了。」載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下冊，頁724。
- [3-8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5。
- [3-85]毛澤東表示：「照搬，我們也搬過，也犯過教條主義的錯誤。紅四軍九次黨代表大會那時候，軍隊裏頭有兩條路線。有些同志對資產階級的軍事學，資產階級的管理制度有興趣。」「我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第一章，首先對這些同志作了答覆。」「後來，這些同志大部分都覺悟了。」「沒有好久，洋教條來了。過去這些同志的觀點是屬於資產階級教條主義。另外一個無產階級教條主義來了。就是搬蘇聯的一套，搞正規化，總的口號是反對游擊主義，又反對『上山主義』，主張打大城市，兩個拳頭打人，短促突擊，等等。那些從前是資產階級教條主義的，這時候就歸降了無產階級教條主義，合在一起了。結果就把根據地送掉。」
- [3-86]《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0—301。
- [3-87]《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1。
- [3-88]鍾期光：《鍾期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頁518。
- [3-8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6。
- [3-90]《羅榮桓傳》編寫組：《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341。
- [3-9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6。
- [3-92]《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1。
- [3-93]《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2。
- [3-9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6。
- [3-95]《廖漢生回憶錄》，續集，頁126。
- [3-96]《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3。
- [3-9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6。
- [3-9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7。
- [3-99]《廖漢生回憶錄》，續集，頁127—128。
- [3-100]《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4。
- [3-101]《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4。
- [3-102]《劉伯承傳》，頁665。
- [3-103]《羅榮桓傳》，頁341。
- [3-104]曉農、疆文：〈彭德懷劉伯承的誤會與糾葛〉，《黨史文苑》，2005年第1期，頁31。
- [3-105]彭德懷指控劉伯承之事乃是：中共「長征」途中，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紅四方面軍會將一批軍、師級幹部送到由劉伯承任總教官的紅軍學校受訓。時任紅四方面軍三十軍軍長的余天雲因學習不適、與同仁爭吵，劉伯承親自處理此事。余氏不服管教，最後自殺身亡。曉農、疆文：〈彭德懷劉伯承的誤會與糾葛〉，《黨史文苑》，頁31—32。
- [3-106]《廖漢生回憶錄》，續集，頁126。
- [3-107]《廖漢生回憶錄》，續集，頁127。
- [3-108]鄧小平：〈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1972年8月3日），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 [3-109]鄧小平：〈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1972年8月3日）。
- [3-11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上冊，頁678。
- [3-111]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291。
- [3-112]「劉鄧」曾被周恩來稱之為一對「舉輕若重」（劉伯承）和「舉重若輕」（鄧小平）的組合。薄一波：〈師長與戰友——回憶劉伯承同志〉，載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119。
- [3-113]《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5。

- [3-11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7。
- [3-115]毛澤東把劉伯承在「教條主義」錯誤的責任看得最嚴重之時，曾考慮革除劉伯承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職位，並徵詢鄧小平的意見。鄧對此明確表示不贊同，並為毛所接受，劉的政治局委員職位方得以保留。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94。
- [3-116]《廖漢生回憶錄》，續集，頁128。
- [3-117]陳錫聯：〈陳錫聯談鄧小平〉，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話說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61。
- [3-118]時任軍事學院秘書長的余伯由回憶：「1958年6月，我們去北京參加軍委擴大會議時，鍾期光要我草擬劉帥發言初稿，要我實事求是地檢討缺點，不能否定成績；缺點不能推到劉帥個人身上，院黨委要承擔集體領導責任。劉帥到北京後身體不好住進醫院，他看到草稿後，要鍾期光找仲曦東（院政治部副主任）和我進一步改寫發言稿。他自己又大加修改，著重檢討自己。在扶病上懷仁堂主席台發言後，受到大會長時間的熱烈鼓掌，有的同志熱淚盈眶。」載余伯由：〈劉伯承與鍾期光在軍事學院〉，載本書編委會編：《好主任鍾期光上將》（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頁358。
- [3-119]《劉伯承傳》，頁665–666。
- [3-120]時任粟裕秘書的鞠開，在其1958年6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晚上我打電話給彭〔德懷〕、鄧〔小平〕、林〔彪〕等首長秘書，收到首長二次檢討發言後，請他們馬上呈給首長閱。這是首長交代我辦的。」載鞠開：《在跟隨粟裕的日子裏》（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頁244。
- [3-12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9。
- [3-12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9。
- [3-123]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者（D君）提供的訊息。（北京，2007年1月）
- [3-12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9。
- [3-125]《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62。
- [3-126]張震：〈在小平同志領導下作戰與治軍〉，載中央文獻研究室、解放軍檔案館編：《回憶軍事家鄧小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頁28。
- [3-127]丁家琪：《從少尉到元帥：中國元帥葉劍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頁380–381。
- [3-128]丁家琪：《從少尉到元帥：中國元帥葉劍英》，頁382。
- [3-129]《徐向前傳》編寫組：《徐向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339。
- [3-13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9。
- [3-131]毛澤東表示：「蕭克和訓總有些人說，毛澤東的軍事學說過時了。我沒有新東西。外國也沒有打原子彈的經驗，朝鮮戰爭還有細菌戰。戰爭原則保存自己消滅敵人是變化的。戰術原則堅壁清野，封鎖消息還是有用的。可以拿出來跟蕭克對抗。作為指針可以考慮。」載《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262。
- [3-132]載《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7–308。
- [3-133]蕭克自言：在1929年紅四軍內部的毛澤東與朱德、陳毅之爭時，他投票支持後者；1935年蕭所屬的紅二、六軍團與張國燾領導的紅四方面軍會合時，對於張所提的紅軍應「南下」而非「北上」的主張，他也沒有表態反對。郭其僑：〈蕭克將軍談「三次站錯隊」〉，《炎黃春秋》，2007年第7期，頁33–34。
- [3-134]《蕭克回憶錄》，頁451。
- [3-135]鍾期光回憶：「陳伯鈞同志和我分別在會上先後作了兩次檢討，還是過不了關。有人說我的檢討『很不徹底，企圖蒙混過關』。會議對我們不作結論，回原單位繼續揭發批判。」載《鍾期光回憶錄》，頁519–520。
- [3-136]《蕭克回憶錄》，頁452–453。
- [3-137]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頁332。
- [3-138]南畝：〈劉鄧的好參謀長〉，《黨史博采》，2000年第11期，頁18–20。
- [3-139]吳欣峰：〈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真相〉，《炎黃春秋》，頁9。
- [3-140]郭天民在1947年8月從聶榮臻領導的晉察冀野戰軍調至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任副參謀長，協助組織指揮躍進大別山的戰略行動。劉、鄧率主力部隊自山區轉出時，郭受命留下堅持戰鬥，組建鄂豫軍區、擔任司令員。因為任務艱難、處境危險，劉伯承對郭表示：「老郭，你再去當一次無名英雄吧！」鄧小平則特地安派專人專車將郭

的妻女自後方接來與郭告別。何立波：〈「八府」參謀長郭天民上將〉，《黨史博采》，2009年第9期，頁32。

[3-141]根據蕭克的回憶，郭天民在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中遭受殘忍的對待，被當作政治棋子操弄。因為在軍隊建設與訓練問題上，郭在訓練總監部內本與蕭克、李達相近，但是郭竟被上級指示去領導對蕭、李的揭發批判。就在後者的政治結論作完後，郭又成為批鬥的對象，被劃為「蕭李集團」的另一名「第二副元帥」。載《蕭克回憶錄》，頁455。

[3-142]例如：林彪對於曾任職「四野」的陳伯鈞置之不理；陳毅對「三野」出身的鍾期光、宋時輪，也沒有任何同情的表示。另外，有關「反教條主義」對於個別的野戰軍勢力之影響的問題，作者也認為並不明顯。因為受到「反教條主義」衝擊者，不侷限、集中於單一的野戰軍勢力，亦即沒有誰特別得利或蒙害的問題。就算統兵「二野」的劉伯承在此事件中直接受到傷害，作為「二野」另一位「大家長」的鄧小平，也仍巍然不動，「二野」因而也不會有「蛇無頭而不能行」的問題。至於曾領兵「一野」的彭德懷，表面上在「反教條主義」中叱吒一時，然其次年即落難於廬山，若欲藉此「擴大戰果」，也為時不及。

[3-143]〈打倒李達〉，北京工農兵體育學院革命委員會：《體育戰線》，第12號，1967年8月31日，版2。

[3-144]楊曉璐：〈真情攻破「馬其諾」——李達上將與夫人張乃一的情感世界〉，《黨史縱覽》，2007年第3期，頁52。

[3-145]中共山東省委：〈功高泰山，恩澤齊魯〉，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下冊，頁220。

[3-146]何立波：〈「稱職的好參謀長」李達上將〉，《文史天地》，2005年第2期，頁27。

[3-147]鄧小平表示：「一二九師能在華北堅持下來，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比日軍更精幹的參謀班子。」時任參謀長的即是李達。對於國共內戰期間爭取高樹勳倒戈一事，鄧小平強調：「我們是派參謀長李達親自到馬頭鎮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這件事你們好多人可能不知道。」鄧小平：〈對二野歷史的回顧〉，載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頁336-343。莊金興、夏明星：〈被譽為「諸葛先生」的參謀上將李達〉，《黨史博采》，2005年第1期，頁40-41。

[3-148]張雄文：〈無奈的歷史：劉伯承與鄧小平的真實關係〉。

[3-149]〈打倒李達〉，北京工農兵體育學院革命委員會：《體育戰線》，第12號，版2。

〈「五·一二」命令宣判了國家體委獨立王國的死刑〉，北京工農兵體育學院革命委員會：《體育戰線》，專刊，1968年5月25日，版4。〈打倒三反分子李達〉，北京工農兵體育學院革命委員會：《體育戰線》，第25號（1968年6月7日），版4。

[3-150]1967年4月，李達仍表示：「鄧小平到北京以後才變的，抗日戰爭和在西南都是不錯的嘛！和敵人鬥爭的。」見〈打倒三反分子李達〉。

[3-151]吳東峰：《開國將軍軼事》（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頁182-183。

[3-152]何立波：〈「稱職的好參謀長」李達上將〉，《文史天地》，頁26。

[3-153]李達：〈李達談鄧小平〉，載《話說鄧小平》，頁62-71。

[3-15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5。

[3-155]《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2。

[3-156]《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10。

[3-157]其有三項要點：「第一，必須認真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著作，堅持以毛澤東同志的軍事思想為今後我軍建設和作戰的方針。第二，必須樹立正確的學習態度。學習必須與獨創相結合，學習外國經驗必須與我軍實際相結合。必須以我軍經驗為主，有選擇地學習外國經驗。第三、必須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黨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12。

[3-158]《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12-313。

[3-159]《蕭克回憶錄》，頁453。

[3-160]〈鄧小平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未全件），頁1。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3-161]《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03、306。

- [3-162]《彭德懷年譜》，頁691。
- [3-16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41、1443。
- [3-164]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92。
- [3-165]《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14。
- [3-166]〈鄧小平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未全件），頁1。
- [3-16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42。
- [3-16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42–1143。
- [3-169]〈鄧小平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未全件），頁19。
- [3-170]〈鄧小平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未全件），頁31。
- [3-171]《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頁312。
- [3-172]有關中共軍隊對「大躍進」運動熱烈參與的情形，可見：鍾延麟：〈大躍進運動中的軍方活動〉，《二十一世紀》，2008年4月號（總第106期），頁57–68。
- [3-173]《蕭克回憶錄》，頁454。
- [3-174]該會議的結論是：「集中地揭發和深刻地批判了過去南京軍事學院成立以來所犯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這條錯誤路線在較長時間內和中央軍委正確的軍事路線相對抗，是我軍歷史上兩條軍事路線鬥爭在新的條件下的反映。這條錯誤路線統治學院數年之久，在軍事訓練和科學研究工作中表現最為嚴重，其影響遍及全軍，其發生發展過程是由盲目發展到自覺，由實際工作中的錯誤發展到路線的錯誤。」載《鍾期光回憶錄》，頁521–522。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93。
- [3-175]林彪在軍隊「反教條主義」中所發揮的負面作用和影響，中國大陸過去將之過度誇大，被指控為最重要的策劃人與加害者。有些流行的說法，例如：林彪在1958年3月成都會議期間即積極謀劃此事，業已被證明為不實。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79–180.此外，更有資料顯示，林彪曾寫信給毛澤東，表示其因身體不佳不能參加該年5月起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但為毛所不許。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紐約：明鏡出版社，2006），上冊，頁231。
- [3-176]《張宗遜回憶錄》，頁457。
- [3-177]《張宗遜回憶錄》，頁454–455。
- [3-178]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頁570。
- [3-179]孟東：〈軍委訓練總監部的建立與撤銷〉，《黨史博覽》，2002年第10期，頁49–52。
- [3-180]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頁334–335。
- [3-181]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續集，頁204–205。
- [3-182]張震：《張震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下冊，頁252。

第四章

「大躍進」前期高揚紅旗（1958-1959）

從中共建政至1958年以前，毛澤東對經濟工作過問不多，這方面的事務主要由政府領導人周恩來、陳雲主持與掌握，甚至曾發生毛的意見不被尊重的情況，「反冒進」就是最突出的例子。1956年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後，中共「八大」決定全力發展經濟與生產力，毛澤東想要加快發展速度與擴大投資規模，但周恩來與陳雲均以為已被授權，而在1956、1957年的經濟佈局與計劃上，堅持實行講求均衡、穩步發展的「反冒進」方針與政策。

隨著1957年中共的整風運動在政治、思想領域內「告捷」，以及1957年冬季數千萬的農民在興修農田水利上所表現出的高漲民氣，^[4-1]再加上受到蘇聯提出經濟趕超美國的計劃的影響刺激下，毛澤東將心思轉至經濟發展與技術革命上，並希望短時之內就能大有斬獲與建樹。毛澤東為了讓中共領導層能夠儘早領悟與接受他的「多快好省」經濟主張，1958年初他決定在中共高層內部進行整風，名義上是針對「一部分人的那些氣（官氣、暮氣、驕氣、嬌氣），一些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實際上就是指「反冒進」政策的主張者。^[4-2]毛痛斥此前兩年的「反冒進」經濟政策，認為它耽擱、貽誤了經濟的發展，並且對制定相關經濟政策的國務院領導人，以至仿蘇而建的整個計劃經濟管理體制嚴加責難。

毛澤東主導的反「反冒進」，造成兩大政治後果：第一、中共中央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特別是黨直接介入政府事務與經濟工作的管理，具體的組織安排就是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指揮國務院行事，後者聽命前者並依其部署執行；第二、「大躍進」運動的形成與登場（其包括：「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大躍進」以及「人民公社化」，因此又被稱為「三面紅旗」運動）。

講求高速、多產的「大躍進」運動，被中共官方高度標榜為中國自產的強國富民、建設社會主義甚而通往共產主義的捷徑與良策。其含有一個不明言的國際競賽企圖：中共以自創的方法，在建設社會主義上與蘇聯爭鋒，使中國後來居上地先於蘇聯進入社會發展的更高階段。1958年5月17日，毛澤東在通過「總路線」、正式啟動「大躍進」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即表示：「蘇聯建設社會主義，那是一種搞法。我們可不可能有另一種方法呢？都是搞社會主義，都是馬列主義，他們是由上而下的方法，

我們是搞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4-3]所謂「發動群眾，搞階級鬥爭」的方法，就是透過政治運動強化黨的領導，凝聚思想共識，調動黨幹與群眾的積極性，再將之作為推進工作的關鍵憑藉與動力泉源。然而，令中共中央大失所望的是，此一希冀在短時之內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的大膽努力，不但沒有迅速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反而一度將國家帶向崩潰的邊緣。

毛澤東在中共上層大批「反冒進」，鄧小平根據毛澤東的構想直接插手管理政府的經濟工作，指揮中共黨組織與政府系統推進「大躍進」運動。本章以下首先探討1958年鄧小平在毛澤東反「反冒進」後政治權力的擴充，接著關注鄧小平對「大躍進」主要決策出爐的參與情形，再來檢視鄧如何調整省級領導以為運動的推行開路，並討論他到地方推行與視察運動的情形，之後觀察鄧小平如何籌劃實施1959年的大煉鋼鐵運動，最後介紹鄧與聞農業高估產與高徵購的情況。

第一節 經濟整風後受命領導管控國務院

從支持「反冒進」至擁抱「大躍進」

中共中央在1958年發動的「大躍進」運動，在一定的程度上，乃針對先前所推行的「反冒進」政策而發。欲探討鄧小平對「大躍進」的態度，也必須稍帶論及鄧對「反冒進」看法的變化，以更連貫地掌握1950年代中、後期他在中共經濟戰略與政策上觀點變異的痕跡。

1956年秋冬，針對中國大陸因先前急促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及經濟投資上「冒進」的過熱效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得到代理毛澤東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的支持下，調整經濟計劃，進行「反冒進」，以追求穩健平衡的經濟發展。

鄧小平雖不負責「反冒進」的工作，但對於先前貪快、盲目上馬的「冒進」作法亦表關注並予以批評。1957年3月，鄧小平在山西曾針對當時國內供需緊張表示：問題根源在於「經驗不足，一股熱心，建設搞快了，產生了錯誤。但這是前進中的錯誤」。^[4-4]

同年4月，鄧小平在西安幹部會議上亦指出：

過去幾年，我們的建設成績是很大的……。但同時也要看到，建設中暴露出來的嚴重缺點，特別是最近一兩年來，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主要是教條主義傾向，是值得引起我們嚴重注意的。比如在我們同志的頭腦中，對建設總是貪新貪大，這種脫離實際的形式主義的思想使我們吃了虧。^[4-5]

但是鄧小平這種傾向「反冒進」的立場，卻因情勢的發展難以持續，進而有所變化：

一、「反右派」運動的加溫，形成不利於「反冒進」的政治氣氛：中共中央在經濟上實行「反冒進」之時，另一方面在政治上著手進行以中共黨內為對象的整風運動。但隨著整風運動中「反右派」鬥爭的發起（炮火遍及黨內外），「反冒進」政策陷入進退維谷的局面。因為右派的若干主張和言論近似於「反冒進」政策，在批判右派及其主張的聲調日漸拉高的情況下，主張「反冒進」的人士變得難以暢所欲言。^[4-6]其困局在毛澤東對「反冒進」愈加表現出不耐時，更為惡化。

1957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中指稱「反冒進」乃是替右派製造攻擊黨的口實，直接對「反冒進」產生污名化的效應，致使相關政策喪失正當性。毛對「反冒進」的批評，事實上超乎1956、1957年的經濟政策，而涉及更大的經濟發展方針問題、社會主義建設速度問題。因為毛強調：「我們是不是可以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比蘇聯搞的速度更要快一點，比蘇聯的品質更要好一點？應當爭取這個可能。」反映出其亟思「追求一種較高速度的新的發展經濟的辦法，來代替積極穩妥、講究綜合平衡的蘇式道路」。^[4-7]在此背景下，鄧小平縱使仍對「反冒進」抱以同情，也不得不改弦易轍。

二、同年11月，毛澤東赴蘇聯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週年慶祝活動與世界共產黨、工人黨的國際會議期間，因受蘇聯科技發展與趕超美國計劃的鼓舞與刺激，膨脹本已有的樂觀和急躁情緒，既做出「東風壓倒西風」的論斷，也提出「超英趕美」的目標。隨行在側的鄧小平耳濡目染，恐亦受感召。

三、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批評欲罷不能，決定在中共高層間展開一次以經濟問題為主的整風。毛接連利用1958年1月的杭州、南寧中央工作會議、2月北京政治局擴大會議、3月成都工作會議、4月漢口工作會議以及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高調抨擊「反冒進」政策和相關主事者，並策動其他到會者對之鳴鼓聲討，目的是：「整風掛帥，生產是中心，帶動其他工作」。^[4-8]亦即在中共高幹間就「反冒進」問題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明確與統一領導層內對相關問題的思想，^[4-9]然後再以之為準地領導、規劃經濟生產工作，並期以「下層建築」的進展推動「上層建築」的發展。在毛澤東立場旗幟鮮明並語帶威脅下，「反冒進」變得臭不可聞，加速「多快好省」方針的回籠和躁進思想進一步的發展，「大躍進」成為新的政治風潮。坐鎮地方的「方面大員」各憑本事、引領風騷，位居中央之「內廷朝臣」則爭相跟進、不落人後，鄧小平自不例外。

有論者指出，在以毛澤東為中心作運轉的中共高層政治，當毛沒有特定看法或定見時，其他領導人可以表達自身的政策偏好並從事遊說；但一旦毛清楚地闡明立場後，其餘領導人便難有置喙的餘地。^[4-10]及早而準確

地向毛表態支持，既有助自身政治地位的安全，更能獲得毛的賞賜和晉升。^[4-11]毛澤東反「反冒進」、經濟整風主要係針對當時主持經濟工作的國務院領導人，鄧小平雖非毛點名批判、加以為難的對象，但是在毛對經濟發展戰略喜好已是呼之欲出的情況下，鄧必須有更積極的表態：一方面，藉此向毛表示他已毅然決然地拋棄原先傾向「反冒進」的立場；另一方面，對毛主席的新經濟建設方針宣示效忠。^[4-12]

1958年2月13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四川省、地、縣、社四級幹部會上發表講話。此一講話是目前所能找到最早的鄧小平公然表示支持毛澤東反「反冒進」的資料。鄧在會上表示：

在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有兩種方法的鬥爭。一種是搞得快一些，一種是搞得慢一些。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方法，就是根據客觀可能的條件，加快建設。搞建設也要有革命家的態度，要積極創造條件搞快點。只要是可能的，只要不是主觀主義的就應該快。這是我們的正確態度。^[4-13]

反「反冒進」下對經濟建設的樂觀情緒和奮進心情，此時也已在鄧小平指導工作的言論中流露。2月27日，鄧在聽取石油工業部工作匯報時，對於地質探勘隊和鑽井進尺的數目，提出加倍的要求，^[4-14]對石油工業建設的規劃問題，更不無豪情地指出：

第二個五年計劃末期，新疆至少要搞200萬噸油，可能的話，要搞到300萬噸。這樣一來，包括鐵道運輸、蘭州煉油廠擴建、油罐等都要趕上來。……你們規劃1959年克拉瑪依只出40萬噸油，太少了，至少要採100萬噸。^[4-15]

鄧小平在3月成都會議上的發言，更是高調支持毛澤東反「反冒進」的主張。成都會議（3月9至26日）期間，毛多次批評「反冒進」，使得反「反冒進」成為該會的關鍵主題，毛的政治親信更稱之為「中央和各省黨委的聯合整風會議」（毛表示認可）。^[4-16]3月25日，鄧小平在會上就「反冒進」問題發言，深諳整風「規矩」並能活學活用的他，既結合自身情況作自我批評，也順應整風方向進行批評。

對於在「反冒進」問題上，自己會有的認識滯後情形，鄧小平檢討道：

「反冒進」是不好的，挫傷了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我對於這場鬥爭，在一個短期之內是有過模糊認識的，沒有意識到黨內有甚麼兩條路線的不同，在某些問題上和一些同志有共同的想法，也曾設想過基本建設和某些事情是不是慢一點好，是不是謹慎一點好。^[4-17]

為了表示自己經過此次整風「洗禮」已幡然悔悟，鄧小平在會上批判「反冒進」，也饒有勁力，說其成因就是「思想裏面有不好的根子」，「思想根源就是主觀主義，其表現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比較兩者，鄧強調要注意克服經驗主義。因為「老幹部比較多，大家都是老資格，而

且又確實有一些經驗」，「不能很虛心地去學習別人的先進東西，故步自封起來」，「散佈的範圍比較廣」。鄧更指出：「對經驗主義的錯誤絕不應輕視，要正視它的頑固性。」^[4-18]鄧小平對「反冒進」的批判，表面上雖是針對一種普遍的思想傾向而不是針對個別的人士，但是由於周恩來在1940年代的延安整風時就被當作是黨內「經驗主義」錯誤的代表，此次又是「反冒進」的領頭者，鄧小平在反「反冒進」時高聲批判「經驗主義」，可說是以一種較委婉的方式呼應毛澤東在此議題上對周恩來的敲打。

對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鄧小平表示：「對社會主義一定要有宏圖，要有『好大喜功』」，「現在我們的方向是明確的，只要我們有幹勁，那就一定可以把我們的社會主義搞快，也就不會犯機會主義的錯誤」。^[4-19]從他的言語中可以感受出其已接受毛超脫常軌、一躍登階的「大躍進」思路。

另外，成都會議受人非議之處，還在於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揚升。最廣為流傳也最為人詬病的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所說的「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然而，鄧小平對毛澤東唱讚歌的內容，雖不較柯講得露骨，但其捧毛的實質，是所去不遠的。鄧小平說：「我們在一些問題上趕不上主席的思想。與主席思想有一個相當大的距離。今後還會存在這種距離。得到了教訓，再沒有〔距離〕了？今後還有。」「我完全贊成，自己應相信毛主席比我們高明的多。要跟上去，可以跟上。高級幹部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這是真正可靠的跟上。」^[4-20]

鄧小平在成都會議結束、返抵北京後，還負責在更大範圍的中共高幹群中散播此會整風的「豐碩果實」。4月3日、4日，鄧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集在首都的中共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負責人，傳達成都會議反「反冒進」的精神，^[4-21]呼籲「學毛主席的著作」，並要求「注意政治思想工作」，從思想上總結工作經驗，「對缺點錯誤，要搞得深一些」。^[4-22]

在黨對政府的領導強化後，權位大為突出

1958年春，隨著「反冒進」政策和相關人物（主要任職於政府系統內）在中共黨內遭受嚴厲批判，鄧小平的地位與權力益加上揚，以體現與突出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原則。

毛澤東把鄧小平及其統率的中央書記處放在國務院之上，要求其直接領導。根據鄧小平的官方年譜：2月17日上午，鄧小平專門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中央書記處的工作問題。在會上，彭真首先傳達毛澤東所

作的關於「中央書記處對國務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來」的指示。在彭真傳達結束後，鄧小平表示：「書記處工作範圍擴大了，要有新的工作方式，把握兩條，一是為政治局『擋』一些日常工作，二是不越權。」鄧也簡要地回顧中央書記處自1956年成立以來的工作表現：「作為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辦事機構，一般地說，書記處過去沒有越權，但及時反映情況做得不夠。」^[4-23]鄧要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在接下來的作品中，首重加強向中共中央「及時反映情況」的期望，是甚為殷切的。只不過事與願違，在「大躍進」期間，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並沒有及時反應情況，反而跟著政治局起鬨。

為了進一步具體落實毛澤東的「中央書記處對國務院和各部委的工作要管起來」的指示，2月25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總理、副總理聯席會議，研究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的工作關係問題。^[4-24]

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原來並無管理經濟的人事力量，為增加這方面的人力，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向國務院「挖角」，也就是將其管理經濟事務的主要人員如副總理李富春與李先念調入中央書記處，直接受鄧小平與書記處的領導與管制。這種伴隨人事調動，將經濟決策權由國務院向中央書記處轉移的安排，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就已確認。陳雲在3月21日的檢討報告中表示：「財經有關文件都經過書記處。富春、先念都參加書記處工作的。」^[4-25]李富春、李先念先前亦參與「反冒進」、後來也屢次為此檢討不已，毛澤東卻要兩李進入擴權後的中央書記處。毛要他倆「戴罪立功」的用意是甚為清楚的。5月25日，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正式通過增選李富春、李先念為中央書記處書記的人事任命。該會也增選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以及中央書記處書記譚震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柯、李、譚在「反冒進」整風中皆是所謂的積極分子，毛讓此三人進入政治局既是對之的論功行賞，也冀望他們在「大躍進」中能配合鄧小平再立新功。

在發動「大躍進」的緊鑼密鼓時期，在毛澤東的運作下，原先主導國家經濟建設任務的國務院，將有關權責轉手交予鄧小平所管的中央書記處。有資料即指出：中央書記處在1958年共召開42次會議，大多數會議都是討論經濟建設問題。^[4-26]其內容涵蓋的範圍，從每一季度的工業生產進度、計劃項目的調整、全年度的經濟計劃與財政報告的內容與繳交時程、經濟檢查工作的安排，到城市副食品的供應、農業糧食與出口外貿會議的規劃召開、重要城市的糧煤儲備……等，儼然是一「經濟內閣」。

在中共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同時決定由中共中央主辦出版理論半月刊《紅旗》，並要鄧小平任首席編委。^[4-27]該刊創設的目的是扮演中共中央對內、對外的權威性喉舌，特別是要為中共自行開創建設社會主義道

路的「壯舉」，加以理論包裝與解釋。毛澤東要鄧小平牽頭主持運動相關的意識形態詮釋工作，可見毛對鄧的器重。

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在毛澤東的倡議下發出通知，成立財經、政法、外事、科學、文教小組，相關小組直屬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實際上，它們直接向鄧小平報告。6月8日，毛澤東在此一中共中央通知稿上加寫了一段文字，劃分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相關職權：「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對大政方針和具體部署，政府機構及其黨組有建議之權，但決定權在黨中央」，「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屬政府機構及其黨組」。^[4-28]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之間權力的重整與消長，至此告成。

經過這一番密集的人事和組織調整，政府首長周恩來自覺在「反冒進」問題上犯有大錯，已失層峰的信任，故提請辭職。6月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此加以討論（毛澤東主持、鄧小平也與會），認為周宜繼續擔任該職。^[4-29]周雖繼續坐享總理之位，但對於蓄勢待發的「大躍進」，再難提出異議；「反冒進」錯誤的另一「主犯」陳雲，雖被任命為中央財經小組組長，然在經濟事務上的權力，已大不如前，甚至出現他雖身為黨副主席，但是其領導的中央財經小組必須聽命於鄧小平和中央書記處的情況。^[4-30]

相形之下，中央書記處一躍成為規劃部署的指戰部和承上啟下的樞紐點，領班中央書記處的鄧小平又因身為中央常委得以與聞大政方針的擬定，成為一個既參加最高決策又負責統籌執行的關鍵角色，權傾一時。或為了凸顯鄧小平權力調漲的新變化，中共中央在9月5日下令，在黨、軍及人民團體機關懸掛領袖相片時，要將鄧小平像與毛澤東和其他黨副主席像同時掛出、並列。^[4-31]

正因為鄧小平在「大躍進」伊始即變得更加位高權重，並受命對運動進行全方位的涉入，讓他與運動的諸多爭議政策與做法密切關連。

第二節 參與運動決策：放權地方、「以鋼為綱」與建立人民公社

下放權力，動員地方

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的基本思路乃在於：人民之中蘊藏著極大的生產積極性，經由正確的政治引導，可將之成功地釋放、激發出來。自毛看來，相較於作風上官僚主義濃郁、思考上教條主義積重的中央上層，地方基層既有求發展、要建設的強烈意願，也有敢突破既有思考框架的勇氣。

在「大躍進」的經濟佈局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及各自的角色，相對地也須有所調整。中央要下放權力給地方，讓地方有更大的自主性，進而在經濟建設上行使更重要的職權。鄧小平對此表示支持，並認為如此對中央部門也甚有益處。3月25日，鄧小平在成都會議上表示：

這一次中央和地方分權，對中央各部門來說，是一次解放運動。中央各部門可以從大量的、繁瑣的事務中解放出來。只有把大量的日常事務下放到地方去，中央各部才能夠更多地接觸實際、接觸群眾，才能夠更好地從全局考慮問題，從而更多更好地指導和幫助地方。[4-32]

鄧小平也負責對黨內人士與「兄弟黨」說明、解釋。在前述的傳達成都會議精神的4月4日黨內高級幹部會議上，對於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新型關係，鄧小平簡要地表示：「中國是個大國，甚麼事都集中在中央是不行的，中央只要抓住關鍵，抓住綱，具體怎麼做，下面會搞的。」[4-33]

5月10日，鄧小平會見東德大使。由於東德實行蘇聯式的中央指令性經濟，正是中共推行「大躍進」所欲脫離的經濟發展模式，鄧在談到中國工業發展的新策略時，著重對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問題進行說明：

發展工業當然需要一批現代化的工業企業作骨幹，但是中小企業也要發展。概括地說，就是大、中、小結合起來，大機械化和小機械化結合起來，中央和地方結合起來。大的中央搞，中的地方搞，小的由鄉和合作社搞，這樣做比較見效。我們國家落後，國土面積大，如果只搞現代化的、大型的，只能搞幾個。如果全面開花，各地都搞，那麼發展速度可能快些。[4-34]

中共中央關於經濟放權地方的構想，轉化為實際就是成立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華中、西南、西北七個經濟協作區。其各自成立領導機構協作區委員會（分別由歐陽欽、林鐵、柯慶施、陶鑄、王任重、李井泉、張德生出掌），並下設經濟計劃辦公廳（辦事機構），接受國家計委與經委的指導。各經濟協作區的任務在於：根據區內資源等條件，按照全國統一規劃，儘快地分別建立大型的工業骨幹和經濟中心，進而最終建成各自獨立的工業體系。相關的配套措施是將各個中央工業部門及部分非工業部門所管理的企業，大部分地下放給地方管理。[4-35]

關於經濟放權地方的政策文件——〈關於加強協作區工作的決定〉與〈關於企業、事業單位技術力量下放的規定〉，主要制定於5月26至30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鄧小平全程參與相關的政治過程。[4-36]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央將經濟權大幅下放給地方後，毛澤東雖會親自出面召集地方大員，同後者當面進行溝通與對話；作為駕馭國務院、攫取其經濟管理權的中央書記處領導人鄧小平，也經常扮演著代表中央出面與各經濟協作區主任、地方領導人聯繫與商議經濟問題的角色。其間，鄧往往擔負著為毛摸清情況、試探意向並商榷想法的任務。[4-37]

由於地方領導人在「大躍進」中身負重責大任，不便輕易離開工作崗

位，鄧小平在1959年5月就婉拒了波蘭方面提出的邀請中共地方領導人赴該國休息的建議。他表示：「主要是因為他們事情太多，按照我們的領導制度，黨委的責任特別重大，一切重大的方針政策都是由它來決定，所以地方上的負責同志們肩負的擔子很重。關於邀請休假的事，我們很感謝，只是，由於目前我們還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將來再補償吧。」^[4-38]

抓鋼指標，步步加碼

1958年孟夏，在毛澤東主導下，「大躍進」運動愈加出現激進以至於瘋狂的一面。鄧小平作為毛所倚重的助手，協助填充其對「大躍進」綺想的內容。這首先表現在鄧配合毛制定指標居高，甚至華而少實的經濟生產計劃。

中共在「一五」期間有不錯的經濟表現，在「大躍進」越炒越熱烈的政治氣氛下，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人對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簡稱「二五」計劃）自是信心滿滿、意欲更上一層樓。對於「二五」計劃的頭一年1958年，他們不但心想要用力一搏以取得「好彩頭」，也希望以之帶動整個「二五」計劃、抬升其所預想的生產目標。正因如此，1958年年度計劃的敲定與整個「二五」計劃的制定之間，不但同步進行，實質上更是緊密地扣鎖在一起。

對於1958年生產計劃與「二五」計劃的制定，在工業生產方面，毛澤東擇定鋼鐵生產計劃為切入點，也就是以之驅動其他產業部門的計劃。1957年實際鋼產量為535萬噸。1958年鋼生產的指標卻一變再變，在6月以前，竟出現三本賬的變化過程：2月初，中共一屆「人大」五次會議提出624.8萬噸；針對毛澤東提出的地方工業產值要限期超過農業產值的要求，各地上調自身的工業生產計劃後，4月中旬，國家經委匯總報告中共中央，將鋼產指標改為711萬噸；前述的5月底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中穿插鄧小平與地方要人開會座談經濟問題，鋼產量的問題應包含在內），又建議將鋼產量增加到800萬至850萬噸。^[4-39]相關的指標在步入6月後還持續爬升。

鄧小平除了親身與聞1958年鋼產指標一再調升的過程，也費心地以之為基礎來制定「二五」計劃。6月7日凌晨4點，毛澤東致函鄧小平表示：「小平同志，6、7月你應做兩件事」：一是「第二個五年計劃佈局，如你自己所提的」；另一則是第三章詳述的前去協助彭德懷「開好」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4-40]當天，劉少奇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工作安排問題，決定從9日起聽取國家機關各部委關於「二五」計劃的匯報。^[4-41]

6月9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會議，聽取和討論國務院各部關

於「二五」計劃安排的匯報，鄧小平皆到場與會。^[4-42]由於毛澤東交辦鄧小平負責「二五」計劃佈局，再加上毛在8日才作出中央領導機構職權劃分的指示（國務院要根據中央書記處所作的「具體部署」來負責「具體執行和細節決策」），領導中央書記處的鄧小平才是國務院官員真正的「頂頭上司」（他們的直屬長官周恩來的去留問題，9日時才被中央議決）。他們在政治局會議上報告「二五」規劃時，應也會特別重視鄧的意見。

鄧小平在研製包括1958年當年計劃在內的「二五」計劃時，除了聽取國務院相關部會所設想的方案外，更重要的是遵照毛澤東的意見進行調整。6月6日，冶金工業部部長王鶴壽向毛上呈報告：經他與華北協作區主任林鐵商談的結果，認為華北地區鋼的生產能力在1959年底達至800萬噸是可能的。毛受此報告激勵，7日將之批給鄧小平時，在其上寫道：「1962年，〔全國〕可產6,000萬噸鋼。」^[4-43]鄧據此回過頭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要求國務院其他部門負責人，重新安排各自的計劃以與之相應。

由於毛澤東對鋼產高指標有明顯的偏好，鄧小平與其他中共領導人因而對鋼產指標的繼續浮升，也抱持樂見其成的態度。6月17日下午3時，中央政治局聽取國務院副總理薄一波（分管工業、交通事務）報告該年計劃執行情況和核對次年生產的設想。毛澤東沒出席，鄧小平與其他中央常委都參加了。對於鋼產目標，薄表示：1958年鋼產量將達900萬噸，1959年則計劃為2,000萬噸或2,000萬噸以上。鄧小平等與會者不但無人反對，反而有進一步加碼的情緒和要求。相關的討論甚為熱烈，入夜以後仍方興未艾，會議直至夜11時方結束，^[4-44]反映了一種集體躁進的傾向。

6月18日晚8時至11時半，毛澤東召集了鄧小平在內的「中央全體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黃克誠、王鶴壽等談話，決定再將1958年鋼產量的預計完成數由800萬到850萬噸改為1,000萬噸，將1959年鋼產量指標確定為2,500萬噸。^[4-45]隔日，毛澤東又將1958年的鋼產計劃乾脆定為1957年鋼產量535萬噸的兩倍，亦即「翻一番」，達到1,070萬噸；對內部則提出追求1,100萬噸的整數。^[4-46]

1958年的鋼產目標在中共高層內部有了定案後，鄧小平開始對黨內各級幹部進行宣講與推銷。鄧小平在7月11日的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鋼的重要性，言其與糧食、機械並列為「三個元帥」，^[4-47]並指出1958年可年產1,000萬噸的鋼，更公然提倡以興建高爐的方式土法煉鋼，認為此舉對於鋼鐵增產大有裨益：

「大中小、土洋、中央地方遍地開花」方針一搞，靈得很。如果我們整天只看到鞍鋼、包鋼、武鋼這一類的大企業，就永遠上不去，一年增加200萬噸、300萬噸，就了不得了。現在一搞遍地開花，一年就可以上去幾百萬噸，上去1、2,000萬噸，比如今年我們的鋼很可能到1,000萬噸。……我們工業真正解放是經過南寧會議、成都會議之後，才幾個月就見效。全國搞上萬的高爐，就解決問題了，一個高爐平均10噸，一下就長上去了。1萬個高爐，平均10噸就是10萬，

平均20噸就是20萬，50噸就是50萬噸。現在是好多萬個，而且有幾十萬噸的，見效的是1萬噸、2萬噸、3萬噸、5萬噸。一下就上去了，輕而易舉就上去了。

鄧小平在同一講話中，甚至還提到將來鋼生產太多時，「鋼用來作甚麼」、「鋼找甚麼出路」的問題。^[4-48]

八天之後（7月19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也對滿座的解放軍將官大談土法煉鋼的生產潛力，甚至認為此法可供蘇聯參考：

我們解決了很多問題，我們建議蘇聯除了搞一些大的以外，也搞一些中小型的工業。我們毛主席搞了三個並舉，特別是大中小並舉，使工業一下子上去了。例如石油工業，每個小型煉油廠年產300噸，搞它5萬個，那就年產1,500萬噸石油了。鋼為甚麼能上去？今年搞1萬個土高爐，明年就可以產2,000萬噸鋼，每個高爐只年產幾千噸，如果1萬噸就不得了，1萬個高爐就年產1億噸。每個高爐年產200噸，那就年產2,000萬噸。年產2,000萬噸的高爐，每天只生產7噸，這個辦法靈得很，這還不算洋高爐。這可以說明後來居上，蘇聯拼老命每年只增產300萬噸鋼，以後可能方法改變一些，可以多搞一些鋼。^[4-49]

可見在大煉鋼鐵計劃上，鄧小平無異於他人，亦表現得頭腦發熱。

活躍於北戴河政治局會議

「大躍進」運動正式發動於1958年5月中共召開的「八大」二次會議。該會肯定各地已出現的「大躍進」勢頭，通過「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4-50]然而，直到同年炎夏的北戴河灘，「大躍進」運動才真正地衝上浪尖。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舉行擴大會議。為時兩週的北戴河會議，正式向全黨、全國提出1958年鋼產量要比1957年倍增的任務，並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4-51]掀起全民大煉鋼鐵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將「大躍進」推向高潮。

毛澤東主張大搞群眾運動，各級黨委書記掛帥。在中央，鄧小平也以總書記身份掛帥。8月19日上午，毛澤東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強調：

「〔1959年〕鋼產量2,700萬噸要完成，今年1,100萬噸要保證」，「鋼鐵誰搞誰不搞，要服從決定，要下緊急命令」，「大、中鋼廠的計劃必須完成，爭取超過」。為了保證鋼鐵生產任務的完成，鄧小平旋即在同日下午「發表了一個簡短有力的發言」，強調「現在不是統死不統死的問題，恐怕要統點死」。^[4-52]鄧表示：「如果沒有集中統一、保證重點的原則，而且從中央到各省市，一直到企業，堅持到底，我們這個計劃有破產的危險。我們的方針是：全國計劃，集中統一，共同負責，全民保證。全國所有的企業和地方，都要服從這個方針，首先保證重點。」^[4-53]8月21日，陳雲向會議全體人員傳達毛澤東對大煉鋼鐵的相關指示時，鄧小平更特別插話指出：1958年生產1,070萬噸鋼的計劃，是「給赫魯曉夫打了包票

的」。^[4-54]亦即將煉鋼目標達成與否，置於關乎國家形象和國際影響的政治位階來看待。

另外，有關成立人民公社的決定，鄧小平亦表支持。鄧小平在8月23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人民公社解決了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問題。^[4-55]在同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鄧小平亦表示：「公社本身是社會主義性質，為共產主義作準備。全民所有制逐步增加，公社一建立積累很大，積累可為全民所有。公社一定要有公社的內容，一定要有生產財富的物質基礎。」^[4-56]鄧小平也甚為欣賞實行人民公社制度對中共統治的方便性。1959年5月21日，他就對波蘭的訪客表示：「我們有一億兩千萬農戶，後來組織成幾百萬個互助組，後來又併成七十多萬個合作社。現在我們有兩萬六千多個人民公社，這樣，抓起來就容易了。」^[4-57]鄧小平在1972年回顧成立人民公社的決定時坦言：「1958年實現人民公社化，我確實高興。」^[4-58]

鄧小平在北戴河會議期間還從事一項重要的活動，就是繼續編制「二五」計劃。會議最終也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這與鄧小平這兩個月的努力不可分開。鄧小平在6月上、中旬密集地聽取國務院各部會所作的「二五」相關匯報。其後直至北戴河會議召開前的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內，鄧小平則主要同中央的計劃工作者與地方領導人，針對擬議中的「二五」計劃再反覆地進行磋商。北戴河會議期間，鄧小平也兩度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座談會，進一步地率眾討論「二五」計劃。^[4-59]

有關〈決定〉對於糧、鋼的生產目標，皆設下了高不可攀的指標。糧食產量方面：1959年8,000億至10,000億斤；1960年13,000億斤；1962年15,000億斤或者更多一些。各年的鋼產量方面：1959年達到2,700萬噸，爭取3,000萬噸；1960年達到5,000萬噸；1962年達到8,000萬噸至1億噸。中共官方史家坦言：「這些完全脫離實際的指標作為黨中央的正式決定來公佈，給後來的工作帶來很大被動。」^[4-60]鄧小平就是這些高指標的拍板人。

當「大躍進」步入高峰，訂定的生產計劃已脫離實際，鄧小平對情勢卻深表信心，以為已經找到一條正確、快速的發展途徑，大有一股作氣成就一番經世大業的氣概。北戴河會議期間，鄧小平在聽取二機部（負責研發原子能事業）領導人宋任窮、劉杰匯報時指出：「當著國內糧食、鋼鐵和機械的生產問題獲得解決」，今後加速發展原子能尖端科學和工業已成為可能。^[4-61]其言下之意，「以糧為綱」、「以鋼為綱」的「大躍進」，其成功指日可待，甚至已可作為施政的依據。鄧小平的樂觀，由此可見一斑。

在北戴河會議後期與9月初，鄧小平數次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1959年中共國慶十週年的慶祝活動安排事宜。中共對於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在逢五、逢十年的時間點上向有特別慶祝或紀念的習慣。1959年是中共建政十週年，本當大肆慶祝。再加上，中共在1958年自認找到「大躍進」這一條最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可說是喜上加喜，更要在十週年的國慶上具體呈現。以「大躍進」主張的高速方式在首都北京建設「十大工程」，就是中共中央所構想出來的為十週年國慶獻禮的方案。^[4-62]

因為國慶建設工程在北京展開，結果攸關國家門面，鄧小平對此特別重視，在決策後不久即指示負責承建的北京市：「修建中要貫徹少而精、質量要好、藝術要好。」^[4-63]他在指導相關工作時，也不時流露出講求高效速成、集中力量的「大躍進」式的語言，例如：人民大會堂要「一年突擊蓋出來」；每項工程要「組織全國建築師共同搞」。其後，鄧小平對於國慶工程的進展，也多予以關心並實地前往查勘。^[4-64]在將士用命之下（建造人員不離工地、睡覺不脫衣服），^[4-65]「十大工程」不消一年即告成。其施工時間之短，令來訪的外國建築代表團在參觀時仍將信將疑，以為有關工程早有準備，甚至暗中偷跑。只不過如一參與設計者所言：「為了爭取時間，國慶工程幾乎都是邊設計、邊施工的，這就容易出現各種錯誤，有的就成了永久的遺憾。」^[4-66]

第三節 督導地方黨內整風，鼓舞在地的積極分子

由於地方在「大躍進」的推行上預定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人事組成勢必會對運動產生重要的影響。因此，在運動開跑的前後，鄧小平便領導中央書記處，代表中共中央直接過問、插手若干重要省份的領導人調整。然而，鄧小平並非簡單地採取一種人事更替的組織措施，他指示相關省份展開黨內整風，在批判、撻伐與「大躍進」政策與氣氛不對盤的地方領導人的過程中，利用整風兼具說理、誘利、恫嚇的功用，讓省內黨員與群眾辨別政治方向，並調起、動員他們的熱情和幹勁，挺身投入各級的政治揭發與批判，也為當地、甚而全國的「大躍進」計劃的實行，集思廣益、盡其所能。以下將以河南、山東兩個農業大省，以及工業大省遼寧為例。

河南、山東之案例

從1950年代中期起，河南省委內部發生以建設速度爭議為表現的黨內鬥爭，第一書記潘復生代表穩健，省長吳芝圃代表激進，兩人相互傾軋、互不相讓。^[4-67]潘常為病痛所擾，豫政遂漸為吳所把持。在「大躍進」的

政治氣氛下，吳的論調較潘更貼近中央的政治理念與運動的主流語言；吳對運動的忠誠與執著，在全國省級領導中名列前茅，也有「驚世創舉」，猶如運動大浪中的「弄潮兒」。對中共中央而言，支持運動的「死忠派」，協助其排除省內的政敵，就是對當地運動最實際的支持。

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期間，召集吳芝圃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針對潘、吳之間的爭鬥，鄧向吳表示：「真理在你們這一邊。」^[4-68]也就是代表黨中央對吳表達支持。吳芝圃取代潘復生擔任河南省委第一書記的中央人事派令，在「八大」二次會議還未結束前就已發出生效，持續數年的河南黨爭，自此理應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鄧小平卻另有打算。鄧小平指示吳芝圃：「批判潘復生是完全應該的」，「你們在這兒不要搞了，回去鬥」。鄧希望吳在河南黨內發起批判以潘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整風，期以在「寓教於鬥」的過程中，明確、強化當地各級黨幹與黨員敢想、敢幹的「大躍進」思想。

吳芝圃離開北京前，即指示河南省委準備批判潘復生的資料；吳一回到河南後，興沖沖地召集省委會議傳達鄧小平為首的中央書記處的意見：「不要怕潘復生抵抗，要鬥透，從政治上、思想上揭發，不要草率做結論，會議上不要做處理，要反覆鬥爭，時間越長，鬥爭越深入，效果會越大。」^[4-69]吳芝圃鬥潘復生鬥紅了眼，從黨內鬥到黨外（也未見黨中央和鄧小平制止），在河南境內掀起聲勢浩大的揭批「潘、楊、王右傾反黨集團」的運動，受挨整、株連者達20萬人，其中含廳局級幹部18名。^[4-70]

吳芝圃透過批潘整風在河南大抓「小潘復生」，直接強固了他在「中州」的獨尊地位；整風結合強制與自願下的揭發，累積了高達十幾億張的批判大字報，^[4-71]其中也為吳在全省各級中「培養」出一群忠心聽話、願意效命的「小吳芝圃」。吳芝圃個人全面得勢，再加上擁吳勢力在整風批鬥中的浮出與集結，對本來已「左」得突出的河南「大躍進」運動，進一步產生鼓勵、助長的作用。鄧小平在5月指示吳芝圃「回去鬥」、鬥爭要反覆與深入，期待的正是這種既鞏固了黨又「鍛鍊」了人的整風效果。

山東的領導層內部，也存在類似河南的夾雜政策歧異與人事糾紛的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書記舒同與第三書記兼省長趙健民之間的對立。山東黨內對趙的批判，乃是在「整風補課」的名義下進行的，在反對地方主義、反對右傾保守的聲浪下掀起批判的高峰。

趙健民曾效力於鄧小平領導的「二野」，在國共內戰後期隨「劉鄧大軍」的征程落腳西南服務。鄧主政西南時的重要政績——成渝鐵路的興建，實際上正出於具體負責相關工作的趙健民之手。根據「文革」批判資料，趙健民被選派至山東工作，即受到鄧小平誇獎「趙健民老實」的影響。^[4-72]1958年，趙健民在山東成為批鬥目標後，情緒上感到不解與抵

觸，便求助「老長官」鄧小平。不料鄧不但沒有答應聲援趙，反而建議趙虛心自我檢查。^[4-73]鄧的考量乃近似於他對河南吳芝圃所作的指示，也就是地方黨委與各級人員要經過整風的洗練，方能進一步地端正思想、穩住方向，幹部隊伍在接受整風教育的過程中，也能進行一番取優（積極分子）去劣（冥頑不順者）的汰選。鄧小平指示吳芝圃、趙健民兩人的主要不同之處則在於：鄧要吳扮演領導河南黨委整風的「正確代表」，鄧要趙安於充任激化山東黨委整風的「反面代表」。

舒同在6月3日召開省級領導機關負責人會議，強調提出：「首先要加強思想工作，整風是統帥，工農業生產是中心，技術革命與文化革命是兩個關鍵」；「要把整風堅持到底，搞深搞透。反右派、反右傾保守思想還不徹底的單位，必須在整風中重點補課」。舒同進而表示：「山東黨內黨外一直存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鬥爭。有一部分人對『反冒進』、刮『颱風』反應很快，但對黨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卻毫無興趣。他們不是插紅旗而是插白旗，不是促進而是促退。」^[4-74]「與黨委分庭抗禮、離心離德。」^[4-74]從舒同看來，趙健民正是他話中的「一部分人」的首領，必須對之發起總攻擊以徹底剷除。

趙健民在批判初期，為了保住黨籍，遵照鄧小平的「忠告」作了適度的檢查。然而，趙卻發現自己每低首檢查一次，批判反而愈加升級。按照整風發展的規律，被黨上級指認為犯錯者，不認錯不行，但一旦認錯，相關的指控又會在順藤摸瓜下繼續加重、擴大，即便如此，犯錯者只能不停地檢討、認罪與求饒，直到黨上級覺得目的達到可以收手為止。趙健民不明整風的「事理」，憤而改以申明事實的方式為己辯護，甚至在有千人與會的省黨代會上直接出言反駁。代表中共中央（書記處）坐鎮該會議的譚震林，見到趙健民「不安本分」（不願屈作整風的批判標的），便配合舒同聲嘶力竭地大罵趙，發誓要拔掉趙「這一桿地方主義大旗」！^[4-75]

6月27日上午，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中共山東省委負責人匯報工作。^[4-76]從時間上推算，後者匯報的內容甚有可能與當時正在火熱進行的批趙整風有關。譚震林在山東挺舒批趙的言行，並沒有遭到鄧小平公開反對，因為鄧本來即要趙俯首甘為山東的黨內整風扮「丑角」，而後者吞不下這口氣，使得整風這齣戲險些亂了套。1959年初，鄧小平傳話給猶作困獸之鬥的趙健民：「適當檢討，保住黨籍。」^[4-77]趙方才就範。

在中央書記處的認可下，山東的高層政爭與整風最後是以舒同大獲全勝作收場；趙健民最後雖保住黨籍，但被降職為濟南鋼鐵廠副廠長。這次整風也按鄧小平原先的預期，既將可以「大躍進」、必須「大躍進」的思想深嵌在當地黨幹的政治意識中，也「培育」出不少甘願跟從舒同、篤信

「大躍進」前景的「鐵桿分子」，如山東省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張新村（舒同後來因為「大躍進」錯誤遭到批判時，張也因在運動中緊跟舒同而被要求一同檢討），從而為舒同在山東以「一言堂」的方式厲行「大躍進」政策，提供了思想與組織的條件。舒同為了酬謝中共中央對其統治地位的支持，特地在濟南南郊賓館蓋建七棟別墅，意給鄧小平在內的七名中央常委過境山東時，有各自專屬的一棟樓館歇腳。「冤家路窄」，南郊賓館按舒同的計劃興建別墅時，正巧趙健民任職的濟南鋼鐵廠擴建也需材料。此時趙已失勢，更只能「讓路」。^[4-78]鄧小平在「大躍進」期間幾次路經山東，是否曾住進舒同用心籌建的別墅休憩，則不得而知了。

有關趙健民遭到舒同不公正對待而提出調查、平反的要求，雖早在1960年初即向中央書記處反映，但如石沉大海，遲無進展。^[4-79]這肇因於舒同當時仍主持魯政，「齊魯之國」在「大躍進」期間所發生的慘況，還未全盤曝光，因此對趙案的重新處理自是難以被正式置入中央書記處的工作議程。待趙健民申冤成功之時，已有300萬的山東人民死於「大躍進」。^[4-80]

遼寧之案例

遼寧乃是一重工業集中的省份，其在全國工業中的地位，較諸上海不但不遑多讓，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遼寧所屬的鞍山鋼鐵產的鋼產量，佔全國1/3的比重，化學工業與水泥也皆佔20%，煤則超過1/7。中共中央希望它在工業「大躍進」中能作為衝鋒陷陣的標兵。

為了加強遼寧的領導力量，1958年3月，鄧小平告知時任天津市委書記兼市長的黃火青，中央準備將其調至遼寧。成都會議結束後，譚震林正式通知他出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而原本即在該省任職的黃歐東則擔任第二書記。^[4-81]基於對遼寧的重視，除了新調黃火青為其最高負責人，中共中央還特地調派一批幹部去加強工作：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調任該省省委的工業書記；負責主管鞍山鋼鐵廠的鞍山市委書記，也是中央新派去的。^[4-82]

在中共決定乘「大躍進」的順風在經濟上施展拳腳之時，這個負有發展工業重任的遼寧省委高層，卻存在人事不和的隱憂，這主要表現在黃歐東與原省委書記王錚之間的對立。初來遼寧的黃火青雖然傾向支持黃歐東，但是因環境不熟，不敢自行作主，從而向中共中央請示與求助。對於遼寧省委的人事問題，鄧小平聞知已有一段時間。由於鄧深知相關問題可能對該省工業「大躍進」產生不利的政治影響，遂決定採取積極介入的態度。

黃歐東與王錚長期失和，處理原省委常委、省工會主席張烈的政治問

題，更成為兩人以至兩派人馬對決的導火索。簡單地說，黃歐東認為王錚等人蓄意包庇「張烈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罪惡活動」，因而在1957年11月23日用電話向指揮全國「反右派」運動的中央書記處報告（要處理如張烈這種具省委常委身份的幹部，也需報送中央書記處同意），同時也反映了對王錚有關態度的看法。中央書記處在三天以後發電報給遼寧省委表示：「關於『張烈問題』，中央已經聽到一些反映，但迄今未得到你們報告，請省委即加以討論，作出決定，報告中央。」^[4-83]然而，在1958年1月張烈自殺後，相關問題一時陷入了僵局，而其背後牽涉的人事角力，則轉明為暗、繼續纏鬥不休。

黃歐東希望聯手新上任的黃火青，以召開省委擴大會議的方式，一了百了地解決其與王錚的紛爭並順勢剷除後者在省內的政治勢力。會議從1958年6月24日開始，把王錚的錯誤上綱到「兩條路線鬥爭」的問題。兩黃為了讓中共中央知曉遼寧相關會議的進展情況並為他們自己的政治行動取得更大的正當性，親自前往北京向鄧小平匯報。8月1日晚，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雙黃匯報遼寧省委擴大會議的情況。^[4-84]

黃火青晚年僅以「中央支持開會」寥寥數字，說明鄧小平聽取匯報後的態度，^[4-85]實際上大大地淡化鄧及其書記處同僚的角色與作用。根據「文革」時期的揭發材料，鄧小平偕同彭真乃是不惜唇舌地對遼寧領導人詳加指示：

首先，表達中共中央自始即對此問題予以高度關注；也講明了要以「張烈問題」作為批判王錚的突破口。

鄧小平表示：「中央發現了『張烈問題』，並早知道黃歐東是不贊成張烈的，王錚是贊成張烈的，有兩個意見，但你們沒有向中央反映啊，叫中央怎麼做結論呢？所以〔對此問題〕發了電報，將了一軍。」彭真接話表示：「中央發電報，說『張烈問題』怎麼樣，你們不向中央報告？就是將省委一軍，並支持一下正確的方面，中央將一軍的目的是甚麼呢？目的是以『張烈問題』做『引子』，把問題引出來，把省委裏所存在的歪風和髒東西拉出來。看看究竟是些甚麼髒東西。」鄧也補充道：「『張烈問題』只是由頭一個引子，想從『張烈問題』摸一下遼寧省委的問題。」

其次，對王錚等人錯誤的性質加以定性，並指示省委擴大會議接續的開法。

彭真先以「陰風」為喻形容王錚的問題：「遼寧有股不正的風。這種風只是沒有放在桌子面上。是在桌子底下的，是陰風。」他繼而點明王的錯誤性質：「這裏主要的問題，不是黨性，不是共產主義，是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地方主義。現在你們的會議還沒搞透，把這些問題提到原則水平上來批判，以後才不會存在這個問題。」鄧小平更進一步地表示：「他

們〔王錚等人〕的錯誤大體的性質現在已經肯定了，將來要看他們檢討態度、每個人錯誤的具體情況，這是與結論有關的問題。」

關於會議之後進行的方式，鄧小平指示：「性質已經肯定了，材料和事實夠了，就是搞思想問題。」「要搞透就得到一定的火候，沒有一定的人數，沒有一定的溫度，就搞不起來。總之，就靠這次會議來一個遼寧的翻身運動。」而此一引進更大範圍的人員投入批判、將會議溫度在短時間內加熱升高的作法，實無異於由鄧小平領導的、剛結束不到十天的中央軍委「反教條主義」整風（第三章）。事實上，鄧所作的政治思考也與其較早之前指導河南、山東兩省黨爭時一樣，亦即藉由擴大規模的整風，讓遼寧各級黨幹親身目睹、參與沾染此一何者為是、何者為非的政治批鬥，促之思想整齊劃一，進而乖順地跟著黨的腳步為「大躍進」拼命。

再次，強調這場黨內整風與政治鬥爭不但對確認、穩固遼寧的領導權別具意義，該省的「大躍進」表現也將受此整風結果影響。

鄧小平對雙黃表示：「你們這個省，大權旁落，當然你們也應當檢討啦。這些問題，第一書記要掛帥，要拿出意見來。遼寧哪一天不把這個問題搞透，就翻不了身。」「你們要利用這個機會，將省委本身的領導權拿過來，省委要對全省實行領導。」彭真也在一旁幫腔：「遼寧省委是無組織、無政府，省委是『周天子』，省委決議的事、省委做了結論的可以不執行」，「遼寧若不把黨性、共產主義搞起來，就是誰去也搞不好。要用大力搞這個。」^[4-86]

鄧小平也謹記其推行「大躍進」的本職，將相關的整風清算與當地經濟「大躍進」的發展結合、掛鉤起來：「遼寧農業搞的不出色；在大的工業高潮中間，工業戰線也不出色。這個問題要不從這個環節上來解決，不插紅旗，不把黨內正義的旗子樹立起來，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就靠這個會議來一個遼寧的翻身運動」。

二黃返回瀋陽後，即將鄧小平、彭真的指示向與會人士傳達。他倆也恪遵鄧總書記的指示，將會議參加人數從會議前期的201人擴大為1,200多人，會議的批鬥氣氛也因而更加緊張。^[4-87]

鄧小平至東北「白山黑水」指導、推進「大躍進」的期間（下一節詳述），也親自現身遼寧省委整風擴大會議，代表黨中央見證該省「徹底粉碎」以王錚為首的「打白旗，鬧分裂」的「地下省委」。^[4-88]鄧小平除接見參加會議的人員並兩次攝影留念，更到會講話。鄧在會上表示：遼寧不出色的根子，現在找到了，主要是由於王錚等人的反黨宗派活動，並號召要在遼寧「拔白旗」、「插紅旗」，搞個翻身運動。鄧在會上對王錚等人的指控是極為嚴厲的。鄧指責他們：「用陰謀家的手段，背著黨的組織，暗中進行反對這個、反對那個的活動，這種活動是直接違反黨的紀律的、

危害黨的統一，因此，必然也是反黨的。」^[4-89]

省委擴大會議結束後，根據鄧小平提出的「要作為一個運動來搞，要進行共產主義教育，要一直搞到下邊去」的指示，遼寧省委以肅清「王錚反黨宗派」的影響為名，在省內掀起「拔白旗、插紅旗」的整風運動，批判、逮捕了一批「反黨集團」和「反黨分子」。^[4-90]

第四節 從東北一路鼓動幹勁到西南

鄧小平對「大躍進」的熱忱參與，在他接連至地方進行動員、佈達以及檢查運動執行狀況時，表現得最為明顯。鄧小平在9月中旬至11月上旬，以不及三個月的時間，先後前赴東北工業基地、華北的河北省與天津市，以及其曾主政之西南區域，馬不停蹄地於各地鼓動躍進熱情、傳播蜃樓美景。鄧小平在巡視過程中洋溢著激昂的情緒和鼓動的語言，並對運動的「重頭戲」大煉鋼鐵與「新生事物」人民公社多有指導。

東北視察

9月2日上午，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明其赴外地視導的行程與目的：「我們要出去，彭真留在北京主持書記處工作。出去是研究工業問題，先從滿洲里往南走。『十一』回來，住幾天，再由天津向南走。我們出去主要是鼓動。」^[4-91]

鄧小平所言的「出去是研究工業問題」，大煉鋼鐵問題乃是其中重點。因為當北戴河會議確定1958年鋼產量指標時，中共面對的是緊迫的時間壓力和繁重的煉鋼任務，亦即必須在全年剩下的1/3的時間，完成尚待完成的2/3指標。鄧小平自也得投入此場「只爭朝夕」的生產競賽，而其在推行上的強勢和殷切，也歷歷可見。為爭取實現計劃目標，鄧小平麾下的中央書記處密集開會研議，也屢次下達命令規定進度。例如：9月5日，鄧小平主持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就有可能對煉鋼問題加以討論與決議。因為中央書記處在當日晚上舉行全國電話會議，向各省領導人強調：北戴河會議確定和下達的鋼鐵工業指標，只能超額完成，不准完不成。不但一噸不能少，少一斤也不行。^[4-92]

鄧小平或覺得在煉鋼問題上，在中央進行指揮固然重要，直赴生產前線動員、打氣也有所必要。因此，鄧要彭真在北京留守，繼續循由黨機制對下指揮、施壓，他自己則在9月10日起開始為時20天的東北行。在鄧小平「關外行」期間，彭真也確實履行其職責。9月25日，中央書記處召開電話會議，要求達到日產鋼6萬噸，鐵10萬噸。^[4-93]彭真在此會上表示：針對鋼鐵問題，「書記處開了兩三次會，這幾天又給各地打了些電話，初步考慮

之後有這麼些意見，當然這還是初步意見，請同志們考慮考慮」。^[4-94]之後，針對鋼鐵高產「衛星」「放了之後又降下來了」的問題，中央書記處又命令冶金工業部與地方黨委設法「把鋼鐵的生產提高到一定的水平，而且要穩定下來」。^[4-95]

在大煉鋼鐵的問題上，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代表黨中央對地方黨委的「聲聲催」，^[4-96]確實讓後者坐立難安、備感壓力，只得竭盡其所轄區域的人力與資源，以求準時完成中央指定、佈置的鋼鐵生產額度。^[4-97]對於鄧小平及中央書記處在大煉鋼鐵上熱火朝天的勁頭和緊迫逼人的態勢，陳雲和陶鑄在事後都不無微辭。^[4-98]

鄧小平在東北視察的首站是黑龍江。鄧在該省主要視察工業生產：在齊齊哈爾看機床廠、重型機器廠、炮彈廠；到哈爾濱看電機廠、鍋爐廠、輪機廠、軸承廠；在離開黑龍江前，還在雙城視察煉鋼小高爐。^[4-99]

9月17日上午，歐陽欽率省委高幹向鄧小平匯報工作。鄧指示歐陽再接再厲，提出更宏大的躍進計劃：

你們潛力很大，好好用點勁，可以比現在設想的支援得更多更好。你們的成績很大，包括許多工廠在內。好多廠很有幹勁，雖然程度不同，但勁都鼓起來了。大家很熱心，計劃看起來也算不算小，但是鑒於潛力很大，是否挖夠了，不能說。我是外行，但內行人一看就說是還有潛力未挖。稍微調整一下，鼓一下勁，想點辦法，還可以加大計劃。^[4-100]

同日下午，鄧小平在黑龍江省幹部大會上作關於當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鄧在講話中雖表示：「我國的工業和科學技術的關還基本沒有過，還差得遠，還要努力。」但他卻口氣豪邁地指出：「我們不僅要建成社會主義，還要向共產主義過渡！」另外，鄧也向聽眾說明中共中央對東北的工作期許：

北戴河會議對東北三省的工作提出了方針，叫做「充分挖掘潛力，大力支援全國，逐步合理發展」。東北三省潛力大，任務重，任務完成得好不好，主要看支援全國的任務完成得好不好。要完成支援全國的任務，必須正確處理局部與全國、大廠與小廠、工業與農業三個方面的關係。^[4-101]

自9月19日起，鄧小平開始對吉林省展開5天的視察，全國著名的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與吉林小豐滿發電廠都在行程之中。鄧小平在吉林停留期間，也以鼓勁、增產為號召。9月22日，鄧小平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和長春市委負責人的工作匯報並當場給予指示，大煉鋼鐵與人民公社自然是鄧談話中最核心的部分。

吉林省原本是寸鐵不產，但北戴河會議仍分給吉林大煉鋼鐵的任務：1958年生產鐵30萬噸、鋼5萬噸。為達成目標，以吳德為首的吉林省委焦急得有如熱鍋上的螞蟻，9月6日召開全委擴大會議，要求必須動員全省、全

民的力量，保證完成鋼鐵任務；17日又召開全省掀起鋼鐵生產高潮電話會議，指出鋼鐵生產的中心是煉鐵，要求書記掛帥，狠抓建爐工作，搞好焦煤、焦炭生產，組織採礦、礦石運輸，以掀起生產高潮，力爭日產3,000噸鐵。^[4-102]因此，鄧小平來吉林之時，當地正在如火如荼地大煉鋼鐵。針對吉林「先天不良」的鋼鐵生產條件，鄧小平對省委領導人表示：「搞鋼鐵就是搞共產主義，是戰略任務，搞起來再說。」對於該省為了煉鐵而大批建立的小高爐的技術問題，他具體指示：「可以組織大學生下去指導。」

有關人民公社問題，鄧小平著重講解公社領導班子的關鍵性，望之在農村中扮演奔向共產主義的「領頭羊」：「公社組織起來要注意骨幹。選舉骨幹是個基本問題，至少兩個人要選了又選，一個是社長，一個是黨委書記，標準就是選共產主義思想多的人。必須要有核心，有了核心，就把別的人帶動起來了。」^[4-103]鄧小平離開吉林後，吉林省委專門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傳達了鄧的指示精神，並組織幹部、群眾進行學習和討論，並按之部署工作。^[4-104]

9月23日下午，鄧小平抵達遼寧省。對於坐落該省的鞍山鋼鐵廠的領導人思想問題，鄧小平特別關心，在24日就前往視察與指導。因為鞍鋼作為中國大陸鋼鐵工業的主力，在大煉鋼鐵成為舉國首要任務之時，被賦予重大的責任。該廠在1958年的產鋼任務，為先前的一倍，亦即達到450萬噸。然而，重視並提倡企業計劃管理與責任制的煉鐵廠廠長蔡博（中共早期革命活動的領導人蔡和森之子），^[4-105]卻認為大煉鋼鐵根本脫離實際、違背科學。^[4-106]鄧小平來鞍鋼是希望利用整風的方式，讓鞍鋼領導人與幹部篤定運動任務必達的心志，蔡博縱使是「革命先烈」之後，但此時為了整風動員的需要，也只能屈作政治批判的標靶。在指揮此事上，鄧小平較諸同行的李富春（蔡博的姑丈），或有較不顧忌的方便。^[4-107]

有感於蔡博思想的「落後」與「保守」，鄧小平在鞍鋼聽取匯報時，即特別強調此次整風的目的是要對各級人員灌輸、樹立與「大躍進」搭配的「主導思想」：

社會主義大家都在搞，但是怎樣搞，還有個方法問題，是多快好省呢，還是少慢差費。搞甚麼都要有個攻擊目標，應該定出哪一項東西能趕上哪一國，哪一項東西哪國好就超過哪一國。要選擇尖端作為攻擊目標。別人沒有的，我們可以有；別人不好的，我們可以好；別人辦不到的，我們要能辦到；別人的目標，我們可以超過。要把這一點作為主導思想，作為各級領導人的主導思想。^[4-108]

鄧小平主動地為鞍鋼設定了一個要超趕的「攻擊目標」：「鞍鋼這樣的大企業，應超過上海。」^[4-109]對於鞍鋼預定在次日召開的群眾動員大會，鄧小平與李富春也仔細研究確定了其形式、地點與內容。^[4-110]李富春在9月25日有三萬名鞍鋼職工參加的大會上，鸚鵡學語般地重覆鄧小平在前

一日聆聽匯報時所作的指示：「鞍鋼職工應該樹立這樣的風格：別人做不到的事，我們要敢於做；別人想不到的，我們要敢於想」，「一定要把紅旗插起來」！李更強調：「誰有更多的共產主義思想，誰就會創造奇蹟；誰不敢打破常規，迷信老一套，誰就要失敗。」^[4-111]

在鄧小平、李富春放了一把火之後，鞍鋼發起「拔白旗」運動，蔡博等一批廠處級、科級幹部遭到批判、調職，被勒令反省檢討；在此過程中也湧現了一批積極響應或被動員參與批判「錯誤思想」的幹部與群眾，以及許多為了發揮生產潛力以完成鋼鐵增產任務的新措施與新發明（如多裝快煉）。鞍鋼創造日產鋼鐵新紀錄與放出鋼鐵高產「衛星」的消息，也一時不絕於耳、好不熱鬧！^[4-112]然而，這種伴隨整風而來的一波波生產高潮，不久也浮現副作用，特別是不顧管理規章制度而釀成的多起重大死傷惡性事故。^[4-113]

視察農村和城市的人民公社，則是鄧小平在遼寧停留期間的另一重點活動。9月25日，鄧小平赴蓋平縣視察「太陽升」人民公社。在視導該社時，鄧像空中畫餅般地訴說他對農村人民公社似錦前程的想像：

農村要大大增加生豬飼養數量，只有把農林牧副漁統統發展起來，才能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才能使人民公社鞏固發展。公社是建立在生產大發展和人民政治覺悟提高的基礎上的。公社應制定長遠計劃，逐步把農村居民點建成一座座漂亮的城市，有電影院、劇院、運動場，房屋都要改建，城中普遍種花果，要綠化、園林化，工農商學兵全面發展。大城市所有的一切，你們都可以有。將來無所謂農村和城市。工農差別、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別、城鄉差別，都要消滅。^[4-114]

26日，鄧小平視察瀋陽市北關區紅旗公社。從他在27日對遼寧省和瀋陽軍區中共黨員負責幹部大會的講話中，可見乎其對之抱持的是鼓勵試行的意見：

農村的人民公社，遼寧的架子搭得比較早，全國最先成立人民公社的就是遼寧和河南。但是搭起架子，不等於事情就了結了，還要很好地做工作。公社一定要在一個充分的物質基礎上才能搞得很好。農村公社一搞起來，逼得城市也非搞不行。大城市和農村相比有些特殊性，怎麼搞法？要多多試驗，積累經驗，創造經驗。^[4-115]

因為要參加中共國慶活動，鄧小平結束東北之行，在9月29日夜回到北京。

津冀視察

1958年「十一」結束後，鄧小平即投入兩件事：一是思考、總結其在「山海關」外的所見所聞，以作為運動下一步施政的參考；另一是緊抓鋼鐵生產，以免1958年鋼產1,070萬噸指標「跳票」。

10月6日上午，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在討論人民公社問題時，鄧就特別提到他在東北觀察到的公社食堂供給食物簡單劃一、激不起群眾興趣的情形。當天下午至晚上，鄧小平更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專題報告視察東北的情況，以供中央決策參酌。為催趕煉鋼，鄧也在此會上聽取鋼鐵、機械、煤炭生產及交通運輸的匯報。^[4-116]

10月7日起一連八天，鄧小平又在中央書記處下屬的簇擁下，前赴天津市和河北省對運動加以視導。鄧此行在同冀省地、縣級幹部座談中，尤為強調人民公社的組織、領導問題。10月10日夜，鄧小平在石家莊除裁示要以「不斷革命」、「敢想敢做」的精神進行農業生產，也對人民公社的領導與組織問題發表意見：「各級人民公社，黨委都要大權獨攬，不能削弱黨的領導，而且要加強黨的領導。應當選擇有共產主義思想和風格的人領導公社，不能光講資格。在這個總原則之下，考慮公社的組織形式。」^[4-117]幾天後，鄧小平在保定也指示：「公社和黨併在一起，不妥當，第一書記不能兼社長。書記搞到日常事務裏，接觸和反映問題的角度不同，有些問題也反映不到。人民公社黨的領導很重要，只能加強不能削弱，只要黨存在就要大權獨攬。」^[4-118]

鄧小平之所以對人民公社的領導、組織問題施予細膩的指導，乃因公社是「大躍進」開始後黨國對農村底層社會進一步加強控制，甚至按其心意加以形塑的重要機制，因此務必要確保基層黨組織和運動積極分子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以使公社在路線與政策上與黨中央高度保持一致。

鄧小平此次在河北也到了當時在全國聲名大噪的徐水縣人民公社。在徐水停留期間，鄧小平對於當地創新的小麥播種方式和豐產結果予以稱許，也對麵粉廠、縫紉廠等公社辦工業大表欣賞，認為「適應了大躍進解放勞動力的需要，改革了勞動組織，促進了全縣家務勞動的集體化和社會化」。此外，對於公社「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努力學文化」的做法，他也甚感興趣。^[4-119]

此時的鄧小平贊成公社辦工業的想法，如同他在兩個月前的北戴河會議上強調人民公社一級「一定要有生產財富的物質基礎」，皆為一廂情願。因為國家既不給公社資金，公社本身沒有原始積累，只能向下屬生產大隊、生產隊抽調。鄧小平與其他中共領導人對人民公社的定位，所持的此一想當然耳的看法，即是後來人民公社內部發生「一平二調」的根本原因。^[4-120]另外，鄧甚感興趣的徐水「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勞動紀律化」等做法，有論者指出，其造成了瞎指揮和強迫命令的後果。例如：徐水縣委第一書記張國忠下令將不服從密植命令的人綑綁鬥爭、拳打腳踢，之後再押送監獄勞動改造，其中不乏傷重致死者。^[4-121]

西南視察

10月22日，鄧小平搭機飛赴廣西，展開長達16天的西南之行。鄧此行先後赴廣西、雲南、四川、貴州視察和指導工作，再折返重慶。

由於時間越來越逼近年底，鄧小平也為「鋼鐵元帥」能否如期升帳立威一事著急。事實上，鄧在飛赴西南視察的前一天（21日）上午，還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鋼鐵生產問題。^[4-122]甚有可能是在行前，特地對大煉鋼鐵問題再加以指示與佈置。

鄧小平抵達八桂大地的當夜，即視察柳州的鋼廠；隔日早上，又親臨作業現場，視察當地的土法煉鐵。^[4-123]10月27日，鄧小平抵達四川成都的第二天上午，就前去視察土法煉鋼。^[4-124]鄧小平在四川綿陽地區見到人山人海齊煉鋼鐵、火光沖天映紅夜空的壯觀景象，一再地誇讚：「這才是大辦鋼鐵的樣子嘛！聲勢大、氣魄大。」然而，當天明後，鄧注意到農田裏鮮有人影，便不悅地向陪同的地委書記表示：「你們這裏的農民都在扛樹枝煉鐵，沒有人耕地種莊稼，〔農業〕有甚麼看頭？」^[4-125]鄧此時尚沒有想到的是：這不正是中共中央猛力驅策各級力達鋼鐵指標下，所帶來的擠壓農業效應？

鄧小平親自到田間對農業所作的指導，也不無問題。9月底，鄧小平在遼寧撫順視察時，針對農業問題，曾指示：「要搞好水利、深翻地、施肥、密植和加強田間管理等工作。」^[4-126]一個月後，鄧至「天府之國」仍販售同樣的觀點，態度甚至更為嚴峻。鄧小平在勘察成都以北的地區時，曾質問廣元縣委書記：「你們這裏怎麼才犁這麼深？」在後者回答「我們已經把犁頭由2寸加深到了5寸了，這都不容易啊」後，鄧毫不客氣地表示：「人家是掘地三尺，深翻土地，你們才耕那麼深，怎樣能增產？」^[4-127]鄧既要民眾勤煉鋼，又要他們同時顧農活、深掘土，實引人有不惜民力之感。

有關人民公社的問題，鄧小平在西南地區發表的意見，多是他在東北三省以及河北省視察時，所累積思考或曾經表述過的。在公社食堂的供應上，鄧強調：「把人們搞得那麼死板不行」；「公社的食堂要辦得好一些，使農民感到比過去在自己家裏還吃得好，這樣才能顯示出公社和集體化的優越性」。另外，在公社的領導與組織問題上，鄧也重申其在河北所說的，要設法鞏固、加強黨在基層的領導。^[4-128]

然而，在人民公社的問題上，鄧小平也不時出現過於理想而不切實際的主張。10月25日，鄧小平指示雲南領導人：「分配要適當，對窮的地方要補貼一點，富的地方要拿出一點，總是共同翻身。」^[4-129]隔日，鄧在成都視察人民公社時也表示：「以一鄉一社，縣組織聯社較好。搞聯社，便

於組織社與社之間評比，在社與社之間調劑貧富，抽肥補瘦，也可以避免經濟結算不便的缺點，還可以充分發揮基層的積極性。」^[4-130]鄧的指示恐助長平調物資、窮富拉平的傾向，挫傷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在四川德陽視察時，鄧小平指示「城市人民公社你們早點搞」，更主張：

要按共產主義的生活來設計佈置街坊和住宅，要想到將來的人4小時或6小時工作，2至4小時學習，8小時睡眠，再多了睡不著，還有8小時幹甚麼，那就是走棋、跳舞、看戲、看電影、打球、看打球（楊尚昆插話說，還要坐茶館）。因此，娛樂設施、公園、體育場等都要修好。^[4-131]

鄧小平在1958年秋周遊各地廣為推銷「大躍進」，強力地推動運動的發展。經由實地走訪與考察，鄧小平發熱的頭腦中也偶有冷靜的觀察，對於運動的若干具體實行面，加以批評和指正。譬如：鄧認為小高爐煉出的鐵品質不好，要設法改善；^[4-132]也表示「要在大爐子上想辦法，小爐子放衛星不算數」。^[4-133]對於急促推廣的人民公社制度，鄧小平在視察中就一再指陳各地人民公社普遍存有單一形式、缺乏特色的運作方式，強迫命令的組織生活，以及食堂供給貧乏等問題。^[4-134]

農村地區因不明人民公社性質而出現急於過渡的現象，引起毛澤東的高度注意。在其帶頭下，中共中央從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的第一次鄭州會議起開始進行所謂的糾「左」，其後再經過11月21日至27日舉行的武昌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及11月28日至12月10日舉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的討論，最後產生並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強調集體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之間的界限，兩個過渡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今後人民公社仍需要發展商品生產和保持按勞分配的原則。^[4-135]

在〈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形成的過程中，鄧小平協助毛澤東在中共高幹間進行觀念引導、充實內容以及統一思想的工作，最後也是由鄧負責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代表說明。此一鄧小平喻為「給人民公社立一個憲法、一個共同遵守的章程」的政策文件，^[4-136]雖然「對扭轉當時中共黨內那種急於搞共產主義的情緒，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它仍對人民公社制度繼續謳歌不已，^[4-137]而且「並沒有能真正從理論和政策上劃清兩個過渡的界限，只不過是要人們把過渡的時間表推遲15到20年罷了」。^[4-138]這些反映了鄧小平斯時在相關問題上，僅是些許清醒而遠非全然的醒悟。

第五節 規劃實施1959年的大煉鋼鐵運動

鄧小平在1958年的大煉鋼鐵運動進入最後衝刺階段之前，即開始思索1959年的鋼產量目標問題。1958年7月27日，由鄧小平領銜的中央書記處根據毛澤東的意向，持續抬高產量指標，對1959年鋼產量提出三個方案：2,500、2,700、2,800萬噸。^[4-139]鄧小平在8月北戴河政治局會議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關於1959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則將1959年的鋼產指標設為2,700萬噸，並爭取3,000萬噸。然而，1958年的1,070萬噸鋼產指標，雖在最後一季的大煉鋼鐵運動的攻堅下達成目標，但其付出的代價是打亂正常的經濟建設秩序、浪費巨大的人力和資源。毛澤東在此過程中知道，北戴河會議確定的1959年鋼產2,700至3,000萬噸的指標，根本無實現的可能，必須進行調降；負責督導運動的鄧小平對此也知之甚詳。因此，在毛澤東對之提出質疑後，鄧小平就開始動手重定1959年的鋼產指標。

鄧小平秉持的原則，如其所言是：「力戒浮誇，但宜得要熱，去掉浮誇，保留熱。」^[4-140]但是鋼指標究竟超過多少，算是浮誇？又要達到多少，才顯得「熱」？鄧小平實也沒有明確的概念與數字，只能且戰且走、邊做邊看，甚至出現說法前後矛盾、一改再改的情形。如此使得相關的指標修改工作，從1958年底開始一直拖到1959年夏才算底定。

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會議中，毛澤東除強調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上要謹慎，在設定糧食、鋼鐵等生產指標上，也提出要「壓縮空氣」。11月21日，對於1959年的鋼產計劃，當毛澤東在會上提出「鋼3,000萬噸，要不要那麼多，能不能搞那麼多」的疑問時，鄧小平立即響應表示「值得考慮」，支持並堅定毛降低指標的想法。^[4-141]22日夜，鄧小平和劉少奇、陳雲及七位經濟協作區主任參加毛召集的會議，專門研究將1959年鋼產量指標由北戴河會議建議的3,000萬噸降低至1,800萬噸的問題。經過討論後，仍認為1,800萬噸的指標根據有所不足。^[4-142]

既然中共層峰對於1959年鋼產指標的設想已有了要減少1,000萬噸左右的重大變動，鄧小平的工作就是要作進一步的確認，特別是同大煉鋼鐵的運動積極分子進行溝通。11月23日上午，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鋼鐵生產能力和指標問題。煉鋼的急先鋒王鶴壽在會中仍誇口表示：到了1958年底的煉鋼能力可達2,600萬噸。^[4-143]言下之意是1959年的鋼產量至少能達此數。鄧小平在1958年「大躍進」發動的階段，為了順利掀起運動的高峰，對於富有「革命激情」的王鶴壽一類的政治人物，自是鼓勵與放手；在運動成功發動起來以後，為了不使運動在1959年熱到連中共中央都無法掌握的程度（具體表現在鋼產量指標被定得高到完全不可能實現），鄧小平得要將「為有豪情多壯志」的王鶴壽節制一番。鄧小平在聽完王的匯報後表示：

昨夜主席摸底，翻一番是否可能？擔心失掉協調。北戴河提出3,000萬噸是設想，不是定案，此次也還不能最後定，也許在明年2月才能定案。是否靠得住（1,800至2,200〔萬噸〕）？1,800〔萬噸〕究竟靠不靠得住？1960年由1,800至2,500〔萬噸〕，1962年能到5,000至6,000〔萬噸〕就了不得了！苦戰3年是克朗豬，在1961、1962年可能增長快些，1962年有5,000〔萬噸〕就滿意了。[4-144]

鄧小平的講話有以下兩層意義：一、鄧將毛澤東對設定鋼產計劃上的顧慮與想法加以傳達，讓一心漫天喊「量」者知所進退；二、鄧對1959年鋼指標的思考還是從整個「二五」出發，因為他負責規劃「二五」的佈局。鄧覺得將1959年鋼指標定為1,800萬噸，已屬勉為其難、非能確實掌握的數字了；以此為基礎再接再續推出來的「二五」後續三年的計劃產量，亦甚是可觀，也足表欣慰，已無須再額外增高了。鄧話中的「克朗豬」指的是一種豬，其外觀看來雖顯消瘦，但骨架健壯。這比喻到了「二五」尾聲，中國的鋼產能力若能按此計劃發展，產出雖非頂尖，但已形成規模，並有繼續茁壯的基礎。

鄧小平在表明中央欲將鋼指標改設為1,800萬噸的意思後，七名經濟協作區主任現場合報的鋼產目標，總計仍達2,300萬噸。或為了不要被人當作直潑冷水、不尊重「革命群眾」的生產意願，關於1959年的鋼產量指標，鄧小平主持的會議最後「決定按1,800、2,200兩個數字計算」。[4-145]

緊接在後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期間，鄧小平在12月3日表示：「思想分歧，各種想法都是應該的，應有的。黨對抓工業的經驗不足，全黨抓工業也只幾個月，要形成較完全的經驗還需要若干年。總之，要實事求是。」[4-146]對於該會最終將1959年鋼產目標調整為1,800至2,000萬噸，[4-147]形成一定的作用。

1959年1月下旬，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共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討論1959年度的國民經濟計劃問題，和當前生產中的一些問題」。[4-148]1月26日，鄧小平在會中對地方大員表示：「堅決保證武昌會議決定的四個主要指標——2,000萬噸鋼，3億8千萬噸煤，10,500億斤糧食，1億擔棉花。還是以鋼為綱、以糧為綱，二個元帥、二個副帥。在此前提下，調整和制定今年年度計劃。」[4-149]在保證四大指標的方法上，鄧小平強調在全局上必須貫徹「全國一盤棋」的方針，否則「今年計劃有完不成的危險」。鄧對「全國一盤棋」的解釋為：「一是全國統一安排基建；二是全國統一安排主要產品的生產；三是統一安排原材料和兩個部類（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主要物資的分配；四是除了三個統一安排外，還有一個讓路問題。」他強調：「為了保證鋼糧，該讓路的還是要讓路」，「所謂讓路就是輕重緩急要排隊，不保證重點就不能實現計劃」。[4-150]

因為煉鋼目標已改定在2,000萬噸，相較於兩個月前鄧小平在武昌稍為

抑制王鶴壽的浮誇傾向，鄧在此會上則指示王領導的冶金部「不能留後手」，應按照1962年達到鋼產5,000萬噸的目標佈置工作，也就是從1959年到1962年平均年增1,000萬噸鋼。鄧並強調：「保險係數也要有一點，但不能打得過多，不要瞞產私分。」^[4-151]2月1日，毛澤東到會講話時，提問是否可以年復一年地出現經濟「大躍進」的局面時，鄧小平還插話說：「每年1,000萬噸鋼，應該肯定是大躍進！」^[4-152]會後，鄧頻仍聽取相關負責人匯報，期以掌握鋼鐵實際生產的情況。^[4-153]

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後來通稱為上海會議）。3月27日夜，鄧小平主持召開各經濟協作區主任會議，討論當年度的鋼產指標，最後接受了「確保鋼1,800萬噸」的建議。^[4-154]鄧在28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此解釋：

計劃要放在切實可靠的基礎之上。現在，中央、地方都覺得有些問題，主要是肩膀上的擔子重得很，感到為難。講出來好，應該實事求是解決。總的情況就是原材料不足，又主要是鋼材不足，武昌會議是按鋼材1,400萬噸（加100萬噸進口，是1,500萬噸）來訂的計劃，但今年鋼材不會超過1,200萬噸，加進口95萬噸，不到1,300萬噸。問題擺得很明白，即使1,500萬噸鋼材，計劃也不可能完成，所以存在危險。跟一些同志商量，大家一致贊成把計劃訂在切實可靠的基礎上，寧可超過，大家心情舒暢一點。我們想把今年的計劃放在1,100萬噸鋼材的基礎上，鋼搞1,800萬噸。不下這樣一個決心，計劃有危險。^[4-155]

鄧小平的意見為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所接受，促成鋼的指標進一步下調至1,800萬噸（其中1,650萬噸為好鋼）。只不過，在要不要公開修改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公佈的四大指標問題上，鄧小平卻傾向維持不動。3月31日下午，鄧小平主持有劉少奇、周恩來、陳雲及中央書記處成員參加的「碰頭會」，決定「去年和今年的四大指標均不改動」。^[4-156]兩日後，鄧小平對此說明：

經過計委、經委、建委和各省摸的結果，加上原材料不足，最後核定今年鋼的指標數字是1,650萬噸。即使搞不到1,800萬噸，搞1,650萬噸鋼，那也比去年翻一番。今年的指標不變，年終能搞多少算多少，努力搞。方法是留有餘地，超額完成。^[4-157]

鄧小平這種認為在公開上應繼續維持原有指標的主張，中共史家指出：「主要的一個顧慮就是怕洩氣，怕政治影響不好。」其後果是上海會議後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只將1959年鋼產1,650萬噸作為內定指標下達，而無更改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公佈的1,800萬噸的鋼指標；4月中旬舉行的第二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最後通過的鋼產量數字也依舊維持1,800萬噸。從而「失去了一次公開修改指標以擺脫十分被動局面的機會」。^[4-158]

4月中、下旬以後，鄧小平自己即發現鋼產1,650萬噸的指標，仍然不符客觀的可能。4月16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檢查當前工業生產問題，^[4-159]並在次日發出黨內通信指示：4月以來的鋼鐵生產

情況依然不好，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立即對生鐵的生產和調出情況，進行一次檢查。^[4-160]在此基礎上，鄧小平得以更確切地掌握指標與實際之間的落差。4月29日、30日，鄧小平又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研究上海會議後第二季度的鋼鐵生產仍落後計劃進度的問題。鄧表示：

任務高了點是肯定的。現在還是議論多，方法值得研究，由下而上算。一千萬噸鋼材必須保證。今年是高度集中的辦法，看起來只能這樣辦。關鍵是鐵的調度問題，要把好鐵用於生產好鋼材。不要再議計劃了，解決具體問題，方法是按實際可能來辦。根據下面能包多少就包多少，能生產多少就是多少，不要從上面來規定。最後，完成多少，宣佈多少。主要抓措施。我完全贊成退夠，站穩了，再前進。^[4-161]

鄧小平此時主張不再多議計劃指標更動的問題，而是要專心於解決實際生產的具體問題，但他還是主張要儘可能地多煉鋼鐵，以保證1,000萬噸的鋼材。鄧為首的會議最後責成陳雲繼續研究1959年鋼鐵生產指標問題。^[4-162]

陳雲準備好之後，在5月11日向中央政治局會議提交報告：鋼材的可靠指標可以初步定為900萬噸，鋼產指標相對地應從1,800萬噸（1,650萬噸好鋼）降至1,300萬噸。鄧小平支持陳雲的方案，在會上表示：「現在急需下決心退，退到可靠的陣地再前進。」^[4-163]不過，鄧小平得處理一件他自找的麻煩之事，那就是他在3月底堅持不改的鋼鐵名義指標1,800萬噸，經過「人大」程序公定為國家經濟計劃後，反而被黨內一些執著、崇尚大煉鋼鐵者奉為一尊不得褻瀆的「神主牌」，以至形成一種鄧自己在呼籲調降鋼指標時，得花些氣力推倒的「思想障礙」。

鄧小平遂在5月19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強調，農業穩定的重要性高於對1,800萬噸的鋼產指標的追求，並強調「這一腳踩不穩，會天下大亂」。^[4-164]鄧在28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更直言：「眼睛只看到1,800萬噸，就會把全面丟掉，包括丟掉人心！」^[4-165]鄧還表示：

1,800萬噸鋼公佈了，不過是解釋而已，政治上被動一點，不太了不起，過去估計高了，生產多少都是大躍進，因比去年好鋼增加400至500萬噸。另一方面是人民生活來打扁擔，大家說面子難看，出口物資質量差，數量不足，已名譽掃地，市場如此情況，面子已老早丟了。出口市場是根本的東西，比1,800萬噸鋼的影響大得多。過去我們是已鑽入鋼裏，問題越來越嚴重。要知道，市場供應的糧食，在7、8、9月的關還難過。

鄧甚至說道：「不顧一切來搞鋼，就有革命的條件。」亦即因糧食、副產品長期不能得到滿足，影響群眾生活，恐會引起人民內部矛盾的尖銳化。他進而指示：「中央把鋼安排下來了，力量就集中搞市場、出口、搞農業。」^[4-166]

中共中央將1959年的鋼鐵指標從3,000萬噸（鄧小平也促成此一高指

標)最終定於1,300萬噸(同年夏天的廬山會議又將之降至1,200萬噸),鄧小平在其中的角色與影響不可謂小。鄧小平之所以屢次在煉鋼問題上踩剎車,甚至從高指標向後倒車,除了因了解到客觀條件實在不允許追求過度脫離實際的鋼鐵指標外,享有毛澤東的信任和授以權柄(特別是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被毛稱作「副帥」),使之敢於表述、說話算數,更是關鍵因素。況且若煉鋼任務過於超載,引發運動翻車,作為「大躍進」操盤手的鄧也將難脫責任。

在大煉鋼鐵問題上,鄧小平雖幾番出力壓縮1959年鋼鐵計劃指標中明顯完成不了的「水分」;與此同時,鄧小平仍須竭力張羅與督陣,達成猶屬不低的新定鋼鐵產量目標。

首先,如同前一年秋天的作法,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提出有關鋼日產量的「軍令狀」。1959年4月22日,中央書記處決定通令各級黨委「打一個鋼鐵戰役」:從當日起到5月15日止,為此一戰役的第一階段,目標是鋼日產量4萬噸;從5月16日到6月15日為第二階段,目標是鋼日產量4.5萬噸;6月16日至7月15日為第三階段,目標是鋼日產量5萬噸。達到相關目標就是「取得勝利」,超過目標就是「巨大勝利」。^[4-167]中央書記處同時也決定:為了取得鋼鐵戰役的徹底勝利,決定以國家經委、計委為主,聯合中央工業交通部,共同組成四個工作組,分別到東北、華東、華北、華中四個鋼鐵生產的重點地區,協助各地黨委進行檢查督促工作。^[4-168]其次,在5月26日,鄧小平也親筆起草中共中央通知,轉發江蘇鋼鐵生產的經驗(要縮短戰線、集中力量、合理定點,不能一擁齊上,以免分散力量),並指示:「中央認為江蘇省對於鋼鐵合理布點的辦法是正確的,各地可以仿照辦理。」^[4-169]期以為各地的鋼鐵增產提供有利的政策參考。在鋼鐵生產上,鄧小平確實不怠忽其所負之「具體部署」的職責。

另外,鄧小平在5月多次主張與推銷將鋼指標從1,800萬噸降至1,300萬噸的同時,他也特別注意到要維護大煉鋼鐵運動的熱勁與熱情。因為他身為「大躍進」的首要執行者,知道在運動中需要適時而準確地掌握「有鬆有緊」、「鬆中帶緊」的節奏,以免在鋼產指標一再下調的過程中,讓運動的積極分子喪氣,甚而喪志。

6月4日與5日,鄧小平接連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並討論李富春〈關於1959年工業生產、基本建設和運輸指標的報告〉。根據會上匯報的1959年1月至5月的鋼鐵生產情況,若與1958年的同期相較,與會者楊尚昆仍感到:「基本情況是好的,仍然是一個躍進的形勢!」但是若按1959年所定的鋼產指標,第一與第二季度皆無達到目標,應生產的份額只好展期後延。依此發展與進度,楊也感嘆1959年鋼產指標改設為1,300萬噸,也只能如此。^[4-170]

對此，鄧小平一方面注意總結經驗，表示：「今後搞計劃，不能過多依靠當年新增生產能力。」「這一段提出的數字，主觀片面性很大，各部門都有。在建設方面，還是要承認自己沒有經驗，虛心一些好。這一時期黨內最大的損失是浮誇風，我們領導上有責任，這也是經驗問題。歸根結底是要虛心，實實在在研究問題。」另一方面，他也擺出煉鋼總督導的架勢，強調不能再下調鋼產指標：「鋼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洩氣，全黨全民洩氣。因為才講過1,300萬噸，再退大家都沒有底了。」^[4-171]鄧為首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最後作出的決定中，即特別強調：「我黨對『糾而不洩』的經驗不足，應防止洩氣」；「在調整、落實之後，在國家分配的原材料、設備範圍之內，各地應充分發揮積極性，千方百計的努力，爭取超額完成任務，決不洩氣。」^[4-172]

第六節 助長農業浮誇風，對高徵購制止不力

鄧小平對1959年鋼鐵指標問題稍有冷卻之時，他對於農業的「大躍進」——農業高產量，卻還頗為執迷、不夠清醒。

早在1957年秋冬，在反「反冒進」逐漸打響的階段，鄧小平即認為積極地提出「挖掘農業生產潛力」，是很好的意見，因為「沒有一股勁，不經常同保守傾向作鬥爭，是不行的」。^[4-173]但在農業「大躍進」開始喊得震天價響之時，鄧小平還會以其實際走訪基層所見，在1958年2月17日要求譚震林注意農產作假的問題。^[4-174]然而，接下來數月，有關糧食生產的奇蹟，在全國各地越傳越多、越來越離譜，更成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經常報導的主題。此時，反倒未聞鄧小平曾出面制止或要求徹查，因為他本人也開始相信、接受之，甚至加以傳播。

1958年7月19日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鄧小平對軍方高階人士表示：

思想解放就是那麼靈，就可以寫好文章、畫好圖畫。現在畝產糧食的高額就算中國的了，地瓜畝產十幾萬斤已經解決了，現在是搞幾十萬斤囉！最近在北京討論麥子高產量，有的合作社提出畝產7萬斤，最後為了照顧農學院的面子，只寫上了2萬斤。^[4-175]

鄧小平對農業生產情勢大好的判斷，溢乎言表，甚至說：「論糧食，有的是。短期內想存3,000億斤，國家存1,000億斤，合作社存1,000億斤，農民存1,000億斤。有3,000億斤，打世界大戰根本不愁沒飯吃。」^[4-176]對於鄧小平大舉儲糧的主張，主管部門糧食部甚為重視，其副部長陳國棟在7月27日的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上指出：「糧食儲備問題，中央書記處的負

責同志曾議論過，打算儲備3,000億斤，國家、社、社員各1,000億斤，5年完成。今年儲多少，值得研究，可能在頭一、二年，社要多賣一些食物。」^[4-177]

當時糧食部估計1958年的糧食產量達5,700億斤，較諸1957年的3,900億斤大大增產1,800億斤；糧食部具體規劃將這增產的1,800億斤中的420億斤（23%），列為「離開農村的」部分，納入國家口袋。^[4-178]然而，事後證明，1958年的糧食產量僅有4,000億斤，^[4-179]較諸1957年僅增產100億斤而非1,800億斤。就算將1958年實際增產的100億斤全部賣給國家，也遠遠未及該年「〔農業〕社要多賣」政策所規定的數額（缺口達320億斤）。相關政策任務要達成，只好向農村的基本用糧下手。在如此「高收購、高分配」之下，由農業合作社併成的人民公社，以及農民自己手裏，不但沒有像鄧小平設想的儲存大量食糧，反而飽嘗飢餓之苦、游移生死之間。

鄧小平在1958年9月巡視東北時，賣力推銷風行當時、後來證明大有問題的農業增產方法：

全國農業增產的經驗，概括說來就是水、肥、土、種、密加上田間管理齊頭並進。這是農業生產的「憲法」，是毛主席的「憲法」，是事實證明了完全正確的憲法，是已經創造了奇蹟的「憲法」。^[4-180]

9月25日，鄧小平視察遼寧蓋平縣的「太陽升」人民公社，還提出以畝產增三倍作為該公社1959年的目標。^[4-181]

對於處處頻傳的農業大豐產捷報，鄧小平喜聞樂見，甚至10月8日到天津霸縣的勝芳人民公社，在旁人的攙扶下，站在明顯是人工假造的豐產稻田上，與其他同行的中央書記處僚屬李雪峰、楊尚昆、劉瀾濤一起拍照留念、歡於「見證奇蹟」。^[4-182]

此一以稻田移栽「放衛星」而出名的人民公社，最後不意外地出現嚴重的浮腫病、非正常死亡、婦女閉經問題。「大躍進」過後，該社成為重點的糾正對象。工作組進駐該社調查後，原先規劃對其黨委書記續長嶺祭以黨紀處分與追究刑事責任。然而，工作組在發現鄧小平等「中央負責同志」1958年參觀該社時站在移栽後的稻穀上的留影後，覺得既有「領導同志」的鼓勁與喝彩，就沒有理由過多地追究續長嶺的責任了。^[4-183]

「文化大革命」時，相關照片被「紅衛兵」找出，大作文章、嚴厲批判：「這幫壞蛋對浮誇現象不但不制止，反而讓社員四面托扶，站在稻子上留影紀念，實在可惡之極！」王任重1984年也表示：「天津就出現畝產10萬斤。小平同志還跑到那裏抱著稻穀照了相嘛。所以人的頭腦發熱了，也別埋怨誰。」^[4-184]

或是受到天津畝產超過10萬斤的豐產田的鼓勵，鄧小平在同月下旬視察西南時，對四川的農業發展提出令人感到瞠目結舌，以至匪夷所思的政策建議。根據時任四川溫江地區的負責人宋文彬在「文革」中的揭發：鄧小平和李井泉研究後決定，1959年要在四川建造1,000萬畝的畝產萬斤的高額豐產田。1957年四川的糧食作物耕地總面積為16,632萬畝，^[4-185]鄧小平、李井泉規劃的1,000萬畝的萬斤試驗田，僅約佔全省耕地總數的6%，但李井泉為了不讓中央總書記失望，也避免自己跌股出醜，選定在省內最適合農業耕作的地區推行萬斤田的計劃，例如：位居成都平原腹地的溫江地區，李下令要建400萬畝的萬斤田，佔該區耕地530萬畝的3/4以上。

溫江地委第一書記宋文彬認為此乃「省委第一書記、總書記研究決定，是經過考慮的」，便接受了任務。但是宋在實際安排工作時，感到有關計劃不可行，因而向李井泉要求縮小試種萬斤田的面積，亦即從400萬畝降為100萬畝。李井泉斥喝宋文彬：「一、對中央『少種、高產、多收』的方針動搖；二、1,300萬畝是和總書記商量決定的，要改變這個計劃得經過總書記批准。」^[4-186]對於此事，也有「文革」批判小報指稱：「1958年劉少奇、鄧小平帶頭大刮浮誇風、高產風、共產風。李井泉一直堅持高指標、高徵購，大搞萬斤田，還揚言是和鄧小平商量的。」^[4-187]

在1958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舉行的武昌會議與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毛澤東主張要對1959年的生產指標「壓縮空氣」。然而，迥異於鋼產指標最後急降1,000萬噸的結果，1959年的糧產指標竟不降反升，從1958年北戴河會議規劃的8,000億斤到10,000億斤，提高至10,500億斤。^[4-188]

鄧小平在1958年底對隔年農業情勢的樂觀，還可見諸他對12月下旬舉行的「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及其主辦人譚震林的極力支持。鄧小平除了熱情接見會議主席團全體成員、現身開幕式以壯其聲勢外，^[4-189]他還代表黨中央審閱認可此會「為在1959年實現更大、更好、更全面的躍進提出的十大倡議」（其頭兩項，就是保證完成1959年糧食產量10,500億斤、皮棉生產1億擔的任務，並且力爭超過）。^[4-190]毛澤東旋即批示將之印發出席會議的全體代表。^[4-191]由此可見，對於1959年農業情勢的大為看好與應採的方針政策，鄧小平顯然與毛、譚保持高度一致。

步入1959年後，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持續地與地方領導人就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所定的糧產指標，進行確認與磋商。正因為鄧小平以中央總書記的職位在中央主議糧食估產、汲取及配置事宜，他在運動期間與為了固寵爭榮而好搶先承包高額糧食指標的地方領導人之間，事實上構成了上下「一搭一唱」的密切關係，在相關責任的分攤上，兩者也難以釐清彼此。1959年1月9日上午，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農業問題與農產計劃。針對各地上報的該年糧食指標共計達到11,900至12,000億斤，鄧領班的

中央書記處不但照單全收，會議結束時甚至提出更高的期成指標，不但要求該年糧收保證完成中共八屆六中全會規定的10,500億斤任務，更要爭取糧收13,000億斤！^[4-192]

2月20日，鄧小平在上海談及1959年糧食指標問題時就表示：「10,500億斤糧食，這是對外公佈的數字，實際上我們要搞到12,000、13,000〔億斤〕。」鄧並強調此一糧食指標與其他生產指標乃是「實事求是的，是根據並考慮了各方面的條件的」，「這指標是10分指標，但是不嚇人。如果我們拿出12分措施，就可以超額完成；如果再加上24分幹勁，就可以更多地超額完成」。^[4-193]鄧小平對農業高產的信誓旦旦，讓毛澤東信以為真，進而在黨內高幹會議上指示：「13,000億斤一顆不能少！」^[4-194]

鄧小平除了對全國範圍的農業高估產造成推波助瀾的作用，在個別省份制定如同幻夢般的農業計劃時，他也有所與聞。1月15日上午，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河北省領導人匯報該省1959年的生產計劃。^[4-195]擔任河北省委第一書記的林鐵，由於兼任華北經濟協作區主任，經常與鄧小平一同商議計劃問題；鄧在1958年10月視導河北時，林也隨身陪同。鄧在天津站在假造的豐產田上拍照時，安排高產假象的林鐵也以當地「父母官」的身份一同歡喜入鏡。林鐵或即是受中央總書記此行當面的鼓舞，因而加大了在河北推動農業「大躍進」的力度。經鄧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認可，林鐵在1959年提出河北糧產「3年包天津，5年包北京」的口號；而在他的主導下，河北在1959年的糧食徵購數也比往年豐收的年度超出一倍！^[4-196]

當鄧小平深信農業可以在1959年繼續凱歌躍進的同時，他也不得不分些神給農村中已出現的一些令人既感擔憂又困惑的現象與問題：農村的勞動力（特別是所謂的「強勞動力」）因調出支援國家的大煉鋼鐵計劃、地方的工業建設與水利工程等，出現嚴重削弱與缺乏的情形；春荒與浮腫病也開始在農村中蔓延。針對相關問題，在前述的1月9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指示：

農業主要是個勞力安排問題，這一環不抓好，其他都會落空。農村工作輕重緩急要排隊，勞力的使用要非常合理。現在還有些主觀，單打一，勞力浪費了，應有大兵團作戰，但不要甚麼都大兵團，結果把責任制搞掉了。總之，勞力要用到最得益處的地方。今年勞力中浮腫病不少，一定要實行8小時勞動，最忙12小時，否則要出大亂子，要適當估計到體質減弱的情況。對春荒問題，要再三講，要引起足夠重視，寧肯估計得嚴重一點。現在並不是沒辦法，問題是要及早注意，及時調劑。要一個個公社，一個個生產隊查清，現在還有不敢講的。要一面節約，一面調運糧食。春荒再不注意，問題更大。看來，包括省委，有些同志還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4-197]

防小慎微、一見事即思對策，乃是鄧小平在政治上的長處。然而，鄧在這時對農業問題與困難所作的思考與方案，並無絲毫觸及其產生的深層

原因——「大躍進」運動本身的基本設想與作法，所以至多僅能做到「頭痛醫頭，腳疼醫腳」，而無法直搗問題的核心，例如：鄧小平在講話中強調「農村工作輕重緩急要排隊，勞力的使用要非常合理」，但在同一會上所決定的該年糧收除了要保證完成中共八屆六中全會規定的10,500億斤任務，更要爭取糧收13,000億斤的目標，根本是農村可用勞力所無法負荷的目標。1月14日，譚震林就坦承：「1959年農業要實現糧食10,500億斤，棉花1億擔，共需勞動工日1,100億個左右，而現在農村勞力可以用於這兩項的，只有600億個左右，還差500億個左右。即差45%以上。」^[4-198]另外，鄧小平同時參與制定的1959年大煉鋼鐵計劃，一旦求諸「土法煉鋼」的協助（就像1958年最後一季），不也會輕而易舉地將任何「合理的」、精心規劃的農村勞力安排計劃給衝垮、沖散？

鄧小平在講話裏雖向地方省委警告春荒與浮腫病問題，但問題卻無歇止的跡象。1月中旬，不包括廣西與實際情況相當嚴重的河南在內，全國農村就已「發病」500萬人、死7萬，「大約有10%-15%的生產隊糧食不夠吃」；^[4-199]4月初，湖北省會武漢面臨斷糧的危機，該省領導人王任重情急之下下令攔截四川經武漢中轉送往上海的糧食，以先救武漢的燃眉之急。鄧小平聞此消息生氣地說：「要撤王任重的職！」^[4-200]更親自在電話中質問王任重：「為甚麼你把四川調上海的糧食扣了，上海如果糧食脫銷怎麼辦？」在王承認錯誤、作出解釋，並承諾儘快補回糧食後，鄧才放之一馬。^[4-201]到了4月中旬，春荒缺糧的情況已蔓延15省，毛澤東也驚呼「2,517萬人無飯吃大問題」。此一情資同時也送到了鄧小平的手上。^[4-202]

按1958年「大躍進」的運動捷報，農業生產戰線上不是「大豐收」嗎？何以在1959年春卻出現全國性的缺糧、缺油問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囿於認識上的侷限，唯能找到部分的原因，譬如鄧就跟蘇聯大使尤金解釋：「去年我們雖然是大豐收，但由於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用掉大量糧食。」^[4-203]至於農村發生嚴重問題的真正「病灶」——農村既無1958年「大躍進」所宣稱的如此豐收，又按這種不實的表像數字被國家徵糧，因此實際上是處於缺糧的狀態。他們不但沒有發覺，甚至以為任職廣東的趙紫陽找到了關鍵答案：糧食緊張乃肇因於農村基層的瞞產私分。並因此在1959年2月發起了「反對瞞產私分」運動，反而更加重了農村缺糧的情況。

為了調動農民與基層幹部的積極性以渡過春荒並促之投入春耕，中共中央不得不在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舉行第二次鄭州會議，針對人民公社內部的所有制和分配問題進行較務實的調整；^[4-204]4月底發關於農業方面六個問題的〈黨內通信〉；^[4-205]5月上旬下令施行如恢復自留地等較為寬鬆的農業政策。

4月下旬，鄧小平曾經手處理一樁因「大躍進」而導致的農業失調，甚而飢饉死亡的事件。鄧處置該案的方式，也反映出其雖有心解決，但方法仍錯置、不到位的窘況。

中共青海省委因其境內的興海縣溫泉人民公社發生嚴重的人畜死亡情況，進行檢查並通報中共中央。其報告稱：造成嚴重的人畜死亡，除了一定的客觀因素外，最主要的則是由於工作不深入的結果。部分幹部作風沒有轉變過來，對群眾的疾苦漠不關心。兼管地方與農業事務的譚震林將此事報送鄧小平並建議：由監委、民委和中組部組成檢查組到青海該地進行深入調查，大張旗鼓地處理此一事件。4月25日，鄧小平閱卷後批示：「可先打電話告訴省委，指出他們當作一般問題處理是不對的，責成省委嚴肅處理這個問題，不好的幹部必須撤職，違法亂紀且有民憤的，應該法辦。中央暫不派檢查團去。」^[4-206]鄧小平的批示顯示：一、鄧沒有採納譚震林所提的中央介入調查、「大張旗鼓地處理」的處置方案。二、鄧是要青海省委自己糾正自己的錯誤，也就是讓其改過自新。

然而，若再對之加以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鄧小平的處理方式存有不小的瑕疵。首先，興海縣溫泉人民公社慘案的發生，主因是高估產後再強行高徵購的結果。^[4-207]該地的州、縣、公社級幹部對此當然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但他們的相關行徑主要肇因於省委在背後的政治施壓。換言之，此案追根究底不正是青海省委自己逼出來的嗎？鄧小平卻還要省委自己作組織處理，無異是讓之「球員兼裁判」，實難以對問題發生的根源作一徹底的追究。從後來青海的「大躍進」在其一把手高峰的繼續領導下，一波高於一波的結果來看，顯然省委根本沒有吸取興海縣溫泉人民公社人命慘案的教訓，類似的高估產、高徵購錯誤一犯再犯，青海省1958年的糧食徵購量佔其糧食總產量的39.6%，已比1957年的27%高得多，1959年更攀升至46.9%，1960年也達44%。^[4-208]最後，青海至少餓死45萬人，佔全省人口近1/5，成為運動的「重災區」之一。^[4-209]

其次，鄧小平在此事上沒有從嚴、從速處理，對於全局或也可能帶來不良的影響。鄧小平向以「樹典型」、立大威著稱。1957年5月，鄧對於同樣是因高徵購而造成農民死亡、逃荒的「廣西事件」，就是採取「大張旗鼓地處理」的方式。他勒令相關省、地、縣負責人來北京報告與檢討，廣西省委的負責人最後還因此事而丟官。相形之下，鄧小平對青海類似的案件，確實是顯得過於輕判，甚至可能是輕忽了。鄧沒有將青海相關慘案做殺一儆百的處理的因素，可能包括：值此之時，青海的民族問題本已緊繃，西藏問題又吃緊，不想再令外界有西南地區局勢一團糟的印象；青海地處內陸，影響與重要性可能較為次要。出於對「大躍進」運動本身的顧慮，自也在內：因為中共（包含鄧在內）公開宣稱「大躍進」的第二年情

勢大好，這時青海問題若被放在檯面上，豈不是自打嘴巴，更簡直是提供那些本來即看衰運動的人一顆可轟向中共的重量炮彈（1957年，「廣西事件」被鄧小平放大處理後，黨外人士即用此例攻擊中共的統治，毛澤東就說此事被人「鑽了空子」，^[4-210]對此，鄧不能不特別注意）。另外，別具意義的國慶十週年在即，青海因運動餓死人的事件若傳開，也恐會對此慶典投下一道陰影。精心籌備相關慶祝活動的鄧小平，^[4-211]不會不想到有這方面的影響。

無論其考慮如何，鄧小平最後沒有以此事為例，要所有的黨國官僚引以為戒，深入思省進而糾正運動中高估產、高徵購的弊病。如此可能錯失了對該問題早發現、早管控的機會。此風在全國範圍內繼續層出不窮、越演越烈。

毛澤東與鄧小平在處理接踵而來農業、農村問題的過程中，也漸次察覺農業生產呈報上嚴重的浮誇問題，連帶地對1959年農業總產量估算是否準確的問題也有所擔心，甚至嘗試繞過層層篩選上報的正規的資訊傳遞途徑，另覓資訊渠道以確切了解農村的真實生產情況。例如：第二次鄭州會議期間，鄧小平曾召集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指示新華社收集人民公社問題的資訊，即顯示其擔心農村的生產問題與產量數字的誇大不實。^[4-212]鄧小平在5月23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也指示：中央書記處和中央財經小組應「切實抓一下」農業生產。^[4-213]事實上，鄧自己先前也主要盯著鋼鐵指標問題不放而相對冷落了農業問題。

然而，由於中共中央先前在農產估計上，灌水的程度實在太過離譜（其中雖主要是中央書記處內主管農業的譚震林愛好「放炮」所致，^[4-214]然而，也不乏鄧小平一貫對之當面認可或在旁默許的作用），與前述的鋼鐵指標調降相仿，中共中央到1959年夏將該年糧食指標大幅下調到5,500億斤，但相較於中國農業當時實際的生產能力，還是大大地失真，何況運動的其他部分（如大煉鋼鐵）對農業所形成的干擾，更只會讓之不進反退。鄧小平對於此一仍屬誇張的糧產預估，沒有進一步地予以查證外，更在此估算上強力執行徵購。

鄧小平在中共建政初期主政西南時，對徵糧問題即表現得相當鐵腕；^[4-215]對於「大躍進」時期的糧食徵購問題，鄧小平也會嚴厲地指出，短缺一斤都不允許。^[4-216]鄧小平對棉花收購的問題亦有相似的強硬態度。他曾當面指示各省領導人：「千方百計，說服農民賣給國家」，「完不成任務，不睡覺」。^[4-217]鄧小平所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也會以召開電話會議的方式，催促各省「要進一步鼓足幹勁，把收購運動推向更大的高潮，再接再厲，一氣呵成，力爭迅速完成和超額完成農產品收購任務」，並強調「收購運動一定要政治掛帥」，也就是在方法上注重「總路線的宣傳教育

和對右傾思想的批判」。^[4-218]

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的上令下行、不讓講價，對於各級黨組織與幹部造成任務必須達成的壓力。為了不辜負上級的命令和期待，各地幹部乃將壓力轉嫁於本已忙於「大辦」、無暇顧及生產的農民身上。鄧小平對按時完成徵糧任務者，就予以好評，例如：李井泉在1959年四川糧食外調問題上，努力配合中央的要求，就得到鄧「貢獻大、風格高」的表揚。^[4-219]

根據後來核實的數字，1959年的全國實際糧食產量只有3,400億斤，但因為估產超過5,400億斤，1959年糧食年度徵購糧食達1,348億斤，佔實際產量的33.7%。若再將1959年農村的留糧與運動前一年的1957年相較，竟短少了三成。^[4-220]高徵購造成的破壞性後果，主要表現在因徵「過頭糧」而使農民口糧不足，甚至因飢饉而造成生命損失（如同青海興海縣溫泉人民公社慘案更多的翻版與放大），甚是讓人驚心觸目。^[4-221]

鄧小平與相關政策過失的關連，也可從他自身後來所寫的檢討信件中獲得印證。鄧小平在1972年「林彪事件」後寫給毛澤東的一封表態效忠的信裏談到「大躍進」時表示：「這幾年，還存在著高估產、高徵購的錯誤，每年徵購任務的確定，我都是參與了的。」「我作為總書記，對這些錯誤負有更多的責任。」^[4-222]

綜前所述，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的這段所謂「大躍進」糾偏時期中，對於毛澤東有意識地帶頭對「大躍進」進行糾「左」（有限度的），鄧小平感到信服，甚至感慨「毛澤東可學而不可及」，^[4-223]並甘於悉心緊隨毛，賡續獻力此一運動。鄧小平對運動的主要看法是：路線本身正確，尚待政策充實，矛盾問題難免，重在糾正改錯。^[4-224]他努力進行「微調」，力求「大躍進」可持續而健康地發展，而非質疑整個路線與方針的正確性。

鄧小平幫助討論、認識人民公社的發展階段屬性問題，但對人民公社制度本身的「優越性」，則不疑有他；在工業上，他敢言壓降鋼鐵的產量指標，但為了防止洩氣，主張對外還是維持不切實際的鋼產高指標，內部最後定下的鋼產目標，也是無視犧牲、甚為費勁下才可拿下的；在農業上，他對糧產問題也仍無法真正跳脫「數大便是美」的迷思與偏向，最終設下的糧產目標，現實上還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臆想數字。易言之，鄧小平對「以鋼為綱」、「以糧為綱」的「大躍進」發展方針，仍堅信不已，並力能所及地襄助毛澤東繼續高舉「三面紅旗」。無怪乎毛澤東在1959年夏起將運動的方向從糾「左」撥向「反右傾」，並在1960年開啟另一回的「大躍進」時，鄧小平不作遲疑、箭步跟上。

注釋

- [4-1]根據中共水利部部長傅作義（投共的國民黨將領）的說法：1957年的10月份，全國每天出工人數為2、3,000萬人，11月份上升為6、7,000萬人，12月份超過了8,000萬人；1958年1月份更發展到約1億人。〈四個月的成就等於四千年的一半，水利部部長傅作義暢談農村中興修水利的高潮〉，《人民日報》，1958年2月7日，版3。
- [4-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上冊，頁786–787。
- [4-3]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上冊，頁386。
- [4-4]胡富國：〈山西人民永遠懷念小平同志〉，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74–76。
- [4-5]鄧小平：〈今後的主要任務是搞建設〉，載《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第1卷，頁264–265。
- [4-6]David Bachman,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93–95.
- [4-7]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冊，頁52–53。
- [4-8]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冊，頁291。
- [4-9]「反冒進」的首要代表人物周恩來，在1958年5月17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檢討時也說：「杭州會議、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的整風」，是認識自己「反冒進」錯誤的「重要的教育」。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冊，頁371。
- [4-10]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pp. 228–229.
- [4-11]Avery Goldstein,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42–53.
- [4-12]有論者指出：在反「反冒進」問題上，中共其他領導人在選擇跟隨毛澤東的動機中，同時含有恐懼與信仰（fear and belief）的因素，亦即既有懼怕毛的成分，也有對毛指點方向的信從。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Politics of an 'Un-Maoist' Interlude: The Case of Opposing Rash Advance, 1956–1957," in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1997), pp. 177–178.
- [4-1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1415。
- [4-14]大慶石油管理局黨委：〈油海播深情，光輝照千秋〉，載《回憶鄧小平》，下冊，頁551。
- [4-15]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心繫新疆〉，載《回憶鄧小平》，下冊，頁448–449。
- [4-16]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冊，頁211–212。
- [4-1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21。
- [4-18]〈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陶鑄傳達紀錄）〉，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北京：1967），頁22。
- [4-19]〈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陶鑄傳達紀錄）〉，載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北京：1967），頁23。
- [4-20]〈在中央一次會議上的發言〉，載《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頁25。
- [4-21]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下冊，頁664。
- [4-2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22。
- [4-2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16。
- [4-2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18。
- [4-25]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冊，頁252。
- [4-26]《彭真傳》編寫組、田西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225。
- [4-27]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下冊，頁114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0。
- [4-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

頁1396。

[4-2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4。

[4-30]陳雲因為有「反冒進」的「政治錯誤」在身，所以他在中央財經小組內並不積極管事，而主要由李富春、譚震林與薄一波掌管，他們再向鄧小平報告、請示。作者感謝審稿人提供的資訊。

[4-31]此一中共中央文件指示：「今後在黨和人民解放軍以及各人民團體機關懸掛領袖像時，除過去規定懸掛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同志的像外，應增掛中央副主席林彪同志像和總書記鄧小平同志像。」〈中央關於增掛林彪、鄧小平同志像的通知〉，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4，目錄號1，案卷號395。

[4-3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21。

[4-3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22。

[4-3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27。

[4-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中卷，頁146。

[4-3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0–1431。

[4-3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1。

[4-38]〈鄧小平同志同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團長莫拉夫斯基的談話紀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號109-00894-02（1），頁17。

[4-3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45。

[4-40]〈關於做好第二個五年計劃佈局和開好軍委會會議問題給鄧小平的信〉，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第7冊，頁264。

[4-41]《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47。

[4-4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4。

[4-43]《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22。

[4-4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723。

[4-4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72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5。

[4-4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725。

[4-4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40。

[4-48]〈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北京：1967），第1集，頁63–64。

[4-49]〈鄧小平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未全件），頁16–17。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4-50]此一「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可說是對中共「八大」以來摸索建設中國社會主義的各項方針的一個政治概括。其「基本點」被表述如下：「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繼續完成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同時，逐步實現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條件下，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在集中領導、全面規劃、分工協作的條件下，中央工業和地方工業同時並舉，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同時並舉；通過這些，儘快地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1958年5月5日）〉，《人民日報》，1958年5月27日，版1、3。

[4-51]〈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今年宏偉目標，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鬥；會議指出人民公社是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和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最好形式〉，《人民日報》，1958年9月1日，版1。

[4-52]《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31–832。

[4-5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48。

[4-5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729。

[4-55]武市紅：〈鄧小平對中國農村現代化的探索與思考〉，《黨的文獻》，2006年第6期，頁61–62。

- [4-56]《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34–835。
- [4-57]〈鄧小平同志同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團長莫拉夫斯基的談話紀錄〉，頁18。
- [4-58]鄧小平：〈鄧小平寫給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摘錄）〉（1972年8月3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 [4-5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48。
- [4-60]《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頁839。
- [4-61]中國核工業總公司黨組：〈鄧小平同志與中國核工業〉，《回憶鄧小平》，中冊，頁422。
- [4-62]「十大工程」包括：人民大會堂、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博物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全國農業展覽館、北京火車站、北京工人體育場、民族文化宮、北京民族飯店、釣魚台國賓館、華僑大廈。
- [4-63]金磊、李沈：〈流金歲月中的經典：「國慶十大工程」設計回顧〉，《百年潮》，2006年第2期，頁48。
- [4-6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49–1450、1475、1505、1510。
- [4-65]張崇：〈建國初期的首都建設和「國慶十大工程」〉，《北京黨史》，1999年第1期（總第114期），頁47。
- [4-66]所謂「永久的遺憾」指的是設計上的若干瑕疵，例如釣魚台迎賓館內過於挑高、寬敞的格局，使得年邁的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陳叔通，曾不禁對其設計者抱怨：「你們設計的賓館，房間太高太大，我這個小老頭子睡在那裏感到空空蕩蕩，很不舒服」，「你們建築師一定要懂得房間並不是越高越大就越好住」。張開濟：〈國慶十大建築設計追憶〉，《縱橫》，1996年第9期，頁26。
- [4-67]「大躍進」發動前後，有關河南省的政治鬥爭和省內運動發展的關係，可參閱：Jean-Luc Domenach,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ase of One Chinese Provi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 [4-68]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總第48期），頁41。
- [4-69]河南二七公社河南農學院紅衛兵總部：〈河南省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個司令部鬥爭的由來和發展〉，1967年7月。中國文革研究網：<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8033>（2011年7月登入）
- [4-70]所謂「潘、楊、王」，分別指的是潘復生、原河南省委書記處書記楊珏，以及原河南省委副秘書長王庭棟。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上篇，頁88–89。
- [4-71]何立波：〈吳芝圃與大躍進運動〉，《黨史文苑》，2006年第12期，頁5。
- [4-72]打倒趙健民聯合作戰部：〈大叛徒大特務大黑手趙健民的反革命罪行調查〉，《紅宣兵》，第42期。中國文革研究網：<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17901&fpage=29>（2011年7月登入）
- [4-73]丁龍嘉、聽雨：《康生與「趙健民冤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110。
- [4-74]〈山東省委召開省級領導機關負責人會議，根據總路線精神部署當前工作〉，《人民日報》，1958年6月17日，版4。
- [4-75]中共中央黨校紅旗戰鬥隊李廣文：〈譚震林罪責難逃〉，《紅代會》北京工農兵體育學院毛澤東主義兵團主辦：《體育戰線》，第18期（1967年4月2日），版3。
- [4-7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37。
- [4-77]丁龍嘉：〈趙健民在20世紀50年代反「左」〉，《炎黃春秋》，2012年第10期，頁19。
- [4-78]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434。
- [4-79]趙健民昔日的部屬在當時曾向彭真反映趙在山東被錯誤批判的情況。丁龍嘉、聽雨：《康生與「趙健民冤案」》，頁297。
- [4-80]1962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委正式發文山東省委為趙健民平反。1963年初，趙健民赴雲南擔任省委書記處書記。丁龍嘉、聽雨：《康生與「趙健民冤案」》，頁112。周星夫：〈憶六十年代山東的甄別工作〉，《中共黨史資料》，2006年第2期，頁100–108。

- [4-81]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頁194。
- [4-82]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頁195。
- [4-83]〈揭開1958年省委擴大會議內幕〉，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瀋陽總部編：《紅衛報》，第53期（1967年7月12日），版7。
- [4-8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45。
- [4-85]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頁196。
- [4-86]〈揭開1958年省委擴大會議內幕〉，版6。
- [4-87]〈揭開1958年省委擴大會議內幕〉，版5、7。
- [4-88]〈中共遼寧省委召開擴大會議進行整風，粉碎了以王錚為首的反黨宗派活動〉，《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22期，頁36—39。
- [4-89]〈揭開1958年省委擴大會議內幕〉，版5。
- [4-90]〈揭開1958年省委擴大會議內幕〉，版6。
- [4-9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49。
- [4-92]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頁141。
- [4-93]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頁140—141。
- [4-94]〈9月25日中央電話會議紀錄彭真同志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1，案卷號27，頁83。
- [4-95]〈王鶴壽同志在10月9日中央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27，目錄號4，案卷號1，頁15。
- [4-96]彭真對此即不諱言地指出：「〔鋼鐵問題〕今年我們躍進，明年還要更大的躍進，這一項任務把各省市黨委書記壓得很重，那真是睡不好覺，眼熬紅了，但這項任務非要死抓不行……。」〈彭真同志在10月9日中央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27，目錄號4，案卷號1，頁11。
- [4-97]例如：中央書記處在1958年9月下旬召開中央電話會議之前，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感到「形勢逼人」、「急得沒有辦法」，就搶先召開地、市委書記電話會議，要求日產目標，並安排在中共國慶日當天放出江蘇日產生鐵1萬噸的「大衛星」，以跟中央「獻禮」、祝賀。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下卷，頁426。在中央電話會議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即在該省召開電話會議傳達並動員。陶鑄在講話中心急地表示：「按主席指示：凡是搞不好的就是黨委沒有抓起來。廣東就是沒有抓好，昨天就無法報告。」「人家是躍進，廣東省是向後退的，問題就嚴重在這裏。」「全國都完成任務，唯獨廣東完不成，我看這話就很難講了。廣東條件並不差，到處是鐵，煤差了一點，但也有，木炭也有，森林不算少，煤中央很支持，把我們當作重點，送煤給我們，如果完成不了就不好說了。昨天聽了全國各地的電話匯報，又看了我們的日程表，我是很憂慮的。」「我想最重要的還是黨委還沒有真正抓，過去很多事說明只有黨委認真抓，沒有甚麼問題是解決不了的，所以我認為還是黨委沒有認真抓，狠狠抓，拼命抓。」〈9月26日省委電話會議上陶鑄同志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1，案卷號27，頁103、105。
- [4-98]1962年旨在檢討「大躍進」錯誤的「七千人大會」期間，陳雲在煉鋼問題上即意有所指地表示：「有些人到書記處找幹勁，到總理那兒講困難」。可見其既批評王鶴壽，也對鄧小平為首的中央書記處熱衷追求鋼鐵高指標的不以為然。與此相關地，陶鑄認為：「大躍進」錯誤的責任主要歸咎於中央，尤其是中央書記處；並對其的檢討不甚滿意，認為「不深刻」。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71、106。陶鑄之所以跳出來責備中央書記處，多少與中央書記處在運動期間透過中央電話會議催促煉鋼，對之造成巨大壓力有關。
- [4-9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52—1453。
- [4-10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52。劉金田：《水乳交融——人民中的鄧小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頁4。
- [4-10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52—1453。
- [4-102]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吉林省志·中國共產黨志》（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頁193。
- [4-10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54。

- [4-104]張德江：〈情灑松遼大地，心繫吉林人民〉，載《回憶鄧小平》，下冊，頁103-104。
- [4-105]蔡博：〈鞍鋼煉鐵廠進行中心工作的經驗〉，《人民日報》，1954年3月15日，版2。
- [4-106]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228-229。
- [4-107]中國大陸當代中國史學者（A君）提供的資訊與觀點。（北京，2007年1月）
- [4-10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55。
- [4-109]鞍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編：《鞍山市志·黨政群團卷》（瀋陽：瀋陽出版社，1993），頁811。
- [4-110]鞍山鋼鐵集團公司：〈鄧小平同志與鞍鋼〉，載《回憶鄧小平》，下冊，頁537。
- [4-111]〈預祝為1,070萬噸鋼而戰的主力軍早奏凱歌，鞍鋼立志奪取450萬噸鋼——富春同志勉勵鋼都職工說：誰有更多的共產主義思想，誰就會創造奇蹟〉，《人民日報》，1958年9月26日，版1。
- [4-112]例如：〈徹底解放思想、充分發揮潛力：鞍鋼鋼的日產量創新紀錄，第二煉鐵廠同一天產量破七千萬噸大關〉，《人民日報》，1958年9月28日，版1。〈遼寧日產鋼鐵各兩萬多噸，鞍鋼創日產兩萬零二百噸的新紀錄〉，《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日，版4。〈證明大企業開展群眾運動的重要性，鞍鋼上月增產鋼七萬噸〉，《人民日報》，1958年10月8日，版1。〈總結高產週的經驗，鞍鋼決定天天組織高產〉，《人民日報》，1958年10月24日，版2。
- [4-11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741-742。
- [4-11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55。
- [4-11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56。
- [4-11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59-1460。
- [4-11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60-1461。
- [4-11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62。
- [4-119]中共保定市委黨史研究室：〈親切的關懷，永恆的記憶——1958年鄧小平視察保定〉，《黨史博采》（河北），2004年第11期（總第200期），頁42-43。
- [4-120]中國大陸當代中國史學者（H君）提供的觀點。（北京，2007年1月）
- [4-121]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529。
- [4-12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63。
- [4-12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63。
- [4-12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65。
- [4-125]周朝海、蔣春玲：〈金秋的囑咐〉，載趙慶東、劉文耀、吳啟權主編：《鄧小平與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頁156。
- [4-12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57。
- [4-127]周朝海、蔣春玲：〈金秋的囑咐〉，載《鄧小平與四川》，頁157。
- [4-12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64-1465。
- [4-12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64。
- [4-13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65。
- [4-131]劉金田、張愛茹：〈1958年的鄧小平〉，《黨史博覽》，2003年第8期，頁8-9。
- [4-132]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頁160-161。
- [4-133]薄海燕：〈抓好整頓、改造和引進〉，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部編：《鄧小平再造中華輝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頁93。
- [4-134]劉方仁：〈黔山留下偉人足跡〉，載《回憶鄧小平》，下冊，頁345-346。
- [4-135]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163-170。
- [4-13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71。
- [4-137]其強調：「它〔人民公社〕為我國人民指出了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農業中的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即按勞付酬）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別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國家對內職能逐步縮小以至消失的道路。」
- [4-138]〈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

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第11冊，頁599、602。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頁380。

[4-139]《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156。

[4-140]〈鄧小平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1月26日），頁10。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4-141]《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02。

[4-14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71。

[4-143]《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09–310。

[4-144]《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10。

[4-145]《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10–311。

[4-146]《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18。

[4-147]12月10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指出：「中央全會決定把1959年的鋼（一類鋼）產量定為1,800萬噸到2,000萬噸」。《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頁629。

[4-148]《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38。

[4-149]〈鄧小平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頁1。

[4-150]〈鄧小平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頁3–4。

[4-151]〈鄧小平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頁4。

[4-152]〈主席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2月1日），頁2。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4-153]例如：2月23、24日上午，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薄一波關於冶金、機械、煤炭生產情況和計劃安排的匯報。3月9日上午，鄧又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李富春報告，討論包括鋼鐵生產在內的1959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情況和第二季度生產安排。

《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91–1492、1495。《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58、363。

[4-154]《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70。

[4-15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98–1499。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858。

[4-156]《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72。

[4-15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00。《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72。

[4-158]《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39。

[4-15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04。《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78。

[4-160]《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227。

[4-16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07。

[4-162]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492。

[4-16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10–1511。

[4-164]《鄧小平思想研究》叢書編審委員會：《鄧小平思想研究》（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3），第2卷，頁1202。

[4-16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864。

[4-166]〈討論計劃問題時中央同志的發言紀錄〉，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2，目錄號4，案卷號1，頁36。

[4-167]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下冊，頁491。

[4-16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219。

[4-16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14。

[4-170]《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94。

[4-17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16–1517。

[4-172]《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94。

[4-173]鄧小平：〈在八屆三中全會上的總結發言要點（節錄）〉（1957年10月9日），載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第22冊，頁312–313。

[4-17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16。

- [4-175]〈鄧小平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未全件），頁17。
- [4-176]〈鄧小平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未全件），頁33。
- [4-177]〈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簡報〉，第10期，1958年7月27日，頁3。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 [4-178]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秘書處：〈關於1958—59年度糧食分配及有關問題的初步意見（草稿）〉，1958年7月，頁3。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 [4-179]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141。
- [4-180]〈鄧小平李富春視察遼吉黑三省時強調說：東北要大挖潛力支援全國〉，《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日，版2。
- [4-181]鍾文、鹿海嘯：《百年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上冊，頁267—268。
- [4-182]相關照片請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著：《鄧小平畫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頁124。
- [4-183]安振英：〈1961—1962：河北省甄別平反〉，《炎黃春秋》，2008年第2期，頁5。
- [4-184]王任重：〈對湖北「大躍進」的若干回憶〉，載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大躍進」運動（湖北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456。
- [4-185]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頁135。
- [4-186]宋文彬：〈檢查兩個錯誤〉，宋文彬文史資料研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mlnf.html（2010年6月登入）
- [4-187]〈李井泉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罪行錄〉，紅衛兵成都部隊成大支隊、成都大學八一戰鬥團：《八一戰報》，第24期（1967年6月6日），版4。宋文彬後來又幾次對李井泉告以利害：若不成功，不但當地人民無飯可吃，也無糧可供外調。李終而讓步同意縮小溫江試種萬斤田的面積。宋文彬：〈我對原溫江地區農業大躍進中的兩個特殊問題的主要情況的交代〉，宋文彬文史資料研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02vw.html（2010年6月登入）
- [4-188]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頁381。
- [4-189]〈祝捷、慶功、誓師、再接再厲徹底改變整個農業戰線面貌——全國農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開幕，黨和國家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同志到會熱烈祝賀〉，《人民日報》，1958年12月26日，版1。
- [4-190]第三項至第十項的農業倡議為：三、切實做好小麥和其他過冬作物的田間管理，開展冬修水利和冬季積肥運動等。四、認真執行「水、肥、土、種、密、保、工、管」的農業「八字憲法」等。五、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六、實行工業和農業同時並舉。七、實行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同時並舉。八、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改善群眾生活。九、爭取科學、文化、教育、衛生和體育事業更大的躍進。十、抓緊最近幾個月的時間，密切結合冬季生產，整頓鞏固人民公社。〈十大倡議——農業先進單位代表會議提出今年農業戰鬥綱領〉，《人民日報》，1959年1月2日，版1。
- [4-19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76。
- [4-192]《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32—333。
- [4-193]〈鄧小平同志在上海市委工業會議上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2，案卷號204，頁14。
- [4-194]〈譚震林同志在十省市小麥座談會上的總結〉（1959年2月21日），頁2。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 [4-19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81。《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37。
- [4-196]劉子厚：〈徹底揭發批判林鐵的滔天罪行，徹底清除林鐵在河北的流毒和影響〉，河北保定工代會籌委會、河北保定鐵路工代會、河北保定市貧代會聯合主辦：《百萬工農》，第35期，1968年1月22日，版3。
- [4-19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80。
- [4-198]《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36。
- [4-199]《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38。
- [4-200]趙發生：〈我為共和國經管糧倉24年〉，《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頁35。
- [4-201]章重：《東湖情深：毛澤東與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202。

- [4-202]《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216。
- [4-20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15。
- [4-204]中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中制定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規定人民公社採取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並要求在公社內部，承認隊與隊、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實行按勞分配、等價交換的原則。鄧小平在此會中協助毛澤東討論與研究相關問題。《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18–921。
- [4-205]其內容包括：1、包產問題；2、密植問題；3、節約糧食問題；4、播種面積要多的問題；5、機械化問題；6、講真話問題。《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944–946。
- [4-20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06–1507。
- [4-207]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海南州州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頁204。
- [4-208]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省志·糧食志》（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頁18–20。
- [4-209]尹曙生：〈省長王昭之死〉，《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頁8。
- [4-210]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578。
- [4-21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11。
- [4-212]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62–163.
- [4-213]《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91。
- [4-214]當中央書記處其他成員對於1959年糧食生產的前景已稍為冷靜一些時，譚震林在5月22日卻仍堅持是年糧食可達10,500億斤的春秋大夢。《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89–390。就在譚震林發表前述「高見」的次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示：對於農業增產問題，「需切實抓一下」。這多少也有要譚震林在相關問題上再多加確認的意思。1959年7月26日，譚震林在廬山會議的小組會上，也承認他自己確實犯有農業估產偏高的重大錯誤。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148。
- [4-215]例如：鄧小平曾嚴厲批評川南領導人：「徵糧任務沒有完成，你李大章、彭濤、杜義德、郭影秋要負責，再完不成任務，我要給你們算賬，算歷史賬，新賬老賬一起算，算總賬！」鄧進而強調：「甚麼是政策？當務之急是把糧食拿到手，完成徵糧任務就是政策。站不住腳跟，還有甚麼其他政策可講！」針對同一問題，鄧對川東的幹部表示：「對上級交給的任務，只有考慮如何完成，絕不容許思想動搖或者要求減輕。」王海光：〈徵糧、民變與「匪亂」——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貴州為中心〉，載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編：《中國當代史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第1輯，頁210。
- [4-216]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p. 111.
- [4-217]〈1月31日小平同志在省市委第一書記會上的講話〉（1959年1月31日），頁1。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 [4-218]〈中央書記處1959年10月15日電話會議上李先念同志講話紀要〉（1959年10月15日），頁2–3。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 [4-219]東夫：〈李井泉和四川大饑荒的特殊成因〉，載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香港：田園書屋，2009），上冊，頁347。
- [4-220]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39。
- [4-221]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257。梁靈光：《梁靈光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頁382–383。中共的統購統銷制度在「大躍進」中釀就徵糧過度之結果的討論，可參閱：Philip A. Kuhn,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05–108.
- [4-222]〈鄧小平寫給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摘錄）〉（1972年8月3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 [4-223]據李銳回憶，這是鄧小平在1959年3月的上海會議上說的。李銳：《李銳談毛澤東》（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104。
- [4-22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09、1516。

第五章

「大躍進」後期續揚紅旗（1959-1960）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不滿彭德懷批評「大躍進」所引發的「反右傾」政治風波，使得稍有降溫的「大躍進」又再次開足馬力，在1960年衝向另一回合的運動高潮。然而，第三年度硬行「大躍進」的結果，不但經濟大幅倒退，更賠上極其嚴重的人命代價。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就指出：在1960年，「以高指標、浮誇風、共產風和瞎指揮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再度泛濫，並且持續更長的時間，造成更大的危害」，「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該書更進一步表示：[5-1]

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不少省份農村人口死亡增加。由於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積降低，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全國總人口比上年減少1千萬。突出的如河南信陽地區，1960年有9個縣死亡率超過100，為正常年份的好幾倍。

1960年年終，台灣人口總數為10,850,685人。[5-2]從比喻上來說，中國大陸在1960年一年減少的人口數（尚不包括自然增長應有而未有的人口數），就約等於一個台灣在地球上消失殆盡。

對於肇禍極大的1960年「大躍進」，鄧小平所為何事、對相關事態的發展有何作用與影響？下文先討論鄧小平如何參與廬山會議、「反右傾」運動，以及1960年經濟計劃的制定，接著介紹1960年2月鄧跨省視察、指導地方運動的情況及問題，再來探討鄧對編修「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的態度與活動，然後關注是年夏天運動因中蘇關係緊張而出現激化發展時，鄧與聞其中的情況。最後，在小結的部分，綜合第四章與本章的探討，對鄧在運動中的地位與責任，作一簡單的概括。

第一節 廬山會議後「反右傾」 並制定「繼續躍進」計劃

對廬山會議的態度

1959年7月召開的廬山會議，因彭德懷（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上書批評「大躍進」引發毛澤東大怒，導致會議原訂的糾「左」

議程突轉為「反右傾」，其影響所及不但中斷了正在進行而略見初效的糾「左」工作，會後掀起的全國「反右傾」運動，更引發了另一波的「大躍進」運動，使得先前業已受創的國家經濟和社會面臨更大的危機。

鄧小平在1959年6月5日因跌倒骨折而住院療傷，^[5-3]故未參加廬山會議。^[5-4]但對廬山會議的情勢與發展，特別是彭德懷等人對「大躍進」問題的不吐不快，以及毛澤東對此議論的大加撻伐並決心對之開展批鬥，鄧小平除可能如同其他的會議缺席者（如陳雲）透過閱讀官方文件知情外，^[5-5]或也因身為毛澤東倚賴的重臣（如羅榮桓）而作為通報情況、徵詢意見的對象。^[5-6]易言之，鄧小平此時雖然未親臨會議，但仍消息靈通、耳聰目明，不致會有「不識廬山真面目」的情形。

鄧小平的政治地位在廬山會議後未有變動，中共的主要領導人皆仍對之高聲肯定：毛澤東稱鄧為「中國政壇上正在升起的一顆明星」；^[5-7]劉少奇說要提倡對鄧的「個人崇拜」。^[5-8]由此看來，鄧小平是通過了廬山會議風波的「政治考驗」。事實上，不能排除鄧小平在會議期間即有表態支持毛澤東的可能。^[5-9]促使鄧小平選擇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廬山會議上打出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5-10]乃是在毛澤東主導、諸多中共高幹充當積極分子下所共同創造（賣力揭發、奮力討伐）的整風成果。鄧小平在政治上既要唯毛馬首是瞻，也要尊重其他同僚在廬山整風中的辛勤表現。然而，鄧恐也不是完全被動地接受。

毛澤東在廬山上對彭德懷算的政治總賬中特別指控：彭意圖不軌的野心早已有之，參加高崗的密謀活動就是明證，而彭在廬山會議中向黨中央發起進攻，實是其野心、陰謀的總暴露。「彭高聯盟」的指控乃是「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成案的一個重要理由，亦是中共高幹在傳達相關政治決議時的一項重點內容。^[5-11]各級黨幹在認識彭的問題與錯誤時，此點頗具說服力。^[5-12]鄧小平也一直確信彭德懷深涉高崗的案子。^[5-13]

彭德懷在廬山行事本身的有失策略和存有瑕疵，多少也對鄧小平的態度有所影響。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中批評「大躍進」政策，猶如「半路殺出程咬金」，不但激怒了毛澤東，更驟然中斷中共中央得來不易的自省，繼續主觀地將「大躍進」推動下去。鄧小平對彭德懷的莽撞也難免生怨。1961年10月23日，鄧小平在回顧「大躍進」問題時就表示：

三面紅旗是對的，總路線是對的，我們缺乏那麼一套，一個缺乏一套具體政策，一個叫調整遲了一年。59年廬山會議碰到了鬼。本來廬山會議是調整會議，鋼調整到×××噸，反對的是左，鑽出這麼一個鬼，大家一股勁，越搞越猛。^[5-14]

鄧小平話中所言的「鬼」，指的即是彭德懷上書所引發的事端。

另外，彭德懷的直率性格和直言直語，在政治上也易生誤會。彭在廬山會議「觸犯天條」，與此不無關係，鄧小平對此也有看法。據鄧力群回憶：對於造成廬山會議轉折的原因，「一種因素，小平同志對此也講，彭老總寫信、說話，特別是說話，確有不妥的地方」。^[5-15]

與「反右傾」運動的關係

廬山會議對「大躍進」運動帶來的極其不利的影響是「反右傾」運動的尾隨而至。該運動肇因於毛澤東在廬山批彭時對「右傾思潮」的警惕與反感，由於彭德懷獲罪的殷鑒不遠，鄧小平對於毛的「反右傾」主張當然不敢輕慢。推行「反右傾」運動的任務，就像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自然就落在鄧小平為首的中央書記處的肩上。至於1959年最後一季度的「大躍進」計劃、生產和建設問題，就由周恩來負責管理。^[5-16]

有關鄧小平對「反右傾」運動的參與情形，現有可得的資料非常地少，但是仍可初步判斷其對相關政治運動的推行，既表支持也擔任要角。鄧小平為蘇聯《真理報》所寫、並刊載在1959年10月1日出版的《紅旗》上的〈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一文，是目前唯一公開的鄧小平批評「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書面文字。其中指稱：

我們黨內的少數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看不見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偉大成就，竭力誇大群眾運動中的那些已經克服了的缺點，借以非難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1958年的大辦鋼鐵運動對於我國國民經濟迅速發展的積極作用，在實際生活中愈來愈明顯，而他們卻以為這個運動只能起破壞的作用；人民公社已經在總結了初期的經驗以後進一步成長和健全起來，而他們卻以為人民公社正在「倒退」，只有解散人民公社才是唯一的出路；廣大人民群眾都認為我國國民經濟的躍進的局面好的很，而他們卻認為「糟得很」。這種右傾機會主義的觀點，顯然不過是害怕群眾和敵視群眾運動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在我們黨內的一種反應。^[5-17]

至於鄧小平在施行「反右傾」運動時的具體作為方面，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在1959年秋冬頻繁地開會討論、佈置進度以及聽取匯報。例如：1959年9月15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八中全會向下傳達和處理各地右傾分子問題」；10月20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各正副部長會議」，報告「反右傾」情況；11月9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聽取「兩個直屬黨委、總政和北京市關於反右整風的報告」；11月21日，中央書記處開會討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界線問題」；^[5-18]12月28日，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反右傾處理問題」，即由鄧小平主持並做出原則性的指示。^[5-19]

四川的「反右傾」甚為厲害，從中也可一窺鄧小平「黨性」的堅強。李井泉在四川領導「反右傾」運動，是拿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開刀的。鄧自力因為其領導的瀘州專區在解散公共食堂、多劃自留地、豬分散餵食等問題上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省委檢查團指控：領導幹部「對個體生

產的積極性考慮的多，對個體生產影響集體生產的消極性則考慮的少」，宣傳「黃貓黑貓，捉住老鼠就是好貓」；^[5-20]個別公社的生產隊甚至推行「包產到戶以產計工」，導致社員強調個戶生產、集體事業沒人顧，勞強者有餘力經營副業、勞弱者惶惶不可終日，食堂無法恢復，以及思想混亂與動搖），^[5-21]被李井泉點名為四川頭號的「蛻化變質和有系統的右傾言論和行動並且具有代表性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李上報中共中央審查後獲得批准。^[5-22]鄧自力的地委書記職務被撤銷，地委常委雖保留，但須下放勞動。

鄧自力是何許人也？

鄧自力乃是鄧小平的堂弟，年輕時受鄧小平的影響前赴延安參加革命；1949年回四川工作，乃經鄧小平同意，並在其電話介紹下到川南工作，初為合江縣委書記，後升任瀘州地委書記。^[5-23]對於與自己關係不淺的堂弟在四川「反右傾」運動中「中箭落馬」，鄧小平自是知情。鄧自力被批判和下放後不久即患了浮腫病，鄧小平還特地將組織配送給自己的百斤黃豆與一盒蛤蚧油，託人交給鄧自力，助之消除腳腫問題。^[5-24]以鄧小平身居中央總書記要職、在四川的政治影響，以及其與李井泉的密切關係，他為何不在鄧自力被捲入「反右傾」運動、成為眾矢之的時就伸以援手呢？這可能出於兩方面的原因：

一、鄧自力的「犯行」明確而嚴重。

鄧自力就自承：「我是四川第一個解散食堂，劃自留地給社員，允許私人養豬，劃小生產隊（十幾戶到二十幾戶）包產到組、包工到戶的人。因此我的錯誤是一系列的，不把我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定誰呢？」^[5-25]鄧小平即便想幫堂弟的忙，^[5-26]也仍難以讓之全身而退。以鄧小平當時對「大躍進」問題的膚淺認識，也甚有可能以為鄧自力在瀘州解散食堂、實行包產到戶等舉措，真的是有錯，需要被批評與「搶救」（鄧小平直到1961年才覺得公共食堂可以不辦；1962年才比較明確地認為包產到戶可以一試。請見第七章）。事實上，鄧小平的親弟弟、也就是鄧自力口中的二哥鄧墾，當時擔任重慶市副市長，對農村基層情況了解甚少，即認為鄧自力在瀘州的作法有錯，甚至趕在四川省委召開「反右傾」大會之前，特地勸之要知錯能改。^[5-27]

二、高調批鬥鄧自力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符合四川「反右傾」運動發展的政治需要。

鄧小平在前述的〈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一文中說：

黨所領導的廣大群眾運動之所以能夠對於推進社會主義事業起重大的作用，就因為，通過這種群眾運動，群眾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的發揮，同時，這種群眾運動又是群眾進行自我

教育的最好的學校。我國的廣大人民群眾，正是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一次又一次的群眾運動，深刻地受到社會主義教育，而使自己的社會主義覺悟迅速地提高起來。[5-28]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後發起「反右傾」運動，目的就是希望藉由整風式的群眾運動，讓幹部與黨員接受「反右傾鬆勁」的「社會主義教育」，迅速提高「社會主義覺悟」並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積極性」，以推進「三面紅旗」的事業。然而，群眾在運動中並無法自我教育，而需要黨的引導。中共在整風中行之有效的引導方法，即是鎖定有分量的個別人士，將之作為黨要徹底批判、否定的敵對思想的形象化代表。從全國範圍來看，毛澤東說：「借彭〔德懷〕黃〔克誠〕教育廣大群眾。」[5-29]在四川，要借誰來「教育廣大群眾」呢？李井泉瞄準了鄧自力。鄧自力自己也說：「我是小平同志的弟弟，要在四川找彭德懷式的人物，定我是最有震動效應的了。」[5-30]

李井泉批鬥鄧自力的政治含意是再清楚不過了：鄧自力縱使有一個在巴蜀赫赫有名的堂哥鄧小平，但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是得挨批，全川的黨員與群眾從中必能深刻體認相關錯誤的嚴重性與危險性；而連鄧小平的堂弟犯錯都無法遁逃、不予輕放，其他犯類似錯誤的人更是不能縱放、要深挖。李井泉通過對鄧自力等「右傾分子」開展思想批判與辯論，「使右傾分子更加孤立，使不堅定的分子堅定起來，使右傾思想失掉市場」，進而「撤換那些極少數的右傾分子，樹立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的積極分子的領導優勢」，使後者在公社各級領導中掌握2/3的多數；「對於一部分表現過動搖，但是願意積極改正錯誤的，在經過批判後，責令他們在工作中去改正錯誤」。[5-31]各級「促進派」在「反右傾」過程中重新抬頭，以及先前有動搖表現者又被迫在未來工作中努力證明自我洗心革面，這些皆為李井泉在四川再推「大躍進」提供思想上、組織上的便利。

對於參與指揮、負責督導全國「反右傾」運動的鄧小平而言，忍痛坐視自己的堂弟被「拋出」，以換取四川甚而整個西南地區「反右傾」運動的「興旺發展」，或是一個痛苦但值得的決定。何況自己的堂弟犯錯，鄧小平不更應該要表現得公私分明、為黨無私嗎？有中央總書記「大義滅親」作示範，各級與各地的黨幹在尋覓、批鬥所謂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時，就不會狠不下心了。

「反右傾」運動始之於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以後，運動的「正規時間」為時雖只約半年，但其發展卻如脫韁野馬，最後被冠上相關政治標籤而淪為政治異己者，竟有365萬之眾。[5-32]代表中共中央督管「反右傾」運動的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很難同它的擴大、失控脫離干係。鄧銜毛澤東之命大打「右傾機會主義者」所營造出的高壓政治氛圍，讓主張對運動續行糾「左」者，難有發聲的空間，只能啞口無言，任1959年上半年好不容易稍

有降溫的效果付諸東流；相反地，誓言再起「大躍進」的聲音，重新佔得上風，成為壓倒一切的主流政治語言。

參與制定1960年「繼續躍進」的計劃

當鄧小平在1959年深秋驅策全黨使勁批鬥與深挖「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之時，他也開始利用「反右傾」思想整風在各級黨幹與群眾之中逼發出來的只講大幹快上的聲浪，著手制定1960年「大躍進」的生產計劃。

鄧小平在1959年10、11月主持或坐鎮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明年年度的計劃內容。其基本流程是：鄧小平等人在琢磨、領會毛澤東對新一輪運動的心意後，領導地方領導人與中央部會首長進行討論並匯集意見，最後，在擬成計劃後親自向毛澤東匯報，徵求毛的初步認可，再回頭作進一步具體的研議。

1959年10月23日，鄧小平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等政治局常委參加毛澤東離京外出前召集的會議，商談國內外情勢。^[5-33]鄧從中應該了解到毛對經濟計劃的基本想法。毛到外地去後，1960年經濟計劃制定的工作，就成為鄧的工作重點。在中央書記處內協助鄧小平制定經濟計劃、並負責領導國家計委的李富春，在10月27日的全國計劃會議上提出：「明年基建盤子不要打得過大，這是今年上半年的教訓」；「把計劃安排得積極可靠，留有餘地，分兩步走，不要一下子滿打滿稱」。李所言的「兩步走」，其意思為：計劃的安排首先按照鋼年產1,800萬噸、糧年產6,500億斤來規劃；第二步則考慮按照鋼年產1,900至2,000萬噸、糧年產7,000至7,500億斤安排計劃。^[5-34]事實上，李富春這個計劃構想（也反映了鄧小平的想法），並非「積極可靠，留有餘地」，其所設的基點本身就屬於高指標了。

一週後的11月3日，周恩來與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的副手彭真赴浙江杭州向毛澤東報告正在擬議中的1960年的計劃數字。周表示：「1960年計劃數字，現在總是看漲，我們是控制了。」毛表示：「下面有勁，不要越漲越搞得被動。」當周、彭對毛說明1960年的鋼產量計劃是1,800萬噸時，毛說：「死啃1,800〔萬噸〕，搞個半年再講。6月間那個時候，有可能的話，內部搞一個指標，搞1,900〔萬噸〕。」^[5-35]鄧小平在了解毛澤東的看法後，也不管這些計劃數字是否合理，就照著提出計劃指標，並領導黨的高級官僚對計劃做更細緻的規劃。

11月15日、17日、18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討論計劃問題。與會者除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書記處成員，還有周恩來、國務院副總理和有關部門負責人。^[5-36]鄧小平不但全程出席會議參與討論，他在18日的會上，還儼然以會議領導者之姿與周恩來一起作總結發言。^[5-37]鄧小平的會上發言

與總結發言的內容，中共官方迄今仍未公開。但周恩來18日發言強調，有關運動的全國性經濟數據的公佈問題，需經中央書記處決定。[5-38]

11月23日下午，鄧小平又在其住處召集會議，到會者包括：前一日飛赴杭州與毛澤東晤談的周恩來與彭真，以及「各大區區長和中央去的10人左右」。會議決定相關領導人28日再赴杭州向毛匯報1960年經濟計劃的安排。之後，為了更加完善1960年的經濟計劃，並且使自己在向毛澤東匯報時更有準備，鄧小平等人在中共高層間又就此進行相當密集的討論。11月25日、26日下午的3時至8時，彭真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鄧小平一同聽取並討論李富春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周恩來、朱德出席此會，國務院有關部委負責人、各省黨委的工業書記也列席會議。[5-39]

11月28日，按既定行程，鄧小平與周恩來、彭真飛往杭州，「向主席匯報1960年計劃問題」。[5-40]以此為基礎，11月30日至12月4日，中共中央在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之繼續討論。鄧小平等人順迎毛澤東對生產指標要多、要高的心意，借由李富春提出相對應的計劃；毛在基本接受後又擺出一副要人冷靜的姿態，既表其欣慰於前者的奮發心志，又以示自身思慮理智。毛澤東在會中表示：「1960年鋼產指標1,800萬噸，2,200噸不要去打算，搞到2,000萬噸就了不起了。」[5-41]就在鄧等人揣摩迎合毛、毛作勢撫慰鄧等人的過程中，相較11月初的討論，1960年鋼產的「第二本賬」（不對外公佈的期成的計劃）已從1,900萬噸調升至2,000萬噸。

1960年1月7日至17日，中共在上海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其主要目的在於將1960年的經濟指標確定下來，以為將在3月底召開的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作準備。會議批准了在鄧小平監製下、國家計委所提出的〈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對此，毛澤東在1月17日閉幕會上表示：「這次會議作出決定的只是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今年的計劃。關於鋼產指標，按照中央的方案，第一本賬〔必成的計劃〕，即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的，是1,835萬噸，第二本賬，爭取2,000萬噸或者還稍多一點。」[5-42]

至於1960年糧食產量的指標，這次會議則將之定為6,000億斤。中共聲稱1959年糧收5,400億斤，後來證明是一不實的數字，但是中共卻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地規劃並預測1960年糧產指標將達6,000億斤，亦即增產10%左右。不及一個月前的1959年12月24日，鄧小平對北韓大使李永鎬表示：

對於農業，我們有新提法，即以農業為基礎。這個提法是否合乎馬列主義？我們研究了，馬克思、列寧都很重視農業。農業落後，工業就要受到拖累。農業發展，可以促進工業發展。農業每年增產10%就不容易，而食品、副食品、輕工業原料，都要靠農業。所以農業是基礎，始終要抓農業。[5-43]

中共將1960年農業增長的目標，設為不容易達成的10%，以顯其農業

上要繼續「大躍進」的決心。但是鄧小平所說的「以農業為基礎」、「始終要抓農業」的「新提法」，在1960年的運動實踐中還是付諸具文，百姓到頭來為之更吃盡苦頭。

後來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1960年4月10日通過的〈關於1960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由鄧小平主持討論、最後按毛澤東指示修改定稿），^[5-44]即以此次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的計劃為基礎，再約略調整而成。其確定1960年鋼產量目標為1,840萬噸（較1959年增長38%）；糧食產量指標設為5,940億斤（較1959年含虛報成分的產量增長約10%），仍然是一個高指標的計劃。^[5-45]然而，這僅是個對外公佈的「第一本賬」。中共內部對主要的生產項目，特別是對鋼所要求貫徹的「第二本賬」甚至「第三本賬」，在1960年的孟春起即一直蠢蠢欲動，也牽動了整個「二五」後三年（1960、1961、1962）的補充計劃。以上經濟計劃的調整或編修，統由鄧小平領導、掌握，本章的第三節會作更詳細的介紹。

1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鄧小平回北京討論該會議精神的傳達問題，也按其方針安排書記處工作。中共史家對此次上海會議及其影響的評價甚低。因為在此會後，運動中的一些不良政策與傾向如：大辦縣社工業、水利、食堂、養豬場，高指標、浮誇風、命令風及「共產風」，「又嚴重地氾濫起來」。更指出：「這段時期，1959年冬與1960年春，是經濟工作中『左』傾蠻幹最厲害的一段時期。」^[5-46]

「當局者迷」，鄧小平當時對運動的發展仍感覺良好。1960年1月23日，《人民日報》刊出的社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乃是經鄧小平在20日審閱批示「可用」的。^[5-47]其內容在一定的程度上可反映他在1960年初如何評價運動的已有成就和未來前景。該社論表示：「由於1958年和1959年連續兩年的大躍進，我們已經提前三年完成了原來擬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標，用兩年時間走完了五年的路程。」由於中共在運動中強調「以鋼為綱」，所以文中特別以鋼產量的增長為例，自豪地強調：「我國國民經濟這樣巨大的連續的增長速度，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黃金時代也不曾有過的。」

最後，社論堅稱：「要在1958年和1959年連續大躍進的基礎上，爭取在1960年實現國民經濟更好的全面的繼續躍進。」而這在「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個建設社會主義的法寶」「深入人心」與發揮作用下，是可以達成的。^[5-48]

第二節 從中南一路走馬看花到華東

鄧小平在1960年「繼續躍進與更好的躍進」的計劃初告確定後，就迫

不及待地到地方視察工作、加油鼓勁。

巡視廣東、路經湖北

鄧小平視察的首站是廣東及其所管轄的海南。鄧小平在2月初視察嶺南期間，在陶鑄的安排下，可說是驚喜連連。他參觀湛江的建設後甚感滿意，給予「北有青島，南有湛江」的評價；更向同行的彭真與柯慶施表示，要將該地在城市建設、綠化、衛生方面的經驗向全國推廣。^[5-49]陶鑄安排鄧小平等人來湛江視察的另一個用意，就是要他們見識一下自己在廣東水利工程上的「大手筆」：堵海大堤與鶴地水庫——青年運河工程。

陶鑄的計策成功奏效，因為鄧小平對湛江這兩項興建中的水利工程，甚為激賞。鄧不顧行動上的不便（當時仍需藉手杖助行），親臨堵海大堤的施工現場，一望眼有上萬名民工同時上陣的氣勢，即不禁讚嘆：「這真正叫移山填海啊，真是當代的愚公移山啊」，「真正的依靠群眾，自力更生，土法上馬」。^[5-50]

鶴地水庫——青年運河工程也投入很大的人力。它在1958年6月開始動工，其庫區工程的高峰期投入民工5萬餘人，在1959年9月基本建成；灌區工程高峰期工地民工高達30萬人，1960年5月各主要幹渠建成，開始部分發揮效益。^[5-51]鄧小平在聽取青年運河工程的匯報時，也稱讚地表示：「了不起，真了不起，幹勁很大，你們真是當代的愚公啊！狠抓水利是對的，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而水利又是農業的命脈，你們幹得非常好！」鄧小平後來在北京的一次部長級的高幹會議上就推銷其在湛江的見聞：「廣東湛江目前有兩大工程在施工，我到那裏去看了，很了不起。你們有時間也應到那裏去看看，學習一下他們的艱苦創業精神，深入調查研究，多開動腦筋。」^[5-52]鄧更具體要求國務院各部委與各省、市的領導人前去觀摩。^[5-53]在中央總書記的推薦下，從中央到地方紛紛派員到湛江參觀與學習。

1962年的中共「七千人大會」上，中共水電部作檢討：在1960年，全國上馬300多個蓄水1億立方米以上的水庫，其結果不僅浪費國家財力、物力，而且擠佔農村大量的勞力，影響農業生產，亦造成後來防汛工作的困難。^[5-54]鄧小平在1960年初登高一呼推廣湛江經驗，或有對該年全國範圍內的大辦水利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至於湛江經驗的創造人陶鑄，在「七千人大會」期間也對他在「大躍進」中大興水利工程，將人操勞致死，有所反省。^[5-55]

1960年2月初，鄧小平到有「天涯海角」別稱的海南島的視察情形，胡喬木在「文革」中「供認」：「鄧小平、彭真、楊尚昆等曾仗勢帶子女到

海南島去玩過一兩天，陶鑄陪往，我也去了。一路上只是遊覽性質，而且陶鑄主要陪鄧小平……。」^[5-56]

鄧小平參加完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後，2月14日離開羊城，並於隔日上午抵達武漢。鄧小平的目光馬上聚焦在湖北農村嚴重的春荒問題上，因為該省領導人對鄧報告：「現在是調運不能及時和差一億斤糧」。^[5-57]鄧立即指示楊尚昆電話聯繫中央書記處內負責糧食和貿易的李先念，要之解決糧食調運不及時的問題。

地處華中的荊楚大地都發生這種春荒急情，鄧小平預感此一問題恐會在更大的範圍內出現，需要一專人專職機構統籌因應處理，因此提出成立糧食調運指揮部，由李先念負責。^[5-58]中共中央在21日正式批准此議，以「中發〔60〕135號」文件發至各省，要後者「立即研究執行」，並強調：「中央要求，凡是有糧食調出任務的省份，應當緊急動員起來，掀起一個調運糧食的突擊運動，堅決保證完成當前的糧食調運任務。」事實上，李先念在聽聞鄧小平的指示後，隨即著手籌建糧、油、棉調運指揮部，在相關中央文件發出前三日，就已開始辦公。^[5-59]與前一年的情況相仿，對於1960年春荒的成因，鄧小平並無認識到問題的根本實質還是在於農村缺糧。鄧仍相信1959年的糧產接續1958年繼續「大躍進」，並以為只要糧食調運工作得宜、讓之及時暢流，相關的春荒問題最後總是能化險為夷。

視察河南

一、支持吳芝圃「持續大躍進」的計劃

2月17日，鄧小平到吳芝圃治下的河南省會鄭州視察工作。鄧小平上午抵達後立即聽取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楊蔚屏等人報告當地旱情及群眾生活安排的情況。楊蔚屏對該省信陽地區在1959年底開始出現大量人口餓死的情形，一直表現得無動於衷，^[5-60]他對鄧小平所作的省情報告中，不知有否據實以陳。

17日下午，鄧小平參觀鄭州北郊人民公社食堂和鄭州紡織機械廠食堂，「主要是看炊具的改革」。^[5-61]公共食堂的炊具和加工工具的改革運動，乃是吳芝圃吹噓其成功推行機械化、半機械化的例證，他甚至曾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開箱展覽炊具改革的具體成果。事實上，相關的炊具只能供參觀而不能實際使用，能言善道、負責講解的炊事員也是由河南婦聯的負責人所冒充。^[5-62]鄧小平沒有參加廬山會議，自然無法看到吳芝圃在廬山所作的炊具改革「表演」；或為彌補此一遺憾並一飽眼福，鄧此次在河南主動要求參觀炊具的改革。吳芝圃故技重施，將炊具展覽會上陳列的炊具緊急搬至鄧到訪的地方，原班人馬又為鄧上演一次炊具改革的

「成果展」。^[5-63]鄧小平似乎沒有看穿吳芝圃的把戲，因為不及一個月後，《人民日報》還會大幅報導河南炊具改革的成功經驗。^[5-64]

2月4日至19日，河南省委舉行第十五次全會和全省五級幹部會議，總結1959年的工作，也討論1960年河南省的國民經濟計劃，吳芝圃在會上作了題為〈為實現1960年的持續大躍進而奮鬥〉的報告。會議要求繼續「反右傾」，提出全省大辦縣社工業、大辦水利、大辦養豬場的口號，並作出〈關於動員全黨、全省人民為實現1960年持續躍進而奮鬥的決議〉。^[5-65]對於河南在1960年大煉鋼鐵的計劃，此會也提出生產鋼35萬噸，生鐵150萬噸的任務，分別比上年增長5.9倍和1.2倍。^[5-66]中原的「大躍進」又將被帶向另一波運動的狂潮，讓當地經濟陷入更為嚴重的失調。

鄧小平就在相關大會舉行期間的2月17日晚上，「會見了參加省委五級幹部會議的全體人員」。^[5-67]此舉可以視為是代表中共中央對吳芝圃倡議的河南1960年「大躍進」計劃的肯定與支持。吳書記有鄧總書記背書，好不得志。兩個月以後的4月15日，吳芝圃率領中共代表團遠赴北歐，參加芬蘭共產黨的黨代表大會。鄧小平乃是主管中共黨對黨外交的負責人，他的點頭或推薦，應是吳芝圃享此殊榮「出國爭光」的關鍵。吳在芬共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當然包括傳播「大躍進」的「偉大成就」。^[5-68]芬共後來如果知道他們接待的中共代表吳芝圃在河南推行「大躍進」造成的死亡人數（300萬），超過芬蘭總人口的半數以上，應該會咋舌不已吧！

吳芝圃為了兌現他2月中旬在大煉鋼鐵上向中共中央與鄧小平所誇下的海口，5月11日至18日，吳召開全省工業生產會議，研究確保鋼鐵大增長問題。在此一會議準備召開之際，鄧小平正好在鄭州陪同毛澤東會見外賓，也抽空聽取河南省委匯報工作，並對之指導「如何做好計劃」。^[5-69]鄧在其中有否對此會加以指示，目前並不可考。但會議提出要繼續貫徹中央「以鋼為綱」的方針，「在鋼鐵生產上繼續堅持『左』傾蠻幹」，^[5-70]讓已是嚴重減產的河南農業再受重創。

二、為城市人民公社尋求範例

1960年2月18日，鄧小平在河南的第二天（也是最後一天），也是行程滿檔，最主要的項目是參觀鄭州管城區街道人民公社。鄧小平此行並非是一般的視察，而是為中共中央在運動中重啟城市人民公社風潮前，所作的最後一次正式檢裝。

中共在1958年「大躍進」勃興階段，曾鼓勵試辦城市人民公社，鄧小平即是一名積極的倡議者。鄧在該年9月的東北行中數次聽取城市試辦公社的匯報。他在聽取中共四平市委負責人報告時，認為該市已具備了組織市公社的條件，並「指示市委迅速作出一個規劃，草擬出公社章程，在群眾

中進行醞釀，並建議吉林省委在此試點，取得經驗」。^[5-71]1958年10月上旬鄧視察河北時也指示：「全國6億農村人口都實行公社化了，只剩了5,000萬城市人口，形勢逼人，公社非辦不可。」他進而要求：「對城市組織人民公社作出規劃，積極進行試點，總結研究經驗。」^[5-72]

由於農村人民公社問題叢生，中共若馬上在城市推行人民公社，恐顧此失彼、捉襟見肘，因而暫緩城市建立人民公社的計劃。1958年12月9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代表中央作〈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時，針對城市組織人民公社問題表示：「總的精神是從穩從緩，以後再作專門研究。」^[5-73]鄧小平從積極力倡到主張從穩從緩的變化，逃不出眼尖的南斯拉夫派駐中國的記者，他甚至以此為例，撰文批評中共「大躍進」相關政策，指稱：「頑固的實踐和事實是不按主觀願望伸縮的。」^[5-74]

1960年，中共中央決定將組織城市人民公社，重新置入行動的議程。在相關決策過程中，鄧小平在1958年秋對城市人民公社所撥撒的種子，也適時開花、發揮影響。因為鄧在1958年10月曾指示河北省委「對城市組織人民公社作出規劃，積極進行試點，總結研究經驗」，河北省委隔月即成立城市人民公社辦公室，以加強指導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研究和試點工作。根據其先後召開三次座談會的所得，河北省委在1959年12月17日向中共中央提交〈河北省委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向中央的報告〉，集中強調城市人民公社的優越性。^[5-75]此一報告劉少奇大為欣賞，除指示譚震林擬寫中央批語，肯定此報告內容並同意批轉各地參考，也要鄧小平「將此件擬印發一月政治局會議各同志」。^[5-76]亦即交由1960年1月的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由於河北對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取得的成果，部分可歸因於鄧小平當初的耳提面命，鄧自樂於在中共高層間傳閱之。

為了打鐵趁熱並增加更多的政策說服力，鄧小平也到地方找尋城市人民公社的模範。河南鄭州早有試辦城市人民公社的經驗，該市管城區的紅旗人民公社更享有全國城市人民公社的「第一面紅旗」的稱號。^[5-77]鄧小平在1960年2月18日視察此一街道人民公社時，特別注意詢問其公共食堂實行的情況和內部資源調配記帳的問題。^[5-78]鄧小平來此，就是為了中共中央推行城市人民公社，鑒定可供參考的模式。因為鄧即聲稱：為了「讓大家儘快地富起來，要多想富起來的辦法」，「你們下邊要多想想辦法。我們這次來，主要是尋求如何發展經濟的辦法，尤其是城市」。^[5-79]受到鄧小平此行的肯定與鼓舞，中共河南省委在鄧參觀後的十天，亦即2月28日，就向中共中央報告城市人民公社鞏固和發展的情況，大加宣揚此一建制。有此範例為本，中共中央在3月9日作出〈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批示〉，指示應以積極的態度組織實驗和推廣城市人民公社。^[5-80]

2月18日晚上，鄧小平一行人要乘專列離開鄭州之前的最後一項視察內容，竟是「看了幾個河南省的紀錄片」。^[5-81]如果鄧小平欲以相關紀錄片作為了解河南運動實際情況的窗口，無疑是緣木求魚，甚至會遭其誤導。事實上，鄧小平視察河南的前後，「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遺症，特別是飢饉與餓死的情況，已在該省多處出現以至蔓延，吳芝圃竟還向中共中央以及其來人粉飾太平、禮讚「躍進」。顯然，鄧小平被蒙在鼓裏了。

視察安徽

鄧小平離開河南後，轉赴安徽，從2月19日停留至25日。主政安徽的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與柯慶施、李井泉以及吳芝圃，在「大躍進」運動中有四大「左狂」之稱。鄧小平與曾希聖個人交情匪淺，曾是鄧與妻子卓琳的婚姻介紹人。^[5-82]鄧小平在皖視察一週期間，曾希聖用心陪同參觀多處並詳加說明，鄧也對安徽各項工作給予肯定與鼓勵。

2月19日上午，鄧小平到達省會合肥，隨後參觀市容與規模甚大的省博物館。鄧在參觀省博物館時受到熱烈的歡迎，心情大好地表示：「聽說安徽出土的文物多，安徽的建設也搞得不錯。」^[5-83]20日，鄧到金寨縣參觀梅山水庫（詳細的情形，後面將會介紹）。折回合肥後，鄧在21日上午參觀合肥特殊鋼廠和小型化肥廠。由於曾希聖提出安徽在一年內要建100座產量800噸的化肥廠，因此鄧小平在參觀該省蜀山化肥廠時便有感而發地對彭真表示：「老曾是我們黨內難得的人才。他這個人魄力很大，他要搞100套，這個傢伙是有一套！」^[5-84]易言之，鄧小平就算不是為曾希聖所作所為背書，也為之開了綠燈。

2月21日下午，主持中共安徽省委書記處日常工作的桂林棲以及分管工業、農業的書記向鄧小平報告安徽工農業生產情況和整風問題。陪鄧聆聽匯報的楊尚昆的感想是：「安徽省的糧食情況較好，生活安排也較好，只棉花收購任務未完成。」^[5-85]鄧小平應有近似的感受。安徽省委對鄧小平報告的整風問題之中，包括對省委書記張愷帆的整肅事件。^[5-86]張愷帆在1959年7月初在安徽無為縣調查，發現當地幹部欺上瞞下，糧食存在嚴重問題。張當機立斷，緊急向民眾分發糧食外，更嚴令縣委立即執行「三還原」，包括：一、吃飯還原，也就是停辦公共食堂，讓農民回家吃飯；二、自留地還原；三、房屋還原，讓農民返家居住。^[5-87]張愷帆的相關舉措，不久即被正在參加廬山會議的曾希聖當作反面案例呈報毛澤東。毛在批判彭德懷的同時，也點名張愷帆是在省級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既然張愷帆已被最高領導人認定為「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張在安徽的上級、同僚對之自不會手軟。在鄧小平到安徽聆聽相關整風匯報時，張愷帆早已被逮捕囚禁，甚至朝「內奸」的方向被進行審查。鄧小平沒有替在四

川犯下類似「右傾」錯誤的堂弟鄧自力關說，自也不太可能對安徽受審中的張愷帆表示甚麼特別意見。但是他顯然對張敢於在「大躍進」第二年即主張解散公共食堂等作為留有深刻印象。因為在1970年代末，鄧還曾詢問當時主持安徽工作的萬里有關張的年紀，並表示：「這樣敢講真話的同志真正是不簡單，要用！」^[5-88]

2月22日，鄧小平參觀蜀山人民公社、江淮人民公社、合肥礦山機械廠等。鄧小平前來蜀山人民公社，乃因毛澤東在1959年10月28日曾來此參觀，甚感滿意，^[5-89]並向鄧推薦的結果。^[5-90]鄧面對的因而是一場演練多次、精心準備的接待。他對該公社的生產建設和發展規劃模型、沼氣用電甚感興趣，也對公共食堂剛開鍋的白米飯稱讚不已。鄧小平在1958年視察基層人民公社的指導重點，是公社領導權的掌握問題；兩年後在安徽的蜀山，他則著重於對公社組織構成的指導。鄧小平主張在公社機關原有的「三部一室」（組織部、宣傳部、武裝政法部和黨政辦公室）以外，另設一個專門負責領導生產、經濟的部門，並且「還要派得力幹部抓」，^[5-91]期以更能彰顯公社制度的生產機能。

鄧小平在23日上午參觀安徽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和安徽省農具改革展覽會，「晚間到曾希聖同志家中吃飯」。^[5-92]這餐是以曾為首的省委領導人自掏腰包集資請鄧小平一行「打牙祭」。^[5-93]鄧小平在安徽期間，由於接受特別豐盛的款待，還會欣慰地表示：「別處很困難，你們安徽不錯嘛，小康。」^[5-94]然而，安徽因農業減產與糧食高徵購（1959年的糧食徵購量佔糧食總產量的50.6%），在1959年冬季和翌年春季，即「不少地方出現了疾病、人口大量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嚴重情況」。^[5-95]在此期間，因為缺糧飢餓而發生的人相食（多數是吃屍體）的「特殊案件」，就高達上千件。^[5-96]換句話說，鄧小平在安徽視導、與其黨政高層飽食暢飲之際，該省某地可能正在上演這種慘絕人寰的悲劇。曾書記用蓋子將安徽實情摀得如此之緊，鄧總書記完全處於狀況之外。

2月24日上午，鄧小平離開省會北上，除赴淮南煤礦視察，他在皖北主要有兩個行程：一參觀水利工程，另一是重返「淮海戰役」戰場。

曾希聖在安徽推行的「大躍進」計劃中，大修水利是一項重要的內容，他也為此大出風頭。曾希聖很有心地向來皖的鄧小平大秀他這方面的政績與規劃：鄧小平到皖當天參觀省博覽館時，曾希聖就利用館內陳列的安徽水利規劃圖，向鄧說明該省水利工程的全貌；^[5-97]次日，曾希聖不顧往返「共300多公里」的路程，「整整坐了8小時的汽車」，^[5-98]親自引領鄧小平參觀皖西的重要水利工程——梅山水庫。梅山水庫坐落的金寨縣，鄧小平在1947年底轉戰大別山時曾旅經過，^[5-99]此次算故地重遊，但景觀已大為不同，因為梅山水庫與鄰近的響洪甸水庫工程的興建，是以淹沒金

寨縣的舊縣城與10萬畝良田為代價，鄧看了也感到有些所費不菲。^[5-100]

皖北是曾希聖推行水利工程的重地，包括：治理淮河與在淮北平原推行「河網化、水稻化」。也就是針對淮北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提出挖築交織成網的大小河道，以便在雨多時蓄水防洪澇，缺雨時澆地抗旱；並在供水穩定下，大面積地改種水稻以增產糧食。^[5-101]「大躍進」開始後，曾希聖雷厲風行地部署執行相關政策，1958、1959年投入的上工人數，每年都達300萬人以上。鄧小平此次安徽行既然會駐足皖北，曾也趁此機會拿出「壓箱絕活」獻寶。

2月24日，鄧小平到達蚌埠後，即被安排參觀淮河中游的大型水利樞紐工程——蚌埠閘，同行的楊尚昆在日記中就直接以「大河閘」形容之。^[5-102]為了表示支持之意，鄧小平執意登上大閘工地，慰問施工中的幹部與人員。當鄧聽聞工程完工後可將河水引送至兩岸平原，灌溉農地達1,100萬畝時，「臉上露出滿意的笑容」。^[5-103]2月25日，鄧小平到達宿縣後，參觀「三八人民公社」及當地紫蘆湖的河網化工程。^[5-104]「三八人民公社」及出身其中的全國勞動模範陳淑貞克服環境困難，努力治水、艱辛創業的故事，因為被拍成電影《三八河邊》而享譽全國。鄧小平跟陳淑貞高興地交談，^[5-105]他在參觀河網化工程時，也給予很好的評價。^[5-106]

鄧小平後來回到北京後，有否像推薦廣東湛江治水經驗一樣地推薦安徽淮北河網化工程，目前雖無資料可資說明，但他至少沒有對此水利工程提出質疑。因為繼鄧小平之後前來觀摩的官方人士仍絡繹不絕，也與他一樣作出好評。鄧參觀「三八人民公社」河網化工程後不到一個月，3月中旬，中共全國「人大」、「政協」代表組成的「安徽視察團」也到此一遊。其成員返京後在4月舉行的兩會會議上，對之讚不絕口，^[5-107]當中的所謂「台灣省代表」甚至還藉此比較、批評台灣1959年發生的「八七水災」，並強調：「請看看我們祖國大陸的大興水利、防澇抗旱而形成的災年豐收與台灣災民悲慘情況，這是多麼鮮明的對比呀！」^[5-108]《解放軍報》在3月下旬也對淮北的水利工程作一高度頌揚的報導，指出：「人民公社顯威風，千里淮北織銀河」、「河網化後換新裝，荒灘變成米糧倉」；文中所附的照片之一即是「三八人民公社」河網化工程鳥瞰下的全景。^[5-109]

鄧小平與這些「人大」代表、「政協」代表、軍方記者，若僅以其在「三八人民公社」所見，即類推整個淮北平原的實況，就犯有以管窺豹的錯誤。「三八人民公社」的河網化工程本身效益較為顯著，被曾希聖當作是反映皖北人定勝天的「樣板」。事實上，它也是「大躍進」第三年淮北平原上少數僅存的「亮點」，其所在的宿縣地區在1960年春就因缺糧而「大量出現浮腫病、乾瘦病，人口非正常死亡嚴重」，迫使當地政府採取

如撥發黃豆、白糖和部分油脂等緊急措施，以救護飢寒交迫的百姓。^[5-110]至於散佈淮北平原上的河網化工程，也因地方農村經濟與農民生活極端困難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在1960年陷入停頓、停建的狀態，留下一堆工程的爛攤子。^[5-111]

2月25日，鄧小平離開「三八人民公社」後，即前赴「淮海戰役」雙堆集遺址。^[5-112]鄧小平在中共建政前參與指揮的幾次重要軍事行動如「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渡江戰役」，都涉足安徽境內。鄧在這次訪皖期間，就不時「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曾希聖在這方面投其所好，或也想藉此分散鄧對現實問題的關注。

鄧小平在參觀省博物館時，曾希聖特意引導他去革命史展覽廳看一幅「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態勢圖」，這立刻引起鄧的興趣，他拿起助行的手杖指著地圖就開始詳述當年的戰事。鄧一開講，館內的人員即向之聚攏，閉氣凝神地聆聽，讓他講得過癮。^[5-113]幾天後（23日），鄧小平在參觀安徽大學時，還對隨同的桂林棲（其當年在「大別山堅持游擊戰爭、也參與了「渡江戰役」）憶及相關往事。^[5-114]

鄧小平25日到了雙堆集後，作為地陪的宿縣官員如此介紹：「這次鄧總書記來雙堆，主要是故地重遊，憑弔烈士，同時視察當年淮海戰區人民的生產和生活。」鄧小平在接見縣、公社領導人時，大談「當年勇」，強調他參與指揮的「淮海戰役」是「中外戰爭史上殲敵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說到激動處時，還振臂高呼：「不可一世的蔣家『王牌』軍終於覆滅在人民戰爭的海洋之中了」。然而，當話題回到當下「大躍進」的現實生活後，特別是該地糧食產量低、社員收入少的情況，鄧的興致自不若剛來時沉浸在「崢嶸歲月」中的盎然，只能空言慰勉幾句。^[5-115]

鄧小平接連巡視的河南、安徽兩省，其在「大躍進」中出現的慘劇，皆在此年雪上加霜、更形嚴重。在是年秋，河南信陽地區死亡百萬的慘案，終於紙包住不火，走漏消息，震驚中共中央。^[5-116]1960年安徽因運動致死的人數，曾希聖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以前，刻意隱瞞實情，在蓄意縮減統計結果後，竟還高達117萬多人！^[5-117]這個曾希聖動過手腳後的人命數字，就已是鄧小平洋洋自得的「淮海戰役」殲敵人數（55.5萬）的兩倍以上！^[5-118]在1960年2月風光過境、查訪兩地的鄧小平，對於吳芝圃、曾希聖的造假、欺瞞，竟都沒有感到異樣，對此，鄧恐難脫偏聽偏信的失察之責。

1960年2月下旬，鄧小平離開安徽後，便直驅山東。2月25日夜，鄧抵達濟南；一覺醒來，便在26日上午花了三個鐘頭，聽取省委「一把手」舒同報告該省生產和人民生活的情况，下午即離開。^[5-119]這個「孔孟思想」

的發源地，從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據不完全統計，「非正常死亡」即有65萬人，外流109萬人，其中也不乏人吃人的案件。^[5-120]鄧總書記若僅在短時內透過舒書記的口了解山東的情況，其對「齊魯之國」運動實況的掌握，絕不僅是隔層紗的問題，更可能有隔了幾重山的落差。

2月26日夜，鄧小平到達天津。隔日上午，鄧小平採取在山東的作法，撥出三小時聽取中共河北省委書記兼省長劉子厚報告該省生產和群眾生活的情況。下午，鄧所乘的專列離開天津，回到北京。^[5-121]

2月28日下午，鄧小平出席劉少奇主持召開的高層會議，介紹其在廣東、湖北、河南、安徽等地考察的情況和觀感。^[5-122]鄧小平這種流於表象觀察、走馬看花下所得的誤差資訊，經他匯集整理後，又成為中共中央判斷運動情勢、制定下一階段運動政策的重要參考。

第三節 編制過於冒進的「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

調整1960年的鋼鐵生產計劃

因為中共宣稱經過1958、1959年兩年經濟的大躍進，「二五」的主要指標已提前完成。中共領導人志得意滿，也開始研議如何統籌善用原屬於「二五」時間範圍內的1960、1961、1962年三年。鄧小平認可刊出的社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就指出：

在我們面前展開了一幅無限美好的遠景。我們已經用兩年時間完成了第二個五年計劃，爭取了三年的時間。時間，這對於抱有雄心大志、革命幹勁沖天的我國人民說來，是一個無價之寶。有了這三年的時間，我們就有了更多的主動，能夠辦更多的事情，使我國國民經濟到1962年（第二個五年計劃最末一年）攀上一個更高的水準。這樣，我們就能更好地實現整個六十年代連續躍進的遠大目標。^[5-123]

鄧小平除了從1959年秋起領導中央書記處（特別是李富春）主持制定1960年國民經濟的年度計劃，並於1960年1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基本確定了1960年對外公佈的年度計劃（第一本賬），他同時也開始參與討論所謂「二五」後三年的補充計劃，甚至結合「三五」一併籌劃八年的計劃。^[5-124]

由於1960年是「二五」後三年的頭一年，也是三年補充計劃可否成形的基礎與關鍵。中共在1960年上半年對1960年內部經濟計劃（主要是第二本賬）的修改，直接影響了整個「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的編修。事實上，鄧小平經常將兩者一併考慮與規劃，以使之既有現實性（符合1960年

當年需要）、也有前瞻性（能準確地涵蓋到「二五」的尾聲）。以下首先側重說明鄧小平參與下的1960年內部經濟計劃的變化情形。

上海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後不久，2月14日，李富春在廣州約集中央工業、交通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座談經濟計劃問題，最後提出：「今年計劃超額完成是肯定的」，「1960年努一把力，鋼產量有可能搞到2,100萬噸」。相關座談的紀要為毛澤東所注意，感到「有些意思」，除了轉發軍中各元帥讀閱，^[5-125]更在26日批示：在1960年「爭取2,200萬噸鋼」。^[5-126]

李富春這麼有運動幹勁，膽敢一人單方面更動上海會議對鋼鐵內部指標的原議，進而促使毛澤東下決心加碼？若是如此，他又將中央書記處的上級領導、主導制定相關計劃的鄧小平置於何地？李富春恐不敢大膽妄為至此。因為同樣在1960年2月，石油工業部部長余秋里在6日寫信給李富春，表示該部準備在東北松遼盆地組織石油「會戰」的構想（其成果即是後來聲名大噪的大慶油田），並請求國家增加投資、設備、器材和勞動力。李富春見信後對余秋里說：「各部門都在下馬（縮減投資計劃），而你們卻要上馬，這是個大動作，要給中央書記處寫報告。」亦即李自身縱使是主管計劃工作的書記，也無法自行決定。數日後，余秋里直接向鄧小平匯報，鄧當即表示同意。在鄧小平的許可下，中共中央在同月20日發文給相關部門，通令支持石油部。國家經委最後同意提供鋼材3.8萬噸。^[5-127]此事涉及近4萬噸的鋼材，李富春尚不敢自作主張、貿然定案。李富春在同月14日帶領工業、交通部門領導人抬高1960年鋼產的期成指標近100萬噸（若按照陳雲在1959年計算鋼產量時的算法：1噸鋼最後可成0.7噸鋼材。相關新增鋼產數最後可成70萬噸鋼材），李如未經鄧小平的同意或默許，實教人難以置信。

無論如何，上海1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1960年鋼產所提的「第二本賬」——「爭取2,000萬噸或者還稍多一點」，就這樣被破功；毛澤東在興致所至下提的「爭取2,200萬噸鋼」，即成為鄧小平在調整1960年相關生產計劃時，必須考慮在內、嘗試納入的指標。

如同「大躍進」的前兩年，鄧小平特別注意鋼鐵生產的情形，例如：2月29日上午，他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聆聽薄一波報告以鋼鐵生產為中心的工業生產問題。^[5-128]如此一方面可以督促黨官僚煉鋼的進度；另一方面，可以從中了解是否可以有將指標再向上推移的可行性。

鄧小平在3月份積極配合毛澤東，繼續推進「大躍進」運動的發展。譬如：他協助發佈積極發展公共食堂的政策指示，其中勒令將去年5月發還社員的自留地，又轉交給食堂；^[5-129]密集參觀北京、天津地區的工廠，^[5-130]推行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這種以群眾運動方式開展的技術改造，事

後顯示常流於形式主義與浮誇)。鄧小平在視察中也對有關生產下達求多、求快的指示：他在汽車製造廠，鼓勵職工「為祖國生產更多的汽車」；在合成纖維實驗廠，指示「要在國慶節前，把樣板車間建成投產」。^[5-131]鄧這種鼓勵、甚而催促生產的心情，不久也表現在對鋼鐵生產上。

4月11日至24日，中共召開了省、市、自治區黨委工業書記會議，主要討論如何安排本年的工業生產（尤其是鋼鐵）。鄧小平對此會甚為關注，並適時對煉鋼的積極分子加以嘉獎與聲援。為響應毛澤東在2月下旬提出的煉鋼新設想，冶金部向中共中央提出1960年鋼產量三本賬的計劃（1,840萬噸，2,040萬噸，2,200萬噸）。4月14日，在各地工業書記群聚北京商議如何落實工業生產與增產之機，中共中央不失時機地同意並批轉了此一三本賬的政策倡議，^[5-132]對值在進行的工業書記會議，猶如注射了一劑強心針。參與中央領導、也常代表中央議決的鄧小平會同意此案，也是可以預期的。3月25日，他在著重討論「大躍進」政策問題的天津會議上，^[5-133]即會當面聽聞毛澤東感嘆中國因可用鋼材少而被外國輕視。^[5-134]無論是滿足領袖心願或遂行多鋼強國之夢，鄧皆會樂意為之。薄一波後來對此回憶：

5月30日，黨中央正式批准了這一計劃，決定確保完成第二本賬，爭取實現第三本賬，並以此為標準來安排和檢查工作。鋼產量一變，沖亂了整個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在全國又掀起了保鋼、保煤、保運輸的「躍進」高潮，從而使經濟生活發生了更大的危機。^[5-135]

此次省、市、自治區黨委工業書記會議結束的前一日，即4月23日上午，鄧小平應薄一波的請求，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此一會議的情況。^[5-136]鄧領導的書記處會議可能也對工業書記會議最後要通過的總結決議加以討論與審定，亦即〈關於當前工業交通戰線上的十個問題——省、市、區黨委工業書記會議紀要〉。其內容如同前兩年大煉鋼鐵的作法一樣，按月對鋼的平均日產量提出要求：5月份要達5.5至6萬噸，6月份要達到6萬噸以上；也強調「小土群」、「小洋群」在限期完成鋼產指標上的重要角色與作用。為了加強此〈會議紀要〉對各級黨委、黨幹的權威性與拘束力，中共中央在4月29日將之批准並轉發各協作區委員會、省一級黨委、中央一級各部委、黨組，嚴肅要求後者遵照辦理。^[5-137]之後，薄一波也注意寫信報告鄧小平鋼鐵生產的安排情形。^[5-138]

主持編制「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

鄧小平在調整1960年的內部鋼產指標的同時，也以之為基準地頻繁過問「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的制定工作。3月23日上午，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和討論國家計委黨組所提的關於「二五」後三年補充

計劃的「匯報提綱」。下午，繼續開會，專門聽取冶金部部長王鶴壽報告鋼鐵工業今後三年建設的設想。^[5-139]由此可想見「二五」後三年計劃必也是深具「以鋼為綱」、鋼鐵掛帥的傾向。4月2日下午，鄧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國家計委黨組進一步提出的〈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1960–1962年）補充計劃要點（草稿）〉。因相關計劃經過幾番討論，已有雛形，鄧在4日夜將之提交中央政治局會議加以討論。^[5-140]

鄧小平在主持制定「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的4、5月，常為糧食、物資問題所擾，這些棘手的現實問題，可能多少促之在規劃相關計劃時，態度上稍為冷靜一些。

如前所述，在鄧小平的提議下，中共中央在2月21日成立糧食調運指揮部，以統一解決春荒的糧食問題，鄧也緊盯相關問題的後續發展。^[5-141]然而，令鄧吃驚不小的是，農村的春荒問題尚無獲得適當解決，主要城市的供糧問題居然也出現急情。4月12日上午，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有關會議的內容，鄧小平的官方年譜僅表示：「討論棉花、棉紗、棉布、針織品等生產分配問題及今後50天糧食安排問題。周恩來參加會議。」^[5-142]然而，會中討論的「今後50天糧食安排問題」，或可從同日中共中央批轉的糧食部黨組〈關於目前糧油調撥和銷售情況的報告〉略為探知。其指出：3月份糧食調撥計劃實際完成的比例不及76%。其中調至北京、天津、上海的糧食，僅佔三市平時每月糧食銷量的48%，調入工業大省遼寧的糧量，更只佔其月需量的33%，如此使得此三市一省在3月底的存量較上年同期大為減少。進入第二季度到農忙季節，調運糧食任務更重。各地所提可調出的糧食量，也只達出口和需要調入之糧食量的80%。^[5-143]李先念指出：「目前糧食工作正面臨著青黃不接的50天（有的地方只一個月），這是保證春耕生產順利進行和繼續穩定糧食局勢的緊要時期。」李建議的辦法是開展糧食調運突擊運動，^[5-144]實質上就是打農民的主意、強挖他們的口糧。

除了糧食窘迫的問題，鄧小平要儘快設法處理的還有棉布供應短缺的問題。有點兒讓鄧小平傷腦筋的是，在1月由他本人審定後刊出的社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才說「棉花的產量也完成了原定1962年的指標，達到4,820萬擔」。^[5-145]譚震林4月6日提交二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的〈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高聲讚揚以「一大二公」為特色的人民公社制度，並為農業「大躍進」取得各方面的成就自豪不已，亦稱1958、1959年「棉花兩年增長47%」，也為未來滿懷信心。^[5-146]這篇報告也是由鄧要求重寫、再次審閱後方得以面世的。^[5-147]但現實生活上竟出現棉布不足、必須縮減用量的情況。鄧小平只能在4月19日指示主管部門商業部，要對民眾進行「深入的解釋」。^[5-148]或正因此起彼落的糧食、物資

的短缺問題，鄧小平在5月上旬特別著重農業生產與農村工作的政策指導。^[5-149]

在5月中、下旬，李富春與國家計委負責編寫的「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已有了更詳細的構想，鄧小平頻頻開會對之作進一步的審定與指導。鄧在此一討論中常扮演引導降溫的角色。這既與他眼見很多現實問題正在浮出相關，也同毛澤東提出要冷靜思慮此一計劃有關。

5月12日、13日，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李富春針對「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所作的匯報。鄧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意見：「毛主席強調了兩個問題，一是勞逸結合，二是勸大家慢一些，主要是水利工程。我們各部門工作要冷熱結合。作計劃第一要考慮發展快的問題，但還要照顧佈局。佈局不好，現在發展快，將來不會快，總有一天要擋事。」
「現在的計劃已經很大了，要注意是不是計劃安排緊了，而不是指標訂少了。」^[5-150]5月25日上午，鄧針對「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也發表「寧肯稍微慢些，也要把佈局佈好，留有餘地。佈局不只是戰局問題，還有長遠發展的問題」的意見。^[5-151]

5月底，鄧小平接連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為李富春、國家計委所提的〈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後三年補充計劃建議的報告〉作最後的敲定。鄧在28日指示：「各項指標，按確有把握的再打9折。」^[5-152]李富春急忙將〈報告〉修改後，30日再提交中央書記處會議審定。鄧認為〈報告〉雖仍有不足之處，但內容大體可行，故同意將之原則通過，^[5-153]並交付6月中旬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研究與討論。

這個全程由鄧小平監製主導、李富春（及其國家計委）具體編制的「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其預定對外公佈的版本是：到了1962年，鋼產量是3,100萬至3,300萬噸，糧產量達6,600億斤；對內部的版本則是：時至1962年，鋼產量3,600萬至3,800萬噸、糧產量6,600億至7,000億斤。^[5-154]究其實質，仍是一紙雄心不減的發展計劃。

從前述的計劃制定過程中，雖然可見鄧小平經常提醒李富春：「要注意是不是計劃安排緊了」、「是不是太滿」、「寧肯稍微慢些」，甚至還要求李「按確有把握的再打9折」；但是扮演「警鐘」角色、熱中有冷的鄧小平，其自己仍是「大躍進」的主張者，也相信只要努力得法，「大躍進」的宏偉計劃仍大有可為。這可從鄧在4月中、下旬支持將1960年內部鋼產指標再加碼一事上看出。「二五」後三年計劃乃以1960年計劃為基礎，1960年計劃起點不低，「二五」後三年計劃的規劃勢必走高；就算鄧確有心壓減後者，也是在已過分飆高的指標上進行壓減的工作，其結果不免仍是一個超乎可能性的目標。

另外，鄧小平雖然已發現經濟出現不少問題，並將之作為制定相關計劃時的重要參考因素，但是他對經濟問題的規模程度與深層原因，仍然所知有限。在此背景下所訂出的經濟規劃，當然仍遠遠不切實際。例如：對於糧食窘迫與浮腫病問題，鄧小平確已注意，甚至指示將相關情況加以匯整，以便在6月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同有關地方的領導人進行研究、吸取教訓。但是他對問題成因的認識，也沒有真正地到位。鄧小平在5月25日的中央書記會議上表示：「糧食問題原因何在？肯定有相當大的虛報，工作不謹慎，多吃糧。浮腫同勞動強度有密切關係。」^[5-155]

但是若仔細推敲，鄧小平的相關論斷存有不少可議之處。運動中的糧食問題的確部分肇因於虛報與「多吃糧」，但是鄧所認為的「虛報」的程度有多少？他確切掌握了嗎？他可知中共在運動頭兩年高估產量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徵糧，有多少早已是徵過頭糧？農村又有多少地方的困境，真的只是因為幹部管理不善，不能量入為出而多吃了糧？浮腫病主要是勞力安排不當、過勞所致？抑或更多是缺糧餓肚的關係？此外，農村在1958、1959年折騰兩年後，鄧再冀望1960年到1962年農業連三年繼續「大躍進」，達到甚而突破6,600億斤的目標，事後看來，更簡直是痴人說夢。

首先指出鄧小平監製而成的「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存在華而不實的問題的人，還是毛澤東。

毛澤東調降「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

6月8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討論「二五」後三年的補充計劃。會議的指導思想反映在毛澤東撰寫的〈十年總結〉一文。該文雖然遲至會議的最後一日清晨才寫出，但在會議期間，毛即以其精神指揮會議的發展與走向了。

毛澤東對「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的內容不甚滿意，他在〈十年總結〉中即批評：「1960年6月上海會議規定後三年的指標，仍然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就是對於留有餘地，對於藏一手，對於實際可能性，還要打一個大大的折扣，當事人還不懂得。」^[5-156]然而，作為「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的一名主要「當事人」的鄧小平，在會議初期還自認比較冷靜，呼籲「領導者頭腦要熱，但是更要冷」，並自況對於相關計劃的看法是「右傾主義」的。^[5-157]只不過，毛這次在上海比鄧還「要冷」、「右傾」。

毛澤東對會議的作法，就是先統一政治局常委會的思想，接著要鄧小平在內的其他中央常委前去齊一政治局會議成員的想法，然後自己再親自出馬，以為重新研議「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創造輿論條件。具體的情況可見：6月13日下午，毛澤東召集常委開會，討論「二五」後三年的補充

計劃等問題。^[5-158]毛甚有可能在此會上指示要調整相關計劃，因為在次日上午主談計劃問題的座談會上，「少奇、小平、恩來講話，提出降低盤子問題」，也就是降低計劃指標。在鄧小平等人的先行「暖場」下，毛在當日下午的大會上，「對計劃工作發表意見」。^[5-159]他講話的中心內容就是「降低計劃指標，把質量問題提到第一位」。^[5-160]

根據毛澤東要降低計劃指標的意向，李富春趕忙綜合各協作區的調整意見，據以修改「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經過鄧小平的過目與把關後，^[5-161]相關計劃的修改稿在17日提交大會討論。對此，楊尚昆的日記記載：「下午開大會，討論計委的新方案（是根據主席指示壓縮了的）。」^[5-162]經由前述的過程，「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內的14項指標，被「作了較大幅度的調整」。^[5-163]對於會議後來呈現的壓低指標的趨勢，鄧小平即以「我們這幾天都是搞的改良主義」作概括。^[5-164]

6月18日，毛澤東在閉幕會仍對新擬的「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表示：「這個調整方案還得調整」；並強調要「盲目性少一點，自覺性多一點，被動少一點，主動多一點，不要喪失主動權」，也自我嘲解「當了這麼多年解放軍，結果自己又沒解放」。^[5-165]

鄧小平在同一會上發言指出：

這個會議最大的收穫，就是主席的〈十年總結〉。它不僅管今年、明年，是要一直管下去的。錯誤不可能不犯，問題是善於總結教訓。我們大家要學毛主席，到一個階段總結一次。十年總結是全面的（當然以後還會有發展），是提到認識論和思想方法的高度來總結教訓，只從糧、鋼的具體數字來認識問題是不夠的。我們幹部還有一個心理狀態，就是對項目明知有困難，但是嘴上不說，一定要爭到手；從局部著想，明明知道不可能，卻說可能。這是對貫徹總路線這樣嚴肅事情的庸俗理解和處理。直到今天，相當多的中央部的領導同志、相當一部分的省市同志沒有轉過來。中央的同志更是責任所在，主席進行自我批評，我們也要進行自我批評。^[5-166]

鄧小平大為盛讚的〈十年總結〉，中共官方史家後來承認：「有很大的歷史侷限性，它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肯定對彭德懷的錯誤批評，表明對『左』的指導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從根本上認識。」^[5-167]這可反映鄧小平當時對運動本身的認識，猶是唯毛澤東所言為是而相機擺動的程度。至於鄧所稱的根據〈十年總結〉的指示與啟發，應作自我批評一事，則要等到會議結束、返回北京後。

6月23日上午，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著重講留有餘地，爭取主動」的精神。鄧繼而自承按照毛澤東〈十年總結〉的精神，他參與制定、提交上海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原「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是大有問題的：

在上海會議上，主席〈十年總結〉不拘於枝節，從思想方法上統一了大家的認識。這次主席講他交心了，我們也要交心。一是好多問題沒察覺，二是察覺了沒解決，一直到這次計劃，糧食6,000億斤，鋼鐵3,600至3,800萬噸，明知有困難，還是提出了。[5-168]

可惜的是，鄧小平與其他中共領導人在上海出現的較為冷靜的思考與壓降計劃指標的相關努力，未幾即因中蘇兩黨關係的急遽變化而無法堅持。

第四節 為黨「爭氣」，煉鋼壓倒一切

在1960年下半年，鄧小平的主要精力與注意力，轉移至中蘇關係問題上（請參閱第六章）。但是由於國內政策與對外政策之間的連結（linkage）關係，由毛澤東主導、鄧小平從旁襄助的中共對蘇政策與立場，又反過來對國內「大躍進」運動本身產生加溫的作用。

6月下旬在羅馬尼亞舉行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中共代表團遭到蘇共代表團有組織的圍攻，「大躍進」也被數落得一無是處，鄧小平與其他中共黨人一樣對蘇共的作法感到憤慨。6月30日，鄧小平對來自拉丁美洲的「兄弟黨」人士不滿地表示：「我們搞小高爐也挨罵，說是『不符合社會主義建設原則』。」鄧進而大講小高爐的好處，說這是1958年以來中國「鋼鐵大發展」的「秘密」，並認為其大有璀璨的前途。他最後強調：

我們說這辦法在中國是適合的，沒有犯罪吧！你們看違背了馬列主義原則沒有？我們認為，鑒別社會主義搞得正確與否就看是不是找到了最妥善的辦法消滅階級，並且用最快速度進行建設？如果是的，就應該贊成，應該認為是好的，不應該認為不對。[5-169]

鄧小平與毛澤東一致，並不止於憤怒，而是進一步思慮如何運用此一被蘇聯激起的「民氣」。7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說：「國際反華浪潮是包括蘇聯，它搞反華統一戰線。毛主席講，反華就是把我們的勁鼓起來了。革命是有氣幹出來的。」[5-170]這預示了中共將把其在國外所遭受之氣，轉化成推促國內建設的一股幹勁，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將之變為推進1960年度下半年「大躍進」計劃的新動力。

7月中旬，中共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中蘇關係又進一步地惡化。蘇聯突然決定召回在中國大陸工作的蘇籍專家，並廢除200多項關於科技合作的協定。如此更是燃起中共領導人要與蘇聯較勁的鬥志，全心寄望國家的實力能經由「大躍進」運動的拼搏而在短時內有突飛猛進的成長，以增加未來與蘇抗衡的籌碼。

首先，中共領袖自然而然地又想從「船堅炮利」的關鍵基礎——鋼鐵生產著手。7月中旬，毛澤東對李富春、薄一波說：

辦鋼鐵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浙江的情況只有4個鋼鐵廠，小洋群不夠。各省都要佈置一批小洋鋼鐵廠、小洋鐵路。今冬可能動員7,000萬人來幹。1962年搞到3,500萬噸，可能更多一些，今年可能搞到2,200萬噸，如果今年有2,200萬噸，後年可能達到3,800萬噸。第二個10年可能搞到1億噸。

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在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要繼續躍進，不僅資本主義國家看不起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也不給技術，憋一口氣有好處。10年搞1億噸，上天。[5-171]

從毛澤東的談話中可見，其不但認為1960年的鋼產可能達到該年度的「第三本賬」，也就是2,200萬噸，更希望到了1962年，鋼產能達3,500至3,800萬噸。相關數字實根本無異於鄧小平監製、提交上海6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原「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的規劃指標。毛對於自己甫於一個月之前寫成的〈十年總結〉，似已不當一回事。對〈十年總結〉曾讚揚不已的鄧小平，此時恐也無啥興致再對之回味，因為煉「爭氣鋼」直是鄧須優先張羅的要務。

其次，同樣與蘇聯因素相關，中共領導人在這次會議上也提出希望能在運動中增加出口額，以償還對蘇聯的貿易欠債。

中共在從事「大躍進」運動中，為了推進、擴大經濟建設，積極地向國外（尤其是蘇聯、東歐）採購石油、石油產品、機器設備，付款的主要方式就是大量出口糧、油、肉、蛋、豆類、煙草等農產品，亦即主要由農村「買單」。[5-172]出口的相關事宜，鄧小平抓得非常緊。1959年初，鄧小平對各地領導人講：「保證出口」，「這是政治經濟大事」。[5-173]「出口情況不好（包括港澳），欠賬多。今年共計劃力求保證79億人民幣的出口任務。關鍵是油、糧、豬肉、品種、時間問題。58年總額完成，但品種差得很遠，全國每人一年少吃4個蛋、1斤肉、1斤油、12斤糧，問題就可以解決。」真正要縮衣節食的對象，鄧也說得明白：「農村每人不可吃得太太多，伙食控制在3、5元之間」，「擠出一點東西出口和供應城市」。[5-174]

針對鄧小平所作的人民少吃蛋以供出口的指示，李先念在1959年4月即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對各省表示：「蛋的分配，80%出口，20%內銷，內銷中第一是滿足外國人，第二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不吃雞蛋，工農聯盟、工農都不吃雞蛋。要採取斷然措施來解決出口問題。」[5-175]

對蘇聯的貿易是中國大陸對外貿易中的大宗交易，其中，又以農產品作為中國對蘇的主要出口項目。只是因為相關農產品的計劃收購情形一直不佳，到了1960年中，中共對蘇貿易欠債金額已累積達到25億盧布。在兩黨、兩國怒目相對之時，自中共領導人（包括鄧小平）看來，貿易欠債於蘇，實有損黨國顏面，故決定加速還清。當糧食及副食品的收購與出口被附上了「對外鬥爭」的政治意義後，其重要性也就非同小可了。

在此同時，就中國大陸國內需要而言，糧食也是一迫在眉睫的問題。1960年的第一、第二季度，糧食急情不斷，直接負責相關工作的李先念常為此感到焦頭爛額，其直屬上級鄧小平在經手處理的過程中也知悉其嚴重性。^[5-176]進入第三季度以後，糧食問題未見舒緩，依舊嚴重。

李先念在7月就三次向中共中央報告糧食供應所存在的危急情況。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7月25日，李先念將〈關於緊急調運糧食的報告〉報送鄧小平、毛澤東。其內容為：「今年5月份以來，京、津、滬、遼糧食庫存極少，面臨脫銷危險，不斷告急，現在已經到了不可終日的地步。」

「據糧食部報告，7月22日，北京市區庫存糧食銷不到4天，上海只夠銷6天，天津只夠銷17、8天，遼寧20日庫存糧食銷不到10天，吉林19日糧食庫存只夠銷17天。」李在報告中表示：6月份全國糧食計劃調運21億斤，只完成14億多斤；7月份計劃調運20億斤，22天只完成8億7千多萬斤。各地沒有完全把糧食運輸放在整個運輸的第一位。李建議有關省區緊急動員，按時完成糧食調運任務。鄧小平當日閱後即批示：「此件印發出席會議各同志。請應調出糧食的各省負責同志，馬上打電話回去，督促和檢查一下。」^[5-177]7月26日，周恩來主持、鄧小平一旁坐鎮的中央工作會議全體會議，即專門討論糧食問題。^[5-178]

綜上所述，「憋一口氣」煉「爭氣鋼」和加緊糧食生產與收購以滿足出口還債以及國內消費需要，即成為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向全黨、全國提出的運動任務。運動的具體部署者鄧小平對此自是責無旁貸。

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一方面，討論並具體佈建1960年下半年的生產、基建、農業等問題；^[5-179]另一方面，討論、制定相關的運動政策文件，例如：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中共中央〈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中共中央〈關於向黨員幹部介紹布加勒斯特會議和中蘇關係的通知〉，^[5-180]以作為黨各級官僚與幹部執行運動時可依循的書面指示。

鄧小平主持討論、制定的相關文件內容，乃根據此次北戴河會議的精神，結合現實情況所提出的具操作性的執行方案與辦法。例如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強調：「對蘇聯和東歐兄弟國家的貿易欠賬務必做到今年少欠、明年基本還清。這不僅僅是一個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問題，而且是關係到我國在國際上的聲譽，關係到我們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及其追隨者進行鬥爭的問題。」其也提出從中央到地方組建對外貿易指揮部的基本人事構想，以及具體完成1960年出口任務的四項工作方針。^[5-181]中共中央〈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要求做好九方面的工

作，以完成「糧鋼的增產問題」。其也指出：「帝國主義、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及其追隨者對我們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污蔑、攻擊和阻撓，只能激起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使全黨全民鼓起更大的自力更生、發奮圖強的革命幹勁，創造出更加偉大的成績。」^[5-182]兩份文件中皆提到的「現代修正主義者及其追隨者」，指的即是讓中共領導人氣得跳腳的蘇共。

相關中央文件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也確可反映，甚至看作是鄧小平的意見。這可從8月10日北戴河中共中央工作會議結束的當天，鄧小平在會上的講話內容得到印證。他就以蘇共睥睨中共、從外施壓為由，號召黨人為「大躍進」奮戰不懈：

對赫魯曉夫，我們有兩個辦法，一個辦法是照他的辦，跟著他搞修正主義；一個辦法是頂住，堅持原則，即使只剩下我們一家，也堅持到底。因為孤立的不是我們。歷史的發展不是跟他走的，他的指揮棒越來越不靈了。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就不靈了。阿爾巴尼亞就不跟他走，英勇得很，這麼一個小國硬是頂住了龐然大國的赫魯曉夫。我們黨堅持原則是正確的，也只有我們黨有力量堅持，我們不堅持就不得了。我們黨在國內實行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沒有一件是赫魯曉夫同意的。如果我們聽他的，承認錯誤，那我們現在就要下台。^[5-183]

鄧小平講話中所提的蘇共不認同「我們黨在國內實行的一系列路線、方針、政策」，主要就是指「大躍進」及相關的具體政策。

鄧小平也重申加緊出口還債的政治意義，以及化蘇共壓力為運動助力的「政治哲學」：

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是有信心的。儘管現在面臨著很緊張的局面，但是這些都是局部性的、暫時的問題。我們國內的事情搞好了，我們反對修正主義鬥爭的腰桿子就粗了。其他兄弟黨也不會給赫魯曉夫幫甚麼忙的，對我們的影響也不會大。我們要做最困難的準備，這樣有好處，要加緊工作。要從現在起用一年的時間緩過氣來，要下決心明年出口20億盧布來還債。要硬著頭皮頂著，從各方面擠，努力儘快把債還清。這是政治問題。事實上是可以擠出來的，留點尾巴也沒甚麼關係。現在大家情緒很高，都要勒緊腰帶還債。大家對蘇共這種做法義憤填膺，這就產生幹勁，就可以想各種辦法來渡過這個難關。我們一定要把工作做紮實，從今以後要堅決反對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在今後一年內要把困難估夠，把幹勁鼓足，共赴國難。^[5-184]

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結束後，鄧小平將其大部分的精力、才智耗費在與蘇共領導人的鬥智鬥勇、唇槍舌戰之上。但是鄧對煉「爭氣鋼」仍掛心不已，因為其深知相關鋼鐵指標若「跳票」，定會影響自己與蘇方代表對罵時的「底氣」。在北戴河會議上，中共中央提出「為2,000萬噸鋼而奮鬥」。^[5-185]但由於作為鋼鐵重要生產基地的東北發生水災，9月7日，中共中央將鋼產指標稍降為1,900萬至1,950萬噸，並號召「工業交通戰線上的全體同志必須緊急動員起來」，為之而奮鬥。10月8日，中央書記處發出狠抓鋼鐵生產的通知。^[5-186]

10月10日，在莫斯科談判的鄧小平還不忘敕令李富春主持中央書記處

會議，召集冶金部、煤炭部、鐵道部領導人討論實踐鋼鐵指標問題。據與會者回憶，「會議氣氛非常緊張」，連舉止向以溫和著稱的周恩來在會上都大發雷霆，要求有關部會一定要完成任務。^[5-187]12月3日，中共中央還發出〈關於保鋼問題的緊急指示〉，要求12月份鋼的平均日產量確保6.2萬噸，爭取達到6.3萬噸。^[5-188]

這種全心全力的保鋼，不但大損鋼鐵產業的元氣，^[5-189]更嚴重的是，其造成1960年經濟發展比例的益加失衡和對農業生產的強力擠壓。鄧小平在半年後即感到後悔。1961年5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坦承：「去年搞了1,840萬噸鋼，雖然影響了其他方面，但當時正在反對國際上的修正主義，大家很高興。現在回頭想一想，還是得不償失。去年為了保鋼鐵，鋼鐵勉強上去，其他都上不去，還擠了農業、輕工業，把必要的市場供應也擠了。」^[5-190]另外，1960年後半年為了提前還債以保全黨國面子的作法，使得當饑荒在中國大陸大幅蔓延、最為嚴重之際，卻出現加緊糧食輸出的異常現象。^[5-191]這是否也「得不償失」？是否又是「贏了面子，輸了裏子」？

小 結

儘管全國幹部和人民的疲於奔命，1960年底，「大躍進」運動欲振乏力，遑論形成另一個高潮，而它造成的混亂、危害與負面效應，更一一浮現，最可怕的是帶來前所未見的饑荒。^[5-192]為了因應全國性的饑饉危機，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只能壓減人民的用糧，要求百姓使用「瓜菜代」，尋找、食用「代食品」充飢。^[5-193]毛澤東、鄧小平等中共高幹在饑荒危機中仍有一般大眾所無的「特需供應」，但是這種食物供應為數不多，也未及妻孥，家裏食指浩繁的鄧小平不忍獨享，讓全家分食，共體時艱。^[5-194]

當時楊尚昆、張愛萍彼此會將分配給自己的「特供」米飯，招待對方登門造訪的公子，鄧小平見到張的兒子可享一碗白米飯，還說了一句：「還不放開肚皮吃！」^[5-195]1958年中共才對人民提出「放開肚皮吃飽飯」的政治口號；沒多久以後，有碗米飯吃，就是了不得的人間佳餚。在尋常百姓家，哪可能看到白米飯。

當糧食不能維持所有人的最低生存時，中共中央只能有所棄保，於是選擇「壓農村、保城市」。其邏輯是，城市供糧直接關乎該處工業的正常運行，再說，城市較受外界關注，若有人缺糧餓死，易走漏風聲，成為批評中共的證據。鄧小平除多次提出這種想法外，^[5-196]更親自執行此一政策。1960年代初，鄧小平曾專程前往成都宣達中共中央要四川調糧救急的

命令。鄧對送行的李井泉表示：「井泉啊！不要送了，糧食還得調，如果北京、上海死人，國際影響就大了，目前，只有我們四川做出犧牲了！」^[5-197]鄧的指示傳開後，四川萬縣地委書記燕漢民將之準確地闡釋為：「人死在山溝裏總比死在王府井大街上強。」^[5-198]

「大躍進」運動期間及其後（中共官方慣稱1959年至1961年為所謂「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主要是餓死）的人數，多達3,600萬。^[5-199]這在中國歷史上，甚至是全人類歷史上，都是史無前例的慘劇。對此，毛澤東個人的作用和責任，自是無可規避與抵賴；但是毛以下中共要人的角色和作為，也有必要加以釐清與分析。因為毛澤東雖然是「大躍進」的始作俑者，但若無他人群策群力、鼎力相助，毛縱有「雄才大略」，也難成事。

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在「大躍進」運動中的作為與角色，並不似中國大陸通行出版物所描述的消極對待、位處邊緣。在毛澤東振臂高呼之下，鄧小平熱烈擁抱「大躍進」的構想與主張，毛也託付鄧在運動中行使大權，助其遂行「敢叫日月換新天」的高速創舉。「大躍進」運動所衍生的問題與是非，鄧小平自與之難以劃清。事實上，鄧曾在1961年、1962年中共中央的多次會議上，為此進行自我批評與檢討。綜合第四章與本章正文的討論，以及目前所能得到的零散、片段的鄧小平的相關檢討內容，可對鄧小平在「大躍進」中的重要地位與突出責任做一論斷。

第一、在運動決策倡議方面：

毫無疑問，「大躍進」的主要方向（運動的發動、推展、糾「左」、再掀運動的高峰）由毛澤東親掌，其他人不敢披其逆鱗；但鄧小平對運動的重要決策也全部參與、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一方面，毛澤東在1958年初批判「反冒進」，直接宣洩對主持經濟工作的周恩來、陳雲的不滿，更擴充鄧小平的權力，使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主宰國務院。關於經濟「大躍進」，鄧小平的發言權超乎周、陳。毛在1959年春稱鄧為「副帥」，可說追加認定、實至名歸而已。另一方面，鄧小平在參與運動決策討論時，負責事先準備有關資訊與擬議方案。毛在內的其他中央常委以鄧篩選的資訊與擬好的方案為基礎，進行思索與決定。

然而，處於重要決策位置的鄧小平，對各方呈報的訊息與意見，核實不力、思考未清，即據以提出看法並供上層參酌。1961年3月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就坦承有此問題：

主席對我們的批評是中肯的、必要的。在我個人來說，在書記處來說，日常工作做得不算很壞，但是在重大的決定方面出的好主意不算很多，主要是缺乏調查，調查研究不夠，材料的來源主要是看報告。因此，出的主意、一些意見很難有把握。作為主席、常委、政治局的助手，這一方面工作是做得不好的。^[5-200]

鄧也具體指出：「大躍進」的方針政策「如鋼鐵的第二本帳，糧食數量、公社規模等，我們都參加了意見，贊成了的」。^[5-201]

第二、在運動計劃制定方面：

中共中央（毛澤東領導、鄧小平參與）做出運動的決策後，鄧小平負責「具體部署」，亦即主持制定運動的具體生產計劃。他通常以中央書記處會議為平台，召集黨政部門與地方領導人就計劃內容（包括：生產潛能估計、指標任務分配、人力物資調配）反覆進行研商；並根據層峰心意的變化與政治空氣的流向調整計劃。

在研擬運動計劃的過程中，鄧小平主要是配合、順迎毛澤東的意向，例如：1959年的鋼鐵計劃被過分抬高（鄧當初也加入哄抬的行列），在毛表露出狐疑不信後，鄧迅即調降指標，但仍盡力維持一個不低的煉鋼計劃。然而，鄧研議具體目標時，可能誤導毛，甚至促成更大偏差，譬如：1959年的糧產計劃，經過他審議後，不降反漲，增添後來糧食估產調降的難度，並加劇了高徵購的程度。此外，鄧1960年主持制定「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其指標之高，連毛都看不下去，認為「存在一個極大的危險」；毛決定煉「爭氣鋼」與蘇聯較勁後，才接受鄧原初提的補充計劃的目標。

鄧小平後來承認在領導制定運動計劃上出現偏失：「過去高指標是錯的，第一是中央負責，主要是書記處負責」；並具體地說，其主持的運動計劃存在「偏高、多變，基建戰線長，打破了一切程序」的弊病。^[5-202]彭真在1962年初檢討「大躍進」問題時表示：「1960年是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大出口，基本建設也是1960年搞得最多。1960年的毛病出在沒有調查研究，首先是我們書記處。小平帶頭，沒有調查研究。」^[5-203]彭真是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的得力副手，與鄧近身共事相處，其對鄧所作的批評，更是一語中的。

三、在運動執行方面：

鄧小平在「大躍進」中除了直接參加「領頭帶路」的決策與計劃工作外，也擔負著「埋頭拉車」、執行運動的工作。夾雜著自身對運動的熱度，鄧小平急於理清頭緒、抓出成效的強勢作風，時常展露得淋漓盡致。他領導的中央書記處若覺得某一部門的運動經驗與績效不錯，即以中央指示的名義將之批轉各方參考辦理。^[5-204]「不破樓蘭誓不還」，讓每一位黨國官僚神經繃緊，全無保留地為特定任務拚搏。對工業（鋼鐵）、水利工程、交通、教育事業等進行「大辦」的做法，也就是要各級黨幹傾其所轄的人力與資源，不顧客觀條件地按時完成中央指定的目標。

「大辦」的做法雖有集中火力、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其副作用也相當

大，就是顧此失彼，導致發展比例失衡，特別是犧牲農業。鄧小平在1960年春調升鋼產的期成指標，並在年中主張全力「保鋼」以與蘇爭氣，後來也不得不承認：如此「擠了農業」與「必要的市場供應」，實是「得不償失」。鄧在1960年春大力推銷廣東湛江的人海戰術水利工程經驗，要求各地立即前去「取經」、學習，助長大辦水利的勢頭。1961年初，鄧內外有別，對外賓強調：中國之所以能度過1959、1960年「百年不遇的大災荒」，^[5-205]是因為「修了很多水利工程」與「人民公社的組織力量」；^[5-206]但在高層間吐實：大煉鋼鐵外，「再加上大興水利，大調勞力，就把農業擠了」。^[5-207]

對於自己在運動執行層面上的失策，鄧小平也有所省悟，1961年3月27日，他表示：「最近幾年，工作好了，就舒服了，不搞調研了。中央也是按級聽匯報，群眾的呼聲聽不到，聽到也不重視。許多事就是那麼一下子幹下去，又不經過試驗後再推開，都是一哄而起。」^[5-208]同年底，針對中央書記處在「大躍進」中的重大缺失，鄧指出其中一項就是：「幾個『大辦』，而且是限期完成，把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因地制宜的工作方法搞掉了。」^[5-209]

鄧小平自知這種如「大辦」式的自上而下、不准討價的運動執行方式，對各地黨幹造成莫之能禦的政治壓力，激發後者為達目標而不擇手段、鋌而走險。因此他對運動中犯有嚴重「錯誤」的下級黨幹的處理問題，態度較為寬大。鄧小平在1960年12月22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表示：「下邊的亂，是由總的方面形成的，我總講這些。下邊有責任，我們自己也有責任，好多東西是書記處點了頭的。對錯誤無論如何都不能原諒，但要分析，鬥爭到適當時機，處理要慎重。」^[5-210]鄧小平之後在中央具體指導相關工作時，也曾指示：「反『五風』〔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對生產瞎指揮風〕問題，在農村主要是走群眾路線。相信絕大多數幹部，幫他們過關。」^[5-211]鄧在1961年3月到「大躍進」期間「五風」問題極為嚴重的河南視察時，還交代吳芝圃（其本身就是該省「五風」肆虐的禍首）：「對於幹部的處理，寧肯不及，不要過，不要隨便戴帽子。批判後，重要的是鼓氣，不要灰溜溜的。」^[5-212]

對於震驚中共中央的「信陽事件」問題，有資料指稱，鄧小平在河南訪視期間曾調閱有關檔案文件。鄧閱後表示：各地都是這個調子、做法，信陽沒甚麼特殊的，不同意殺人。^[5-213]鄧的話可能包含幾層意思：一、中共黨幹在運動中出現行為脫序，甚至枉顧百姓生命與生活的現象，乃普遍發生而不限於信陽一地，若真正訴諸律法追究審理，恐會有大批人頭落地，直接折損幹部力量。二、這些「犯錯」黨幹主要是執行運動政策過當、過火，是「方法」的問題，其政治責任還比公然抵制運動路線、政策

者所犯的「原則」問題輕；不消滅其肉體，既符合黨「治病救人」、自新改過的幹部方針，更可讓之感到黨的寬大為懷，努力戴罪立功。三、分處各地的「犯錯」黨幹的錯誤表現形式，竟跨越地域差別呈現驚人的一致性，鄧參與領導的中共中央對全國運動進度所作的統一稽催，實也脫不了關係與責任。

四、在運動監督與控制方面：

運動的計劃與政令出了京城、下發到地方後，鄧小平還要負責監管運動的發展與落實情形。由於各省承載兌現運動目標的要務，鄧小平經常視察地方，以確認運動在實行過程中沒有走樣。然而，鄧對各地報告的運動細節決策、施行方案，以及湧現的運動果實，卻往往不分真假、照單全收，在沒有確切掌握實際情況下，甚至還加入盲目指揮。

以鄧小平與運動的「左狂」們的互動為例：1958年的金秋時節，鄧小平在四川讚賞李井泉驅動萬人通宵上陣煉鋼是「氣魄大」，更與李商議出當地在1959年要種植千萬畝的萬斤田的計劃，助燃了該地已有的浮誇風、高估產，以及順之而來的高徵購。1960年大地回春以前，鄧小平先到河南肯定吳芝圃提出的該年度「持續躍進」的計劃，滿意驗收吳試辦城市人民公社的成果，並賞玩吳在公共食堂炊具機械化的展覽。事後證明，全弄虛造假。鄧小平繼而轉赴安徽，雖然此時江淮多處已餓殍成片、屍填溝壑，但鄧在曾希聖巧心佈置下，竟然做出安徽生活「小康」的判斷；至於鄧以「魄力很大」稱讚安徽大建化肥廠的計劃，一年後曾希聖招認「計劃落空，不可能實現」。^[5-214]後來曾希聖在政治上被批判後，鄧小平可能聯想到自己在1960年初視察安徽期間所看到的衣食無虞、蒸蒸日上的景象，根本是一場騙局，也不管曾希聖早年在撮合鄧和卓琳婚事上的功勞，發言批評：中共在全國雖有1,700萬名黨員，但曾希聖只和五六人談心、說真話而已。^[5-215]鄧氣自己還不在其中之內呢！

鄧小平在運動管控上另有一個嚴重的疏失，就是對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注意不夠、處置不當。1961年3月，鄧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說：

過去我們書記處不是對所有問題都沒有發覺，對若干地方出現的問題本來是有察覺的。察覺了之後，應該有個辦法，去調查研究。無非是自己去調查研究，或者是派人去調查研究。出現這些問題不能及時解決，不能夠正確地解決，這一方面我們沒有盡到責任。作為重要的教訓，個人也好，整個書記處也好，我想大家恐怕都應認真汲取。^[5-216]

這方面具體的例子可見：因高估產、高徵購導致死人的青海興海縣慘案，1959年4月呈上鄧小平的桌案後，他否決中央派人調查、高調處理以讓各地為戒的建議，反而要青海當局自行糾錯。此舉好比縱虎歸山，因為高峰領導的省委知錯不改、我行我素，使得青海高估產、高徵購的情形其後不但沒有改變，更變本加厲。河南信陽地區從1959年冬開始發生大量人口

餓死的情事，鄧小平在1960年2月視察河南時，似渾然不知；關於慘案的情報在4月報送了中央書記處，^[5-217]一個月後鄧曾到河南聽取省委報告工作，但此事件的真實情況卻遲至10月才全盤揭露。鄧對事態掌握的深度與因應能力，都有可以批評之處。

對於安徽在運動中發生的慘況，1961年1月，中共中央組織部一名在安徽「勞動鍛鍊」的幹部，將其調查獲知的蚌埠地區餓死百萬的情況，以密信回報，並建議中央派出強而有力的工作組，徹底解決安徽問題。中組部部長安子文讀信後感到情況嚴重，將信呈送給鄧小平。鄧閱信後，沒有採納信中所提的中央派人至皖處理的建議，而是將信交給柯慶施，要華東自行解決。柯的作法竟是召喚安徽省委辦公廳主任，也就是曾希聖的妻子余叔至上海看信，從而暴露了揭發人的身份，使其遭到下放農村基層的報復。^[5-218]鄧小平如果採納中組部人員的建議，派人前去調查處理，曾希聖在安徽造成500萬人死亡的內情，^[5-219]不用等到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就會被揭開蓋子。

1960年12月22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鄧小平曾傳達毛澤東對中共黨幹在「大躍進」中表現的看法：

毛主席把幹部分為六類。一類是明了情況，完全實事求是，頭腦清醒的。工業方面可能多一點；二類是比較了解情況的；三類是好人犯官僚主義錯誤，政策不大清楚；四類是死官僚主義，脫離實際，對情況不清楚；五類是被敵人拉過去的，蛻化變質；六類是敵人打進來的。^[5-220]

毛澤東的有關看法是存有嚴重侷限的，特別是他忽略了中共政治制度與運動本身弊端對幹部行為的影響，並過度強調了所謂外在「反動力量」的作用，例如：所謂第五、第六類的幹部。然而，暫且不論毛的這套分類標準的問題，鄧小平按之歸類，應屬於哪一類的幹部？

自1956年起，毛澤東偕同鄧小平在國內多方試行有別蘇聯的社會主義實驗，側重在發展經濟的「大躍進」，也可看成是相關政治實驗的集大成。中共與蘇聯之間這種或明或暗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與模式的競爭，再加上雙方在對外關係與國際事務主張上愈益加深的歧異，兩黨之間漸行漸遠，在意識形態上隔空交火，在國家關係上也冷若冰霜。鄧小平如何在毛澤東的麾下對北（蘇聯）昂首迎戰、對南（東南亞共黨）策動內戰，是第六章討論的課題。

注釋

[5-1]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368-369。

[5-2]〈中華民國台閩地區歷年人口總數、年增加、自然增加、出生數、死亡數、結婚對數、離婚對數及其比率〉，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

<http://www.ris.gov.tw/ch4/static/yhs109800.xls> (2010年10月登入)

[5-3]楊尚昆：《楊尚昆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上冊，頁395。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3），頁301。

[5-4]長期以來有一種流行的看法：認為鄧小平缺席廬山會議，乃因所謂的「政治病」，亦即刻意避不參加會議，以免身陷政治衝突的漩渦。事實上，此說難以立足。首先，鄧小平真的因腿傷之故，需要一段時間的臥床治療（由於未影響思維能力，鄧有可能在中共大員群聚廬山開會時，更多地恢復參與處理北京的中央日常工作）；其次，廬山會議走向的突然逆轉，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與會者，上山開會前都始料未及，鄧自也無法預知。

[5-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下冊，頁1193。陳雲經由閱讀會議文件，感覺廬山會議情勢有變，規勸同在大連休養的鄧子恢不要前去廬山開會。事態明朗後，鄧子恢即向陳雲道謝。《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編：《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頁533。另外，中國大陸當代中國史學者（E君）指出：中共高幹除非有重大的政治問題，不然皆有閱讀中央文件的權利。以鄧小平當時重要的政治地位，必定能收閱相關的會議文件。（香港，2007年1月）

[5-6]羅榮桓當時因病而未出席廬山會議。會議期間，彭真從廬山打電話給羅榮桓，通報會議情況外，並就林彪接替彭德懷職務問題徵詢意見。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793。《羅榮桓傳》編寫組：《羅榮桓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頁341。黃瑤、李志經、楊國慶：《羅帥最後十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頁94。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者（D君）表示：廬山會議期間，中共中央決定要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後繼續召開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按照中共黨內程序，會通報鄧小平；也會跟他講此前會議的情況。（北京，2007年1月）

[5-7]1959年10月1日，中蘇兩黨領導人進行會面。毛澤東在向蘇方介紹鄧小平時表示：「不要小看他個子小，他是中國政壇上正在升起的一顆明星。」利沙特·沙拉夫特季諾維奇：〈他是中國不可侵害的一部分〉，載周爾均、周秉德主編：《百人訪談周恩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頁408。

[5-8]1959年9月9日，劉少奇在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表示：「我這個人歷來是提倡『個人崇拜』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主席；『七大』的修改黨章報告我也宣傳，現在我還要搞，還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個人崇拜』。」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305-306。

[5-9]有關鄧小平對廬山會議的與聞情形與態度立場的問題，更詳細的討論請參閱：鍾延麟：〈鄧小平與1959年廬山會議〉，《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15卷，第2期（2007年12月），頁121-154。

[5-10]所謂「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包括：彭德懷、身兼中央書記處書記與軍委秘書長的黃克誠、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以及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

[5-11]〈井泉同志傳達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的報告〉（1959年8月30日），頁16-18。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5-12]上海即有幹部聽聞彭德懷問題的傳達後表示：「聽了〔彭德懷〕反黨集團事件，開始很吃驚，但仔細一想，聯繫過去高、饒反黨集團的問題也就想通了。」「彭是高饒反黨聯盟的重要成員之一，中央保護他過關，還讓他擔任這麼重要的工作，他不但不改好，反而繼續反黨活動，真是太瘋狂了。」〈上海市委關於市委擴大會議情況給中央的電話匯報〉（1959年9月2日），頁3、6。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5-13]1980年3月，鄧小平在評論高崗問題時就還表示：「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懷同志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那時候六個大區，他得到四個大區的支持。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西北是彭德懷同志。」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100。

[5-14]〈鄧小平在接見參加團中央工作會議全體人員時的講話〉（1961年10月23日），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編：《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北京：1967），第2集，頁51。

[5-15]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102。

[5-16]由於鄧小平與陳雲皆告病，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即建議周恩來在會後負責管理相關事宜。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

- 冊，頁1486。
- [5-17]鄧小平：〈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紅旗》，1959年19期（總第33期），頁30。
- [5-18]《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28、438、442。
- [5-19]鄧小平表示：「黨的根本隊伍是好的，百分之九十幾是好的，要相信這一點。有些同志只是一段話，在小範圍內批判，放在思想整風中解決更有益處。劃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原則是不要比賽，劃不劃，都要慎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1522。
- [5-20]安法孝：〈關於瀘州專區在整頓鞏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檢查報告〉（1959年9月1日），頁37。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 [5-21]安法孝：〈省委檢查團瀘州分團敘永檢查組關於敘永天堂公社部分生產隊推行紅荳「包產到戶以產計工」辦法的報告〉（1959年8月4日），頁2–6。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 [5-22]〈中央批轉四川省委關於省委第一屆第十一次會議情況的報告〉（1959年10月13日），頁1–4。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 [5-23]鄧自力：《坎坷人生》（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頁88、96。
- [5-24]鄧自力：《坎坷人生》（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頁160–161。
- [5-25]鄧自力：《坎坷人生》，頁141。
- [5-26]有「文革」的批判材料指稱，對於鄧自力的「罪行」，鄧小平輕描淡寫地表示：「鄧自力有了右傾情緒。」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新北大》編輯部編：《新北大》，第61、65期（1967年4月18日），版8。
- [5-27]鄧自力回憶：「記得重慶批判我時，臨開會前，他〔鄧墾〕專門找到我勸我好好認識錯誤，只有認識好才能改正好。今後要更好地為人民服務。並告誡我：『你人還年輕，革命的路還長，要看遠點。』」鄧自力：《坎坷人生》，頁164。
- [5-28]鄧小平：〈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紅旗》，頁28。
- [5-29]〈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第8冊，頁522。
- [5-30]鄧自力：《坎坷人生》，頁141。
- [5-31]〈中共四川省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1959年9月2日），頁6。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 [5-32]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頁232。
- [5-3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18。
- [5-34]房維中、金沖及主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533。
- [5-3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1024–1025。
- [5-3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中卷，頁268。楊尚昆在日記中對此的記載是：11月15日「5時到7時半在養蜂夾道開會，聽富春同志關於計劃會議的匯報」、17日「上午10時到下午3時1刻，在養蜂夾道繼續聽計劃工作匯報」、18日「下午3時繼續在養蜂夾道開計劃工作座談會，8時始完」。《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44–445。
- [5-3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19。
- [5-38]《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頁269。
- [5-3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19。《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46–447。
- [5-40]《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47。
- [5-41]《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28–1029。
- [5-4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49。
- [5-4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22。
- [5-4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2–1533、1536。《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81、487。
- [5-45]《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68。
- [5-46]《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50。

- [5-4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26。
- [5-48]〈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人民日報》，1960年1月23日，版2。
- [5-49]陳充：〈北有青島，南有湛江——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湛江黨史網：<http://www.zjds.org/ReadNews.asp?NewsID=670>（2010年10月登入）
- [5-50]陳充：〈為了湛江的騰飛——中央三代領導集體對湛江的關懷〉，《廣東黨史》，2000年第1期，頁12。陳充：〈北有青島，南有湛江——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
- [5-51]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水利續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頁315。
- [5-52]陳充：〈北有青島，南有湛江——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
- [5-53]陳充：〈為了湛江的騰飛——中央三代領導集體對湛江的關懷〉，《廣東黨史》，頁12。
- [5-54]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86。
- [5-55]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107。
- [5-56]〈陶鑄的「換頭術」及其他〉，北京郵電學院革命委員會、首都紅代會北郵東方紅公社：《北郵東方紅》，第54期（1967年9月21日），版4。
- [5-57]《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73。
- [5-5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29。
- [5-59]〈中央批轉李先念同志「關於立即突擊調運糧油棉和成立調運指揮部的報告」〉，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22，目錄號2，案卷號3，頁140—141。
- [5-60]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上篇，頁68—71。
- [5-61]《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74。
- [5-62]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109。
- [5-63]河南二七公社河南農學院紅衛兵總部：《河南省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個司令部鬥爭的由來和發展》，1967年7月。中國文革研究網：<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8033>（2012年7月登入）
- [5-64]〈群眾迫切要求改革炊具——河南炊具改革運動的幾點經驗〉，《人民日報》，1960年3月12日，版3。
- [5-65]河南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南省志·大事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386。相關會議的情形，另可見：〈中共河南省委五級幹部會議和省委全體會議確定以農業為基礎實現今年的持續躍進，會議要求：動員全省人民戰勝乾旱，保證超額完成鋼鐵等生產任務〉，《人民日報》，1960年3月7日，版4。
- [5-66]河南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纂：《河南省志·共產黨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頁97。
- [5-67]《河南省志·大事記》，頁386。
- [5-68]吳芝圃表示：「近幾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滿懷信心地正在進行著社會主義建設。我們從1958年到1959年的兩年時間內，就基本完成了1958—1962年的第二個五年計劃。今後我國仍將依照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以大躍進的發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向前邁進。我國預定在十年間在主要工業產品的產量方面趕上或超過英國。我們深信，在我國人民團結一致、共同努力之下，在各國人民的熱烈支持下，我們一定能夠完成上述的目標，並將以此來增強整個社會主義世界的力量。」〈吳芝圃在芬共代表大會上致賀詞〉，《人民日報》，1960年4月17日，版4。
- [5-69]中共河南省委李長春：〈鄧小平同志在河南〉，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242。
- [5-70]《河南省志·大事記》，頁389。
- [5-7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54。〈鄧小平李富春視察遼吉黑三省時強調說：東北要大挖潛力支援全國〉，《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日，版2。
- [5-72]〈鄧小平同志視察河北省並作重要指示：城市辦人民公社是大勢所趨〉，《文匯報》，1958年10月20日，版1。
- [5-7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73。
- [5-74]〈南「戰鬥報」駐北京記者歪曲我領導同志關於公社問題的談話〉，新華通訊社

- 編：《內部參考》，總第2716期，1959年2月25日，頁14-15。
- [5-75]李端祥：《城市人民公社運動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頁258-259。
- [5-76]李端祥：《城市人民公社運動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頁110。
- [5-77]李端祥：《城市人民公社運動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頁82。
- [5-78]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原大地建偉業〉，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鄧小平的歷史足跡》（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320-321。
- [5-79]中共河南省委黨史研究室：〈中原大地建偉業〉，頁320。
- [5-80]此一中央批示就將河南省委的這篇報告作為附件，「發給各地研究參考」。〈中共中央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13冊，頁59。
- [5-81]《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74。
- [5-82]曾希聖之子女回憶：「鄧伯伯很關心爸爸，爸爸是他和卓琳阿姨的婚姻介紹人。」其子曾曉東表示：「卓琳阿姨常常同我談起這件事。卓琳阿姨多次對我說過，我得感謝你爸爸，是他使我同你鄧伯伯相識，力促我們談戀愛、結婚，結成終身伴侶，那是1939年夏天在延安發生的事。」江鯤池：〈鄧小平與曾希聖〉，安徽文化網：<http://www.ahage.net/fengyun/11900.html>（2012年8月登入）
- [5-83]〈巡視〉，合肥報業網：<http://www.hf365.com/epublish/gb/special/class000000031/1/hwz487751.htm>（2012年8月登入）
- [5-84]《曾希聖傳》編纂委員會：《曾希聖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438。
- [5-85]《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75。
- [5-86]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者（I君）提供的觀點。（2010年12月）
- [5-87]宋霖：〈道德節操黨性之光——紀念張愷帆誕辰100週年〉，《江淮文史》，2008年第5期，頁55-70。
- [5-88]張愷帆口述，宋霖記錄整理：《張愷帆回憶錄》（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頁489。
- [5-89]金翠珍：〈毛主席視察蜀山人民公社的記憶〉，安徽文化網：<http://www.ahage.net/hefei/11846.html>（2012年8月登入）
- [5-90]鄧小平表示：「去年毛主席來了，說你們這裏很好，給我打了招呼，要我和書記處的同志都來看看，年前忙未來成，今天我們來了。」蜀山區地方志辦公室：〈小平同志在蜀山人民公社三個多小時的前前後後——訪原蜀山人民公社黨委書記錢朝聖〉，人民網：<http://ah.people.com.cn/GB/channel9/37/200806/26/134879.html>（2010年10月登入）
- [5-91]鄧小平表示：「去年毛主席來了，說你們這裏很好，給我打了招呼，要我和書記處的同志都來看看，年前忙未來成，今天我們來了。」蜀山區地方志辦公室：〈小平同志在蜀山人民公社三個多小時的前前後後——訪原蜀山人民公社黨委書記錢朝聖〉，人民網：<http://ah.people.com.cn/GB/channel9/37/200806/26/134879.html>（2010年10月登入）
- [5-92]《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76。
- [5-93]江鯤池：〈曾希聖軼事〉，《江淮文史》，1994年第4期，頁72-73。
- [5-94]張愷帆口述，宋霖記錄整理：《張愷帆回憶錄》，頁394。
- [5-95]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徽省志·大事記》（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頁437。
- [5-96]尹曙生：〈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記錄〉，《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頁62。
- [5-97]〈鄧小平在安徽的珍貴照片〉，安徽文化網：http://www.ahage.net/photo/11532_3.html（2012年8月登入）
- [5-98]《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75。
- [5-99]安徽省金寨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金寨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20。
- [5-100]中共安徽省委盧榮景：〈來自黃山之巔江淮之濱的頌歌〉，載《回憶鄧小平》，第3冊，頁171。
- [5-101]蘇樺、侯永主編：《當代中國的安徽》（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上冊，

頁226–228。

[5-102]《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76。

[5-103]鄧小平參觀蚌埠閘的情形，乃引自：2010年2月24日，安徽省蚌埠市郵政局推出「鄧小平同志1960年2月24日視察蚌埠」紀念郵戳時所附的說明。郵之趣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78ac3a0100hw8z.html（2012年5月登入）

[5-104]蘇樺主編：《當代安徽大事記（1949–1985）》（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頁374。

[5-105]安徽省宿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宿州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照片頁1。

[5-106]此乃根據安徽宿州市詩人協會架設的網站中一篇介紹當地景點的文章。馮子豪：〈小河潺潺之四〉，紅杏詩社：

<http://hxsbs700.blog.163.com/blog/static/6647145720093210453124/>（2012年8月登入）值得一提的是，其時間誤植為1959年。這種對鄧小平視察年份記載錯誤的情形，也同樣存在當地的地方志中。

[5-107]〈人民公社是幸福根——戴戟委員談視察安徽宿縣紫蘆湖河網化的觀感〉，《人民日報》，1960年4月5日，版12。

[5-108]〈台灣一定要回到祖國懷抱——田富達、謝學堂代表、丘琳、蘇子蘅、陳文、陳文彬、徐萌山委員的聯合發言〉，《人民日報》，1960年4月13日，版15。事後證明，台灣因「八七水災」所遭受的災害（全省667人死亡、408人失蹤），相較於淮北平原因「人禍」所造成的生命損失，實在是「大巫見小巫」。1960年，宿縣的死亡率高達144.32，非常正常死亡人口即超過10萬。戴寶村：〈台灣歷史上的八七水災〉，台灣歷史學會：

<http://www.twhistory.org.tw/20010806.htm>（2012年9月登入）；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337。〈1960年安徽省各縣市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表〉，大飢荒檔案：<http://www.yhcnw.net/famine/Data/Anhui/anhui00b.html>（2012年10月登入）

[5-109]〈萬條銀龍降淮北〉，《解放軍報》，1960年3月26日，版4。

[5-110]安徽省宿縣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宿縣地區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頁42。

[5-111]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徽省志·水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頁141–142。

[5-11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0。

[5-113]朱世力：〈走近安徽省博物館的老一輩革命家們〉，《江淮文史》，2009年第2期，頁7。

[5-114]江鯤池：〈桂林棲桐城蹲點記〉，《江淮文史》，2005年第5期，頁89。

[5-115]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室：〈江淮熱土的懷念〉，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鄧小平的歷史足跡》，頁224–225。

[5-116]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57–61。

[5-117]1962年2月9日，曾希聖所作的〈在中央擴大的工作會議安徽大組會上的自我檢查〉坦承：「1960年的死人數字……把原匯報的數字縮小為117萬多人。」劉彥培：〈「李世農反黨集團事件」的真相及其歷史經驗〉，《江淮文史》，2006年第1期，頁175。事實上，安徽在1960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高達192萬人。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337。

[5-118]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頁249。

[5-119]《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77。

[5-120]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453–454。

[5-12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0。《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77。

[5-12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1。

[5-123]〈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人民日報》，1960年1月23日，版2。

[5-12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21。

[5-125]〈給林彪的信〉，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9冊，頁31。

[5-126]〈對國家經委黨組關於工業、交通生產情況報告的批語〉，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33–35。

- [5-127]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頁603-611。
- [5-128]《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7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1。
- [5-12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1。
- [5-130]3月10日上午，鄧小平參觀北京第一機床廠；15日上午，參觀北京毛紡廠；16日上午，參觀北京熱電廠、北京焦化廠、化工二廠。20日上午，參觀天津機床廠、橡膠廠和自行車廠。《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2-1533。
- [5-131]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歷史足音，長留京華〉，載《鄧小平的歷史足跡》，頁2-3。
- [5-13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下冊，頁919。
- [5-133]此一為期兩天（3月24日至25日）的高幹會議，參加者有：毛澤東、鄧小平在內的中央領導人、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以及11位省級第一書記。毛提議會上討論的17個問題，包括：1、「四化」問題，也就是機械化、半機械化、自動化、半自動化。2、城鄉公共食堂普遍化。3、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4、農村人民公社的5個問題。5、農業。6、工業。7、小土、小洋鐵路。8、工業交通、財貿、文教系統普遍支援農業。9、教育。10、農業綱要四十條提前完成的問題。11、除四害。12、「三反」問題，也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13、迴避問題。14、外賓參觀。15、增產節約與綜合利用問題。16、反華問題。17、社會主要矛盾問題。毛指定鄧小平主持會議對以上問題一一進行討論，並將討論結果向毛逐條匯報。《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62-106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4。
- [5-134]《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65。
- [5-13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頁919。
- [5-136]《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9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44-1545。4月21日，薄一波致信鄧小平表示：「我們工業書記會議開得差不多了，開得還好，解決了問題。擬在明日或後日上午向中央書記處匯報一次，參加的人一省一個。是否可以並在哪天為宜，請通知我。」鄧小平當日閱後批示：「可在後天（二十三）上午九時。請尚昆通知。」〈致鄧小平〉（1960年4月21日），載薄一波著作編寫組編：《薄一波書信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下冊，頁430。
- [5-137]〈關於當前工業交通戰線上的十個問題——省、市、區黨委工業書記會議紀要〉，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頁355-375。
- [5-138]5月5日，薄一波致信鄧小平表示：「關於工業交通生產工作已根據工業書記會議的決定，做了安排。總的情況是4月份生產不好；力爭在5、6兩月把情況扭轉過來，並且爭取上半年完成年計劃的一半或稍少一些。目前中央各部和各省市都在抓，估計5月中旬情況會逐步好轉過來。」〈致鄧小平〉（1960年5月5日），載薄一波著作編寫組編：《薄一波書信集》，下冊，頁433。
- [5-139]《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8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4。
- [5-140]《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89-49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8。
- [5-141]2月29日，鄧小平會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李先念關於財貿方面（糧食問題為主）情況的匯報，並做出相應決定。李應在會上獲得有關問題的指示，因為他在隔日即召開全國電話會議，強調應「把突擊完成糧、油、棉的調運任務，作為一項緊急的政治任務」。《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1。《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李先念傳（1949-1992）》（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上冊，頁472。
- [5-14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40。
- [5-143]《李先念傳（1949-1992）》，上冊，頁472-473。
- [5-144]《李先念傳（1949-1992）》，上冊，頁473。
- [5-145]〈社會主義建設的新階段〉，《人民日報》，1960年1月23日，版2。
- [5-146]〈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鬥〉，《人民日報》，1960年4月7日，版2。
- [5-147]《楊尚昆日記》，上冊，頁489-49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7-1538。
- [5-14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41。
- [5-149]5月9日上午，鄧小平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中

開展「三反」運動的指示〉、〈關於農村勞動力安排的指示〉、〈關於做好糧食分配工作的指示〉等文件。《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47。

[5-15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48。

[5-15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2。

[5-15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4。

[5-15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5。

[5-154]《李富春傳》，頁541。

[5-15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2。

[5-156]〈十年總結〉，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9冊，頁214。

[5-15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8。

[5-15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9。

[5-159]《楊尚昆日記》，上冊，頁512。

[5-160]《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81。

[5-16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9。

[5-162]《楊尚昆日記》，上冊，頁513。

[5-163]《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84。

[5-164]《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82。

[5-165]《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82–1083。

[5-16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9。

[5-167]《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84。

[5-16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60。

[5-169]〈鄧小平同志同拉丁美洲12國兄弟黨學習代表團談話紀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號102-00036-14（1），頁191。

[5-17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64。

[5-171]蕭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下冊，頁687。

[5-172]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0), pp. 73–76.

[5-173]〈1月31日小平同志在省市第一書記會上的講話〉（1959年1月31日），頁1。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5-174]〈鄧小平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1月26日），頁7。

[5-175]〈4月19日中央電話會議上李先念同志的講話〉（1959年4月9日），頁7。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5-176]例如：5月28日上午，鄧小平簽發中共中央〈關於調運糧食的緊急指示〉。〈指示〉要求有關省區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把一切需要調運和能夠調運的糧食儘快地集運外調。6月6日，中共中央再次發出〈關於為京、津、滬和遼寧調運糧食的緊急通知〉。

《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4。

[5-177]《李先念傳（1949–1992）》，上冊，頁473–475。

[5-178]《楊尚昆日記》，上冊，頁52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67。

[5-179]《楊尚昆日記》，上冊，頁52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68。

[5-18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69–1570。《楊尚昆日記》，上冊，頁526。

[5-181]該文件中所提的四項工作方針為：一、糧、棉、油必須保證完成收購和出口計劃；其他物資凡是能出口的，應當千方百計地擠出來出口，力爭超過計劃。二、堅決貫徹執行中央規定的「五先」原則：在國家計劃規定的範圍內，對出口商品應當安排在先，生產在先，原料材料和包裝物資供應在先，收購在先，安排運輸力量在先。三、出口商品一定要合乎規格，在各個環節上，層層負責，保證質量。四、少出口原料，多出口成品；多進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並增加出口商品品種，提高規格質量。〈中共中央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頁512–515。

[5-182]九方面的工作要項包括：一、「立即發動群眾檢查今年前7個月完成國家計劃的情

況，討論今後5個月增產節約的指標，和實現這些指標的具體措施。」二、「繼續深入開展技術革新、技術革命的群眾運動」。三、「一切基本建設項目和生產任務，都要在省、市、區黨委統一領導下，根據國家計劃，分別輕重緩急，進行排隊。」四、「幹部要立即下去，親臨生產前線。」五、「大量精簡非生產人員，充實生產戰線。」六、「加強企業管理。」七、「堅決貫徹全國一盤棋的原則，反對本位主義」。八、「所有工業和交通運輸部門，都必須進一步加強支援農業。」九、「廣泛開展增產節約的勞動競賽。」〈中共中央關於開展以保糧、保鋼為中心的增產節約運動的指示〉，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頁527-536。

[5-183]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上冊，頁340-341。

[5-184]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頁341。

[5-185]《周恩來傳》，下冊，頁1552。

[5-186]蕭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頁688。

[5-187]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301-302。

[5-188]該指示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60萬噸鋼的生產任務，是國內國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個政治性的問題」；「如果我們不立即抓緊時機，扭轉生產下降的局面，那麼全年生產就有完不成的危險。而一旦發生這種情況，對於我們目前國內外的政治鬥爭，對於爭取明年國民經濟的繼續躍進，都是不利的」。《李富春傳》，頁555。

[5-189]中共經濟官僚薛暮橋表示：「1960年的生產指標仍然定得過高。鋼產量定為1,800萬噸，執行的結果，雖然『超額完成』了計劃，實際上是吃了老本。」「據陳雲同志計算，鋼的綜合生產能力只有1,200萬噸，煤的綜合生產能力只有2.5億噸，1960年的產量都是超負荷運轉逼出來的。」而這種「超負荷運轉」引發了諸多嚴重的負面效應，包括：設備不能按時檢修，損壞嚴重，造成後來要輪流停產檢修；小高爐煉鐵浪費、耗費煤炭過多，使若干大高爐因缺煤而停止生產；由於只顧採煤，無暇掘進礦井、延長坑道；職工因供應減少、體力下降。整體的鋼、煤生產，也需幾年的時間才能止跌回穩。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頁269-270。

[5-19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42。

[5-191]「大躍進」期間每年的糧食出口量（此為貿易糧，每噸相當於1.2噸原糧），都比運動前的1957年（209.2萬噸）還高。1958年有288.34萬噸；大饑荒開始出現的1959年，糧食出口額最高，達到415.75萬噸，若按照1957年的農村人均消費糧食量（204.5公斤）的標準，其可供約2,440萬人食用一年。1960年出口糧食也計有272.04萬噸。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頁835-837。若同樣按照1957年的用糧標準計算，1960年出口的糧食量，也可供約1,330萬人食用一年。

[5-192]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96).

[5-193]1961年1月16日，針對糧食問題，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表示：一定要低標準，「瓜菜代」搞三年。《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13。

[5-19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永遠的小平：卓琳等人訪談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頁38。

[5-195]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頁266。

[5-196]1961年6月6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指出：「今年糧食要出問題就出在城市。城市一旦出了問題，那比農村死人問題更嚴重。」7月3日，鄧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表示：「照顧農村，也要照顧工業骨幹；照顧農民，也要照顧工人。糧食問題，主要是減農村人口的口糧標準。」7月14日，他在瀋陽也曾說：「農村要多吃一點，但是如果沒有一定數量保證城市的需要，出了亂子會比農村嚴重。」《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43-1644、1647、1649。

[5-197]周燕：〈顧全大局的李井泉〉，《黨史博覽》，2009年第11期，頁30-31。

[5-198]東夫：〈李井泉和四川大饑荒的特殊成因〉，載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香港：田園書屋，2009），上冊，頁348。

[5-199]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頁966-999。楊並指出：若再加上應出生而未出生的人數4,000萬，「人口損失大約7,600萬」。

- [5-20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24。
- [5-201]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95。
- [5-20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76、1678–1679。
- [5-203]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07。
- [5-204]1961年12月21日，鄧小平在一次高幹會議上表示：「〔在大躍進中〕具體的中央指示，批轉的文件，比如這個部門、那個部搞的東西，批轉了，這個毛病就很多了。許多毛病是出在這上面……，而這一部分，說到中央的責任，主要是中央書記處的責任。因為這些文件主要是經過中央書記處拿出去的。」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39。
- [5-205]中共強調「三年自然災害」、政策錯誤和蘇聯背信，同是造成經濟困難的原因。但有研究指出：「天災年年有，三年是常年」，「三年是正常年景」，中共刻意誇大了自然因素的作用。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下篇，頁643–653。
- [5-20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15。
- [5-207]《毛澤東傳》，下冊，頁1113。
- [5-20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25。
- [5-20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76–1677。
- [5-21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06。
- [5-21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07。
- [5-21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18–1619。
- [5-213]路憲文：〈「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地方文革史交流網：<http://www.difangwenge.org/simple/?t5618.html>（2012年7月登入）
- [5-214]〈注意總結經驗教訓——在安徽省委三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載曾希聖：《曾希聖文選（1939–196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361–362。
- [5-215]安徽打倒曾希聖四川調查團、東方紅八二六東方紅縱隊、東方紅八二六水電校八三一、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革命造反指揮部：《打倒曾希聖》（成都：1967年11月），第1集。中國文革研究網：<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8036>（2012年6月登入）
- [5-21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24。
- [5-217]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篇，頁73。
- [5-218]梁文斌：〈我向中央告省委〉，《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頁59–61。
- [5-219]《張愷帆回憶錄》，頁344、369。
- [5-22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06。

第六章

參與管理中共的黨對黨外交（1956—1966）

在毛澤東時期，中共對外從事黨、政分離的「雙軌外交」，也就是與他國政府發展正式外交關係的同時，也廣續與當地共產黨保持聯繫、維持互動。^[6-1]因此，中共對外工作主要可以分為政府對政府外交和黨對黨外交兩個部分。「文革」前十年的中共的黨對黨外交，工作相當繁重，也甚為艱鉅。

因為值此期間，作為中共政黨外交重心的中蘇兩黨關係，發生劇烈的變化：從初始的出現嫌隙，到爭執加劇並擴及雙邊國家關係，最後更演變成彼此不共戴天的局面。兩造關係的變質主要歸因於兩個方面：一、中共建政後對蘇聯實行「一邊倒」政策，將之視為師法學習的對象；但從1956年開始，中共強調「以蘇為鑒」，要走出中國自己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自認不遜色於蘇，更較之略高一籌。二、中蘇雙方自1950年代中期起，在國際事務上，特別是對敵、我、友之間關係，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向的經略，多抱持不同的認知與作法，並且互不買帳。另外，為了與蘇共互爭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龍頭地位，彰顯自身政策主張獲有多數「群眾」支持，中共也用心經營與其他「兄弟黨」的關係。東南亞共黨因活動地區接近中國，中共較能施加影響力，因而成為中共對外交往的重點對象。中共熱烈鼓勵、大方支持有關友黨的武裝叛亂活動。

中共黨對黨的外交，以至於所有對外關係的重大決策，毛澤東自始至終親手掌握。^[6-2]其他領導人則唯毛是從、隨毛起舞。「文革」前的鄧小平雖也參與政府間外交，^[6-3]但擔任中央總書記的他更活躍於中共黨際外交。以中蘇共關係而言，鄧晚年就表示，他當年「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6-4]在中蘇關係由好變惡、從同盟轉趨敵對的發展歷程中，鄧從事甚麼活動？扮演何種角色？在「文革」前中共對東南亞如火如荼的黨際外交活動中，鄧擔負的工作任務為何？他在處理相關外交關係時，如何配合當時中共對蘇外交的需要？這些乃是本章所欲解答的問題。

本章的論點為：毛澤東主宰中共對外關係，鄧小平可說是毛的意志遂行者。在中蘇兩黨關係方面，鄧小平經常作為中共對蘇強硬交涉的首席代表，也是中方對蘇開展意識形態辯論的首要組織者。鄧對抗「蘇聯修正主義」悍將的形象，深受毛澤東讚賞。在中共與東南亞共黨關係方面，鄧小平致力將有關的外交工作，納入中共對蘇外交較勁的戰略框架中。他同相

關共黨領袖交換意見，希望他們支持中共對蘇的立場和觀點；促使北越在中、蘇論爭中靠向中共；接洽、鼓吹東南亞的革命活動，以證成中共對世界革命情勢的樂觀預判。對於此一時期中共黨對黨外交所造成的內、外負面效應，鄧小平皆負有重要責任。

以下首先檢視鄧小平在中蘇雙方逐步交惡的各階段中的活動與角色，接著探討他在中共與東南亞共黨關係上的作為。最後的小節討論鄧小平相關外交作為的政治影響與責任。

第一節 親身與聞中蘇的嫌隙醞釀與爭議累積（1956–1959）

鄧小平在中、蘇兩黨關係中的作為和角色，依照「文革」前雙方關係的起伏變化，可分為三個階段。本節集中介紹1950年代後半期。

嫌隙醞釀階段（1956–1957）

中共建政伊始，鄧小平雖然擔任「中蘇友好協會總會」理事，卻沒參加中蘇外交的活動。1952年後才以副總理身份參加、處理中蘇之間的外事禮儀活動和實質意見交換。在中蘇同盟蜜月的氣氛下，鄧小平在1954年參觀「蘇聯經濟文化建設成就展」時，題字「以有〔蘇聯〕這樣強大的盟邦而自豪」；^[6-5]但在與蘇方實際往來時，他卻偶爾流露出對中國弱勢的感嘆。^[6-6]鄧小平在中共對蘇外交決策中地位愈見攀升，乃從其代表中共參加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開始。

1956年2月上旬至3月初，鄧小平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的職銜參加以朱德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赴蘇出席蘇共「二十大」。對於赫魯雪夫撻伐史達林的「秘密報告」，朱德態度模稜，遭致毛澤東批評。^[6-7]鄧小平當時立即感到事關重大，對外表示，要呈報上級而不急於表態；對內討論，強調「不能這樣對待革命領袖」，^[6-8]展露出機敏和堅定的特質。鄧小平返國向毛呈報時，直截了當地對赫魯雪夫批評史達林的方式與方法表示不滿，尤其事前未通知中共，事後也未對中共特別說明，顯露大國主義作風；同時也反對將史達林的錯誤簡單歸結於其個人性格和個人崇拜。^[6-9]鄧小平對赫魯雪夫全盤否定史達林的做法採取強硬批判，認為存在嚴重的片面性：蘇聯的成就皆與史氏無關，但過錯卻通歸於他。^[6-10]對於聯繫到自身身後評價問題的毛澤東而言，鄧的此番言行不啻是一值得信賴的表現，故深得其歡心。

同年的中共「八大」，經毛澤東力薦，鄧小平出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

中央總書記，並分工「主管黨的對外交往工作」，^[6-11]會同劉少奇一起指導以王稼祥為首的中央對外聯絡部進行工作。^[6-12]毛澤東要鄧小平肩挑黨際外交重任，尤其是參與管理中共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中蘇關係，既是對鄧的賦責磨練，培養其獨當一面的處理能力，也有對之忠誠稽核、觀其後效的考量。鄧小平自是務求迎毛所願。鄧對中共政黨外交實質掌理和具體統籌的職權，^[6-13]直至他「文革」初「靠邊站」後，方被迫交出。^[6-14]

1956年10月下旬，針對波蘭、匈牙利先後產生反共騷動情況，毛澤東責成劉少奇、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赴蘇進行訪問與調解。劉、鄧二人此行既對蘇共強加於人、使用壓力的大國主義傾向予以批評，^[6-15]也成功遊說蘇聯妥善處理蘇波關係並出兵防阻匈牙利易幟（鄧小平極力主張蘇聯紅軍強力干預，壓制所謂的「反革命勢力」），^[6-16]不但完成使命，鞏固社會主義陣營，也適時彰顯中共的外交影響力。其中，鄧小平的外交能力再次讓毛刮目相看。

最能突顯毛澤東引領鄧小平處理中蘇關係的意圖，莫屬於1957年11月2日-21日，毛澤東指定鄧小平參加由他親率的中共代表團，至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0週年慶祝活動，出席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

訪問期間，鄧小平主要負責代表中共和以蘇聯為主的與會各方，就會議宣言草案（即後來的〈莫斯科宣言〉）進行磋商，^[6-17]也隨同毛澤東參加各場多邊會議與雙邊會談，拜會蘇聯黨政最高領導和其他國家相關政黨的領袖。

針對〈莫斯科宣言〉內容的協商任務，由於毛澤東批評蘇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過渡」觀點（強調資本主義國家可經由和平的方式轉化成社會主義國家），忽略了「非和平過渡的可能性」。^[6-18]鄧小平對於蘇方在宣言草案中所提的「和平過渡」主張，堅決表示不贊同，毛對此大予好評。^[6-19]然而，為了照顧蘇方，鄧提議在相關議題上，以較為間接的方式表達中方立場：在宣言草案中對「和平過渡」問題有所闡述，並另外向蘇共中央提交一紙書面的意見提綱，以完整說明中方對此一問題的觀點（此即〈關於和平過渡問題的意見提綱〉）。這也為毛所同意。^[6-20]

鄧小平在會議期間和毛澤東的如影隨形，一方面，大大增加鄧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令他人產生鄧即是毛的全權代表的印象。事實上，這層政治涵義在毛澤東與赫魯雪夫的一次會晤中，就曾清楚表露。毛向赫氏提及接替他出任中共國家主席的可能人選，依序為：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以及朱德。其中，毛唯獨對鄧讚譽有加、不帶保

留，並請求蘇方：鄧未來造訪蘇聯時，要視之如毛本人。^[6-21]對此，赫氏印象甚深，晚年仍記憶猶新。^[6-22]一旁在座的鄧小平，耳聞毛澤東在蘇共領導人面前不吝對自身所做的褒獎與關愛，亟思在中蘇關係上不辱上命、有所表現，必也是可期之事。

爭議累積升級階段（1958–1959）

1958年，蘇聯先後向中共提出在中國建立長波電台及合組共同艦隊的建議，相關主張引起毛澤東的高度疑慮與不滿，以為蘇聯大國沙文主義死灰復燃。

7月31日至8月3日，赫魯雪夫前往中國大陸就相關問題進行溝通。尤能顯現鄧小平在中共對蘇關係上的重要地位的是：在赫氏抵達北京後隨即展開的毛、赫高峰會談中，鄧小平是唯一陪毛出席的中央常委，直接助毛與赫氏爭辯。^[6-23]

中蘇雙方雖在赫魯雪夫結束訪問時發表聯合聲明以示共識，但未幾又因毛澤東在未事先告知蘇方的情況下發動金門炮戰，使彼此嫌隙益深（事實上，在赫氏停留期間，中共已調兵遣將、蓄勢待發，毛卻隻字未提，讓前者頗感不是滋味）。^[6-24]

與此前後，負責「具體部署」「大躍進」的鄧小平利用中蘇關係問題，幫助毛澤東在國內推動「大躍進」運動。1958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全國大煉鋼鐵，完成該年1,070萬噸的煉鋼指標，鄧小平告訴大家這是「給赫魯曉夫打了包票的」，^[6-25]亦即利用中蘇高層之間存在的較勁氛圍激勵士氣。

但是，在對外方面，鄧小平則小心地注意被運動鼓起的「豪情壯志」與激昂民氣，可能反過來對中蘇關係造成不良的影響。所以在1959年初，鄧小平要求「切實糾正」中方人員對蘇方表現出來的「驕傲自大」、「態度傲慢」等現象。^[6-26]鄧自己在1958年底的鄭州會議領導制定大大脫離實際、不久即被束之高閣的長程發展計劃——〈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1958–1972）〉時，也還煞有其事地提醒同僚，在發展速度上不要「與蘇撞頭」，要照顧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之首的面子。^[6-27]從此一側面，也可反映出鄧在「大躍進」初期頭昏腦脹的程度。

對於中共推行的「大躍進」運動，蘇聯領導人特別是赫魯雪夫不但不予認同，更出言批評。^[6-28]鄧小平也在中蘇兩邊的實際互動中，有直接的體驗與感受。鄧小平監製的「二五」經濟計劃中，擬議要求蘇聯予以援助的部分，在中共與蘇方交涉時，明顯地得不到後者的支持與配合。^[6-29]鄧小平索性指示「不要再爭」，並不快地認為「爭也爭不到甚麼了」。^[6-30]

然由於中共在1958年底開始進行「大躍進」的糾「左」，且忙於處理1959年3月發生的西藏動亂問題和所波及的中共與印度關係，故暫不願與蘇另生事端。但在1959年夏秋，中蘇關係因蘇聯單方面的若干外交舉措，又增添了不和的種子，包括：6月20日，蘇聯通知中共停止供應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關於8月發生的中印邊界衝突問題，蘇聯「塔斯社」在9月9日發表一則不利中方的聲明。赫魯雪夫9月訪問美國後，10月初訪問中國大陸時也被中共當作為美國遊說，兩國關係又受創傷。

此時，中蘇之間雖意見不合，但毛澤東仍主張以團結為重，不欲雙方就此撕破臉。鄧小平遵此辦理，在為蘇聯《真理報》撰寫慶祝中共建政的文章中指出：「蘇聯是中國最忠實的朋友，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是一切更廣泛的國際團結的核心。蘇聯、中國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團結是破壞不了的。」^[6-31]鄧也在腿傷漸癒、即將全面恢復工作之際，友善地會見蘇聯新任的大使，^[6-32]繼續為中蘇之間愈趨緊繃的關係編織友好如昔的表象。

當時退守台灣的蔣中正，以為有留蘇背景的鄧小平，可能會在中蘇關係吃緊時與赫魯雪夫裏應外合出面制止毛澤東。^[6-33]根據蘇聯外交官的回憶，赫魯雪夫也曾認為：對於中蘇關係問題，鄧小平出於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不得不服從他的決定，但鄧真正的觀點可能不同於毛，而較看重雙方的友好關係。^[6-34]從不久之後的發展觀之，無論是蔣中正還是赫魯雪夫對鄧小平都作了政治誤判。

12月1日，赫魯雪夫在匈牙利提出社會主義國家要「互相對對錶」、「不落後也不搶先」，讓中共領導層甚為惱怒，決定有所動作。鄧小平就說：

我們同赫魯雪夫是一系列的分歧，思想體系的分歧。赫魯雪夫的根本思想是出在蘇共「二十大」，〈莫斯科宣言〉實際是對「二十大」的修改，但是他不認賬。他現用一切辦法壓我們，向他「對錶」，向「二十大」對錶。過去是內部講，現在在印度問題上公開講了。他的目的是壓我就範。馬列主義原則不能讓，頂住。方法是不公開，但原則要講。^[6-35]

鄧小平所言的用「不公開」的方法闡述中共對「馬列主義原則」的堅持立場，就是發表文章曲筆批評蘇聯。經鄧小平組織與審定，12月21日，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紀念斯大林誕生八十週年〉。^[6-36]眾所周知地，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痛揭史達林個人及其執政之短，中共（含鄧小平）對此早有不同的看法。此時，鄧小平安排高調紀念與頌讚史達林，針對赫氏的用意自是清楚不過。該文並以史達林「強調必須對帝國主義保持高度警惕，強調必須在人民群眾面前揭露帝國主義的陰謀」，^[6-37]影射赫魯雪夫當下推行的與西方交往政策的不智。

第二節 活躍置身中蘇的正面衝突和暗中較勁（1960–1962）

衝突公開與收場（1960）

1960年1月中旬，毛澤東主張針對赫魯雪夫去年後半年向西方過度傾斜的做法、影射中共如「好鬥的公雞」、要求社會主義各國「共同對錶」，以及「和平過渡」等觀點，撰文批判。在1959年底以史達林作文章譏諷蘇方的鄧小平，再相機提出利用另一位「革命導師」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誕辰九十週年之機，對於「和平過渡」、「和平共處」以及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對蘇「公開表示我們的意見」。^[6-38]

鄧小平設想的具體作法就是：籌辦紀念列寧的活動、出版列寧選集，以及撰寫發表紀念列寧的文章。1960年的3、4月，鄧小平花極大的精力於焉。^[6-39]鄧為何主張編輯列寧的文集呢？從他所作的指示中可看出其動機：

編者向中央寫個報告，說明編輯思想，指出過去蘇聯出版的兩卷本列寧選集中刪了甚麼，最近出版的三卷本中改了甚麼；我們的四卷本中添了甚麼，去了甚麼。我們和蘇聯針鋒相對的思想就是關於要不要暴力革命的問題。列寧有關論述的小冊子要認真推敲，要反映革命。^[6-4]

亦即，鄧小平設想從列寧的「革命經典」中，找出能佐證中共支持暴力革命、與國外階級異己為敵的「合法性」；同時反映赫魯雪夫推行「三和」（「和平過渡」、「和平共處」、「和平競爭」）的「離經叛道」。

經過鄧小平的安排，4月22日，中共中央在列寧的誕辰日高規格地舉行紀念大會。同日，人民出版社公開出版數冊經鄧精心挑選的列寧言論集；^[6-41]另外，在鄧的主持討論與分工佈局下，由陳伯達主持起草的〈列寧主義萬歲〉、由胡喬木主持起草的〈沿著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以及陸定一主持起草〈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三篇文章，也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發表。相關文章後來合訂成一冊，以《列寧主義萬歲》為名出版，並譯成多種文字發送。^[6-42]

5月1日，美國偵察機闖入蘇聯領空被蘇軍擊落，赫魯雪夫要求美國總統艾森豪（Dwight David Eisenhower）公開道歉未果，最後憤而取消出席原定於5月中旬舉行的美、蘇、英、法四國高峰會議（裁軍、禁止核試驗、改善東西方關係為規劃議題）。此一發展與中共紀念列寧的文章內容，特別是有關揭露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論點若合符節，讓中共高層頗為得意，更決定利用此一事件，表面上大張旗鼓地聲援蘇聯反「美帝」，實際上意在促使蘇共改變對西方和緩的外交方針。這方面即由鄧小平統籌負責。

首先，編寫社論，闡述中方立場。

5月7日，鄧小平決定由胡喬木主稿，在《人民日報》發表社論。^[6-43]此一經鄧審閱、在9日刊出的〈對蘇聯的挑釁就是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挑釁〉，除支持蘇聯譴責美國入侵領空的行徑，更重要的是，藉機推銷中共強調的「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沒有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侵略和戰爭就是帝國主義的本性」的觀點。^[6-44]

其次，組織群眾大會，展現中共支持的決心。

對於赫魯雪夫抵制參加四國高峰會議的決定，毛澤東提出要在全國各地舉行群眾集會以示支持。鄧小平召集有關幹部開會，迅速組織聲勢浩大的群眾集會。5月20日在北京舉行的有300萬人參加的大會上，鄧小平也上場演講，宣稱：「全中國6億5,000萬人民，完全擁護蘇聯對於四國首腦會議所採取的嚴正立場，完全支持蘇聯反對美國侵略和挑釁的正義鬥爭。」^[6-45]

再次，會見其他共黨代表，進行政治遊說。

一方面，鄧小平直接向處於蘇聯勢力範圍之內的東歐國家使節表明中共有別蘇共的觀點。5月13日下午，他對捷克大使表示：

我們共同致力於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爭取和平應該「兩條腿走路」。一方面是群眾的鬥爭，包括社會主義陣營力量的壯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對殖民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運動。另一方面，我們也準備與帝國主義談判，例如最高級首腦會議、裁軍會議，如能達成協議當然很好，如不能，也能達到揭露帝國主義的目的。打仗也是「兩條腿走路」，就是爭取和平，也準備戰爭。現在有兩個口號「沒有戰爭的世界」、「沒有武器的世界」。辦到當然很好，不過在階級社會中絕不可能辦到。^[6-46]

另一方面，面對比鄰中國的「兄弟黨」，鄧小平針對蘇共的批評言論，就更為直白。5月25日，鄧小平對北越領導人黎筍（Le Duan）說：

有人提出我們的時代問題。甚麼是我們的時代？列寧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是否過時了？我們的觀點是，情況有變化，但帝國主義的特徵未變，1957年〈莫斯科宣言〉沒有過時。歷史不能根據某些人的情緒改造，不能憑個人感情。我們能否認斯大林領導革命30年的主要作用嗎？如果斯大林30年這麼醜惡，過去的革命都是假的，那麼，蘇聯30年也是醜惡，我們臉上也無光彩，全世界人民還有甚麼勇氣搞革命？和平過渡關係到人類的三分之二。不要輕易下判決書，判決不許革命。^[6-47]

鄧在27日的會談中更表示：

赫魯曉夫在匈牙利黨代表大會上說，各國黨要「對對錶」。「對錶」是應該的，問題是向誰對？向一個人的指揮棒對？還是向一個共同綱領對？應該向馬列主義對，向〈莫斯科宣言〉對。國際共運中現在存在著一些原則性的意見分歧，這不是策略性問題、局部性問題，是大非問題。我們希望同蘇聯同志取得一致意見，但這幾個月來，我們看到，這個目的達不到了，工作將是艱苦的。^[6-48]

連番主張對蘇共採取主動說理姿態的鄧小平，或覺得餘興未盡，更進而主張利用6月上旬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工會聯合會理事會，擴大宣傳中共的觀點。^[6-49]6月5日夜，中共宴請該會的重要代表。鄧小平宴會上表示：

關於我們的時代的問題，我們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現在有些人說反對教條主義，實際上是在反對馬列主義。我們認為〈莫斯科宣言〉是根據國際共產主義的發展和時代的特點制定的，它作出了正確的結論。我們的分歧歸根到底是這麼兩個問題：列寧主義過時沒有？

〈莫斯科宣言〉過時沒有？我們中國黨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大家商量一下。^[6-50]

由於世界工聯理事會並非國際共黨中央層級的內部會議，鄧小平對其代表提出共黨理論問題，立即引發蘇方代表的不滿，不但拒絕鄧的解釋，更當場抗議離席，成為中蘇雙方後來交相指責的一個問題。為報復中共這種出其不意的舉動，蘇共憤而利用同月下旬多國共黨代表群聚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開會的機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6-51]鄧小平對相關事態起到的催化作用，是顯而易見的。^[6-52]

還有必要指出的是，在1960年的春夏之交，鄧小平先是集其中央書記處同僚與中共理論權威之力，藉由搬出共產革命「老祖宗」列寧的「先祖教誨」，對蘇聯領導人的對外主張提出質疑，繼而特意利用美國間諜機事件、世界工聯理事會，證明與宣揚中共政策主張。聯繫到前面第五章的討論，在此同時，鄧小平也正為調整1960年「繼續躍進」的經濟計劃與制定「二五」後三年補充計劃費心，並忙於緊急處理與安排「大躍進」所造成的糧食、物資短缺問題。

此時，如果鄧小平與其他中共領導人不要如此計較中蘇兩黨在「革命理論」上的高下與輸贏，而將更多的心力放在民生國計，特別是「大躍進」之上，他們是不是可以更進一步或較早地發現運動本身的深層問題呢？或鄧小平至少不至於還調升1960年的煉鋼計劃並主持制定出一紙連毛澤東都覺得華而不實的「二五」後三年計劃草案？若是如此，是否也會有一些人民（特別是農民）得以免於餓死的命運？

1960年6月上旬，蘇共來信建議：利用6月下旬的羅馬尼亞工人黨代表大會，在該國首都舉行兄弟黨多邊會晤。經毛澤東、鄧小平共同評估分析，決定覆信答應與會，並由彭真率團參加，鄧小平則在北京擔任後方指揮、傳達中央指令。在此會中，蘇共代表一方面交付中共代表一封長信，即蘇共〈通知書〉，反駁中共先前發表的紀念列寧專文；另一方面，策動其他國家代表，在會場集中批判中方。雖然中蘇雙方在會議結束時表面上仍達致一定結果，但彼此分歧已無法掩飾。

7月4日上午，鄧小平召集中央部級以上的黨組書記列席中央書記處會議，介紹中蘇雙方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的激戰。鄧更以「捨我其誰」的口

氣鼓動黨內高幹：「鬥爭開始公開了，問題在對不對他的『錶』，中國屈服不屈服。中央決定不『對錶』，這關係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命運，關係到社會主義前途。」在同一會上，他也提出了中蘇「理論」歧異或有擴及兩國關係的可能性。^[6-53]果然不出鄧小平所料，7月16日，蘇聯突然照會中共，決定撤走其在中國大陸的全部專家，相關的合同協定也因而形同具文。中共高層群情憤慨不已，決定頂住壓力，大煉「爭氣鋼」，更要提前還債，從第五章中即可見鄧小平強硬的態度。

毛澤東由於同時面對內外困局而備感壓力。8月上旬，其他中共領導人勸毛稍事休息以免影響健康，毛亦表贊同。值得玩味的是，鄧小平建議毛：「脫離一下工作，完全休息」，「日常工作我們處理」、「小事不要過問了」；唯獨對蘇共〈通知書〉的答覆，鄧請求「主席過問一下」。^[6-54]由此，除可見對蘇關係在中共政治議程上茲事體大，亦能反映在相關問題上，鄧以毛為準、不敢越權自行做主。中共針對蘇方〈通知書〉的回覆，即中共〈答覆書〉，也由鄧小平統籌完成，^[6-55]並於9月10日交付蘇聯大使。

9月17日至22日，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赴俄，同蘇共中央舉行兩黨會談。此會談原旨為年底召開的多國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做準備，但中蘇雙方卻糾纏於中共剛提交的〈答覆書〉內容。另外，鄧小平強烈指責蘇共將黨的原則分歧擴大到國家關係上的做法，並質疑蘇方「究竟要把中蘇關係引到甚麼方向去？」鄧也強調：決心用自己的雙手，把蘇共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絕不就此屈服。^[6-56]由於雙方針鋒相對，會談毫無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談判期間，鄧小平與赫魯雪夫正面交鋒，赫氏突然提出高崗問題，並宣稱其遭整肅，乃是對蘇不友好之舉。鄧也立即強烈批駁、要求記錄在案。對此，一般多以赫氏言談一向缺乏思慮而常出現荒唐走板來理解。^[6-57]然而，由於高崗被打倒，鄧小平是關鍵的揭發者與參與者，赫氏此言應非無的放矢而是指桑罵槐，意在向鄧挑釁。若是如此，鄧小平在以毛、赫關係為中心的中蘇衝突中，因稱職地作為毛的代理人，不但已成為對立的雙方的一個主角，其政治資歷和個人因素，更成為對手做文章的藉口。10月1日至22日，鄧又率團赴蘇參加26國文件起草委員會，會上爭論激烈，再次無功而返。

1960年11月5日，鄧小平隨劉少奇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赴蘇參加十月革命43週年慶祝典禮，並出席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根據鄧在一線、劉在二線的談判陣勢，鄧在14日、24日兩次代表中共代表團在大會上發言，既抨擊5日蘇共為回覆中共〈答覆書〉而發出的〈答覆信〉，也「下駟對上駟」，直接挑戰赫魯雪夫。^[6-58]中共在會議期間與蘇方爭執不下，多次放出不惜破裂、流會的消息，使得與會各方甚為憂心。最後雙方各做

讓步，簽署彼此都尚能接受的〈莫斯科聲明〉。中蘇關係峰迴路轉，暫時獲得和緩。

毛澤東對於劉少奇、鄧小平在此次81黨多邊會議瀕臨破裂之下，終能取得協議、維持團結的成果感到滿意；對於鄧讓蘇方有所畏懼的盡職表現，亦讚譽有加。然而，對於中蘇往後的可能發展，鄧小平認為：「不能說整個鬥爭就此完結了」，「赫魯曉夫仍然保留他機會主義的觀點，而且這個人是善變的，他經常是臨時應付，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是一貫的」。^[6-59]

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中共中央決定對中蘇雙邊關係採取緩和的方針。1月14日，鄧小平在全會上作題為〈關於1960年11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的報告〉，他仍向與會者強調：「這個鬥爭告一段落，但不能算結束，是起伏的、長期的。」^[6-60]

不冷不熱的雙邊關係（1961–1962）

1960年底的莫斯科會議結束後，中共宣稱「要像保護自己眼睛一樣保護中蘇的團結」；相對地，蘇共也避免與中共發生正面爭論。因此，1961年雙方關係雖無顯著改善，但大致上也維持平靜。

1960年在中蘇關係上持好戰態度並積極獻策的鄧小平，在步入1961年後也有所收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大陸經濟因三年「大躍進」的蠻幹，已呈現全面凋敝甚而幾近崩盤的危局。鄧小平自身也認識到：1960年下半年為了與蘇聯較勁、硬煉「爭氣鋼」，而未能照顧到農業生產，讓市場供給問題更形惡化，實是「得不償失」。^[6-61]中國大陸嚴重的糧荒問題，^[6-62]更迫使鄧小平頗為難堪地在9月代表中共出面與蘇方商議自蘇進口糧食的問題。^[6-63]

然而，1961年的中蘇雙邊關係，表面上雖似波浪不興，但實際上仍暗潮洶湧，尤其是關於蘇聯對待阿爾巴尼亞的方式，以及蘇共「二十二大」的走向等問題，中蘇之間多存有明顯的歧異。在此過程中，鄧小平經常代表中共與蘇方進行這種「合而不固，鬥而不破」的互動。

在中蘇意識形態衝突上，阿爾巴尼亞是東歐國家中少有的同情中共者。1960年代初，阿國不滿蘇聯與南斯拉夫關係修好，對蘇採取敵對的立場；蘇聯也還以顏色，甚至揚言撤出駐守在阿國的軍隊與軍事基地。對於蘇阿之間緊張的關係，中共擺出調解人的姿態，呼籲兩黨兩國冷靜行事、加強團結，但實地裏較為袒護阿國。1961年5月11日，鄧小平即對蘇聯使館代辦表示：

蘇阿關係發展到這樣情況，我個人感到很不安。我深深感到，特別是像我們這樣的大國大黨（第一個是蘇聯，第二個是中國），採取正確的態度和正確的方法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蘇共中央在處理阿爾巴尼亞問題時還要更忍耐一點、慎重一點。[6-64]

對於中共在蘇、阿之間「拉偏架」的行為與暗中籠絡後者的盤算，蘇聯也甚為明瞭，因而在批判阿國之時，更多地加入了針對中共的用意。1961年10月舉行的蘇共「二十二大」，就上演這種「批阿打中」的戲碼。中共領導人也心領神會地接招，在會中以援阿為名，行以批蘇之實。

中共參加蘇共「二十二大」的所有事前準備工作，包括毛澤東的賀詞內容、中共代表團的組成人選與講話文稿，統由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籌劃。[6-65]鄧因應蘇共攻擊阿國的會議情勢，在國內緊急修改中共代表團的發言稿，強調蘇共此舉「無助於團結，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只能使親者痛、仇者快」。[6-66]10月20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介紹蘇共「二十二大」的情況，並說明中共的應對方針：

很明顯，孤立我們，孤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孤立中國共產黨，是赫魯曉夫這些人堅定不移的方針。赫魯曉夫在這次會上公開罵阿爾巴尼亞，實際上是罵我們。我們不能不答覆，不能不反擊。我們的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6-67]

中共代表團團長周恩來提前離會返國，就是中共對蘇共「二十二大」表示不滿的一個姿態。

1962年初，中蘇關係也曾發生波動，然因有所隱忍而未將事端鬧大。一是蘇共2月來信，指責中共與阿爾巴尼亞為伍，採取不同路線，但表示雙方應去異求同。對此，中共覆信提出以開會解決問題的建議。鄧小平主持了中共此封覆信的擬稿，並由他交給蘇聯大使。[6-68]鄧為此加以說明：「這封信的中心內容是，為了團結就需要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開會。……我們的出發點，要開，就必須開好。所謂開好，就是團結起來。」[6-69]但因蘇共提出須以阿國放棄原先立場為開會前提而作罷。

二是4、5月時，中國新疆塔城、伊犁地區發生數萬人越境出走至蘇聯的事件，鄧小平直接指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應變並防治。[6-70]此事件也使鄧在內的中共領導人認為蘇聯居心不良。

在1962年上半年，鄧小平對國內經濟進行更深入的整治和重建時，在對外關係上也願意思考調整的可行性。同年2月，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提出：為因應國內情勢困難，對外宜作約束與緩和，不要四面出擊、自陷腹背受敵，外援也須量力為之，以便集中精力改善國內經濟。[6-71]鄧小平對此主張就予以默許和支持。[6-72]但是，毛澤東等到國內形勢初步獲得舒緩後，在該年夏天又高舉「階級鬥爭」的旗幟。王的相關主張被毛澤東、康生批為是「三和一少」（要與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以及各國反動派和解，並減

少對「第三世界」人民的援助)的錯誤觀點。在毛澤東已明確表態下，鄧小平的立場迅即後撤，發言表示：「無論在國際鬥爭方面，還是在國內問題上，都要看我們的旗幟鮮明不鮮明。左派旗幟不鮮明，歪風就厲害。」^[6-73]鄧也建議補選康生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代替王稼祥領導中聯部的工作。^[6-74]

同年底，鄧小平在審閱《人民日報》1963年元旦社論稿〈鞏固偉大成績，爭取新的勝利〉時，加寫如後文字：

我們的任務是艱巨的，我們每走一步都會遇到不少的困難，我們必須自力更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在國際事務中還會遇著不少的逆流和風浪。但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人民，不會被艱巨任務和各種困難所嚇倒，他們將在黨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以堅定的信心和雄偉的步伐，迎接1963年的新勝利。^[6-75]

這或也可看作鄧小平表露自身在對外事務上，願意繼續悉心跟從毛澤東的心跡。

第三節 擔綱投入中蘇的公開論戰與走向決裂（1963–1965）

文攻與論戰（1963–1964）

1962年底，中蘇雙方因古巴危機與中印邊界衝突又產生齟齬；東歐五國共黨相繼召開的代表大會，在蘇聯影響下又對中共加以抨擊。對此，毛澤東自然不願坐視，在鄧小平的張羅、主持下，^[6-76]中共從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連續發表了〈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列寧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分歧從何而來？——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論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以及〈評美國共產黨聲明〉等答辯文章進行回擊，也就是所謂的「前七篇」。毛對鄧組織的文章甚為滿意，語多好評。^[6-77]

1963年2月21日，蘇共來信要求停止論戰、舉行兩黨會談，中共雖表贊成，但仍提出追究蘇共責任問題。1963年4月，加拿大共產黨領導人呼應蘇共主張並前來中國大陸遊說，對此，鄧小平憤然指出：「加共給我們扣的帽子都是從莫斯科販運來的，我們可以不理睬，只同他們談兩個問題：在黨的代表大會上指名攻擊兄弟黨是不是正確？到底是誰挑起國際共運大論戰？」^[6-78]

3月30日，蘇共再次來信，提出以它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問題的

看法為雙邊會談基礎。中共中央決定起草覆信，全面闡明自身的觀點，並將此一工作委由鄧小平主持。鄧小平表示：「要準備一個對案，提出我們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看法。」^[6-79]鄧事後也曾說：「我們得感謝他們的來信。因為他們的來信給我們出了個題目，給了我們一個啟發，我們感覺到確實需要解決總路線的問題了。」^[6-80]

經過鄧小平近70天的努力後，6月14日，中共發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6-81]此一被鄧小平形容為「搞文件以來最費力的一篇東西」、「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6-82]乃因其綱舉目張地陳列出中共不同於蘇共的意識形態主要觀點。事實上，雙方之後的爭吵仍不脫其範圍，辯論的文章也主要是對之進行專題闡述與細緻說明。

1963年7月5日至20日，鄧小平率中共代表團赴蘇參加中蘇兩黨會談。行前，毛澤東與鄧小平進行多次討論，研擬了談判方針。鄧小平對此的說明是：「最近在主席那個地方多次考慮了談判方針」，「這次談判的結果，實際上只能是兩個前途：一個叫拖，一個叫破。第一條要放在他破，我們不主動破。我們不給他一個藉口，好像我們首先來破裂。」^[6-83]「至於講話，當然也不給他抓我們，也要講分寸，也要站得穩。」^[6-83]「拖，就是拖下去，繼續爭論，各講各的。另外一個可能就是破裂。我們估計，他現在不敢破裂，但是，我們一定要做破裂的準備。」^[6-84]

鄧小平在此行中與蘇共代表進行多回合的馬拉松式的談判，毛澤東自始至終密切關注會談情況並直接發予指示，鄧小平也確實能夠執行方針、堅持立場。對於俄方代表一再要求中共無條件停止論戰，鄧絲毫不肯讓步，堅持蘇共必須首先承認其錯誤對待中共，否則，中方自然保有答辯的權利。^[6-85]俟其返國，毛澤東特地前去接機，表達對鄧小平表現的肯定。

再次與蘇交手後的鄧小平，態度堅如磐石。8月2日，他在會見南非共產黨主席時，悍然指出：「中蘇分歧的實質是關係到革命不革命、反帝不反帝、支持不支持民族解放運動等重大原則問題。目前中蘇關係可說已處於半分裂狀態。」^[6-86]隔日，鄧也在日本共產黨人士面前抨擊蘇共：「修正主義的實質是不革命，不反對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不支持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怕一點火會引起世界大戰，搞大國沙文主義，反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6-87]

在7月中蘇兩黨會談期間，蘇共中央在《真理報》上發表一封給其全黨的公開信，全面批駁中共6月中旬所發的〈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對此，毛澤東決定拉高攻擊，強調要對蘇方的觀點「加以澄清」。在此背景下，鄧小平基於「重質而不重量」的原則，^[6-88]領導「反修文稿起草小組」，^[6-89]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

報》和《紅旗》雜誌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關於斯大林問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反分裂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與赫魯曉夫修正主義〉以及〈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等文章，評論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亦即所謂的「九評」，將中蘇論戰帶到最高峰。

在此期間，1963年11月底，赫魯雪夫曾致信毛澤東，要求停止論戰，並希望藉由加強經濟、科技合作，提供設備、派遣專家的方式改善兩國關係。對於蘇共所提的停止論戰的意見，中共認為誠意不足、其中有詐，因而置之不理。鄧小平就對東德大使說：「〔蘇共〕他們想達到中蘇兩黨不講話，而讓其他國家的黨繼續攻擊中國共產黨的目的。雖然我們過去反對公開爭論，但現在看起來公開爭論也不是壞事。」^[6-90]

蘇共為了促使中共接受其停止論戰的提議，還請羅馬尼亞、波蘭共黨幫忙遊說。1964年3月，對於上門的羅馬尼亞「說客」，鄧小平直接切入正題，代表中共開出停止論戰的條件：「蘇共『二十二大』首先發起了公開論戰，如果要停止公開論戰，首先赫魯曉夫要宣佈蘇共『二十二大』攻擊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和不指名攻擊中國共產黨是錯誤的。如果赫魯曉夫真的認錯，我們就可以停止公開論戰。」鄧之後又對羅國黨人強調：「赫魯曉夫攻擊我們黨是公開的，承認錯誤也必須是公開的，爽爽快快，不要耍花招。」^[6-91]對於鄧小平所提的這種談和條件，羅國使者只能敗興而歸、宣告任務失敗。

對於蘇方所提的加強經貿合作、協助建設的倡議，鄧小平也顯露出不屑一顧的態度。他在1964年2月17日表示：「赫魯曉夫把蘇聯專家撤走，把幾百個協定廢除，反而促使我們自力更生。自己搞，搞得更好、更多、更紮實。看來，走自己的路更快、更好些。」^[6-92]中共在3月1日正式回信拒絕蘇共相關提議後，鄧小平在5日對捷克大使說：

過去，我們搞建設，總是看別人。現在，看不到別人了，情況就好些了。我們自己努力幹，就幹出了一些成績。例如，石油就是這樣。總有一天，人家會拿這個東西來卡我們的，事實上也在拿它來卡我們的脖子。怎麼辦？自己幹。再如原子彈問題。我們過去同蘇聯有過協定。但是，他們在1959年片面撕毀了協定。怎麼辦？自己幹。我們相信，別人能幹的事，我們也能辦得成。^[6-93]

鄧小平在同一講話中甚至指稱蘇聯在1960年撤回專家一事，乃是導致1960年代初中國大陸經濟發生困難、必須加以調整的重要因素。他說：「1959年至1961年是我們國家的困難時期。由於天災的影響和我們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規律不摸底，加上蘇聯撤走專家，撕毀合同，打亂了我們的經

濟計劃，使得我們必須重新進行調整。」^[6-94]這種說法後來長期成為中共官方解釋「大躍進」困難成因時的主流論調，以及控訴蘇聯落井下石的慣用舉證。但其真實性業已受到中國大陸自身研究者的懷疑，指出：「由於政治上的原因，中國官方過分強調了蘇聯撤退專家在造成1960年代初經濟困難中的作用。」因為當時80%以上的蘇聯專家「是在軍事工業系統」服務的，「造成1960年代初經濟滑坡和供應緊張的根本原因在於中國自己的政策失誤，而與蘇聯撤退專家沒有直接關係」。^[6-95]

值得一提的是，中蘇兩國在1964年還開始進行邊界談判。這起因於中共方面的主動挑起，而相關問題最初的提出，乃是透過經鄧小平審閱、於1963年3月8日刊出的《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6-96]該文表示：包括「沙皇俄國」在內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國家，曾經猖狂地侵略中國。它們強迫舊中國政府同它們簽訂了許多不平等條約」。文中列舉的1858年〈璦琿條約〉、1860年〈北京條約〉、1881年〈伊犁條約〉，^[6-97]皆與蘇聯的前身「帝俄」有關。

中共此時提起「不平等條約」的歷史問題，除了意在呼應其與蘇共進行論戰時，堅決反對蘇方採取的以上對下的壓制性立場與手法，也含有對雙邊關係中的具體議題，改採主動進攻的策略變化。蘇方對此予以迅速與強烈的反應，認為中共有覬覦其領土的野心，故開始調動重兵防備，兩國的邊界情勢益加緊張，邊界談判也列入中蘇互動的一項重要議程。^[6-98]中共政府代表團的談判方針與發言內容，乃由鄧小平經手審閱與掌握；^[6-99]中蘇邊界爭議問題引發的國際關注與憂心，特別是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如北越，鄧也負責向其解釋與說明。^[6-100]

中共（毛澤東主導、鄧小平配合）在中蘇意識形態爭論之外，另外加入兩國邊界是否為「不平等條約」的結果的爭論，不但使雙邊關係更趨複雜，後來更為中國大陸北疆的國防安全問題，投下了不穩定的變數。

兩方關係的實質決裂（1964–1965）

1964年10月16日，蘇聯發生政變，赫魯雪夫下台，布里茲涅夫（Leonid Ilich Brezhnev，在中國大陸通常將之翻譯作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對於雙邊關係可能出現的轉圜餘地，中共特地派遣周恩來率團赴蘇試探。在此次難得的機會上，由於蘇聯政局尚未明朗，此前累積了大量與蘇方高層談判、交往經驗（如蘇共領導人的背景、政治傾向及互動關係）的鄧小平，成為毛澤東倚重的諮詢對象，在中共相關決策中的角色至為關鍵。^[6-101]

11月7日，中蘇雙方在莫斯科進行外交試探時，竟發生蘇聯國防部長馬

利諾夫斯基（Rodion Yakovlevich Malinovsky）脫口建議中方代表賀龍推翻毛澤東的挑釁事件。中共高層人士在聞知相關情況時，由於事關擁護領袖、取信於毛，莫不表現得義憤填膺，鄧小平尤其是如此。鄧小平平常在外事活動場合中，就特別注意頌揚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在此次蘇共敬酒失言事件之前不久，他才對古巴的訪客表示：「我們很幸運有毛澤東這樣的領袖。」在會見厄瓜多爾共產黨人士時也說：「毛澤東最突出的貢獻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指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6-102]這既反映鄧個人的認知，也不能排除其有「出口轉內銷」、藉機取悅毛的心思。對於此次俄方非議毛一舉，鄧小平將之解讀為「顛倒敵我、干涉內政、顛覆領導、破壞團結」，並成為促使毛澤東決心責成代表團強化對蘇態度、升高談判籌碼的主因之一。11月8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強調：

我們可以利用此事把問題擺開來講，說明我們是為團結對敵而去莫斯科的，我們不僅自己派代表團去，而且為著表示我們的誠意，建議各個社會主義國家都派代表團去，共同慶祝十月革命節，在帝國主義面前表示我們團結一致。而他們竟然對我們採取像對待敵人那樣的態度，要干涉我們的內政，而且要顛覆我們的領導，這完全顛倒了敵我，破壞團結。

毛澤東對此深表同意，表示這是一根本問題，蘇方混淆了敵我關係，以及對待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應有的不同處理方式。^[6-103]鄧小平更代表中共中央發電指示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一、同意代表團代表中共中央向蘇共中央提出正式抗議，要求蘇共中央做出正式的答覆。第二，代表團要抓住這件挑釁事件採取攻勢，指責蘇共新領導破壞團結，繼續搞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第三，在同蘇共新領導會談時，不必談召開國際會議和它的籌備會議，也不必談中蘇兩黨舉行會談等問題。」^[6-104]

11月10日夜，毛澤東又召開常委會議進行討論。鄧小平在會上的態度仍舊強硬：

從代表團到莫斯科之後跟他們接觸的情況看，到目前為止，他們的表現並不是一種友好的表示，並不是向好的方向轉變，而是不好的表現。很可能他們並不是反對赫魯曉夫的路線，而僅僅是對赫魯曉夫的專橫跋扈、個人說了算有所不滿。另外還有不滿他把農業搞糟了。至於對赫魯曉夫的對外政策，對帝國主義求和、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大國沙文主義，恐怕現在的領導並不反對，因為他們是積極參與了這些事情的。^[6-105]

毛澤東接受鄧小平的判斷，並指示鄧綜整會議的討論內容，傳給周恩來作為行事的依據。在中蘇雙方信任基礎本已薄弱的情況下，經此次蘇方失言風波和中方未能見好就收、反而希望乘勝追擊的做法，使得雙方關係不但沒有和緩，反而益形惡化，新的蘇共領導也表示同中共的分歧並未因赫魯雪夫下台改變，雙方終至不歡而散。

其後，中蘇雙方爭辯的焦點，更多地集中在有關國際共黨會議召開的爭論（包括其形式、組成以及開會前提等），以及援助北越抗擊美國的問題

題。

1965年2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錫金（Aleksey Nikolayevich Kosygin）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領導人交換意見。對於蘇方在未與中共達成共識之前，可能逕行召開國際共黨會議的決定，毛澤東自稱與鄧小平同為「頑固不化」的「教條主義者」，不阻撓也不會出席。^[6-106]毛相關表態既傳達蘇共須自我承擔分裂責任的中方立場，也反映了毛、鄧在同一問題上的形影不離。不久，中蘇雙方又因援助北越的問題出現衝突。對於蘇聯提出的援越計劃：經中國鐵路，運送蘇軍戰鬥部隊與人員赴越；在中越邊境提供機場為蘇空軍所用；在中國領空開闢空中航線，讓蘇方運送武器與物資至北越等。中共外交部在鄧小平的幕後指揮下一一加以拒絕。^[6-107]

1965年3月初，蘇共不顧中共的反對意見，召開部分國際共黨參加的「協商會晤」，更在此會上指控中共阻撓蘇方援越。鄧小平一方面組織文章〈評莫斯科三月會議〉，批評蘇共召開的是「非法的分裂會議」，更指稱蘇共繼赫魯雪夫之後的領導是「三假三真」：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賣；假團結，真分裂。^[6-108]另一方面，針對中、蘇援越紛爭，鄧在國際上替中共「辯誣」。根據羅馬尼亞的官方檔案，鄧小平在同年7月的羅國之行，除了代表中共出席其執政黨的代表大會，也負有宣揚中共援越決心和立場的任務，以及解釋何以中方對蘇方的援越「共同行動」建議嗤之以鼻的原因。^[6-109]

直至「文革」爆發前，鄧小平反蘇態度可謂是旗幟鮮明、未見褪色。鄧批評蘇共領導人：「沒有一天停止對中國共產黨的攻擊，沒有一天停止反華運動。口頭上講甚麼停止公開爭論是假的，只不過公開的形式、表現的方式更多樣性一些，更巧妙一些。中國黨沒有必要改變自己的革命路線和政策。」^[6-110]他更直指「蘇修」為「美帝」的幫兇，以及美蘇合謀威脅中共的可能性。^[6-111]

1966年4月，蘇共召開「二十三大」，中共根本不派員參加。中蘇兩黨從1956年蘇共「二十大」出現嫌隙，至此形同陌路。

第四節 協調東南亞各黨觀點，爭取一致對蘇

「文革」前的中共對東南亞共黨外交上，鄧小平參與的活動主要圍繞在三個方面：一、出面同東南亞共黨接觸和交換意見，希望相關政黨支持中共對蘇聯的立場和觀點。二、努力促使北越在外交上偏向中共，慎防北越因蘇聯的拉攏而與中共漸行漸遠。三、代表中共與東南亞共黨接洽、商

議，鼓吹各地的革命活動和事業。其中，對蘇聯的針對性是相當明顯的。本節集中探討鄧小平在第一個方面的活動。

首先，在國際會議前後的遊說與溝通工作上：

鄧小平在1950、60年代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頗有一定的名望，主要肇因於他屢次出席重大的世界性共產黨會議，如前文提到的1956年蘇共「二十大」，1957年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和64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鄧小平也確實藉由參與相關會議，結識了包括東南亞共黨在內的各國代表，累積了從事黨際外交的知識、經驗及人脈資歷。

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在1960年代初因中蘇分歧而產生裂痕，中蘇之間的對立更直接表現在國際場合上。在親蘇的東歐各國共黨大會中，常常出現蘇共糾集東歐共黨代表一面倒地圍攻中共代表，以及在中共代表發言時集體鼓噪或發出噓聲的尷尬情況。^[6-112]面對會場上這種不友善的氣氛，向與中共互動密切的亞洲共黨如：日本、北韓和東南亞，以及澳洲、紐西蘭共產黨，即成為中共不致形單影隻的夥伴。東南亞共黨大者如處於執政地位的北越勞動黨，以及黨員達數百萬之眾的印尼共產黨，具有不可小覷的發言權；馬來亞共產黨、緬甸共產黨和泰國共產黨，雖然規模較小，在其國內無合法性的地位，勢力也略顯薄弱，然而，相關政黨代表若能適時發聲支援，對於中共的處境也能發揮不無小補的改善作用，最起碼證明中共是「德不孤，必有鄰」。

1960年11月，蘇聯召開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毛澤東責成領銜出訪的劉少奇和鄧小平要從最壞的情況去打算，表明「不簽字不等於是分裂」的底線。面對蘇聯串聯多數共黨掀起對中共的言語攻勢，身為中共代表團副團長的鄧小平，著力於與東南亞共黨代表溝通和協作。11月17日，鄧小平約緬甸、馬來亞、泰國三黨代表談話，透露出中共此一決定。^[6-113]值得注意的是，21日，緬、馬、泰三黨在大會上一致發言支持中共。緬甸共產黨總書記德欽巴登頂（Thakin Ba Thein Tin）的講話，尤其「明確、尖銳，完全不同意蘇共的意見」。^[6-114]巴氏以結合緬共親身經驗的說法，在如何看待帝國主義、世界和戰問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走向，以及此次會議的開法等議題上，力挺中共。馬、泰兩黨代表雖然「話說得軟些」，但與緬共的巴登頂意見如出一轍。^[6-115]緬、馬、泰三黨代表公然為中共喉舌，必與此前鄧小平親自出面做工作有重大關係。^[6-116]

事實上，中共採取高姿態不惜流會的決心和策略，也確實奏效，成為促使中蘇兩黨在最後關頭達成共識的重要因素。與中共「配合演出」的若干東南亞共黨，自然令中共感到滿意。12月1日，會議宣言完成簽字、成功閉會後，針對緬共先前賣力高調的表態，鄧小平在返國匯報之前，還特意接見緬共代表，以表慰勉與感謝。^[6-117]在鄧的建議下，12月12日，毛澤

東、劉少奇在北京還接見了緬、馬、泰三黨的負責人。[6-118]

在1960年莫斯科會議上「小兵立大功」的緬共，後來更聲稱「國際共運由ABC支撐」。所謂ABC，乃是阿爾巴尼亞（Albania）、緬甸（Burma）與中國（China）各自英文稱謂第一個字母的集合。其意指：此三黨才是馬列主義最正統的繼承人。緬共此一提法以及其表現出來的「黨小志氣大」，甚為中共所欣賞。[6-119]

1961年10月蘇共「二十二大」會議結束後，鄧小平馬不停蹄地與東南亞共黨就蘇共「二十二大」的開會情形與意義影響進行討論和評估。11月15至17日，鄧小平同其他的中共領導人一連三天與印尼共產黨領導人艾地（D. N. Aidit）會談。14日，鄧參加中共高層與北越領導人胡志明（Ho Chi Minh）的意見交換。他在21日又和泰、馬、緬三國共產黨人士就同一問題交談。[6-120]鄧小平的穿針引線，使得中共與東南亞共黨之間保持順暢的官方溝通。

鄧小平在中蘇問題上與東南亞共黨的積極通氣，也可引長年在中國大陸活動的馬共領導人陳平（Chin Peng）的回憶為證：「『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我常見到他。他經常給常駐北京的兄弟黨領導人作匯報，特別熱衷於向我們報告中蘇問題，以及中國對中蘇問題的看法。我們曾經公開進行交談。」[6-121]

其次，在對辯論文章的徵詢工作上：

中共和蘇聯論爭意識形態問題時，毛澤東一方面希望能獲得與中共立場相近的外國共產黨的意見，以使中共的主張具有所謂的「群眾基礎」，而非僅是中共一家的偏好，也象徵中共能不恥下問、不以黨小而廢言；另一方面，也能藉此將中共自身的觀點傳達給被徵詢的對象，讓對方更能認同、接受中共的看法，從而在未來更緊密地和中共合作。這方面的任務，正是由負責主稿中共反「蘇修」文章的鄧小平擔負，東南亞共黨則是鄧每每徵詢意見的重點對象。

鄧小平在1963年主持寫作〈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的過程中，甚為積極地徵求東南亞共黨的意見，既集思廣益，也期望相關各黨能給予背書以示「吾道不孤」。4月10日下午，鄧小平宴請泰國、馬來亞、緬甸三地「同志」，[6-122]「就中蘇兩黨會談和蘇共中央3月30日來信中提出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綱領等問題交換意見。」[6-123]5月，中共中央擬給蘇共中央的覆信草稿出爐後，鄧又指示中聯部再次徵求泰、馬、緬駐北京負責人對稿件的意見。[6-124]6月初，在中共中央發出給蘇共的覆信之前，鄧也在武漢同包括黎筍、長征（Truong Chinh）、阮志清（Nguyen Chi Thanh）、武遵、駐華大使黃明芳等人的越南勞動黨代表團，針對覆信內

容加以討論。^[6-125]由此可見他在徵詢友黨意見上之殷勤。

第五節 驅策北越靠攏，促其遠蘇近中

中共向來宣稱，其對北越的支持是不遺餘力亦不求回報的。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簡單。對北越而言，儘快地統一南越是它最重要的目標。北越領導人也深知，欲打倒由美國支持的南越政權，必須同時獲有中共與蘇聯的援助，因此對兩邊都高調感激。^[6-126]基於此種考量，北越並不樂見中、蘇之間日益加深的歧見，更不希望自己被迫在兩位社會主義「老大哥」之間進行選邊。對於北越的此番願望和想法，中共在一開始雖可以諒解，但是隨著中蘇對立加劇，中共對北越採取調和、不得罪兩邊的立場，愈加感到不滿，對之倒向蘇聯的疑懼也只增不減，更直接發酵在中共對雙邊關係的處理上。中共除了增加物資援助的誘因，也直接予以批評和施壓。其中，鄧小平經常擔負這種軟硬兼施中「黑臉」的工作。

中蘇意識形態爭論中的北越

面對中蘇意識形態爭辯的愈演愈烈，北越三番兩次在兩強之間進行緩頰。然而，中共對北越的相關努力並不領情，甚至強調在相關問題上，越方不能作為旁觀者或採取中間的道路（a middle course），^[6-127]故經常發生令後者尷尬的情形。

1960年底在蘇聯莫斯科舉行的81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期間，北越領導人胡志明在未與中共代表團事先商量之下，充當「和事佬」，試圖安排劉少奇和赫魯雪夫見面，面對面地討論雙方的爭議，謀求解決的方案。由於事發突然，遭中共代表團拒絕。

會議結束後，胡志明與黎筍返國行經北京時與中共領導人舉行會談。對於莫斯科會議期間胡志明欲在劉、赫之間牽線一事，鄧小平直言時機不妥：「那個時候見面只能吵架。」當胡志明進一步地提出希望中蘇相忍歸好的想法，並呼籲「把辣椒都收起來，都多給點糖」。鄧小平回應：「光給糖恐怕不行，因為分歧還有。他挑起爭論，他先丟辣椒，我們也得丟辣椒。雙方的意見不會那麼完全一致，還會有爭論的。」在同一場合中，毛澤東也在胡志明等人面前稱讚鄧小平：「赫魯曉夫很怕你這根棍子。你這根棍子出名了。」^[6-128]鄧小平對蘇強硬的態度，在越方人士之間想必留下深刻的印象。鄧直率的行事風格，在中越高層互動中一再地出現，也頗令越方高層感到不悅。

1963年6月初，鄧小平與北越領導人在武漢討論中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問題的看法。據越南方面的資料，雖然中共方面接受了越方提議

的部分修改意見，但黎筍、長征等越方代表又再次領教到鄧小平不假辭色的嚴厲態度。據分析是黎筍本人的談話紀錄中記載：

在1963年赫魯曉夫犯錯誤時，（中共）立即發佈了一項包括二十五點的聲明，邀請我黨前去發表自己的觀點。長征兄弟和我以及其他兄弟一同前往。在討論中，他們聽取了我們的十條左右的意見，但是當我們談到「不能放棄社會主義陣營」時，他們就不再聽下去了。……鄧小平說：「我掌管著我自己的文件。我徵求你們的意見，但是我不接受你們的這種觀點。」^[6-129]

南越游擊戰爭升級的問題

1970年代末期，中共與北越反目成仇後，越方控告中共過去居心叵測，曾意圖阻撓、遲滯南越革命事業的進展。此問題發生的過程中，鄧小平也與聞其中。

1958年夏天，胡志明與周恩來、鄧小平商談中共援越問題，並且向中方提交了在南越進行抗美活動問題的文件，希望徵詢中方的意見。中共建議越方需要考慮「在越南南方是否已經到了暴露白的武裝力量的時候」，而中共的看法是「恐怕還不到時候」，^[6-130]亦即抱持較為謹慎、保留的態度。

1960年，因應南越政權愈加採取高壓統治，北越決定在南越擴大活動，在取得一定的進展後，中共改而支持其在南越的鬥爭。同年的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宣告成立，中共率先承認。^[6-131]在南越的共黨活動方針是否需要作進一步調整的問題上，鄧小平可能是中共高層中最先提出要對之注意者，他在1960年4月下旬即提請毛澤東考慮。^[6-132]針對南越鬥爭的具體方針問題，鄧在5月也和周恩來建議越方重視策略的運用，根據城鄉不同的情況，採取靈活的鬥爭方法。^[6-133]

1961年11月14日，針對迅速發展的南越游擊戰爭，鄧小平隨同毛澤東、周恩來與胡志明進行會談。在評估此一游擊戰爭的作戰規模和影響上，鮮見的情形是，中共高層內部出現不一致的狀況。相較其他中共要人，鄧小平顯得略為保守：游擊戰要打，但要小打。小打，美國不會出兵。大打，佔西貢、堤岸等大城市，把吳庭艷政府完全推翻，美國就有可能出兵。周恩來表示應考慮大打。毛澤東則認為：不要怕，即使聯合政府成立了，也是暫時的，最後也還是要打。^[6-134]鄧小平敢在毛澤東面前表達自己的意見，在一定程度可以顯現他深獲毛的信任，故能直抒己見。

由於毛澤東的相關看法尚未明確，鄧小平的主張在一定的時間內也能代表中共官方的立場。因為在隔年6月3日，鄧小平偕同劉少奇、彭真與胡志明「就越南北方經濟建設、南越問題、老撾問題、國際共運等問題交換看法」。^[6-135]針對南越問題，鄧在內的中方人員仍是向越方強調「長期鬥

爭、準備條件、等待變化」。^[6-136]

鄧小平這種較為謹慎小心的主張，在毛澤東決心大力支持南越解放戰爭後便改弦易轍，特別是在美國升級對越南戰事的介入並擴及至北越境內後，鄧小平更多次在公開場合強烈表達中共對越方的支持。1965年4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外交部紀念萬隆會議十週年的招待會上宣稱：

美國正在越南瘋狂地進行戰爭冒險，這不僅是對越南人民的挑戰，而且是對亞非各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挑戰，是對亞非和世界和平的挑戰。亞非各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只有行動起來，把美國侵略者從越南趕出去，從他們侵略的一切地方趕出去，才能保障亞非和世界的和平。中國政府和人民一貫積極支持越南人民保衛北方、解放南方的偉大鬥爭。不論發生甚麼情況，不管需要付出多大代價，我們都將堅決履行自己的國際主義義務。^[6-137]

但鄧小平在1960年代初期的相關立場，猶為統一祖國心切的北越領導人所耿耿於懷，以至於後來越方指控鄧小平在當時曾出言不遜，干擾南越解放的進程。如黎筍指稱：

當我們正在南越作戰時，鄧小平規定我只能在排以下的規模上打，決不能在更高的規模上打。他〔鄧小平〕說：「在南方，既然你們已經錯誤地開始打仗，你們就只應該在排以下的規模上打，不要有更大的規模。」他們就是這樣給我們施加壓力。^[6-138]

增援北越的同時，抑制越蘇關係的發展

在援助北越的問題上，中共確實表現出國際主義慷慨大方的一面；但隨著中共逐漸摻入自己的反蘇情緒，進而直接、間接地要求北越接受中方的觀點時，便造成越方很大的困擾和壓力。鄧小平在這方面的作為和活動更是屢見不鮮。

1963年6月，鄧小平陪同毛澤東和北越代表團會談時，向對方表示：「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厲害得很，連抗美援朝的武器、旅〔順〕大〔連〕的設備，他們都要我們這麼多錢。我們幫助越南，幫助你們抗美、抗法戰爭，是當作我們的責任。我們援助你們的軍火是根本不要錢的。」^[6-139]亦即經由刻意突顯蘇聯在韓戰中對中共大發「戰爭財」的不義之舉，標榜中共援越的無私，也提醒越方對於蘇聯提供的援助要小心，以免上當、吃虧。為了證明中共挺越非假，同年底，鄧小平會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的訪問團，以示對南越革命事業的支持；關於中越談判簽訂衛生合作協定的問題，鄧也批示有關部門盡可能地滿足越方的要求。^[6-140]

其後，中共更決定贈予北越20億元人民幣，並協助制定一個長遠的經濟建設規劃，使其經濟（特別是農業、輕工業）能基本自給。易言之，以支持北越民生經濟的方式，建立更緊密的雙邊關係。若比照中共對外援助的歷年規模，中共提出20億元人民幣的援越計劃，可說是非常闊綽的決

定。中共在整個1950年代（1950年至1959年）的對外援助總額是27.57億元人民幣，中共此一援越計劃的金額約其72.54%；中共在1960年代的頭三年（1960年至1962年）的對外援助總額是17.36億元人民幣，還比中共此一援越計劃短少2.64億元人民幣。^[6-141]而且，中國大陸此時才剛剛從「大躍進」所造成的經濟谷底中爬出來而已。

為此，鄧小平與康生在1964年2月25日至28日訪問北越河內。^[6-142]鄧小平在25日夜的中越兩黨會談中表示：

最近，中國在考慮國家建設計劃時也設想了中越兩國配合進行經濟建設的問題。中國完全贊成越南在可能的條件下建設一套相當完整的自主經濟體系，既要進行農業、輕工業的建設，也要進行一些必要和可能的重工業建設。中國過去幫助越南搞的，只是在經濟建設初期，為滿足當時需要的一些項目。今後，中國將對越南提供更多的有系統的援助。^[6-143]

鄧小平在抵越的第二天，方露出中共帶來經濟厚禮後面的政治底牌。鄧在26日午後的雙邊會談中提出：「現在要建立兩個統一戰線，一個是廣泛團結全世界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包括如法國、日本這樣的間接同盟軍，結成反對美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另一個是建立反對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修正主義的統一戰線。」^[6-144]鄧說要組建一個反「美帝」的陣線，正愁美國在其南方伸手的北越，自是歡喜贊成；但鄧說要組建一個反「蘇修」的陣線，冀望得到整個「社會主義大家庭」幫忙的越方，就感到為難。

根據越南單方面的資料，鄧小平還向北越領導人提出更露骨的要求：中共向北越提供援助的交換條件，就是河內拒絕接受蘇聯任何形式的援助。^[6-145]亦即藉此釜底抽薪地隔絕蘇聯勢力的滲入。

未及半年，「東京灣事件」爆發（也就是美國在8月5日以其軍艦在東京灣受到襲擊為由，對北越進行攻擊的事端），越南的情勢急劇升溫，戰爭的烏雲密佈其上。中共認為發生區域戰爭的可能性大增，需要正色以對並做好準備；對於與「美帝」直接對抗的北越，中共也加大援助的力度。在中共領導人中，除周恩來外，可能就屬鄧小平最為投入。

鄧小平以中央總書記的身份督導、批審中共的援越工作，對於中共官僚部門所上呈的具體援越方案，往往是大開綠燈放行。1965年3月28日，鄧小平批閱同意北越戰時進出口貨物經由中國轉運；4月10日，批准向越方贈送通信設備；20日，對於「支援越南領導小組」組長羅瑞卿所提的派部隊幫助北越在其東北群島設防、修路及修建機場的請示，加以批可；6月10日，允許越方漁船向中國港口疏散。^[6-146]

在鄧小平與中共對北越大展國際主義精神時，中越雙方卻一直因為對蘇聯看法的歧異而持續引起紛爭；再加上，越南對中國揮之不去的歷史情

結和民族情緒，又潛在地產生作用，使得中越關係在堅定友好的表面之下，隱藏著一股不穩定和不信任的暗流。鄧小平多次代表中共擔負對北越「批評但不撕破臉，施壓而不吵過頭」的任務。

鄧小平對於胡志明個人向表佩服，在1960年代初甚至曾指示中共中央辦公廳派一工作小組至河內，專程了解、學習胡的生活作風。^[6-147]然而，涉及到中、蘇、越三角關係時，鄧小平對胡志明也就不那麼「溫良恭儉讓」了。1965年5月17日，鄧小平與胡志明會談時，針對蘇聯援越的動機問題表示：「他們〔蘇聯〕提供你們援助是為了他們自己的目的……簡單地說，蘇聯的援助是為了服務他們自己的戰略。」鄧甚至有些強人所難地向胡強調：「如果越南覺得不方便說出這個事實，讓我們替你們做。」^[6-148]

另外，針對當時越南的報紙和輿論提出「來自北方的威脅」影射中國的問題，鄧小平毫不客氣地對胡志明說：「如果胡主席也認為中國威脅越南，中國就把部署在廣東、廣西的幾萬駐軍撤走，放到北方去。我們放軍隊在那邊的原因，是為了預防發生像韓戰的情形，我們設想美國攻擊〔越南〕的可能性。」^[6-149]胡志明對此只能急忙澄清和否認。

1966年4月13日，中越兩黨舉行會談。鄧小平質問黎筍：「為甚麼你們害怕惹惱蘇聯？那中國呢？我要坦率地告訴你們我現在的感覺：越南同志對我們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但是你們並沒有告訴我們。」

鄧小平又同樣地以中共考慮自兩國邊境撤軍向越方施壓：

目前在你們國家的10萬中國軍人中，有些人可能犯了錯誤，而你們方面有一些人要利用這類事情在我們兩黨、兩國之間製造分裂。我們應該直言相告，現在，我們的關係不僅是蒙上了陰影，而且已經造成了一些傷害。這不只是由於我們對蘇聯援助的評判問題，你們是在懷疑中國幫助越南有自己的企圖吧？如果你們需要我們的幫助，希望能直接告訴我們。這個問題很容易解決，我們立即撤走我們的軍隊，在國內我們還有許多事情要做。沿邊界部署的軍隊也將受命返回內地。^[6-150]

此外，鄧小平和周恩來還聲明：「你們將蘇聯的援助與中國的援助相提並論，這對我們是個污辱。因此從現在起，在你們提蘇聯的援助的時候，不應提中國的援助。」^[6-151]

中共貫以「同志加兄弟」形容中越關係，然而，由於雙方基於各自的利益考量，彼此之間不免有不快的事情發生。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發現：在中共高層中，常由鄧小平出面處理雙邊關係中存在的棘手問題。鄧小平的稱職表現讓毛澤東和其他中共要人在與北越交涉時，無須陷入敏感的爭議，進而保有迴旋的餘地。但是鄧在「文革」中被打倒後，他先前在對越關係上的賣力表現，反而成為一項「錯誤」。1967年4月12日，周恩來就跟范文同（Pham Van Dong）、武元甲（Vo Nguyen Giap）表示：鄧小平等人「不尊重兄弟黨間的平等關係」，實行「大國、大黨政策」。^[6-152]

第六節 鼓吹各黨行動，開創革命形勢

中蘇爭論的主要議題之一，就是如何看待「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和革命運動的問題。中共原先堅稱革命不能移植，一定要自發於當地，但為了證明自身觀點較蘇聯更符合實際，一方面開始「傳道授業」，對外如數家珍地介紹中共自己的革命經驗；另一方面，「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更出力支援、促成海外激進的獨立和革命運動。中共宣稱其「作為東南亞革命運動的大後方」，「責無旁貸，義不容辭」，「會以最大努力來支持東南亞各國的反帝鬥爭」。^[6-153]東南亞即是中共與鄧小平著墨最深的對象。

馬來亞共產黨

中共在1954年曾與蘇共聯名建議馬來亞共產黨從武裝鬥爭轉變為政治鬥爭。然而，當時中共領導層內部對此建議似無保持全然一致。根據馬共領導人的回憶：劉少奇、鄧小平（時任中央秘書長）與中聯部支持馬共轉變革命形式；毛澤東則勸勉馬共「繼續戰鬥下去」。^[6-154]這後來在「文革」中被渲染、上綱為「中共在馬來亞革命問題上的兩條路線鬥爭」。1967年1月，毛澤東接見馬共中央代表團時還表示：「他們〔劉少奇、鄧小平、王稼祥〕這樣大膽，要你們轉變鬥爭形式的意見，沒有向我請示過，沒問過我的意見。」^[6-155]實際上，自1950年代中期以後，馬共在馬來半島叢林中已是經營困難，艱難的環境最終迫使其總書記陳平在1959年獨立地做出停止武裝鬥爭、改行政治鬥爭的決定。

1960年代初期，中共第二次對馬共的革命事業予以建議。此次中共計劃提供具體的援助，試以影響馬共的革命決策與方向，中共方面就是由鄧小平出面與馬共領導人進行會商。這也是截至目前為止，最直接顯示鄧小平代表中共鼓勵東南亞共產黨從事暴力革命的例子。

1961年7月，鄧小平約陳平進行一天兩階段的正式會談。鄧小平強調東南亞革命情勢大好，有益於展開軍事鬥爭，希望馬共善用此一時機發展，中共也保證給予支持。陳平回憶：

他通知我們說，東南亞就要經歷一場巨變。我們都知道他不久前才和胡志明會晤。我猜測他是知道了河內要在南越發動革命的意圖，以及胡志明矢志統一祖國的決心，才會說出這番話。鄧小平也深知緬甸、暹羅、老撾及印尼共產黨同志的心思和盤算。這些兄弟黨當時都在中國維持重要的訓練設備。

鄧小平強調說，就策略上而言，東南亞的整體形勢，對類似我們在馬來亞展開的鬥爭越來越有利。他力勸馬來亞共產黨不要在這個節骨眼上轉變政策。我們必須善用這個即將席捲全東南亞的時機。

鄧小平向我保證，如果能夠達成協定，中國會支持我們，而具體的統籌工作將交由中央聯絡部負責。鄧小平也解釋說，中央聯絡部獲得授權敲定預算。^[6-156]

根據馬來西亞方面的相關研究，在1961年中陳平抵達中國首都以前，鄧小平在中聯部高幹劉寧一的陪同下，已與長駐北京的馬共中央代表團舉行多次的中馬兩黨會議。鄧小平在相關會議上一再地鼓勵馬共堅持武裝鬥爭，建議馬共學習中共的革命經驗，並針對馬共當時所處的挫敗處境加以撫慰，表示在任何鬥爭中，革命力量的高低起伏，乃屬平常之事。在具體的援助問題上，鄧小平強調：任何革命鬥爭的成功取決於幹部的素質，因為革命的營造者是人而不是武器。倘若馬共人員需要到中國尋求庇護，中共竭誠歡迎；在其準備妥當後，即可自主地返回馬來亞。他也表示中共可以向馬共幹部提供必要的訓練，但是鬥爭的技術層面問題，必須由了解當地情況的馬共自己作出決定。[6-157]

經過鄧小平的多次勸說與保證，參與會談的馬共中央代表團的主要成員如：馬共主席穆沙阿默德（Musa Ahmad）和政治局委員小章（原名章傳慶），很可能都已經被說服了。因為他們後來在馬共中央內部討論時，對於鄧小平對陳平正式提出的建議，皆甚表贊同與積極，促使陳平接受。[6-158]

以慷慨的金援作後盾，兼之以勤快的開會遊說，鄧小平很成功地得到一度偃旗息鼓的馬共領導人的正面回應。陳平即指出：

當我們與中國共產黨交談的時候，我們的核心立場就是，馬來亞共產黨恢復武裝鬥爭的成敗，取決於中國願意在多大程度上援助我們。鄧小平已經授權其屬下處理馬共事務，我們現在是和中央聯絡部的最高層幹部打交道。[6-159]

既然鄧小平已向馬共領導人作出支援的承諾，馬共與中聯部後續的談判即進行得非常順利，馬共提出的金額預算要求，中共照單全收。陳平就說：「我們和中央聯絡部的磋商歷時幾個星期，而且非常成功。這是我參加馬來亞共產黨以來，黨的財政狀況第一次得到保證。」[6-160]馬共因為受到中共的激勵和穩定的財政支援，毅然改變方決定不久的政治鬥爭路線，頒佈「積極堅持，逐步發展」的「新方針」，重回武裝鬥爭的道路。[6-161]到了1964年，馬共的游擊隊員人數也從300人迅速增長為800人。[6-162]

馬共在獲得中共的金援而絕處逢生後，作為政治回報，一方面，駐留在中國大陸的馬共領導人「得為中國分析馬來亞的政治演變」；[6-163]另一方面，對於中蘇意識形態論戰，馬共更是偏袒中共，進而在1965年1月31日發表〈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聲明〉。中共樂得大肆登載馬共此一政治文告。[6-164]陳平對此表示：「我們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作了很重要的聲明。我們相當清楚地表達了我們的立場。我們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其次，我們反對大國沙文主義。因此，我們是偏向中國的。」[6-165]

鄧小平在「文革」初下台後，陳平為首的馬共領導人，不顧鄧在1960年代初曾在中馬兩黨合作上所曾扮演的媒合角色，竟也投入對之的揭發與批判。^[6-166]或是受到馬共揭發的影響，周恩來在1967年1月14日曾表示：「十一屆全會以後，中央各部，各省、市沒有一個過關的，原來說中聯部好的，實際上王稼祥、鄧小平都有問題，對馬來亞黨比對父子黨還嚴重，非常嚴重，比斯大林嚴重得多。」^[6-167]

印尼共產黨

在1965年「九二零政變」之前，^[6-168]印尼共產黨在印尼政局中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時的蘇卡諾（Bung Sukarno）政權對共黨勢力採取合作的政策，印尼共在其國內的勢力和國外的聲望皆受到各方的注目。中共與印尼共之間的密切互動，每見於雙方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觀點的唱和與舉措的呼應。

由鄧小平主持起草、^[6-169]在1965年5月23日的《人民日報》上發表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主席熱烈祝賀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成立四十五週年〉，就宣稱：

中國共產黨以有印度尼西亞共產黨這樣親密的堅強的戰友而感到十分自豪。我們兩黨的革命團結和我們兩國人民的戰鬥友誼，在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的鬥爭熔爐中，經過了千錘百煉，經受了嚴重考驗，是任何力量都破壞不了的。這種友誼和團結必將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在反對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中，我們堅定不移地同你們站在一起，並肩前進，共同戰鬥。^[6-170]

此外，中共與印尼共之間關係的緊密，也表現在雙方高層密集的訪問交流。僅從1964年到1965年印尼政局出現大動盪之前這段期間來看，在中共領導人中，鄧小平露面與印尼共各級領導人接觸的頻率尤其繁多。1964年10月6日，鄧小平會見以印尼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副書記優素福·阿吉托羅普（Jusuf Adjitorop）為首的印尼共代表團。1965年7月5日夜，鄧小平設宴招待以印尼共中爪哇大地區委員會常委蘇克米、西蘇門達臘大地區委員會常委阿布·曼蘇爾（Abu Mansur）為正副團長的印尼共代表團。^[6-171]7月17日至27日，鄧小平率團出席羅馬尼亞工人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期間，鄧兩度會見同樣與會的印尼共主席艾地。^[6-172]根據中共外交部公佈的檔案，7月24日，鄧小平與艾地晤談時，後者感謝中共對於印尼共該年度的慶祝建黨45週年活動的支持（除中共派彭真出訪印尼道賀，也包括前述的鄧小平主持起草的賀文）。鄧小平也向印方介紹中共批判「蘇修」的規劃，特別是整理出版赫魯雪夫的言論集，他強調：「很需要把新、老修正主義對照一下。」^[6-173]

在「九二零事件」爆發前的一個月（亦即8月1日至7日），艾地率印尼

共代表團訪問中國大陸。對於艾氏的到訪，在外事禮儀上，鄧小平親自予以接、送機，並出席中共中央舉辦的歡迎宴會；在實質討論上，鄧小平不但參與兩黨代表團的會談，其後更陪同毛澤東接見艾地，直接與閩雙方最高領導人之間的交談。^[6-174]

有關「九二零政變」的真相問題，蘇哈托（Haji Muhammad Suharto）為首的印尼軍人政府對外宣稱：該事件乃是中共唆使、煽動印尼共進行的不法顛覆活動。並使得中共與印尼兩國的外交關係長期陷入停滯中止的狀態。對此，中共官方一向予以否認，指出相關說法純係子虛烏有，因為事發之前中共對此一無所知；^[6-175]進而反指此乃印尼軍方藉機擴大事端、接管政權的人為藉口。中共在該事件中確實涉入的程度和真實扮演的角色，至今仍未公諸於世。學界對此亦存有分歧：有文獻指稱對於印尼共在1965年發起的武裝攻擊，雖然中共參與的程度不明，但中共是一個堅定的支持者，則無庸置疑。^[6-176]另有論者主張，權衡各方勢力在印尼共起事後的可能得失，即便印尼共一舉成功，中共得利最小；但行動一旦失敗，中共將損失最鉅。故認為中共應不至於支持印尼共貿然行事，因而是處於被動的地位。^[6-177]

鄧小平在相關問題上的實際作為，囿於資料的不足，更是模糊難以斷定。雖然有學者以鄧小平熱情接待來訪的印尼共高層，以及僅1965年中共即贈予該黨上億元的人民幣為由，指涉鄧在中共向印尼共推廣其武裝革命奪取政權模式上的重要角色。^[6-178]但無論對中共或鄧小平個人而言，印尼共遭到武力剷除、在短時之內土崩瓦解的結局，都是一直接的衝擊，因為這無疑讓當時高調表示世界革命情勢一片大好的中共高層（包括鄧在內）大失所望。^[6-179]

從1965年底至1966年初，鄧小平在接見外國共產黨，特別是仍未取得政權的友黨時，經常強調的重點包括：革命不怕挫折；一個黨重於戰鬥力、聯繫群眾的能力，而不是其黨員人數；要注意統一戰線的操作問題。^[6-180]這些明顯都是針對印尼共失敗的慘痛教訓有感而發。1966年4月7日，鄧小平會見印尼共中央副總書記阿吉托羅普。^[6-181]「九二零政變」事發時，阿吉托羅普正在中國訪問，因而逃過軍方的大肆捕殺，也是該黨少數倖存的高級領導人。鄧小平之所以找阿吉托羅普相晤，應無外乎詢問印尼共的殘存情況，以及該黨之後如何在中國維持運作等問題。鄧也有可能在此會談中代表轉達毛澤東對印尼政局巨變的看法。

如前所述，中共是否直接參與印尼共支持進行的「九二零政變」，目前仍無定論，但是中共確實一直鼓勵印尼共「只要有奪權的機會，就奮起以武裝鬥爭奪權」。艾地對此也似無惡感，^[6-182]其本人並曾到廣東聆聽、學習中共的武裝革命經驗。^[6-183]根據中共外交部相關官員的說辭，中共對

印尼共的支援，包括：政治、輿論、物力、財力，也還有軍火。^[6-184]「九二零政變」激化了印尼局勢，中共倒覺得是一政治時機，讓習於在體制內活動的印尼共脫掉西裝與皮鞋「上山」，改採體制外的武裝抗爭。^[6-185]中共拭目以待艾地及其黨人能一展身手，但想不到這個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在野的共產黨竟是如此不堪一擊，對於印尼軍方的進剿，毫無招架還手之力，艾地與絕大多數的印尼共高幹遭到格殺，各級黨組織未戰即垮。毛澤東雖痛惜艾地的身亡，^[6-186]仍對印尼共的「不成材」有所指責。毛就對日共領導人表示：「印尼共產黨犯了兩個錯誤。第一，他們盲目相信蘇卡諾，過高估計了黨在軍隊裏的力量。第二，他們動搖了，沒有打到底。」^[6-187]

鄧小平與阿吉托羅普會面後的五個月，即1966年9月，印尼共中央政治局發表了〈自我批評〉的文件，對自身的發展歷史進行檢討並作出結論：在「九二零事件」以前較長的時期，其領導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九二零事件」中，犯的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九二零事件」後，又犯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6-188]其觀點同毛澤東如出一轍，或也可見中共對之的影響。

其他共黨

有關鄧小平介入東南亞其他共黨採取武裝行動的資料，更是屈指可數，泰國共產黨的情形尚可聊備一格。中共與泰共關係久遠，泰共早期的負責人徐啟新即是中共人士，^[6-189]徐在中共建政後也出任中聯部的領導職務。有徐作中介，中、泰共的兩黨關係自能保持一定的熱絡。根據馬共領導人的回憶：泰共領導人王斌在1949年夏即參加中共在北京開設的以東南亞共黨為對象的理論學習課程。^[6-190]根據陳平的觀察，泰共駐留在北京的人數相較他黨雖屬最少，但卻是最多人參加中共所提供的長期學習課程。^[6-191]可見泰共甚為重視汲取中共的革命經驗。泰共的成長也頗受中共的重視，因為泰國在地理位置上與多個東南亞國家相鄰，是區域共黨之間進行聯繫的重要途經之地。泰共如能坐大，有助區域共黨連成一氣。美國後來在泰國境內設有軍事基地，中共幫助泰共培養武裝力量，也期望對之起到騷擾與破壞的作用。

1961年起，泰國東北部和南部相繼出現與泰共直接相關的武裝反政府活動，恐不僅是時間上的巧合，同年4月29日，鄧小平曾會見泰共中央總書記王斌。^[6-192]泰共在1962年3月開設「泰國人民之聲」，傳播共黨政策、鼓動民眾，直接挑釁泰國政府。該電台基地位於中國境內，中共背後對之撐腰，自不在話下。

值得分析的是，1964年2月16日和17日，鄧小平在廣州與乃比里（Pridi

Phanomyong) 舉行兩次會談。中共官方的《鄧小平年譜》僅簡單地透露鄧在會談中向乃比里介紹當時中國的國內情勢，而無述及其他內容。^[6-193]然而，乃比里為親泰共勢力的政治人物，曾擔任泰國政府總理一職。其被迫去職後長期流亡中國，中共暗中對之勤加觀察並灌以「說明教育」，期望他能在泰國未來的革命事業中，得以為中共所使，並安於同泰共共事。^[6-194]乃比里在後來積極發展的泰共活動中的中心角色和中共對之的支持，即遭受他儂(Thanon Kittikachorn) 為首的泰國政府的強烈指控。鄧小平和乃比里在穗一晤，是否有達成任何有關對泰共活動的共識，雖然仍有待進一步的釐清，但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泰共之後的活動更是如火如荼。

1964年11月1日，「泰國獨立運動」成立；1965年1月1日，「泰國愛國戰線」成立。1965年4月，這兩個組織宣佈常駐中國大陸，「以便尋求各國朋友對泰國人民對拯救祖國的正義鬥爭的同情」；武裝鬥爭亦於同年8月7日開始進行。11月1日，「獨立運動」加入「愛國戰線」，使泰共的力量更為集結。^[6-195]此一時期，中共對泰共所作的多方面的支助，包括：組織成立與重組、資金籌集、人力訓練以及宣傳攻勢的密集配合等，^[6-196]一度使得「泰國人民的反帝愛國鬥爭進一步高漲」。

在菲律賓共產黨方面，中共與之的淵源雖可溯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雙方的關係並曾在1940年代末達到高峰，但相較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由於菲律賓位置較為偏遠、重要性較低以及菲共組織內部渙散的原因，從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中期，中共對菲共並未予以太大的關注，遠遜於其對待馬共和泰共的積極。兩黨之間的組織聯繫孱弱，中共在菲共決策中的角色也僅在於指導啟發(guiding inspiration)的作用。^[6-197]就現今所能獲得的相關資料，尚未見到鄧小平曾在此一階段中共與菲共往來中露面或活動的紀錄，這或是從一個側面反映當時雙邊互動不甚熱絡的事實。兩黨的關係要等到屬於「文革」時期的1960年代後期方轉冷為熱，但也只是限於從菲共中分化出來的親北京的激進派而已。^[6-198]

最後，相較於中南半島其他國家，柬埔寨共黨勢力的發展較遲。鄧小平與柬埔寨共黨運動的關係，可溯及1960年代中期柬共尚未成氣候之時。1965年11月至隔年2月，後來惡名昭彰的柬共領導人波帕(Pol Pot)赴中國大陸進行秘密訪問。在此期間，鄧小平曾接見波帕。鄧是波帕所見到的最高層級的中共領導人。^[6-199]鄧小平的官方年譜對此雖有記載，但有意地迴避了敏感的情節。其記錄了鄧小平在1966年1月10日會見了高棉人民革命黨代表團(即柬共)，卻沒有提及波帕也在接見對象之列。該年譜指出鄧在會見中介紹中共的革命經驗，也談及共產主義的實踐問題。^[6-200]至於鄧有否對柬共的發展方向與策略提出中方的看法，以及中共具體援助柬共的問題，皆不見交代。

然而，著眼於中共與柬埔寨當時執政的施亞努親王（Norodom Sihanouk）（中國大陸通常譯為西哈努克）保持良好的外交關係，以及柬共羽翼未豐、勢力仍弱等原因，鄧小平應不致於直截了當地鼓吹波氏與柬共立即起事，以推翻施亞努政府為優先目標；而較有可能是勸之蓄積實力、等待時機。^[6-201]

但是，鄧小平麾下負責接待的中聯部，特意安排波帕學習中國武裝革命、農民運動、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反修正主義的理論課程，再加上「文革」前夕中國大陸趨向激進的政治肅殺氛圍，耳濡目染下皆不免對爾後波帕返國的作為（波氏甫回國即提出為強化城鎮的力量而鬥爭、為農村的武裝暴動作準備的路線），^[6-202]甚至未來施政的藍圖造成偏差性的影響。

小 結

從前述正文的討論，可以清楚地看到鄧小平對「文革」前中共黨對黨外交的盡心投入與辛勤奔波。此處則簡要探討：鄧小平的外交角色與作為所造成的政治影響及責任。

在中共和蘇聯進行論爭時，雖然毛澤東具有一錘定音的決定性地位，但是不能忽略其他中共領導人的積極參與。其中，鄧小平的角色與作用即甚突出。最能代表中共反「蘇修」言論的「前七篇」、〈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九評」，皆由鄧小平負責主稿。^[6-203]鄧小平在相關批判文稿產出的過程中，並非簡單地過目經手而已，他具有甚大的權限，例如：文中涉及第三黨時，是否可對之點名褒貶，他可當場決定；在批評赫魯雪夫取消階級時，是否宜談及史達林在同一問題上的錯誤，他拍板說可，並提出區分兩人的要求。鄧小平可豐富文稿的內容，例如：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有關無產階級的政黨繼續脫離群眾要求、逆勢而行的後果問題上，他主持羅列包括被黨內、外的馬列主義者取而代之等幾種可能情況。^[6-204]他也力求將文稿的核心論點「濃纖合度」、「恰如其分」地展現，例如：在「第九評」中，有關「蘇聯的特權階層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這頂「政治帽子」的陳述與論證上，就由其具體掌握拿捏。^[6-205]

中蘇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大打「筆墨官司」，毛澤東與鄧小平因懷有共同的信念，而顯得「志同道合」。^[6-206]由於鄧如實地做到「鄧手寫毛口」，毛對鄧把關下的作品，語多讚揚。事實上，毛對鄧在中蘇關係上的總體表現甚為激賞，鄧後來在政治上也因此獲益不小。^[6-207]

中共「反修」言論存在不少的錯誤觀點與荒唐之處，例如：「第九評」中批評赫魯雪夫的經濟政策，使得蘇聯的國民經濟陷於嚴重的混亂，並稱他為「一個不可救藥的敗家子」，因為其花光了史達林時期的糧食儲備，給蘇聯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嚴重的困難。^[6-208]中共在作相關的指控時，是否曾聯想到幾年前中國才因「大躍進」而發生經濟混亂、生活困難以及大規模的缺糧死人？是不是過於寬以律己、嚴以待人？主持文稿的鄧小平是否感到心虛呢？

鄧小平需要面對的不僅是文責而已，更要擔負整個「反修」論述對中共爾後政治發展所產生的惡劣作用。事實上，鄧自身的政治生涯就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一方面，鄧小平助長中蘇之間的對立，造成中國處於風聲鶴唳的外在氣氛。對週遭環境險峻的認知，又必然對國內政治的發展造成約束和壓迫，因為應付外來威脅而啟動的政治動員機制，勢必擾亂內在優先的關注焦點和正常的運作方式。「大躍進」激情過後，鄧小平在經濟為主的內政問題上漸拾理性，但中共因對外關係緊繃而對內又提出備戰要求，兩者之間存在著衝突與矛盾。易言之，在外張內弛的背景下，鄧小平對外強硬的立場，反倒擠壓了其對內治理的彈性空間（詳細的討論，可見於第七章）。

另一方面，鄧小平輔弼毛澤東的對外「反修」活動，其自然的發展邏輯即是「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就是當毛澤東發現列寧、史達林所在的蘇聯，竟也會變修變色，類似的危險自有可能在「社會主義中國」出現。

「九評」本身已構築了一個似可言之鑿鑿、自圓其說的思想體系，即在一個為時甚長的社會主義社會歷史階段，還存在階級鬥爭以及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除了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經濟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外，政治戰線與思想戰線上也必須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若非如此，鐵打的社會主義江山也難逃變色之日。^[6-209]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大躍進」後困難時期的因應對策和措施，就遭毛批判為修正主義式的做法，劉、鄧後來更被視為竊取要職、潛伏中央上層的赫魯雪夫式的人物。此乃「文革」醞釀、產生的一主要背景與原因。

鄧小平秉承毛意戮力打造的「反修」理論工程（鄧對此認同並加以傳播），^[6-210]最後在「文革」居然成為他和劉少奇被打倒的論據，如此作繭自縛，恐為其所始料未及。追根究底，鄧小平在中蘇論戰上的理論「建樹」，事實上正為後來的「文革」理論作出隱而不顯的鋪墊和準備。深受「文革」禍害的鄧小平，較諸其他「文革」的倖存者，對此也應有更深邃的感觸與體認。

在中共與東南亞共黨互動上，鄧小平在「文革」前緊隨毛澤東的相關作為，例如：使勁要南方的「兄弟黨」在中蘇之間「擇良木而棲之」，不

要誤上「蘇修」賊船；不顧國力地輸出革命，兜售自家經驗、饋贈軍經物資，希冀在該地區營造出處處烽火的燎原態勢。在「文革」時更是登峰造極，演變成如脫韁野馬的激進外交行徑。其間的政策連續性甚至在「文革」後，仍可見其影響與遺緒，譬如：中共與甫告統一的越南鬧到翻臉、兵戎相見，致使兩造關係冷凍、停擺多時；^[6-211]中共在波帕和「赤色高棉」（Khmer Rouge）當政後作出令人「大惑不解」的行為時，^[6-212]仍執意給予支持，讓中共在國際社會中處於被動與尷尬的境地；^[6-213]以及中共與東南亞共黨關係的「歷史問題」，一直困擾、阻礙中共與當地政府之間的正常往來，遲至1980年代末才渙然冰釋。這些皆恐與曾是歷史當事人的鄧小平個人的堅持，^[6-214]或是他在相關問題上一時未能驟然決斷，高度相關。

對於中蘇關係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何去何從的問題，「文革」前的中共高層存在高度共識和一致性，即使在策略與步驟上曾有過些許差異，但並無本質的分歧。但在1960年代前半期的國內問題上，特別是「大躍進」步入泥沼、舉步維艱後的整治方向，鄧小平與毛澤東的協作情形，就沒有像對外關係上如臂使指般的契合與暢達，從而埋下了毛在「文革」中批判鄧的關鍵種子，這是下一章討論的課題。

注釋

[6-1]J. D. Armstrong,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7), pp. 48–56.

[6-2]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頁118。

[6-3]在政府對政府外交上，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代總理的身份協助總理周恩來，例如：鄧在周出訪期間，指示政府外交部門處理中共與法國建交設館的事宜。載鍾文編：《鄧小平外交風采實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頁56。

[6-4]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頁291。

[6-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頁9。

[6-6]赫魯雪夫在1954年訪問中國大陸時，提議引進中國勞工至蘇聯。在中蘇雙方準備相關協議文件的過程中，鄧小平曾向蘇方人員表示：「又是中國苦力。上個世紀就有中國苦力，而現在又有中國苦力，不同的只是他們去的是蘇聯。」令後者感到不快。閻明復：〈聽阿爾希波夫談中蘇關係〉，《百年潮》，2007年第11期，頁15–16。

[6-7]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頁460–462。

[6-8]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上冊，頁5。《我的一生——師哲自述》，頁460。

[6-9]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上冊，頁6、8、18。

[6-10]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上冊，頁19。

[6-11]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編者說明頁1。

[6-12]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頁189。耿飆：《耿飆回憶錄（1949–199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249。中國大陸中共黨史學者（D君）指出：黨際外交上，在中共中央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在管，而具體工作則由鄧

小平負責。例如：基於外交對等性，關於外賓來訪接見的問題，由鄧小平提出建議如「請主席參加」或「請少奇同志跟我參加」。中聯部的報告直接送呈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

（北京，2007年1月）

[6-13]1959年劉少奇出任國家主席，肩負國家元首正式外事活動的重責後，對帶有秘密性質的黨際外交活動，便改以選擇性的領銜出面，以免造成對外被動的情況。例如：1963年4月，劉少奇以國家主席的身份訪問印尼，即刻意避免與印尼共產黨領導人接觸。載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309。隨著中蘇兩黨交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分化，爭取各國共黨支持中共的意識形態路線和主張，成為中共黨際外交迫在眉睫的目標，較諸劉少奇，年輕力壯的鄧小平更常擔負對各國共黨從事遊說、周旋的任務。據阿爾巴尼亞大使的回憶：1962年，劉少奇與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與阿國勞動黨的代表團在北京舉行會談。鄧擔負中方主要與談人的工作，常作連續數小時的發言；劉僅負責調節會議氣氛，以讓雙邊談判順利進行。該名大使對鄧小平思考的視野、論證方式以及充沛的精力印象深刻。載馬利列（R. Malile）著，王洪起譯：《我眼中的中國政要》（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頁113–116。因此，在經營黨對黨外交上，鄧小平愈益代替劉少奇，承擔、負責該工作的主體實質部分。

[6-14]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台北：雙大旅遊出版社，2000），頁25。

[6-15]鄧小平對蘇方指出：蘇共的大國主義錯誤，是波匈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必須承認國與國、黨與黨的獨立平等原則。鄧也轉達毛澤東的意見：建議蘇聯對東歐國家採取一種根本的政策，即在政治和經濟上放手，讓它們獨立自主，不加干涉，相互平等。載《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頁18。

[6-16]《我的一生——師哲自述》，頁469。

[6-17]對於蘇方提供的宣言底稿，毛澤東甚為倚重鄧小平，接受其主張改寫的意見，並委由胡喬木執筆。中方據此另提的草案，也大多被後來正式發表的宣言所採用。楊尚昆：

〈我所知道的胡喬木同志〉，載《追憶領袖戰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226–227。

[6-1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1401。

[6-19]胡喬木回憶：「關於和平過渡問題，小平同志講了一篇話，講得很清楚，毛主席很贊賞這個講話。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平過渡是不可能的。只有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和平演變，而且也不是很和平。」載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4。

[6-20]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10–11。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頁70–71。

[6-21]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頁169。

[6-22]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74), p. 253.

[6-23]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冊，頁163–16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45。

[6-24]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9），頁412–415。另外，按中共外交人員所言，中共發動金門炮戰，欲達「一石三鳥」的目的：嚴懲「蔣幫」的猖狂活動；打擊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囂張氣焰；間接針對赫魯雪夫上台後對西方的姑息政策。載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頁69。

[6-2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下卷，頁729。

[6-2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81–1482、1488。

[6-27]楊尚昆：《楊尚昆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上冊，頁304。

[6-28]閻明復、朱瑞真：〈赫魯雪夫對中國「大躍進」運動的反應〉，《百年潮》，2007年第8期，頁9–13。

[6-29]1959年1月21日上午，在鄧小平召集的高層會議中，李富春表示：「第二個五年計畫中，請蘇聯供應全套設備的，我們共提出104項。現蘇方答覆，已答應的14項，推遲交付

時間的49項，難於馬上定下的26項，不能供應的15項。」最後，「書記處決定：完全按蘇方意見辦，不再爭取了」。載《楊尚昆日記》，上冊，頁339。

[6-3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487。

[6-31]鄧小平：〈中國人民大團結和世界人民大團結〉，《紅旗》，1959年第19期，頁26—32。

[6-32]"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CCCP, Deng Xiaoping (December 8, 1959),"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1248> (2012年7月登入)

[6-33]蔣中正表示：除了毛澤東以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其他六名成員（包括鄧小平），「均係早年在蘇、德、法等國分別加入聯共者，一向與聯共有直接關係，迨中共成立後，復參加中共。」「劉匪少奇、陳匪雲、林匪彪、鄧匪小平等係在俄參加聯共，周匪恩來在法國參加聯共，朱匪德在德國參加聯共。」蔣進而認為，由於赫魯雪夫可「對匪共政治局內其他6個常務委員有直接、個別之控制，倘欲與毛匪攤牌，迫使匪共接受其政策，赫魯可以獲得成功。」〈總統接見美國國務院副國務卿狄倫談話紀錄——有關匪俄問題〉，1959年10月21日。國史館，全宗名：蔣經國總統文物，卷名：中美關係（一），典藏號：005-010100-00055-010。

[6-34]顧達壽：〈蘇聯外交官眼中的鄧小平〉，《領導文萃》，2011年第11期，頁56。

[6-3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20。

[6-3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22。

[6-37]艾思齊：〈紀念斯大林誕生八十週年〉，《人民日報》，1959年12月21日，版7。

[6-3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1050。

[6-3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4、1537、1539。

[6-4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37。

[6-41]包括：《列寧論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前夜》、《列寧論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論民族解放運動》、《列寧論戰爭與和平》、《列寧論反對修正主義》、《列寧論新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

[6-4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40。

[6-4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47。

[6-44]〈對蘇聯的挑釁就是對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挑釁〉，《人民日報》，1960年5月9日，版1。

[6-4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49—1550。鄧小平：〈支持蘇聯正義立場，反對美國破壞首腦會議〉，《紅旗》，第11期（1960），頁1—3。

[6-4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48。

[6-4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2。

[6-4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3—1554。

[6-49]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冊，頁275—276。

[6-5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56—1557。

[6-51]1960年9月19日，中蘇雙方在莫斯科爭吵時，蘇方即明白指出：「布加勒斯特會議的召開，是由於有北京的世界工聯理事會。」《楊尚昆日記》，上冊，頁545。

[6-52]鄧小平順應毛澤東欲批判蘇共觀點之意，建議利用紀念列寧誕辰的時機發表文章表明觀點，以及他主動提出在世界工聯理事會舉行之機闡釋中方論點二事，對中蘇關係的緊張發展所產生的直接影響，也為西方學者所注意。馬·克萊默：〈蘇聯外交部對分裂前夕蘇中關係的估計〉，載李丹慧編：《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413。這也反映鄧小平在具體部署工作以落實毛的對蘇主張的過程中，可以有一定的操作空間，對政策結果也能產生擴大的作用。

[6-5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63—1564。

[6-54]《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90。

[6-55]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冊，頁307。

[6-56]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頁343。

[6-57]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頁202—203。

[6-58]鄧小平在此會期間當面頂撞赫魯雪夫一事，也為美國情報單位所注意。其認為鄧小

平扮演的是毛澤東的「忠實代言人」；並諷刺地評說鄧：「怒火沖沖甚至有時是脾氣暴躁的口氣，想必一定是模仿了最高領袖在國內說話時那種帶點陰鬱、嫉妒以及『躲在家裏生悶氣』的情緒的語調。」〈中情局關於1960年《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聲明》的高級研究報告〉，1961年2月17日。載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第6卷，頁114。

[6-59]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上冊，頁445。

[6-6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12-1613。

[6-6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42。

[6-62]對於中國在「大躍進」後所面臨的糧荒問題，蘇聯並非無動於衷、袖手旁觀。1961年3月，蘇聯主動提議以借用的方式提供中國100萬噸糧食和轉口古巴50萬噸糖。由於茲事體大，鄧小平等「一線」領導人不敢自行決定，特地飛赴廣州向在該地休息的毛澤東匯報並研商。最後，在兼顧政治顏面與實際需要下，中共決定要糖不要糧。《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19。

[6-6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59。

[6-6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37。

[6-6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60-1661。

[6-6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64。

[6-6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65。

[6-68]鄧小平4月7日對內表示：「我們答覆的這封信，主要內容，一是高舉團結的旗幟；二是駁斥他們對我們的指責，中心是抓〈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聲明〉裏面的兄弟黨、兄弟國家獨立、平等、協商一致的原則，因為這是一切團結的基礎，離開這一點，就談不上別的問題；三是建議開會，中央要做一點準備工作，要把道理講得更透。」《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99。

[6-69]《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33、136。《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09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00。

[6-70]1962年6月，鄧小平與周恩來指示：新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維持治安，勸阻邊民外逃，對外逃民眾所遺留的農牧業生產與基層工作實行「三代」（代耕、代牧、代管）；加強兵團武裝力量，組建值班連隊，在中蘇邊境建立國營農（牧、林）場帶。鄧小平更強調：值班連隊「上去了就不要下來」。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即著手組建工作隊與民兵值班連執行任務，以及沿邊界建立多個邊境農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鄧小平同志與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461。

[6-71]施昌旺：《王稼祥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頁311-320。

[6-7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93-1694。王力：《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上冊，頁390-393。

[6-73]《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243。

[6-7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25。

[6-7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39-1740。

[6-76]1962年12月4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毛澤東予以還擊的意見，並就採取的方式做出指示：「以後的鬥爭怎麼樣，要研究。現在看，今後的鬥爭更加展開了。這就需要一系列的東西，也要有適當的刊物。寫文章的問題，每個問題寫一篇，要適合於外國人看。」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265。

[6-77]例如：關於〈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反對我們的共同敵人〉原稿，毛澤東閱後批示：「小平同志：此文已閱，認為寫得很好，有必要發表這類文章。」關於〈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毛批示：「小平同志：文章已看過，寫得很好，題目也是適當的。」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37、1739。

[6-78]齊錫玉：〈為鄧小平同志作翻譯的點滴回憶〉，《當代世界》，2004年第2期，頁33。

[6-7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54。

[6-80]《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277。

[6-81]其內容包括：一、對1957年、1960年兩次莫斯科會議通過的決議文件的認識與態度；二、對現階段國際共運總路線的內容概括；三、這一總路線的出發點與針對性；四、

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所在；五、對前一問題的錯誤觀點；六、社會主義陣營成員應實現的要求；七、對美帝國主義的揭露及對之應採對策；八、亞洲、非洲、拉美的民族、民主運動的重要性；九、亞非拉被壓迫者的革命方式與策略問題（武裝鬥爭的重要性）；十、在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內部進行革命的方式與策略問題（利用議會鬥爭，但不限於之）；十一、對「和平過渡」的質疑；十二、無產階級政黨的角色與職責，以及違反其之後果；十三、對被壓迫者革命鬥爭的支持；十四、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看法（不能一律反對戰爭，要支持民族解放、革命鬥爭；和平的取得要靠實力與鬥爭）；十五、對核武器作用的想法；十六、對「和平共處」的看法（不能將之作為對外政策的總路線）；十七、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階級鬥爭、社資鬥爭的長期存在；十八、無產階級專政的長期存在，批駁蘇共所提的「全民國家」觀點；十九、無產階級政黨長期存在的必要性，批駁蘇共所提的「全民黨」觀點；二十、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的關係，批評以「反對個人迷信」的名義而干涉他黨內政；二十一、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問題（自力更生不能被視作「單幹」、「民族主義」）；二十二、社會主義政黨之間的關係（獨立自主，沒有上下等級之分）；二十三、國際共運的主要危險是現代修正主義；二十四、無產階級的革命黨攸關革命的最終勝敗；二十五、中共對國際共運出現分歧的立場與主張。〈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3月30日來信的覆信〉，《人民日報》，1963年6月17日，版1。

[6-8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59。

[6-83]《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281—1282。

[6-8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61。

[6-85]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頁240—241。

[6-86]《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頁4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68。

[6-8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68。

[6-88]1963年11月22日，鄧小平對阿爾巴尼亞大使表示：「從7月14日到11月初，蘇聯報刊共發表了二千一百多篇攻擊中國的文章。我們不像他們發表那麼多文章，但是每篇文章的份量要重。」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79。

[6-89]此小組直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從1962年11月就開始工作，1963年2月才正式命名。其組成為：組長康生、副組長吳冷西，廖承志、伍修權、劉寧一、章漢夫、孔原、許立群、姚溱、喬冠華、王力、范若愚等。陳伯達機動參加。載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冊，頁540—541、637—638。

[6-9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90。

[6-9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02。閻明復：〈1964年羅共調停中蘇關係始末（二）〉，《百年潮》，2010年第9期，頁9。

[6-9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98。

[6-93]《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頁49—50。

[6-9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02—1803。

[6-95]沈志華：《蘇聯專家在中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頁314—315。

[6-96]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頁145—148。

[6-97]〈評美國共產黨聲明〉，《人民日報》，1963年3月8日，版1。

[6-98]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頁341、356—358。

[6-9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82。

[6-10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01。

[6-101]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冊，頁845、858、881—882。

[6-102]時間分別為1964年9月29日上午與10月6日下午。《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29、1831。

[6-103]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冊，頁863—864。

[6-10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35—1836。

[6-10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36。

[6-106]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下冊，頁916—917。

[6-107]中共外交部回絕蘇方的相關援越方案的談話稿，乃經鄧小平事先審閱並批可。《鄧

- 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50。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頁378–379。
- [6-108]〈評莫斯科三月會議〉，《人民日報》，1965年3月23日，版1。
- [6-109]"Stenographic Transcript of Discussions held wi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legation to the 9th Congress of Romanian Communist Party (July 26, 1965),"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0017> (2012年12月登入)
- [6-110]《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頁6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58。
- [6-111]《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頁62、67–68。
- [6-112]伍修權：《回憶與懷念》，頁332–365。
- [6-113]《楊尚昆日記》，上冊，頁603。
- [6-114]《楊尚昆日記》，上冊，頁613–614。
- [6-115]《楊尚昆日記》，上冊，頁612。
- [6-116]另外，鄧小平在1960年春所主持撰寫的有關列寧理論的文章，也有不小的作用與影響。馬共領導人陳平就表示：「〔中蘇〕紛爭在1960年公開化，中共的雜誌刊登題為《列寧主義萬歲》的社論，紀念列寧一百週年誕辰〔作者按：應為九十週年〕。文章在不點名蘇聯和赫魯曉夫情況下批判蘇聯的政策。我們認為它很有說服力。」載陳劍編：《與陳平對話：馬來亞共產黨新解》（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6），頁210。
- [6-117]《楊尚昆日記》，上冊，頁629。
- [6-118]《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04–1605。
- [6-119]徐焰：〈緬甸共產黨興亡始末與教訓〉，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85039/13375411.html>（2010年11月登入），鄧小平在1963年8月27日曾陪同毛澤東會見改任緬共副主席的德欽巴登頂，然具體討論內容不明。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71。
- [6-120]《楊尚昆日記》，下冊，頁90–9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70–1671。
- [6-121]陳平、伊恩沃德（Ian Ward）、諾瑪米拉佛洛爾（Norma Miraflor）合著：《我方的歷史》〔My Side of History〕（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頁409。
- [6-122]《楊尚昆日記》，下冊，頁270。
- [6-12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55。
- [6-124]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頁568。
- [6-125]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頁574。
- [6-126]Shiraishi Masaya, "Vietnamese Communists' Perception of China: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載許文堂主編：《越南、中國與台灣關係的轉變》（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2001），頁236–237。
- [6-127]William J. Duiker, *China and Vietnam: The Roots of Conflict*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 pp. 44–45.
- [6-128]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頁440–441。
- [6-129]"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legacy.wilsoncenter.org/coldwarfiles/files/Documents/Document_Le%20Duan,%201979.pdf (2012年12月登入) 對此一報告的分析可見：〈引言：關於黎筍談越中關係的報告〉，冷戰中國網：http://www.coldwarchina.com/kfda/ynnda/000585_2.html (2006年6月登入)
- [6-130]黃文歡：《越中友好與黎筍的背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9。
- [6-131]黃文歡：《越中友好與黎筍的背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頁9–10。
- [6-13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542–1543。
- [6-133]鄧小平、周恩來向越方表示：「總的來說，要搞政治鬥爭與武裝鬥爭相結合。南越城市和農村的具體情況不同，要根據具體情況，採取靈活的鬥爭方法。在城市裏，一般地說是搞政治鬥爭，但最後要搞垮美吳集團，沒有武裝力量不行。南越農村有廣泛的群眾運動，有武裝鬥爭，但武裝鬥爭中也有政治鬥爭。」載郭明主編：《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67。

- [6-134]楊奎松：〈毛澤東與印度支那戰爭〉，載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頁36。
- [6-13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08。
- [6-136]《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80。
- [6-137]《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頁59。
- [6-138]"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 [6-139]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頁575–576。
- [6-14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83–1784。
- [6-141]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下篇，頁663。
- [6-142]吳冷西：《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頁666–667。
- [6-14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00–1801。
- [6-14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01。
- [6-145]李丹慧：〈中蘇在抗越援美問題上的分歧和衝突〉，載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頁139、179。黎筍也指控：「鄧小平與康生一道，前來告訴我說：同志，我們將每年援助你們幾十億（估計是人民幣）。你們不能從蘇聯方面接受任何東西。」"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 [6-14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53、1855、1858、1865。
- [6-147]〈半杯殘酒見為人——胡志明鱗爪〉，《廣東黨史》，2007年第2期，頁19–20。
- [6-148]"Discussion between 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and Ho Chi Minh (May 17,1965),"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061>（2012年11月登入）
- [6-149]1975年9月29日，鄧小平與黎筍談話時，回憶1965年其與胡志明所作的意見交換。"Discussion between Deng Xiaoping and Le Duan (September 29, 1975),"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1268>（2012年11月登入）
- [6-150]〈周恩來、鄧小平、康生與黎筍、阮維楨的談話〉（1966年4月13日），載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頁260–261。
- [6-151]李丹慧：〈中蘇在援越抗美問題上的分歧和衝突〉，頁168。
- [6-152]〈周恩來、陳毅與范文同、武元甲的談話〉（1967年4月12日），載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頁281。
- [6-153]童小鵬：《風雨四十年》（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2冊，頁219。
- [6-154]阿成：《我肩負的使命——馬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阿成回憶錄之四》（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07），頁103–108。
- [6-155]金津：〈馬共的革命與終結〉，《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頁84–85。
- [6-156]陳平、伊恩沃德、諾瑪米拉佛洛爾合著：《我方的歷史》，頁386。
- [6-157]此乃根據研究馬共歷史的學者阿萊修斯·陳（Aloysius Chin）的相關研究。載萬家安：《與歷史對話（二）——戰後馬共策略的探討》（Kajang Selangor：當代本土史料研究室，2008），頁26–27。
- [6-158]陳平回憶：穆沙阿默德「表現得最為樂觀」，「他胸有成竹地預測到：『有了中國的援助，我們能在5年內接管馬來亞。』」小章「也支持」。再加上，駐守前線的領導人阿海（原名單汝洪）「認為有了中國援助就行了，他立即回電，表示他願意領導一場重振旗鼓的武裝起義。」在1959年主導決定馬共改走政治鬥爭的陳平，「只好少數服從多數」，「多少帶點勉強」。載陳平、伊恩沃德、諾瑪米拉佛洛爾合著：《我方的歷史》，頁389–390。
- [6-159]陳平、伊恩沃德、諾瑪米拉佛洛爾合著：《我方的歷史》，頁390。
- [6-160]陳平、伊恩沃德、諾瑪米拉佛洛爾合著：《我方的歷史》，頁390、392。
- [6-161]1961年夏，陳平在北京制定的〈有關新方針等問題〉指出：「我們會將武裝鬥爭這幾年的挫折情況和目前處境的嚴重性向毛主席反映，毛主席極其關心我們的鬥爭並給予很高的評價。關於今後的方針問題，我們同毛主席研究結果，認為一方面必須堅持光榮的武

裝鬥爭的旗幟，使游擊隊繼續鞏固和發展，另一方面要大力開拓敵佔區的工作，即發展秘密黨和群眾運動。不論是在游擊隊的工作中或敵佔區工作中，採取各種措施，大力開展馬來人工作，在馬來人中落地生根，以便逐步建立起馬來亞的工農聯盟和實現馬、華、印三大民族的團結。我們認為目前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很好，只要長期堅持下去，贏得時間，馬來亞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我們應該提出積極堅持的方針與口號。」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對馬共的政治影響。載阿成：《我肩負的使命——馬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阿成回憶錄之四》，頁166。

[6-162]陳平、伊恩沃德、諾瑪米拉佛洛爾合著：《我方的歷史》，頁391。

[6-163]陳平、伊恩沃德、諾瑪米拉佛洛爾合著：《我方的歷史》，頁392。

[6-164]〈馬來亞共產黨揭露蘇共領導堅持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嚴厲譴責現代修正主義者假團結真分裂，指出公開論戰能分清是非有助於促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人民日報》，1965年4月2日，版4。

[6-165]陳劍編：《與陳平對話：馬來亞共產黨新解》，頁212。

[6-166]陳平、伊恩沃德、諾瑪米拉佛洛爾合著：《我方的歷史》，頁409。

[6-167]〈周總理接見各大區書記和省委書記時的講話〉，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國家測繪總局二分局計算隊翻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選編》（北京：1967），頁154。

[6-168]「九二零政變」係指1965年9月30日，印尼左派中階軍人發動之政變。對於印尼共產黨介入該事件的討論，可參閱：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頁125-126。

[6-16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61。

[6-170]〈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主席熱烈祝賀印度尼西亞共產黨成立四十五週年〉，《人民日報》，1965年5月23日，版1。

[6-17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30-1831、1867。

[6-17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68-1869。

[6-173]〈鄧小平同志率領的我黨代表團參加羅黨大會時與印尼共領導人艾地的談話紀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號109-02838-02，頁22-23。

[6-17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70。

[6-175]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頁117。

[6-176]Niklas Swanstrom, *Foreign Devils, Dictatorship, or Institutional Control: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Uppsala, Sweden: Uppsala University, Dept. of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2001), pp. 63-64.

[6-177]David P. Mazingo, *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49-196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241-243.

[6-178]Benjamin Yang,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pp. 158-159.

[6-179]「九二零事件」後三個月，美國情報單位即分析：「印度尼西亞的政變流產，以及隨後共產黨內部親北京分子遭到軍事打擊，對中國人來說也是一個沈重的打擊。」〈中情局關於中國及其當前問題的情報手冊〉，1966年1月1日。載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3卷，頁520。

[6-18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88-1889、1894、1897-1898。

[6-18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907。

[6-182]張戎、喬·哈利戴（Jon Halliday）著，張戎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頁443。

[6-183]〈笑在百花前——艾地聽取游擊戰爭經驗介紹〉，《廣東黨史》，2007年第2期，頁21-22。

[6-184]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白鹿書院：

<http://www.oklink.net/01/0419/csjs/013.htm>（2012年7月登入），楊當時為中共外交部第一亞洲司副司長，中共與印尼的關係在其職司範圍之內。

[6-185]楊奎松：〈毛澤東與印度支那戰爭〉，頁47。

[6-186]對於艾地之死，毛澤東在1965年12月填詞悼念：「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奈何笑容難為久，春來反凋殘。殘固不堪殘，何須自尋煩？花落自有花開日，蓄芳待來年。」

- [6-187]張戎、喬·哈利戴著，張戎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頁444。
- [6-188]〈印尼「九·三十事件」〉，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
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b/yc_b_060.htm（2010年10月登入）
- [6-189]劉鑒銓主編：《青山不老：馬共的歷程》（Selangor：星洲日報，2004），頁184。
- [6-190]阿成：《我肩負的使命——馬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阿成回憶錄之四》，頁15–16。
- [6-191]陳平、伊恩沃德、諾瑪米拉佛洛爾合著：《我方的歷史》，頁385。
- [6-19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634。
- [6-193]《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97。
- [6-194]〈中央同志對乃比里工作的口頭指示〉，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6，目錄號1，案卷號157，頁89–90。
- [6-195]原不二夫：〈馬來亞共產黨與中國〉，《南洋資料譯叢》，2001年第4期（總第144期），頁33。
- [6-196]Eugene H.C. Wang,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ailand*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66), pp. 94–99, 106.
- [6-197]Jay Taylor,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eking's Relations with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New York: Praeger, 1976), pp. 284–285, 323.
- [6-198]Joyce K. Kallgren, Noordin Sopiee, and Soedjati Djiwandono eds., *ASEAN and China: An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8), pp. 266–270.
- [6-199]〈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爾布特與中國〉，沈志華、李丹慧個人網站：
http://www.shenzhijhua.net/ynzz/000032_2.htm（2006年6月登入）
- [6-200]《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91。
- [6-201]David P. Chandler,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pp. 72–73.
- [6-202]Ben Kiernan,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A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Kampuchea, 1930–1975* (London: Verso, 1985), p. 224.
- [6-203]鄧小平領導的中共中央寫作班子，其主要運作流程為：在鄧小平主持討論後，寫作小組先行起草初稿並修改，然後送交鄧審閱批改；在鄧認可後，方送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審閱，最後再交中央政治局或常委會討論定稿。閻明復、朱瑞真：〈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十年〉，《百年潮》，2007年第1期，頁20。
- [6-204]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頁162–163、232、242–243。
- [6-205]鄧小平對此指示：「有些情況，講得少了，有道理，講多了，反而沒有道理；說得少了，清楚，說得多了，反而不清楚，反而露了馬腳。」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頁244。
- [6-206]當時美國的情報人員即認為：鄧小平、毛澤東在內的中共領導人「對蘇聯領導人的敵視有幾分是源於表面上的深信，即蘇聯是意識形態的倒退者與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叛徒。」〈中情局關於中國領導層與接班問題的分析報告〉，1964年3月20日。載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2卷，頁83–84。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的施樂伯（Robert A. Scalapino）教授也認為：在對蘇聯的意識形態爭論上，鄧小平與毛澤東的看法所差無幾。（美國，2008年6月9日）
- [6-207]「文革」期間，毛澤東曾數次提及鄧小平在歷史上的功績。其中，鄧小平對蘇交涉和鬥爭的表現，乃是毛澤東反覆強調的事功，例如：1972年8月14日，毛在鄧請求給予工作的來信上批示：「（鄧）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載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頁223–224。
- [6-208]〈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之三）〉，《人民日報》，1964年7月14日，版3。
- [6-209]李向前：〈越戰與1964年中國經濟政治的變動〉，載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頁70–71。
- [6-210]例如：1963年5月21日，鄧小平對紐西蘭共產黨總書記表示：「社會主義制度下，如果沒有一個堅強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領導，有一部分掌握權力的人就會蛻化變

質。」次年的8月22日，鄧在會見該黨主席時也表示：「我們國家的工作很多，歸納起來主要有兩項：發展生產力和防止出現修正主義。修正主義是打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旗號為特權階層服務的。」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58、1825。

[6-211]導致中越戰爭的議題包括：中國援助、蘇聯因素、柬埔寨走向、領土爭議以及華僑華人等問題。King C. Chen,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Issues, Decisions, and Implication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7), pp. 10–68.前面三項問題，皆與中共先前長期以來的政策有直接的關聯與延續性。

[6-212]對於波帕在柬埔寨執政後的種種匪夷所思的暴行，鄧小平也表示感到「大惑不解」。載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台北：世界書局，1998），下集，頁697。

[6-213]中國大陸資深國際關係學者（J君）所提供之觀點。（台北，2005年12月）

[6-214]澳洲莫納許大學（Monash University）的孫萬國教授表示：對於是否要發起「懲越戰爭」的問題，在中共高層內部無論是政治要人或軍事將領，多予以反對，但是鄧小平堅持要打，其他人也莫可奈何。鄧小平之所以力排眾議，一意出兵，或與其在「文革」前即與北越領導人在外交談判上多次交鋒、甚至結怨有關。（台北，2007年5月25日）

第七章

「大躍進」後緊跟不上毛澤東 (1961-1966)

為因應「大躍進」運動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中共中央自1961年著手進行經濟調整，以緩解困難的情勢。如何緩解經濟困難？中共高層內部有不同的政策主張。這種看法的歧異導致領導人之間關係的緊繃，更在後來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化大革命」中表面化與白熱化。在此一政情急速變化的階段，鄧小平難以「亂雲飛渡仍從容」，在「文革」伊始即靠邊站。鄧小平在經濟調整和「文革」前的國內政治中到底採取什麼看法？做了什麼決策？鄧為何從毛澤東的「副帥」變成毛欲去之而後快的「劉、鄧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

本章論點為：鄧小平對於「大躍進」後的經濟整治，甚為認真與用心，在人民公社與工業企業等問題上，皆根據親自調查提出較符合實際的建議與方案；在「包產到戶」問題上，鄧小平視之為農村紓困的可行對策，反映務實傾向對其治國思考的影響，只是在毛澤東的堅決反對下無法堅持己見。在「文革」前數載的國內政治中，毛澤東感到鄧小平在政治上（如經濟調整與「社教」問題）和劉少奇過於接近而生疑，又認為鄧對毛的新政策倡議（如「三線」建設）有些怠慢，因而降低對鄧的信任，造成兩人關係的疏離，最終導致鄧在「文革」初期失勢下台。

下文首先探討中共在1961年進行經濟調整以擺脫「大躍進」釀成之困難時，鄧小平採取何種作為，接著討論在調整過程中掀起政治風波的「包產到戶」爭議，鄧小平如何回應，再來檢視鄧小平在「社教」運動與「三五」規劃中的意向與處境，以及相關問題對鄧、毛關係由濃轉淡的影響，最後的小節簡要說明鄧小平何以在「文革」初即遭清洗出局。

第一節 參與經濟調整工作（1961）

1961年1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針對「大躍進」的缺失，正式通過「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鄧小平此前因為積極推行「大躍進」，親身體驗該運動的問題與所造成的嚴重困難，因此對於此一指導方針的轉變，表示贊同與支持，也積極參與各個領域的具體調整工作。

農業蹲點調查

1961年春，毛澤東號召全黨進行調查研究，中共領導人紛紛下鄉蹲點，搜集農村情勢的一手資訊，作為施政參考。3月13日，毛澤東點名鄧小平與彭真抽出時間下鄉調查，「使自己心中有數，好作指導工作」。^[7-1]鄧小平一方面召集中央書記處會議，安排人員去農村調查，^[7-2]並親自設計農業調查的問題提綱；^[7-3]另一方面，不同於鄧在「大躍進」期間單憑下級匯報以及走馬看花所得，即參與制定農業政策的做法，鄧此次真正親赴農村作比較集中的調查，除深化自身對農村工作複雜性的認識，也認知到農業現行政策須作調整的必要性。^[7-4]

5月10日，鄧小平、彭真根據「直接領導的五個調查組（在順義、懷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組，在北京近郊和各縣一個多月調查的情況」，聯名寫信向毛澤東報告。為了「進一步全面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他們提出的意見包括：調整社隊規模、減少糧食徵購和增加餘糧分配、廢除供給制、改善評工記分辦法、公共食堂去向的討論、確認耕畜和農具的所有制問題，以及恢復發展手工業、家庭副業。^[7-5]其中，最重要的是「在食堂、供給制等問題上提出了糾正錯誤的意見」。^[7-6]

針對人民公社結合供給制與工資制的分配制度問題，鄧小平、彭真在信中指出：

現在實行的三七開供給制辦法，帶有平均主義性質，害處很多。它不僅使勞力多、勞動好的人吃虧；也不能適當解決五保戶和困難戶的問題。^[7-7]許多典型材料證明，這種供給制，不一定對貧雇農和下中農有利，甚至是對地富和上中農更有利。因為貧雇農和下中農一般結婚比較遲，子女少，勞動比較好，在他們中間佔這種供給制便宜的人，比例較小；而地主、富農一般撫養人口比較多，勞動比較差，又有使子女上學的習慣，在他們中間佔便宜的人，比例較大。因此，在這次辯論中，幹部和群眾普遍主張取消這種供給制，而主張只包五保戶和對生活困難戶給予部分補助。

兩人對此所做的結論是：「看來廢除三七開的供給制，只對五保戶生活和困難戶補助實行供給，不僅可以更好地解決五保戶和困難戶的問題，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勞動分值，更好地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原則，更好地調動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針對有「人民公社的心臟」之稱的公共食堂，鄧小平在順義調查期間曾直爽地指示當地幹部：「吃食堂是社會主義，不吃食堂也是社會主義。以前不管是中央哪個文件上說的，也不管是哪個領導說的，都以我現在說的為準。要根據群眾的意願，決定食堂的去留。」^[7-8]但是他與彭真給毛澤東的信中，對於此問題的說明就含蓄許多。鄧、彭一方面表示：食堂問題在北京郊區比較複雜。居住分散的隊最好不辦，一般也以不辦常年食堂為宜。至於農忙食堂，他們強調群眾意見很不一致，難以建議。北京市各縣、區在試點時向群眾宣佈：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完全根據自願；吃食堂、不吃食堂都好，都光榮；吃食堂、不吃食堂都給予便利。結果遠處郊

區的食堂大部分都解散了。但另一方面，兩人又不把話說死，表示：

現在情況還在變化，有些人退出食堂自炊一個時期後，又要求入食堂，散了食堂的地方，也有少數人要求再辦。看來，吃不吃食堂的問題，比較複雜，不能像供給制一樣，一刀兩斷地下決心。尤其要走群眾路線，讓社員慢慢考慮、好好討論，完全根據群眾自願，他自己感到怎樣合算就怎樣辦。

鄧小平對公共食堂問題傾向鬆綁、開放，但又強調要依群眾意願決定食堂去留的態度，實際上，還不如同一時間胡喬木在毛澤東的故鄉湖南湘潭韶山調查後，直接主張不辦食堂那樣明快。^[7-9]這或肇因於鄧小平明瞭毛澤東從「大躍進」開始起一直堅守興辦公共食堂的政策立場；鄧自己的堂弟鄧自力1959年因解散食堂等問題落難於「反右傾」運動的前車之鑒，或也對之採取謹慎策略有所影響。

鄧小平的農業調查和觀點，匯合其他中共要人相似的訪查所得，對毛澤東造成影響，^[7-10]促其下定決心，終而將1958年「大躍進」以來突出宣傳的人民公社在分配上的兩項「共產主義因素」——供給制和公共食堂，加以取消。

主持制定工業、教育的工作條例

在工業領域上，鄧小平強力呼籲工業生產必須貫徹、落實「八字方針」，也就是切實地進行調整、做必要的退卻，以免影響、耽擱整體經濟的發展。1961年8月9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表示：

去年北戴河會議提出八字方針，究竟怎樣貫徹？一年多了還沒有具體化，各部、各地區和計委都沒有具體地安排。去年鋼完成了1,840萬噸，還是一馬當先，影響了八字方針的貫徹，今年又是高指標，1,800多萬鋼，基本建設規模過大，還是影響八字方針的貫徹。^[7-11]

鄧小平也花費諸多心思在主持制定〈工業七十條〉（後來定稱為〈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關於制定〈工業七十條〉的目的，鄧小平的說明是：「〈工業七十條〉要有針對性，就是為了專門治亂的。這幾年把企業管理搞亂了，就是要把這種混亂局面扭轉過來。」^[7-12]在〈工業七十條〉醞釀與討論的過程中，鄧小平不但多次從旁推動、給予指示，也從7月14日起親率調查組前往大型工業企業聚集的東北，進行為時近兩週的視察與調查。在獲取企業情況的一手資訊後，鄧小平對〈工業七十條〉應有的內容，有愈加明確的看法。後來〈工業七十條〉中規定國家對企業實行「五定」，^[7-13]企業對國家負責實行「五保」，^[7-14]正是源於鄧小平的這次東北之行。^[7-15]

據實際組織起草〈工業七十條〉的薄一波回憶：鄧小平「很重視這個東西」，除了催促他儘早完成該條例的初稿，鄧自己也提出許多重要意

見，並強勢闖關通過。〈工業七十條〉中有一個關鍵的內容：重申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以限制企業內的黨組織對生產行政工作做過度而不適當的干預。在討論的過程中，鄧小平強調：關於工廠生產的指揮問題，只能服從一人意志，不能有多頭馬車，「黨委書記要做甩手掌櫃」，也就是工廠裏黨的負責幹部要將主要的時間與精力，放在調查、發現企業管理工作中的關鍵性問題並研究解決方案，而不要對生產行政工作隨便加以指揮；車間以下的黨支部也不宜對生產施行領導。^[7-16]

針對〈工業七十條〉的主要內容，陳丕顯為主的華東代表認為：其過多地吸取「一五」時期辦工業的經驗（存在照抄蘇聯、規章制度多的問題），而對「大躍進」時期辦工業的經驗如發動群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夠重視。甚至指稱：制定〈工業七十條〉的人好像是剛從蘇聯回來，沒有參加過「大躍進」。鄧小平聞後憤而指出：「難道我成了剛從蘇聯回來的嗎？」「我就是剛從蘇聯回來的，不討論了！」陳丕顯只好悻悻然退讓。^[7-17]

在教育領域上，鄧小平指示高校和中專學校要加以調整收縮。他在專門討論學校調整問題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表示：「三年內教育要步子放慢，調整學校搞到什麼程度，住、吃、課堂、師資都要算帳。少辦些學校，把它辦好。大學16、7萬，高中44、5萬，初中200多萬，控制這個比例。」^[7-18]鄧也撥出部分心力放在〈高教六十條〉（全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暫行工作條例〔草案〕〉）的審定上。

〈高教六十條〉乃由中央宣傳部與教育部共同起草，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逐條討論。據參與執筆該條例的人回憶：「鄧小平講究辦事效率，凡有爭論，他聽了意見，立即拍板，或者要求起草者另擬一稿，第二天再討論。」^[7-19]

鄧小平主持定案的具體例子很多。像是高等學校應採行教育部主張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還是中宣部主張的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的爭議問題，最後鄧小平拍板決定為：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另外，在高等學校內，黨的領導權是集中在校黨委一級或是各系與各教研室的黨支部也可施行領導上，鄧小平在討論過程中肯定、同意中宣部部長陸定一的觀點，亦即黨在各系和各教研室的支部只能在校黨委的領導下，對同一層級的工作進行保證與監督，而無任何直接的領導權。^[7-20]

〈工業七十條〉與〈高教六十條〉皆在1961年夏廬山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通過，並下發試行。毛澤東曾在會議期間評論：「這次會議搞了幾個好文件，如〈工業七十條〉、〈高教六十條〉等，證明我們的經驗比較多了。」^[7-21]這也可以看作是毛對主持制定相關政策文件的鄧小

平的一種稱許。

另外，對於聶榮臻主持下提出的〈科學十四條〉（全稱為〈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1961年7月6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鄧小平在會上發言表示支持，並針對黨的角色與工作內容提出補充意見：

我看是個好文件，可以試行，很有必要。試行後在實踐中加以補充，使其成為科學工作中的憲法。只提一點意見，黨的領導方法，內容可以充實。黨怎樣做工作？要創造一個生動活潑，人心舒暢的局面，出科學成果。黨的領導幹部要和科學家交朋友，關心幫助他們。讓我看，24小時都有事情做，怎麼能夠說這樣一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好做了？我看就是要老老實實當好勤務員，為科學家服務，替他們解決困難。這個報告大部分的內容，可以向黨外作口頭報告，索性把政策講清楚。[7-22]

在鄧小平的主持下，前述幾項可供實際操作的指導性綱領條例的制定與出爐，有助於緩解、抑制「大躍進」對相關領域所造成的混亂，並建立一套可依循的規範，以明確方向、重建秩序。在其中扮演領導角色的鄧小平，其發揮的積極作用自應獲得肯定。從中也反映鄧小平在多方面的政策思考上，也漸褪去浪漫不切實際的傾向，理念與態度都趨於務實。這不久也表現在他對「包產到戶」問題的看法上。

第二節 對「包產到戶」爭論的態度 (1962)

1960年代初，由於農村經濟的凋弊破產和嚴重破壞，針對人民公社制度的弊病，以農業生產責任制為核心內容的各種形式的「包產到戶」主張，在不少地區中出現並向周圍擴散。這一農業主張引發不小的政治風波，領導經濟調整工作的鄧小平也被捲入在內。

對曾希聖推行「包產到戶」的態度：以毛的是非為是非

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是倡導「包產到戶」的代表人物。曾在「大躍進」期間鋒頭甚健，大受毛澤東的讚賞。然而，他發現運動過激的農業政策對農村經濟所造成的惡劣影響後，有所醒悟，並在1961年開始推展實際上與「包產到戶」沒有多大差別的「責任田」制：在計劃統一、分配統一、大農活和技術性農活統一、用水管統一、抗災統一的「五統一」基礎上，實行包產到隊，定產到田，責任到人，全獎全賠。其主要特點為：將集體責任和個人責任相結合，把包工和包產相結合，把生產成果與計算獎賠結合起來。[7-23]

對於曾希聖的農業新主張，毛澤東起先在1961年3月中旬表現出或可小

試的態度，表示：「你們試驗嘛！搞壞了檢討就是了。」但到了1961年底，中共在農村實行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政策以後，毛對曾的做法開始明白表示反對。^[7-24]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中，實行「責任田」更成為曾遭受批判，甚而被罷官的理由之一。^[7-25]

對於曾希聖在安徽推行「責任田」，鄧小平是清楚的。因為曾希聖在1961年3月跟毛澤東提出相關構想的前後，也曾跟鄧小平就此交談過。^[7-26]曾希聖在3月20日致信多位中央領導人，分析實行「責任田」的優、缺點，並指出好處明顯大於壞處，鄧小平亦是受信人之一。^[7-27]鄧小平對曾希聖推行「責任田」抱持什麼態度，現在雖無直接資料說明，但似無惡感，因為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曾指示中央辦公廳將會希聖在安徽試行「責任田」的情況報告，轉發河南、江蘇、浙江、江西、湖北，以增進鄰省對安徽有關作為的了解並減少誤會。^[7-28]另外，也有資料指稱：鄧小平曾在同年告訴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去進行「包產到戶」實驗。^[7-29]倘若此事屬實，則鄧小平應該不會反對曾希聖在皖的相關舉措。然而，一旦毛澤東明確反對曾希聖的「包產到戶」政策後，鄧立即修正自己的態度。

1962年初，中共中央舉行旨在檢討「大躍進」錯誤的「七千人大會」。相較於林彪在「七千人大會」公開講話中力挺毛澤東（此舉常被看作是惡名昭彰的政治投機行徑），鄧小平支持毛的堅定立場，實也不遑多讓。在會議的籌備階段，鄧小平向毛澤東並中央常委提交書面報告，檢討由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在此前幾年的工作，表明應對「大躍進」運動失誤負起主要責任，並為毛個人的錯誤開脫。鄧小平表示：「總的來說，毛主席歷次反映我們根本路線、政策的議論，是正確的，但我們有若干具體政策措施，與指導思想相違背」，「是許多具體的問題、具體政策違背了毛主席的指導思想」。另外，對於陳伯達奉鄧小平指示整理而成的「大躍進」以來的中共中央文件輯錄，鄧也強調：經研究的結果，毛澤東在此一時期的語錄，作為黨總路線和各項具體政策的指導思想，沒有錯誤。^[7-30]鄧小平主動攬責在身、不遺餘力維護領袖威信的報告，毛澤東閱後都有些不好意思，他對鄧小平等人表示：你書記處寫了一個報告，什麼都是執行我的指示，理解不深，執行不夠，執行也有偏頗，你們把我當成聖人，不是閒人已經不錯了，你們不批評我，我自己也要作自我批評。^[7-31]

「七千人大會」期間，中共中央為討論修改劉少奇的大會報告稿成立一個專門的起草委員會，在其開會的過程中，鄧小平在人民公社問題上強調：「當然是跟主席走！」擺出「唯毛是瞻」的態度。^[7-32]在「七千人大會」中，毛澤東為維持人民公社制度而批判曾希聖時，鄧小平未聲援後者，就不叫人意外了。曾的妻子余叔抱怨：「老曾搞責任田，是主席同意的，而且很多人都知道，為什麼主席不說話，別人也不說話呢？」^[7-33]

鄧小平之所以沒有出面替曾希聖說話，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毛澤東已有定奪，再多說也無益，甚至可能招毛大怒。

愈漸支持「包產到戶」

鄧小平對「包產到戶」的認可態度，到了1962年中才變得明確。

1962年春，劉少奇帶領鄧小平、周恩來、陳雲等，對中國當時的經濟危機重新加以評估，並一致認為：經濟情勢比原先估計還嚴重得多，需要擴大經濟調整的力度。陳雲在相關的討論中扮演關鍵的角色，最後被推舉出任新設立的中央財經小組組長，負責經濟決策事宜。

在「大躍進」期間取代周恩來、陳雲掌管經濟大權的鄧小平，在經濟開始進行調整後，對陳雲所作的紮實調查相當地重視，將之批轉高層以供決策參考。^[7-34]對於陳雲重新回到決策圈，司掌經濟事務，鄧樂見其成；對於陳雲為經濟難題所開出的「藥方」，如壓縮城鎮人口以減輕國家的糧食負擔，鄧也從善如流、要求力行。

精簡人事在糧食需求上雖可起到「節流」的作用，但親歷缺糧危機並親手處置調糧問題的鄧小平，^[7-35]深知經濟回穩的關鍵，還在於糧食的供給能否穩定，因而主張抓緊農村生產隊的工作，以振興、恢復農業生產。^[7-36]在促進生產上，頗有「開源」效果的「包產到戶」，在1962年孟夏前後，又重新進入鄧小平的政策思考範圍內。

曾希聖在1962年初失去安徽的領導職位後，「包產到戶」並未人去政息。由於它救急有效，在該省不但「春風吹又生」，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在中共領導層內也獲得愈來愈大的迴響。鄧小平在綜合比較各方的聲音後，態度也日益傾向贊成「包產到戶」。

首先，中央書記處的計劃書記李富春在6月中旬致函劉少奇與鄧小平，報告他在安徽農村所見，並以轉述當地農民意見的方式，表達對「包產到戶」的支持。^[7-37]其次，「責任田」在安徽死灰復燃的現象以及因此產生的「官司」爭論，一路打到中央書記處，更讓鄧小平難以迴避「包產到戶」的問題。6月下旬，在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華東局的農業負責人與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就「包產到戶」的性質問題爆發激辯。華東局認為安徽實行「責任田」就是單幹、是方向性錯誤。鄧子恢反駁：「責任田」沒有改變所有制性質，多數能做到「五統一」，怎麼能說成是方向性錯誤呢？^[7-38]中央書記處內部對此意見不一，贊成和反對者皆有。^[7-39]

面對會議僵持不下的局面，鄧小平鬆口表示，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採取各種辦法，安徽省的同志說，「不管黑貓黃貓，能逮住老鼠

就是好貓」，有一定的道理。「責任田」是新生事物，可以試試看。[7-40]有資料指稱：此時已轉任閒職的曾希聖，在輾轉得知鄧小平的何妨一試的態度後，感到欣慰並盛讚鄧為「帥才」。[7-41]

再次，鄧小平受到陳雲的影響，對「包產到戶」支持的立場，越來越鮮明，甚至也接受陳主張的分田到戶。陳雲在1962年春重新參與經濟決策的工作後，政策建議愈形大膽：「包產到戶還不徹底，與其包產到戶，不如提分田到戶。」因為陳雲認為重新分田的辦法，可以更加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加速農產量的恢復。[7-42]6月底，陳雲還就分田到戶的意見，與毛澤東以外的中央常委包括：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進行溝通，獲得「看法大體一致或者沒有表示不同的意見」的結果。[7-43]陳雲與鄧小平進行商談時，鄧表示：分田到戶是一種方式，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7-44]陳雲高興地跟自己的工作親信說：「我的意見已和小平同志談了，他贊成！」[7-45]

或許因為政治局常委會的大多數成員（除去毛澤東以及不太管事的朱德）對分田到戶問題漸有默契與共識，[7-46]進入7月以後，鄧小平在更多的場合中表現出對「包產到戶」、分田到戶的開放立場。7月2日，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表示：

恢復農業，群眾相當多的提出分田。陳雲同志作了調查，講了些道理，意見提出是好的。現在所有的形式中，農業是單幹搞得最好。不管是黃貓、黑貓，在過渡時期，哪一種方法有利於恢復，就用哪一種方法。我贊成認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產到戶，究竟存在什麼問題，因為相當普遍。你說不好，總要有答覆。群眾要求，總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要肯定，形式要多樣。公社、大隊為基礎都可以，不要輕易否定一種。但現在大隊是少數，小隊也發生了問題，不如包產到戶。分田到戶也有好的。過渡時期，要多種多樣。退的時期，退夠才能進。總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這幾年就是千篇一律。陳雲同志也贊成多種多樣，他提出分田單幹允不允許？是否就是不好的？[7-47]

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田家英原先反對「包產到戶」，後來經過調查後轉變態度。他在7月初就此向鄧小平匯報時，鄧也明確表示贊成。[7-48]7月7日，鄧小平接見共青團三屆七中全會代表，談到農業問題時表示，「現在看來主要還是從生產關係上解決」：

現在全國也還有個別的公社實行社所有制，群眾不願意拆散，能夠保持的就讓它保持好啦。也有以大隊為核算單位的，比較多的是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責任到田」、「包產到戶」、「五統一」等等。在這個形式下面，有的實際是分田到戶，不過現在分田是不合法的，現在看來各種形式的分田到戶恐怕不只百分之××，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所以「包產到戶」、「責任到田」、分田到戶曉得它搞什麼。名義上還是集體核算，實際上已經不是了，要解答這個問題，怎麼解答，中央準備在8月會議上研究一下。現在「百家爭鳴」。這樣的大問題應該「百家爭鳴」，大家出主意，最後無非是找出一個道理來。

鄧小平面對這些共青團的後生晚輩，無所顧忌地說出自身的政策偏好：

總之，要鞏固集體經濟，就要鞏固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根本方向問題。當然，也還有一個工作問題、領導問題。農村主要是調整生產關係，我們要承認多種多樣的形式。照我個人想來，可能是多種多樣的形式比較好。[7-49]

只不過「包產到戶」等議題，終究無法如鄧小平所言的「在8月會議上研究一下」，因為在鄧講話的次日，毛澤東就表態反對「包產到戶」等主張，使得相關提案胎死腹中。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包產到戶」、分田到戶支持者，被迫緘默無語，進而拋棄原先的立場。

毛表態反對後轉向

當「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主張在中共黨內逐漸形成輿論之時，毛澤東在1962年初夏指使羅瑞卿（時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兼總參謀長）在軍隊調查「是贊成單幹的多，還是贊成社會主義的多？」，並強調「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也還沒有解散集體農莊」。^[7-50]換言之，毛認為「包產到戶」與分田等農業「單幹」主張，除了是對國內社會主義事業的倒退，也有損於中共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與蘇聯競爭時的地位與顏面。毛反對「包產到戶」的心意，在此已表露無疑。

7月6日，陳雲鼓足勇氣當面向毛澤東提出分田到戶，以動員農民對付台灣「反攻大陸」的軍事威脅。毛澤東雖然沒有當場給陳雲難堪，但他嚴拒「分田單幹」、「包產到戶」的立場——批之為瓦解農村集體經濟、解散人民公社的中國式的「修正主義」，^[7-51]很快就傳遍高層。面對毛的震怒，陳雲藉口養病，淡出政治。

相較於陳雲的稱病而去，鄧小平則以立場轉向來因應情勢變化。7月8日，毛澤東召集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人開會，表明自己反對「包產到戶」的態度。^[7-52]當日晚上，鄧小平急忙聯絡胡耀邦，要求不要傳達他在前一日對共青團幹部講話中關於「包產到戶」等問題的段落。^[7-53]除了急急收回自己在相關問題上的出格言論，鄧小平也藉由籌備行將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的機會，在擬定中央要求各地先行調查以為開會作準備的通知中，以設計具特定傾向的調查問題的方式，突顯自己對「包產到戶」的反對。

在中央通知中有關農業方面的問題，鄧小平開頭即問：「你們認為，應當採取什麼辦法來鞏固集體經濟，使農民生產恢復和發展快一些？」在開宗明義肯定「鞏固集體經濟」後，鄧才問：「你們認為，採取包產到戶和分田到戶的辦法是不是可以更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並更進一步地詢問相關辦法「將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引起何種結果？」對於已實行相關辦法的地方，「應當採取什麼政策？」^[7-54]鄧小平這種有預設答案的問題

設計，應是他想在此一爭議上扳回失分的一種補救。另外，鄧也在7月19日簽發中共中央〈不要在報紙上宣傳「包產到戶」等問題的通知〉。^[7-55]

即便如此，鄧小平此前針對「包產到戶」問題的談話，還是傳到毛澤東耳中，毛批評鄧為「唯生產力論」。據薄一波的回憶，「這個問題當時弄得還挺厲害」。鄧小平只能辯解：「我沒有旁的用意，就是把生產搞上去，把目前的困難度過去就是好的。」^[7-56]自此直到毛澤東身故以前，鄧小平不再對人民公社制度獨一無二的地位提出異議，而與毛保持同調。^[7-57]

鄧小平在經濟調整期間所做的工作中，「包產到戶」問題並不是他唯一遭到毛澤東批評的事項。1962年夏，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高唱「階級鬥爭」，除嚴厲批判「包產到戶」主張為「單幹風」，也指責對經濟情勢審慎估計的傾向為「黑暗風」，對大批的政治運動受害者恢復名譽為「翻案風」。對於緩和對外關係的主張，毛也有所責怪。這些事也都與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鄧小平有直接、間接的關係。其中，特別是甄別平反的工作，即由鄧小平主導與推動。

鄧小平力主推行大規模甄別平反工作的原因有：首先，鄧小平開始對中共自「大躍進」以來頻仍發起政治運動的做法，以及每每流於擴大打擊面的結果，有所省思。^[7-58]1962年3月，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就說：「這幾年，批判、處分的人很多，拔白旗、反右傾、整風補課等，80%、90%是錯了，甄別工作進度很慢，不能調動積極性。」^[7-59]其次，鄧小平將甄別平反當作調動基層幹部與群眾積極性的一種方法，因為網開一面、不拘小錯，可讓先前在政治運動中被錯劃、誤懲的人士獲得解放，並藉以安定他們親友的情緒，進而安心於生產。5月11日，鄧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表示：

幹部的甄別平反，對於調動幹部的積極性，特別是調動縣以下農村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很重要。所謂甄別平反，主要對象是幹部，可是每一個幹部都聯繫著群眾，實際上影響到大量的群眾。

現在，大家都贊成這個辦法，就是全國縣以下，首先是農村，來個一攬子解決。就是說，過去搞錯的，或者基本搞錯了的，統統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決。因為縣以下都是一些基層幹部，問題只有那麼多，右傾也是右傾到那個程度，「左」傾也只是「左」傾到那個程度。他們又是直接聯繫群眾的，親戚朋友、各方面的人聽到這些事，人心不安。大家情緒不安定，是不利的。現在我們不是來抓生產隊嗎？為了把基層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甄別平反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輕視這個工作。^[7-60]

然而，毛澤東受到彭德懷寫信要求平反的刺激，裁示「反右傾運動不能一風吹」，鄧小平期望快刀斬亂麻、「一攬子解決」的甄別平反工作，也只得停擺告終。

毛澤東對「單幹風」、「黑暗風」、「翻案風」的撻伐，主要針對鄧

小平在內的所謂「一線」領導人。這對投入調整工作、全心努力恢復經濟的鄧小平而言，無疑是一重大的政治打擊；但是對鄧更重要的是，重建毛對自身的信任，讓之知曉自己有心改正。

針對「包產到戶」與甄別平反等主張在中央官僚部門中頗受同情的情形，毛澤東十分憤怒地指示：「在中央部門要反分散主義！」^[7-61]負責統領黨國官僚的鄧小平，專門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商討補救措施。鄧小平表示：「分散主義最大的在中央的各部門，這是個大問題。不使主席、常委經常了解全局動態，對決策不好。書記處的責任是通風報信，為主席、常委作準備。材料一要少而精，二要經常。」鄧小平除了規定黨中央的各部門按時撰寫、上報綜合報告，以「建立一個經常向主席和常委反映問題的習慣」；對於自己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他也指示：「以後書記處會議討論的重要問題，有些摘記送常委傳閱（不是指要經常委批准的，主要是反映情況）。」^[7-62]鄧小平的此一規定，實具有自我設限的涵義，因為毛澤東經此得以更方便地對鄧與中央書記處的作為進行監督。

另外，對於毛澤東在1962年炎夏大批「單幹」並大談「階級鬥爭」的重要性，鄧小平表態力求跟進，頌讚毛的提醒與指正「非常重要，很及時」。^[7-63]

第三節 「社教」運動與「三五」規劃問題 (1963–1965)

1963年起，鄧小平的工作重心與時間主要放在外事關係上，尤其是與蘇共的意識形態論戰。然而，鄧小平仍參與國內的重大事務，並置身在國內政治的重大發展與變化中。

1963年以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後來改稱「四清」）乃是中共治國議程中的一項重要政治議題。幾與之同步發展的是，國內經濟在經過1961年、1962年的調整後，接下來的經濟建設方針問題，則是中共高層努力思索的一項主要經濟議題。事實上，鄧小平正是在相關議題上引起毛澤東的不快和批評，使得兩人益形疏遠。

奉行劉少奇的「社教」方針，讓毛起疑

「三面紅旗」造成的災難性後果，使得向來自認是正確主張化身的毛澤東心緒低迷，特別是自感身陷權力危機，而益加敏感與多疑。自信不若先前的毛澤東，小心檢視中共黨內的各方力量，希冀分辨可以信任的盟友，以捍衛並確保自身獨尊的地位。長年來被毛視為「自己人」的鄧小

平，也得重新受到毛的政治考核。就毛而言，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職位上經歷數年的磨練，對於黨機器的操控運轉已相當熟練，勢力不可小覷，斷不能在其忠誠問題的判斷上出現任何失誤。

鄧小平自獲得毛澤東的眷顧而接任中央總書記以來，確實在一些重大政策與運動上，緊跟毛澤東並為其所欣賞，例如：整風、「反右派」，軍隊「反教條主義」以及「大躍進」。但是就毛看來，鄧小平在1960年代前半期卻有同自己拉開距離、而與劉少奇走近的跡象。這時毛對劉的忠誠度已漸漸起疑而將劉當作潛在的競爭對手，鄧看似傾向劉的政治言行，因而變得更加容易啟毛疑竇。

1961年至1962年的經濟調整中，毛澤東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抑或是想更集中心思於如何突破困局，他在更多的時間裏是待在「二線」，讓劉少奇統領鄧小平等「一線」領導人主持經濟調整工作。由於毛較少在「一線」指手畫腳，而且因為他也尚在思索，無法向「一線」領導人提出明確的方向，所以劉少奇與鄧小平有較大的政治空間進行政策探索，並較敢提出不同的政治嘗試。劉、鄧在時間、情勢的急迫壓力下，有迅速反應處置的需要，又鑒於中共先前政策偏差導致混亂，以及「當家作主」首重穩當的「角色意識」，較傾向於以保持黨國正常運行、政經穩定發展為優先。這與毛澤東更重視政策的意識形態意涵與後果大不相同。^[7-64]劉、鄧與毛在「包產到戶」問題上迥異的思考，即為一例證。

鄧小平與劉少奇在經濟調整期間，確實做到彼此步調一致、通力合作，雙方對當時問題的看法與情勢的分析相近。^[7-65]劉很信任鄧，要鄧一起整頓危局；^[7-66]鄧也很配合劉，奉行與信從劉的領導。^[7-67]劉與鄧在此時期協力推動的一些有違毛澤東偏好的政策與倡議，在毛訴諸「階級鬥爭」並仗其權威下，雖然立即中止，但已經引毛疑心。劉、鄧為了止息毛的懷疑，盡量依循毛的主張，但是毛的疑心太大，不會沒有行動。毛在後來「文革」時提到「1962年的右傾」，就是批評劉、鄧在這時候的表現。

另外，被毛澤東批判為「1964年的形左實右」，則是指劉少奇主導下「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錯誤偏向。毛也因鄧小平在其中與劉「配合演出」，而感到不悅，甚而遷怒。

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的主要職責之一，在於貫徹中央的意旨和決定。鄧小平雖然同樣參與最高決策，然無論其個人意見為何，一旦最終方案底定，鄧都是不論原則而只講求有效率的執行（unprincipled but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7-68]鄧小平服從組織決定並雷厲風行貫徹的行為取向，向為毛澤東所欣賞；鄧舉重若輕、不拘泥細節的行事能力與作風，更享譽中共領導層。鄧小平這種性格和作風，在毛澤東親自掌舵、「國無二主」之時，問題不大，鄧小平至多只有在執行上拿捏是否得宜的問題。然而，

當發號司令者不僅是毛澤東一人之時，可能衍生的是非就會多起來了，甚至引發毛始料未及的中央書記處為劉少奇的個人主張服務的情況，最集中表現的例子，就是引發毛、劉當面爭執的「社教」運動。

「社教」運動的起因，乃是1963年春毛澤東著眼於在前一時期中共黨內、外出現若干背離社會主義的做法和現象而決定發動的，期以教育黨員和人民：「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社、資兩條道路的鬥爭，以及資本主義復辟、幹部變質、黨變修的危險性。」^[7-69]劉少奇在1964年下半年起接掌、指揮「社教」運動後，他對運動的基本設想（基層幹部大有問題，要將之踢開）與具體做法（集中力量於一點，暗中查訪、開展奪權），對基層幹部有打擊面過大之虞。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大張旗鼓地捕捉手腳不淨的基層幹部，不但牽扯面過寬，也錯置運動重點，縱放了蛻變異化的上層幹部。^[7-70]尤為重要的是，劉在運動過程中展現的驅動全黨投身運動的權威，讓毛吃味；劉個人流露出不輕易妥協的自信，更讓毛倍感威脅。^[7-71]

劉少奇對「社教」運動的主張，鄧小平恐不是全盤同意而是有所保留的。因為被劉少奇當作「社教」的新圭臬——其主持的〈後十條修正草案〉（全稱為〈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修正草案〕〉），乃是修改〈後十條〉（其全稱為〈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一些具體政策問題〉）而來。〈後十條〉正由鄧小平、譚震林在1963年9月至10月所主持制定的。^[7-72]

鄧小平主持制定的〈後十條〉，對農村基層情勢與幹部情況有較為冷靜的估計，內容比較溫和。鄧小平曾評價「這個文件大體上比較好」。^[7-73]1963年10月8日，鄧小平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也提出「社教」運動宜謹慎的看法：「貪污的一定要退賠，但運動要謹慎。」「可否這樣設想，總的這個運動特點是十年沒搞（老『三反』起），十年積的問題很多（儘管算是從1961年），如不警惕，打擊面可能大了。還有這幾年黨內鬥爭也很複雜，還有三年災荒困難，所以要趨向謹慎。」「這個運動要二、三年，後年還可能有個尾巴，只要政治上寬點，退賠方面、揭露方面搞嚴一點，也要實事求是，毛病就不會大。」^[7-74]半年後，鄧小平到地方指導工作時更表示：「這個〔農村『社教』運動〕也不要花多少時間，要抓季節，抓住生產，把生產搞上去，以生產為綱。」^[7-75]

1964年後半年，劉少奇開始領導「社教」運動後，即對鄧小平主持制定的〈後十條〉不假辭色地嚴加批評，認為基層幹部與貪腐分子利用相關條文阻礙運動的進展。^[7-76]劉後來甚至批評以鄧為首的〈後十條〉制定者，當初沒去基層實地調查，僅聽下級匯報了解運動。這種情況下寫成的運動文件，反映的是基層幹部的意見，而非群眾、貧下中農的意見。^[7-77]

鄧小平聞之，心裏恐怕也會有些不是滋味。[7-78]

但由於中共中央決定劉少奇掛帥指揮「社教」運動，[7-79]鄧小平尊重劉少奇領導運動的地位，努力配合劉對運動走向的新指示。鄧小平一方面公開響應劉少奇提出的「集中力量打殲滅戰」與倚重工作隊角色的運動主張；[7-80]另一方面，他按照劉所提的組織各級幹部參加運動的指示，調動黨機器與各科層官僚下鄉投入運動。[7-81]

鄧小平直到1964、1965年之交，在毛澤東開始強勢批判劉少奇帶領的「社教」運動方向後，才表明他個人對劉的運動主張的保留意見。1964年12月20日，對於涉有不法的基層幹部的處理問題，鄧小平表示宜限縮在小範圍內：「這次運動的打擊面還是百分之幾比較有利。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幹部，在鬥爭中分化他們，爭取他們，教育他們，改造他們，最後的打擊面是百分之幾。」對於派遣各級幹部蹲點調查的問題，鄧在1965年1月3日也呼應毛對劉的批評指出：

方法問題很重要，我贊成主席的意見。我們一些大幹部，如中央局書記、省委書記蹲在一個小隊、大隊，太長了不一定有利。至少還要著眼一個縣，還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點的經驗並不一定全面。現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現在要慢慢上來管廣一些，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裏面出不來，就不好了。[7-82]

然而，鄧小平此前在「社教」運動中拋棄己見、服從劉少奇領導，並高效地將其指示付諸實行的做法，在自認大權旁落的毛澤東看來，分外刺眼，以為兩人過於靠攏。1964年11月底，毛澤東對劉少奇的怒氣還在隱忍未發之時，就曾意有所指地將鄧小平與劉少奇牽連在一起。他說道：劉少奇罵娘有用、說話「靈驗」，「做主席，做秦始皇」，「小平做秘書長」。[7-83]一個月後，當毛澤東針對「社教」問題當面斥責劉少奇之時，毛同時也以鄧小平不讓他開會參加討論為由，略帶小題大作地對鄧加以責罵。持平而論，鄧小平在1964年下半年奉行劉少奇對「社教」運動的領導與指示，乃為其中央總書記的職分，在組織上並無疑義。毛澤東對鄧小平有氣，實質上主要是鄧沒有照應、顧及毛對權力得失極為敏感的心理。[7-84]

如果說鄧小平在「社教」問題上，多少是受了池魚之殃，被毛澤東對劉少奇的大發雷霆所波及；然而，毛在批責劉的同時，也另有直接針對鄧小平個人工作的批評——「搞獨立王國」。這則同中共高層在調整時期後的經濟建設方針問題上，存在相左看法有關。

怠慢「三線」建設，引毛不滿

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原訂從1963年開始的「三五」計劃，向後推遲至

1966年開始，而在此之前，再作三年的經濟調整，並同時為「三五」計劃預作準備。^[7-85]對於這一兼具調整與過渡性質的階段，以及「三五」計劃的走向，在1960年代初主持經濟調整工作的「一線」領導人如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已形成一定的共識，亦即更注重農業生產與民生需要的問題，「吃穿用」就是其形象化的比喻。毛澤東對此最初也無太大的異議。

自「大躍進」起即主持制定年度與中、長期經濟計劃的鄧小平，既著手設計1963年與1964年的年度計劃，也同時思考「三五」計劃的重心問題。從1963年至1964年春這段期間鄧小平在討論計劃工作時所作的指示，^[7-86]以及對內、外的多次講話中，^[7-87]可以明顯地發現他主張的是：以加大對農業的投資、解決人民的「吃穿用」問題為優先，再來的發展序位才是基礎工業與國防。基於此一思路，鄧小平更具體地提出：在「三五」計劃內要建設五億畝穩產高產農田，第二步再搞五億畝；「三五」期間就是要努力解決「吃穿用」問題。^[7-88]李富春領導的國家計委，配合中央總書記的意向，擬出了一個加重農業投資，基本工業要與之相適應和配合的「三五」計劃構想。

1964年5月中旬，毛澤東在聽取李富春的計劃匯報時，卻表達了不同的意見。毛澤東不但直接對鄧小平主張的建成一定數額的穩產高產農田目標，表示不以為然，^[7-89]更進而認為基於國防安全的考量，基礎工業與內陸地區的工業建設問題才應是「三五」計劃的主要側重點。在毛明確表態後，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共高層只好以之為準。

毛澤東對當時中國大陸的周邊情勢，保持高度的警戒，甚至據此提出改變國內建設的既有方針以肆因應，雖看似是一自然而然、無可厚非的自衛反應，但若注意到中國當時周遭出現的緊張情勢，有些乃與毛自己推行的對外政策如同蘇聯針鋒相對、對東南亞輸出革命相關。易言之，中共當時所面臨的四面烽火的處境，實有部分是自引火上身所致。如第六章的討論，在對外關係上一直擔任毛的助手、政策立場與之無異的鄧小平，此時就遇到了一個窘況：鄧助毛對外施展若干強硬手段的後果，例如：在中、蘇共思想論戰方酣之時，又主動挑起兩國邊界屬性的敏感議題，使得蘇方益加惱火，開始在雙方交界之處部署重兵，讓中共在北面感到軍事威脅的壓力。這些竟反過來限縮鄧自身對內採行較務實的經濟主張的空間。

鄧小平雖力求跟上毛澤東基於備戰思維所提出的經濟建設新想法，但一方面自身首重補強農業的意見，自「大躍進」災難後已成形有一段時日，在反應與轉變上難免稍有遲慢；^[7-90]另一方面，大型經濟計劃的另作安排，也確實尚需一定的時間以便重新研究、探勘與確認。^[7-91]因此，直至1964年的夏秋之交，鄧小平、中央書記處與國家計委才將毛澤東主張的優先發展基礎工業與「三線」建設的理念，納入施政的正式軌道內。對

此，毛澤東已大感不耐。8月，「東京灣事件」的爆發，益增毛對發生戰爭的焦慮感與準備應戰的急迫感。再加上，約此同時，鄧小平對於改由劉少奇領導的「社教」運動，在部署上卻極力配合，態度顯得特別熱絡。相形之下，益發讓毛覺得鄧對自己一心急著推動的「三線」建設有所怠慢。

毛澤東的怒氣首先表現在對李富春及國家計委的批評上，進而將批評的炮火逐漸向上延伸，對準了領導國家計委的中央書記處。毛澤東曾刻意詢問國家計委的人員：「你那個計委掛不掛牌子呀，寫的是什麼？」然後，語帶批評地表示，國家計委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計委，而是「中央書記處計委」。亦即，毛認為國家計委只聽命於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對毛所倡的「三線」建設不熱衷。^[7-92]到了1964年底、1965年初，毛澤東痛批劉少奇在「四清」運動上犯了「形左實右」的嚴重錯誤（鄧在其中的錯誤，在於沒有對之加以抵制，反而努力執行），也點名中央書記處與國家計委為兩個不聽指揮、自行其事的「獨立王國」。^[7-93]

毛澤東對鄧小平與國家計委在啟動「三線」建設上有所遲滯的不滿，並非只停留在口頭警告而已。毛對李富春與國家計委的懲處，是將之虛權化，也就是提拔開發大慶油田有功的余秋里組建「小計委」，^[7-94]具體負責制定「三五」計劃，從而掏空了李與國家計委的原有權力。毛對於督帥國家計委不力的鄧小平的懲處，則是剝奪了鄧從「大躍進」以來即享有的主導設計經濟計劃的權力。

對於新成立的「小計委」的組織領導關係，毛特別指示：「小計委由周總理直接領導，國務院各副總理不要干預他們的工作。」^[7-95]當時國務院的副總理中，排名在鄧小平之前的林彪本來就不管經濟，陳雲在1962年「包產到戶」風波後即基本賦閒。自1958年起，鄧在經濟管理上，以中央總書記身份負責「具體部署」，身為總理的周反而得負責「具體執行」鄧所主持的經濟方案，鄧因而是最具實權的副總理。事實上，周有事之時（如出訪或病假），也常是由鄧代行總理之職。毛在1965年初特意安排周領導「小計委」制定「三五」計劃，鄧雖也能參與其中，但他對經濟計劃的主導權，卻不動聲息地轉手給周。

根據楊尚昆晚年的說法，毛澤東在要求成立「小計委」以擺脫國家計委時，甚至還提議要另外成立一個中央書記處。對此，鄧小平「不好說話」，反倒是周恩來認為此議不妥而作罷。^[7-96]此說若無誤，可以反映出毛對鄧接連在「四清」上跟錯人、「三線」上又跟不緊的惱怒，甚至已到了想更動鄧的職位的程度。

面對毛澤東對自己的批評，鄧小平不下一次地檢討自身在「三線」問題上，確實犯了毛所指陳的「抓遲了」的過失，^[7-97]並積極地投入「三線」建設。然而，面對1965年至1966年越來越詭譎的高層政治發展，尤其

是經毛澤東許可下的出人意表的政治鬥爭（如批鬥羅瑞卿），^[7-98]遠遁西部荒谷、埋首「三線」佈局，反倒成為鄧小平走避相關政治鬥爭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也反映出鄧對相關人事清洗的異議。

第四節 在「文革」初期的高層政治中出局

在中共領導層中，毛澤東真正看重與偏愛的是鄧小平與林彪二人。^[7-99]有資料指稱，毛澤東對劉少奇大失所望，決心更換劉的接班人地位後，鄧小平與林彪同是他屬意的可能接替對象。^[7-100]只不過，相較於林彪在「文革」前數年對毛澤東的一貫悉心維護與緊密相隨，以及他在軍隊工作上的有聲有色，鄧小平明顯地遜色一籌。林彪在中共高層中節節高升，與鄧小平一樣是出自於毛澤東的主動安排。1955年中共七屆五中全會，林彪與鄧小平同時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1958年中共八屆五中全會，林彪更進一步地被增選為黨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林彪也確實不辜毛澤東所望，在維護其權力地位上有所回饋：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林彪響應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批判；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林彪從鞏固毛的領導威信出發聲稱：「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讓心情不佳的毛如獲知音。林彪在接替彭德懷主持軍隊工作後，在軍中大力推行政治思想工作，例如：提出「四個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推行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活動，以及強調「突出政治」原則。相關舉措皆贏得毛的青睞與好評。^[7-101]

相比之下，鄧小平在摸測毛澤東的政治意圖上，略現疲態，^[7-102]實際上也出現了摸不太著毛的真實政治脾胃的情況，對待文藝批判問題就是一個重要的事例。1963年起，在江青的引導下，毛澤東對中國大陸的文藝工作表現屢予嚴批；相關的批判更向整個思想、文化界擴大，造成氣氛緊縮的現象，鄧小平希望對此加以控制。1965年3月，他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表示：「現在人們不敢寫文章了。戲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了。電影哪有那麼完善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著別人的肩膀上台。」並提出對此現象要加以制止。^[7-103]

對於隱藏在文藝批判後面更大的政治圖謀，特別是「文革」的導火線——對吳晗的《海瑞罷官》的批判，鄧小平似不知此事乃由毛澤東、江青幕後策劃，而直接不予贊同。當彭真向鄧小平報告吳晗因耳聞《海瑞罷官》可能出事而深感壓力時，鄧不但要彭真傳話給吳讓之安心，自己也照樣請吳打牌，甚至在牌桌上對吳表示「有我們給你往前頂」。^[7-104]

鄧小平對毛澤東的態度從早先的唯恐人後，到「文革」前夜的半溫不熱，以至於摸不著頭緒，皆難逃毛的法眼。鄧領導的中央書記處的人事問題，又層出不窮，毛在1966年初為此批評：

鄧小平管的書記處，不知道是管的誰人的書記處。書記處裏頭壞了多少人啦。過去的不算，現在的彭真，他管的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陸定一管的中宣部是個閻王殿，左派的文章休想過關。羅瑞卿在軍隊裏頭搞折衷主義。楊尚昆往來傳遞消息，收集情報。這就是鄧小平的書記處。[7-105]

「彭、羅、陸、楊反革命集團」成員一一被「揪出」的過程，既可看作毛澤東對相關人士的共同上級鄧小平領導無方、督導不周的責怪，也實同是在權力上對之的削翦羽翼、步步進逼。[7-106]再加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如何看待群眾運動的問題上，鄧小平又與劉少奇一道主張派遣工作組管理與引導，被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批為是「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毛澤東終而擇定林彪為政治接班人，攜手領導「文化大革命」。[7-107]

鄧小平在「文革」急速升級的批判中，被冠上「黨內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惡名，並因此黯然失權。鄧小平以中央總書記的職銜與地位在中共政治中權傾一時、叱吒風雲的歷程，也至此告止。

注釋

[7-1]〈關於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的一封信〉，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第9冊，頁440。

[7-2]1961年3月27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規定書記處最近的四項工作，首項即是組織農村調查。4月3日，中央書記處又專門討論去農村調查的人員安排。載楊尚昆：《楊尚昆日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上冊，頁659、661。

[7-3]中國大陸資深經濟學者（G君）提供的資訊。（香港，2007年1月）

[7-4]謝蔭明、郭曉燕：〈鄧小平1961年北京順義調查〉，《黨的文獻》，2004年第5期，頁69-70。

[7-5]〈鄧小平、彭真同志5月10日給主席的信〉，1961年5月10日，頁1-7。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後面文中對此信內容的摘錄，皆引自於此，不再贅述。

[7-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頁24。

[7-7]五保戶、困難戶乃指農村地區生活困難、無自給能力又孤立無援者。所謂「五保」，包括：保吃、保穿、保衣、保住、保葬。如果供養對象是孤兒，則還有保障其接受基本教育的機會。

[7-8]鍾文、鹿海嘯：《百年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下冊，頁290。

[7-9]〈胡喬木同志5月8日給主席的信〉，1961年5月8日，頁2。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7-10]例如：在湖南調查的胡喬木與在河北調查的周恩來。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下冊，頁1153-1162。

[7-11]蕭冬連：《共和國年輪·196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頁173。

[7-12]中國科學院運動辦公室印：《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言論摘錄》（北京：1976年3月），頁22。

- [7-13]包括：規定產品方案和生產規模；規定人員和機構；規定主要的原料、材料、燃料、動力、工具的消耗定額和供應來源；規定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規定協作關係。
- [7-14]包括：保證產品的品種、質量、數量；保證不超過工資總額；保證完成成本計劃，並力求降低成本；保證完成上繳利潤；保證主要設備的使用期限。
- [7-15]鍾文、鹿海嘯：《百年小平》，下冊，頁303-30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下卷，頁994。
- [7-16]薄一波：〈薄一波談鄧小平〉，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話說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15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994-997。
- [7-17]馬天水：〈我的揭發〉，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大會專刊》，聯合版第2期，1967年3月23日，版3。〈鋼鐵戰線上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記大毒草《上鋼一廠訪問記》出籠經過〉，《大會專刊》編輯部主辦，《大會專刊》，第8期，1967年6月2日，版4。
- [7-18]蕭冬連：《共和國年輪·1961》，頁205。
- [7-19]龔育之：《龔育之的回憶：「閻王殿」舊事》（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285。
- [7-20]龔育之：《龔育之的回憶：「閻王殿」舊事》（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285-286。
- [7-21]《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169-1170。
- [7-22]蕭冬連：《共和國年輪·1961》，頁232。
- [7-23]劉以順：〈60年代初安徽農村責任田始末〉，《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8期（總第205期）（1994年8月），頁2-12。
- [7-24]劉以順：〈毛澤東在安徽推廣責任田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總第54期（1995年7月），頁102-122。
- [7-25]除了推行「責任田」的問題，曾希聖被撤職的原因還包括：他在安徽採行「一言堂」的家長制領導，以及蓄意隱瞞該省在「大躍進」期間所出現的嚴重問題。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頁234-239。
- [7-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下冊，頁1623。
- [7-2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14。
- [7-28]〈中央辦公廳轉發安徽省委關於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1961年5月3日，頁1-4。此乃海外的匿名研究者提供。
- [7-29]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31.
- [7-30]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36-39。
- [7-31]吳冷西：〈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者〉，載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2000），頁317。
- [7-32]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11-112。
- [7-33]水靜：《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書記夫人的回憶》（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頁242。
- [7-34]1961年孟夏，陳雲赴外地、特別是在華東進行調查。陳雲回北京後寫成〈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等報告。陳雲在8月8日致信鄧小平說明調查所見並附上前述三份報告。鄧閱後批示將陳來信與調查報告印發中央工作會議。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下冊，頁1258-1270。
- [7-35]例如：1960年末，遼寧農村情勢告急，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急電李富春，請求中央緊急調撥糧食。李表示糧食問題「得找小平同志」。東北局特地派專人赴北京匯報。最後，中共中央答應緊急調運兩億斤糧食以緩解災情。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頁369-370。
- [7-36]《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71-172。
- [7-37]李富春在信中表示：本月16日途經安徽一些地方，看到農民生活好了，沒有浮腫病和逃荒要飯的了。同農民談話，農民都這樣解釋：「實行包產到戶好，積極性比過去高

了」，「現在自己種自己收，多種就多收，多收就多吃。」載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15。

[7-38]劉以順：〈鄧子恢在安徽推行「責任田」前後〉，《黨史縱覽》，1999年第6期，頁15。蕭勇、宗躍：〈鄧子恢與人民公社化運動〉，《黨史博采》，1999年第1期，頁13-14。

[7-39]對於「包產到戶」問題，在中央書記處內，除彭真反對之外，王稼祥似也有所保留。載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頁391。〈在國史第三卷初稿討論會上的講話〉（1993年12月18日至12月31日），載《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匯編：《鄧力群國史講談錄》（北京：2000），第3冊，頁13。

[7-40]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19。

[7-41]江鯤池：〈鄧小平與安徽經濟體制改革〉，《江淮文史》，2004年第5期，頁5。

[7-42]《陳雲傳》，下冊，頁1321。

[7-43]《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230。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下卷，頁119。

[7-44]《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12。

[7-45]姚錦：《姚依林百夕談》（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頁166。

[7-46]鄧力群在一次內部講話中，針對此問題表示：「朱總司令那個時候不太管事。七個常委，除了總司令，劉少奇同意、周總理同意、鄧小平同意、林彪同意、陳雲同意，六個常委中有五個同意分田到戶。」〈關於修改國史第二卷的談話〉（2000年9月18日、11月1日），載《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7冊，頁148-149。

[7-47]《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13。

[7-4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118。曾自：〈向毛澤東進言「包產到戶」——記我的父親田家英〉，《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04年第3期，頁61-62。

[7-49]〈鄧小平在接見參加團的三屆七中全會全體人員時的講話〉（1962年7月7日），載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編：《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文章匯編》（北京：1967），第2集，頁56-57。需要著重指出的是，鄧小平在1962年孟夏支持「包產到戶」，主要基於應急的權宜需要。鄧同意「包產到戶」合法化，也不是要將之推廣全國、全部取代人民公社制度，而是要因地制宜。與此同時，人民公社在中國農村裏仍佔有主要的比例。另外，鄧也強調「退了才能前進」。也就是俟情勢轉好、步伐站穩後，實行「包產到戶」者仍要向更高級的集體經濟方向前進。

[7-50]羅點點：《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1999），頁134-135。

[7-51]對於「包產到戶」爭論，毛澤東除了利用權威懾服鄧小平等人放棄己見，毛也有技巧地將「包產到戶」爭論放諸意識形態層次，把它化約為是否有利於堅持集體經濟的問題。在當時中共領導人對社會主義的認識與理解中，集體經濟可謂是深植人心的「天經地義」。毛這種刻意將「包產到戶」等同於違背社會主義理念的做法，不但使得同意「包產到戶」者難以辯駁，也可在共同為社會主義奮鬥的呼籲下，再次取得後者的共鳴。此乃中國大陸當代中國史研究學者林蘊暉教授提供的觀點。

[7-5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232。

[7-53]胡克實：〈胡克實談鄧小平〉，載《話說鄧小平》，頁163。

[7-54]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頁505-506。

[7-55]《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17。

[7-56]薄一波：〈薄一波談鄧小平〉，載《話說鄧小平》，頁152。「貓論」後來常被用來反映鄧小平講求務實的政治風格。1988年，曾有台灣訪客當著鄧小平的面，引述「貓論」對之進行讚譽。鄧的立即反應雖是甚為得意，但仍表示相關說法係當時為「解決吃飯問題」而說。"Wei, E., writing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6C14-9.13, p. 28.

[7-57]例如：1964年1月21日，鄧小平對阿爾及利亞外賓表示：「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制度，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有利於發展生產。公社規模大，可以興辦小單位不能興辦的事業，如水利事業；將來通過公共積累的不斷擴大，可以實現農業現代化。第二，有利於鞏固社會主義制度，保障向共產主義道路前進，避免農村出現兩

極分化。第三，可以穩定城市市場。」武市紅：〈鄧小平對中國農村現代化的探索與思考〉，《黨的文獻》，2006年第6期，頁61-62。

[7-58]事實上，相關政治運動多是由鄧小平領導中央書記處執行與督導。例如：「大躍進」期間，農村發生多起幹部作惡、加重死亡災情的事件（尤以河南的「信陽事件」為代表），中共一開始視之為地主、富農所做的「階級報復」，並在發生類似情事的地區進行「民主革命補課」，亦即以強化階級鬥爭、挖掘階級敵人的方式試圖解決問題，鄧小平正是主持其事的中共領導人。載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頁107、109-110。

[7-59]中國科學院運動辦公室印：《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言論摘錄》，頁23。

[7-60]鄧小平：〈克服當前困難的辦法〉，載《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卷，頁319。

[7-61]《楊尚昆日記》，下冊，頁196。

[7-6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17-1719。

[7-63]《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243。

[7-64]Jing Hua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12.

[7-65]對於「大躍進」所造成的危害，劉少奇在親赴基層調查後有深刻的體會，也有迫切的危機感以及愧疚感。劉期望藉由大刀闊斧的措施制止情勢惡化，儘快走出谷底。鄧小平對此心有同感，並引用劉的判斷。1961年5月31日，鄧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表示：「三年來毛病出的很大，問題相當多，……究竟是由於天災還是人禍？少奇同志也講過，恐怕我們工作上（包括若干政策）的毛病是主要的，天災不是主要的。」載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頁105。

[7-66]1962年初，針對危急的經濟情勢，劉少奇指出：「處在非常困難時期，不能按常規辦事」，「要搞點非常措施，同意搞財經小組，有時××抓、小平抓、我抓，硬是要搞獨裁。」載中國科學院革命歷史研究所、近代史革命研究所編印：《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匯編》（北京：1967年4月），頁103。易言之，劉少奇認為，在此緊急階段，鄧小平如自己同是可以行使大權的領導人。

[7-67]1962年春，劉少奇主張：中央政治局應該用最大的決心，採取非常的措施。鄧小平則從補充劉的角度表示：「決心早就下了，就是不夠大，更重要的問題，不是決，而是行」，「現在主要問題是行的問題」。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鄧小平對於上半年劉少奇帶頭、鄧參與其中的調整結果，肯定地表示：現在的情況比較好轉了，證明當時採取的措施是對的。吳冷西：〈國民經濟調整的領導者〉，載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頁336、344。

[7-68]Barry Naughton, "Deng Xiaoping: The Economist,"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p. 492-497.

[7-69]范曉春、孫寶元：〈第三次包產到戶與四清運動〉，《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8期（總第301期）（2002年8月），頁15-24。

[7-70]王海光：〈60年代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載郭德宏、王海光、韓鋼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卷2）：曲折探索（1956-1966）》（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頁588-590。

[7-71]高華：〈北京政爭與地方——釋讀《江渭清回憶錄》〉，載高華：《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204-214。

[7-7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72。針對〈後十條〉問題，鄧小平在「文革」中也自承：「在杭州搞這個文件的時候，我是參加了的，我完全應該對這個文件的錯誤，負重大的責任。」〈鄧小平寫給中共中央的《我的自述》（摘錄）〉（1972年8月3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7-73]1963年10月5日，鄧小平將〈後十條〉呈送給毛澤東時也說：「主席，我看這個文件可以了。請你抽暇審閱修改後定稿。」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75-1776。

[7-74]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頁73-7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76。

- [7-75]譚啟龍：〈我心目中的小平同志〉，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上冊，頁298。
- [7-76]1964年5月28日，劉少奇在各中央局負責人會議上指出：「〈後十條〉強調發動群眾不夠，比較多地強調依靠基層幹部，強調團結兩個95%。於是，基層幹部和那些『四不清』的幹部，就拿團結兩個95%來反對『四清』。」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下冊，頁958-959。
- [7-77]劉少奇：〈關於四清、五反蹲點問題的報告〉，載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北京：1967），頁588。
- [7-78]南京大學的高華教授提供的觀點。
- [7-79]1964年8月5日，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劉少奇主持〈後十條〉的修改；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領導。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24。
- [7-80]1964年8月31日，鄧小平在劉少奇主持召開的旨在討論「社教」運動的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表示：「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城市『五反』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具體來講，一定要有工作隊，一定要發動群眾。通過這次運動，讓那些堅持馬列主義的或者比較堅持馬列主義的人，成為各級的領導骨幹。」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26-1827。
- [7-81]劉少奇欲驅動黨的官僚與幹部參與運動，需要鄧小平與中央書記處從中佈置、組織落實。1964年8月16日，劉少奇致信中共中央，建議組織各級幹部參加「四清」、「五反」。劉指出：「如果中央同意，請中央決定後，由書記處立即進行組織。」同月27日，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即決定：中央黨政機關實行精簡，抽人下去參加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9月3日，劉少奇又指示鄧小平：「過去派到各地勞動鍛鍊的幹部，凡符合參加四清、五反者，一律由各地省委組織他們參加四清、五反。」載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頁142。《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2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602。
- [7-8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70、1377。
- [7-83]蕭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下冊，頁1100。
- [7-84]除了權力因素之外，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的包瑞嘉（Richard Baum）教授認為：毛澤東對鄧小平主持的〈後十條〉，也有不滿之處。（台北，2006年3月29日）根據包氏專著的分析：鄧的〈後十條〉對運動中敵友界線的劃分，採取的是較為模糊的立場，例如：對於具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較富裕的農民比較寬待；也相信「四類分子」中的多數可透過適當的教育與勸導而獲得改造。對於群眾在運動中的角色與自主活動空間，也附加更多的限制與規範如：群眾不被允許逕自決定或處分四不清的幹部，以及召開群眾鬥爭大會對付「四類分子」。鄧的相關主張乃希望運動在執行的過程中，可具必要的謹慎性以及適當的程序。實行〈後十條〉所產生的後果，恐也不符毛澤東以階級鬥爭作為運動主軸的設想。Richard Baum,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57-59.
- [7-85]1963年7月3日，毛澤東指示：「不要馬上搞第三個五年計劃。從1963年至1965年再搞三年調整，把三年作為過渡年，基本上是調整，也有發展，然後在這個基礎上搞五年或十年計劃。」同月30日，鄧小平將毛的旨意傳達給具體研製經濟計劃者：「還要進行三年調整，重點是鞏固、充實、提高，創造條件，為第三個五年計劃做好準備。」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62。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230。
- [7-86]1963年8月20日，鄧小平在主持召開中共中央〈關於工業發展問題〉起草委員會（中央書記處在13日決定成立此會並由鄧主持，周恩來、彭真、李富春、李先念等參加）的會議時表示：「制定發展工業的方針和規劃，要從現實出發，考慮到農業、工業和科學技術的基礎，考慮到管理水平問題。」「美國、日本工業發展快，靠的是農業有一個強大的基礎。許多國家工業發展得快，尖端工業能夠較快地上去，都是因為有強大的基礎工業。現在還似乎找不到一個國家，基礎工業很差，而尖端工業發展很快的。而我們的弱點基本在農業，基礎工業本身也存在不少問題。」「因此，在一定時期內，我們的工作重點，必須

按照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適當解決吃、穿、用的問題，著力解決基礎工業薄弱的問題。」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70。

[7-87]1963年11月22日，鄧小平對阿爾巴尼亞大使表示：「農業穩了，工業也就穩了；農業不穩，工業就提心吊膽。我們還要用10至15年的時間集中力量搞農業，吃的、穿的、用的主要來自農業，穿的慢慢地要從工業方面解決。」「一個國家吃穿問題解決了，自力更生問題就解決了。」12月18日，鄧小平也對北韓人士表示：「我們的基礎是放在農業上，首先解決吃和穿的問題。」1964年1月11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表示：「多年來我們制訂的計劃沒有反映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在今年、明年兩年的調整時期，在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期，要落實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同時著眼於搞吃穿用。吃穿用搞好了，我們國家的腳跟就站穩了，基礎就穩固了，發展速度也會更快一些。總之，第一是搞吃穿用，第二是搞基礎工業，第三是搞國防，要以這三點為綱，來制訂我們的計劃。」《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778—1779、1782、1789。

[7-88]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231。《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03。

[7-89]毛澤東表示：「已有2億4千萬畝了，再搞1億6千萬畝就是4億畝，也很好嘛！不要套4億5千萬畝、5億畝那個框子。」李富春：〈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說明（節錄）〉（1964年5月18日），《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14。

[7-90]1964年5月中旬，毛澤東在聽取「三五」計劃的匯報時，提出「兩個拳頭（農業與國防工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的構想。但是毛在其中更注重基礎工業與內地工業的發展。鄧小平對此一時會意不過來，在5月28日仍試圖綜合原來的計劃方針（發展農輕重、解決「吃穿用」）與毛的新構想，亦即將兩者齊量觀之。迫使毛在6月6日再次出面講話，強調在「三線」開展工業基地建設的優先性。陳東林：〈硝煙瀰漫的西部開發——60年代三線建設決策始末（上）〉，《黨史博覽》，2001年第1期，頁7。

[7-91]劉松茂：〈李富春和國家計委的改組〉，《百年潮》，2000年第6期，頁22—23。針對西南鋼鐵基地選址問題的遲而不決，毛澤東尤為不滿，在1964年秋指定「釘子就釘在攀枝花」。載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241。

[7-92]陳東林：〈硝煙瀰漫的西部開發——60年代三線建設決策始末（下）〉，《黨史博覽》，2001年第2期，頁23。

[7-93]《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373。

[7-94]毛澤東多次批評李富春與國家計委後，在1964年底任命余秋里為國家計委第一副主任兼秘書長、黨組書記。計委的黨組會議自此改由余秋里主持，重大的問題也由其領導議決。「小計委」則是由余秋里組建的一個「計劃參謀部」，擺脫國家計委的日常事務，負責商議有關經濟計劃的重大問題。載雷厲：《歷史風雲中的余秋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頁16—17。

[7-95]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頁1244。

[7-96]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頁36。

[7-97]1965年4月12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表示：「主席批評三線建設抓遲了，包括書記處在內是有錯誤的，現在抓還來得及。」1966年2月26日，鄧小平在全國工交會議上也說：「主席提出三線建設，批評我們忽略了，這是個錯誤。」他在「文革」中的檢討亦表示：「沒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線的基本建設」，「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意義的三線建設」。載《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下冊，頁1856。〈在全國工交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2月26日），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北京：1967），頁72。〈鄧小平給毛澤東的信〉（1972年8月3日），載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

[7-98]有關羅瑞卿問題發生的原因，傳統的說法是：由於林彪身體孱弱，毛澤東決定在他養病期間，由賀龍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羅瑞卿由於亦步亦趨地協助賀龍工作，推展群眾性練兵運動，更因比武與政治工作之間的關係問題向林彪表示異議。因而引發林彪大權旁落之感、進而決心將羅剷除。毛澤東因為需要林彪的力量以對付其所認定的「修正主義」人物，另外也認為羅瑞卿與劉少奇、鄧小平等人過度相近，故同意林彪對羅進行整肅。林彪、葉群指控羅瑞卿覬覦林彪權力，曾在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生前要之出面請林彪讓賢交權。鄧小平表示「死無對證」，似無意採信。載羅點點：《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

案》，頁191。毛澤東後來在1973年底也表示：「小平講，在上海的時候，對羅瑞卿搞突然襲擊，他不滿意。我贊成他。也是聽了林彪的話，整了羅瑞卿呢。」載《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1677。但是，另一種說法是：羅瑞卿在軍中過於張揚、樹敵甚多；其在官職上也抱有雄心，並私下進行人事拉攏。羅被打倒，乃毛澤東主動發起、林彪被動配合。在羅被揭發的問題上，鄧小平所言的「死無對證」，也受到質疑。載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1），上冊，頁367-402。

[7-99]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下冊，頁474。

[7-100]1965年秋，周恩來受毛澤東委託向王稼祥「打招呼」：「人事變動很大，黨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鄧小平。」載朱仲麗：《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自傳三部曲》（北京：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4），第3卷，頁763。

[7-101]例如：1963年11月16日，毛澤東給林彪等人的信中表示：「自從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軍隊的軍事、政治工作都有一個新的發展，軍隊政治工作就更加理論化，也更加具體化了。」1964年2月，毛澤東在一次接見活動中表示：「四個第一好。我們從前也未想到四個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民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創造，是個發現。我們以前靠解放軍，以後仍要靠解放軍。」載少華、游胡：《林彪的這一生》（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頁336-337。毛澤東更曾在對林彪覆信中用上「真是小說上說過的『英雄所見，大抵略同』」的字句。載張素華主編：《毛澤東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頁472。

[7-102]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者（D君）表示：在應對毛澤東的熱情上，鄧小平在「文革」前有所降溫。因為較諸先前，鄧就較少到毛澤東處走動，與毛說話也少了。（北京，2007年1月）對此，也有論者指出，鄧小平逐漸體認到毛澤東「左傾」偏好的不切實際，但是也了解在政策管理上若不滿足毛，容易陷入危險。鄧乾脆請彭真多管事，自己則儘量避開政治漩渦。Frederick C. Teiwes, "Mao and His Lieutenant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20 (1988): pp. 68-72.另外，中國大陸研究學者（G君）亦以「鄧小平遇事往後縮，彭真則往前衝」，形容鄧、彭兩人在「文革」前政治行為上的殊異。（香港，2007年1月）鄧小平此一愈到後來愈明顯的傾向（鄧在「文革」時多次為此被指責為懶惰、貪玩），也為心細如髮的毛澤東所察覺。毛在「文革」中即說：「鄧小平對我是敬而遠之。」〈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載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毛澤東思想萬歲》（台北：1974），頁661-662。

[7-103]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頁397-398。

[7-104]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歷史足音，長留京華〉，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鄧小平的歷史足跡》（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頁25。

[7-105]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4），頁434。

[7-106]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4.

[7-107]「文革」初期，毛澤東決定以林彪取代劉少奇為接班人時，仍希望繼續使用鄧小平，並期望鄧能配合「毛主席副」的高層人事安排。鄧小平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一次就談崩了。」載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台北：雙大旅遊出版社，2000），頁35。林彪、鄧小平兩人會談之所以破裂，應主要是與處於政治上風地位的林彪不願退讓有關。毛在「文革」激進派的強烈反對下，以及向外難以交代的原因（鄧既然被當作運動的主要批判對象，何以能繼續安享高位）而作罷。即便如此，毛卻不顧林彪、江青的反對，一意地主張保留鄧的黨籍以觀後效，不使之徹底出局；在人身保護上也給予鄧基本的照料，並廣續維持兩人聯絡的管道。

結 論

從毛的「副帥」到「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第一節 中央總書記任內作為的評述

鄧小平活躍於「文革」前十年的中共政壇，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深受毛澤東個人的器重，故有機會嶄露頭角，進而參與中樞領導，在1956年中共「八大」獲任中央政治局常委與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中央總書記的權位，之後在毛澤東愈益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下，更是水漲船高。鄧小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一員，參與決策、與聞大計，但是不同於其他常委的是，身任總書記的他還負責領導中央書記處，落實常委會的決策並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也實際指揮黨中央直屬各部與地方黨委，以及實行黨對政府、軍隊的領導。由於鄧小平位高權重，「文革」前毛澤東對內在政治、經濟、軍事各領域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摸索，對外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上表述與追求自我主張時，他都作為主要的副手，密切投身其中。

1956年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內所發生的政治風波（蘇共「二十大」對史達林的批判與揭發，以及東歐波匈兩國出現的反共騷動），益加促使毛澤東思考在中國如何避免出現史氏治下所形成的蘇式極權政治體制與僵硬統治方式。毛思定後的方案，就是在黨政、思想領域推行整風運動，以徹底清除黨內各種不正之風。

1957年的整風運動，是鄧小平就任中央總書記後面臨的第一起重要政治任務與考驗。對於運動有關的決策，包括整風的醞釀、邀請黨外提供建言（「開門整風」）、加入「反右派」議程、加大運動的熱度與範圍（黨內大反「溫情主義」的同時，發起工廠與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後分別在地方與邊疆地區展開反對「地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運動），鄧小平都全程參與。他秉承毛澤東的意旨，以黨中央名義全面規劃並監督運動的進程、步驟和重點，直接統帥、調度中共各級黨組織，貫徹運動的目標與方針。整風之所以能按毛澤東的意圖漸次推展，與鄧小平的張羅、驅策直接相關；「反右派」之所以流於走火蔓燒，也與他的激勵、催促大有關連。簡言之，鄧小平是中共1957年推行整風、「反右派」的首要組織者、號令手以及急先鋒。事實上，他是毛以外對運動介入最深的中共領導人，甚至可以說「主事在毛、成事在鄧」。

中共領導的整風運動從全黨進而朝向全國、全民範圍發展後，一個重

要的政治影響就是運動中對各種「脫離黨的領導」的「錯誤」的嚴加批判，助長了黨要鞏固、確認其在各界的領導權的氛圍。毛澤東順勢將整風的範圍從已「取得基本勝利」的「整黨」、「整政」，進一步地轉向「整財經」、「整軍」。

毛澤東的基本思路，近似於他在延安時期的設想與作法：經過「七整」以促進黨的統一領導。^[8-1]如果說1940年代前期毛在延安透過多項內容的整風樹立高崗在西北地區的崇高地位，並乘機樹立黨一元化領導的典範，再進而將之推廣與貫徹，以為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創造必要的條件；^[8-2]那麼，1950年代後期，毛則在北京經由一系列的整風樹立鄧小平在中央高層的突出地位，並藉機強化黨一元化領導的趨勢，以為中共全面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實驗做好組織的部署。

1957年底，毛澤東在訪蘇期間受到蘇聯建設與規劃的鼓舞，心生經濟趕超發展戰略的想法。毛氣滿志驕地從莫斯科歸來後，在高層間對主張經濟穩健發展的政府系統大表不滿，高聲地反「反冒進」。這番「整財經」的重要結果就是將國務院管理經濟的要權轉交給鄧小平領導的中央書記處，委任鄧為「大躍進」運動的指揮者與督戰者。

在「大躍進」行將步入高峰以前，毛澤東鑒於此前東歐軍隊發生離心的教訓，並且期以強調學習本國戰例來鞏固、提高自己在軍中的聲望，決定對中共軍隊高層進行一次整風，使之更加聽命於黨中央的指揮，並跟上「總路線」、「大躍進」要走出中國自己的路的主要訴求。這即是中共解放軍的「反教條主義」運動的由來。中共軍中有關「教條主義」的爭論，鄧小平從初始就頗為關心。在毛的指示下，鄧小平後來更以「反教條主義領導小組」組長的身份領導1958年春夏之交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推促軍委負責人彭德懷改變原定的會議議程，大力升高對涉嫌、犯錯人士的批判，掀起「反教條主義」運動的最高潮。鄧小平在執行有關任務時，甚至力主自己過去的戰友劉伯承到會檢討，直到相關批判出現過火、失焦的狀況，方給予劉伯承關照。此一軍隊整風與人事清洗事例，顯示鄧小平對「文革」前軍隊事務的介入之深。

鄧小平對於由毛澤東親自發動的「大躍進」，自始就是亦步亦趨。鄧小平在1958年秋後鼓吹「人民公社化」與貫徹大煉鋼鐵指標上，都甚為賣力。他循由黨的組織網絡並訴諸嚴明的黨紀，強而有力地推進運動；也前赴地方視察、打氣，為其所經之地的運動帶來火上加油的影響。在1959年上半年運動糾偏與降溫的階段，鄧小平積極配合毛澤東「糾而不洩」的意旨，抑止運動的狂熱偏向，卻也注意保持運動的熱勁。例如：鄧小平強力佈置該年仍屬不低的鋼鐵指標；仍舊深信農業高產，並根據嚴重失實的估產，硬性徵購糧食。1959年下半年因彭德懷直言上書引發事端的廬山會議，以及讓「左」傾政治氣氛復燃、高漲的「反右傾」運動，鄧小平都無條件

地緊跟毛澤東。

對於1960年的「大躍進」運動，如同前兩年，鄧小平主持監製偏高、勉強的具體生產計劃，到各地為運動的積極分子嘉獎、鼓勁。該年下半年，鄧小平偕同毛澤東為了與蘇聯較勁，做出大煉「爭氣鋼」與緊急出口糧食、副食品以提前還清欠蘇外債的運動決策，並主持制定具體的實施辦法。其惡果是讓中國大陸受創的經濟情勢雪上加霜，因運動造成的人命損失也繼續攀升。為了解決主要城市與工業重鎮的嚴重糧荒，鄧小平親自出面半勸半壓內陸省份（特別是鄧自己的家鄉四川）做出犧牲，忍痛將其省民生活基本所需的口糧大量調出救急，以厲行先讓一部分的地區與人民存活下來的政策。西方學者指出：因「大躍進」運動而致死的人數，較諸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軍民死亡的人數，恐怕是有過之而無不及。^[8-3]

中共自1950年代中期起努力尋求建設社會主義的新路徑的主要國際背景，就是欲與蘇聯互別苗頭、一較高下；此外，針對國際情勢和走向的估判，以及應採方針與對策的問題，中蘇雙方之間的歧異也擴大到了無法繼續維持團結表象的田地。在中、蘇兩黨關係由好轉壞的過程中，鄧小平與毛澤東態度一致、步伐齊一，他經常以毛的全權代理人的身份，出面與蘇共人士進行唇槍舌戰與強硬交涉，之後更針對與蘇方「打筆仗」的政治需要，主持撰寫出一批條理闡述、細緻論證毛的「反修」、「防修」主張的政論文章。鄧小平在反蘇過程中費心投入揭露「修正主義」的論述工作，後來竟反作用地投射回中共自身的政治，為毛發動「文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鄧更成為毛國內「反修」批判的標靶。

隨著中蘇關係惡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分化，東南亞共黨成為中共黨際外交的新重點，鄧小平在這方面也參與頗多，致力將相關外交納入中共對蘇爭鬥的戰略框架之中：一來因應中蘇意識形態論戰，出面同東南亞共黨交換意見，爭取它們支持中共對蘇的立場和觀點；二來促使北越不顧蘇聯拉攏，在外交上偏向中共，並處理雙方互動中出現的摩擦問題；三來為促進世界革命情勢樂觀判斷的早日兌現，支援東南亞共黨在當地的革命活動。

不過，在「大躍進」難以為繼、國內轉而被迫進行經濟調整後，鄧小平與毛澤東之間開始出現分歧。鄧支持「包產到戶」，在毛表態反對後，他雖放棄己見，但已無法挽回毛的全盤信賴。其後，鄧小平在政治上與劉少奇過於接近，又在組織上配合劉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更引起毛澤東的疑心。毛倡議建設「三線」時，鄧在政策領會上稍慢，也是毛、鄧關係疏遠的另一原因。所以「文革」爆發後不久，鄧即成為被批判、打倒的第二號「走資派」！

總之，鄧小平在「文革」前十年多數的時間中，是毛澤東及其激進政

策主張深信不渝的支持者與雷厲風行的執行者。毛屢次委交重任予鄧，鄧也每以激昂的熱情、縝密的安排相報（後期則緊跟不上）。進一步的問題是：對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所作的觀察，是否有助於對毛澤東時期個別政治人物與其所處的政治結構與體制之間關係的理解？

中共政治研究中有「毛掛帥」解釋模型（Mao-in-command model），其主要內容是：在由毛澤東宰制的權力結構、決策體制下，其他中共要員為了生存與舞台，仰毛鼻息、觀之臉色，他們的政治選擇與行為大受其限。^[8-4]只是，鄧總書記僅是一個被毛主席掌控的「線拉木偶」嗎？他難道完全沒有自我主張的餘地嗎？從鄧小平擔任中央總書記任內與毛澤東的互動中可以發現：從毛澤東所倡議的政治主張與決策發展到具體部署和政策之間還有很大的距離，銜命承辦、「辦也有決」的鄧小平仍有很大的揮灑餘地和優遊空間。

在整風、「反右派」運動中，鄧小平負責將毛澤東簡單的運動構思和複雜的實際狀況加以銜接。他制定運動在不同階段與領域的具體政策，並監督各層官僚確實對之予以執行。鄧在組織程序上雖要向毛匯報或事後報備，然而，他在規劃政策與指示黨幹時，絕非照本宣科，宣講毛的意旨而已，他更要進行詮釋，以之為準地判讀運動情勢、指揮行事、做出調整，以及代表中央回覆下級對運動問題的請示等。在整風運動升溫與擴大之時，毛認為運動已步上軌道、自身心思移往經濟問題後，甚至乾脆將運動的指揮權交予鄧，統由他經營、管理與收場。

在軍隊「反教條主義」運動的案例中，鄧受毛委託指導1958年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會議期間，鄧不僅僅是作為毛對會議的傳話者，他得經手安排毛不好明言之事。例如：在會議轉向批判「教條主義」後，鄧不管眾人的意見，一逕要劉伯承與會「受審」，就是避免由毛本人出面，讓「反教條主義」的旗幟被「卸磨殺驢」的議論所淹沒。若僅將鄧視為毛的一枚棋子，實也有失簡化，因為鄧在會議後期顧慮會議發展，不支持對劉的批判超出「教條主義」問題的界線，令批劉正酣的彭德懷、林彪不得不收手，毛也在達到整劉以固權威、報夙怨等目的後，同意鄧對會議批劉所作的煞車決定。

在「大躍進」運動中，毛要鄧擔負的政治角色，即是以毛的主觀狂想與偏好多快為本，指揮中央各部門與地方領導人，編制具操作性的生產與建設計劃，也強力督帥、整合所有單位、人力與資源，通力將之完成。統整重要經濟資訊與監視主要生產環節的鄧，對於運動重要項目與計劃的看好程度，有時是照應毛的心意，有時更超乎毛所預期。在「大躍進」烏托邦之夢的築造上，可說是毛中有鄧、鄧中有毛，毛、鄧兩人難以分割。

綜前所言，在以毛澤東為主的政治結構與體制下，鄧小平在奉行毛的

旨意時，肩負將之實體化的任務，也就是把它發展、充實，以及因時地制宜。鄧小平的動機可能十分複雜，包括：崇信毛澤東關於國事的判斷；對毛感恩圖報，自願肝腦塗地；為了保持祿位，專門投其所好……。無法給予單一而明白的解釋。但從本書對鄧小平所作的細節描寫中，至少可以反映出鄧並非完全勉為其難地奉旨行事或是出於無奈照章辦事，在一定程度上，他可能樂在其中，自以為是正確的。易言之，鄧在「文革」前十年一方面受限於以毛為核心的權力結構與體制之中；另一方面，作為政治個體的鄧，其立場與作為也反過來鞏固他所處的結構與體制，甚至促之僵化、走向極端。

本書對鄧小平的研究也可擴充、深化「毛掛帥」模型的內涵。「一個好漢三個幫」、「紅花還需綠葉扶」，是毛澤東常引用的諺語。事實上，毛主導中共政治發展的同時，他自己也需要像鄧小平這樣能善體其心意、又能幹練地付諸實踐的政治能手鼎力相助。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任上對毛澤東的政治倡議加以「具體部署」的角色和活動，可簡要化約為兩個部分：一是集中：代表黨中央具體規劃與佈置，負責執行並監管其進度；另一是「民主」：代表黨中央激發、鼓動並引導下級黨委的積極性。鄧在這看似對立的兩者之間適時地進行拿捏、收放與平衡，令之互補相輔（即使中央政令獲得民氣支撐，也使群眾幹勁得到方向指引），共同促成毛的政治意志在現實情境中實現。毛澤東以大元帥之姿升帳發令，鄧小平等人鳴鑼擂鼓、聚將點兵，在毛個人魅力型的領導之外，另外注入黨的組織律令權威，讓毛的紅色帥旗更能高舉，方是「毛掛帥」更完整的圖像。

鄧小平在「文革」前不短的時間內，享有毛澤東的榮寵，掌握大權、充當前鋒，實至名歸地作為毛的「副帥」。身為「王儲」的劉少奇對鄧小平不敢小覷，「大管家」周恩來也要對他敬讓三分，其他各級官僚與幹部尋求中共中央指示與指導時，更往往直接視鄧總書記的決定為黨中央的裁決。鄧小平特具的若干政治性格，在「文革」前的政治發展與黨國運作中也表現得淋漓盡致，例如：機敏、準確掌握層峰的政治意向，機警調整態度以對（「文革」前一、兩年方略現疲態）；實行政策與貫徹目標時，緊抓問題要害、出手狠準，果斷速決、鐵腕作風等，對事態的扭曲發展多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改革開放」以後鄧小平常被稱道，甚至大加宣揚的講務實、重實用的政治個性，在「文革」前他執迷追逐共產主義願景（「大躍進」）與堅守捍衛馬、恩、列、史的「先祖遺教」（中蘇論戰）時，則退居次位或不見蹤影。

對於「文革」前中共黨國對民間社會所進行的改造工程，以及伴隨而來的「紅色恐怖」，例如：數百萬人被錯劃為反黨分子並遭到殘酷對待；人民的言論自由實際上被取消與剝奪，社會氣氛呈現死寂狀態。數千萬農民缺糧致死、陳屍溝壑；億萬農民被禁錮在「通往共產主義天堂的橋樑」

——人民公社，既喪失自主的權利，也失去努力生產的誘因。鄧小平自有應負的責任，根本無法規避與隱晦。

第二節 中央總書記經歷的政治資產

根據本書正文的討論，本節可以初步總結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期間的政治歷練與經驗，主要為他積存兩方面的政治資產：

第一、強化治理能力，使之享有競爭優勢。

鄧小平自言擔任中央總書記期間，「是在領導核心之中」。^[8-5]在這所謂「社會主義建設的十年」中，舉凡中共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大事，鄧小平幾乎無役不與。鄧小平在此時期對各方面事務的咸有涉入，使之成為全方位的「通才」（generalist），而不僅是專於特定領域工作的領導人。另外，也養成他在政治洞見和手段運用上的爐火純青。^[8-6]

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任內的豐富政治閱歷和實務治理經驗，在毛澤東的晚期，除了積勞成疾的周恩來以外，已無人可與之相比。^[8-7]事實上，這正是毛澤東在1973年再次起用鄧小平的重要原因。^[8-8]毛澤東將志大才疏的「文革」新貴與老謀多算的鄧小平做比較時，也不禁感到前者「政治上不強，威望不高」，而鄧則有嫻熟政治、擅於統領的本領。至於鄧小平思想傾向的問題，毛澤東之所以讓鄧「東山再起」，可能因為鄧表露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的低姿態；也可能因為鄧在中央總書記任內曾與毛默契配合。無論如何，後來的發展證明毛有所失算與誤判。

「文革」中一度遭到漠視與踐踏的政治人物，在毛後時期又重新走向政治舞台核心。「革命地位」（revolutionary status）在決定中共高層政治的權位排序上，又恢復其重要性。^[8-9]鄧小平之所以一枝獨秀，是因為「文革」後的中共黨內，無人的「革命地位」可以跟他相提並論。華國鋒之所以不敵鄧小平的最主要因素，不在於政策與意識形態的差異，而是華在黨內的資歷遠不如鄧。^[8-10]至於鄧小平與陳雲兩人之間，鄧在「文革」前十年的中央總書記經歷，則是讓他迎頭趕上，甚而後來居上的重要關鍵。陳雲在1945年即被增選為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地位僅居當時中共「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之後，更比鄧小平早進中央政治局多年，論黨內資歷較鄧深厚得多。但是陳雲在「文革」前十年的多半時間裡，因經濟主張不為毛澤東所認可，只能枯坐冷板凳，寄情於蘇州評彈，不能像鄧一樣長時間連續參與黨政國策的領導。此外，陳雲主要涉足組織、經濟工作，也不及鄧在中央總書記位置上工作經驗的全面。在「第一代領導集體」中，陳雲的實際權位在此階段終被鄧小平所超越，並基本固定下來。

在中共講究論資排輩、重視歷練能耐的政治文化中，以及基於現實上統馭全局、掌舵引航的能力需要，由鄧小平繼任毛澤東的強人地位，可以說是形勢使然、眾望所歸。鄧小平對自身過人的政治經驗與能力也深具信心，自認「搞政治我行」。^[8-11]這或也是他當政後在政治上較為自信，進而顯得有些剛愎自用的一項原因。

第二、累積政治人脈和培養政治團隊。

中央總書記在「文革」前中共政治與黨國機器中所處的關鍵位置，讓鄧小平得以認識、熟悉從中央到地方、從文官到武將各方面的中共重要幹部；鄧本身突出的領導特質與能力，在此過程中也多為後者所體認與折服。這種經由正式職位的工作關係所構建的「非正式的聯結」（informal bonds），^[8-12]在後來轉化成鄧小平用人時的重要資源。^[8-13]

1978年鄧小平正式執政之後，「文革」前的相關同僚與下屬，轉而成為鄧的股肱之臣。就中央層級而言，「文革」前與鄧在中央書記處共事者，如彭真、李先念、楊尚昆、胡喬木，皆在他入主中央後扮演重要的角色。就地方層級而言，「文革」前治理東北的宋任窮、湖北的王任重、上海的陳丕顯、北京的萬里，也因當時與鄧互動頻繁而強化已有的信任或建立厚實的關係，進而在鄧治下佔有一席之地。至於在1980年代曾先後被鄧小平視作接班人的胡耀邦、趙紫陽，在「文革」前也因分別任職於共青團中央和廣東省省委，而有機會在鄧面前展現他們的才幹，並為鄧所賞識。^[8-14]

第三節 「副帥」經驗對「改革開放」的影響：政治領域

鄧小平因領導並推進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與現代化，被中共官方譽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本書對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任內歷史的檢視與探討，並非意在動搖或改寫其在晚年大膽探索後所獲致的相關歷史地位與評價。本書認為：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任內的政治經歷，對他後來所選擇的政治道路及施政作為有重要影響。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若干政經政策，其根源可溯及他擔任中央總書記時期的經驗。

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任內除熟習政治領導、廣結政治人脈外，對於中共政經體制、治理方針和發展戰略的特點與良窳，也有較諸他人更深刻的認識。鄧對此時期經驗的反省與汲取，是他在「改革開放」時期治國的重要參考。必須強調的是，鄧小平對「文革」前十年經驗的體會與揚棄，有許多並非是所謂幡然悔悟或一步到位的，而還要經過後來政治的磨練與沉

激，特別是「文革」衝擊的影響，才發生功用。但是鄧小平後來大膽而果敢的摸索，畢竟是從這一個基點開端。以下五個方面討論中央總書記經驗對後來「改革開放」時期政治領域的影響。

第一是對鄧小平規範中共黨內高層政治的影響。

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任內對毛澤東「家長制」領導的惡性發展深有體會。在作為「大躍進」先聲的反「反冒進」上，毛澤東對主張經濟穩健發展者，不顧情面地窮追猛打；在軍隊「反教條主義」上，他示意對軍中涉及相關問題的將帥，揭發批鬥、上綱上線，鄧小平秉承上意具體執行。因毛衝冠一怒而方向扭轉的1959年廬山會議，鄧沒有親臨現場，形格勢禁下也表態響應。鄧小平對這段時期黨內生活的失控發展，不但沒有挺身而出，反而順毛之意、逢君之惡。^[8-15]鄧在「文革」中也終於嘗到毛的攻擊，無力反抗，只能默默承受政治清算與數年軟禁、勞動之災。

鄧小平大權在握後，並不止於對毛澤東當年的乾綱獨斷加以批評，更進一步從制度面思考何以「革命先鋒隊」領導的「新中國」會孕育出一位「現代秦始皇」。^[8-16]他在「改革開放」初期將高層領導體制的改革置諸政治議程，也有意地限制黨內衝突的激烈程度和擴散範圍。^[8-17]前者如：針對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的問題，鄧小平希望以「集體領導與個人分工責任相結合」的做法改正弊端；鄧也認為應設立規章以保障黨內政治生活的正常以及黨員發表意見的權利。後者如：鄧小平逼使華國鋒及其人馬交權，但並未將此政治鬥爭引向社會，華國鋒也被允許留在中央委員會內，而無步上「文革」期間黨內輸家難有善終的後塵。

可惜的是，鄧小平在權力地位愈加鞏固後，對於中共高層政治初有雛型的制度性規範，改採隨其個人所意的權宜態度。鄧自言是年輕一輩的中央領導人唯一的「婆婆」，亦即他們必須且只能聽命於己；^[8-18]鄧先後不滿胡耀邦與趙紫陽的政治表現而將之罷黜，相關的做法與處理過程，在程序上、法理上皆不無疑義。胡不久即抑鬱而歿，趙更在餘生失去了人身的基本自由。

第二是對鄧小平調整中共政治治理方式的影響。

鄧小平在中央總書記任內，經常銜毛澤東之命領導、組織或參與政治運動（整風），犖犖大者包括：政治、思想整風——1957年的整風、反右派運動；經濟整風——1958年的反「反冒進」；軍隊整風——1958年的「反教條主義」。如此一方面經由運動中對黨的政治領導的強調與突出，強化了黨對各領域、各部門的一元化領導；另一方面，透過運動中對思想共識的形塑與灌輸，也調動黨幹與群眾的各種積極性，眾志成城地從不同的面向共同推進有別蘇聯的中國社會主義建設。

鄧小平深曉並嫻熟毛澤東所發明的政治運動的操作邏輯與方式，能針對當下的政治需要與風向，機巧地根據各種實際狀況，鎖定運動的批判目標人選如：1957年整風、「反右派」運動中黨外的「章羅聯盟」、文藝界的「丁陳反黨集團」；1958年「反教條主義」運動中的劉伯承、蕭克；在「大躍進」運動期間，「反地方主義」中河南的潘復生、山東的趙健民、遼寧的王崢，「拔白旗」中鞍鋼的蔡博，「反右傾」中四川的鄧自力。既藉以聚攏或隱或顯的支持者，也導引甚至威逼中間立場者與潛在反對者，一道投身批鬥那些被黨所認定的「公敵」，並在身邊周遭挖掘可以被套用相關政治標籤的人，以表自身與黨「同呼吸、共命運」（否則就有歸類為另一邊的風險）。因為在揭發鬥爭上，「大家參與、人人有份」（深陷其中，無法切割，而且事成之後還可論功分賞）；在思想觀點上，「越辯越明、人人互睹」（上級與群眾交相施壓，同時也不乏如鄧小平在反「反冒進」中經整風「啟發」後即「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的忠心向黨者）。如此促使參加運動者更緊密地跟隨黨的腳步，進而按照運動中政治爭辯所揭櫫的方向，為黨在各領域擘劃的社會主義建設方向，群策群力、想方設法、獻力獻策。

然而，鄧小平在有效完成相關運動任務的過程中，或多或少也發現政治運動本身的危害之處，譬如：運動中的打擊面與發酵波及面，從數十萬（右派分子）到數百萬（右傾機會主義者）之譜，而且事後證明絕大多數是錯案，能站得住腳的寥寥無幾；運動所調動的黨幹和群眾的積極性，以及其後湧現的建議與創造，不少是唯任務導向、政治投機、急功好利、只爭朝夕不顧長遠、非科學甚至反科學，其成果不但沒有「多快好省」，反而常有不真實、不耐固、不優質、不合算的流弊。鄧更清楚地感受此點，當然要等到集毛式政治運動大小弊端於一身、鄧個人也有切身之痛的「文革」。

「文革」後，鄧小平並沒有簡單地以一個「文革」受害者的身份來撻伐「文革」。他深知「文革」的極端發展，乃與「文革」前他自己領導、組織的多次政治運動分不開。直言之，他知道這場「動亂」從何而來，若算起歷史細帳，他也與之脫不了關係。鄧痛定思痛地表示：「我們過去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仍然搞這個運動、那個運動，一次運動耽誤多少事情，傷害多少人。」^[8-19]他因而主張不再以政治運動的方式作為達到政治目的的途徑與方法。「改革開放」期間，鄧在政治上雖堅持反對所謂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但不訴諸政治運動解決。對於思想文化領域的政治批判，相當注意掌控，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傷害，也慎防流於過度糾纏，從而耽擱發展經濟的首要任務。

第三是對鄧小平設計中共政治制度的影響。

本書對鄧小平的中央總書記時期歷史的討論，也有助於認識與理解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後的政治制度發展。「文革」結束後，以鄧小平為首的所謂「老幹部」不但重返權力中樞，他們也將其在「文革」前所經歷的、認為行之有效的制度經驗，重新帶回中共政治。鄧小平在「文革」前擔任的中央總書記職位及整個中央書記處機構，在「改革開放」時期的重新設置，就是中共政治制度的一項重要「復古」。鄧小平雖不是第一個倡議者，但無疑是最有力的推銷者，因為「文革」前領導該機構十年的他自有別人所不能企及的發言權。

對於1980年再次建立的中央書記處，鄧小平以「過來人」的身份界定其職權：「書記處的職權，肯定是管全局，黨、政、軍、民、工、農、商、學、兵，都得管。」^[8-20]事實上，鄧倡建的這個中央書記處與「文革」前毛設計、鄧領導的中央書記處之間，並無實質的差異，同是司掌黨中央的日常決策與執行工作，管轄範圍涵蓋黨政軍等領域。^[8-21]此時的鄧小平正與1956年為「八大」成立的中央書記處界定地位、功能的毛澤東相仿，只是鄧更熟悉中央書記處應當所為之事，也因而對其運作方式和領導者提出更詳細的要求與期許。^[8-22]

鄧小平最初主張恢復中央書記處時，懷有權力上的計算。因為鄧以親身領導過中央書記處的經驗，深諳中央書記處確可藉由處理中央日常工作、負責日常決策之便，攬得不小的權力並具有一定自主空間。因此，其之重設可暗中削減、瓜分時任黨主席的華國鋒的權力。^[8-23]鄧小平打的此一「如意算盤」，也的確使得華在政治上提前跛腳。在順利達到「倒華」的目的後，鄧並未更動中央書記處的職權，因為他知曉、也希望利用相關機構制度所具之集中、高效、分勞、培養接班人等優勢。然而，在鄧小平實質取代華的最高領導人地位後，沒有幾年，他也面臨了毛澤東在「文革」前所遭逢的一個尷尬處境。

中央總書記及其統領的中央書記處對各方事務皆能與聞，具有重大的政治實權。隨著時間的推移，黨的各級官僚對之愈加信崇，行動上愈以其下發指令與可能期望為準。中央總書記與中央書記處在黨國體制中的地位愈形強化、吸納越來越多的權力，自身也熟能生巧地越有自信去單獨議決與處理事情。「文革」前夕，毛覺得鄧在政治上與之不對盤，就批評中央書記處為「獨立王國」，「文革」開始後，毛更發出「大權旁落」的怨言。

對「改革開放」時期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核心」鄧小平而言，這種原被賦予獨當一面重任的中央總書記與中央書記處，有可能自成一格、自行其事而出現與在上位者（最高領導人或其主導的常委會）背道而馳的不預期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似乎又在胡耀邦擔任中央總書

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時重現。鄧小平覺得胡耀邦在政治上與之不合拍（特別是如對待「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感到所託非人，組織上也常有不當發言與驚人之舉。^[8-24]然而，鄧小平在制度上的回應方式，不同於毛在「文革」爆發後將中央書記處制度完全棄置，鄧選擇的是調降中央書記處的權力位階，以減低中央書記處自外於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的可能性，並讓未來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的人，不會再因該機構權力的加持而有過分突出的政治能量，以至有言行「出格」的機會。

胡耀邦黯然離職後，從1987年中共「十三大」起，中央書記處所享的權力地位與自主空間明顯受到規限而大不如昔。中共黨章中原先規定的「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在「十三大」被更改為：「中央書記處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辦事機構；成員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提名，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8-25]換言之，第一、黨章使用「辦事機構」的字眼，著重強調中央書記處在政治局及常委會之下的從屬地位，並且不再提及中央書記處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工作」的職權（其在政治解釋與運作上，向來存有甚大的彈性空間）。第二、在「十三大」以前，中央書記處成員與常委會成員乃同時一起直接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亦即前者獲致合法性的來源與程序，與後者同一。但為了讓中央書記處更服從於常委會的領導，黨章新規定中央書記處組成人員要先經由常委會提名後、再經中央委員會會議通過，也就是書記處成員獲致合法性的來源與程序，除了本來即有的中委會，又多加上了常委會。

另一個重大變化是，中央書記處的業務主要限縮在黨務方面。這也有助於「黨政分開」原則的實施。在毛澤東強化黨的一元化領導下，擔任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管黨又領政，是「黨政不分」最大的獲益者。但因為鄧本身「抓大放小」的政治特質與注意個人節勞，再加上，政府總理周恩來守分際、不爭權，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之間關係平順、配合得宜。但是當中央書記處與國務院分別由胡耀邦和趙紫陽負責時，兩方卻屢因經濟管理權限劃分問題出現爭論，甚至讓外界有黨、政口徑不一的觀感，迫使鄧小平以自身過去的工作經驗出面進行調停與糾正。^[8-26]中共「十三大」後，中央書記處將日常決策權上繳政治局常委會後，不像先前那樣「管全局」、「都得管」，而國務院提請政治局或其常委會決策的議題，也「不再經過中央書記處『過濾』」，^[8-27]兩者衝突的因子大為減少。

以上對中央書記處制度的重大調整，大致不變地沿用至今，成為今日中共中央書記處的制度格局。

第四是對鄧小平處理政治異議人士的影響。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乃是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所主

導的最具爭議性的政治決策與事件。鄧小平悍然下令清理北京天安門示威活動的舉措，一方面乃與他在1957年「反右派」期間對右派施予嚴厲回應有一脈相承之處：為了保衛共黨政權，高度警戒與敵視可能的政治異己力量，更不惜動用強硬手段加以壓制。^[8-28]另一方面，鄧或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這兩起事件的後續處置上有所差別。他可能從實際參與「反右派」運動擴大化，甚至作為主要旗手的經驗中有所借鑒，避免重蹈當年傷及無辜、又造成寒蟬效應的政治後果。^[8-29]因此，在1989年天安門清場後，他聲稱不擴大範圍持續追查、追究一般參與遊行示威活動的人。^[8-30]

第五是對鄧小平處理對外關係的影響。

中共與蘇聯關係長期的冰凍三尺，中越兩黨從「同志加兄弟」到「仇人相見、分外眼紅」的惡化過程，以及中共與部分東南亞國家之間因中共與當地共黨存在傳統聯繫而心存芥蒂等問題，鄧小平皆是中方的主要當事人。「解鈴還需繫鈴人」，關於「文革」前中蘇的意識形態爭辯，鄧小平主政後雖仍堅稱中共當年向蘇共爭取平等地位是正確無誤的，但他也承認中共本身也有理虧之處，特別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8-31]而且中共用來對他黨「說三道四、指手畫腳」的那套「經驗和實踐」本身，鄧也曾表示：「我們有些東西今天看來也站不住腳」，「如果現在講，有好多提法就不同了」。^[8-32]（綜合以上鄧自己所做的總結，實際上，中共在「文革」前並非僅是鄧所言的要與蘇共平起平坐而已，中共從反對蘇共對自己「下指導棋」，到後來不惜「打腫臉充胖子」，以有更高的馬列道行自居，指責蘇共的不是，要其迷途知返。）

鄧小平鑒於中共過去在國際上「好為人師」但卻落得徒勞無益，甚至自身孤立的下場，決定將中共對國際共運所能作的貢獻，重新定位為中共自身「生產力的發展」，以在國際上增加社會主義經濟的比重，並力爭體現「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加優越」。^[8-33]如此既與國內首重經濟發展的新主軸內外呼應、彼此相通，也大幅降低革命型意識形態在中共對外政策中的作用，使之更理性、務實地看待外在世界，有助於中共建立和平穩定的周邊環境（這也是中國大陸專心發展經濟所不可或缺的前提）。在中共與近鄰之間啟動與開展的和解進程中，特別是中蘇關係正常化的漫長談判，鄧小平審時度勢，親自主導中方的談判方針與節奏，直至兩黨、兩國關係成功完成融冰，^[8-34]終而化解中國大陸北疆承載多年的龐然壓力。

第四節 「副帥」經驗對「改革開放」的影

響：經濟領域

在「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在政治領域的改革作為有限，甚至會有反覆；相對地，他在經濟領域內確實大刀闊斧、大破大立。從中，更可見中央總書記經驗對他產生影響的痕跡。擇其要者有以下三點：

第一、下定決心抓緊時間全力發展經濟。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戰略與政策之前，曾「非常嚴肅和認真地總結了建國後的近三十年的經驗」，^[8-35]得到的最重要教訓是，中共中央沒有及時將施政重心移轉至發展生產力與從事經濟建設之上，反而戀棧於似無止境的階級鬥爭與政治運動。正因為中心指導思想的偏斜，即便有心發展經濟，也因為錯用方式（例如用整風解決思想問題，以作為發展經濟的動力），栽了跟斗，以致陷入不進反退的窘況。放眼同時期其他國家與地區經濟、科技的突飛猛進，他更益發感到錯失光陰而悔不當初。^[8-36]鄧強調「改革開放」就是要記取過往挫敗的教訓，扭轉長期效果不彰的方針與政策，汰換、革新不利發展的陳舊體制，引進境外經驗與資源，全心一意地投入經濟發展。

若對鄧小平倡議或解釋「改革開放」源起的相關言論進行分析，可以注意到他將這「近三十年」概分作四個時期：「健康、恰當」的「頭八年」；基本正確但有曲折、錯誤的「文革」前十年；錯誤至極的「文革」中十年；徘徊不前的「文革」後兩年。鄧既然認為「頭八年」無甚問題，所以通常幾句帶過；「文革」後兩年的問題所在，鄧認定是當家者（華國鋒）未能拿定主意、指明方向，但為了團結一致，也不作深談。鄧提得最多的是「文革」前十年和「文革」中十年。他在總結這兩段的歷史經驗時，雖經常將它們連在一起看，但在省思深度上，對兩者卻有差別。

鄧小平認為中共在經濟發展上犯有嚴重錯誤的「文革」前十年與「文革」中十年兩個時期，不僅是時間先後的關係，更有緊密的內在聯繫。鄧慣用的說法是：中共從1957年到「文革」前的政策傾向是「左」，「文革」中十年更將之發揮至極致，成了「極左」或「左的極端」。易言之，前者是後者的主要源頭，後者是前者的極化結果。鄧有時甚至乾脆以「二十年『左』的錯誤」，統稱密不可分的兩者。

然而，可以進一步察覺的是，鄧小平在回顧相關歷史時，卻詳述前者、概談後者。也就是對「文革」前十年失誤的經過（特別是「反右」與「大躍進」）扳指細數，對「文革」中十年的錯誤則籠統含糊。^[8-37]對此可能的解釋是：在「文革」大多數的時間內，他根本不在中共決策圈之內，僅是一遠在天邊的無權旁觀者，因而也無過多經驗可談；相形之下，他在「文革」前十年身處決策核心，行使重權、肩扛重任，其中之得失、

甘苦，自是分外刻骨銘心、深植腦海。因此，可想見鄧從中共自身歷史中導出「改革開放」勢在必行、經濟建設刻不容緩的政治論斷的過程中，中央總書記經驗可能產生的突出影響。

第二、對鄧小平進行農村經濟改革的影響。

眾所周知地，家庭聯產承包制，即「包產到戶」的實行，是中共農村經濟改革甚具關鍵意義的一步，佔有中國大陸八成人口的農村，其經濟面貌不消幾年即基本獲得改善與改觀。該政策之出現與流行，乃是地方試行卓有成效後，中央再正式予以承認並進而向全國推廣。1958年「大躍進」建立的農村人民公社體制順勢土崩瓦解。

「大躍進」期間，鄧小平是人民公社制度的主要推手與號角手。他當時認為人民公社解決了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問題，並多次參加中共中央關於公社定位、內部運作及分配問題的討論；他至地方指導時，也對公社領導權的掌控與內部組織問題予以指示。為了挽救「大躍進」對農業經濟的嚴重破壞，「包產到戶」的成效開始映入鄧的眼簾，他在1962年甚至一度將之視為一個或可與公社體制並存的政策選項。然而，說鄧在當時已真正認識到「包產到戶」的優點與活力，並將它看作是較適合中國農業生產的組織形態，恐怕是言過其實了，因為他對之主要還是基於權宜、實用的思考。不久，在毛澤東明言反對「包產到戶」後，鄧隨即放棄。不過，在鄧親歷的「大躍進」「災難經驗」中，對「包產到戶」似乎留有不淺與不壞的印象。

由於中共高幹長期被灌輸農業集體經濟模式至上的思想，「包產到戶」也一直被官方批為異端作法。1970年代末，當「包產到戶」又在當年「大躍進」的「重災區」安徽出現時，中共高層對此出現正反意見。安徽領導人萬里面對反對聲浪，請示鄧小平。鄧表示：「不要爭論，你就這麼幹下去就行了，就實事求是幹下去。」^[8-38]從而堅定萬里繼續在該省實行「包產到戶」政策的決心，也讓「包產到戶」能有一個省級平台盡情展現其刺激農民生產的制度優勢。安徽隨後成為「包產到戶」政策推向全國時的示範樣板。^[8-39]在「包產到戶」最終為中共官方承認為合法的過程中，鄧也在中共領導層內起到化解反對阻力的關鍵作用。^[8-40]

需要再進一步說明的是，鄧小平在1970年代末支持「包產到戶」政策在局部地區一試，並不代表他對該政策的效果已了然於胸甚或已決定將之向全國推銷。^[8-41]實際上，「摸著石頭過河」般地一邊嘗試、一邊總結，見有正面兆頭，再加大支持力度，才可能是實情。但是鄧一開始會支持萬里嘗試「包產到戶」，顯示他對該政策無甚惡感，這應與其在中央總書記任內曾初步見識該政策的效力直接相關。鄧指示對「包產到戶」問題「不要爭論」、埋頭去做，或也是他欲彌補當年在毛高壓喝止並將問題上升至

階級鬥爭高度之下，不敢放手嘗試的遺憾。

當「包產到戶」政策收效越益顯著，鄧小平對農村經濟改革的思維與章法，也愈見連貫與完整。他在表述其改革觀點時，更多地直接鋪陳在對人民公社弊病如：「平均主義」、「大鍋飯」、「以糧為綱」等的思考與反省上。有關人民公社體制的存廢，可說是「成也小平（鄧參與建立公社）、敗也小平（鄧批判放棄公社）」。

第三、對鄧小平注意中共經濟治理問題的影響。

在「改革開放」時期經濟的宏觀管理上，鄧小平也經常借鑒中央總書記任內的經驗與教訓，特別是「大躍進」只顧貪快、求成，付出傷筋動骨、得不償失的代價，深烙在鄧小平的記憶中，令其深以為戒。鄧小平在「改革開放」時期為求中國大陸能急起直追、縮小與國際的差距，要求加快經濟發展速度，並主張「台階式」的飛躍發展。但是在實行相關高速發展戰略時，鄧小平特意提醒不要重複當年「大躍進」欲速不達的錯誤。^[8-42]

另外，在與年輕一輩的中共中央負責人討論國家經濟計劃時，也可常見鄧小平憶往談今。例如：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對高級幹部痛陳過去在編定經濟計劃時長期存在的「沒有安排好各種比例關係」的缺點。^[8-43]1983年1月12日，針對「六五」計劃問題，鄧對經濟部門領導人指出：計劃要「留有餘地」、「不要片面追求產值、產量的增長」。鄧並語重心長地說：「總結歷史經驗，計劃定得過高，冒了，教訓是很深刻的，這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經注意到了，今後還要注意。」^[8-44]鄧以上的諄諄教誨，恐有不少正是提煉自他在中央總書記的崗位上負責主持制定各種經濟計劃（尤其是惡名昭彰、禍國殃民的「大躍進」計劃）的經驗。

最後，有論者指出：鄧小平主政下中共「改革開放」的政策與作為，猶如是將毛澤東的主張與事業予以改弦易轍，甚至加以埋葬。^[8-45]本書對鄧小平中央總書記時期歷史的研究，以及對於相關經歷與他「改革開放」時期施政之間的關聯性的探討，則可以進一步地揭示：由於毛澤東一手締造的「人民共和國」，鄧小平曾以中央總書記的身份長年參與砌磚、添瓦的工作，^[8-46]鄧在「改革開放」中對毛生前許多的重要主張與實踐所作的深度改變，事實上，也含有對他自身中央總書記任內的治理經驗與生命體驗所進行的一次取捨和揚棄。

鄧小平在「文革」前作為毛澤東的「副帥」時的諸多正反實踐，包括本書側重討論的政治上「反右派」、經濟上「大躍進」、軍事上「反教條主義」、外交上意識形態論戰與輸出革命，實皆應看作是鄧「總設計師」提出並遂行「改革開放」政策的重要參照經驗。一味加以遮掩、美化，不

但不符合鄧小平坦承當時有錯、有責的簡易說法，^[8-47]以及他對撰寫傳記提出的好壞對錯都要並呈的要求，^[8-48]也有礙於我們理解鄧晚年勇於否定部分中年自我、邁步大膽探索的思考轉變過程。

注釋

[8-1]「七整」包括：整黨、整政、整軍、整民（人民群眾團體的領導機關）、整關（黨政軍民之間的關係）、整經、整財。另外也有說法是有整學校或整幹部而無整經。

[8-2]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上冊，頁384。

[8-3]Edward Frie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 "Introduction," in Yang Jisheng,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2), p. x.

[8-4]泰偉斯與孫萬國即是擅用此一模型解釋毛澤東時期中共政治的代表性學者。

[8-5]〈總結歷史是為了開闢未來〉，載鄧小平：《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3卷，頁271。

[8-6]中國大陸政治學學者（K君）與中共黨史研究者（L君）皆以鄧小平熟知「什麼事可以說可以做，可以做不可說，可以說不可做，不可以說也不可以做」作比喻，形容鄧在政治上的老練。（台北，2006年11月；北京，2007年1月）

[8-7]賀金瑞、孫晶：《走近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頁80。

[8-8]Frederick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M. E. Sharpe, 2007), pp. 66–67.

[8-9]Frederick C. Teiwes, "The Chinese State during the Maoist Era," in David Shambaugh ed.,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11, 145.

[8-10]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under Hua Guofeng: Party Consensus and Party Myths," *The China Journal* 66 (July 2011): p. 23.

[8-11]1988年9月3日，鄧小平宴請台灣人士。當訪客向鄧小平告辭時說：「請您多指教」。鄧小平回覆：「彼此互相學習」，「談學問你好，搞政治我行」。*"Wei, E., writing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6C14-9.13, p. 29.*

[8-12]Lowell Dittmer,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34 (July 1995): p. 14.

[8-13]這方面當然也存在反例，並讓鄧小平在政治上受挫。「文革」中代替王洪文主持上海日常工作的馬天水，鄧小平自認與他在「文革」前有不少的互動（馬在柯慶施、陳丕顯治滬時長期主管該市的工業），在1975年6月曾試圖對其拉攏和策反。然而，馬不但不買帳，反而密告「四人幫」，成為批鄧「右傾翻案」的重磅砲彈。載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346–357。

[8-14]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頁143。David Shambaugh, *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4), p. 11.

[8-15]鄧小平本人對此也直言不諱。1980年5月24日，李維漢建議鄧小平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肅清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兩人在回顧黨史上對毛澤東的造神運動時，鄧小平坦承其個人也有責任。石光樹：〈李維漢建議鄧小平肅清封建餘毒〉，載楊天石主編，《百年潮》雜誌社編：《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251–252。

[8-1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下冊，頁943。

[8-17]Lowell Dittmer, "Patterns of Elite Strife and Succession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123 (September 1990): pp. 414–419.

[8-18]趙紫陽：《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台北：時報文化，2009），頁252–253。

[8-19]〈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載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15–216。

[8-20]《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603–604。

[8-21]1980年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再次成立的中央書記處，乃「與中共八屆一中全會對其的規定基本一致」。其後，兩者在制度上比較明顯的差異，出現在領導中央書記處的中央總書記地位的變化。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繼續沿用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對中央書記處的定位。不同的是，在黨主席一職被取消後，繼續主持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其本身已作為黨的法定最高領導人超然於書記處之上」。易言之，此時的中央總書記既領導中央書記處（權力如同「文革」前的中央書記處），又是中央委員會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李林：〈中共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3期，頁19-20。

[8-22]〈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載《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246。

[8-23]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頁278、281。

[8-24]趙紫陽：《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頁147-148、210。

[8-25]〈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3/02/content_2637610.htm（2012年9月登入）

[8-26]針對胡耀邦、趙紫陽之間的職權爭論，鄧小平指示：胡耀邦與其領導的中央書記處雖「是要管經濟的，但主要是管大政方針，不要干預具體的經濟工作」。載趙紫陽：《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頁145-149。

[8-27]趙紫陽：〈關於黨政分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5/content_2550447.htm（2012年9月登入）

[8-28]趙紫陽對此即評論：「由於鄧多年形成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方式，所以一聽到李鵬的匯報就發表了那樣的講話（作者按：鄧將學潮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提出「快刀斬亂麻」加以解決）。這恐怕是主要原因。」趙紫陽：《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頁44。

[8-29]中國大陸中共黨史研究者（E君、L君）皆不約而同地指出：鄧小平深知「反右」擴大化的教訓，因此其雖在1989年決定鎮壓異議分子，然沒有像1957年那樣事後進行大規模的「秋後算帳」。（香港，2006年8月；北京，2007年1月）

[8-30]1989年9月16日，鄧小平表示：「參加過遊行、絕食的許多人思想轉變過來，要好多年，不是一兩個月的補課就行的。不能責怪參加絕食、遊行、簽名的人，只追究用心不良、觸犯刑律的帶頭的人。對學生，包括參加過絕食的學生，主要是教育。」〈我們有信心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327。

[8-31]《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944。

[8-32]《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880-881、905。

[8-33]《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冊，頁944。

[8-34]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頁3-39。

[8-35]〈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228。

[8-36]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表示：「如果過去沒有『左』的干擾，沒有1958年的波折，尤其是沒有文化大革命，不要說像我們現在這樣吸收世界先進經驗，不要說好多的雄心壯志，只要老老實實按部就班地幹，我們的工農業生產和科學、教育一定有了很大發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較大的改善。拿鋼來說，平平穩穩地發展，起碼也可以生產5,000萬噸到6,000萬噸，而且合用。」〈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載《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213。

[8-37]例如：1987年10月13日，鄧小平向匈牙利領導人表示：「建國後的頭八年，也就是從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們的發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當的。1957年下半年，我們在政治上開展了反右派鬥爭，當時反右是必要的，但擴大化了，打擊面太大了，這是錯誤的。接著就是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完全違背客觀實際情況，頭腦發熱，想超高速發展。從1957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1976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極端是『文化大革命』。」〈我們幹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253-254。

[8-38]《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冊，頁531。

[8-39]〈改革的步子要加快〉，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238。

[8-40]趙紫陽：《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頁175-176。

[8-41]趙紫陽：《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頁173。

[8-42]〈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要點〉，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376-377。

[8-43]〈目前的形勢和任務〉，載《鄧小平文選（1975-1982）》，頁214。

[8-44]〈各項工作都要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22。

[8-45]Richard Baum,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8-46]鄧小平雖在「文革」中多半處於閒置，然「文革」時期的高壓政治與低效經濟可說是承續鄧效力許多的「文革」前體制發展而來；鄧在「文革」後期曾短暫復出，從事整頓經濟、恢復秩序的工作，但其實主要還是對原有體制進行小修、小補。

[8-47]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表示：「建國以後，成功的地方我都高興。有些失誤，我也有責任，因為我不是下級幹部，而是領導幹部，從1956年起我就當總書記。那時候我們中國掛七個人的像，我算是一個。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工作搞對的有我的份，搞錯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時候的失誤都歸於毛主席。」〈發展中日關係要看得遠些〉，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54。1985年10月23日，鄧小平也對美國訪客表示：「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也是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那時候的一些錯誤我也要負責的，世界上沒有完人嘛。」〈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151。

[8-48]1986年9月2日，鄧小平表示：「就我個人來說，我從來不贊成給我寫傳。我這個人，多年來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錯事。『文化大革命』前，我們也有一些過失，比如『大躍進』這個事情，當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沒有反對過，說明我在這個錯誤中有份。如果要寫傳，應該寫自己辦的好事，也應該寫自己辦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錯事。」〈答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問〉，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173。1989年9月4日，鄧小平也表示：「我多次拒絕外國人要我寫自傳。如果自傳只講功不講過，本身就變成了歌功頌德，吹噓自己，那有什麼必要？」〈改革開放政策穩定，中國大有希望〉，載《鄧小平文選》，第3卷，頁317。

徵引文獻

檔案文獻

(一) 中國大陸

〈9月25日中央電話會議紀錄彭真同志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1，案卷號27。

〈9月26日省委電話會議上陶鑄同志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1，案卷號27。

〈中央同志對乃比里工作的口頭指示〉，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6，目錄號1，案卷號157。

〈中央批轉李先念同志「關於立即突擊調運糧油棉和成立調運指揮部的報告」〉，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22，目錄號2，案卷號3。

〈中央關於增掛林彪、鄧小平同志像的通知〉，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4，目錄號1，案卷號395。

〈毛主席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談話紀要〉（1957年12月8日），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6，目錄號1，案卷號116。

〈王鶴壽同志在10月9日中央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27，目錄號4，案卷號1。

〈李雪峰同志在省市委工業書記會議上的發言〉，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1，案卷號27。

〈討論計劃問題時中央同志的發言紀錄〉，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2，目錄號4，案卷號1。

〈彭真同志在10月9日中央電話會議上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27，目錄號4，案卷號1。

〈彭真同志在省市委工業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1，案卷號27。

〈鄧小平同志在上海市委工業會議上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2，案卷號204。

〈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的報告〉，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6，目錄號1，案卷號122。

〈鄧小平同志同拉丁美洲12國兄弟黨學習代表團談話紀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號102-00036-14(1)。

〈鄧小平同志同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團長莫拉夫斯基的談話紀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號109-00894-02(1)。

〈鄧小平同志率領的我黨代表團參加羅黨代大會時與印尼共領導人艾地的談話記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檔案號109-02838-02。

〈薄一波同志1月7日在全國工業交通工作會議上的總結〉，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21，目錄號4，案卷號8。

〈關於工業企業的整風問題——李雪峰同志在1958年1月20日在遼寧省委工業企業整風匯報會議上的講話〉，廣東省檔案館，全宗號219，目錄號2，案卷號144。

(二) 海外收藏檔案

〈1月31日小平同志在省市第一書記會上的講話〉，1959年1月31日。

〈4月19日中央電話會議上李先念同志的講話〉，1959年4月9日。

〈中央批轉四川省委關於省委第一屆第十一次會議情況的報告〉，1959年10月13日。

〈中央書記處1959年10月15日電話會議上李先念同志講話紀要〉，1959年10月15日。

〈中央辦公廳轉發安徽省委關於試行包工包產責任制情況的報告〉，1961年5月3日。

〈中共四川省委關於堅決反對右傾思想、增產節約糧食、勝利渡過災荒的指示〉，1959年9月2日。

〈井泉同志傳達八屆八中全會關於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的報告〉，1959年8月30日。

〈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簡報〉，第10期，1958年7月27日。

全國糧食廳局長會議秘書處：〈關於1958-59年度糧食分配及有關問題的初步意見（草稿）〉，1958年7月。

安法孝：〈省委檢查團瀘州分團敘永檢查組關於敘永天堂公社部分生產隊推行紅苕「包產到戶以產計工」辦法的報告〉，1959年8月4日。

安法孝：〈關於瀘州專區在整頓鞏固人民公社工作中幾個問題的檢查報告〉，1959年9月1日。

〈胡喬木同志5月8日給主席的信〉，1961年5月8日。

〈鄧小平同志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未全件），1958年7月19日。

〈鄧小平同志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1月26日。

〈鄧小平、彭真同志5月10日給主席的信〉，1961年5月10日。

〈譚震林同志在十省市小麥座談會上的總結〉，1959年2月21日。

（三）美國

"Comrade B on the Plot of the Reactionary Chinese Clique against Vietnam,"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legacy.wilsoncenter.org/coldwarfiles/files/Documents/Document_Le%20D

"Discussion between Zhou Enlai, Deng Xiaoping and Ho Chi Minh (May 17, 1965),"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3061>

"Discussion between Deng Xiaoping and Le Duan (September 29, 1975),"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126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CCCPC, Deng Xiaoping (December 8, 1959),"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1248>

"Stenographic Transcript of Discussions held with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elegation to the 9th Congress of Romanian Communist Party (July 26, 1965),"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http://digitalarchive.wilsoncenter.org/document/110017>

Chiang Kai-shek Diarie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Wei, E., writings," 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Stanford University, California, 2006C14-9.13.

沈志華、楊奎松主編：《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第

1至3、6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2009）。

（四）台灣

國史館，全宗名：蔣中正總統文物，卷名：武裝叛國（一四七），典藏號：002-090300-00170-119。

國史館，全宗名：蔣中正總統文物，卷名：武裝叛國（一四八），典藏號：002-090300-00171-290。

國史館，全宗名：蔣中正總統文物，卷名：武裝叛國（一五八），典藏號：002-090300-00181-204。

國史館，全宗名：蔣經國總統文物，卷名：中美關係（一），典藏號：005-010100-00055-010。

國史館，全宗名：軍事委員會侍從室，卷名：鄧小平，典藏號：129000045607A。

（五）英國

"Notes on leading personality in China (1955),"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FO371/114984.

"Leading personalities in China (1956)," The National Archives, United Kingdom, FO371/120875.

其他原始文獻

（一）中國大陸

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總第2015期，1956年10月10日。

——：《內部參考》，總第2152期，1957年3月14日。

——：《內部參考》，總第2180期，1957年4月16日。

——：《內部參考》，總第2311期，1957年9月16日。

——：《內部參考》，總第2313期，1957年9月18日。

——：《內部參考》，總第2343期，1957年10月26日。

——：《內部參考》，總第2344期，1957年10月28日。

——：《內部參考》，總第2374期，1957年12月4日。

——：《內部參考》，總第2386期，1957年12月23日。

——：《內部參考》，總第2716期，1959年2月25日。

（二）台灣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編印：〈共匪「黨外整風運動」的實質〉，《專題研究》，第38期，1957年12月9日。

——：〈法國共產黨之研究〉，《專題研究》，第41期，1956年12月31日。

行政院設計委員會編印：〈匪幫最近的重要人事調整〉，《匪情研究資料》，第7輯，1953年3月。

對共軍事研究會編印：《朱毛匪軍重要人物調查》，1957年12月。

「文革」資料

（一）言論醞編

人民出版社資料室編：《批判資料：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集》。北京：1967。

中國科學院革命歷史研究所、近代革命史研究所編印：《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醞編》。北京：1967。

中國科學院革命歷史研究所、近代革命史研究所編印：《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醞編》。北京：1967年4月。

中國科學院運動辦公室印：《不肯改悔的走資派鄧小平言論摘錄》。北京：1976年3月。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資料組編印：《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鄧小平反動言論》。北京：1967。

北京地質學院東方紅公社、國家測繪總局二分局計算隊翻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首長講話選編》。北京：1967年3月。

安徽打倒曾希聖四川調查團、東方紅八二六東方紅縱隊、東方紅八二六水電校八三一、中共中央西南局機關革命造反指揮部：《打倒曾希聖》，第1集。成都：1967年11月。中國文革研究網：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8036>

首都紅代會中國人民大學三紅揪鄧兵團：《鄧小平反革命修正主義言

論文章匯編》，第1至2集。北京：1967。

國防部情報局叢書編輯委員會：《劉少奇問題資料專輯》。台北：國防部情報局，1970。

（二）革命小報

「1025」批鬥劉鄧賀羅籌備處：《1025戰報》，第6期，1967年9月19日。大連鐵道學院紅色造反團主辦：《紅鐵道》，第3號，1967年2月11日。工人造反報、財貿戰士、體育戰報、反到底、東方紅、新北大：《大會專刊》，聯合版第2期，1967年3月23日。

——：《大會專刊》，聯合版第5期，1967年4月13日。

——：《大會專刊》，第8期，1967年6月2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測繪學院井岡山紅色造反團：《井岡山戰報》，第3期，1967年1月16日。

中國人民解放軍藝術學院星火燎原革命造反隊：《星火燎原》，第3期，1967年1月18日。

毛澤東思想紅衛兵瀋陽總部編：《紅衛報》，第53期，1967年7月12日。

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新北大》編輯部編：《新北大》，第28期，1967年1月20日。

——：《新北大》，第61、65期，1967年4月18日。

北京工業學院革命造反委員會紅代會北工紅旗編輯部：《北工紅旗》，第62期，1967年9月6日。

北京工農兵體育學院革命委員會：《體育戰線》，第12號，1967年8月31日。

——：《體育戰線》，專刊，1968年5月25日。

——：《體育戰線》，第25號，1968年6月7日。

北京郵電學院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郵東方紅公社：《北郵東方紅》，第47期，1967年8月12日。

北京郵電學院革命委員會、首都紅代會北郵東方紅公社：《北郵東方紅》，第54期，1967年9月21日。

北京礦業學院革命委員會、紅代會北京礦院東方紅：《東方紅》，第

98期，1968年5月1日。

打倒趙健民聯合作戰部：〈大叛徒大特務大黑手趙健民的反革命罪行調查〉，《紅宣兵》，第42期。中國文革研究網：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17901&fpage=29>

甘肅師範大學革命造反總部編：《東方紅戰報》，第14期，1967年6月21日。

——：《東方紅戰報》，第16期，1967年6月28日。

石家莊魯迅（狂人）公社紅衛兵第二革命造反司令部、北京郵電學院革命委員會首都紅代會北郵東方紅公社：《狂人、北郵東方紅聯合版》，1967年9月4日。

西安地區大中院校文革統一指揮部西軍電（臨）西北工業大學文革委員會、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西軍電紅衛兵總部、西工大紅衛兵總部主辦：《新軍電、西北工大合刊》，第52期、第73期，1967年9月13日。

全國赴石五湖四海戰鬥兵團：《捉鱉》，第10期，1967年9月19日。

東北工學院紅旗紅衛兵造反團東工紅旗編輯部：《東工紅旗》，第4期，1967年7月10日。

林業部東方紅公社《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第2期，1967年9月28日。

河北大學毛澤東思想「八一八」紅衛兵《八一八戰報》編輯部：《八一八戰報》，第54期，1967年3月16日。

河北保定工代會籌委會、河北保定鐵路工代會、河北保定市貧代會聯合主辦：《百萬工農》，第35期，1968年1月22日。

河南二七公社批鬥陶文聯絡站：《鬥陶文戰報》，第5期，1967年11月1日。

河南二七公社河南農學院紅衛兵總部：《河南省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個司令部鬥爭的由來和發展》，1967年7月。中國文革研究網：
<http://www.wengewang.org/read.php?tid=28033>

河南省革命造反派總指揮部主辦：《中州烈火》，第12期，1967年6月10日。

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聯合委員會編：《大批判》，第3期，1967年9月3日。

青海省東方紅公社、東方紅紅衛兵指揮部主辦：《東方紅》，第7期，1967年3月11日。

——：《東方紅》，第9期，1967年3月18日。

《長春公社》報編輯部：《長春公社》，第16期，1967年9月2日。

哈爾濱林業系統紅色造反團總部主辦：《鬥私批修報》，創刊號，1967年10月15日。

紅代會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北京公社八八戰鬥報：《北京公社》，第34期，1967年8月8日。

紅代會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東方紅》編輯部：《東方紅》，第45期，1967年8月30日。

紅代會北京工農兵體育學院毛澤東主義兵團主辦：《體育戰線》，第18期，1967年4月2日。

紅代會清華大學井岡山報編輯部：《井岡山》，第81期，1967年9月6日。

紅衛兵成都部隊成大支隊成都大學八三一戰鬥團：《八三一戰報》，第24期，1967年6月6日。

紅衛兵重慶警備區重慶大學紅衛兵八一五戰鬥團主編：《8·15戰報》，第61期，1968年4月20日。

重慶紅衛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鬥團主辦：《8·15戰報》，第20期，1967年5月12日。

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聯絡站：《東方紅》，第18號，1967年1月31日。

首都紅代會中央民族學院東方紅公社《民院東方紅》編輯部：《民院東方紅》，第32、33期，1967年10月20日。

首都紅代會北京林學院東方紅公社：《北林東方紅》，第9期，1967年3月20日。

首都醫革會健康報延安公社《全無敵》編輯部主辦：《全無敵》，第9期，1967年5月19日。

國務院財貿系統革命造反聯絡委員會主編：《財貿紅旗》，第7期，1967年8月11日。

——：《財貿紅旗》，第9期，1967年8月30日。

湖南大學文革籌委會宣傳組、湖南大學東方紅聯合指揮部宣傳組、高司湖大總部宣傳部編：《大字報選》，第17期，1967年3月22日。

——：《大字報選》，第18期，1967年3月28日。

——：《大字報選》，第26期，1967年5月15日。

雲南衛生系統八二三戰鬥兵團、昆明市衛生系統八二三白求恩兵團合編：《白求恩戰報》，第19、20號，1967年10月27日。

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首都紅代會中國科技大學東方紅：《四二二戰報、東方紅》，第44期，1967年8月26日。

衛生系統革命造反派《全無敵》編輯部主辦：《全無敵》，第8期，1967年5月12日。

（三）資料編輯

宋永毅等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2。

譚放、趙無眠選輯：《文革大字報精選》。香港：明鏡出版社，1996。

年譜、日記

（一）年譜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劉少奇年譜》，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陳雲年譜（1905–1995）》，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吳殿堯主編：《朱德年譜》，新編本，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紀》。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

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周均倫主編：《聶榮臻年譜》，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徐則浩編著：《王稼祥年譜（1906–1974）》。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黃瑤主編：《羅榮桓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鄭仲兵、盛平：《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香港：時代國際，2005。

（二）日記

宋雲彬：《紅塵冷眼》。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

郭小蕙整理：〈郭小川日記（1957中）〉，《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3期，頁144–174。

——：〈郭小川日記（1957下）〉，《新文學史料》，1999年第4期，頁39–79。

楊尚昆：《楊尚昆日記》。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鄭文翰著，王焰、王業志、王承光補注：《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

文集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6–11、13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1996。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上）》，第22冊。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85。

《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編委會匯編：《鄧力群國史講談錄》，第3、7冊。北京：2000–2002。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特殊館藏：《反右文件》。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印：《毛澤東思想萬歲》。台北：1974。

曾希聖：《曾希聖文選（1939–196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鄧小平文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薄一波著作編寫組編：《薄一波書信集》，下冊。北京：中黨史出版社，2009。

地方志

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山東省志·大事記》，中冊。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8。

中共四川省委研究室：《四川省情》。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吉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吉林省志·中國共產黨志》。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安徽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安徽省志·大事記》。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安徽省志·水利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安徽省金寨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金寨縣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安徽省宿州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宿州市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安徽省宿縣地區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宿縣地區志》。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

河南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河南省志·大事記》。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河南省志·共產黨志》。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

青海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青海省志·糧食志》。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海南州州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

廣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廣東省志·水利續志》。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

鞍山市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編：《鞍山市志·黨政群團卷》。瀋陽：瀋陽出版社，1993。

蘇樺主編：《當代安徽大事記（1949–1985）》。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蘇樺、侯永主編：《當代中國的安徽》，上冊。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

回憶資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回憶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二編研部編：《話說周恩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話說劉少奇——知情者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第三編研部編：《話說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永遠的小平：卓琳等人訪談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解放軍檔案館編：《回憶軍事家鄧小平》。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中共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李井泉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

中共保定市委黨史研究室：〈親切的關懷，永恆的記憶——1958年鄧小平視察保定〉，《黨史博采》（河北），2004年第11期（總第200期），頁42–43。

毛毛：《我的父親：鄧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

——：《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台北：雙大旅遊出版社，

2000。

——：《我的父親鄧小平》，圖文版，中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大象出版社，2004。

水靜：《特殊的交往——省委第一書記夫人的回憶》。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2。

王力：《現場歷史：文化大革命紀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

——：《王力反思錄》。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

王凡、東平：《紅牆醫生：我親歷的中南海往事》。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王亞志回憶，沈志華、李丹慧整理：《彭德懷軍事參謀的回憶：1950年代中蘇軍事關係見證》。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王炳南：《中美會談九年回顧》。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85。

本書編委會編：《好主任鍾期光上將》。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

伍修權：《回憶與懷念》。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朱仲麗：《王稼祥夫人朱仲麗自傳三部曲》，第3卷。北京：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4。

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下卷。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

安振英：〈1961–1962：河北省甄別平反〉，《炎黃春秋》，2008年第2期，頁5–8。

余秋里：《余秋里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吳冷西：《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北京：新華出版社，1995。

——：《十年論戰——1956–1966中蘇關係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

吳欣峰：〈1958年軍委擴大會議真相〉，《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頁6–11。

吳法憲：《吳法憲回憶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

宋文彬：〈檢查兩個錯誤〉，宋文彬文史資料研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mlnf.html

——：〈我對原溫江地區農業大躍進中的兩個特殊問題的主要情況的交代〉，宋文彬文史資料研究：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02vw.html

宋任窮：《宋任窮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下集。台北：世界書局，1998。

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台北：時報文化，1993。

李海文、王燕玲編：《世紀對話：憶新中國法制奠基人彭真》。北京：群眾出版社，2002。

李雪峰：〈關於黨的八大召開前後的歷史片段回憶〉，《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4期（總第297期），頁8-12。

——：《李雪峰回憶錄（上）——太行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李雪峰紀念文集》編輯組：《李雪峰紀念文集》（北京：未出版，2007年）。

李富春：〈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的說明（節錄）〉（1964年5月18日），《黨的文獻》，1996年第3期，頁11-14。

李慎之：〈胡喬木在1956-1957年的「右派言論」〉，《炎黃春秋》，2011年第2期，頁75-76。

李嵐清：《突圍——國門初開的歲月》。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

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1。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

李銳：《大躍進親歷記》。海口：南方出版社，1999。

——：《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 ：《李銳談毛澤東》。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 李輝：〈與張光年談周揚〉，學術中國網：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029>
- 李輝：〈與李之璉談周揚〉，學術中國網：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403>
- 1邱會作：《邱會作回憶錄》，上冊。香港：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1。
- 周林：〈貴州「四清運動」的幾個問題〉，政協貴陽市委員會網站：
<http://www.gyszx.gov.cn/wenshi/showDetail.asp?id=1795>
- 周星夫：〈憶六十年代山東的甄別工作〉，《中共黨史資料》，2006年第2期，頁100-108。
- 周爾均、周秉德主編：《百人訪談周恩來》。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
- 金冶主編：《回憶譚震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 金翠珍：〈毛主席視察蜀山人民公社的記憶〉，安徽文化網：
<http://www.ahage.net/hefei/11846.html>
- 阿成：《我肩負的使命——馬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阿成回憶錄之四》。吉隆坡：21世紀出版社，2007。
- 姚錦：《姚依林百夕談》。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8。
- 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胡績偉：《胡績偉自述（1953-1976）》，第2卷。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
- 范明著，郝瑞整理：《西藏內部之爭》。紐約：明鏡出版社，2009。
- 師哲口述，師秋朗筆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
- 耿飆：《耿飆回憶錄（1949-1992）》。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

馬永順、朱雨滋、齊翔安編：《齊燕銘紀念文集》。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

馬利列 (R. Malile) 著，王洪起譯：《我眼中的中國政要》。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1999。

崔奇：《我所親歷的中蘇大論戰》。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

張文澄口述，李暢培記錄整理：〈我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紅岩春秋》，1999年第3期，頁59-63。

張宗遜：《張宗遜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0。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張開濟：〈國慶十大建築設計追憶〉，《縱橫》，1996年第9期，頁24-26。

張培森整理：〈楊尚昆1986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炎黃春秋》，2009年第3期，頁29-36。

張勝：《從戰爭中走來：兩代軍人的對話》。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7。

張愷帆口述，宋霖記錄整理：《張愷帆回憶錄》。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

張震：《張震回憶錄》，下冊。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梁文斌：〈我向中央告省委〉，《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頁59-61。

梁靈光：《梁靈光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莫文驊：《莫文驊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

郭戰平、趙曦主編：《真情見證：開國領袖的親情家事》。南京：鳳凰出版社，2009。

陳人康策劃、口述，金汕、陳義風著：《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

陳平、伊恩沃德 (Ian Ward)、諾瑪米拉佛洛爾 (Norma Mirafior) 合

著：《我方的歷史》〔My Side of History〕。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4。

陳伯達：《陳伯達遺稿——獄中自述及其他》。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陳劍編：《與陳平對話：馬來亞共產黨新解》。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6。

陳曉農編纂：《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香港：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順長江，水流殘月》。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7。

曾自：〈向毛澤東進言「包產到戶」——記我的父親田家英〉，《中國黨政幹部論壇》，2004年第3期，頁61-62。

曾志：《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9。

童小鵬：《風雨四十年》，第2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黃文歡：《越中友好與黎筍的背叛》。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黃克誠：《黃克誠自述》，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黃崢執筆：《王光美訪談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

楊公素：《滄桑九十年：一個外交特使的回憶》，白鹿書院：
<http://www.oklink.net/01/0419/csjs/index.html>

楊尚昆：《追憶領袖戰友同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楊尚昆等著：《我所知道的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

楊得志：《楊得志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

蜀山區地方志辦公室：〈小平同志在蜀山人民公社三個多小時的前前後後——訪原蜀山人民公社黨委書記錢朝聖〉，人民網：
<http://ah.people.com.cn/GB/channel9/37/200806/26/134879.html>

路憲文：〈「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地方文革史交流網：<http://www.difangwenge.org/simple/?t5618.html>

- 廖漢生：《廖漢生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3。
- 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香港：卓越文化出版社，2006。
-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
- 趙發生：〈我為共和國經管糧倉24年〉，《炎黃春秋》，2003年第3期，頁33-38。
- 趙紫陽：《國家的囚徒——趙紫陽的秘密錄音》。台北：時報文化，2009。
- 齊錫玉：〈為鄧小平同志作翻譯的點滴回憶〉，《當代世界》，2004年第2期，頁32-35。
- 劉立強：〈「信陽事件」後劉建勳在河南〉，《炎黃春秋》，2009年第9期，頁64-70。
- 劉振德：《我為少奇當秘書》，增訂本。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 劉華清：《劉華清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
- 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8。
- 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
- 鄧自力：《坎坷人生》。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0。
- 黎之：〈回憶與思考——整風、鳴放、反右〉，《新文學史料》，1995年第1期，頁92-107。
- 蕭克：《蕭克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
- 蕭勁光：《蕭勁光回憶錄》，續集。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8。
- 錢其琛：《外交十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
- 閻明復：〈回憶兩次莫斯科會議和胡喬木〉，《當代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3期，頁6-21。
- ：〈聽阿爾希波夫談中蘇關係〉，《百年潮》，2007年第11期，頁10-17。
- ：〈1964年羅共調停中蘇關係始末（二）〉，《百年潮》，2010年第9期，頁7-11。

閻明復、朱瑞真：〈1959年赫魯曉夫訪華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2006年第4期，頁30-57。

——：〈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十年〉，《百年潮》，2007年第1期，頁15-21。

——：〈赫魯曉夫對中國「大躍進」運動的反應〉，《百年潮》，2007年第8期，頁9-13。

薄一波：《領袖、元帥、戰友》。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薛暮橋：《薛暮橋回憶錄》。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鞠開：〈二十六年蒙冤去，三十六年慰忠魂——回憶逆境中的粟裕〉，《縱橫》，2003年第8期，頁11-13。

——：《在跟隨粟裕的日子裏》。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

聶力：《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6。

聶榮臻：《聶榮臻回憶錄》。香港：明報出版社，1991。

羅東進：《我的父親羅榮桓》。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3。

羅點點：《點點記憶——紅色家族檔案》。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1999。

蘇維民：〈楊尚昆談在中央辦公廳二十年〉，《百年潮》，2008年第7期，頁17-23。

——：〈楊尚昆憶兼任中直機關黨委書記〉，《百年潮》，2009年第1期，頁19-23。

龔育之：《龔育之回憶：「閻王殿」舊事》。南昌：江西出版集團、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顧達壽：〈蘇聯外交官眼中的鄧小平〉，《領導文萃》，2011年第11期，頁53-56。

〈半杯殘酒見為人——胡志明鱗爪〉，《廣東黨史》，2007年第2期，頁19-20。

〈笑在百花前——艾地聽取游擊戰爭經驗介紹〉，《廣東黨史》，2007年第2期，頁21-22。

〈叩訪富強胡同六號〉，博訊新聞網：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china/2005/01/200501301027.shtml>

中文專著

丁抒：《陽謀：反右派運動始末》，修訂版。香港：開放雜誌社，2006。

丁家琪：《從少尉到元帥：中國元帥葉劍英》。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

丁龍嘉、聽雨：《康生與「趙健民冤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

——：《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研究室，1998。

——：《鄧小平研究述評》，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毛澤東傳（1893-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百年小平》。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逢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金沖及、陳群主編：《陳雲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著：《鄧小平畫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5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部編：《鄧小平再造中華輝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鄧小平的歷史足跡》。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

中共北京市委《劉仁傳》編寫組編：《劉仁傳》。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中共湖北省委黨史研究室：《「大躍進」運動（湖北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等編：《鄧小平與大西南》。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少華、游胡：《林彪的這一生》。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文輝抗、葉健君主編：《新中國第一代：省（市、區）委書記、省（市、區）長卷》，上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王昊、王紀一：《開國上將葉飛》。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王爾敏：《史學方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朱正：《兩家爭鳴：反右派鬥爭》。台北：允晨文化，2001。

《江華傳》編審委員會：《江華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

吳東峰：《開國將軍軼事》。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

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

呂書正：《解讀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宋連生：《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始末》。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2。

李丹慧編：《中國與印度支那戰爭》。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

——：《北京與莫斯科：從聯盟走向對抗》。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李向東、王增如：《丁陳反黨集團冤案始末》。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李健：《鄧小平三進三出中南海》。北京：中國大地出版社，1993。

李端祥：《城市人民公社運動研究》。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6。

李穎、程美東主編：《與鄧小平一起親歷歷史》。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李先念傳》編寫組編：《李先念傳（1949–1992）》，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

杜維運：《史學方法論》。台北：三民書局，1989。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出版社，2007。

沈志華：《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派運動（1956–1957）》。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蘇聯專家在中國》。北京：新華出版社，2009。

阮銘：《中共人物論》。紐澤西：八方文化企業公司，1993。

房維中、金冲及主編：《李富春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林蘊暉：《烏托邦運動——從大躍進到大饑荒（1958–1961）》。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

武市紅、高屹主編：《鄧小平與共和國重大歷史事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邵維正主編：《鄧小平百年百事》。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4。

施昌旺：《王稼祥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中國人民解放軍六十年大事記》。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

《徐向前傳》編寫組：《徐向前傳》，第2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徐則浩：《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

——：《在歷史的風陵渡口》。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

張戎、喬·哈利戴（Jon Halliday）著，張戎譯：《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香港：開放出版社，2006。

張江明選編：《廣東歷史問題研究——廣東「地方主義」平反研究資料》。廣州：學術研究雜誌社，2000。

張素華：《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張素華主編：《毛澤東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張湛彬、劉杰輝、張國華編：《大躍進和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國》。北京：中國商業出版社，2001。

張雄文：《無冕元帥——一個真實的粟裕》。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張黎群、張定、嚴如平、唐非、李公天主編，唐非撰：《胡耀邦傳》，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

郭明主編：《中越關係演變四十年》。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2。

郭德宏、林小波：《四清運動實錄》。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陳永發：《延安的陰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修訂版。台北：聯經出版社，2001。

陳修良撰述，唐寶林編著：《拒絕奴性——中共秘密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傳》。香港：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

陳徒手：《人有病天之否：1949後中國文壇紀實》。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陳野萍、韓勁草：《安子文傳略》。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文化公司，1992。

章重：《東湖情深：毛澤東與王任重十三年的交往》。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粟裕傳》編寫組：《粟裕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

《彭真傳》編寫組、田酉如：《彭真傳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彭德懷傳記組：《彭德懷全傳》，第3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曾希聖傳》編纂委員會：《曾希聖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

舒雲：《林彪事件完整調查》，上冊。紐約：明鏡出版社，2006。

賀金瑞、孫晶：《走近鄧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賀龍傳》編寫組：《賀龍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黃瑤、李志經、楊國慶：《羅帥最後十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楊天石主編，《百年潮》雜誌社編：《鄧小平寫真》。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

楊立編著：《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廣州：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1997。

楊光斌：《中國政府與政治導論》。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9。

楊國宇、陳斐琴、陳鶴橋、劉備耕編：《二十八年間三編——從師政委到總書記》。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下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

雷厲：《歷史風雲中的余秋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

當代廣東研究會編：《嶺南紀事》。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

《當代中國人物傳記》叢書編輯部編輯：《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

萬家安：《與歷史對話（二）——戰後馬共策略的探討》。Kajang Selangor：當代本土史料研究室，2008。

董保存：《譚震林外傳》。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

趙慶東、劉文耀、吳啟權主編：《鄧小平與四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劉金田：《水乳交融——人民中的鄧小平》。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4。

劉金田、張愛茹：《鄧小平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

劉源：《劉少奇與新中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5。

劉漢、黃瑤等著：《羅榮桓元帥》。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劉鑒銓主編：《青山不老：馬共的歷程》。Selangor：星洲日報，2004。

《劉伯承傳》編寫組：《劉伯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

潘敬國主編：《共和國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滕敘充：《風雨彭門：彭德懷家風、家事》。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鄭謙、龐松、韓鋼、張占斌：《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發展概要》。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

《鄧小平思想研究》叢書編審委員會：《鄧小平思想研究》，第2卷。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3。

《鄧子恢傳》編輯委員會編：《鄧子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蕭冬連：《共和國年輪·1961》。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蕭冬連等著：《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下冊。北京：紅旗出版社，1999。

閻潤魚：《共和國歷史上的鄧小平》。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戴煌：《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修訂版。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4。

鍾文、鹿海嘯：《百年小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鍾文編：《鄧小平外交風采實錄》。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鍾灝編著：《鄧小平的理論與實踐縱覽（1938–1965年）》。北京：遼

寧人民出版社，1991。

叢進：《曲折發展的歲月》。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羅瑞卿傳》編寫組：《羅瑞卿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7。

《羅榮桓傳》編寫組：《羅榮桓傳》，第2版。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

蘇台仁主編：《鄧小平生平全紀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

龔士其主編：《楊獻珍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

中文論文

丁龍嘉：〈趙健民在20世紀50年代反「左」〉，《炎黃春秋》，2012年第10期，頁15-21。

尹曙生：〈安徽特殊案件的原始記錄〉，《炎黃春秋》，2009年第10期，頁62-63。

——：〈省長王昭之死〉，《炎黃春秋》，2010年第10期，頁8-14。

王海光：〈60年代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載郭德宏、王海光、韓鋼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卷2）：曲折探索（1956-1966）》。成都：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頁548-601。

——：〈徵糧、民變與「匪亂」——以中共建政初期的貴州為中心〉，載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編：《中國當代史研究》。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輯1，頁201-233。

朱世力：〈走近安徽省博物館的老一輩革命家們〉，《江淮文史》，2009年第2期，頁4-11。

朱楹：〈粟裕大將蒙冤始末〉，《文史精華》，2000年第12期，頁4-10。

江鯤池：〈曾希聖軼事〉，《江淮文史》，1994年第4期，頁72-79。

——：〈鄧小平與安徽經濟體制改革〉，《江淮文史》，2004年第5期，頁4-12。

——：〈桂林棲桐城蹲點記〉，《江淮文史》，2005年第5期，頁70-90。

——：〈鄧小平與曾希聖〉，安徽文化網：
<http://www.ahage.net/fengyun/11900.html>

莊金興、夏明星：〈被譽為「諸葛先生」的參謀上將李達〉，《黨史博采》，2005年第1期，頁37-42。

何立波：〈「稱職的好參謀長」李達上將〉，《文史天地》，2005年第2期，頁22-27。

——：〈吳芝圃與大躍進運動〉，《黨史文苑》，2006年第12期，頁4-11。

——：〈「八府」參謀長郭天民上將〉，《黨史博采》，2009年第9期，頁29-33。

余敏玲：〈俄國檔案中的留蘇學生蔣經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9期（1998年6月），頁103-130。

宋霖：〈道德節操黨性之光——紀念張愷帆誕辰100週年〉，《江淮文史》，2008年第5期，頁47-77。

李林：〈中共中央書記處組織沿革與功能變遷〉，《中共黨史研究》，2007年第3期，頁13-21。

李穎：〈新中國中央辦公廳主任崗位上的楊尚昆〉，《中共黨史資料》，2007年第3期，頁153-163。

杜光：〈中央高級黨校反右派內幕〉，《炎黃春秋》，2005年第9期，頁1-8。

周燕：〈顧全大局的李井泉〉，《黨史博覽》，2009年第11期，頁29-35。

孟東：〈軍委訓練總監部的建立與撤銷〉，《黨史博覽》，2002年第10期，頁49-52。

林蘊暉：〈高崗事件與中共高層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上的分歧〉，《二十一世紀》，2003年8月號（總第78期），頁62-68。

——：〈朱可夫事件與彭德懷廬山罷官〉，《百年潮》，2004年第2期，頁30-34。

——：〈1958年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紀實〉，《黨史博覽》，2005年第3期，頁4-9。

武市紅：〈鄧小平對中國農村現代化的探索與思考〉，《黨的文

獻》，2006年第6期，頁61-66。

金津：〈馬共的革命與終結〉，《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頁82-87。金磊、李沈：〈流金歲月中的經典：「國慶十大工程」設計回顧〉，《百年潮》，2006年第2期，頁48-54。

東夫：〈李井泉和四川大饑荒的特殊成因〉，載宋永毅、丁抒編：《大躍進——大饑荒：歷史和比較視野下的史實和思辨》，上冊。香港：田園書屋，2009，頁333-353。

南畝：〈劉鄧的好參謀長〉，《黨史博采》，2000年第11期，頁18-20。

洪小夏、劉俊平：〈淮海戰役總前委辨析〉，《史林》，2009年第3期，頁101-110。

范曉春、孫寶元：〈第三次包產到戶與四清運動〉，《黨史研究資料》，2002年第8期（總第301期）（2002年8月），頁15-24。

原不二夫：〈馬來亞共產黨與中國〉，《南洋資料譯叢》，2001年第4期（總第144期），頁26-39。

徐明：〈吳芝圃與河南大躍進運動〉，《二十一世紀》，1998年8月號（總第48期），頁37-47。

徐焰：〈緬甸共產黨興亡始末與教訓〉，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dangshi.people.com.cn/BIG5/85039/13375411.html>

高連升：〈淺析1958年解放軍反「教條主義」的鬥爭〉，《軍事歷史》，1994年第1期，頁7-10。

高華：〈在貴州「四清運動」的背後〉，《二十一世紀》，2006年2月號，頁75-89。

張崇：〈建國初期的首都建設和「國慶十大工程」〉，《北京黨史》，1999年第1期（總第114期），頁46-47。

張國星：〈關於右派的人數和性質〉，《黨史博覽》，2005年第6期，頁50-51。

張雄文：〈將來可入正史的粟裕秘聞（一）〉，張雄文的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547a3010009m7.html

——：〈無奈的歷史：劉伯承與鄧小平的真實關係〉，張雄文的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c547a30100f8p0.html

梁丞：〈粟裕大將的蒙冤與平反〉，《百年潮》，1999年第8期，頁4-10。

郭其僑：〈蕭克將軍談「三次站錯隊」〉，《炎黃春秋》，2007年第7期，頁33-34。

郭道暉：〈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頁1-7。

陳充：〈北有青島，南有湛江——紀念鄧小平百年誕辰〉，湛江黨史網：<http://www.zjds.org/ReadNews.asp?NewsID=670>

——：〈為了湛江的騰飛——中央三代領導集體對湛江的關懷〉，《廣東黨史》，2000年第1期，頁11-14。

陳東林：〈硝煙瀰漫的西部開發——60年代三線建設決策始末（上）〉，《黨史博覽》，2001年第1期，頁4-10。

——：〈硝煙瀰漫的西部開發——60年代三線建設決策始末（下）〉，《黨史博覽》，2001年第2期，頁22-26。

馮子豪：〈小河潺潺之四〉，紅杏詩社：
<http://hxs700.blog.163.com/blog/static/6647145720093210453124/>

楊曉璐：〈真情攻破「馬其諾」——李達上將與夫人張乃一的情感世界〉，《黨史縱覽》，2007年第3期，頁49-52。

趙生暉：〈1965年中央組織部關於黨的建設的三個報告的形成過程〉，《中共黨史資料》，1994年總第52期，頁12-21。

趙紫陽：〈關於黨政分開〉，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5/content_2550447.htm

齊德學：〈彭德懷與1958年反教條主義鬥爭〉，《軍事歷史》，1998年第5期，頁45-46。

劉以順：〈60年代初安徽農村責任田始末〉，《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8期（總第205期）（1994年8月），頁2-12。

——：〈毛澤東在安徽推廣責任田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資料》，總第54期，（1995年7月），頁102-122。

——：〈鄧子恢在安徽推行「責任田」前後〉，《黨史縱覽》，1999年第6期，頁13-16。

劉松茂：〈李富春和國家計委的改組〉，《百年潮》，2000年第6期，

頁20–25。劉金田、張愛茹：〈1958年的鄧小平〉，《黨史博覽》，2003年第8期，頁8–9。

劉彥培：〈「李世農反黨集團事件」的真相及其歷史經驗〉，《江淮文史》，2006年第1期，頁168–176。

鄧偉志：〈評柯慶施〉，《江淮文史》，2004年第1期，頁4–22。

曉農、疆文：〈彭德懷劉伯承的誤會與糾葛〉，《黨史文苑》，2005年第1期，頁26–32。

蕭勇、宗躍：〈鄧子恢與人民公社化運動〉，《黨史博采》，1999年第1期，頁11–14。

戴寶村：〈台灣歷史上的八七水災〉，台灣歷史學會：
<http://www.twhistory.org.tw/20010806.htm>

謝蔭明、郭曉燕：〈鄧小平1961年北京順義調查〉，《黨的文獻》，2004年第5期，頁65–71。

鍾延麟：〈鄧小平與1959年廬山會議〉，《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第15卷第2期（2007年12月），頁121–154。

——：〈大躍進運動中的軍方活動〉，《二十一世紀》，2008年4月號（總第106期），頁57–68。

——：〈中共建政後周恩來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49–197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2009年11月），頁169–220。

——：〈劉少奇與鄧小平關係之研究（1952–1966）〉，《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4期（2010年11月），頁115–164。

——：〈鄧小平在「高饒事件」中之角色與作為〉，《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22卷第4期（2010年12月），頁521–562。

關良桂、夏明星：〈譚冠三中將在西藏〉，《黨史文苑》，2006年第10期，頁22–27。

〈戰神走出硝煙——劉伯承夫人汪榮華憶劉伯承〉，《黨史博采》，2000年第8期，頁26–29。

〈60–70年代的西哈努克、波爾布特與中國〉，沈志華、李丹慧個人網站：http://www.shenzhijhua.net/ynzz/000032_2.htm

〈1960年安徽省各縣市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表〉，大飢荒檔案：
<http://www.yhcnw.net/famine/Data/Anhui/anhui00b.html>

〈中國共產黨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案〉，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3/02/content_2637610.htm

〈中華民國臺閩地區歷年人口總數、年增加、自然增加、出生數、死亡數、結婚對數、離婚對數及其比率〉，中華民國內政部戶政司全球資訊網：<http://www.ris.gov.tw/ch4/static/yhs109800.xls>

〈引言：關於黎笥談越中關係的報告〉，冷戰中國網：
http://www.coldwarchina.com/kfda/ynda/000585_2.html

〈印尼「九·三十事件」〉，中國社會科學院網站：
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b/yc_b_060.htm

〈巡視〉，合肥報業網：
<http://www.hf365.com/epublish/gb/special/class000000031/1/hwz487751.htm>

〈鄧小平在安徽的珍貴照片〉，安徽文化網：
http://www.ahage.net/photo/11532_3.html

〈「鄧小平同志1960年2月24日視察蚌埠」連體戳〉，郵之趣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78ac3a0100hw8z.html

英文專著

Armstrong, J. D. *Revolutionary Diplomacy*.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7.

Bachman, David. *Bureaucracy, Economy, and Leadership in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Baum, Richard. *Prelude to Revolution: Mao, the Party, and the Peasant Question, 1962–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Burying Mao: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ge of Deng Xiaopi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Becker, Jasp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Henry Holtand Company, 1996.

Chandler, David P. *Brother Number One: 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Pol Po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9.

Chen, King C. *China's War with Vietnam, 1979: Issues, Decisions, and Implications*.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Stanford University, 1987.

Dikötter, Frank.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0.

Domenach, Jean-Luc. *The Origin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ase of One Chinese Provi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5.

Duiker, William J. *China and Vietnam: The Roots of Conflict*.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6.

Franz, Uli. *Deng Xiaoping*. Boston: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8.

Goldstein, Avery. *From Bandwagon to Balance-of-Power Politics: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olitics in China, 1949–197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Goodman, David S. G.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1994.

Huang, Jing. *Factionalism in Chinese Communist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Kallgren, Joyce K., Noordin Sopiee, and Soedjati Djihadono, eds. *ASEAN and China: An Evolving Relationship*.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8.

Khrushchev, Nikita Sergeevich. *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New York: Little Brown, 1974.

Kiernan, Ben.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A History of Communism in Kampuchea, 1930–1975*. London: Verso, 1985.

Kuhn, Philip A. *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MacFarquhar, Roderick.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 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8–19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oming of the Cataclysm 1961–196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c Farq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Mozingo, David P. *Chinese Policy toward Indonesia, 1949–1967*.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6.

Potter, Pitman B. *From Leninist Discipline to Socialist Legalism: Peng Zhen on Law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the PR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Ruan, Ming. *Deng Xiaoping: Chronicle of an Empir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Shambaugh, David. *The Making of a Premier: Zhao Ziyang's Provincial Career*.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4.

Swanstrom, Niklas. *Foreign Devils, Dictatorship, or Institutional Control: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Southeast Asia*. Uppsala, Sweden: Uppsala University, Dept. of Peace and Conflict Research, 2001.

Taylor, Jay.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Peking's Relations with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New York: Praeger, 1976.

Teiwes, Frederick C. *Provincial Party Personnel in Mainland China 1956–1966*. New York: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67.

———. *Politics and Purges in China: Rectifi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Party Norms, 1950–1965*. Armonk,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 *China's Road to Disaster: Mao, Central Politicians, and Provincial Leaders in the Unfolding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1955–1959*. New York: M. E. Sharpe, 1999.

———. *The End of the Maoist Era: Chinese Politics during the Twiligh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72–1976*. Armonk: M. E. Sharpe, 2007.

Vogel, Ezra F.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Wang, Eugene H. C. *Chinese Communists and Thailand*.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1966.

Yang, Benjamin. *Deng: A Political Biography*.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Yang, Jisheng. *Tombstone: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 1958–1962*.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2012..

英文論文

Dittmer, Lowell. "Patterns of Elite Strife and Succession in Chinese Politics." *The China Quarterly* 123 (September 1990): pp. 405–430.

———.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34 (July 1995): pp. 1–34. Dreyer, June Teufel. "Deng Xiaoping: The Soldier."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p. 536–550.

Forster, Keith. "Localism, Central Policy, and the Provincial Purges of 1957–1958: The Case of Zhejiang."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edited by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pp. 191–233.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Masaya, Shiraishi. "Vietnamese Communists' Perception of China: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載許文堂主編：《越南、中國與台灣關係的轉變》，頁230–245。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南亞區域研究計劃，2001。

Naughton, Barry. "Deng Xiaoping: The Economist."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p. 491–514.

Pye, Lucian W. "An Introductory Profile: Deng Xiaoping and China's Political Culture."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p. 412–443.

Shambaugh, David. "Deng Xiaoping: The Politician."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p. 457–490.

Teiwes, Frederick C. "Mao and His Lieutenant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9/20 (Jan. –Jul., 1988): pp. 1–80.

———. "Interviews on Party History."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edited by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pp. 339–353.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 "The Chinese State during the Maoist Era." In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 edited by David Shambaugh, pp. 105–160.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Teiwes, Frederick C., and Warren Sun. "The Politics of an 'Un-Maoist' Interlude: The Case of Opposing Rash Advance, 1956–1957." In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edited by Timothy Cheek and Tony Saich, pp. 151–190. New York: M. E. Sharpe, 1997.

———. "China's New Economic Policy under Hua Guofeng: Party Consensus

and Party Myths," *The China Journal* 66 (July 2011): pp. 1–23.

Whyte, Martin King. "Deng Xiaoping: The Social Reformer."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p. 515–535.

Yahuda, Michael. "Deng Xiaoping: The Statesman." *The China Quarterly* 135 (September 1993): pp. 551–572.

報刊

《人民日報》，1954、1957–1960、1963–1965、2004年。

《文匯報》，1958年。

《解放軍報》，1960年。

《紅旗》，1959–1960年。

《新華半月刊》，1958年。

後記

這本書是在我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大幅改寫而成的。其內容架構的安排以至具體文字的斟酌，皆首推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陳永發先生的教導。很感謝他在我未曾修過他的課、僅看過我兩、三篇文章的情況下，即願意擔任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對於我選擇以「文革」前十年的鄧小平為研究主題，他認為資料難尋而有所保留，但最後也尊重我的意見並悉心惠予指導。在我取得博士學位以後，陳老師不斷地鞭策我將博士論文修改為書稿。在他的鼓勵和督促下（他細心審閱過的就有四、五個書稿版本），最終形成了本書現在的面貌。書中存有的不足和錯誤，概因我個人的認識和能力水平之故。

何其有幸地，在我寫作此書的過程中，也獲得海內外諸多老師的不吝指導與提攜，在此對他們表示由衷的感謝。包括：中國大陸的林蘊暉老師（感謝其多年來對我不倦的教導並慨然為本書作序）、高華老師（感念其生前對我的指引，讓我知曉在資料稀缺的情況下，仍可有所作為）、李海文老師、韓鋼老師、沈志華老師、熊景明老師，以及許多位不便具名的當代中國史的師表與先進。澳大利亞的孫萬國老師（其追求歷史真相的毅力和勤勉不懈的治學精神，最讓我感佩）、美國的葉文心老師、羅德明（Lowell Dittmer）老師、林孝庭教授。

台灣方面，我首先要感謝培養我的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謝謝帶我走上中共黨史研究的引路人關向光老師，邱坤玄、魏艾、李英明、寇健文歷任所長，以及施哲雄、耿曙、王信賢諸位教授。國內的陳鴻瑜教授、齊茂吉教授、克思明教授，以及我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期間所有曾給予我鼓勵和支持的師長和學者，特別是余敏玲、翟志成、吳啟訥、孫慧敏和陳耀煌諸位教授，我在此表示深切的謝意。另外，亦要藉此機會向陪我一起求學、成長的同窗好友賴皆興、許志吉、蔡文軒、張廖年仲表達感謝之意。

我真誠地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甘琦社長和林穎主編，在關於鄧小平的著作已是汗牛充棟、其中又多有名家創作的情況下，仍願受理送審、安排出版本書。這對於一名初出茅廬的後生學子而言，是一個多麼大的正面激勵！我也要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林驍小姐，細心熱情地協助我完成書稿付梓前甚為繁瑣的最後準備過程。

最後，我要深深地感謝父親鍾瑞光、母親鄒秋五對我的養育之恩。我的雙親、岳父母、姐姐們和哥哥，多年來對我漫長的求學和求職之路所給予的各種溫暖支持和溫情鼓勵，讓我感激不已。當初我在市場主流和研究

興趣之間猶豫不定之時，我的愛妻陳雅琪是最旗幟鮮明支持我選擇所好的人。她兩度毅然放棄工作，陪我旅美訪澳、為我持家育子，只為成就我個人的學業。她在我感到徬徨之時，堅定我的心志；在我覺得沮喪之刻，振奮我的心緒。她也讓我知道，在研究寫作之外還有生活樂趣的一面。我們與兒子枝穎在墨爾本的甜蜜家庭生活，助我熬過等待書稿審查結果、苦尋工作出路的那段日子。

我要將這本書獻給我敬愛的父母和親愛的妻子。

鍾延麟

2013年6月13日

於政治大學

More books in the series

- 1.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腎延敏行：積極面對慢性腎病
- 2.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學以為已：傳統中國的教育
- 3.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報人報國：中國新聞史的另一種讀法

[Search “CUHK Series” in Kindle Store for more books](#)

More series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 1.[CUHK Series: Search “CUHK Series” in Kindle store](#)
- 2.[Maijia Spy Series: Search “Maijia Spy Series” in Kindle store](#)
- 3.[HKAC Series: Search “HKAC Series” in Kindle store](#)
- 4.[ZBT Series: Search “ZBT Series” in Kindle store](#)
- 5.[EMBA Series: Search “EMBA Series” in Kindle store](#)
- 6.[Classic Novel Series: Search “Classic Novel Series” in Kindle store](#)

More books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Search “Info Rainbow LTD” in Kindle Store](#)